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 1917 年十月革命至 1991 年底 70 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 8 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档案文献共编为4个专题，即“苏联与战后保加利亚”、“苏联与战后阿尔巴尼亚”、“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及其后果”，以及“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

“苏联与战后保加利亚”（1944年10月至1948年12月）：专题选编了43件档案，主要是有关战后保加利亚各派政治力量（以保加利亚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与苏联政府和苏联驻保加利亚机构，苏联政府内部各机构，以及苏联驻保机构与苏联政府之间往来的信件、电报、报告、批示和会谈记录等文献，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确立绝对领导地位期间，苏联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及苏保关系的发展状况。

“苏联与战后阿尔巴尼亚”（1946年4月至1948年12月）：专题选编了17件档案，主要是有关战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与苏联党和政府，苏联驻阿机构与苏联政府之间往来的信件、电报、报告和会谈记录等文献，反映了在欧洲冷战格局形成时期，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以及阿南、苏阿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及其后果”（1945年11月至1949年9月）：本专题选编的档案是对本档案集第22卷“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专题的补充，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有关1948年2月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和接触的文件，包括当年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和保共领导人科拉罗夫关于会谈内容的记录，苏南

代表向各自领导人汇报会晤结果的报告，以及铁托对此做出的反应等等。

“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专题选编了47件档案文献，主要是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华沙协商会议前有人提出重新建立共产国际的建议情况，会议期间各党代表的发言记录，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会议进展情况给斯大林的通报，以及会议做出的各项决议，大体反映了共产党情报局筹备和建立的过程。斯大林与多列士的长篇谈话则表明了苏联党和法国党对会议结果的态度。

沈志华

2000年12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24 - 1

苏联与战后保加利亚

(1944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

专题说明.....:..... 24 - 1

№09144 比留佐夫关于与保加利亚开始停战谈判的条件
致格奥尔吉耶夫的信 (1944 年 10 月 11 日) 24 - 4

№09145 格奥尔吉耶夫关于保政府同意停战谈判先决条件
给比留佐夫的复信 (1944 年 10 月 11 日) 24 - 5

№09157 切列帕诺夫关于保加利亚准备审判战犯情况给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1944 年 11 月 23 日) 24 - 6

№09159 葛罗米柯向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递交的关于
保加利亚战犯的照会 (1944 年 12 月 5 日) 24 - 8

№09160 雅科夫列夫与莫沙诺夫关于保加利亚形势及英国
在保政策的谈话纪要 (1944 年 12 月 6 日) 24 - 9

№09168 列维奇金与舒列夫关于审判保加利亚战俘情况的
谈话纪要 (1945 年 1 月 20 日) 24 - 14

№09169 科斯托夫在联共 (布) 中央国际情报部关于
保加利亚形势的报告 (摘录)
(1945 年 1 月 26 日) 24 - 16

- №09187** 比留佐夫与维辛斯基关于保加利亚可能出现政府危机的电话记录（1945年4月6日） 24-28
- №09196** 列维奇金与奥博夫关于保加利亚农民党内部情况的谈话纪要（1945年5月10日） 24-30
- №09199** 列维奇金与巴夫洛夫关于政府危机发展情况的谈话纪要（1945年6月4日） 24-32
- №09204** 格奥尔吉耶夫关于向保民警局提供武器和汽车致比留佐夫的请求信（1945年7月2日） 24-37
- №09206** 比留佐夫关于Г.季米特洛夫出走问题与杰卡诺佐夫的电话记录（1945年7月18日） 24-39
- №09207** 列维奇金与巴夫洛夫关于保加利亚政治局势的谈话纪要（1945年7月18日） 24-41
- №09211** 比留佐夫和基尔萨诺夫关于保议会选举问题给维辛斯基的电话记录（1945年8月16日） 24-47
- №09213** 比留佐夫关于美国对保议会选举延期所持立场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话记录（1945年8月22日） 24-49
- №09216**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政府及摄政委员会请求苏联对保加利亚问题表态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1945年8月22日） 24-51
- №09217** 比留佐夫和基尔萨诺夫关于盟国管制委员会商议保加利亚大选事宜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5年8月24日） 24-53
- №09218** 列维奇金转述斯泰诺夫关于大选的照会及苏方答复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1945年8月25日） 24-57
- №09226** 杰卡诺佐夫关于保政府请求提供武器和交通工具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10月24日） 24-59

目 录

- №09227** 拉夫里舍夫关于“环节”人民联盟会议情况
给潘友新的报告（1945年10月29日） 24-61
- №09228** 比留佐夫关于保政府改组问题与美国记者艾特
里奇的谈话记录（1945年10月29日） 24-64
- №09229** 苏军南方集群政治部关于保加利亚选举给总政治部
第七局的报告（1945年10月） 24-73
- №09233** 基尔萨诺夫关于格奥尔吉耶夫同艾特里奇的谈话
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45年11月12日） 24-77
- №09234** 季米特洛夫与拉夫里舍夫关于保加利亚议会选举
不容再推迟的电话记录
（1945年11月12日） 24-79
- №09244** 莫洛托夫关于三国外长会议结果与米哈尔乔夫的
谈话纪要（摘录）（1945年12月27日） 24-81
- №09250** 斯大林与格奥尔吉耶夫等人关于莫斯科会议决议
执行情况的谈话记录（1946年1月7日） 24-86
- №092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保加利亚缔结
和约的指示（1946年3月21日） 24-94
- №09297**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加利亚在选举问题上如何答复
美国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6年10月3日） 24-98
- №09299** 基尔萨诺夫关于反对派在保议会选举前夕频繁
活动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6年10月26日） 24-101
- №09302** 季米特洛夫关于保新政府和议会主席团组成问题
给日丹诺夫的信（1946年11月5日） 24-103
- №09305**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反对派报刊驳斥苏联广播
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6年12月28日） 24-105

- №09308** 列维奇金与哈里扎诺夫关于选举后保社会情绪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18日) 24-107
- №09332**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农民联盟状况等问题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5月20日) 24-110
- №09350**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与科斯托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8月11日) 24-113
- №09358** 克鲁格洛夫关于帮助保政府组织边防军勤务工作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7年10月3日) 24-116
- №09359** 列维奇金关于保社会民主党内部状况与昌科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10月9日) 24-119
- №09362** 列维奇金与特莱科夫关于保农民阵线政治状况的谈话纪要 (1947年10月23日) 24-125
- №09363**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祖国阵线发展前景与科拉罗夫和科斯托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10月23~24日) 24-129
- №07478** 列维奇金和昌科夫关于保社会舆论对祖国阵线宣言反映的谈话纪要 (1947年11月21日) 24-132
- №07480** 基尔萨诺夫与季米特洛夫关于保新宪法草案的谈话纪要 (1947年12月7日) 24-134
- №094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国家安全部接受保工作人员来学习的决定 (1948年4月5日) 24-136
- №09501**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保共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调查报告 (不晚于1948年6月3日) 24-137
- №09528** 科诺瓦洛夫与沙班斯基关于保加利亚向苏联专家提供经济情报的谈话纪要 (1948年12月13日) 24-144

苏联与战后阿尔巴尼亚

(1946年4月至1948年12月)

专题说明	24 - 146
№09267 莫洛托夫与塔什科关于阿尔巴尼亚政治形势的 谈话纪要 (1946年4月20日)	24 - 148
№09270 曼奇哈关于阿尔巴尼亚之行的报告 (摘录) (1946年5月14日)	24 - 151
№09271 丘瓦欣与霍查关于阿尔巴尼亚党内斗争的 谈话记录 (摘录) (1946年5月20日)	24 - 157
№09279 丘瓦欣与霍查关于阿政府代表团访南结果的 谈话记录 (1946年7月3日)	24 - 161
№09280 苏斯洛夫关于佐泽提供的阿共领导层情况给 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7月13日)	24 - 168
№09293 丘瓦欣与斯皮鲁关于斯库台市暴动的谈话纪要 (1946年9月13日)	24 - 171
№09296 丘瓦欣关于阿共领导人状况与霍查的谈话纪要 (摘录) (1946年9月21日)	24 - 174
№09330 丘瓦欣关于对马列绍瓦免职的反应与科奇· 佐泽的谈话纪要 (1947年5月12日)	24 - 178
№09347 莫洛托夫关于阿同苏联及相邻巴尔干国家关系与 霍查的谈话记录 (摘录) (1947年7月15日)	24 - 182
№09366 斯皮鲁关于其受到阿共政治局审查与加加林 诺夫的谈话记录 (1947年11月19日)	24 - 187
№09513 丘瓦欣与霍查关于阿国内政治形势的谈话记录 (1948年3月16日)	24 - 190

- №09518** 普赫洛夫和曼奇哈关于阿共第八次中央全会的
报告 (1948年5月15日) 24-196
- №09505** 莫洛托夫与霍查关于阿南关系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8年6月24日) 24-198
- №09524** 丘瓦欣与佐泽关于在阿共一大发言进行自我
批评的谈话纪要 (1948年11月5日) 24-203
- №095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阿共领导人立场的
评价给丘瓦欣的电报
(1948年11月20日) 24-207
- №09527** 丘瓦欣与尼沙尼关于佐泽的错误及阿南、
阿苏关系的谈话纪要 (1948年12月7日) ... 24-208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及其后果

(1945年11月至1949年9月)

- 专题说明** 24-211
- №09241** 丘瓦欣关于斯洛文尼亚局势和新政府组成原则与
卡德尔的谈话纪要 (摘录)
(1945年11月29日) 24-213
- №09333** 莫洛托夫关于向铁托介绍联共(布)中央给法共
中央信件给拉夫连季耶夫的指示
(1947年6月7日) 24-216
- №05546** 拉夫连季耶夫关于铁托在南人民阵线
第二次大会上讲话向莫斯科的报告 (节录)
(不早于1947年9月27日) 24-218
- №11662** 斯大林关于阿尔巴尼亚局势给铁托的信 (节录)
(1947年12月23日) 24-219

- №11663** 苏联领导人关于南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问题给铁托的电报（节录）（1948年2月1日）…… 24-220
- №11664** 拉夫连季耶夫关于铁托对苏联来电反应给苏联领导人的报告（节录）（1948年2月1日）… 24-221
- №11665** 莫洛托夫关于要求南共领导人访苏给铁托的紧急电报（1948年2月2日）…………… 24-222
- №08496** 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摘录）（1948年2月10日）…………… 24-223
- №08497** 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0日）…………… 24-233
- №08500** 卡德尔等人关于2月10日会谈情况给南共中央的电报（1948年2月11日）…………… 24-243
- №08498** 苏南关于就重要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议定书（1948年2月11日）…………… 24-244
- №08499** 莫洛托夫关于军事援助和贷款等问题与卡德尔的会谈纪要（1948年2月12日）…………… 24-245
- №08502** 卡德尔关于同莫洛托夫会谈情况给铁托的电报（1948年2月13日）…………… 24-247
- №08503** 铁托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1948年2月13日）…………… 24-248
- №09502** 季赫尔关于情报局刊物上表现的反南倾向给主编尤金的信（1948年6月7日）…………… 24-249
- №09506** 情报局秘书处关于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南共五大的决定摘录（1948年7月5日）…………… 24-252
- №03657** 经互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同南斯拉夫关系的决议（1949年4月28日）…………… 24-254
- №03658** 苏联政府关于指责南反苏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1949年9月28日）…………… 24-255

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

(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

专题说明	24 - 257
№11661 拉科西关于新国际在匈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摘录)(1946年5月17日)	24 - 259
№09295 赖赫里关于恢复共产国际问题给斯大林的信 (1946年9月20日)	24 - 262
№0931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赖赫里来信的 结论性意见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2月7日)	24 - 263
№09351 巴拉诺夫关于华沙会议议事日程和苏联代表团 与会问题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7年8月15日)	24 - 272
№11618 第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开幕式会议记录 (1947年9月22日)	24 - 274
№11621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波工人党活动 情况的报告(1947年9月22日)	24 - 280
№11622 马林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联共(布)工作 情况的报告(1947年9月22日)	24 - 298
№11649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情报局会议第一天情况 给斯大林的通报(1947年9月22日)	24 - 320
№11623 契尔文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保工人党活动 情况的报告(1947年9月23日)	24 - 322
№11624 杜克洛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法共活动情况的 报告(1947年9月23日)	24 - 336

- №11650**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契尔文科夫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3日) 24-347
- №11651**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杜克洛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3日) 24-349
- №11625** 斯兰斯基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捷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3日) 24-352
- №11626** 乔治乌-德治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罗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3日) 24-370
- №11652**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斯兰斯基和乔治乌-德治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24-380
- №11627** 卡德尔和吉拉斯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南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4日) 24-385
- №11628** 隆哥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意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4日) 24-406
- №11629** 雷瓦伊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匈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4日) 24-418
- №11630** 马林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会议日程安排的发言 (1947年9月24日) 24-433
- №11653**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卡德尔、隆哥和雷瓦伊等人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24-436
- №11654**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将情报局驻地设在华沙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24-441
- №11631** 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1947年9月25日) 24-443
- №11632** 吉拉斯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5日) 24-474

- №11633** 波克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5日) 24-484
- №11655**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会议讨论情况和情报局
驻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5日) 24-489
- №11656**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接到斯大林指示的
通报(1947年9月25日) 24-491
- №11634** 杜克洛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492
- №11635** 斯兰斯基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00
- №11636** 卡德尔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07
- №11637** 法尔卡什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21
- №11638** 隆哥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26
- №11639** 波普托莫夫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52
- №11640**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58
- №11641** 雷瓦伊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65
- №11642** 巴什特万斯基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24-569
- №11657**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对日丹诺夫报告的
讨论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6日) 24-571

- №11658**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法共和意共已承认错误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7日) 24-580
- №11659**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各党同意协调行动和
确定情报局驻地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7日) 24-581
- №11643** 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辩论的
总结发言 (1947年9月27日) 24-582
- №11644**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建立共产党
情报局的发言 (1947年9月27日) 24-588
- №11647** 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制定委员会的
讨论记录 (1947年9月27日) 24-593
- №11648** 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制定委员会
第二次讨论的记录 (1947年9月28日) 24-596
- №11645** 各国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会议宣言、
决议和公报草案的讨论
(1947年9月28日) 24-605
- №11646** 共产党情报局9月28日会议通过宣言、决议等
有关文件的记录 (1947年9月28日) 24-614
- №11660**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宣言、决议和公报已获
通过的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8日) 24-623
- №093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党情报局波兰
会议结果的决议
(1947年10月27日) 24-625
- №06566** 斯大林与法共中央书记多列士的会谈记录
(1947年11月18日) 24-627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保加利亚

(1944年10月至1948年12月)

本专题选编的43件档案，反映了从战争结束到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确立绝对领导地位期间，苏联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及苏保关系的发展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原是德国法西斯营垒的成员。1944年8月，保加利亚工人党与农民联盟的“普拉德内”派、爱国军人组织“环节联盟”、社会民主工党左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代表成立了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准备推翻王国政府。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祖国阵线随即发动起义，配合苏军行动。9月9日，祖国阵线政府宣告成立。“环节”联盟领导人基蒙·格奥尔吉耶夫出任总理，工人党掌握着内务部和司法部。政府宣布的施政纲领包括了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等内容。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祖国阵线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特别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领袖格·米·季米特洛夫（格梅、格梅托）回国并担任总书记后，在祖国阵线内部组织了反对派。尽管在苏联和工人党的压力下格梅托于1945年1月被迫辞职，但接任总书记佩特科夫继承了以往的政策，并宣布脱离祖国阵线，单独成立农民联盟反对派。6月，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卢尔切夫单独成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联合

派)，并于8月宣布退出祖国阵线。在英、美压力下，大选推迟到11月18日举行。此时，工人党领袖、著名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回国领导国内的斗争。祖国阵线在大选中以88.18%的得票率继续组织政府。1946年3月，国民议会选举工人党领导人科拉罗夫担任议长，组成格奥尔吉耶夫为总理的第二届祖国阵线政府。根据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建议，祖国阵线同意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进入政府。不久，反对派提出重新选举，工人党展开反击，逮捕了反对派领导人，查禁了两个主要反对派的报纸，并对军队进行改组，由工人党出任国防部长。9月8日通过全民公决废除了君主制。10月27日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工人党独得53%的选票，随后成立的第三届祖国阵线政府由季米特洛夫出任总理。1947年5月以后，工人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展了全面进攻：把数十名反对派议员逐出议会，并进行抄家；查封反对派的报纸；逮捕并处死佩特科夫；禁止民主党活动。在取缔反对党公开活动的同时，对祖国阵线内部也进行了整肃。

苏南矛盾的激化和冲突公开化以后，为了统一东欧各国党的思想和政策，苏联组织了对南共的批判，以达到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实行整肃的目的。因此，保加利亚工人党内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平过渡的思想以及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也受到了莫斯科的指责。在这种背景下，保加利亚工人党提出，祖国阵线内的各党都不得有自己的纲领，而要承认工人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为此，开始了打击各党内右翼，争取中间势力的斗争。1948年8月，社会民主党公开承认工人党的纲领和章程，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工人党。11月农民联盟也声明接受工人党的纲领，只保持组织上的独立。随后，其他各党宣布自动解散。自此，保加利亚从多党制过渡到两党制，实际上是工人党独掌政权。

这里刊出的档案显示了在保加利亚战后政治变换的过程中，苏联的方针和政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保加利亚工人党早在战争后期就提出了与南斯拉夫合并的意向。这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苏南

在巴尔干联盟问题上的冲突有一定帮助。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张廷文、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方琼)

№09144

比留佐夫关于与保加利亚开始停战谈判的条件 致格奥尔吉耶夫的信

(1944年10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讨论了保加利亚政府关于停战的请求^①，并确定开始停战谈判的必要前提是保加利亚政府履行义务，将保加利亚的全部军队和官员撤出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撤退必须立即开始，并从接到此通知的15日之内结束。为了检查和监督撤退过程，两个盟国政府将向保加利亚派出自己的代表。^②他们将在苏联代表的领导下，以盟国联合军事代表的身份行动。

比留佐夫^③

1944年10月11日

① 1944年9月9日，抵达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部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通报说，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已经对德宣战，并请求与苏联缔结停战协定。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关于停战的请求进行了审批，并于9月10日通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但是，在9月9日20点正式接到决定之前，乌克兰第3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就已向各部队司令员和指挥员下达了自22点00分开始停止在保加利亚的一切军事行动的命令。以苏联、英国和美国为一方，保加利亚为另一方的停战协定，于1944年10月28日在莫斯科签署。

② 美国和英国军事代表团于1944年10月5日和7日，即停战协定签署之前，陆续来到保加利亚。

③ C.C. 比留佐夫，乌克兰第3方面军副司令。

№09145

**格奥尔吉耶夫关于保政府同意
停战谈判先决条件给比留佐夫的复信**

(1944年10月11日)

我以保加利亚内阁的名义荣幸地通知您，保加利亚政府将全部执行您在今日第1855号来信中阐述的盟国政府的决定。

在此我还要补充说，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根据保加利亚政府的决定，早在昨日，即今年10月10日已经开始从希腊领土撤出，我昨日已荣幸地将此消息书面通知了您。撤出官员和将行政权力移交给当地居民则进行得更早一些，现已经结束。

为使盟国政府派出的军事代表团能够有可能对这一撤退过程进行检查和监督，保加利亚地方和军事当局将给予全面协助。

总理 基蒙·格奥尔吉耶夫
1944年10月11日于索非亚

№09157

切列帕诺夫关于保加利亚 准备审判战犯情况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1944年11月23日)

分送杰卡诺佐夫、佐林、诺维科夫^①、察拉普金、波日达耶夫

11月23日，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佩特科·斯泰诺夫拜会了我，并通知说国家公诉人彼得罗夫和司法部长奈切夫请他转告盟国管制委员会：

1. 他们对费洛夫^②、博日洛夫^③和加布罗夫斯基等人的侦查已经结束，为了最后起草起诉书，最好能审讯（如果可能）关在莫斯科的主犯^④，并希望得到被情报部列茨科夫中校没收和带到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内阁会议的某些记录的副本。

2. 由何人并在何处审判主犯：是由苏联还是盟国政府审判？将在莫斯科还是在保加利亚审判？

① K. B. 诺维科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二欧洲司司长。以下接收外交部文件的诺维科夫都是此人，而不是 H. Γ. 诺维科夫。

② B. 费洛夫，1940~1943年任保加利亚政府首相，1943~1944年为摄政会议成员。

③ B. 博日洛夫，1943~1944年任保加利亚政府首相。

④ 根据1943年德黑兰会议的决议，战时保加利亚政府领导人作为战争罪犯，应该交付国际法庭。于是，1944年9月他们被送交苏联军事当局。

3. 他们希望得到记录和照相复印件的编号。

切列帕诺夫^①

1944年11月23日于索非亚

^① А.И. 切列帕诺夫中将，驻保加利亚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苏联官员。

№09159

葛罗米柯^① 向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
递交的关于保加利亚战犯的照会

(1944年12月5日)

照会副本分送杰卡诺佐夫、佐林、诺维科夫、察拉普金和波日达耶夫。

受苏联政府委托，我荣幸地向您通知：

苏联军队进入保加利亚之后，苏联机构拘留和监护了保加利亚的某些人士，他们对将保加利亚拖入反对盟国的战争负有责任，其罪行应当受到审判。

被拘留的人员有：摄政委员会成员费洛夫、B. 基里尔亲王、H. 米霍夫中将、前保加利亚政府总理 B. 博日洛夫、前部长华西列夫等人。

现在，由于保加利亚开始审判战犯，保加利亚政府向苏联提出将被拘留的人员交还他们的问题，以便有可能在国内进行直接审判。

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政府的建议没有异议，但希望了解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苏联政府也向英国政府提出了类似的问题。^②

① 葛罗米柯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

② 同日，苏联驻英国大使古谢夫向英国外相艾登递交了同样的照会。1944年12月15日，英国方面在回函中同意了保加利亚政府的建议。12月18日美国政府也表示了肯定的意见。

No 09160

雅科夫列夫与莫沙诺夫关于保加利亚 形势及英国在保政策的谈话纪要

(1944年12月6日)

副本分送切列帕诺夫、拉夫里舍夫、维辛斯基和苏联外交部第四欧洲司，归档。

秘密

莫沙诺夫^① 宣称，他特别希望进行会晤，以便解释几个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有助于保加利亚的整个事业。他谈了以下两个问题：

1. 保加利亚的国内政治形势

国内形势相当复杂，代表祖国阵线的四个党^② 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竞争：每个党都在抢职位，到处安插自己的人。一场争夺影响和权力的斗争正在进行。对祖国阵线团结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这些党的所有领导人都热衷于党派之争，忘记了这些问题应当服从与德国法西斯作斗争这一共同目标。

这四个党闭关自守，都想从政治上限制其他民主力量治理国

① C. 莫沙诺夫，保加利亚前国民会议主席，曾参加与盟国在开罗的谈判。

②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成立于1942年，参加的政党有：保加利亚工人党（自1944年9月底改称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左派，“环节”政治集团（自1944年10月改称“环节”人民联盟），以及所谓独立的无党派社会活动家，主要是来自知识分子阶层。

家，为自己垄断权力创造条件，因此开始相互斗争。

国内的民主力量和知识分子袖手旁观，有意置身事外，害怕与人竞争，但恰恰是他们能够在某些党企图称霸时起到平衡作用。

1) 工人党。它承担了在政治上清理国家，促使保加利亚参战以及为了军事需要而在农村征粮的全部责任。这样一来，所有的政治错误全都算在了工人党的账上，并通过它转嫁到苏联身上。

工人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做法是不合理的。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可能参加政府持过分嫉妒的态度，认为这种情况将加强未来祖国阵线的资产阶级力量。

实际上，这样就使农民党和环节党^①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不必担心来自其他方面的竞争，从而有组织地反对工人党。已经成立的对苏友好协会，特别是在地方上，其领导机构的人都是工人党的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次要人物，他们不让广大的知识分子和著名社会人士参加这些协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形势，即工人党完全承担了使国家倒向苏联的所有工作，而本来应该吸引各阶层的居民，首先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参加这一事业。

工人党在执行国内政策问题上忘记了它参加的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因此犯了一系列策略性错误，特别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把隶属工人党的内务部的工作集中起来，也没有做到使该部的地方机关能够独立自主地工作，而是依照中央机关的指示办事。因此而出现了滥捕人的现象。从法西斯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强烈地反对自己的压迫者，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的现象。

2) 农民党。由于该党最著名的领袖吉切夫身陷囹圄，他的所有支持者，如亚历山大、奥博夫等农民党一批有政治经验的干部被

^① 战争期间组织的保加利亚爱国军人组织。

迫脱离党的工作，党的全部权力落入“政治新手”、明显的英国间谍格格·季米特洛夫^①手中。仅从季米特洛夫一度曾因为与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有联系，而不是因为政治活动被审判为间谍一事，就可以对他做出否定性评价，由他领导的农民联盟也不可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季米特洛夫竟然走到了这一步，即允许保英协会在农民联盟的办公室办公，他亲自担任协会副会长。

莫沙诺夫由此得出结论说，因此出现了这样一个形势：保加利亚与苏联接近的工作由工人党承担，与英国接近的工作由农民党承担。所有政治分歧，威胁到祖国阵线团结的因素皆由此而产生。

莫沙诺夫对季米特洛夫持尖锐批评的态度，并竭力表明，为了对季米特洛夫明显的亲英活动形成抗衡和中立的态势，必须把吉切夫吸收到党内。只有他能够消灭季米特洛夫的影响和力量，使农民党的主要干部摆脱季米特洛夫。

他认为，吉切夫将坚持亲俄方向。

3) 环节党。莫沙诺夫竭力表明，环节党对工人党忠心耿耿。对德·韦尔切夫的命令（对在前线表现突出的军官，人民法庭免于追究其责任）应当看成是在工作中缺乏政治经验，而不应当视为恶意的结果。他认为，环节党本身也没有预料到这一命令会导致军队和警察发生冲突，与工人党的关系紧张。

与此同时他指出，环节党并不是一个政党，仅仅是由军人和专家组成的集团。他们对政治一窍不通，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又强调指出，尽管基蒙·格奥尔吉耶夫是环节党的领导人和政府首脑，也是一名大政治活动家，但他忙于处理国家事务，因此党内的政治事务并不是由资深政治家领导的。

看来，莫沙诺夫想方设法保护环节党，把事情说成是：由韦尔

^① 此处指的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领袖格·米·季米特洛夫（格梅、格梅托）。

切夫的命令和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所引起的冲突并不是想达到与工人党发生冲突的目的。

莫沙诺夫宣称，他认为，参加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的所有政党完全有条件联合起来工作，政府承认这些党，人民也支持。莫沙诺夫认为，希腊、比利时和法国的政府受到外部势力的控制，那里的人民不愿意承认这些政府，这种事情在保加利亚是不会发生的。

在莫沙诺夫看来，为了缓和国内局势，必须让处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其他民主党派，首先是以尼古拉·穆沙诺夫为首的民主党人，参加国家的管理。他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过去一直是前法西斯政府反对派的穆沙诺夫，现在竟然被推翻了法西斯的现政府所逮捕。他说，如果我在索非亚而不在开罗，那我就不允许尼·穆沙诺夫参加穆拉维耶夫政府。

莫沙诺夫在谈话中多次强调指出，现在大批的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充当观察员角色。吸收这批力量参加管理国家将克服农民党在未来的国民会议选举中获得大多数席位的威胁。

2. 关于英国人在保加利亚的政策

莫沙诺夫与英国驻保加利亚代表博苏韦尔会晤过两次。两次会晤似乎都是后者主动提出的。

据莫沙诺夫声称，博苏韦尔跟他谈话时非常坦率，而且多次强调，莫沙诺夫能够，也可以说是应该，消除农民党因在宣传中过分片面地强调其亲英倾向，而给人留下的不正确的印象。

博苏韦尔似乎对格·米·季米特洛夫以及记者利瓦依的行为感到气愤，后者企图干涉保加利亚内政。他多次拜访部长、摄政者和社会活动家，造成他的行动是代表英国人的印象。利瓦依还拜会了被捕的民主党领导人穆沙诺夫，多次在许多场合说应当释放他等等。

博苏韦尔还说，英国人派自己的代表到莫斯科签署停战协议，

似乎并不是为了在实践中破坏与苏联关于苏联在保加利亚有优先地位的协议。

博苏韦尔指出，谁要是存有别的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保加利亚是苏军的军事行动区，因此所有在这儿的人，包括英国人，都应当服从苏联代表。博苏韦尔似乎说过，就是有人建议我离开，我也得坚持这一点。

总的印象是莫沙诺夫是替英国人说话，竭力让人相信英国人在保加利亚一贯维护苏联利益，他们并不同意，而不是同意格·米·季米特洛夫和农民党的亲英倾向。

盟国管制委员会副政治顾问 Д.Г. 雅科夫列夫

1944年12月6日于索非亚

№09168

列维奇金与舒列夫关于审判保加利亚 战俘情况的谈话纪要

(1945年1月20日)

分送给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1月20日，我应索非亚第一审判庭人民法官舒列夫的请求会见了。在就实质性问题进行交谈之前，舒列夫自我介绍说，1918年他曾经在俄国呆过，他热爱俄国和俄国人民，历来是亲俄派，拥护保加利亚同苏联密切接近。接着舒列夫说，尽管他在组织上同工人党没有联系，但是他在思想上是共产党人。

舒列夫说，他来这里是為了搞清俄国人对即将举行的关于战争罪犯的判决（指在索非亚市进行的对摄政者、皇室的顾问和大臣的第一次审判）的态度。舒列夫说，司法机关中各政党代表之间对即将举行的判决存在着本质上的分歧，所以他想知道苏联代表团的意见，以便在法庭上坚持这种意见。

我回答舒列夫说，这个问题不属于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司法机关完全有必要对罪犯的案件做出公证的判决，法官掌握着罪犯活动的具体材料，了解他们对保加利亚人民和盟国所犯下的罪行，知道保加利亚人民的情绪。还有，司法机关是人民的机关，足以避免法庭在判决时犯错误。

舒列夫说，人民的情绪是自发的，他不熟悉诉讼程序的细节。

例如，俄国人也认为，巴格里亚诺夫的罪行比穆拉维耶夫的罪行严重，但是诉讼程序却提供了相反的结果。^① 此外，舒列夫说，保加利亚没有独立的政策，它的政策取决于苏联的政策。所以，他们不能单独通过决定，想知道我们对判决的观点。

我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意见，舒列夫不满意地走了。

顺便说一下，有消息说，农民党的法庭成员带着同样的问题去找过英国人和美国人。

克·列维奇金^②

1945年1月20日于索非亚

① 巴格里亚诺夫和穆拉维耶夫领导了1944年6~9月的保加利亚战时最后一届政府。

② 克·达·列维奇金，盟国管制委员会驻保加利亚的苏联副政治顾问。

No 09169

科斯托夫在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 关于保加利亚形势的报告（摘录）

（1945年1月26日）

季米特洛夫：同志们，利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抵达莫斯科的机会，我们部请斯皮里多诺夫^①同志讲一讲保加利亚的形势，介绍保加利亚共产党及其活动的情况，以及祖国阵线目前面临的问题。

报告结束后请同志们提提问题，以便对在目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保加利亚所发生的一切有更全面的了解。^②

斯皮里多诺夫开始讲话。

斯皮里多诺夫：苏德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坚持通过开展破坏颠覆活动和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帮助苏联红军的方针。这项工作碰到了许多障碍，不能说我们做得很好，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过一系列加大我们工作难度的不利的客观环境。首先，德国人是在保加利亚加入三方条约以后作为“同盟国”进入我们国家的。他们允许占领马其顿和色雷斯，因此使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有可能宣传所谓的不流血实现保加利亚的国家理想。一开始他们对待居民彬彬有礼，拿什么东西都付钱，军事上的胜利使他们戴上了不可战

^① 斯皮里多诺夫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科斯托夫在党内的化名。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许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到苏联避难，他们大多被安排在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工作，其中的主要代表有：季米特洛夫（保加利亚）、哥穆尔卡（波兰）、赫布朗（南斯拉夫）、拉科西（匈牙利）、尼耶德利（捷克斯洛伐克）、贝尔曼（波兰）和明兹（波兰）。

胜的光环。戈培尔的间谍组织在我们国家开展了广泛的组织鼓动和宣传。

还有当局方面的残暴恐怖活动。保卫国家的法律被修改，规定了一些最严厉的惩办措施，后来这部法律中规定的不使用死刑这一点也被取消。

在共产党内，我们的方针也遇到了众所周知的对抗。一些同志说，由于现行的方针我们脱离了群众，使全部斗争的重担落到了一个政党肩上。此外还发现，组织破坏活动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搞到爆炸材料，还要会使用这些爆炸材料，而我们却没有这种技能。

由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国内抵抗运动的组织大大落后于南斯拉夫和希腊。某些同志，尤其是南斯拉夫党内的某些同志认为，我们的这种落后是由于我们党的机会主义消极性造成的。我们认为，这种解释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党在这一时期做了很多工作，做出了很多牺牲，许多共产党员被投入监狱。显然，应该寻找别的原因。我们落后于南斯拉夫和希腊是由各种各样的客观环境造成的。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当时的局势十分明朗。每个公民都很清楚，德国人是奴役者，是敌人。此外，旧的权力机构已被摧毁。而在我国，形势就不是那么明朗，法西斯权力机构被全部保留。因此必须在保加利亚人民中间进行大量的解释工作，以克服所有的障碍。需要有一段时间让德国“盟友”的面目自我暴露，使人民认识到他们是占领者，是肆意干涉我国内政、企图把我国变成希特勒德国农业附庸国的掠夺者。需要时间使全体人民知道，保加利亚不仅还没有实现自己的国家理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德国的殖民地。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全世界的人开始认识到，德国军队不仅是可战胜的，而且一定会被打败的。从那以后，我们的斗争进

程出现了转机。

红军 1944 年夏季在罗马尼亚的胜利和托尔布欣^① 的军队向多布罗加的保罗边境的推进加快了保加利亚的事态发展进程。……

进入我国并使法西斯分子丧失抵抗意志的红军对于 9 月 9 日的人民起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某些同志，尤其是南斯拉夫党的一些同志据此指责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了红军的胜利，9 月 9 日的事情只不过是红军的事情。从我给你们所讲的情况和罗马尼亚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国内抵抗运动的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红军也攻入了罗马尼亚，此外，罗马尼亚在战争中受到了重创。尽管如此，罗马尼亚的情况同保加利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新成立的祖国阵线政府面临着哪些问题呢？

第一，对付正在国家西部边境附近，并向这些边境进逼甚至入侵这一地区保加利亚领土的德国人的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终于恢复了军队的战斗力，并使战争的第一阶段顺利结束——把德国人从南塞尔维亚、马其顿和桑贾卡境内赶出去，粉碎了德军几个师。……

第二，新政府面临铲除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的问题。9 月 9 日以后的头几个星期中，一个最凶恶的敌人集团被革命制度消灭了。^②

季米特洛夫：这还不够。

斯皮里多诺夫：所有的法西斯组织都被解散了，制定了关于人民法庭的法律。我们将根据这一法律审判法西斯政府的所有部长、

① Ф.И. 托尔布欣元帅，时任乌克兰第 3 方面军司令，驻保加利亚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

② 指保加利亚工人党党员自行镇压法西斯分子的行动。在 1944 年 9 月 9 日以后的几周时间里，他们未经审判而镇压了 18000 多被捕者。

摄政者、宫廷谋士和数千名法西斯政策的积极执行者以及法西斯议会的所有议员。我们建立了劳动教养营，目前有将近 2000 名法西斯骨干分子被关在劳动教养营中。

季米特洛夫：你们还没有改造好法西斯分子，如果让他们修建桥梁和道路就好了。

斯皮里多诺夫：我们还是叫它劳动教养营。

已开始清洗国家机关，包括军队的机构。正在着手组建强有力的、有良好组织的人民警察机关以取代旧警察。

第三，政府面临着加强祖国阵线和祖国阵线共同运动委员会作为祖国阵线权力机关的群众基础及政治依靠力量的问题。……

第四，祖国阵线政府面临着为反对大保加利亚沙文主义而斗争的问题。保加利亚资产阶级在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后，用大国沙文主义精神培养了几代人，这是我国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遵照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我们在对保加利亚人民进行意识形态再教育方面开展了系统的长期工作。

第五个问题是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问题。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任务旨在使保加利亚各阶层劳动人民感觉到自己的物质状况与在法西斯制度下相比有某些改善，哪怕是不大的改善。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和提高某些农产品价格，这个问题已经部分解决。我们还面临着改善城乡供应和恢复经济生活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加强保加利亚的外交地位，旧制度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遗产。保加利亚在政治上孤立于整个民主世界，它被敌对和不信任所包围。首先是由于保加利亚积极参加反对德国人的战争，使我们突破了敌对和不信任的包围圈。为此必须得取得新南斯拉夫、取得铁托的同意，让保加利亚军队留在南斯拉夫境

内。根据1944年11月5日签订的协议，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①这一协议为两国的进一步亲近创造了前提条件：开始了派代表团互访，广泛开展了帮助南斯拉夫儿童的运动。等等。

与此同时，同西色雷斯希腊居民的关系也得到了调整，其途径是向希腊居民提供全部的公民权力，然后保加利亚军队撤出希腊领土。……

由于祖国阵线的这一政策，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停战的有利条件。

季米特洛夫：当然是相对比较有利的条件。

斯皮里多诺夫：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最有利的。所以说，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明显改善了。

祖国阵线各个政党和政府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巩固祖国阵线各政党的合作关系问题。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事情的进展远不是那么顺利和没有斗争。

我们同祖国阵线的其余政党的相互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在9月9日之前，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我们的盟友不断动摇。夺取政权以后他们开始提出大量要求，他们要求平分政权。

尽管如此，一开始总的说来还是友好的，甚至移居英国返回后领导农民联盟的英国代理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即所谓的格梅，也开始寻求同我们党的合作。祖国阵线的所有四个政党发表了共同宣言，确定了建设祖国阵线委员会的任务和方法。^②……

签订停战协定和有英国和美国代表参加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来到

① 原文如此。报告所说的协议日期有误。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员会与保加利亚政府之间关于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以及解决出现在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方面进行军事合作的协议，是1944年10月5日在克拉约瓦签署的。

②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的领导人于1944年10月12日发表宣言，确立以平等原则作为在各地成立祖国阵线委员会的基本原则。

我国以后，事情开始向坏的方面变化。显而易见，盟国对我们党在治理国家方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是受到英国人的影响的。……

在祖国阵线内部，开始出现了其他三个政党一致行动反对我们、反对所谓的祖国阵线中的“共产党淫威”的现象。

因此，祖国阵线的内部危机在12月份已成为不可避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危机呢？农民联盟领导人中的反祖国阵线分子展开了反对警察机关、反对内务部和反对共产党人的运动。……

祖国阵线的右派分子指望什么呢？要搞政变和把共产党人清除出权力机关——在国内有红军的情况下这未必是可能的。至少他们是想吓唬一下共产党人，并迫使他们做出让步。也可能他们梦想，一旦发生冲突和骚乱，英国人就有可能干预，从而可以要求让英美军队进入我国。总之，他们在宣传中特别强调，除了苏军以外，英军和美军也将开进保加利亚。那样，苏联在我国占绝对优势的影响就将不复存在。

我们是怎样摆脱这种危机的呢？我们决定向人民发出呼吁。……

尽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敢说，祖国阵线不仅没有因为这一尖锐的国内危机而受到损害，反而在摆脱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大了。祖国阵线和我们党的威信更加提高了。

现在我讲一讲我的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这就是我们面临着哪些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中我们要克服哪些困难。

最重大的任务之一是胜利结束对德国人的战争。我们应该为粉碎德国法西斯匪帮的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以托尔布欣元帅指挥的红军部队一道、同铁托元帅的人民解放军肩并肩参加进军柏林的战斗。目前保加利亚军队有6个师在匈牙利前线参加作战。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要认真研究，因为根据我们的一些担任副职的指挥员的报告，不能说保加利亚军队的精神状态很好，保加利亚

农民不愿意远离保加利亚领土去作战。由于缺乏战斗经验，保加利亚军队牺牲很大，却没有特别的战绩。部队的军官中有相当一部分受过法西斯教育，还没有完全转到祖国阵线一边，在指挥军队的作战中缺乏战斗激情。……^①

第二项重大的任务是打垮国内的法西斯敌人。虽说法西斯主义已经受到重大打击，但是如果以为它已被全部消灭，则是错误的。……

粉碎法西斯分子以后，我们应该同时进行大量的工作，对那些或多或少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人，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再教育。

我们的人民法庭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人民法庭已经开始自己的工作，并迅速对所有在我国的希特勒走狗做出公正和无情的判决。保加利亚是第一个让法西斯分子坐在人民法庭的被告席上的国家。人民法庭由祖国阵线委员会挑选的人员组成，它将根据良知和信念进行审判，而不拘泥于资产阶级法律的繁琐的诉讼程序。所以，我们审判法西斯分子的人民法庭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在对从1941年到1944年9月期间管理国家的摄政者、皇室顾问、内阁大臣进行审判以后，还要接着进行其他一些诉讼程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到3月底所有这些诉讼程序将结束，对活跃的法西斯走狗将给以最无情的镇压。

第三项任务是进一步巩固祖国阵线，进一步改善同祖国阵线的盟友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反对某些同志的想法。他们认为，在我国建立纯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显而易见，这些同

^① 在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部1945年1月18日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保加利亚第1方面军战斗准备不足，缺乏军纪，许多不良分子混入了军官队伍。在3月17日与季米特洛夫的交谈中，斯大林批评“保加利亚军队没有很好地打仗”。季米特洛夫立即将这一点通报给索非亚。科斯托夫在3月30日的复函中承认了这些缺陷，并保证采取措施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志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党的力量，对于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面临的重大困难（政治的、经济的困难，尤其是国际方面的困难）估计不足。在现阶段，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民主化阶段，如果我们顺利解决了最终铲除法西斯以及建设民主和强大的新保加利亚的任务，那么我们就能够向前迈出一大步，并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扫清道路。……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不得不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进行大量的斗争。我们的许多组织根本就不信任盟友，这种不信任，部分是由于这些政党的右派分子推行的政策造成的。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还隐藏着追求功名的倾向——想为自己保留所有职位。毫无疑问，在祖国阵线其他政党的队伍中有许多忠诚和经验丰富的人。他们在祖国阵线的监督下是可以完成赋予他们的某种社会工作的。……

下一项任务是建立强大的民主的新保加利亚。这种民主不是旧的表面上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新型的民主。在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下，政权掌握在劳动者手中，掌握在由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爱国军人和人民知识分子组成的战斗联盟手中，掌握在人民和军队的战斗联盟手中。……

我们没有理由为目前祖国阵线政府的人员组成而特别高兴。政府中有不少不称职的人，包括我们的人和同盟者。我们应该讨论一下，鉴于即将举行祖国阵线委员会全国大会，能否对现政府组成进行某种变动。即便保留政府中目前的力量对比，也应该挑选合适的人员，把他们安排在可以发挥他们能力的职位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另一个困难是，我们现在需要对为法西斯服务和保护法西斯追随者利益的法律进行修改。

但是，在建设新政权中的困难不仅来自盟友，而且来自我们队伍本身。我们至今仍未能根除我们队伍中的游击习气，我们有不少

同志在新政权建立以后，还继续使用老式的游击方法办事，不顾任何法律和权力机关的命令。

不经法庭判决擅自逮捕、殴打，甚至打死人的现象依然存在。是的，大部分这种现象与法西斯分子本应受到法庭审判有关，但是也有报私仇的情况。

某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趾高气扬，对待普通人民群众态度傲慢，有的人骄傲自大，甚至刚愎自用。例如，有过这样的事情：在大工业城市斯利文市，我们的党委书记有一次去电影院看电影，在他到电影院之前，电影已经开始放映。于是他进了电影放映厅后就吩咐停止放映，开灯让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后再开始放电影。还有的人千方百计谋求更高的职位。在企业和机构中，并非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恰恰相反，有些人是工作散漫、纪律涣散的典型。

在我们工作中，以及在祖国阵线委员会和某些党组织或者权力机关中的这些缺点被敌对宣传机关广泛用于反对我们和反对人民警察。

制定并严格遵守祖国阵线的法律是我们党首先面临的重大任务，因为内务部和警察机关掌握在我们手中。

迄今为止我们仅局限于做一些解释工作，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出，这并不能使事情了结。我们必须举行一些公开审判，可能还要枪决一些最恶毒的暗中破坏祖国阵线法律的人，以使人人明白，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了。正如季米特洛夫告诫同志们的那样，我们不应该忘记，权力机关可能被收买，可能出现追求名利、擅离职守、腐化堕落的现象。为了对付这些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为整顿秩序、维护纪律、严格遵守祖国阵线的法律进行坚决的斗争。

下一项任务是为了反对法西斯制度给我们留下的经济烂摊子而

斗争。这就是活跃经济生活，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状况。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能面临最艰巨的任务，最严重的困难。德国和保加利亚的法西斯分子留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经济崩溃、被洗劫一空的贫穷国家。……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改善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这首先无疑是加强保加利亚人民同 70 年中两次使保加利亚人民摆脱外国统治的伟大的俄国人民和我们的解放者的永恒友谊。……我们面临的另一任务是进一步同新生的以铁托为首的兄弟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亲近，直至两国之间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为在不远的将来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创造条件。……

我们可以指出，总的来说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建立那样的联盟的条件是存在的。这两个国家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尽管不久以前保加利亚占领军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胡作非为，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塞尔维亚人民，对保加利亚人民十分友好，而保加利亚军队现在正在南斯拉夫境内参加反对德国人的斗争。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因为在这两个国家中还有仍然不想放弃霸权主义思想的沙文主义分子，还有某些其他强国进行干涉的企图。……

全面地、全力以赴地加强我们的党，是我们所有任务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其解决有赖于所有其他任务的完成情况。……

我们要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建立铁的纪律，把所有混入党的队伍的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清除出去。我们要为反对追求名利、游击习气、骄傲自大而斗争。我们应该学会治理国家，学会领导经济、解决困难的国际外交问题、掌握军事艺术，学会同其他政党在祖国阵线范围内一道工作。……

9月9日开创了我国和我党历史的新纪元。完全有理由认为，

以季米特洛夫为首并在他的领导之下的我们的党，能够应付自己面临的新的复杂任务。

问：目前是否训练军事干部，训练是否由我们的人担任军官？

答：是的。组织了训练班，从游击队干部中选拔人员，培训我们自己的军官。这些训练班最近几天就要开课，第一批训练230人。我们也准备通过这种训练方法培养我们的主要干部——指挥人员的助手。

问：国内对诉讼程序有什么反应？

答：反应很好。不过有些群众对诉讼程序拖的时间太长有些不满。我们本想在1月7日结束，但现在看来不得不延长到1月底。法庭庭长这个人看来不完全合适，他在法律上抱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使被指控的人可以进行长时间的解释，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为了对这样的法官施加影响，我们在法院大楼前组织了群众集会。与会者派出代表向法庭庭长提出自己的要求。当这些被指控的人被带出来时，群众对他们鼓倒掌，让他们不可能有好结果。主要的公诉人看来也难以胜任。

尽管如此，审判还是顺利结束了，因为人民法官的人员组成是有保证的。他们由忠于人民的人组成，能够做出正确的判决。

问：对于加入农民联盟的法西斯分子有没有进行斗争，如何斗争。

答：准备成立检查该组织人员成分的小组，这一点已写入农民联盟的决议。……

巴拉诺夫：为什么格梅托（季米特洛夫博士）提出辞职？他怎

么了，想靠边站？^①

斯皮里多诺夫：不，他想从这个国家溜走。他请求政府给他提供出国护照。美国驻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邀请他去美国，但是我们放不放他，这还不知道，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倾向于发给他护照，想以此来减轻国内工作的压力。

季米特洛夫：他会妨碍你们的，还是让他呆在国内好。他在国外比在国内更有害处。毫无疑问，他在国外会得到过分的赞扬，人家会说，俄国人逼迫他离开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让他在国内呆着，要是他开始捣乱，就把他关进监狱，我们要人民警察干什么？^②

季米特洛夫：还有问题吗？没有，那就到此结束。

1945年1月26日于莫斯科

① 格·季米特洛夫在1945年1月18~19日召开的最高联盟会议上，提出辞去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总书记的职务。由于季米特洛夫坚持农民联盟“独立行动”的路线，并提出非常传统的口号“和平、面包与自由”、“人民政权”，而这一切被共产党人看做是“失败主义的”，从而导致农民联盟与工人党之间关系的恶化。

② 1945年9月，季米特洛夫（格梅托）被正式批准到国外去治病。

№09187

比留佐夫与维辛斯基关于保加利亚 可能出现政府危机的电话记录

(1945年4月6日)

抄送莫洛托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特急

高频电话记录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斯泰诺夫^①在同雅科夫列夫同志交谈时作了如下声明：

农民党人在政府中提出，要求惩办31日不愉快事件^②（由警察和工人党引起）的肇事者，保证工人党和警察不再欺负他们，否则的话，他们（担任部长的农民党人）将退出政府。斯泰诺夫暗示说，环节党的成员不想同担任部长的其他农民党人在政府内一道工作。因此，可能会出现政府危机。

内阁定于今天13时开会。4月6日，斯泰诺夫请求我（比留佐夫）干预这件事，并通过协作的方式对农民党人和工人党施加自

① П. 斯泰诺夫，保加利亚外交部长。

② 1945年3月31日，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的保加利亚全国总工会在许多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其口号是全国工人总工会团结一致，以及取缔1934年的组织职业工会的立法原则。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索非亚市的组织不支持这项倡议，并在斯拉维科夫广场上举行了独立集会，要求工会组织的自由（其中包括建立全国农民工会联盟）以及进行反价格昂贵的斗争。游行示威者与参加集会的人发生了冲突，并发生了枪击事件。

己的影响。

我认为，不应该姑息和纵容农民党人。让农民党人去争斗，其结果可能是有2~3名由农民党人担任的部长退出政府，由也是农民党人担任的其他部长取代他们，这件事工人党只会赢，不会输。如果让步，那下一次他们就会提出更大的要求。

盼指示。^①

比留佐夫^②

1945年4月6日于索非亚

①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四欧洲司司长拉夫里舍夫1945年4月16日给维辛斯基的报告中强调，“应该让农民联盟领袖明白，工人党是不会害怕农民联盟的代表脱离政府的。”报告还说，季米特洛夫也认为工人党在原则问题上不应该向农民党做出任何让步。

② 谢·谢·比留佐夫，时任驻保加利亚盟国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09196

列维奇金与奥博夫关于保加利亚农民党 内部情况的谈话纪要

(1945年5月10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比留佐夫，归档。

秘密

5月5日，由于常设机构小组呼吁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消息的发表，我会见了亚历山大·奥博夫（保加利亚农民党常设机构委员）。

奥博夫通报说，这个以他和托斯切夫为首的小组肩负的使命是负责召集农民代表会议，驱逐格梅托的追随者，选举常设机构的新成员以及改变农民联盟的政治方针——加强祖国阵线，发展农民联盟与工人党之间的关系。

据奥博夫说，召开代表大会的原因有：

1. 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在格梅托追随者占优势的常设机构中的老成员无所作为，并且在实际上已丧失了对联盟的领导。没有组织能力、没有党政工作经验和没有一定政治原则的H.佩特科夫已不能成为农民联盟的领袖。^①

2. 已经召开的农民联盟地方代表会议表明，农民的大部分都反对格梅托的追随者留在农民联盟内。常设机构的现有成员不能解

^① 这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立场不同，当时保加利亚工人党的立场是佩特科夫应该留在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导岗位上，并参加政府和祖国阵线人民委员会。

决这一问题——把格梅托的追随者作为祖国阵线的奸细和分裂分子从联盟中驱逐出去。

3. 必须及时防止祖国阵线出现危机。为此，调整好祖国阵线内部农民联盟与工人党的正常的相互关系是重要条件。

奥博夫说，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将不只是从常设机构，而且还要从地方和祖国阵线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驱逐格梅托的追随者。奥博夫认为，召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是与格梅托分子有组织斗争的第一阶段，随后将着手把格梅托分子和亲法西斯分子从农民联盟中清洗出去。

奥博夫曾数次问我，他们（指奥博夫等）能否在与格梅托分子的斗争中得到我们的支持，我回答说，这一问题不列入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农民党的党内问题。

我问奥博夫，为什么他要提出有关我们支持的问题。这是否是提议召开代表会议，以便顺利解决向这次代表大会提出各种问题的决策人举棋不定的后果呢？奥博夫回答说，除了那些不跟他们走的农民联盟成员以外，他们确信格梅托的追随者既没把报纸，也没把电台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奥博夫还指出，召开代表会议前有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他们的人员安排要做到不使一个格梅托的追随者参加会议。奥博夫说，如果我们支持他们反对格梅托分子，将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我反复指出，这个问题是农民联盟的一个党内问题。

克·列维奇金

1945年5月10日于索非亚

№09199

列维奇金与巴夫洛夫关于政府危机 发展情况的谈话纪要

(1945年6月4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6月4日，我拜会了摄政者托多尔尔·巴夫洛夫^①。

巴夫洛夫通报说，据尚需核实的情报表明，在索非亚已建立了两个中心：1. 由韦尔切夫（军事部长）、斯坦契夫将军（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司令员）、甘切夫将军、斯托伊科夫及其以高级资深军官组成的“铁拳”军事中心；2. 由П. 斯泰诺夫（外交部长）、佩·斯托扬诺夫（财经部长）和几位农民联盟即格梅托分子出任的部长（布姆巴罗夫、巴夫洛夫^②及H. 佩特科夫）组成的政治中心。巴夫洛夫认为，摄政者加涅夫追随的是政治中心，此人在最近还巡视了全国，并与英美人频繁会见。

两个中心提出的任务是利用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将不满工人党和祖国阵线行为的军官和文职官员团结在自己周围，以策划政变和改变保加利亚的内政和外交方针。

巴夫洛夫就政府危机问题提出了加深危机的办法，即不仅要把农民联盟成员担任的部长（布姆巴罗夫、巴夫洛夫，可能还有H.

① 托多尔·巴夫洛夫是共产党员，并参加了于1944年9月成立的摄政委员会。

② A. 巴夫洛夫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成员。

佩特科夫)，而且还要把切什麦德日耶夫（社会政策部长）、韦尔切夫（军事部长）和 П. 斯泰诺夫（外交部长）清除出政府。政府的改组则必须按阶段进行——首先是驱逐布姆巴罗夫、巴夫洛夫以及佩特科夫（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立场的话），其次是驱逐韦尔切夫、斯泰诺夫和切什麦德日耶夫等人。^①

针对把农民联盟成员担任的部长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巴夫洛夫提出了下列计划：鉴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召开的地方和全国代表会议谴责了格梅托分子的活动，并强调了与格梅托分子作斗争的必要性，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新领导人应当召开农民党的最高决策会议，通过将巴夫洛夫和 Н. 佩特科夫（如果他不参加最高决策会议的话）开除出党的决议，并将站在反祖国阵线立场的部长从政府召回。这些担任部长的农民联盟的成员不会自愿离开政府。显然，他们接到过英美人的指示，为的是留在政府中从事破坏活动。

巴夫洛夫认为，这些举措将向社会舆论表明：（1）内阁危机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主动挑起的；（2）强化了保加利亚联盟新领导人与格梅托分子的斗争；（3）对庇护格梅托的英美人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在任命农民联盟的成员担任新部长时，巴夫洛夫认为必须考虑到，新政府常设机构的组成中存在着三个派别：奥博夫—唐切夫派、格诺夫斯基派和涅德尔切夫派，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如果要提出任命三位部长（分别取代布姆巴罗夫、巴夫洛夫和佩特科夫）的问题，那么这些部长分别是这三派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党在利用这些派系分歧的同时，还必然在战术上利用他们。至于说到杰尔让斯基，巴夫洛夫认为，他应在政府中保留下

^① 由托·巴夫洛夫代表的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部分领导人的立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来，因为他与格梅托分子不是同路人。

巴夫洛夫说，鉴于内阁危机，应当考虑改变政府中各党力量的比例，把环节党的部长职位压缩到2名，社会民主党压缩到1名，并在此基础上将农民联盟的部长职位增至6名，工人党增至5名，因为工人党和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同时必须更换卫生部长安格洛夫（工人党党员），他因年事已高不能胜任该部工作，并且以自己的敷衍塞责而损害了工人党的声誉。

巴夫洛夫接着指出，在摄政会议上也呈现出危机的势头，摄政者鲍鲍舍夫斯基和加涅夫不满意内阁危机的日益迫近，而该危机会导致布姆巴罗夫、巴夫洛夫和佩特科夫离开政府。最近几天，鲍鲍舍夫斯基和加涅夫在摄政者巴夫洛夫不在（他已前往普罗夫迪夫）的情况下签署了授予包括布姆巴罗夫、巴夫洛夫和佩特科夫在内的所有部长以保加利亚大勋章的命令，而他明明知道就要提出有关这些部长离开政府的问题。鲍鲍舍夫斯基和加涅夫想以此举支持农民联盟成员担任的部长，并围绕他们形成正面的社会舆论。摄政者巴夫洛夫发表了书面声明，表示自己不同意鲍鲍舍夫斯基和加涅夫对这些大臣的奖励。

两星期前，摄政者的亲戚致一位美国教授的信函被截获。该信请求美国为加涅夫提供一席之地，似乎他已经无法忍受保加利亚出现的局面，而且他应该从保加利亚前往美国。

鉴于韦尔切夫目前正在组建军事组织，在最近期间明显疏远祖国阵线，对韦尔切夫十分赏识的鲍鲍舍夫斯基开始对巴夫洛夫持否定态度。

在摄政会议工作的有许多“环节党”党员，他们是被韦尔切夫和H.佩特科夫派往那里的。韦尔切夫在摄政会议的代理人——涅德尔科夫将军（系韦尔切夫和斯泰诺夫在摄政会议谍报机构的领导人）将摄政会议发生的事情以及谁要访问摄政会议等等一切都向韦

尔切夫和斯泰诺夫作了通报。

巴夫洛夫指出，所有这些及其他事实都使他相信，有可能摄政会议的危机正逐渐逼近，如果是这样，那么保加利亚就将要面临国家危机。

后来，巴夫洛夫重新谈到韦尔切夫和 H. 佩特科夫的品行。他说，应尽快将韦尔切夫撤走。他不仅是团结有反动情绪的保加利亚将领和军官的核心，而且还在暗中破坏军事部改组军队及其战备工作。

他仇视军队参谋长基诺夫中将、部队副司令员科佐夫斯基和军事部情报部长伊凡诺夫，因为他们均是共产党员。当英苏在巴尔干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保加利亚军队将不能参加保护我们的共同利益，它无所准备，而且韦尔切夫也不能为此做出准备。因此，在任何冲突的情况下，保加利亚不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抑或是军事方面都将无所作为。

巴夫洛夫声称，保加利亚军队缺乏准备的大部分责任将由共产党人承担（基诺夫将军、科佐夫斯基将军及伊凡诺夫，此外还有工人党中的一些领导干部），因为他们不是坚决地将亲法西斯分子从军事机关和军队中清洗出去，没有处理好与无党派军官的业务联系，没有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没有通过他们向军队施加自己的影响。在巴夫洛夫看来，军队中有大量无党派的中老年高级军官，他们是愿意跟共产党走的。巴夫洛夫还特别指出了共产党员将军们对保加利亚军队总司令马里诺夫中将（无党派人士）的不正常态度，此人能够与共产党员共事，并且还把他们当作优秀的军事专家使用。

巴夫洛夫认为最近时期大量保加利亚军官被提升为将军的现象是不正确的，不能如此匆忙地突击提拔。

用巴夫洛夫的话说，这种现象会激起许多保加利亚老军官的不

满。

在谈到斯泰诺夫时，巴夫洛夫指出，应当尽快地将他从部长岗位上撤下来，因为他奉行的是一条反祖国阵线、亲英的外交政策，并据此挑选到部机关和国外工作的干部。

在巴夫洛夫看来，任命安东诺夫（保加利亚驻土耳其大使，祖国阵线的支持者）取代斯泰诺夫。安东诺夫以前与环节党有密切联系。因此，用安东诺夫取代斯泰诺夫不会招致任何反对意见。

巴夫洛夫还就以下方面对内务部长尤戈夫表示了不满，即直到目前为止，他并未把内务部机关、警察，尤其是各地的机构抓在自己手里。因此，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在一些地方制造混乱和过火行为，这不仅引起农民党和环节党，而且还包括部分居民对自己的反感。祖国阵线的敌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与工人党和祖国阵线较量。巴夫洛夫主张对那些在各地搞过火行为和以自己的一举一动损害工人党和祖国阵线的公安人员不仅要开除出工人党，提交审判，而且还要予以枪毙，从而表明工人党不能容忍混乱和过火行为。这些都将有利于提高人民警察的威望，安定人心，同时还可清除敌人赖以诽谤工人党和祖国阵线的土壤。

克·列维奇金

1945年6月4日于索非亚市

№09204

格奥尔吉耶夫关于向保民警局提供武器和汽车

致比留佐夫的请求信

(1945年7月2日)

秘密

译自保加利亚文

盟国管制委员会驻保加利亚副主席

比留佐夫上将先生

呈莫斯科

人民委员会

内务部部长Г. 尤戈夫告诉我说，从民警局局长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保加利亚民警局迫切需要武器和交通工具。武器根本不足，此外，现有的武器都已老化且几乎不能使用，其系列和规格也不尽相同，现在特别需要自动武器。

另一方面，警察的交通工具也处于不佳状态。现有少量的交通工具，诸如卡车、大轿车和摩托车等等都已陈旧和磨损，而且其中有许多已不能使用，为了使民警局的工作能够发挥作用，只好动用个人交通工具，而这却在一些居民中引起了不满。

内务部部长在自己的报告中补充说，鉴于民警局的使命是作为有组织的战斗力量维护国家的秩序和安全，就务必使民警局在最近获得足够数量的交通工具及其备件，同时还要装备必需的现代自动武器。

面对这一切，我冒昧请求已经向我们提供各种慷慨的兄弟般援助的苏联政府发布指示，再给保加利亚政府提供援助，以满足我国民警局在本附表中所列的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需求。您的这一举措会给予保加利亚以莫大的帮助，保加利亚政府为此向您致以深切的感激之情。

保加利亚总理 基·格奥尔吉耶夫

1945年7月2日于索非亚

附表格一张。^①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表格。据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其他文件，保加利亚方面曾请求提供：供给年轻警察的小口径步枪 13000 支；每 10 人配备一挺的轻机枪 1000 挺；每人配备一把的手枪 10000 支，等等。

№09206

比留佐夫关于 Г. 季米特洛夫出走问题 与杰卡诺佐夫的电话记录

(1945年7月18日)

秘密

В.Г. 杰卡诺佐夫同志^①：

7月18日我拜访了外交部部长斯泰诺夫，他告诉说，政府领导成员讨论了美国政治代表要求他批准季米特洛夫^②去美国的照会。领导人对上述决定答复如下：

让季米特洛夫转告保加利亚政府：必须本人请求保加利亚政府允许他前往美国，随后政府才能保证他前往美国。

斯泰诺夫问，对他们的决定我们有什么看法。

比留佐夫请杰卡诺佐夫尽快做出答复。

斯泰诺夫提出理由说，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为的是向美国人做些让步，因为美国人已建议保加利亚人派保加利亚的政治代表去美国。他们原定斯托伊切夫将军为该职务候选人。

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同意这样解决季米特洛夫的问题，至于确定

① В.Г. 杰卡诺佐夫，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这里的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导人之一 Г. 季米特洛夫（格梅托）。

斯托伊切夫为候选人，也是合适的。^① 斯泰诺夫对苏联不错，斯泰诺夫问我对斯托伊切夫当候选人的看法，我的回答是我不能随随便便谈。

比留佐夫

1945年7月18日于索非亚

① 1945年9月初，正式许可季米特洛夫（格梅托）前往国外，并为其办理了出国护照。1945年8月26日，美国国会表示准备接受斯托伊切夫作为保加利亚非官方的政治代表。1945~1947年期间，斯托伊切夫代表保加利亚驻在美国和联合国。

№09207

列维奇金与巴夫洛夫关于保加利亚 政治局势的谈话纪要

(1945年7月18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7月18日，我在摄政者巴夫洛夫的住所拜访了他。巴夫洛夫通报说，他刚从英国人那里吃过午餐回来。他指出，最近英国人请一些摄政者、部长及著名社会人士单独去他们那里共进午餐，他们看来想搞些什么名堂。

巴夫洛夫说，他掌握一份一位在美国的保加利亚人有关格梅托的加密电报，它是发给外交部长 П. 斯泰诺夫的。电报称，这位保加利亚人曾去过美国国务院，那里的一些负责官员向他表明，美国人似乎对在保加利亚的美国政治代表巴恩斯的保护下继续支持季米特洛夫（格梅托）不感兴趣，因此，他们对把他交给保加利亚当局处置似乎一点也不持异议，但是要以后者对待季米特洛夫不采取任何镇压手段为条件。

谈及巴恩斯今年7月14日就季米特洛夫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的照会，巴夫洛夫认为，让季米特洛夫从保加利亚去美国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在这种条件下能够领导所有在那边的保加利亚反动势力反对祖国阵线领导的保加利亚。巴夫洛夫坚持要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格梅托，把他留在保加利亚，同时向美国人保证说，如

果他不奉行反祖国阵线的方针就不会对他提起诉讼，但同时要组织对他的监视。^① 在竞选期间，当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趋向尖锐化时，格梅托不会不参与到这场斗争中去，他将竭力与英、美人保持联系，而且英、美人自己也要在竞选期间竭力利用他与工人党作斗争，那时，依据其违反约定（答应不参加反对祖国阵线的政治斗争），就可以揭露他的反祖国阵线活动，追究其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人就没有理由向保加利亚当局提出任何要求了。

巴夫洛夫认为，佩特科夫还将竭力与格梅托保持联系，这将更多地败坏自己的名声。对于佩特科夫的行为，巴夫洛夫说他已形成固定的看法，即不能与佩特科夫达成妥协。佩特科夫之流在历次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有以下几点：1. 确定和最终批准候选人应在双方各选3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内进行^②；2. 双方常务机关在选举工作中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机会，允许新的常务机关出版《农业旗帜》报，佩特科夫就任该报主编；3. 选举前不提出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内部形势有关的任何有争议的问题；4. 选举后立即召开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代表大会（一次大会在奥博夫追随者中举行，另一次大会在佩特科夫追随者举行）；5. 给予H. 佩特科夫以机会公开声明

① 1945年5月底，科斯托夫向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通报说：“目前局势是这样的：格梅托在已被苏联军队和保加利亚军队包围的巴恩斯的别墅里。美国人在大厦周围构筑了街垒，并发表声明说，如果保加利亚当局试图阻止美国人沿城市街道进行检查或者是试图将格梅托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开枪射击。我们的当局得到指示，要提高警惕性不能上挑唆行动的当。监督方面主要由俄罗斯军队负责。他们不放任何人到巴恩斯的别墅里，并对出城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

② 1945年6月底，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内部发生了分裂。有影响的佩特科夫集团通过决定，成立独立的政党，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政治领导人相对立，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祖国阵线。以奥博夫为首的农民联盟部分成员留在了祖国阵线内。

他赞同祖国阵线所有的对内和对外政策，他过去和今后都不反对祖国阵线，他拥护与工人党的合作和与苏联、新南斯拉夫的诚挚的友谊，他支持联合声明而不再谈论格梅托运动，只谈论分裂行为和失败主义；6. 以 H. 佩特科夫书记为首的常务机关在祖国阵线人民委员会中应有 2 名代表；7. 为了规范和顺利进行立法选举，应释放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所有被逮捕和拘留的人员。巴夫洛夫认为，倘若连工人党和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新领导人都同意这些条件，那么佩特科夫就会走得更远，并且还会提出更加不能接受的条件。

巴夫洛夫说，佩特科夫归根结底是对与工人党和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新领导人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感兴趣。7 月 17 日，佩特科夫在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常设机构成员唐切夫私下交谈时声称，他正致力于建立第二个农民党，而该党将独立出现于议会选举中。他同时声明，如果他获得议会多数席位，那他就同意给予共产党人 3 个部长的职位，但无论如何不把内务部交给他们。

巴夫洛夫认为，佩特科夫的目的在于为建立在自己领导下的第二个农民党与奥博夫分子相抗衡，同时利用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反动分子独立参加竞选，佩特科夫就指望从这些反动分子那里得到支持，而这些人一旦加入农民党，就会将格梅托的拥护者和其他英美代理人选入议会，然后在议会与奥博夫分子、右翼环节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达成默契，向工人党发起进攻，并改变保加利亚的内外政策。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即如果佩特科夫拒绝妥协并坚持不妥协的立场，工人党将怎么办，巴夫洛夫则指出，工人党届时将开始反对佩特科夫及其追随者的公开斗争。巴夫洛夫同时认为，应当把所有民主力量都吸引到与佩特科夫分子的这场斗争中，因为这些人实际上与格梅托分子搞在一起，以便揭露佩特科夫及其追随者，在选民

面前败坏他们的名声。巴夫洛夫还认为可以考虑将吉切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并让他参与同佩特科夫分子的斗争，而这些人就害怕他。巴夫洛夫在日前还声称，涅杰尔切夫（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常设机构成员）将在监狱里会见吉切夫，并且就这一问题的实质努力试探他。

巴夫洛夫认为，工人党在对待格梅托、佩特科夫和其他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因而在议会竞选期间的形势也复杂化了。在巴夫洛夫看来，这些错误有以下几方面：

1. 工人党围绕格梅托个人的如此声张虚势并无效果，产生的印象是格梅托几乎成了民族英雄。英美报界等舆论工具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可以不必如此声张而不留痕迹悄悄地将他干掉。到那时，工人党甚至政府都可以从他们目前所处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2. 工人党对 H. 佩特科夫太客气，在农民党党员眼里这种状况提高了佩特科夫的威望，他们得出的印象是没有佩特科夫祖国阵线就不能存在。特别大的错误是在最近犯下的。对于佩特科夫和其他由农民党出任的部长，格奥尔吉耶夫总理已经为摄政会议起草好了有关将他们逐出政府的命令。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新领导人在报上发表声明说，佩特科夫不能继续代表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在政府和祖国阵线委员会中的利益。取代由农民党出任部长人员已经选出，但是所有这一切均尚未落实。另外犯下的错误是在向保加利亚人民发表有关巩固祖国阵线的必要性和与反动分子作斗争的宣言已经由 H. 佩特科夫签署，实际上，他不必签署这份宣言。所有这些状况都提高了佩特科夫的情绪和威望，同时也使得与他的斗争节外生枝。

3. 工人党没有及时恢复各地民警机关的秩序。各地民警机关的过激行为以及消除国内经济困难工作的不利，增加了反动势力在

居民中进行反祖国阵线宣传，损害祖国阵线声誉，并且把国家全部困难和动乱的责任都推给工人党的可能性，一部分居民就听信于这种宣传，同时还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祖国阵线的政策。工人党的社会政治地盘因此而缩小，其威望也有所下降。如果再加上工人党疏于在农村开展自己的工作和不巩固自己在农民中的影响等状况，那么这种困难将会越来越大。

4. 处于重要岗位上的个别工人党成员犯了一些战术性错误。例如在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拥有四位书记（来自祖国阵线中的每一政党），但是，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发表的所有文件均由卓拉·德拉戈伊切娃一位书记（工人党党员）签署，而其他书记（其他各党成员）却靠边站。这种状况在各地都存在。由此造成了祖国阵线各委员会的磨擦和无谓的不满情绪，同时，还为敌人提供了指责工人党在国内缺乏民主、实行工人党一党专政等的材料。

随后，巴夫洛夫通报说，最近在外交部长 П. 斯泰诺夫那里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波普兹拉捷夫（环节党中央书记）、伊万·哈里扎诺夫（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成员）和尤鲁科夫（环节党《日出报》经理）。在这次会议上，波普兹拉捷夫似乎声称，共产党人现在就要与佩特科夫作斗争，下一个目标是达缅·韦尔切夫（军事部长）。但波普兹拉捷夫说，我们现在不应加入与工人党的冲突，直到红军离开保加利亚为止。

巴夫洛夫依然认为，П. 斯泰诺夫和 П. 韦尔切夫迟早将离开政府。

巴夫洛夫通报说，最近几天，皇后和公爵夫人（鲍里斯皇帝的妹妹）向摄政会议请求允许她们在8月28日前往下葬鲍里斯沙皇的里尔修道院以祭奠死者，巴夫洛夫认为可以准许她们前往修道院，但时间不是在8月28日，届时因节日关系那里的人很多，而

是改在7月底（即7月28日）。巴夫洛夫请我将王后这一要求转告盟国管制委员会指挥部，我已答应将他的要求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指挥部转告。

克·列维奇金

1945年7月18日于索非亚

№09211

比留佐夫和基尔萨诺夫关于保议会选举问题 给维辛斯基的电话记录

(1945年8月16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巴尔干国家司。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由于格奥尔吉耶夫宣布4名反对派部长辞职以及将他们从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中除名（您已有该声明的文本），今日（8月16日），在全国范围内要举行支持格奥尔吉耶夫声明的群众集会。^①

前部长佩特科夫和斯托扬诺夫意欲拜访基尔萨诺夫^②，以便向他表示他们基于对国内政策的考虑而提出辞呈和拒绝参加议会选举，而与祖国阵线的外交政策完全无关，他们一如既往依然是与苏

① 1945年8月14日之前，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派成员参加了竞选活动。但是，8月14日反对派宣称，由于当局歧视反对派的一些候选人，他们不能再参加竞选斗争了。同时一些部长大臣——反对派成员Г.切什麦德日耶夫（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П.斯托扬诺夫（独立分子）、А.巴夫洛夫和А.捷尔让斯基（两人都是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成员）交给格奥尔吉耶夫一封信，以辞职威胁要求推迟竞选。8月16日，格奥尔吉耶夫在《祖国阵线》报上发表声明，“一些人士和阶层的行动，明显暴露了其目的是想引起外部对保加利亚内政的干涉”。

② С.基尔萨诺夫，时任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

联保持友好关系的拥护者。^①

我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在佩特科夫、斯托扬诺夫明显的反爱国主义行动及声明之后，不应再会见他们，我们也不想邀请他们出席我们为保加利亚将领和军官授奖而举办的招待会。

请指示。

比留佐夫

基尔萨诺夫

1945年8月16日16时40分于索非亚^②

① 1945年7月26日，H. 佩特科夫等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成员致信保加利亚总理、摄政者会成员和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声明国内不具备自由选举的条件。有鉴于此，他们请求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意在国际监督的条件下进行选举。比留佐夫认为这是不爱国的行动并拒绝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讨论会上提出关于推迟竞选的问题。在复函中佩特科夫和斯托亚诺夫声明退出政府并着手组建反对派集团。

② 原文件上有莫洛托夫的指示：“维辛斯基同志将给予答复（他清楚）。维·莫洛托夫”。

№09213

比留佐夫关于美国对保议会选举延期所持立场 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话记录

(1945年8月22日)

抄送斯大林、米高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秘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B.Γ. 杰卡诺佐夫同志：

8月21日，根据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摄政者巴夫洛夫拜会了我，并且还通报了下列内容：

“昨天晚上5~7点，几位摄政者会见了美国政治代表巴恩斯先生。这位代表声称，他将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美国政府的名义说话。他首先力图澄清一些误会，比如他声明他所理解的民主概念就是人民的政权，即全体人民都有权管理自己国家这样一种制度。其次，巴恩斯声称，美国政府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加入该党的是一些诚实勇敢和有思想的人们，没有共产党就不能设想有保加利亚政府。第三，他声称，保加利亚人民走的是一条苏联的道路，而在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历史和种族上的联系。美国政府考虑保加利亚应当与美国人民和国家保持良好的融洽的关系。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建议摄政王解散保加利亚政府并任命一个由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府，但摄政王否定了这一建议。

然后，巴恩斯提议组建新的祖国阵线政府，参与该政府的首先是四个祖国阵线党的代表，其次是尼古拉·佩特科夫和格里戈里·切什麦德日耶夫集团的代表，第三是前民主党代表穆沙诺夫、吉尔吉诺夫、鲍里斯·巴夫洛夫以及无党派知识分子的代表。应当解除基蒙·格奥尔吉耶夫的总理职务，任命摄政者加涅夫为总理并接替他。这个新政府应当延期选举，借以保证选举的真正自由和真正民主。但这遭到了摄政会议的否决。

于是，巴恩斯就提议召集一次协商会议，与会成员有美、英、苏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军事代表、美英苏的政治代表、保加利亚总理、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以及摄政会议成员。这次会议应当讨论保加利亚的当前局势，决定另立政府和延期选举，但这一建议也遭到摄政王的否定。

这时盟国管制委员会收到了美国和英国致保加利亚政府照会的副本，这些副本目前尚未翻译出来，但其大意是，如果选举不推迟，那么美国人和英国人就不承认由这些选举组建的政府。”

比留佐夫

1945年8月22日3时10分于索非亚

№09216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政府及摄政委员会
请求苏联对保加利亚问题表态
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5年8月22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巴尔干国家司。

8月22日晚，斯泰诺夫邀请我去他那里。鉴于英、美两国驻保加利亚代表的照会及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最近的声明，斯泰诺夫以摄政委员会及保加利亚政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以某种形式公开或仅对保加利亚政府表明对保加利亚现行制度和行将举行的大选的态度。

“我们之所以非常希望苏联政府能做出这样的声明，不仅仅是为了消除关于苏联政府将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做出让步、大选将被取消的传言，而且也是为了得到道义上的支持。摄政委员会和政府都需要这种支持”。

我指出，通过恢复同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已经给了保加利亚以巨大的道义上的支持。对此，斯泰诺夫说，是这样，但是现在，鉴于最近的一些事件，他才注意到当初在恢复同保加利亚的关系时苏联政府没有声明承认保加利亚国内制度的民主性质。

斯泰诺夫认为在向摄政王递交国书时——通常在这种场合都要

发表公使致词——做出上述声明最为妥当。因此，他坚持请求我在8月24~25日递交国书。^①

请速予指示，如果您同意斯泰诺夫的请求，请电告递交国书时的致词文稿。

基尔萨诺夫

1945年8月22日于索非亚

^① 就任国书是由基尔萨诺夫于1945年9月19日递交的。

№09217

比留佐夫和基尔萨诺夫关于盟国管制委员会 商议保加利亚大选事宜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8月24日)

抄送斯大林、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四欧洲司。

秘密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兹向您报告：我们已经在美国和英国代表及其政治顾问的参加下举行了盟国管制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发言指出：英国和美国代表越过盟国管制委员会直接就这些问题去向摄政委员会和保加利亚政府提出交涉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表明了三个大国在上述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也是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漠视。^① 英国和美国代表只是在收到保加利亚人的答复之后才诉诸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这种做法违背了停战协定，损害了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地位，从而造成了极为困难的局面。对此英国人宣称，英国在保加利亚派驻有双重的代表——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代表和单独的政治代表。在其政治代表未能从保加利亚人那里得到对他所提要求的积极答复之后，他们诉诸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对此，我们回答说，三大国在保加利亚的惟一合法代表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只

^① 英国和美国代表于1945年8月20和21日分别发出照书，认为保加利亚目前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条件。

有它才能就选举问题提出要求 and 发出指示。

接着美国人阐明了自己的要求：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希望建立一个能够被它认定确实反映保加利亚人民意愿的保加利亚政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同保加利亚建立正式关系，进而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美国政府认为，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各点：

一、推迟举行大选，直至下列条件得以满足：

1. 根据农民联盟的章程召开该党的代表大会；
2. 社会党也同样要这样做；
3. 如果有成立民主党的基础，政府应准予该党登记注册^①；
4. 让5个政党——共产党、农民联盟、社会党、“环节”人民联盟和民主党——各自决定是单独还是联合提出候选人名单。

二、所有的5个政党均享有言论、宣誓、利用广播和集会的自由。

三、秘密自由投票。

为了达到上述条件最理想的政府措施是：

1. 专门为进行大选而建立一个务实内阁（改组政府）；
2. 颁布一项规定在这一务实内阁存在期间总理的职权交由摄政者代行；
3. 改组现有内阁，以使主要的各部及其职位交由5个政党的领导人负责，并且根据各党的人数在5个政党之间按比例分配部长席位；
4. 让目前仍被关在监狱中或者被软禁在家中的所有农民联盟或民主党领导成员——前部长充分地参与党的事务（如果该党希望他们参与的话）；

^① 在祖国阵线成立时民主党没有参加，由于这一点自1945年9月之后它的活动被禁止了。

5. 改组祖国阵线，使之像 1944 年 10 月 28 日（指同保加利亚签订停战协定的日期）时那样，让民主党也参与其中——如果有建立该党的实际基础的话。

英国人完全支持这些要求。

鉴于他们所发出的照会及发表这些讲话，我们提议讨论如下问题：

1. 选举法是否符合民主原则？
2. 竞选运动的进行情况是否符合民主的要求？

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接受了这一程序。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坚决否认选举法和竞选运动进程的民主性，并声称，他们除了已经表明了的两国政府的否定看法之外不能再发表自己个人的观点。在引用了大量证明选举法和竞选运动进程的民主性的事实之后，我们概述了我们的观点：

1. 保加利亚在使国内制度民主化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
2. 保加利亚政府一直在忠实履行停战协定并曾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战争。保加利亚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完全民主的选举法，它确保着选举的充分自由，其中对反对派也同样如此。

某一部分反对派人士拒绝参加选举并不能用来作为此次大选不民主的证据，因为到今天为止仍然有 40 位反对派候选人留在候选人名单中。

反对派撤掉自己的一些候选人名单是由于反对派因尼·佩特科夫关于建立同盟国间对保加利亚大选的监督的信件而丧失了其在群众中的威信。

接着我们指出，根据上述理由，我们不能干预保加利亚国家内部生活。让人民自己在大选中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好了。至于说到现政府，我们没有理由提出解散这个政府的问题，况且距举行大选只剩下两天了。关于未来政府的问题可以在大选之后再说。

在这之后，他们表示，他们的政府将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次大选建立的保加利亚新政府并且将不同它签署和约。

我们回答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这个意见以及他们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将被报告我国政府。

会后发现，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行动完全一致。巴恩斯所持有的立场更加激烈和强硬。

比留佐夫

基尔萨诺夫

1945年8月24日于索非亚

№09218

列维奇金转述斯泰诺夫关于大选的照会及 苏方答复给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

(1945年8月25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安·亚·维辛斯基同志

“致盟国管制委员会副主席比留佐夫上将

上将先生：为确认我本人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所做的口头声明，我今天以保加利亚政府的名义给您发出书面照会。保加利亚政府希望尽快根据波茨坦决议同苏联、英国和美国签署和平条约，并在同别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被接纳加入爱好和平人民的大家庭方面得到三大国的支持和帮助。保加利亚政府极其认真地对待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先生、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先生在这方面向它提出并在最近发出的照会中所体现的那些建议。如果盟国管制委员会认为推迟举行大选将有助于尽快签订和约，则保加利亚政府宣布，它准备接受这一建议。上将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崇高敬意。

外交部长兼停战协定执行委员会委员

П. 斯泰诺夫

1945年8月24日1时35分于索非亚”

我们的答复：

“致外交部长兼停战协定执行委员会委员 П. 斯泰诺夫教授先生

部长先生：作为对您今天8月24日关于保加利亚政府希望推迟举行议会选举的照会的答复，我荣幸地通知您，驻保加利亚盟国管制委员会认为可以建议保加利亚政府推迟议会选举到较晚时候举行。^①

驻保加利亚盟国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比留佐夫”

现将美国驻保加利亚政治代表的声明报告如下，供参考。

“我愿意再一次代表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讲话，并认为，保加利亚政府和您，将军先生，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副主席，应当受到美国政府的祝贺。这是证明在3个盟国之间意见完全一致的事例之一。我想，我们当中与盟国管制委员会有联系的人可以为我们有您这样一位杰出的苏联军官作为负责人感到骄傲。我愿意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向您表示威谢，因为是您，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副主席，向保加利亚政府转达了这样的信息，即我们很珍视保加利亚政府已经做的事情”。

① 苏联方面在保加利亚选举问题上的让步过程如下：1945年8月23日，外交部长斯泰诺夫在没有部长内阁全权委托的情况下，对外国新闻记者声明说，保加利亚政府不会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可能做出的关于推迟选举日期的决定。在8月24至25日夜召开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和英国代表根据斯泰诺夫的声明，向委员会中的苏联成员下了最后通牒：选举应该推迟，否则西方盟国将不承认其结果以及拒绝同保加利亚签订和平条约。面对业已形成的局势，苏联在盟国委员会中的代表被迫做出让步。1945年8月25日，也就是选举前的一天，保加利亚政府宣布推迟选举。无论是对于苏联方面，还是对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斯泰诺夫的声明都是完全出人意料的。季米特洛夫评价斯泰诺夫的“自作主张”是“投降行为”，是“对祖国阵线的打击”，而科斯托夫认为声明是“愚蠢的错误……是意外的或者，大概是故意的”。在内阁召开的会议上，共产党内阁成员激烈地反对斯泰诺夫。8月25日15点，斯泰诺夫来到比留佐夫处说，他将被迫辞职。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人声明，在这种时候，辞职是不妥当的。1945年8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季米特洛夫、科斯托夫和契尔文科夫。谈到发生的事情，他说：“推迟选举——这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让步。不会再有任何让步。政府组成不会有任何改变”。

№09226

杰卡诺佐夫关于保政府请求提供武器 和交通工具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5年10月24日)

秘密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保加利亚政府已请求苏联政府以武器和交通工具装备保加利亚民警人员（总理格奥尔吉耶夫7月2日的来信^①）。保加利亚内政部长尤戈夫及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也曾不止一次地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过类似的请求，但是当时均建议他们按正式的程序通过其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总理格奥尔吉耶夫的信中说，是尤戈夫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让他向我们请求帮助武装民警人员的。

经布尔加宁同志同意，这个问题转请托尔布欣元帅解决。苏军南方集群代理总司令茨韦塔耶夫上将和南方集群军事委员会委员莱奥克中将报告说，他们不能满足保加利亚政府的请求。

考虑到保加利亚民警人员是保加利亚现行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柱，但装备确实很差，我认为我们应当值此基格奥尔吉耶夫提出请求之时，在一定程度上以武器和运输工具帮助装备保加利亚民警人员。

^① 见本专题№09204文件。

请您予以指示。

B. 杰卡佐诺夫

1945年10月24日于莫斯科^①

① 文件上有如下指示：“致杰卡诺佐夫同志。应该达成协议。11月5日。维·莫洛托夫”；“拉夫里舍夫同志，请询问切尔内绍夫同志和梅尔库洛夫同志（内务人民委员部）。杰卡诺佐夫。11月5日”。

№09227

拉夫里舍夫关于“环节”人民联盟 会议情况给潘友新的报告

(1945年10月29日)

秘密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潘友新^①同志

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报告称：10月5日在索非亚举行了“环节”人民联盟最高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40名，会议议程包括如下问题：

1. 国家的政治形势和“环节”人民联盟的基本任务。报告人基·格奥尔吉耶夫。

2. 经济和财政形势和“环节”人民联盟的任务，报告人乔拉科夫。

3. “环节”人民联盟的历史使命、社会基础和对内政策。报告人波普兹拉捷夫。

报告人格奥尔吉耶夫和乔拉科夫的报告皆坚持了祖国阵线纲领的基本精神。

关于反对派，格奥尔吉耶夫说，他们提出的加入祖国阵线的条

^① 亚·谢·潘友新，时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第一副部长。

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①

波普兹拉捷夫竭力夸大“环节”人民联盟的作用，他说，尽管有各种阻碍，但联盟仍然大大地发展壮大，它现在已拥有2000多个组织。

斯泰诺夫说，保加利亚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同三个大国保持紧密的关系。他详细而热情地谈到同苏联的关系。斯泰诺夫揭露了反对派试图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企图，即要想签订一个有利的和约，只有让其他一些人进入政府任职。他强调指出，向保加利亚提出的赔偿要求并非是由于政府的组成人员有什么不妥，而是由于这个或者那个国家对保加利亚所持的立场所致。

在会上的发言中有不少是抱怨工人党和民警机关对“环节”人民联盟成员的种种限制的，这一点在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也有所反映。该决议说，迄今为止一些负有责任的和不负有责任的人依然在继续对“环节”人民联盟的活动设置种种障碍。

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声明，其全文已在塔斯社的参考消息中刊登。^②

委员会根据格奥尔吉耶夫和韦尔切夫的坚决要求，把右翼的

① 1945年9月底，在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谈判时，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反对派提出了下列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内务部，在各政党之间按比例划分警察局的地盘；将政府的首脑职位移交给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反对派代表；恢复祖国阵线1944年9月9日时的面貌；从管理机构中清除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和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也就是那些还没有转向反对派的人）；恢复1879年的国家宪法和民主自由；宣布特赦K.穆拉维耶夫的内阁成员；承认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和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合法权利，并保证他们无阻碍地出版自己的刊物。

② 在“环节”党的最高委员会的宣言中，表达了完全支持祖国阵线及其政府的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特别强调了在各种经济成分合作的基础上，必须保证私营者活动的条件。在内部政治范畴里，“环节”党坚决支持扩大自由民主和遵守国家的法纪。

“环节”人民联盟成员多拉普契耶夫和斯托伊梅诺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理由是他们同尼·佩特科夫的反对派有联系。

《东方报》报社社长尤鲁科夫受到警告并被要求按祖国阵线纲领的精神端正该报的方向。

反对派争取右翼“环节”人民联盟分子加入自己行列的希望未能实现。

谨此报告，供参考。

A. 拉夫里舍夫^①

1945年10月29日于莫斯科^②

① 拉夫里舍夫，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四欧洲司司长。

② 原文件上有如下批示：“向波诺马廖夫同志、巴拉诺夫同志和莫舍托夫同志介绍文件内容。A. 潘友新。1945年10月31日”。

No09228

比留佐夫关于保政府改组问题与 美国记者艾特里奇的谈话记录

(1945年10月29日)

艾特里奇：我想同您直截了当和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以便弄清楚可以着手做些什么。当然，在一周的时间里只能得到一个印象，但是我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同大约70位不同政党和派别的代表交谈过了。^①

我认为，在9月9日政府组成的时候，它曾经代表80%的居民。但是现在有许多人认为祖国阵线已经大大地削弱了。我认为，祖国阵线之所以大大地削弱，其原因是在它取得政权的过程中，警察人员的过火行为和该阵线的不择手段。现在人们不知道，在行将到来的大选中祖国阵线是否还能得到多数票。现在的政府不符合在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某些人把这些过火行为的责任归咎于俄国人，报告说只是由于有俄国人驻扎在这里，这些过火行为才得以发生。

比留佐夫上将：是谁这样指责？

艾特里奇：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说。

比留佐夫上将：可我却一次也没听到过这样的指责。

^① 由于苏联激烈抨击西方大国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改组问题上的立场，美国认为必须补充了解关于这些国家国内政治局势的情况。于是，具有自由民主观点的新闻记者艾特里奇，作为国务卿贝尔纳斯的私人代表，在保加利亚、苏联和罗马尼亚旅行了一个月。

艾特里奇：我非常希望能够向自己的政府说，保加利亚政府确实是代表着人民的大多数。我很想知道，您认为怎样做才能使这个政府成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政府。昨天您说：我们没有必要来争论关于保加利亚的事情。我同样希望我们能够不去争论关于它的事情。但是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很想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建议。内务部不论是对于反对派还是对于祖国阵线，主要也就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内务部对于反对派来说已经成了压迫和不择手段攫取政权的象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它则象征着这样的意义，即他们认为失去内务部就等于失去政权。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仅仅与一件事情有关：扩大祖国阵线基础的办法。这一点我也向祖国阵线的代表们说过。祖国阵线是一个联合性的组织。我所提及的问题不是仅仅关于反对派竞选名单的问题。

我认为，可以使祖国阵线恢复成去年那样的状态，因为所有的人对祖国阵线的纲领均无异议。麻烦只是由于某些个人引起的。

可以在祖国阵线内部的所有不同意见之间达成和解和使政府变得更加具有代表性。问题并不在于佩特科夫先生是否将参加政府。佩特科夫先生是农民联盟分子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除了奥博夫和另外2~3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

我建议把内务部交由总理或者另外一个不偏不倚的公正之人负责。这将消除内务部对于反对派的那种象征意义。这个部也不应该是共产党人的象征，因为不应当忘记，只要这里驻有俄国军队，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我个人希望双方都做出一些让步，不论是祖国阵线，还是反对派，而最为理想的是苏联和美国都来鼓励这种团结。这是相当具体的建议。

我很想知道，您是否认为这种团结是可能的。您怎样看待我的莫斯科之行？

比留佐夫上将：我没有完全弄明白您关于所有这些政党团结问题所说的话。我是这样理解的：您是在说，必须把内务部移交给另外一个党去负责，美国才能以端正的态度对待保加利亚政府。另外，同反对派和解的含义是指什么？

艾特里奇：这个部不应当移交给某个身为反对派的政党，格奥尔吉耶夫自己可以接管它。反对派人士已经不再指望选举将会推迟举行。他们全都表示同意祖国阵线的纲领。

比留佐夫上将：您说，必须使反对派与政府和解，而为了这一点应当让工人党交出内务部。您认为和解就是指的这件事还是指的别的什么？

艾特里奇：如果内务部移交出来，则它对于双方来说都将不再是一种象征。这将是同反对派达成和解的办法之一。

比留佐夫上将：这种和解应当具有哪些内容？

艾特里奇：我不想提出任何确定的基础。应当让他们有可能自己去创造这种基础。

比留佐夫上将：我不明白，如果内务部在选举之前转交到另外一个政党的手中，会有什么结果。距选举的举行还剩20天了，也许通过选举内务部将转至别的政党手中。那么现在做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

艾特里奇：在现在这样一个内务部存在的情况下，大家不相信人们能够不违背自己的意志和不受恐吓地投票。而如果把这个部在大选之前加以改变，则大家将会相信：对人民的这种压力将不复存在，政府将是真正民主性的。

比留佐夫上将：也就是说，要想让美国能够承认保加利亚政府，只需要做到一件事：把内务部移交给另外一个政党？

艾特里奇：需要扩大祖国阵线的基础，而内务部乃是这种扩大的障碍。

比留佐夫上将：到那时什么又是障碍呢？

艾特里奇：祖国阵线一开始是作为各政党的联合体创造起来的。自那时以来其内部已发生了许多分化。

比留佐夫上将：也就是说您希望让反对派加入祖国阵线？

艾特里奇：是的，我希望让反对派加入祖国阵线。大选的结果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因为已经存在按比例分配议会席位的协议了。^①

比留佐夫上将：那么，我是这样理解的：您认为必须对现存的情况做一定的改变，具体说就是内务部必须脱离工人党的管辖。

在此之后反对派将加入现政府，到那时他们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我这样理解您的话对吗？

艾特里奇：也许他们仍然坚持其从前的立场。但是你们应当鼓励他们去做这样的尝试，尝试联合起来。

提出反对派候选人名单——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让反对派参加政府。

比留佐夫上将：我向艾特里奇先生提出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准确地说明我的观点。而现在，如果艾特里奇先生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可以说说我们对上边谈到的那些问题的态度。

盟国管制委员会，特别是苏联方面一贯严格遵守并依照停战协定的规定行事，完全不干涉各政党的内部斗争和政府的国内政策，因为苏联十分尊重每一个国家的主权。盟国管制委员会没有任何权利对某个政党或政府施加任何压力。我也没有得到我国政

^① 在1945年6月底，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祖国阵线内的各党派代表，就将来议会中席位的分配事宜达成了一个初步的协议：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占94个席位；“环节”党占48个；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占32~33个；社会群众组织占8~9个。后来，在允许没有参加祖国阵线的党派进行活动以及反对派合法化之后，这些数字又有了一些改变。

府的授权去做此事。因此在这方面我不能采取任何步骤。我将立即向我国政府报告有关本次谈话和艾特里奇先生所谈意见的情况。

艾特里奇：但是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盟国管制委员会，而且还有三国政府签署的雅尔塔宣言。它们都承担了在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将广泛代表国内一切民主力量的临时政府的义务。这不是一个从外部施加压力的问题。压力由于红军以及您本人在这里本来就已经存在。

比留佐夫上将：红军驻在这里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即已经过去的反法西斯战争。我们在这里是在确保我们驻扎在德国的部队的侧翼安全。我们没有去批评英国，尽管它没有同希腊作战但却在希腊驻扎着自己的军队。因为这种彼此挖苦和刺激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我只是想说，这种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提醒对我是不起作用的，因为这是我国政府职权范围之内的事。

艾特里奇：我并没打算批评贵国家军队在此的存在，但是您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本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比留佐夫：我们没有去组建政府。政府原来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而且盟国同这个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很显然，盟国当时认为可以同这个政府打交道。指责我们施加了某种压力——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艾特里奇：我们多少有些离题了，我一点也不打算进行争论，但是我说，军队在此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压力。我承认，军队驻扎在这里是正确的，应该的，但是军队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将对别人产生压力。

比留佐夫上将：有这种可能。众口不一，各执一词。就此事我想请教艾特里奇先生，如果在所有国内政治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之后突然又出现一个取代佩特科夫的人，此人又说“我不赞同现在这

个政府”，则在这之后又应当满足这个人的要求吗？

我个人认为，任何事情都不妨碍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解决自己的问题。

18日将举行大选。70~80%的人民将投票支持这个政府。5个党的代表将参加政府，此外，还有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这样一来，该名单中也将有代表加入政府班子。当然。还可以争论说，5~6个党还是太少，但是如果再有3个党加入，则仍然可以说，还是太少。没有一个标准。总是有人抱怨，说某个党没有加入政府。

至于说到具体问题，则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地作证：反对派有机会参加投票。如果他们能够在报刊上发表任何东西，他们有这个自由。至于反对派关于恐怖手段的说法，我现在就可以向您提供自今年5月份以来被捕和交法庭审判者的一览表。

艾特里奇：但逮捕仍然在继续。

比留佐夫上将：从5月份以来一共逮捕了230人。在这230人中有大量的刑事犯罪分子。而且在被捕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反对派政党的成员，这些政党中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人在被捕者之列。也就是说，不存在对反对派的恐怖行为；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恐怖行为的说法——全是虚伪的说法。应当举出事实来，而如果没有事实——那就是说，也就没有真理，因此，很自然，我不能同意认为这里存在着恐怖行为的看法。而某些外国记者却在向其本国政府报告说这里存在着恐怖行为，但他们依据的不是事实，而是流言。

艾特里奇：您是否认为现在的政府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至能够实现雅尔塔会议的精神和具体要求？

比留佐夫上将：我不是国际问题的权威人士。但是莫洛托夫同

志在伦敦会议上已经表明了他是怎样看待保加利亚政府的。^①因此，我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至于莫斯科之行，我今天将报告所进行的谈论情况以及您的这个想法。

艾特里奇：并未提出这样的具体建议，我只是问问您的意见。

比留佐夫上将：总的说来，莫斯科一直是热情接待盟国代表的。

艾特里奇：谢谢您，但这不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

比留佐夫上将：我只能说，到莫斯科去一趟是很令人惬意的，莫斯科是个有意思的城市，除此之外我不能再说其他任何东西。

艾特里奇：我想向您提个问题，以便弄清楚您的看法：这样说来，您认为这个政府是具有足够代表性的？您认为盟国管制委员会无权干预保加利亚的事务？

比留佐夫上将：盟国管制委员会苏联一方不认为可以干预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的内部事务，按照停战协定，这不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

上一次曾经应保加利亚人自己的要求讨论过国内局势问题。当时保加利亚政府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请求，要求推迟举行选举。盟国管制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我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在会上宣布，保加利亚政府请求推迟举行选举。于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满足了保加利亚政府的请求。但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没有对其发号施令过。

艾特里奇：上一次是同莫斯科和我国政府共同做出的决定。

比留佐夫上将：我只知道一点，即保加利亚政府请求推迟举行选举。保加利亚政府这样做是因为美国和英国政府要求保加利亚采

^① 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指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政府在这些国家里建立了秩序和安宁，这是在成立民主政府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取这一步骤。反对派也要求这样做。我们只不过是注意到了保加利亚政府向我们提出请求这一事实而已。

艾特里奇：我非常感谢您同我进行了这次交谈。

比留佐夫上将：我希望您能再一次确切简练地阐述一下您的观点。

艾特里奇：我在此间逗留了仅仅 8 天，我能够得到的只是一种印象。因此，我简要阐明的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印象。这样做也符合我从国务卿贝尔纳斯那里收到的指示。

1. 当前，政府拥有的支持大大少于它开始组建时曾经拥有的支持。

2.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有各种过火行为，其中包括政治方面的过火行为。

3. 据我认为，存在着各种分子，其中包括反对派在祖国阵线的框架内而不是在取消祖国阵线的情况下和解的可能性。

4. 如果此事做到了，我就能有充分的根据说，在保加利亚存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

5.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内务部。同时，解决问题并不在于一定要从工人党手中把内务部夺走，而是在于消除该部对于反对派各党和对于共产党人的某种象征性。这一象征性引起他们之间的磨擦并削弱了祖国阵线。

我现在表明我自己的而并非佩特科夫灌输给我的看法，以及某些政府成员的意见：农民联盟是在国内代表多数人的大党，但是在政府中却没有反映实际情况的数量的代表。我认为，在选举之前达成妥协还是可能的，而这种妥协将确保政府基础的扩大。

在未来议会中各政党席位数量的分配已经确定，因而这一妥协不一定要改变政府中的力量对比关系。保加利亚人应当相互间就这些问题进行谈判。

我找您谈话是想弄清楚，为了使政府更加具有代表性，需要如何去做。

我认为，美国和苏联应当支持这一扩大政府基础的想法。我没有涉及承认保加利亚政府的问题，因为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我提出莫斯科之行问题仅仅是为了知道您个人的意见：您是否认为提出这个建议将会带来某种益处。

1945年10月29日于索非亚

№ 09229

苏军南方集群政治部关于保加利亚 选举给总政治部第七局的报告

(1945 年 10 月)

根据政府关于确定选举日期为 11 月 18 日的决定，10 月 14 日在保加利亚已开始了竞选斗争。在这一天，在瓦尔纳及其他一些城市举行了首批竞选群众集会。

国内的竞选斗争早在 9 月 11 日，当首次确定选举日期的时候已开展起来了。反对派当时曾经意识到，如果祖国阵线政府只是现有的成员不变，肯定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因此反对派人士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断言说，现政府“没有保障人民有应有的民主和自由”，因而它无权主持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反对派提出了自己的选举法草案，根据该草案，下列人员将失去选举权：不满 21 周岁的青年，军队，民警，武装护林队，边防部队及各种曾积极地参加过革命斗争和曾经侨居国外的政治活动家。

反对派报纸开始大量刊登对祖国阵线政府、共产党、民警机关及一切站在祖国阵线立场的行政机关的恶意诬蔑。

由于混进政府的企图和按照自己的意愿修改选举法的打算均未能得逞，反对派在《自由人民报》、《人民农业旗帜报》等报纸上发表了告选民书，在告选民书中以尼·佩特科夫的“绿色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卢尔切夫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联合派”及佩特科·斯托扬诺夫的“无党派人士联盟”的名义宣布抵制这次大选。在这几家报纸上还刊登了尼古拉·穆沙诺夫的“民主党”和 M. 斯托因

切夫及 П. 塔尔卡拉诺夫的“激进党”关于拒绝参加大选的声明。

反对派之所以抵制这次大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得到能确保反对派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的足够数量的支持者。只是在某些县里他们得以借助蛊惑宣传吸引一部分农村青年和农民支持自己（当然，亲法西斯分子、投机分子等是完全赞成反对派观点的人）。甚至在据反对派人士说“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们”的舒门这个地方，彼得·谢尔宾斯基也只是从城乡各地召集到了不足2000人来参加群众大会，而且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对演说者的讲话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与之相对照的是：参加由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瓦西里·科拉罗夫的到来而自发举行的群众集会的却多达20000多人。

抵制大选的另外一个同样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反对派企图在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论据的情况下，通过抵制选举这一事实本身来证明“在保加利亚既无自由，又无民主”，并以此为理由给英国和美国以从外部对保加利亚事务进行政治干涉的借口。

最后，通过拒绝参加大选，反对派开展了广泛的诬蔑性运动，反复强调所谓“强制投票”，以便败坏这次大选的名声，否定选举的结果。可以预料，随着代表政府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局势做出客观评价的美国政府全权代表、记者艾特里奇来到保加利亚，这一运动将会大大加强。尽管司法部和民警总局已经警告说将严格追究造谣诬蔑者的责任，反对派报纸现在依然在大力开展诬蔑运动。

揭露反对派的诬蔑及其关于抵制大选声明的挑衅性质，使得反对派以前的许多支持者纷纷疏远他们。越来越多的以前曾经支持佩特科夫分子的农村社团发表声明说，在行将举行的大选中将全力支持祖国阵线。近日来反对派报纸的需求量已经减少。事情甚至到了反对派人士现在又抱怨“有人在有组织地抵制反对派机关报”的程度。反对反对派的情绪在军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军队中组织的

大量士兵、士官和军官的集会上都一致通过了痛斥反对派背叛行为的声明。

所有保加利亚报纸转载的《真理报》文章在揭露反对派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文章揭露了反对派人士关于他们在对外政策方面亲俄和臆造出来的所谓苏联对可能由目前的反对派人士组成的政府抱有好感的谎言。同时《真理报》的看法也进一步加强了大多数农民和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祖国阵线政府的信任——至于工人就更不必说了。保加利亚人民的绝大多数抱定亲俄的大方向并支持面向苏联的政府，不仅仅是出于对曾经两次把保加利亚从外来桎梏下解救出来的斯拉夫民族老大哥的传统友谊之情，也是由于他们坚信，同苏联亲密无间的友谊将意味着保加利亚经济的迅速繁荣和国家政治独立的加强和巩固。

祖国阵线各政党参加竞选斗争不仅仅是紧密团结在祖国阵线周围，而且是明确确定了自己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方针。具有代表性的是，按其社会成分来看属最右翼的祖国阵线政党“环节”人民联盟，不久前在—项声明中表示完全支持祖国阵线的政策，并强调说，祖国阵线的经济纲领不论从整个国家整体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每个工业家个人来看，都是惟一正确的纲领。

像在8月26日之前—样，祖国阵线各党是以统一的候选人名单参加此次国民议会议员选举的。由于激进党加入祖国阵线，在由各党提出的候选人数量方面的对比有所变化：现在由保加利亚工人党（共）提出的候选人为98人，由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提出的候选人为98人，由“环节”人民联盟提出的候选人为46人，由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提出的是31人，由激进党提出的是11人。

在索非亚第1选区，祖国阵线候选人名单上为首的是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普罗夫迪夫第1选区是瓦西里·科拉罗夫；在布尔加斯第1选区是基蒙·格奥尔吉耶夫；在普罗夫迪夫选区是亚·奥

博夫；在鲁休克第2选区是П. 涅伊科夫（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书记）；在费拉察的第3选区是卓拉·德拉戈伊切娃（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秘书，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党员）；在帕纳久里什是斯托扬·科斯图尔科夫（激进党领导人）。

正如首批竞选群众集会所表明的那样，保加利亚人民正以极大的热情参加竞选斗争，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拒绝参加竞选集会和抵制这次大选的号召。

№09233

基尔萨诺夫关于格奥尔吉耶夫同艾特里奇的谈话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1945年11月12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巴尔干国家司。

致莫洛托夫同志

我刚刚收到了格奥尔吉耶夫通过朋友转告我们的如下情况：

11月11日18时，应艾特里奇的请求格奥尔吉耶夫同他进行了交谈。艾特里奇说，他即将前往莫斯科，他认为他有义务在离开此地的前夕告知总理：他已经向本国政府报告了自己对保加利亚局势的印象和结论。

他已经收到了美国政府的指示：既然未能做到使反对派与祖国阵线相联合，他应当前往莫斯科，在那里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以美国政府的名义争取推迟举行大选^①。他的任务是说服莫斯科，使之相信为了建立一个将能够主持大选的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必须推迟选举。如果尽管这样做了，但大选仍旧举行，则他有责任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宣布，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结果将不被承认，美国政府将不能恢复其同保加利亚的关系。艾特里奇说，最近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对

^① 根据经摄政委员会批准的保加利亚内阁会议决议，国民议会的选举定于1945年11月18日进行。

巴尔干问题的坚持不懈的关注特别明显。^①

格奥尔吉耶夫希望告诉莫斯科，在目前条件下再次推迟大选等于是是一场灾难。选举一定要进行。如果必须做点什么，可以在选举以后再去做。格奥尔吉耶夫补充说，他同艾特里奇谈话的情况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艾特里奇的话可能会动摇他的党内许多人。

当格奥尔吉耶夫试图反驳艾特里奇的话时，艾特里奇说：“我的任务中不包括同您进行争论。我只是认为我应当向您转达我的政府授权我转告的东西，并让您了解我国政府的观点。不是由我来解决这些问题，它们将由我国政府按照同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去解决。”格奥尔吉耶夫认为，美国人是在争取让反对派返回祖国阵线。在谈话过程中艾特里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选举之后能否做些什么事情？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如果反对派参加了大选，本来是可以做许多事情的。可是现在，当反对派不参加大选的时候，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艾特里奇问：“不可以解散议会吗？”

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这同样不可以。可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鉴于将进行立宪会议的选举，故议会议员的数量可以减少”。

基尔萨诺夫

后记：格奥尔吉耶夫和朋友们都要求告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②

1945年11月12日18时55分于索非亚

① 11月14日，根据艾特里奇的建议，美国方面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交了官方照会，认为保加利亚和从前一样，不具备自由选举的条件。

② 苏联表示的立场是：选举应在指定期限内进行，并且由格奥尔吉耶夫政府主持。

№09234

季米特洛夫与拉夫里舍夫关于保加利亚

议会选举不容再推迟的电话记录

(1945年11月12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归档。

秘密

11月12日21时格·季米特洛夫同志从索非亚给我打来电话说，11月12日他给莫斯科发了一封内容很重要的电报，他请求对该电报予以重视。在这封电报中告知，艾特里奇希望争取再次推迟举行大选。反对派人士和右翼的“环节”人民联盟成员已经在索非亚散布流言说，苏联同意再次推迟保加利亚的选举。

季米特洛夫同志强调，再次推迟大选等于是祖国阵线的一场灾难，保加利亚政府和参加祖国阵线的各党都认为无论如何也必须在预定日期即11月18日举行大选。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想法是，最好能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或者其他什么渠道对所谓苏联同意再次推迟保加利亚大选的谣言加以驳斥。

季米特洛夫同志请求：如果可能，向他通报一下艾特里奇在莫

斯科将进行的有关保加利亚局势的谈话情况。^①

我答应把我们谈话的情况报告 B.Γ. 杰卡诺佐夫。

A. 拉夫里舍夫

1945年11月12日于索非亚

^① 1945年11月13日，艾特里奇与维辛斯基会晤并向他阐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作为答复，苏联外交官重申，保加利亚政府按其组成是如此具有代表性，正如在其他民主国家一样，抵制选举的责任应该由反对派本身负责，任何试图达到推迟选举的行为都是西方国家的愚蠢的干涉。

№09244

莫洛托夫关于三国外长会议结果 与米哈尔乔夫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5年12月27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基尔萨诺夫。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莫洛托夫简要地向米哈尔乔夫^①通报了会议的结果并补充说，会议已经结束，贝尔纳斯已经乘飞机回国，而贝文则由于天气的原因而留了下来，他将于12月28日飞离此地。贝尔纳斯是绕道经那不勒斯走的，因为天气不适宜飞往柏林和伦敦。

莫洛托夫说，明天将在报纸上全文公布所有的在业已结束的本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莫洛托夫说，米哈尔乔夫那时将可以详细地了解所有的决议，而现在莫洛托夫将简要地通报一下都就哪些问题通过了决议，决议涉及了同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签订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问题。这项决议已经公布。

米哈尔乔夫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苏联政府的观点取得了胜利。

莫洛托夫回答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意了苏联方面提出的起草

^① Д. 米哈尔乔夫，时任保加利亚驻苏联公使。

和约的程序。苏联代表团同意了美国方面关于召开讨论和约的国际会议的建议。莫洛托夫补充说，苏联政府以前也没反对这一点，但是它曾经希望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莫洛托夫说，在会议上还通过了关于在日本和朝鲜的监督机制的决议，就在朝鲜建立独立的政府和对朝鲜的托管原则达成了协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国的决议。……

莫洛托夫接着说，会议的决议还涉及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原子能委员会。莫洛托把关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决议文本(见附件)^①交给了米哈尔乔夫并说，米哈尔乔夫大概将会有兴趣将这两个决议进行比较。关于罗马尼亚，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派一个由维辛斯基、哈里曼和克尔组成的小组前往罗马尼亚同米哈伊国王和现政府成员进行协商，以便完成同让一名国家农民党成员和一名自由党成员加入罗马尼亚政府相关的任务。三国政府将向米哈伊国王建议按这种方式扩大政府的人员组成。将不向保加利亚派遣这样的小组。原因在于，在保加利亚已经举行了大选，而在罗马尼亚则尚未举行。在罗马尼亚现在既没有由议会选出的政府，也没有议会。

米哈尔乔夫又读了一遍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文本。米哈尔乔夫问，其中谈到让其他民主集团的两名代表补入保加利亚政府，这里指的是何人。是否指的是让反对派参加政府？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项决议恰恰是同现在没有参加政府的反对派有关。^②

米哈尔乔夫问，是否将让尼古拉·佩特科夫参加政府，并说，佩特科夫已经参加过政府，但是又退出了。

莫洛托夫说，会上关于具体人选没有谈。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② 在1945年12月16~26日莫斯科召开的外长协商会议上，苏联与英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将在让其他民主派的两名代表参加政府一事说服保加利亚政府，而在此之后，美国和英国将承认保加利亚政府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只对罗马尼亚有专门的协议，即马尼乌、卢普和布莱蒂亚努不能进入政府班子。对于保加利亚没有关于具体人选的这样的协议。

米哈尔乔夫说，他回到索非亚的时候正赶上艾特里奇也正在保加利亚逗留。米哈尔乔夫说，美国人把祖国阵线想象成一个广泛的资产阶级联盟，其中分有两派：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派和由其他政党、农民、手工业者、资产阶级组成的右派。美国人认为，这两派应当互相制约，达到力量均衡。祖国阵线中的资产阶级一派由于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表离开政府班子而削弱了，均势受到了破坏。在美国人看来，在保加利亚应当重新恢复这一已遭破坏的均势。美国人声称，在祖国阵线里共产党人在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这是不正常的。

莫洛托夫说，美国人没有向苏联方面谈过这一点。

米哈尔乔夫回答说，关于这一点艾特里奇同罗马尼亚各方面的社会活动家都谈过。

莫洛托夫回答说，艾特里奇还曾提出过一些其他建议，但是这些建议都未被接受。例如，艾特里奇曾打算插手内务部和司法部的事。这些建议未被接受。美国人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只是引用了艾特里奇的看法。苏联代表团当时表示，爱伦堡同样也持有各种各样的看法。爱伦堡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无党派记者。但艾特里奇说一种看法，爱伦堡说另一种看法，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他们个人的看法而已。莫洛托夫说，被接受的并不是艾特里奇的观点。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是不能允许的。

米哈尔乔夫说，英国人对待罗马尼亚政府的态度有别于美国人。英国人希望祖国阵线被解散，而美国人则不反对祖国阵线。他们同意祖国阵线的存在，但是希望使其内部的两派保持平衡。

莫洛托夫说，如果是一种不稳固的均衡，如果是一种简单的平衡，则不会有任何结果。需要实行一种确定的政治路线。

米哈尔乔夫说，所有保加利亚人共同关心的事情是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米哈尔乔夫说，美国的观点是想让两个米科瓦伊奇克^①进入保加利亚政府。米哈尔乔夫说，他是这样理解此项决议的含义的。让两名反对派人士进入政府并不能改变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米哈尔乔夫说，美国人希望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装装样子，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

莫洛托夫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希望找到一个摆脱业已形成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困难境地的办法。

米哈尔乔夫说，让米科瓦伊奇克进入波兰政府并未改变实际的力量对比关系。

莫洛托夫解释说，当时波兰的情况不同。那时在波兰存在两个政府，问题是在于要取消一个政府和建立一个由波兰所有民主政治集团的代表组成的统一的政府。而在保加利亚则甚至连第二政府的影子都没有。

米哈尔乔夫说，他认为反对派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见解与保加利亚政府成员的见解并无二样。例如尼古拉·佩特科夫就非常明确地承认，保加利亚正在进入——按他的说法——苏联的势力范围。佩特科夫认为没有可能对苏联采取任何敌对政策。他的反对派立场是由于其在对内政策方面的而不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看法决定的。

莫洛托夫说，佩特科夫对某些事情不完全满意。莫洛托夫说，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则佩特科夫立场的实际含义在于他即对保加利亚政府的对内政策路线也对其对外政策路线不满。

①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1943~1944年任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总理，波兰农民党领导人，1945年波兰临时政府成员。米科瓦伊奇克在这里是政府反对派的代名词。

米哈尔乔夫说，他没有想这一点。米哈尔乔夫说，他（米哈尔乔夫）曾经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谈过话并且明白了。共产党人的立场是：佩特科夫及其他一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英国和美国政府的间谍。

莫洛托夫说，他们是间谍还是不是间谍——这是另外一码事。莫洛托夫指出，他没有说他们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间谍。

米哈尔乔夫说，保加利亚的反对派利用了这样的事实，即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表示了自己的关注，要求给保加利亚的少数派以出版报纸、举行会议、参加议会的自由。反对派利用了这一点来加强在国内的地位。

莫洛托夫说，但是不能说反对派就没有想过要“纠正”保加利亚的对外政策。^①

米哈尔乔夫说，他没有想这一点。米哈尔乔夫说，反对派与其说是对苏联不满，不如说是对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不满。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反对派对许多事情不满意。也可能他们对国内政策的不满多一些，而对对外政策不满少一些。

莫洛托夫问米哈尔乔夫对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是否全弄明白了。

谈话共持续了 20 分钟。

记录员 B. 叶罗费耶夫

1945 年 12 月 27 日 15 时 30 分于莫斯科

^① 实际上，在保加利亚反对派纲领中所反映的，是祖国阵线 1944 年 9 月 17 日纲领的内容和 1945 年 3 月在祖国阵线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宣言。在这些文件中确定了一系列方针：同苏联的合作以及与兄弟俄罗斯人民的永久友谊；与南斯拉夫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人民保持最密切的接触和诚挚的关系；友好地对待美国、英国和法国。

№09250

斯大林与格奥尔吉耶夫等人关于莫斯科 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谈话记录

(1946年1月7日)

绝密

苏联方面参加交谈的有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基尔萨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方面参加交谈的有保加利亚总理基·格奥尔吉耶夫先生，外交部长斯泰诺夫先生，内务部长尤戈夫先生和保加利亚驻苏公使米哈尔乔夫先生。

会谈从晚间10时10分开始到11时40分结束，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双方互致问候后开始交谈。斯大林向格奥尔吉耶夫打听保加利亚1945年发生的干旱所造成的后果和畜牧业的情况。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除了南部的多布罗加地区以外，干旱给整个保加利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同时说，目前保加利亚正在下大雪，有理由指望1946年会有好收成。全国的秋播计划差不多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谈到畜牧业时格奥尔吉耶夫认为，由于干旱，使畜牧业的长期危机在1945年进一步加剧，预计还要持续至少两三年时间。之后，斯大林把话题转到了与执行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的有关问题上，这些问题占用了会谈的所有时间。这次交谈中没有提起其他问题。

斯大林同志：“你们那里反对派的情况怎样？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们那里在执行莫斯科决议上出现了困难。”

格奥尔吉耶夫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受到了保加利亚全国人民的欢迎。祖国阵线政府对这一决议感到满意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祖国阵线的立场在决议中得到完全尊重。

斯大林同志：“决议不会给你们的处境造成困难吧？”

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政府没有理由抱怨这些决议。决议很好，对于双方——无论对政府或对反对派都是可以接受的。

格奥尔吉耶夫接着说，一开始以为，在保加利亚找不到反对这些决议的人，事实上并非如此。政府收到的有关莫斯科决议公布后反对派人士情绪的最新材料说明，反对派，尤其农民反对派，倾向于和解。在收到苏联政府方面的友好建议以后，保加利亚政府发出了一些信函，请从祖国阵线中分裂出去的农民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反对派集团领导人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政府的代表就这些集团的代表参加祖国阵线政府的问题举行谈判。1月5日，连续同两个集团的代表进行了会晤。在这些会晤期间，政府的代表团根据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任务是用其他两个民主派集团的两名代表补充现政府，但绝对不是改组政府。接着格奥尔吉耶夫列举并评述了向反对派集团提出的它们的代表进入政府的条件（见附件1）^①。佩特科夫在同政府的代表团交谈中流露出比社会民主主义者代表更趋向于和解的情绪。

在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代表中有一些与祖国阵线从来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人，如帕斯图霍夫。根据两个反对派集团代表的要求，保加利亚政府以书面形式阐述了这些集团的代表进入政府的条件，并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请求他们也以书面形式在第二天（即1月6日）做出答复。昨天（1月6日）政府收到了这些集团的书面答复。把这些答复进行对照后可以得出结论，这两个集团是一致行动的，他们的答复几乎一模一样（格奥尔吉耶夫把农民集团佩特科夫的答复交给了斯大林，见附件1）^①。格奥尔吉耶夫继续说，从这些答复中可以看出，反对派提出了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并且不尊重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这些条件明显同莫斯科会议的决议相矛盾。

斯大林同志扫了一眼佩特科夫的答复后插话说：“他们表面上承认这个协定，实际上否定它。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法。”

格奥尔吉耶夫对此表示同意并继续说，由于保加利亚的反对派明显不愿意尊重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保加利亚政府决定今天午间通过广播电台专门播发有关当前局势的报道（格奥尔吉耶夫把报道原文交给了斯大林，见附件2）^②。

斯大林同志问，这份报道发表了没有，在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后，斯大林说，保加利亚政府仓促地将其发表，可能会造成麻烦。斯大林同志指出，报道本身写得也不正确，里面没有摘引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答复的原文，而是对这些答复进行了综合和转述。反对派此时会说，政府故意对他们的文件进行歪曲。

接着，斯大林同志向保加利亚部长们介绍了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是如何通过的。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把保加利亚连同罗马尼亚问题一并提了出来，他们对两个国家都提出了要求：（1）内务部保持中立；（2）两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和政党有在选举中提出单独名单的权利；（3）吸收反对派的代表参加政府组成并改组政府。他们没有谈到保加利亚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②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的选举是无效的。关于改变国内外政策问题，他们也没有谈到。

我们回答他们说，首先应该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区别开来，因为在保加利亚已经进行了选举。他们对此表示同意。然后我们指出，反对派应该奉公守法，例如美国就是这样。我们拒绝了英国人和美国人关于改组保加利亚政府的要求，他们对此表示同意。在对待罗马尼亚问题上，我们拒绝了他们把马尼乌、卢普和迪努·布莱蒂亚努^①吸收到政府中的请求。我们也不接受改组罗马尼亚政府的要求。我们对英国人和美国人讲，罗马尼亚政府表现很好，没有任何理由对它改组。至于谈到选举，我们同意罗马尼亚政府必须保证集会、言论和出版自由。英国人和美国人希望保加利亚政府也能发表相关的保证性声明。我们不同意这一点，我们也不同意罗马尼亚内务部中立化。

这样一来，在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中既没有写进关于改组政府、进行新的选举的内容，也没有写进关于改变国内政策的话。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今天得到的消息说，罗马尼亚国内已经达成了谅解。而且，罗马尼亚政府不是把所有反对党的代表都吸收到政府中。例如，民族自由农民党提出了米哈拉凯，当被告知这个候选人不合适后，他们就提出了其他候选人。候选人贝贝·布莱蒂亚努也被否决了。在保加利亚，事情不知为什么办得如此糟糕，原先以为这里的事情要容易一些。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对于保加利亚政府较之关于罗马尼亚的决议对于罗马尼亚政府来说更加有利。而实际上却出现了保加利亚政府对保加利亚反对派的付出多于罗马尼亚政府对罗马尼亚反对派的付出。在罗马尼亚，进入政府的反对派代表没有得到一个部长职位。而在保加利亚，反对派得到了好几个部长职位，但他们还不想进入政府。斯大林同志最后说

^① 马尼乌、卢普和迪努·布莱蒂亚努，均是罗马尼亚反对党领袖。

道，这是无耻行径。

之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问保加利亚的两位部长，今后他们想干什么。

格奥尔吉耶夫谈了他的打算。他说，在布加勒斯特达成的协定可能会对保加利亚的反对派起到清醒的作用。但他同时又指出，他不相信这一点。并且说，反对派从外国得到了不怀好意的劝告。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停止这些不怀好意的劝告，而代之以善意的建议。斯大林问，反对派从谁那里得到了不怀好意的劝告，格奥尔吉耶夫回答说，从美国政界代表人物巴恩斯那里。并且说，巴恩斯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联系过于密切，全然不顾一个外交代表所应有的行为准则。

之后开始热烈交换看法，我仅列举一些交谈过程中最重要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显然，我们应该干预。很清楚，佩特科夫、卢尔切夫和帕斯图霍夫都不应该进入政府。”

莫洛托夫同志：“你们同反对派的谈判还不能算是结束吗？”

格奥尔吉耶夫：“表面上看，谈判没有中断，而实质上事情已经没有希望了。”

斯大林同志：“在罗马尼亚，事情的结局很好。那里的反对派更聪明。对于达成的协定，国王比所有的人都感到高兴，高兴得差点哭出来。他本来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现在谢天谢地，暂时得救了。”

斯泰诺夫：“我们这里最困难的问题是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选举结束了，你们的反对派可能全部完蛋。反对派抵制这些选举，三大国承认这些选举。从莫斯科会议关于保加利亚的决议中难道不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吗？”

斯泰诺夫：“是的，反对派看来没有远见。”

斯大林：“不总是那么有远见吧。丘吉尔要比你们反对派有远见得多吧，但在柏林会议期间，他向我们保证一定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艾德礼本来只希望自己的票数稍有增加，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党会在议会中得到多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预见到，这很困难。”

“英国人和美国人想，要是保加利亚进行自由选举的话，祖国阵线就会处于少数地位。而结果并非如此。”

格奥尔吉耶夫：“他们戴着反对派的眼镜看我们。”

斯大林同志：“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选举是合法的”。

莫洛托夫同志：“莫斯科公报中没有一句话提到选举，也闭口不谈出版自由。英国人和美国人也在这份公报上签了字。因此，反对派在这一点上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当然，英国人和美国人还会暗地里支持反对派，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公开这样做。你们那里过去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斯泰诺夫：“是的，这是对选举的默认。”

斯大林同志：“维辛斯基什么时候应该去伦敦？能否把他派到保加利亚，把那里的事情搞清楚？当然，无论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都不应该进入政府。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同意承认保加利亚政府，可以等待他们承认。我们也曾经多年不被他们承认嘛。”

斯泰诺夫：“我想，就是维辛斯基来了以后，反对派也不会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事情不在这里。现政府和反对派正在争吵。如果谈判没有成功，他们可能把责任推到保加利亚政府身上。如果作为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维辛斯基去了，你们的争吵就有了一个调停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调停失败了，我们就来承担责任。到时候谁也不会怪罪你们。”

斯泰诺夫：“我们不怕承担责任。”

格奥尔吉耶夫：“我们考虑到了我们的政治习惯，所以我们不仅要以书面形式阐述我们的条件，而且要求反对派也要有书面条件。”

斯大林同志：“你们做得不对。不应该从书面阐述条件开始，而应该从口头谈判开始，并且一步一步地让他们口头上亮出自己的观点，这以后才可以让他们以书面形式阐述其要求。看来你们还缺乏党与党之间的谈判经验。”

格奥尔吉耶夫：“这是一些丧失理智和不讲信用的人。如果我们不从以书面形式阐述各自的观点开始，那么有朝一日他们就会把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东西归咎于我们。”

斯大林同志：“佩特科夫有一种农民的心理状态，他害怕纸面上的东西。农民可以做许多事情，只是不能逼迫他在某份文书上签字。如果他不得不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他一定要附带种种条件。我认为，对于你们和我们来讲，最好是正面解决问题。倘若反对派不这样做，那对他们更为不利。他们就会完蛋，没有他们我们照样能行。但愿佩特科夫不要以为，苏联和美国会因他而打起仗来。”

斯泰诺夫：“应该迫使反对派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你们很需要佩特科夫的承认。显然，维辛斯基应该向保加利亚人解释莫斯科决议。”

莫洛托夫同志：“这是已经占领的阵地。你们不正确地理解了莫斯科决议。选举已经得到莫斯科会议的承认，这次会议的决议中没有提到选举不是偶然的。不应该要求反对派承认选举。”

斯大林同志：“这是一条公理，而你们想把这条公理变成定理。你们有一个问题——用反对派集团的两名代表补充现政府（斯大林打电话问维辛斯基，什么时候公开发表关于让反对派代表参加罗马尼亚政府的协定，并就保加利亚问题指示维辛斯基说：‘佩特科夫厚颜无耻地要求改组保加利亚政府和解散议会，这是一个厚颜无耻

的人。应该像对待罗马尼亚国王那样对待他’)。只向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想不想派自己的代表去政府？其他的问题都不用讲。罗马尼亚的事情要复杂得多，他们那里还没有搞选举。此外，那里不仅有反对派，而且还有国王。你们佩特科夫有提出某些条件和发表宣言的机会，让人不好理解。”

斯泰诺夫和米哈尔乔夫：“要是反对派在维辛斯基去了以后仍然拒绝参加政府，那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责任不在你们，而在我们。他们可能指责你们撕毁莫斯科决议，却不会指责我们，他们不敢。主要的是瓦解反对派。莫斯科会议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决议已经开始使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四分五裂，因为决议中只说让每个反对派出两名代表补充现政府。这完全不是英国人和美国人许诺的东西，也不是反对派头目所希望的东西。在罗马尼亚，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是众人唾骂的对象。如果你们那里反对派头目不提出进入政府的代表，那么反对派内部就会不可避免地打起来”。

谈话记录 基尔萨诺夫

1946年1月7日于莫斯科

№0926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保加利亚 缔结和约的指示

（1946年3月21日）

绝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出的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缔结的和平条约草案，批准给在伦敦四国外长会议上参加同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缔结和平条约的副外长级协商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并作如下修改：

（1）在关于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缔结和平条约的指示中指出，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军队应各裁减到50000人；

（2）在关于同保加利亚缔结和平条约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向保加利亚索取的战争赔款不应超过4500万美元的现金或相当于这笔钱的实物。

1946年3月21日于莫斯科

附 件

对参加伦敦四国外长委员会
副外长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关于同保加利亚缔结和平条约

参加外长委员会副外长级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应该遵循苏联代表团 1945 年 9 月 12 日在审查四国外长委员会伦敦会议时提出的关于同保加利亚缔结和平条约的建议（见附件 1^①），以及遵循四国外长委员会在会议期间达成的一致决定。

在讨论美国和英国在审查四国外长委员会会议中提出的建议（见附件 2 和附件 3^②）时，如果它们的建议尚未被审查，或者在讨论这些建议时产生分歧，苏联代表团应遵循：

1. 限制武装力量（英国备忘录第 4 点和美国备忘录第 5 部分）。把外长委员会通过的美国的建议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如果在讨论这一建议时要求说出裁军的具体数字，那么有关我方立场的问题要另行讨论（应坚持保加利亚军队应该裁减到 50000 人）。

反对设立裁军监察员。理由是，在缔结和平条约后保加利亚将加入联合国。

2. 从保加利亚撤军（英国备忘录第 5 点）。如果按照同意意大利缔结的和平条约将不规定盟军撤出意大利，那么就收回苏联代表团同意从保加利亚撤军的话。

3. 关于保加利亚的边界（美国备忘录第 1 部分和英国备忘录第 8 点）。

（1）反对美国关于在察里布罗德和马其顿地区对保加利亚 - 南斯拉夫边界作不大修改的建议，因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都没有提出这些问题。

（2）不要在和平条约中规定关于保加利亚 - 罗马尼亚边境的条款，因为对这一边界没有争议。万不得已时可同意和平条约中关于重申南多布罗加归属的条款。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②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个附件。

(3) 在和平条约中不提保加利亚的其他边界，因为其他边界并没有发生变化。

4. 关于供保加利亚使用的自由港（美国备忘录第2部分）。搞清楚美国人提出的关于供保加利亚使用的自由港的建议的具体内容。

在审议美国关于向保加利亚提供专门的自由港和在经萨罗尼基、卡瓦拉和德德奥加奇转口贸易时，向保加利亚提供转口贸易优惠的建议，并坚持让保加利亚的代表一道参加审议，以听取保加利亚代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5. 战争赔款（美国备忘录第7部分）

(1) 在审议保加利亚的战争赔款问题时，苏联代表团应尽量减少保加利亚战争赔款的数量，并对其支付创造有利于保加利亚的最优惠条件。

同时应坚持使保加利亚的战争赔款不超过4500万美元或相当于4500万美元的实物。在战争赔款总数中，南斯拉夫赔款所占的比例应占2/3，而希腊应占1/3。

在谈判时苏联代表团不要首先提出关于战争赔款总数的建议。

反对美国关于成立一个小组以确定战争赔款数量和监督保加利亚履行赔款和财产赔偿义务的建议。

(2) 同意以保加利亚在相关盟国的资产作为战争赔款。但是，反对将保加利亚在中立国的资产作为损失补偿。

6. 关于保加利亚承认多瑙河制度（美国备忘录第2部分第2点和英国备忘录第7点）。如同在外长委员会会议上那样，不接受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建议。

7. 在获取原料，进行贸易和工业生产，利用港口、河流和通航设施方面的平等权利（美国备忘录第8部分）。不接受美国人的建议，理由是这个问题应该通过共同协商规定出适用于各个国家的

办法。

8. 关于主权（美国备忘录第 9 部分）。反对将恢复主权的条款列入条约。理由是，缔结和平条约本身就是恢复保加利亚的主权。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这一点已经按照同意大利缔结的条约通过，那么就说我们同意把关于主权这一点从所有的条约中去掉。

9. 文化歧视（美国备忘录第 4 部分）。不接受美国关于不容许将这部分内容适用于加入联合国的主权国家的建议。

10. 保留或取消双边和多边条约（英国备忘录第 5 部分第 7 点）。我们对这一建议持保留态度，直至收到具体的指示和搞清楚是指哪些条约。

11. 经济和财政问题（英国备忘录第 9 点）。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平条约中的经济和财政问题的篇幅，坚持保留苏联 1945 年 9 月 12 日提出的建议的第 1、2、3 点。

12. 军人墓地（英国备忘录第 8 部分第 7 点）。苏联代表团应该不接受这一建议。

13. 承认取消国际联盟和常设国际审判庭（英国备忘录第 2 部分第 7 点）。不反对英国的建议。

14. 承认联合国的权力机构（英国备忘录第 3 部分第 7 点）。不接受英国的建议，因为支持保加利亚作为联合国候补成员国已有明文规定。

万不得已时可以让步。

№09297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加利亚在选举问题上 如何答复美国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6年10月3日)

抄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马立克、扎鲁宾，送巴尔干国家司和美国司。

致杰卡诺佐夫同志

10月2日美国政治代表巴恩斯拜会了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并将标明信件日期为9月24日的贝尔纳斯私人信件交给了他。该信副本我刚刚通过朋友得到，其全文如下：

“尊敬的总理先生

在我们于今年8月27日关于贵国政治形势和造成在同保加利亚签署和约方面使美国为难的这种形势的诸多问题的谈话之后，我对美国与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系考虑了很久。

我曾经希望，阁下8月31日委托巴恩斯转交我的备忘录中所阐明的计划之付诸实施将会大大有助于消除我曾经同阁下讨论过的那些难题。正如我曾经对阁下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关于在10月27日大国民议会选举之前吸收2名有威望的反对派领导人入阁，从而扩大保加利亚政府的基础的莫斯科协议如能得以兑现，那将是使选举结果得到广泛认可最适当的办法。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保加利亚政府在阁下返回索非亚之后为在选举之前在实际上兑现莫斯科决议而做出努力的任何表现，但我现在依然希望保加利亚

政府将会做出这样的努力。

出于想从我这方面尽一切可能确保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实现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这三大盟国代表在雅尔塔抱有和表达的希望的真诚愿望，我决定通过此信来继续我们在巴黎的对话。我认为我还有义务告诉阁下，我已经指示罗伯逊将军向盟军管制委员会主席提出要求，让盟军管制委员会听取所有政党领导人关于行将举行的大国民议会选举及国家总的政治形势的意见。罗伯逊将军将要求召开盟军管制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在下列几个方面委员会为确保大国民议会的自由选举而在今后能够采取的措施。

1. 反对派出版、广播和集会自由。

2. 除了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情况之下，民警机关不干涉候选人和选民的活动。

3. 释放政治犯或者明确说出对他们的指控。

4. 消除一切形式的关于在选举之后基于政治原因进行报复的威胁。

我确信，阁下能够理解我给阁下写此信时态度如此坦率的动机；请阁下回忆一下我说过的关于造成贵国当前使美国在恢复与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与政府之间友好关系方面感到为难的局势的那些困难的话。”

在转交信件的同时双方所进行的谈话中，巴恩斯特别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不是把保加利亚政府作为一个与之保持有正常外交关系的政府，而是作为一个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并且处于盟国管制委员会管制之下的国家的政府与之对话的。

他说，即将进行的选举应当能够解决一些保加利亚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巴恩斯还保证说，在他同保加利亚的反对派进行多次谈话中他都表示赞成反对派参加这次选举。

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在这次谈话中仍然坚持他在8月27日在巴

黎向贝尔纳斯阐明的那些立场。

我认为最好就此事前往拜会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向他保证，苏联将不同意盟国管制委员会对保加利亚大国民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进行任何干预。建议他本着这样的精神回答美国人，即保加利亚政府现在和将来都保证美国人在其致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信中提出的所有4个方面（在关于法西斯分子的第3点上有保留）实现大国民议会的自由选举，将信中各项问题提到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进行讨论，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是一个在贝尔纳斯所关注的恢复保加利亚和美国两国政府之间友好关系方面很坏的和不太愉快的前奏曲。

我认为，如果美国人真的希望摆脱与今后签署同保加利亚的和约相联系的，对于他们来说是困难的局面，而不是另有什么别的打算，那么保加利亚政府的上述保证对于他们来说应当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请您尽快指示是否同意这样做。格奥尔基耶夫正在准备给贝尔纳斯的答复。

基尔萨诺夫

1946年10月3日于索非亚

№09299

基尔萨诺夫关于反对派在保议会选举前夕 频繁活动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6年10月26日)

秘密

致杰卡诺佐夫同志

10月26日各反对派报纸均以“保加利亚的选举受到中伤”和“选举在空前的恐怖和暴力中进行准备”等大字标题刊登了“祖国阵线和反对派”致总理基蒙·格奥尔基耶夫的新的信件，信中指责祖国阵线政府不履行所承担的关于进行自由选举的义务。

反对派在自己的信中断言说，在国内有一批专门组织起来的恐怖主义小组在活动，它们“用棍棒、石块、尖刀、鞋锥和炸弹驱散反对派的集会”和毒打反对派的知名活动家。据说似乎在蓄意不给反对派的支持者发给持有人以投票权的选民证。在某些地区则每人发给两张投票证。据反对派称，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为伪造投票结果作准备。

该信最后说，如果情况不改变的话，反对派将让政府及格奥尔基耶夫本人对此负全部责任。

还有更加重大的责任将让政府和格奥尔基耶夫承担，因为政府准许了不自由的、受到中伤的选举的进行，从而妨碍了保加利亚签署一项体面公正的和约。

昨天各反对党执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因此在索非亚很快就有一

传言，但并未得到证实。很显然，反对派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这一表态事先对选举进行中伤，并为自己可能遭到的失败推卸责任。

据刚刚通过可靠来源获得的其近邻提供的情报，佩特科夫按照美国人出的主意，今天已经指示自己的组织撤出在选举委员会中的观察员，以便以后有可能宣布说选举是不真实的，结果是伪造的——这是一个卑劣的、除了引起鄙视之外不会有任何作用的诡计。

基尔萨诺夫

1946年10月26日于索非亚

№09302

季米特洛夫关于保新政府和议会主席团 组成问题给日丹诺夫的信

(1946年11月5日)

日丹诺夫同志

现在我向您通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保加利亚新政府及大国民议会主席团的组成初步方案。^①

1. 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
2. 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基蒙·格奥尔基耶夫
3. 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气化部长——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共产党人）
4. 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不管部长——奥博夫（农民联盟）
5. 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不管部长——社会民主党人
6. 内务部长——尤戈夫（共产党人）
7. 军事部长——达米扬诺夫少将（共产党人）
8. 财政部长——斯捷凡诺夫教授（共产党人）
9. 教育部长——巴甫洛夫院士（共产党人）
10. 卫生部长——拉乔·安格洛夫博士（共产党人）

^① 1946年11月4日季米特洛夫飞抵莫斯科。第二天，日丹诺夫向他说明了斯大林在保加利亚政府可能的组成人员问题上的观点。按日丹诺夫的话说，斯大林许可与反对派就其在部长会议中的代表事宜进行谈判，但是，做法是迫使反对派中断谈判，并将中断谈判的罪责推在反对派身上。斯大林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最重要的部长席位应该掌握在工人党手中，同时也不应该将其同盟者——农民党以及其他党派抛在一边。显然，季米特洛夫是按照斯大林的旨意拟订这个名单的。

11. 贸易和供应部长——尤尔丹·博日洛夫（共产党人）
12. 重工业部部长——“环节”人民联盟
13. 农业部长——农民联盟
14. 铁道部长——农民联盟
15. 公用事业部长——农民联盟
16. 司法部长——奈切夫（共产党人）
17. 社会政策部长——社会民主党人
18. 新闻部长——卡扎索夫（依照共产党的提名当选为议员的无党派人士）
19. 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捷尔佩舍夫（共产党人）

大国民议会主席团

主席——科拉罗夫

副主席——一位共产党人

——一位农民联盟成员

——一位“环节”人民联盟成员

——一位社会民主党人

在共和国总统选举出来之前由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代行其职权。

如果德鲁日科夫^①同志对这一初步方案有什么意见，请最迟在11月10日之前将这些意见告知我们。^②

紧握您的手！

格·季米特洛夫

1946年11月5日于莫斯科

① 斯大林的化名。

② 从政府组成的实际结果看，季米特洛夫的方案有了一些改动。内阁成员人数增加到20人。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的代表人数从4人增加到5人，个别人选的职业也有变动。

№09305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反对派报刊驳斥 苏联广播给杰卡诺佐夫的电报

(1946年12月28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马立克、罗季奥诺夫和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

杰卡诺佐夫同志：

12月27日，持反对立场的农民联盟成员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在自己的报纸《农业旗帜报》通过一篇社论对莫斯科广播电台12月24日播出的论点进行驳斥。该广播的论点是：“在希特勒统治保加利亚时期，当保加利亚人民的所有进步力量都投入了反对外国征服者的斗争的时候，现在自称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反对派分子们却在为德国的代理人——鲍里斯王朝效力，并帮助他们把保加利亚变成德国的殖民地”（这篇述评于莫斯科时间晚上22点在电台播出，并登载在12月25日的保加利亚报纸《工人事业报》和《祖国阵线报》上）。

为了证明其反君主主义和反希特勒的立场，他引用了在保加利亚尽人皆知的一些事实，即所谓“祖国阵线”反对派的代表们早在1938年就同共产党一起被同时剥夺了议员的资格（佩特科夫在这里指的也包括他自己），他们早在1942年就加入了“祖国阵线”。

在文章最后，佩特科夫写道：苏联的外交代表——现任公使基尔萨诺夫、前任公使拉夫连季耶夫、前任参赞雅科夫列夫和普拉索

洛夫也都能证明这一点。

您认为是否可以把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公使召到苏联外交部，并向他暗示应当让保加利亚报刊注意尊重苏联的外交代表，当问题涉及到对国内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政治立场的评价时不要公开引用他们的话？这一次只是佩特科夫的反对派报纸一家这样干了，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家报纸已经因无端攻击苏联公使而受过一次处分了（请参见我们1946年4月2日的话传电报）。保加利亚政府必须找到在反对派报刊上也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办法。

同时还应当指出，我们广播电台的上述论点的措辞也过于直率，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也缺乏说服力。本来应当指明，在战争期间，其主要领导干部皆为从前知名的亲英、亲法分子的保加利亚反对派分子给德国代理人的帮助究竟是什么。

直到1944年9月9日，他们在游击运动问题的理论上基本是发挥前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的思想（请参见，例如，当今持反对派立场的农民联盟领导人之一吉切夫在1944年同我所做的谈话中在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而实际上他们却通过在法西斯机构中的忠实服务及同德国人的贸易大捞好处，并且为了同日益增加的共产主义危险做斗争而准备干部，甚至还同德国人签订了协议（1943~1944年期间在吉切夫身上发生的事情）。

基尔萨诺夫

1946年12月28日于索非亚

№09308

列维奇金与哈里扎诺夫关于选举 后保社会情绪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18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归档。

秘密

1月18日我应“环节”人民联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哈里扎诺夫的要求接待了他。哈里扎诺夫说，他想向我谈一谈目前最使他焦虑不安的一些问题。这一次他比以前显得更为直言不讳和开诚布公。

哈里扎诺夫说，他弄不明白，在全民公决和大国民议会选举之后保加利亚现在正走向何处。他相当坦率地表示出了自己的担心和忧虑。他说他担心工人党在巩固了自己在大国民议会中，在政府中和在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地位之后，可能会拒绝继续同自己的盟友，其中包括同“环节”人民联盟进行合作而建立一党执政体系。哈里扎诺夫还说出了保加利亚工业和贸易界人士对现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他的想法是：关于没收非法积聚的资本的法案对保加利亚的经济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该法案使工业界人士感到恐慌，并加剧了工业的紊乱。这种情况是在消除国家的经济困难方面的主要障碍之一。哈里扎诺夫认为关于没收非法积聚的资本

的法案反映出在保加利亚建立或者准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倾向。^①

我对哈里扎诺夫说，我没有看出这些倾向，特别是在研究了保加利亚的新宪法草案及政府的宣言之后。

接着哈里扎诺夫提起了皮林马其顿^②问题。他说：尽管某些南斯拉夫报纸（这里指的是南斯拉夫的《政治报》和《战斗报》）正在讨论皮林马其顿问题，但是保加利亚政府却没有表明自己的观点，对此许多保加利亚人感到不满。据哈里扎诺夫说，政府的这种沉默使保加利亚人民非常不安，并使反对派手中增加了一张反对政府的多余的王牌。我问哈里扎诺夫，在他看来怎样做更好些：是对此问题保持沉默呢，还是同南斯拉夫报纸《政治报》和《战斗报》展开争论？对此，哈里扎诺夫多少有些语塞，然后他说，大概保持沉默更好一些，因为同南斯拉夫人就这个问题展开争论会损害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友谊，而这将会被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敌人所利用。

从哈里扎诺夫的谈话中可以感觉到对政府宣言^③持怀疑态度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不安，这些人害怕共产党人在国家的民主改

① 1946年3月8日保加利亚宣布了关于没收通过投机以及其他非法途径所获取的私有财产的法令，在执行这个法令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如在一些地方宣布进行查找可按法律惩罚的人的“竞赛”，并将他们交付法庭。据保加利亚部长会议的一份简报说，这个“竞赛”的热烈程度“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反响”。

② 马其顿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南部，1913年巴尔干战争后分属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三国，分别称瓦尔达尔马其顿、皮林马其顿和爱琴马其顿。在马其顿的领土划分方面，战后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和希腊之间存在一些争议问题。

③ 1946年11月29日保加利亚政府发表宣言，保证严格制度和法纪，强调不支持各种能给诚实的创造性倡议、公民的财产和劳动带来损失的“有害竞争”和横行霸道行为。

革道路上采取进一步的步骤。这种情绪对于绝大多数对共产党人在保加利亚的影响与日俱增感到不安的“环节”人民联盟成员来说恐怕是很典型的。

K. 列维奇金

1947年1月18日于索非亚

№09332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农民联盟状况等问题 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5月20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5月20日我拜会了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同志，并向他通报了保加利亚东正教教会的情况。

我向季米特洛夫同志递交了负责调查地方政权机关侵犯居住在保加利亚的苏联公民权利问题的调查团的备忘录。季米特洛夫同志答应立即按照我们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在随后进行的交谈中共谈了如下一些问题：

1. 关于行将举行的季米特洛夫 - 铁托和季米特洛夫 - 格罗查会晤。

2. 关于奥博夫的农民联盟的状况。季米特洛夫同志通报说，据他所掌握的材料，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农民联盟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有的发言者，其中也包括奥博夫集团的代表们，都强调了保持联盟的统一，对祖国阵线的忠诚以及同工人党的诚心合作和紧密同盟的必要性。尽管在所发表的意见中有这种表面上的一致，但是奥博夫的支持者和特莱科夫 - 唐切夫的支持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次全会上仍然很紧张。德拉格涅夫试图在奥博夫与特莱科夫 - 唐切夫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特别尖锐的斗争现在是在围绕着农民联盟常

务会议组成人员的问题上进行。参与这场斗争的每一个集团都想力争占有优势，哪怕只多拥有一票也好。谁都不同意自己陷入少数派地位。现在这两个集团已决定请季米特洛夫同志作为仲裁者出面，由他来决定在奥博夫的农民联盟中哪个集团应当在联盟常务会议中占有优势，季米特洛夫同志已经同意定于5月21日进行这一仲裁。我问季米特洛夫同志，他是否考虑到了进行这种仲裁对于工人党既有其积极方面也有某些不利方面——反对派及奥博夫集团有可能利用进行仲裁这一事实来指责工人党干涉农民联盟的事务。季米特洛夫同志回答说，他想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事情业已复杂到这种地步，以至不进行这一仲裁农民联盟中互相争斗的两个集团就无法取得协议。

3. 关于反对派。

正如此前曾经报告过的那样，从4月30日起，在保加利亚，反对派的任何一种报纸均已停止出版。《自由人民报》被政府勒令停刊1个月，只有到5月29日才能出刊。《人民农业旗帜报》由于同印刷工人的冲突而于4月30日停刊，同样不能出版，而且佩特科夫也急于去调解同工人的冲突。据季米特洛夫同志称，佩特科夫仍在继续要求保加利亚政府迫使工人印刷他的报纸。保加利亚政府（完全有道理地——基尔萨诺夫注）回答他说，政府不能违背工人意愿强迫他们去做，并建议反对派自己去同工人取得协议。佩特科夫曾试图招雇自己的印刷工人，但没有一个到他那里去。

5月19日佩特科夫集团向大国民议会主席科拉罗夫宣称，鉴于不久将要在大国民议会讨论保加利亚宪法草案，他们目前面临很大困难，因为他们的代表们就宪法问题所做的发言将没有地方刊登。季米特洛夫同志认为，应当把这一声明看做是反对派要退出大国民议会的威胁，关于此事近来在反对派人士中间谈论得很多。但是他不认为反对派能够把这一威胁付诸实施。英、美两国的代表目

前除了口头上说一说查封保加利亚的反对派报纸“将对他们国家的社会舆论产生不良影响”之外，并未就此问题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任何要求。季米特洛夫同志说：“我们将随机应变、巧妙应付，以便不使保加利亚问题被拿到安理会上去讨论。”

附件：递交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备忘录副本。^①

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 C. 基尔萨诺夫

1947年5月20日

^① 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

№09350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 与科斯托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8月11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8月11日我拜会了科斯托夫同志，并遵照您的指示向他通报了保加利亚驻土耳其公使安格洛夫及保加利亚使团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①

科斯托夫表示，所有这一切（即我向他通报的一切）全部都是安格洛夫惯于干的事。他抱怨共产党员外交官们时运不佳，抱怨外交部国内总部机关和派驻国外机构都严重不纯，混杂有不少敌对分子。他说，外交部是一个“藏垢纳污之所”，至今仍未打扫过。

从科斯托夫的谈话以及其所做的观察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我们的朋友们或多或少对混杂在外交部里的敌对分子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有些估计不足，并夸大了一旦过急地提出清除这些“污垢”的问题可能会出现的困难。我对科斯托夫说，让像卡赞吉耶夫（保加利亚驻土耳其使团工作人员）这样同土耳其警方有联系的一些人留在负责密码的机要工作岗位上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话题接着转向国内局势问题。科斯托夫同志告诉我说，反对派

① 这里指的是保加利亚使团工作人员在涉及保土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的代表最近再次向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提出要求恢复谈判。^①已经回答他们说，鉴于反对派方面没有做出任何事情来证明他们决心重新考虑其以前的政策，因此同他们的代表进行任何会晤和对话都是完全空洞无物的。

科斯托夫说，在佩特科夫案件审理终结之后将对反对派采取更为彻底的措施，直至解散各反对党。至少，反对党将被剥夺任何继续合法地进行其以前的颠覆活动的可能性。

在最近，可能还将解决奥博夫的问题。目前在特莱科夫控制之下的农民联盟领导班子坚决地打算把奥博夫清除出该联盟常务领导机构。在将其清除出农民联盟领导班子之后，但要在稍后一些时候，他也将被撤销其政府中的职务。

科斯托夫接着还向我通报说，粮食收购情况大大好于去年。粮食入库的数量比预计的要多得多。目前已入库的谷物已经有12万吨。总共应当收购约30万吨。据科斯托夫同志说，这个数字相当于大约国内粮食需求的一半。其余的30万吨可由今年将获得丰收的玉米来填补。将不得不从国外进口一定数量的谷物，这将或多或少打乱原定的进口计划。

粮食收购工作的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结果，是以同农民关系中一定的紧张状态为代价换取的。科斯托夫说，在今年安排举行任

① 在取消代表不受侵犯的权利并逮捕了农民联盟领导人佩特科夫（1947年6月5日）之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反对派领导人建议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就在祖国阵线范畴内可能采取共同行动的条件开始谈判。在6月期间还举行了一系列会晤。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代表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旨在使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变成“温顺的”反对派，建议清除其领导层内部“祖国阵线和保加利亚工人党的敌人”，建议反对派与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建立接触。保加利亚农民联盟领导人1947年7月18日做出决议，准备与祖国阵线合作，并完全忠实于祖国阵线。然而，1947年8月5日开始的佩特科夫诉讼案，阻止了与反对派继续谈判的可能性。

何选举都将是危险的，因为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保加利亚政府同相当大量的和有影响的农民阶层都在某种程度上闹翻了。

政府打算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缓和同农民关系中的这种紧张局面。其中，最近做出的关于收购玉米和葵花子问题的决定就是出于这一目的。根据这一决定，从农民手中将只征收其玉米收获量的四分之一，收成的其余部分将由他们自己留用。同时为保证需求，农民将有权直接出售他们拥有的多余玉米和葵花子。这些农产品的收购价也已提高。本着这一精神还将出台关于收购菜豆问题的决定，因为菜豆也是国内基本食品之一。

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 基尔萨诺夫

1947年8月11日

№09358

克鲁格洛夫关于帮助保政府组织边防军勤务工作 给斯大林的报告

(1947年10月3日)

绝密

约·维·斯大林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8月22日第2940-956cc号命令(第7点),苏联内务部被责成派出2-3名内务部所属边防军军官前往保加利亚帮助该国政府组织边防军勤务工作。

为执行今年8月22日的这一命令,向保加利亚派出了以科托明少将为首的3名内务部所属边防军军官。

在研究了保加利亚边防军的组织结构和保卫其国家边界特别是南部边界的现有体系之后,派出的军官们发现,直接负责保卫边界的分队(哨卡)实力过弱,每个分队总共只有8到11人。这些人员中一多半用于自我服务和自我防护,而用于保卫边界的兵力则很不充足。哨卡的负责人由军士担任,而军官则主要在上一级分队——地段指挥所,从那里指挥其所属各哨卡的勤务。在保加利亚边防军中用于保卫边界的哨卡共有430个,总人数为3962人。

保加利亚边防军在其勤务活动中遵循的是非常陈旧的边防勤务条令,按照此种条令的要求不能切实可靠地保卫边界。

为了加强保加利亚边界的保卫,研究并提出了如下建议:

1. 取消现有的边防分队——哨卡和地段指挥所,代之以直接

负责保卫边界的分队——哨所。建议总共组建 196 个哨所，总人数为 4717 人。

2. 为了对边界保卫方面的情况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在南部地段边界附近组建后备哨所和机动分队，总人数为 1280 人。

3. 为了加强对部队勤务的领导和改善边界保卫工作的组织，建立 8 个边界区段指挥所以取代现有的 5 个。

4. 为了在军士中培养干部，建立一座学校。

鉴于所建议实施的改组，特别制定了共和国边防军各部队及司令部的员额编制表。

保加利亚边防军总人数为 9302 人，其中包括 322 名非军职官员。

保加利亚原确定 1947 年边防军编制人数为 8615 人。与所确定的人数相比，增加了 687 人，而净增义务兵役人员则为 365 人。

在改组完成之后，保加利亚同诸邻国的国界保卫兵力密度将有如下变化：

在同希腊的边界上，目前的戍边兵力密度为每公里 3.1 人；部队改组之后这一密度将是每公里 4.34 人。

在同土耳其的边界上现有的戍边兵力密度为每公里 2.3 人，部队改组之后将是每公里 5.24 人。

5. 给边防军总部留下了一份备忘录，内中制定有：各级司令部组织和领导边防的职责；哨所所长组织昼夜警卫的程序；哨所军事行动及勤务执行情况登记制度；关于边防军人保卫哨所及某些军事上的重要部位的指示；边防勤务的基本形式及其在边防中的作用；边防军、正规军野战部队分队及民警人员在边防作战行动中需要给予支援时的相互协同动作计划。

6. 鉴于保加利亚边防军人员学习的只是共同性军事课程，制定并向边防军总部推荐了一份向其人员讲授边防业务的专门计划。

7. 制定并向边防军总部推荐了一份边防军各部队及分队之间的联络示意图，并列举了为确保可靠的联络而需要的必要物资和设备。

所有上述建议都向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小范围会议作了报告并得到了赞同，出席该会议的有：科拉罗夫、科斯托夫（部长会议副主席）、达米扬诺夫（军事部长）和尤戈夫（内务部长）。

奉派赴保的军官已返抵莫斯科。

苏联内务部长 谢·克鲁格洛夫

1947年10月3日

No09359

列维奇金关于保社会民主党内部状况 与昌科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10月9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10月9日我前往拜会了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昌科夫，以便向他了解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结果。^①

昌科夫告诉我说，他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总的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事先，在大会召开之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断言说，参加本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将有1000人，来自地方上各社会民主组织的来宾将有9000人。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该领导人曾说，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800人。而实际上，正如在党的中央机构选举中的投票所表明的那样，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总共只有384人。

我问：社会民主党人怎么竟然能够于10月5日在索非亚的广场上召集起一次5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对此昌科夫说，这次群众集会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工人党召集的。在这次代表大会开幕之前几天，格·波波夫（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来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并以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请求工人党帮助他们组织一次群众集会。波波夫为自己的请求提

^① 1947年10月5~7日在索非亚召开了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出的理由是，社会民主党人自己召集不起来规模很大的群众集会。波波夫说，如果这次群众集会失败了，那么首先，在将前来出席代表大会的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代表的心目中，将造成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微不足道的印象。其次，社会舆论可能会想，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群众并不是跟着他们（涅伊科夫、波波夫等等），而是跟着反对派——卢尔切夫走。波波夫说，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给其他国家社会党的代表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在祖国阵线中，从表面上看，社会民主党人只是作为代表激进派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集团，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正如昌科夫所说，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这一请求并让自己的人前往参加以使这次群众集会开得或多或少有些声势。

有相当多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此外，有37名卢尔切夫分子以代表身分参加了代表大会——虽然在形式上是涅伊科夫党的成员。卢尔切夫分子虽然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发言，但是据从国家安全机关得到的情报，在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他们曾秘密前往卢尔切夫的住宅并同他商量过。昌科夫认为，这37名代表是卢尔切夫安插在涅伊科夫的社会民主党队伍中的奸细。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积极地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右翼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在大会上发了言。他们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1)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是强有力的，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它在国家机构中的代表却很少。因此必须尖锐地向共产党人提出这个问题，以使他们在国家机构中为社会民主党人让出更多的位置；2) 只有那时也才谈得上真正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同共产党人的团结和统一，才将会有统一的国际工人运动。由于目前还不存在这种团结和统一，因此社会民主党应当清楚地把自己同共产党人区分开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同他们混杂在一起；3) 工人党一直在阻碍社会民主党在国内的发展，通过自己的行动阻挠在地方上建

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对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进行恐吓等等。因此应当要求共产党人让社会民主党自由地发展和自由地发挥其在群众中的影响；4)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顾及到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不能批评艾德礼和贝文，拉马迪埃^① 和布吕姆^②，舒马赫^③ 和萨拉盖特^④ 的政策和活动，并且不能称这些人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共产党应当理解这一点，并且不要要求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去对这些人进行批评和斗争（招致此类闲话的导火线是波波夫的一次讲话，他本着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10月3日的会议上达成协议的精神发言，批评了西方一些社会党右翼，其中包括艾德礼、贝文、拉马迪埃、布吕姆等人）^⑤；5) 如果事情发展到打起战争，则保加利亚应当考虑到过去的教训，在这场战争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做这样发言的是大会代表尼科洛夫）。发表此类讲话的多半是来自地方（来自外省）的代表，他们做出这样的发言，除了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之外，也是由于他们被所组织的群众集会到会人数之多所陶醉，并因而对自己在国内的力量估计过高。

据昌科夫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言受到了很大一部分与会代表的同情和支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从右翼分子席位上发言的代表中没有任何人对卢尔切夫反对派集团的活动提出批评。

① 保罗·拉马迪埃，法国政治活动家，时任法国内阁总理。

② 列昂·布吕姆，法国社会党领袖和理论家，1947年1月出任政府首脑。

③ 库特·舒马赫，1946年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④ 朱塞佩·萨拉盖特，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1947~1949年出任政府副总理。

⑤ 1947年10月3日，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当前的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任务。共产党人对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如下要求：对准备新战争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思想开始积极的进攻；与作为英、美代理人的各国社会党的右翼分子（舒马赫、贝文、布吕姆等）进行公开的斗争；将右翼分子从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清除，并粉碎以卢尔切夫为首的反对派集团。

格·波波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米托夫斯基（社会政策部长）、布拉塔诺夫（保加利亚驻意大利公使）、П. 博杜罗夫（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И. 博杜罗夫（来自布尔加斯的代表）、伊万·波波夫（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人都根据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在10月3日会议上达成协议的精神，即断定存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势力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力量阵营——发了言，并号召大会站在苏联一方开展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开展同作为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西方各社会党中央右翼的代表的斗争，其中包括开展对贝文、布吕姆、舒马赫等人的批评。他们同时还号召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加强和巩固祖国阵线，加强和巩固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盟，号召社会民主党积极参加政府所实行的一切措施，以及其他等等，从而驳斥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言的那些右翼分子。

昌科夫说，涅伊科夫表面上采取了“不偏不倚”的立场，但涅伊科夫无疑是同情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

代表大会的工作表明，社会民主党内部的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在该党内明显地已形成了两翼：以П. 博杜罗夫、米托夫斯基、布拉塔诺夫、伊万·波波夫等人为首的左翼和以米捷夫、季霍洛夫、赫里斯托夫、措洛夫（皆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为首的右翼，后者的领导人是涅伊科夫。右翼分子虽然也尝试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亮出自己的行动纲领，但是他们终究还是不敢过于积极。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在涅伊科夫的社会民主党内隐藏着大量英、美两国的代理人，他们在等待较为有利的时机，以便同工人党进行公开的斗争。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27人组成的新的党中央委员会。据昌科夫认为，其中有12人是祖国阵线拥护者，即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П. 博杜罗夫、米托夫斯基、布拉塔诺夫、伊万·波波夫、马

涅夫、布洛哈姆、A. 德拉戈涅夫、克列斯塔诺娃、И. 博杜罗夫、托什科夫——青年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基列夫、阿拉杰莫夫), 10 人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 (涅伊科夫、赫里斯托夫、措洛夫、米捷夫、季霍洛夫、乔巴诺夫、边切夫、格涅夫、塔谢夫、康斯坦丁诺夫), 5 人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动摇分子 (格·波波夫、阿塔纳索夫、因捷夫、巴尔加列诺夫、P. 格涅夫)。

昌科夫说, 鉴于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这些结果, 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准备采取如下对策: 1) 近日内在《工人事业报》上刊载一系列文章批评涅伊科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及右翼分子的发言; 2) 开始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中动摇不定成员的工作, 以便把他们拉到左翼方面来, 并确保左翼在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 3) 认真地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谈一谈将作为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右翼分子清洗出党的必要性问题以及其他等等。左翼集团对涅伊科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也感到不满意。据昌科夫说, 10 月 8 日米托夫斯基来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在同他 (昌科夫) 所做的交谈中曾提出了把涅伊科夫清除出社会民主党领导班子的必要性问题。

我问昌科夫, 是否举行了拟议中的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与前来出席本次代表大会的其他国家社会党代表之间的会晤。昌科夫回答说, 这次会晤是在 10 月 8 日的午餐会上进行的。科拉罗夫根据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决议的精神发表了祝酒词。克劳福德 (英国) 在祝酒词中说, 在英国当时想要进犯苏联的时候, 英国的工党党员建立了一系列为进行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争的委员会。如果英国现在试图同苏联作战, 工党党员同样还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并将为阻止英国同苏联的战争而竭尽全力。什瓦尔贝 (波兰) 在祝酒时讲得很好。他说, 没有苏联就没有民主这个概念, 社会党人应当在争取和平、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中站到苏联一边, 苏联是发展和保卫新的民主制度的主要

基地，社会党人对待民主制度的态度应当由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来决定。一切新的民主制度都应当以苏联为基地。

我问昌科夫，在波兰举行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宣言对保加利亚产生了什么影响。昌科夫说，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为这个宣言而非常高兴。最近该党常务委员会就这一宣言的实质问题交换了意见，并指示帕乌尔吉耶夫（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旗帜报》编辑）在《农业旗帜报》上撰写社论，在该社论中要表示农民联盟完全同意上述宣言（这篇社论已于10月7日发表）。特莱科夫说，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使农民联盟的成员完全明确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其右翼分子则把这个宣言看成是共产党向反动势力发起进攻的开始，这一进攻可能会把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并将败坏各社会党的威信。

“环节”人民联盟成员对这个宣言极为不满。他们认为该宣言提高了各共产党，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工人党的积极性，从而将使“环节”人民联盟本来就已经多得不能再多的麻烦事进一步增多。

宣言给反动势力的队伍带来了惊慌和不安。据昌科夫说，他掌握的情报称：穆沙诺夫的民主党领导人在宣言公布之后已经指示该党的积极成员离开索非亚迁往乡村居住，以躲避共产党人的打击。

K. 列维奇金

1947年10月9日

No 09362

列维奇金与特莱科夫关于保农民 阵线政治状况的谈话纪要

(1947年10月23日)

抄送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归档。

秘密

今年10月23日我前往拜会了农业部长、农民联盟书记特莱科夫，目的是具体地向他了解他打算派哪些农学家到苏联的高等农业院校深造，以及他们需要在哪些农业的专门领域进行学习。特莱科夫答应在近日内提供将前往学习的农学家名单及其拟学专业和简历。特莱科夫补充说，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可靠的。

在交谈过程中我询问，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10月22日会议进行得如何。在这次会议上计划要讨论共产党代表波兰会议宣言中确定的各项任务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尔文科夫10月15日所做的关于国际形势及保加利亚人民的任务的报告。特莱科夫告诉我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契尔文科夫报告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受到了参加全国委员会会议的祖国阵线所有政党代表的一致赞同。关于在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大家谈到的在保加利亚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环节”人民联盟成员原则上没有表示异议，但是他们认为，关于在保加利亚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只应当在实践中去实现，而不要将此事广泛告知人民群众，因为他们对在保加利亚实现这一想法没有充分准备，因而可能会被吓坏。通过交换意见，在最后的结论中，

“环节”人民联盟成员也同意了这样的观点，即人民应当知道他们在走向何处，因此人民的领导者在这方面的意图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共知。社会民主党人和激进党人都完全支持工人党在契尔文科夫讲话中提出来的各项建议。全国委员会指定成立了一个负责起草全国委员会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声明文本（该声明应于本周末公布）和一个负责起草祖国阵线关于民主保加利亚面临的新任务的纲领。

我问特莱科夫，农民联盟各地方党组织对他10月19日发表的关于保加利亚农民联盟坚决支持共产党代表波兰会议宣言，将同工人党一起竭尽全力清除自己队伍中的两面派分子，消灭保加利亚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及在保加利亚实现社会主义的讲话反应如何。特莱科夫说，这个讲话受到了各地的农民联盟成员非常热烈的欢迎。特莱科夫说，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当农民联盟的成员在乡村里挨家挨户分发登载有这篇讲话的那期报纸的时候，人们都感叹地说：“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才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等等。特莱科夫说，在任何情况下，关于保加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将在农民联盟的绝大多数成员中得到积极的反响，当然，那些反动分子、看风使舵者和其他在联盟中的投机分子们最后将被吓得离开联盟。

据特莱科夫告诉我说，在他的讲话之后，关于保加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已是农民联盟成员中的主要话题。鉴于这种情况，最近联盟常务委员会已经开会决定，设立一个由颇具理论素养的人士——帕乌尔吉耶夫（常务委员会成员）、科茹哈罗夫和唐·季米特洛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据特莱科夫称，这个委员会应当准备出一份专门的文件，其中需要指明，保加利亚在祖国阵线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任务与农民联盟奠基人和思想家亚·斯坦博利斯基、莱科·达斯卡洛夫等人的学说的基本原则并不矛盾，

并且这一思想完全符合保加利亚农民，从而也符合农民联盟的利益。特莱科夫说，对于我们领导人来说，这个问题是完全清楚的。现在联盟的领导人应当使基层的党组织对这个问题思想上有所准备。特莱科夫在这方面的计划包括如下内容：1) 准备一份论据充分的，能够证明保加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同农民联盟奠基人和思想家，特别是被农民联盟成员视为自己的思想家的亚·斯坦博利斯基的学说的基本原则完全并行不悖的文件；2) 在委员会准备好这一文件之后，特莱科夫打算在农民联盟某个地方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全面论述关于保加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并论证这一思想与斯坦博利斯基学说基本原则的一致性；3) 在特莱科夫讲话之后，预定在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系统出版和大量发行专题小册子，并由各级党组织以党内教育的形式组织学习。特莱科夫计划以此来使整个农民联盟接受保加利亚将在祖国阵线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预祝特莱科夫在实现他的计划方面取得成功。

在谈话过程中，特莱科夫曾反复地以极大的热情阐述自己的计划。他曾数次重申，他一定能成功地说服农民联盟中的所有忠诚分子相信这一点，保加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工人党和农民联盟所感兴趣的事情。

同时，特莱科夫在交谈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这样一种情况洋洋自得的情绪，即恰恰是他这位农民联盟的领导人，而不是社会民主党，更不是“环节”人民联盟的领导人，在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

记契尔文科夫讲话之后提出了这一问题。^①

另一次谈话没有什么重要性。

列维奇金

1947年10月23日

① 契尔文科夫1947年10月16日在索非亚人民文化局一次文艺晚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强调说必须对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攻击，必须改组国家机关和祖国阵线。他宣称，今后仍然存在的各政治党派在自己的政策和组织工作中，应该更紧密地按照祖国阵线的纲领和章程行动。讲话还专门提到了在保加利亚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景。

No09363

基尔萨诺夫关于保祖国阵线发展前景与 科拉罗夫和科斯托夫的谈话纪要

(1947年10月23~24日)

抄送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归档。

绝密

摘自基尔萨诺夫的日记

10月23日我前往拜会了科拉罗夫，并将斯大林同志与英国工党小组的谈话纪要文本转交给他。

在随后进行的交谈中，科拉罗夫向我通报了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昨天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契尔文科夫关于国际形势和祖国阵线的任务的报告。科拉罗夫首先表示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感到完全满意，同时也指出，在工人党政治局里关于今后的行动纲领问题的争论比在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要多得多，在这次会议上所有政党都对工人党提出的建议表示了赞同。^①

他解释说，我们的某些年轻共产党人曾经建议公开地谈论社会主义，并坚持主张把关于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明确说法写入祖国阵线的纲领性文件。

^① 契尔文科夫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提出的建议，规定在建立祖国阵线委员会时取消人数均等的原则，并进行委员会的选举。各政党应该在祖国阵线纲领的范畴内并以祖国阵线的名义开展自己的工作。建议在祖国阵线内实行单独的会员资格，如果被开除出祖国阵线就是自动被开除了其所在的党。

科拉罗夫在同我的谈话中坚决地批评了这种立场。他指出，这种讲话根本无助于加速保加利亚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而只能使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复杂化，因为在农民当中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对社会主义的偏见。科拉罗夫说，可以在不大张旗鼓喧嚣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

科拉罗夫接着说，在由工人党提出并已经被专门委员会在昨天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声明草案中，“社会主义”一词被略去，代之以“国家今后的社会民主的发展”。

声明中谈到了坚决地加快国民经济中国有和合作经济成分发展速度的必要性。声明同时还规定要同帝国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代理人进行斗争，直至没收其财产。科拉罗夫强调说，这些措施可以确保保加利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如果把科拉罗夫的这番谈话同已经公布的契尔文科夫同志的报告中有关这个问题谈到的内容作一比较的话，则不难看出，在工人党政治局内部对此问题意见并不一致，尤其糟糕的是在行动上缺乏足够的统一。

看来，契尔文科夫在其10月15日的报告^①中当众提出的关于必须把有关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明确说法写入祖国阵线新起草的纲领之中的意见，显然并不反映政治局所有委员的想法。

10月24日我与科斯托夫交谈时，他没有提到政治局内部的争论，他告诉我说，在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开会前夕，朋友们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决定暂时略去“社会主义”一词，但是很可能在预定于今年年底举行的祖国阵线代表大会上，朋友们又将重新回到这一个问题上来，并把关于保加利亚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过渡的明确

^① 原文如此，应指契尔文科夫在10月16日发表的讲话，参见本卷No09362文件脚注。

说法写入祖国阵线的纲领。^① 同时他还说，在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农民联盟成员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对工人党的建议表示支持方面远比这些建议本身走得更远，他们都以坚定的态度谈及社会主义。

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 基尔萨诺夫

① 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48年2月2~3日召开的。在会上通过的章程和纲领，保障了祖国阵线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基础上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组织。会议确定了该组织的重要任务：用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对保加利亚人民进行教育和再教育。

№07478

列维奇金和昌科夫关于保社会舆论 对祖国阵线宣言反映的谈话纪要

(1947年11月21日)

抄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归档。

机密

应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昌科夫邀请，我于11月21日拜访了他。

昌科夫说，他想与我商量并最后确定保苏社会联盟代表团成员的组成问题，代表团将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赴苏。代表团全体成员的最初名单要由我们单独提出。

谈话中，昌科夫告诉我，今天，11月21日，工人党中央领导人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涅伊科夫将举行会晤，商议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应邀赴即将在比利时召开的社会党人的代表大会问题。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希望预先与工人党中央领导人协商好自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所持的实质性立场。按昌科夫所述，这个问题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在11月20日已事先讨论过。工人党中央领导人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表明了下述立场：第一，社会民主党首先要正确了解保加利亚的内部政治形势和国际上的地位；第二，他们应知道保加利亚现在和将来都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一方，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应以这个标准来确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

党在这次比利时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立场。^①

我询问昌科夫在地方上进行《祖国阵线民族委员会宣言》^② 宣传解释工作的结果。

昌科夫说，绝大多数保加利亚人民赞成宣言和宣言中拟定的国内改革措施。地方群众多次提出加快工业国有化和在国内成立统一的政党的建议，提出在宣言中必须明确保加利亚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有很多时候，劳动群众在会议上责备保加利亚的国家民主化速度落后，应在两年或两年半前就提出宣言中的措施，政府和祖国阵线民族委员会必须采取加快国家民主化速度的必要措施等等。昌科夫说，他刚刚收到解释宣言时群众情绪的简报，答应过几天给我看简报。

此外，没有其他重要的谈话。

克·列维奇金

1947年11月21日于索非亚

① 1947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安特卫普召开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否定了邀请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参加本次会议的决定，理由是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赞同共产党情报局的文件并参加了对“西方右派社会党人”的攻击，已成为共产主义的仆从而丧失了组织上的独立性。

② 1947年10月26日发表的《祖国阵线民族委员会宣言》分析了保加利亚的国内外地位，并表示赞同战后世界已分裂成“两个阵营”的观点。

№07480

基尔萨诺夫与季米特洛夫关于 保新宪法草案的谈话纪要

(1947年12月7日)

抄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 机密

摘自 C. II. 基尔萨诺夫的日记

12月7日在季米特洛夫同志家吃晚饭，除我和妻子外，只有契尔文科夫和夫人——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姐姐在场。

晚饭前后的谈话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季米特洛夫和契尔文科夫同志认为，在12月4日最后通过工人党制定的宪法草案^①时，卢尔切夫一伙投否决票的事，表现出他们的恐惧和怯懦。一直到现在，卢尔切夫一伙在进行反对“共产党”宪法草案的残酷斗争结束后，甚至不敢为了多得选票而按自己的观点发表宣言。

季米特洛夫同志通知我，工人党将推现任教育部长涅伊科夫（共产党员）出任大国民议会主席团的主席。

鉴于12月14日恩维尔·霍查将来索非亚访问，季米特洛夫同志又一次提醒我，保加利亚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就保加利亚和阿尔巴

^① 保加利亚新宪法草案是在共产党情报局华沙会议后制定的，并且有一批苏联的法律专家和社会学家予以协助。宪法草案按照苏联模式，加强了在国家组织中的社会主义原则。

尼亚相互关系的协议草案提出意见，协议要在恩维尔·霍查到索非亚来访期间签订。我答应他完成此事。

季米特洛夫同志告诉我，美国公使希德在12月1日交给克·格奥尔基耶夫一份私人照会（照会文本邮递），照会内容是根据“和平条约”要求美国公使和他的代表能自由进入保加利亚政府不久前划定的边界区，检查保加利亚政府完成“和平条约”的情况。

季米特洛夫同志声明，保加利亚政府没有同意照会的内容。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就餐时，一直请求向保加利亚派艺术剧院的巡回演出团，并说保加利亚政府可以负担巡回演出50%的费用。

晚饭后，向季米特洛夫同志通报了由我转交给斯捷凡诺夫的、我们对银行国有化法律草案的修改意见，我请季米特洛夫保证一定把修改意见包括到工业国有化法律草案中，季米特洛夫同志同意照办。此时他谈了在保加利亚国家垄断银行的条件下，我们“贷款银行”的继续存在是否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的问题。按照他的意见，如果苏联同意其取消这个机构更好。但他承认，这个问题对保加利亚来说不能操之过急，不过他让我相信，关于由我们担保的“贷款银行”继续存在的修订意见，将写进银行国有化法律中。

苏联驻保加利亚公使 基尔萨诺夫

1947年12月7日于索非亚

№094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批准国家安全部
接受保工作人员来学习的决定**

（1948年4月5日）

机密

批准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在国家安全部高等学校接受20名保加利亚国家安全管理委员会的业务工作人员进行为期6个月的学习，经费由保加利亚政府负担。

№09501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保共 从南共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调查报告

（不晚于1948年6月3日）

绝密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完全接受了联共（布）中央的建议，同意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状况问题。^①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评价。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从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批评中首先要接受的教训是——要全力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要提高党内思想工作水平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在强调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犯了一些理论上的错误，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某些重要问题上的基本原理：如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农联盟问题、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等。

现举例如下：

① 1948年5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给情报局各成员国共产党领导人致信，建议开会讨论“苏南分歧”的问题。会议计划在1948年6月3~5日召开。5月18日苏斯洛夫致信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确认情报局提议在1948年6月8~10日开会，主要的问题是“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状况问题”。格·季米特洛夫在信中批示表示：“同意。任命科斯托夫和契尔文科夫为代表”。

季米特洛夫同志 1946 年 2 月 26 日在索非亚州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谈到在保加利亚的条件下，有可能不用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错误地、简单解释了苏联的工人阶级专政。

他说：“由于存在着苏联那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许多国家在战后完成了历史性的民主改革，所以当这些国家面临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这个问题已不再是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反对国内其余的社会生产阶层的问题，相反，是工人阶级与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先进和进步的各阶层人民合作的问题。”

从他的讲话中得出的结论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反对落后的生产者，也就是国内劳动的社会各阶层，尽管很清楚，工人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联盟的特殊形式，是用于反对剥削阶级而不是劳动者的。

不考虑列宁、斯大林对工人阶级专政的这个定义，季米特洛夫同志接着表示，“当我们保加利亚也面临着我们的人民要从现在的社会制度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时，共产党员们将依靠人民群众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斗争不是反对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而是与他们一道，这是全体人民的历史性事业”。这条社会发展的道路“看起来比‘拿着武器去战斗，建立自己的专政’更漫长……”等等。

这样简单地解释工人阶级专政，很难正确地理解其本质。

这个讲话曾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上全文刊登，只是在打印他的讲话和文章汇编时，这些地方才得到纠正。

由于把工人阶级专政仅仅理解为是依靠武力的政权，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保加利亚环境下竭力回避提工人阶级专政。季米特洛夫同志 1947 年 7 月 26 日在与美国杂志《星期六晚

邮报》记者谈话时声称，保加利亚可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季米特洛夫同志此时也没有强调，如果这是可能的话，则一定要有最先进和最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领导。

1948年3月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第二次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已经比较确定地讲到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久前这个讲话编在《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人民民主制度》的单独小册子里出版。

从上述材料看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对纠正过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工人阶级领导作用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已走出了第一步，但还应该系统地、持久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这个重要原则。

在保加利亚，直接和公开地讲到保加利亚人民是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和祖国阵线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些季米特洛夫同志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讲话中声明，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章程中，在今年2月通过的祖国阵线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正式文件及出版物中也都写明了这一点。

谈到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最近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仍不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避免地要加强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因此，过去对来自阶级敌人方面的危险性估计不足，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书记契尔文科夫同志的言论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他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1947年1月第1期的《论保加利亚的社会发展问题》一文中写到：

“实践证明了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预见的、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另一种特殊道路的现实可能性——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是在人民政权下经过所有生产阶层，其中包括资产阶级中真正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逐步地发展和扩大民主、公有经

济的形式来实现。我们生活的必然进步不是与主要的、不可抗拒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相对抗，而是在我们的条件下通过没有较大阵痛的合作来实现这种趋势。这才是问题所在。”

接着契尔文科夫同志声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充满了社会主义内容的民主形式，所以，我国人民以没有较大阵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适宜的和可行的。目前有可能把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为所有社会生产阶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真正进步和民主人士的共同事业，或着，按季米特洛夫同志的说法，作为全民的历史性事业。”

接着，契尔文科夫同志说，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与20世纪初保加利亚改良主义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也不同于第二国际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但就上述情况的本质而言，契尔文科夫同志离机会主义地提出这些重要问题相距并不遥远。

契尔文科夫同志上述的论点直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则和保加利亚的真正现实相矛盾。事实说明，随着祖国阵线政府的每一项新措施，阶级斗争在保加利亚不断地加剧，而且每一天都在走向尖锐化。

在实现工业国有化后，一些企业产量下降，出现了亏损。企业主在国有化前不久故意提高工人工资，迫使人民政权面对现实情况不得不降低工人的工资，从而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敌对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数量有所增加。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完成了两年计划，比如，3月份建筑行业的计划只完成了20%。

近来保加利亚小股匪帮活动更加猖狂。正在对227个国事犯进行侦查，3月份在地方上有16股匪帮活动。今年2月在戈尔诺-朱玛区，匪帮杀害了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区委书记。反动的

宗教集团正在加剧活动，他们号召居民参加“基督兄弟会”，这些组织成了形式上的宗教中心和内容上反政府的宣传中心。妇女和青年都被拉进了这个活动，并组成了自己的反动宣传的骨干力量。莫斯科东正教圣大牧首公署在宗教报刊中加强了怀有敌意的、由西方策划的宣传。

在公开斗争中被击败了的反动派改变了自己斗争的方式，但并没有放下武器。反动派加紧了秘密的活动。

所有这些事实，同其他大量的事实一样，说明了在保加利亚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警惕，警惕，再警惕，而不是用走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与资产阶级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来哄骗党和人民。

至今被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所鼓吹的思想理论和观点，仍起着削弱警惕性，麻痹群众的作用，而没有动员群众投入战胜阶级敌人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领导人明显地过高估计了保加利亚发展民主事业中的成绩，仓促地评价国内阶级的变动。今年3月份季米特洛夫在工会会议上正确地谈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时说：“人民民主制……只能使工人阶级享有领导作用，没有其他的可能”。季米特洛夫说，“工人阶级不再是过去理解的那种受资本主义制度剥削和压迫的无产阶级。我们的工人阶级已经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本的生产资料已经转交到他们手中，转交到人民手中，转交到我们的人民国家手中”。

其他重要的改变，季米特洛夫说，是通过土地改革的方法组织农业的合作农场和国营农场，以及把重要的农业生产工具转交到国家手中的类似方法，“实现消灭带有寄生性质的大型农业所有制，最终用这种方法阻止产生类似的剥削农业生产者劳动的寄生经济”。

从这里明显可以得出结论，他过高地评价了所取得的成绩。诚然，在保加利亚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保加利亚全部实现了大型、中型及相当部分的小型工业的国有化，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南多勃鲁热土地最大占有量为30公顷和保加利亚其他地方占有土地为20公顷的农业劳动合作社得到了重大发展（已有600多个农业劳动合作社和30个农业拖拉机站）。但是说已经完全“阻止了产生剥削农业劳动者的寄生经济”还为时过早。在保加利亚还存在着代表富农阶级的富农经济。在农业集体经济的基础上暂时还无法完全消灭富农阶级，不能讲杜绝了剥削经济的产生。

列宁不止一次讲过资本主义的势力存在于小生产中，因为它“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列宁教导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列宁全集》第25卷第189页）

在工业、流通领域和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和小商品经济，是人民民主制度的主要薄弱环节和今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主要困难。而且这是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最大的隐患之一。

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小册子中针对我国的情况讲，小资本主义经济和小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他说：“或者是我们使它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如果我们把穷人组织起来，即将大多数市民和半无产者团结在有觉悟的无产阶

级先锋队周围，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或者是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必然地推翻我们工人阶级的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们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也只能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反复这样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2册第639页）。

这正是保加利亚现在存在的问题。

这样看来，保加利亚共产党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错误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必须加强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

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错误得出的第二个教训是应在加强理论工作的同时，巩固党的组织建设。

在保加利亚党的组织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党的工作削弱的一个原因是：所有在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都把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混淆起来。现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没有一个成员和候选人员是完全只做党的工作的，他们都有政府部门的职务，主要精力都放在政府工作中。这种状况如不得到纠正，必然会导致党内工作的削弱，给党的战斗力带来消极的影响。

依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错误的批评，保加利亚共产党应当重新研究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活动，对自己的缺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将有助于今后党的工作的提高和增强国家的民主化发展。

№09528

科诺瓦洛夫与沙班斯基关于保加利亚向 苏联专家提供经济情报的谈话纪要

(1948年12月13日)

抄送佐林、基谢廖夫，归档。

秘密

1948年12月13日经大使批准，应保加利亚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沙班斯基的请求，我拜会了他。

沙班斯基与我会晤时宣布，他接到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的指示，今后将向我们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处提供我们感兴趣的所有材料和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情报。与此同时，沙班斯基强调指出，他们国家颁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法并不意味着对苏联驻保加利亚的官方代表保守所有机密，否则他们自己也感到难堪。他接着补充说，苏联驻保加利亚的代表应当了解保加利亚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以便正确地将这一切向苏联政府汇报，并希望得到它的帮助。^①

^① 1948年10月保加利亚议会通过了国家保密法。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特·科斯托夫以此为依据，向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发表指示，整顿向苏联驻保加利亚代表发送经济情报的程序，并规定应集中寄送。科斯托夫的这一立场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强烈反应。1948年12月6日，当季米特洛夫、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等人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指责科斯托夫搞阴谋，企图背叛苏联。斯大林特别强硬地指出，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就是从向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封锁经济情报开始的。为了对斯大林的指责做出反应，

随后沙班斯基把一份保加利亚 1949~1953 年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其说明交给了我。据沙班斯基说，计划已经经过保加利亚工人党（共）政治局和保加利亚部长会议批准，并以这种形式提交保加利亚工人党（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

我感谢沙班斯基，并接受了他提供的五年计划的材料。我答应读过之后再退还他。

最后沙班斯基说，今后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不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国家计委的工作人员索要材料。对沙班斯基这一建议我回答说，今后如有必要索取任何材料，我们在征得我们大使同意之后只向国家计委领导人提出要求。

Φ. 科诺瓦洛夫^①

1948 年 12 月 13 日于索非亚

（接第 144 页注释^①） 保加利亚领导人于 1948 年 12 月 9 日通过了关于特·科斯托夫严重的、粗暴的政治错误的决议：“企图将用于与资本主义国家谍报机构作斗争的保守国家机密法用于苏联。”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政治局以这一决议为基础，取消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不向苏联专家提供关于保加利亚与其他国家贸易价格和交易的情报这一“有害的、不体面的”做法。有关机构指示，立即向苏联代表提供他们所感兴趣的所有资料。

^① 科诺瓦洛夫，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馆二等秘书。

【专题说明】

苏联与战后阿尔巴尼亚

(1946年4月至1948年12月)

本专题的16件档案文献，涉及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8年底欧洲冷战格局形成时期，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政策，以及苏阿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阿尔巴尼亚1912年独立，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战前已在意大利的控制之下，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1941年底，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了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战争期间，阿共领导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1944年10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由霍查领导和各党派联合建立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改名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到1946年1月，阿尔巴尼亚宣布成为人民共和国，选举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新政府，霍查出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和人民保卫部长。尽管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只有区区20000多人，但在1946~1948年这短短的三年中，党内却充满了激烈和残酷的斗争。而这些党内斗争，实质上反映的是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和南斯拉夫相互之间以及苏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战后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只有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主要起作用的人物是恩维尔·霍查、科奇·佐泽和纳科·斯皮鲁。内务部长佐泽与贝尔格莱德通好，经济部长斯皮鲁倾向莫斯科，霍查作为党的总

书记和政府总理则摇摆于两者之间。在战时和战后初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得到了南共的积极支持和帮助，斯大林也默许铁托对阿共的控制。不过，在阿南亲密无间的关系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不仅表现为双方在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州的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分歧，也反映在阿南经济合作的问题上。1947年11月，斯皮鲁因抵制南斯拉夫的强权政治而遭到党内以佐泽为首的亲南派的批判。此时苏南关系尚好，莫斯科对斯皮鲁的哭诉和告状未予理睬，霍查也完全倒向佐泽一边，致使斯皮鲁走投无路，自杀身亡。但几个月后，苏南关系破裂，霍查立即掉转枪口，开始在党内肃清亲南派。从1948年6月以后，阿共积极参与了共产党情报局对铁托的围剿和攻击，并在11月党的代表大会组织了对佐泽的批判，甚至采取了“野蛮”、“粗暴”的刑事手段。同时，为了讨好莫斯科而为斯皮鲁恢复了名誉。此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苏联在东欧各党内部发动的大清洗行列。

当然，目前所收集到的有关战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远不是完全的，例如，本专题中就缺少1947年7月16日斯大林与霍查的会谈记录这样十分重要的文件。这无疑会对全面了解这段历史留下遗憾。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
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张廷文、
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方琼)

№09267

莫洛托夫与塔什科关于阿尔巴尼亚

政治形势的谈话纪要

(1946年4月20日)

抄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日丹诺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丘瓦欣（地拉那），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塔什科^①向莫洛托夫提交了国书并且说，他很高兴成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派驻苏联的第一个代表。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的事情如何。

塔什科说，经济方面的事情进行得很好，国民经济正在振兴，开展了“五一”节劳动竞赛，开始铺设管道和其他设施。人民以高涨热情参加政府的经济活动。塔什科提到了苏联和南斯拉夫提供粮食帮助阿尔巴尼亚的事实，并且说，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阿尔巴尼亚目前有商品，现在如果商人不纳税或私藏商品国家就没收他们的商品。现在除了私营商店以外还有国营商店。

塔什科说，从外交政策的观点看，事情比较复杂。希腊在英国

^① K. 塔什科，阿尔巴尼亚驻苏联公使。

的影响下继续在边境挑衅。英国人企图把阿尔巴尼亚同其他民主国家孤立起来。塔什科指出，英国人对奥特朗托海峡，包括对发罗拉港和萨赞岛^①感兴趣。英国人指责阿尔巴尼亚人不向英国人提供在阿尔巴尼亚国内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实际上英国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一个政治组织，它有自己的匪帮，现在已被阿尔巴尼亚粉碎。这些匪帮的成员已被逮捕，并准备送交法庭，以便查清他们同英国军事代表团的联系，这个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已经离开阿尔巴尼亚。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同英国和美国有外交关系吗？

塔什科说，同英国有外交关系，但是英国人不想向阿尔巴尼亚派出自己的外交代表。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但是美国人在阿尔巴尼亚有自己的政治观察员。塔什科说，美国不给阿尔巴尼亚提供向美国派遣领事代表的可能，但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在美国生活。

莫洛托夫问，美国有阿尔巴尼亚的实际上的代表吗？

塔什科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并且说，美国不允许阿尔巴尼亚人有那样的代表。

塔什科说，阿尔巴尼亚只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有外交代表，但同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有外交关系。而目前正在同罗马尼亚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政府打算向法国派遣自己的代表吗？

塔什科说，政府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尽管法国已经任命了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怎么样。

塔什科说，关系很好，是兄弟式的关系。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的国内政治形势怎么样。

^① 原文如此，疑为萨扎尼岛。

塔什科说：政府受到居民的支持，尽管阿尔巴尼亚人在政治方面比较弱。塔什科指出，阿尔巴尼亚南部居民更有觉悟，因为那里早就开始为阿尔巴尼亚的解放而斗争。阿尔巴尼亚北部居民觉悟低一点，尽管那里百分之百的人投票拥护现政府。

莫洛托夫问，索古^①在国内有影响吗。

塔什科回答说，索古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尽管在反动分子阶层中有人支持他。索古利用英国人的支持去联合国内的反动势力。塔什科说，尽管如此，政府的政治地位很稳固，只是需要加强对居民进行政治教育。

塔什科说，政府得到了取得了真正自由的妇女和看到自己现在已经有前途的青年的支持。

塔什科说，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爱和尊敬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阿尔巴尼亚人把斯大林看成自己的父亲，无限真诚地爱戴他。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宗教。

塔什科说，65%的居民是穆斯林教徒，10%的居民是天主教徒，25%东正教徒。对政府最有敌对情绪的是天主教徒。

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语最接近哪一种语言。

塔什科说，苏联学者马拉认为，阿尔巴尼亚语属于高加索语系，比较接近格鲁吉亚语。一些德国学者认为它与巴斯克语相近。

在谈话结束时，塔什科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接见自己，以便向他递交国书。

谈话持续了15分钟。

记录 阿法纳西耶夫

1946年4月20日15时于莫斯科

^① A. 索古，1922~1939年阿尔巴尼亚的政府首脑和国王。

No 09270

曼奇哈关于阿尔巴尼亚之行的报告（摘录）

（1946年5月14日）

该书面报告寄给了苏斯洛夫、潘友新、巴拉诺夫、波诺马廖夫。^①

秘密

在阿尔巴尼亚逗留了19天，并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一些委员进行了一系列交谈之后，我又仓促地分析了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得到的材料，认为有必要简要报告如下：

国内政治形势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现状

阿尔巴尼亚从占领者手下解放以后的17个月以来，在国家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举行了全国性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了新的人民议会（会议）；通过了新宪法；阿尔巴尼亚宣布它为人民民主共和国；通过了一系列加强新人民权力机构、恢复国民经济和同法西斯反动势力残余作斗争的法律和政府命令。

^① 文件上有批示：“致巴拉诺夫同志。请就第10~11页（即报告中《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要求》一节）进行谈判。苏斯洛夫。6月13日”。还有标注：“该报告的三份（复印件），即潘友新、波诺马廖夫和曼奇哈的文件，已被销毁。曼奇哈。1947年2月22日”。

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所有部门的领导力量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这个国家还没有其他政党的情况下，共产党是执政党。党中央委员会由13人组成，是党的核心。中央政治局由6人组成，他们是：

1. 恩维尔·霍查——中央总书记，总理，外交部长，民主阵线总委员会主席和阿尔巴尼亚军队总司令。

2. 科奇·佐泽——中央书记，副总理，民主阵线总委员会副主席，内务部部长。

3. 纳科·斯皮鲁——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经济部部长，反法西斯青年联盟总书记。

4. 潘迪·克里斯托——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

5. 贝德勒·斯巴秀——经济恢复部部长。

6. 图克·雅科瓦——阿尔巴尼亚工会领导人。

目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有党员约12000名，州党组织10个，地区党组织53个。基层党组织按照地区生产部门的原则建立。目前正在制定党章。党员的社会成分如下：贫农占26%，中农23.7%，工人16.3%，学生9.8%，手工业者8.7%，知识分子7.2%，富裕农民2.5%，其他6%。地区党组织书记以上的党的领导干部的社会成分：学生24.2%，工人15.7%，贫农13.7%，知识分子13%，中农12.1%，手工业者9.9%，富裕农民2.1%，其他9.1%。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政治文化程度更低。将近78%的党员只有最低的文化程度，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人数很少。共产党在人民议会、政府、民主阵线、工会（共计27336人）、反法西斯青年联盟（将近7万人）中起到领导和教育作用。人民议会的81名议员中48名是共产党员，13名政府部长中11名是共产党员。在民主阵线总委员会内，共产党员占60%，民主阵线书记的9名成员中有5名是共产党员，民主阵线执行委员会的18名委员中有13

名是共产党员，党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享有巨大威信和受到信赖。但是，共产党员们不想向英国人和美国人炫耀共产党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无论什么地方都不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讲话。但是，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们说，现在不仅阿尔巴尼亚人民，而且国外有关人士都知道共产党的作用和活动。所以，共产党活动的全部合法化在引起注意的同时，大大增强了它在人民中间的影响并加强了它在国家中的作用。今年3月召开的共产党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讨论今年5月25日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缺乏有经验的、训练有素的干部仍然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往的宗派活动、小集团和派别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消除，但是在党的领导层中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团结。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教授由于追求名利、搞分裂、不执行党的决议、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妄加评论和机会主义倾向，根据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決定，已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在讨论马列绍瓦问题时，支持他的潘迪·克里斯托和图克·雅科瓦尽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意志薄弱，借口没有能力胜任工作，宣布退出政治局。克里斯托和雅科瓦的行为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谴责。

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揭露了党的领导活动中的错误，并将这些错误归纳如下：

1. 党自行取消了同国内反动派和反人民的行为进行的长期斗争。民主阵线没有成为党手中的强大武器。

2. 党自行取消了同私有资本的斗争，党的活动不是旨在发展和巩固作为社会主义成分的国有经济，不是着手发展和巩固合作社。

3. 宣传和文化工具没有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手中武器。

4. 党没有确定正确的道路，例如确立亲苏联和民主南斯拉夫的政策。没有按照这一点教育人民群众加强同苏联人民和南斯拉夫人民的友谊。^①

5. 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帝国主义危险性估计不足，用对待英美的态度对待苏联。

中央五次全会指出，在阿尔巴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有成为党的总路线。全会认为，政治局成员们应对这些错误负责，其中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应负主要责任。……

阿尔巴尼亚的反动势力

目前，阿尔巴尼亚的反动势力还没有形成公开的组织。但是，全国有数量众多的由5~10人组成的分散的反动小组（男性反动小组和女性反动小组）。参加这些小组的主要是青年，这些小组的头目是从前的大地主、旧军队的军官、宪兵和警察、天主教教士、前傀儡政府成员、前反人民组织“民族阵线”以及索古的“合法派”成员。

此外，在阿尔巴尼亚的北部有一些武装匪帮在活动，总人数将近600人。根据阿尔巴尼亚同志现有掌握的材料，1945年8月和11月，这些武装团伙的代表在山上开会，研究制定其反人民活动计划。这些匪帮和团伙的许多人互相之间有联系，并且同希腊反动分子和美国外交使团有联系。他们反对新生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及其所采取的措施，在人民中散布不信任情绪，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

①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五次全会的决议指出：苏联“是我们的独立和我们的人民政权的最伟大的保证人”，“我们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与南斯拉夫保持最密切和最具体的联系。我们的人民应该明白，这种兄弟般的情谊是我们生存的保证”。

指望在阿尔巴尼亚发生政变，指望希腊法西斯分子和主要是英国人侵阿尔巴尼亚，以便推翻恩维尔·霍查政府。阿尔巴尼亚政府机关知道这些反动小组和匪帮的大多数头目，准备在取得有关他们活动的证据后将其一网打尽。……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要求

在同我交谈中（参加交谈的有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丘瓦欣同志），科奇·佐泽同志代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讲述了如下要求：

1. 为了同联共（布）中央建立经常联系，允许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向苏联派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常设代表，以便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活动的最重要问题方面取得必要的咨询和建议。

2. 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建立专门的联系。

3. 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部分领导干部提供前往苏联政治学校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机会。

4. 考虑到阿尔巴尼亚人对学习俄文的巨大兴趣，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哪怕 10 名俄文教员也好，以便到阿尔巴尼亚的中学和训练班教授俄语。

5. 允许在阿尔巴尼亚挑选 209 名大学生前往苏联的高等学校继续深造。

6. 允许由医生、教师、农艺师、工程师、画家、建筑学家组成的阿尔巴尼亚知识分子代表团前往苏联，以便了解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方面向阿尔巴尼亚派出类似的代表团。

7. 委托苏联的一个电影制片厂写电影剧本，拍成电影，并按照在南斯拉夫的发行方式发行介绍阿尔巴尼亚的电影。

8. 向阿尔巴尼亚派出一个芭蕾舞演员小组进行巡回演出。

9. 增加向阿尔巴尼亚提供苏联电影的数量。

10.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寄发的材料（文章）最好使用阿尔巴尼亚文，至少使用塞尔维亚文，因为国内把俄文译成阿尔巴尼亚文的翻译人员很少，而且这些翻译人员在政治上不能信任。

П. 曼奇哈^①

1946年5月14日于莫斯科

^① П. И. 曼奇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顾问。

№09271

丘瓦欣与霍查关于阿尔巴尼亚党内 斗争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6年5月20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秘密

摘自 Д.С. 丘瓦欣的日记

.....

恩维尔·霍查继续说，在培拉特会议上，我在斗争过程中采取了所有措施。斯托伊尼奇^①在某些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的默许下，严厉地谴责了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存在恐怖主义活动，其结果是使党实行了独裁措施，脱离了群众。但是以后的情况证明，这些“独裁措施”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利于党，有利于民族解放斗争。关于当时被枪决的许多人，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是阿尔巴尼亚反动派的代理人，或者是“英国国家情报处”的间谍（如穆斯塔法·吉尼什和其他人）。

恩维尔·霍查还就培拉特会议通过的不正确决议谴责了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游击运动，在国外苟且偷安，一个劲地要求党给他寄钱。恩维尔·霍查说，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

^① 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派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代表。

在培拉特会议上以“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理论家”自居。在会议发言中，谢伊富拉·马列绍瓦公开辱骂党，说什么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没有一个出身于人民的领导人。他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搞土匪活动和恐怖活动；他要求把党的所有领导人送交军事法庭。

恩维尔·霍查指出，他说这一切是为了提请我们注意，目前党的领导人的错误同培拉特会议有联系。他随后指示，现在党内有人借口培拉特会议和利用这次会议的不正确决定反对他，因为对阿尔巴尼亚党那个时期的活动负责的党的领导人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恩维尔·霍查强调指出，培拉特会议以后，他被取消了主动领导党务工作的权利，尽管他名义上还是党的第一书记。他说，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转移到以科奇·佐泽为首的干部委员会手中。霍查继续说，由于培拉特会议的不正确决定，由于在这次会议上斯托伊尼奇的坚持和科奇·佐泽的默许下，政治局吸收了一些没有能力的人（贝德勒·斯巴秀，图克·雅科瓦，潘迪·克里斯托和机会主义者谢伊富拉·马列绍瓦）。目前党内二元论盛行：党和政府各行其是。在党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中也可以明显看到这种二元论的表现。恩维尔·霍查继续说，这种状况带来了严重后果。这种后果现在已经表现出来，尤其表现在中央干部委员会和共青团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上。谈到这里时，霍查介绍了阿尔巴尼亚青年的功绩，介绍了共青团中央的功劳，他们在许多问题上走在中央领导人的前面。但是，共青团中央工作人员（利里·贝利绍娃，法迪尔·帕奇拉米等人）倡议和提出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遭到了干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政治局一些成员的激烈反对。出现了极其不正常的情形：在中央全会上，共青团工作人员的讲话遭到了某些中央委员（奈兹米耶·杜马等人）的蔑视和取笑。

恩维尔·霍查认为，党中央内部形成这种状况是由于受到了前

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斯托伊尼奇和迪兹达罗维奇（前南斯拉夫驻地拉那使团一等秘书）的极其有害的影响。

恩维尔·霍查强调指出，他介绍这些情况是为了让联共（布）中央更好地了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党内情况。他对不久前抵达阿尔巴尼亚的联共（布）中央工作人员曼奇哈能不能全面了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部的情况表示怀疑。此外，霍查对曼奇哈同志是否在阿尔巴尼亚得到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民政部的全面和客观的信息表示不相信。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恩维尔·霍查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处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前夕，这是党的生活中的严峻阶段，应该全面地准备这次代表大会。^① 这次代表大会应该以一致的、坚定的、完全明确的观点看待一系列紧迫的问题。他表示担心，中央政治局的某些工作人员（科奇·佐泽）和干部委员会的某些工作人员没有考虑到党内目前形势的全部严重性，没有对政治局成员之间（科奇·佐泽和纳科·斯皮鲁之间）展开的对抗性矛盾予以应有的注意。

为此恩维尔·霍查指出，他对科奇·佐泽的莫斯科之行是否合适表示怀疑，因为他担心科奇·佐泽没有完全准备好向联共（布）中央介绍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现状的全面情况以及正确地指出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恩维尔·霍查说，我们十分激动地期待着我们被邀请前往莫斯科的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到时要身穿完全“干净的衬衫”去莫斯科。来到联共（布）中央领导人面前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莫大的幸福。

恩维尔·霍查极力强调说，对于他来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中谁去莫斯科都无所谓。但是他认为，重要的是，前往莫斯科

^①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 1946 年 5 月 25 日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由于党内斗争激烈，大会多次推迟，直到 1948 年 11 月才召开。

的人应该进行充分的准备，他本人能够全面地讲述阿尔巴尼亚的真实情况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近期任务。

同恩维尔·霍查的交谈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在政治局内部，尤其在恩维尔·霍查和科奇·佐泽之间，关系不那么健康。还使人感到，恩维尔·霍查害怕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科奇·佐泽会利用培拉特会议的决议，组织反对他的有关发言，以此来使自己在党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毫无疑问，恩维尔·霍查想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预先获得我们的支持。尽管他没有直说，但是从他谈话的口气和他所提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愿意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前来莫斯科亲自同联共（布）中央领导人详细谈一谈全部情况。

参加谈话的还有索科洛夫同志。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Д. 丘瓦欣

1946年5月20日于地拉那

№09279

丘瓦欣与霍查关于阿政府代表团 访南结果的谈话记录

(1946年7月3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绝密

摘自 Д.С. 丘瓦欣的日记

7月3日11时，我应恩维尔·霍查的提议同他进行了会晤。总理讲述了他的贝尔格莱德之行。他说，无论他本人或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对贝尔格莱德之行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贝尔格莱德之行对将来发展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恩维尔·霍查说，在贝尔格莱德达成了关于签署友好和互助条约的协定，并签署了经济合作条约和向阿尔巴尼亚提供120万美元财政贷款的协定。上述两份文件基本上是今年5月初纳科·斯皮鲁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准备的。目前他正在贝尔格莱德，这些文件已经办理完毕。

1. 恩维尔·霍查说，在关于签署友好和互助条约的谈判期间，讨论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感兴趣的所有军事问题。恩维尔·霍查继续说，铁托元帅对诸如阿尔巴尼亚军队的状况、部队的部署、阿尔巴尼亚总参谋部战时的武器供给和计划、阿尔巴尼亚陆地边界

和海上疆界的防御情况，以及这个国家现有机场的情况等问题表现出很大兴趣。

恩维尔·霍查说，铁托元帅所持的意见是，阿尔巴尼亚首先应该加强与希腊接壤的南部边境，之后加强沿海地区。但是铁托元帅强调指出，目前，无论是阿尔巴尼亚或是南斯拉夫，都没有建设现代化防御设施的物质力量。他认为，应该把阿尔巴尼亚的所有海疆的防御设施构筑成能够阻止敌对武装力量登陆的临时性防御工事。同时铁托提请我们注意加强发罗拉地区的防御，包括加强萨赞岛^①、卡拉角以及同希腊领土（同科孚岛）直接接壤的萨兰达地区的防御。铁托认为，这两个地区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实际上控制着进出亚得里亚海（奥特朗托海峡）的制海权。

恩维尔·霍查说，铁托请他相信，南斯拉夫总参谋部将在组织和建设防御工事方面向阿尔巴尼亚军队提供全力帮助。铁托答应在最近将派遣一些南斯拉夫军事专家（非正式派遣）前往阿尔巴尼亚研究海岸防御设施的构筑问题。

至于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具体需求问题，铁托建议恩维尔·霍查提供所需武器、装备和供给的详细清单，供南斯拉夫总参谋部在制定供应计划时一并考虑。铁托同时提到，南斯拉夫目前有一些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山地火炮，很适合在阿尔巴尼亚使用，可以移交给阿尔巴尼亚军队。

据恩维尔·霍查说，为了确保两国总参谋部之间的长期联系和工作协调，在贝尔格莱德达成了关于成立常设的军事代表团的协议——派驻南斯拉夫总参谋部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和派驻阿尔巴尼亚总参谋部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此外，铁托好像还说要加强驻阿尔巴尼亚的武官处。

^① 原文如此，疑为萨扎尼岛。

南斯拉夫军队给恩维尔·霍查留下了令他吃惊的印象。他认为，南斯拉夫军队穿得比阿尔巴尼亚军队差，至今还穿德国人的军服。但是，南斯拉夫军队的素养、纪律和装备要比阿尔巴尼亚军队好得多。霍查指出，他所到之处都发现南斯拉夫军队全都使用苏联武器。

2. 经济问题。铁托认为，为了完成军事计划，必须振兴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铁托告诉恩维尔·霍查说，铁托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斯大林同志对他说，苏联政府把阿尔巴尼亚看做需要全力帮助的兄弟共和国。同时指出，苏联将通过南斯拉夫帮助阿尔巴尼亚，因为苏联政府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直接帮助阿尔巴尼亚会引起盟国方面无谓的挑剔。

铁托指出，为了加强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执行苏南经济条约的条款，将成立一些处理某些问题的阿南联合公司。铁托同时指出，他认为，这件事应该由“我们两国”来办。

恩维尔·霍查简要介绍了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经济条约和财政贷款协定的内容。他说，为了迅速恢复和扩大阿尔巴尼亚的生产，为了加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合作，在贝尔格莱德达成了关于优先成立下列阿南联合公司的协议：

- (1) 阿南铁路建设和运行联合公司；
- (2) 阿南石油开采和加工联合公司；
- (3) 阿南矿产资源勘探和利用联合公司；
- (4) 阿南电气化联合公司；
- (5) 阿南海运联合公司；
- (6) 阿南商品进出口联合公司；
- (7) 阿南银行

恩维尔·霍查指出，南斯拉夫夫人答应一定向阿尔巴尼亚的农业、纺织业和食品工业、以及某些其他工业部门提供技术援助。

恩维尔·霍查接着说，今年5月，经济部长纳科·斯皮鲁和南斯拉夫的代表进行了谈判，结果达成了关于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总金额为120万美元财政贷款的协定。这笔贷款用于购买南斯拉夫的商品和支付南斯拉夫人向阿尔巴尼亚各机构、企业和一些提供服务的费用。

根据达成的协定，贷款期限为5年，年息3%，从1948年开始偿还。根据规定，可以用商品支付，也可以用美元支付。

至于成立阿南铁路公司问题，恩维尔·霍查强调指出，在贝尔格莱德尚未就首先建设什么铁路达成协议，是首先建设佩奇—斯库塔里—杜拉佐—发罗拉铁路，还是先建斯特鲁加—发罗拉铁路，双方尚未商定。同时，还对阿尔巴尼亚人说（好像是铁托元帅说的），南斯拉夫明年就可以着手修建这两条铁路中的任何一条。

3. 恩维尔·霍查还讲述了他同铁托关于党的事务的交谈内容。在交谈中只有南斯拉夫驻阿尔巴尼亚公使杰尔贾参加（作为翻译参加）。恩维尔·霍查向铁托元帅详细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部的情况和中央某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过去所犯的错误。恩维尔·霍查说，他坦率地同铁托元帅谈这些问题，没有任何保留。霍查还对铁托讲，阿尔巴尼亚的党还年轻，其过去和现在都需要布尔什维克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帮助。阿尔巴尼亚党在工作中无疑有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不是原则性的。恩维尔·霍查同时强调指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整个民族解放斗争阶段基本上坚持了正确的路线。

恩维尔·霍查接着对铁托元帅说，派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南斯拉夫党的代表给了阿尔巴尼亚党巨大帮助。但是，他们中某些人，例如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犯下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至今还能感觉到。例如，在培拉特会议以后，实际上取消了恩维尔·霍查对党的领导权，让机会主义分子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参加了政治

局，之后得到斯托伊尼奇的支持，把一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拉进政治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错误。

铁托在回答恩维尔·霍查提出的一些党的问题时好像说，他完全同意恩维尔·霍查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现状的评价。铁托指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和其他一些老的政党不一样，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二战期间所犯的错误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少。

铁托似乎承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确实在阿尔巴尼亚办了许多蠢事，他们摆出“老爷”的架子，不考虑当地领导人的意见，忘记了阿尔巴尼亚党是独立自主的。

铁托指出，目前阿尔巴尼亚党必须团结一致，党和政府必须由一个人领导，这个人应当是党的总书记，同时又是总理。同时铁托还告诉恩维尔·霍查说，科奇·佐泽应该懂得这一切，他在中央只从事组织工作，不要插手任何政策。铁托说完这话后指着会谈结束时才参加的南斯拉夫党的组织书记兰科维奇说，兰科维奇在南斯拉夫党内从来不插手制定政策的事。他只是在铁托的领导之下研究党中央的组织问题。据霍查说，铁托希望科奇·佐泽到贝尔格莱德了解一下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书记的工作方法。

铁托让恩维尔·霍查相信，南斯拉夫共产党今后将向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之后他告诉恩维尔·霍查说，最近他将派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重要代表”前往地拉那了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工作并交换工作经验。

4. 恩维尔·霍查向铁托讲述了自己对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州未来问题的观点。他认为，目前无论是南斯拉夫政府或是阿尔巴尼亚政府都不适宜提出把这两个州并入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他认为，这个州的居民大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人，早晚会并入阿尔巴尼亚，但这只能在当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实现。

恩维尔·霍查同时强调指出，在整个民族解放斗争期间，他一直持这一观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持这一立场的。

但是恩维尔·霍查认为，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问题应该以某种形式在友好互助条约中得到反映。恩维尔·霍查对铁托元帅说，如果不这样做，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的反动势力以及阿尔巴尼亚本国的反动势力就可大肆宣传，指责阿尔巴尼亚现政府把这两个州出卖给南斯拉夫。

据恩维尔·霍查说，铁托似乎回答说，在关于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州的未来问题上，他完全同意恩维尔·霍查的观点。铁托指出，南斯拉夫政府过去对这两个州的居民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那里有许多无秩序的现象。铁托接着说，目前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提出把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并入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他认为，目前提出这个问题只会削弱南斯拉夫的地位，尤其是削弱南斯拉夫政府在塞尔维亚的地位，同时这一点也不会加强阿尔巴尼亚的国际地位。但是铁托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使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的居民同阿尔巴尼亚的居民相互亲近。其中的一个措施是开放阿南边界并在开放的边界地段取消关税。

据恩维尔·霍查说，对于铁托元帅提出的关于在科索沃州和梅托希亚地区开放阿南边境问题他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可以在将来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恩维尔·霍查最后说，在签署这些重要的政治协定后，目前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政府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要在各个领域进行许多工作。首先是军队的改组工作，改组军队使其能够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他认为，必须尽快完全改组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总参谋部，因为阿尔巴尼亚总参谋部的某些领导人不能领导军队。为此恩维尔·霍查谈到了关于任命穆罕默德·谢胡少将（莫斯科伏罗希洛夫军

事学院学员)为阿尔巴尼亚军队总参谋长问题。

恩维尔·霍查对穆罕默德·谢胡作了如下评价。他说，穆罕默德·谢胡是目前阿尔巴尼亚所有将军中最有能力和最适合担任总参谋长的人。穆罕默德·谢胡是天生的军人，参加过两次战争（西班牙战争和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运动）。恩维尔·霍查指出，穆罕默德·谢胡在来莫斯科之前担任副总参谋长，几乎没有参与过党的工作，尽管他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恩维尔·霍查认为，穆罕默德·谢胡落后了，不了解党内生活。他认为，在穆罕默德·谢胡返回阿尔巴尼亚和任命他担任总参谋长以后，必须同时让他参与领导党务工作。恩维尔·霍查同时强调指出，穆罕默德·谢胡在其工作中依靠的只是军队中的一些老同志，这似乎是他的不足之处。

“不管怎样”，恩维尔·霍查说，“穆罕默德·谢胡是阿尔巴尼亚军队总参谋长的惟一候选人，不等从军事学院毕业就将把他从莫斯科召回国。”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Д. 丘瓦欣

1946年7月3日于地拉那

№09280

苏斯洛夫关于佐泽提供的阿共领导层 情况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7月13日)

绝密

呈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层情况报告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收到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科奇·佐泽提供的材料。据他说，这些材料已经征得其他政治局成员同意。材料除了介绍阿尔巴尼亚国家和党内的政治形势以外，还介绍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层的情况。

科奇·佐泽说，尽管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以前有过的宗派主义、小团体和派别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铲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层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真正的团结。

根据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五中全会，教育部长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由于追逐名利、搞分裂、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决议、对政府外交政策问题做出有害的解释、有机会主义倾向而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在讨论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的问题时，

支持他的政治局成员贝德勒·斯巴秀（经济恢复部长）和图克·雅科瓦（阿尔巴尼亚工会领导人），尽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灰心丧气，宣布愿意退出政治局，其理由是无能胜任他们所担负的职责。贝德勒·斯巴秀和图克·雅科瓦的行为受到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谴责。

五中全会发现了党的领导活动的许多严重错误。已经通过的决议中说，党自行取消了同国内反动派和反人民现象的斗争，民主阵线还没有成为党手里的强大武器。

全会的决议还说，党自动取消了同私有资本的斗争，党的活动不是旨在发展和巩固作为社会主义成分的国营经济，不是面向发展和巩固合作社。

党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帝国主义危险性估计不足，用对待英美的态度对待苏联。

中央五中全会指出，在阿尔巴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有成为党的总路线的基础。全会认为，政治局成员应对这些错误负责，其中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应负主要责任。

全会的决议在各州和各地的党组织大会上进行了讨论，得到了共产党员的广泛支持。但是，科奇·佐泽说，某些党的领导工作人员仍然对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及其路线表示怀疑，说什么“谁能够担保目前党的路线已经没有缺点了”。中央领导人认为，即将进行的党的清洗有助于把不坚定分子清除出党，巩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纪律性。

中央五中全会决定，在即将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开会日期没有最后确定）将讨论共产党活动全面合法化问题。之所以做出

这一决定，是因为不仅阿尔巴尼亚人民，而且国外关心阿尔巴尼亚的人士都已经知道，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已占绝对优势。所以政治局成员们认为，共产党活动的全面合法化只会扩大它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中间的影响。

米·安·苏斯洛夫^①

1946年7月13日于莫斯科

^① 米·安·苏斯洛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

№09293

丘瓦欣与斯皮鲁关于斯库台市暴动的谈话纪要

(1946年9月13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归档。

秘密

摘自 Д.С. 丘瓦欣日记

今天我应纳科·斯皮鲁的要求同他进行了会见。谈话一开始立即转入了不久前发生在斯库台地区的武装暴动事件。斯皮鲁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一、9月9日发生在斯库台的事件是一次可悲的事件。^① 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发生完全是由于我们的有关机构心慈手软和丧失警惕。例如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只要现政府仍在拉那执掌政权，北方就不敢起来反对政府（在这里纳科·斯皮鲁提到了科奇·佐译的名字）。实际上本来有更多的理由让我们去思考相反的情况。9月9日发生的事情并非偶然。北部地区的人民由于愚昧无知而对至今还继续在米尔季塔、杜卡纳、库克斯等地山区活动的部落武装头领和分散的土匪仍然言听计从。最近一个时期，由

^① 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落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开展的比其他一些地区要晚些。1944年10月，北部的封建领主企图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结成了“斯库台联盟”。临时政府宣布该地区进入军事状态。1946年9月政府在部分地区发布参军动员令。当应征公民抵达集合地点，但却被派去推翻斯库台政府，从而引起当地农民的反，遂爆发了起义。

于希腊人在巴黎会议上的一系列带有挑拨离间性的讲话和英国、美国代表团对希腊君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所提要求的支持，某些匪帮加强了其针对政府的敌对宣传。这些匪帮9月9日在斯库台进行的煽动毫无疑问是由国外势力所指使的。当地匪帮的头子尤普·卡扎齐无疑是知道自己的煽动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他为了帮助其在阿尔巴尼亚境外的朋友们还是这样做了。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尤普·卡扎齐通过自己的奸细于9月8日散布谣言说，地拉那已经被希腊军队占领，游击队纷纷逃离斯库台，人民必须拿起任何能够找到的武器赶往斯库台市，斯库台地区东北部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文盲，愚昧无知，他们对这一宣传信以为真，于是纷纷穿上节日盛装，向斯库台进发。有2个村庄因这一煽动而全体出动，其余5~7个村庄则分别派出了15~20人的代表。由当今民主政府最凶恶的敌人——其中之一是斯库台的大富商罗伊——指挥的人群于9月9日夜间接达斯库台，他们群情激奋，沿街蜂拥。在城市郊区（在铁路信号所附近）人群涌向兵营，要求哨兵放他们进兵营大院并发给他们武器。哨兵没有张皇失措并开了火，接着援军赶到了。匪徒当时都带有武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被当场击毙，一部分被逮捕，而许多人则四散逃往深山。现在正在这一地区进行清剿匪徒的行动。

谈到尤普·卡扎齐的情况时，纳科·斯皮鲁说：在过去卡扎齐曾经当过律师，曾就读于都灵（意大利）的法学院。在意大利人统治时期尤普·卡扎齐当过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发罗拉和都拉斯地区的区委书记，而后担任阿尔巴尼亚法西斯党书记。但后来他“失宠”了，被任命为都拉斯的行政长官。卡扎齐曾是斯库台市阵线分子的首要组织者，在整个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一直同游击队作战。

我问纳科·斯皮鲁，在9月9日暴动期间天主教徒表现如何。据纳科·斯皮鲁称，天主教徒表现并不积极，没有公开参加这次暴

动。初步掌握的材料表明，天主教徒们认为这样一种暴动企图为时过早因而注定要失败。

二、纳科·斯皮鲁同时还向我通报了南斯拉夫军队在列桑市（位于普雷斯帕湖以北）地区包围了以最重要的阿尔巴尼亚匪徒头子之一穆哈雷姆·拜拉科塔里为首的 80 余人的情况。据斯皮鲁说，这伙匪帮本打算逃往希腊。现在阿尔巴尼亚部队已被派去增援南斯拉夫人（后来得知，穆哈雷姆·拜拉科塔里逃出了包围圈，现在躲在迪布拉地区的某个地方）。纳科·斯皮鲁指出，同拜拉科塔里呆在一起的有 2 名外国人，但他们的国籍不详。

三、纳科·斯皮鲁还概括地向我介绍了他巡视马利克沼泽地排水工程的印象。据他说，此项工程将不可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因为现在看来，排干湖水工程的计划未经周密制定，地方当局本来希望沼泽地的水排干之后能得到 9000 公顷土地，而现在据说只能得到 400 公顷。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政府将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压缩此项工作，以免在人民面前公开丢脸。纳科·斯皮鲁说，所有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我们没有一个能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强、果断的领导人”。斯皮鲁在这里也没有忘记“伤害”科奇·佐泽。他对我说，对马利克沼泽地排水工程的失败首先要承担责任的是佐泽，因为此人似乎是此项工程的“教父”，并且直到最近还曾断言说那里的工程正在顺利进行。

谈话结束时，纳科·斯皮鲁提出了一个问题，问是否有可能从苏联给派一名地质学专家来。我已经要求这位部长就此问题给我发一封信来。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Д.С. 丘瓦欣

1946 年 9 月 13 日于地拉那

№09296

丘瓦欣关于阿共领导人状况 与霍查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6年9月21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拉夫里舍夫，送联共（布）中央，归档。

摘自 Д.С. 丘瓦欣日记

……

三、关于扩大共产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问题

恩维尔·霍查主动谈到了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的状况。他坦率地说，在他从巴黎回国之后，他已更加确信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加以改组。据他说，在政治局里已经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局面，政治局的半数成员不做任何工作，等于是个摆设。由6人组成的政治局实际上只有恩维尔本人、科奇·佐泽和纳科·斯皮鲁在工作，而另外3位成员——贝德勒·斯巴秀、潘迪·克里斯托和图克·雅科瓦——则通常是从不参加政治局的争论，而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别人向他们提议什么就同意什么。除此之外，近来科奇·佐泽和纳科·斯皮鲁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霍查说，事情曾经闹到这样的地步，致使“我有时不得不在没有做出任何决议的情况下中止政治局会议”。

据恩维尔说，科奇·佐泽对纳科·斯皮鲁对他的行为与活动的任

何批评都过分敏感。更有甚者，每当科奇·佐泽对恩维尔·霍查提出的某些措施或建议感到不中意的时候，他在这里也要试图找出纳科·斯皮鲁搞了什么阴谋，认为这样的建议是纳科·斯皮鲁向恩维尔·霍查暗中提示的，是针对他（科奇·佐泽）的。据霍查说，科奇·佐泽的缺点是“他过高估价自己的才能和过分乐观地看待事物”。

说到这里，恩维尔·霍查介绍了他从巴黎回国之后同科奇·佐泽的一次谈话。据恩维尔说，科奇·佐泽同他仅用了7~8分钟谈了谈9月9日发生在斯库台的事件，而且是非常肤浅地泛泛而谈，没有对这次事件进行任何分析，也没有得出任何政治结论。对于他（科奇·佐泽）来说，一切都不过如此而已。人们暴动了——就是说，应当予以平息。他认为，保卫人民指挥部的部队“将能够恢复斯库台的秩序”。恩维尔·霍查说，对待解决严肃的政治问题的这种态度不可能导致任何好的结果，并将引起比9月9日事件更为严重的后果。

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在8~9月间，国内曾进行了民主阵线机关的选举工作。科奇·佐泽在这里也没有看出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之处。科奇·佐泽认为选举进行得很有组织，选民参选比例在有些地方达到95~100%，领导内定的候选人“均获通过”。在这次选举中，科奇·佐泽没有发现有任何不足之处。可是要知道缺点和不足之处是很多的。而缺点之一就是缺乏对民主阵线机关工作的批评。这位部长会议主席继续说，实践表明，仅仅一次简单的投票并不足说明什么问题。在北部一些地区出席选举会议的人员比例同样也是很高的，阵线的候选人也都“获得通过”。可是在实践中情况又是如何呢？这些被人民选上了的候选人竟然是9月9日暴乱的组织者，正是这些人策划了这次暴乱。而科奇·佐泽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认为“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当前，我们需要的是对我们工作的

尖锐批评，对我们的某些领导人的缺点的批评，以便使人民，特别是北方各省的人民振奋起来，使他们从数百年来的沉睡状况中醒来。这样的批评毫无疑问会加强我们的行政机关和群众性的社会组织，至于对党的加强就不用说了。

谈到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的工作时，恩维尔·霍查说，这些机关的工作缺乏计划性，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也没有任何条理和秩序。某些组织在职能方面的混乱不清，有时导致群众性社会组织没有被吸收来参与一些重大的全国性和政治性措施的实施。例如，关于不久前部分地征召人员入伍问题，就没有吸收民主阵线和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联盟（该联盟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共青团，而共青团又是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的领导者）来参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民主阵线机关选举之前，没有进行任何事先的准备工作，一切都是靠单纯的行政手段来进行，没有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参与此事，甚至连在地拉那本地的某些群众组织都不知道将要进行民主阵线机关选举之事。

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党和国家机关的一切工作，恩维尔·霍查认为必须尽快地改组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增加其组成人员。他认为政治局组成人员应当扩大到11人，新增成员应当是在工作中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精力充沛并且比较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他认为，吸收参加政治局的人员应当有：现任总参谋长穆罕默德·谢胡少将，现任军队总参谋部政治管理处主任克里斯托·特梅尔科上校，教育部副部长（未来的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领导人）法迪尔·帕奇拉米，现任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希斯尼·卡博（计划逐渐让他担任外交部长一职）和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利里·贝利绍娃。所有这5个人均被恩维尔·霍查称之为能够给政治局的工作带来新的气息的有才华、有能力的干部。

恩维尔·霍查还打算对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进行一些变动，

他认为必须把所有像卡德里·霍查之类的缺乏工作能力的人、游手好闲者和可疑人物淘汰出中央委员会。他认为中央委员的数量需要由 18 人增加到 27~30 人，另加 7~9 名候补委员。按照恩维尔·霍查的意见，可以让这样一些党员进入中央委员会，诸如：马诺尔·科诺米（司法部长），密斯托·特列斯卡（出版局长），哈基·托斯卡（农业部副部长），内斯蒂·佐托，或许还可以有拉马达纳·奇塔库等。目前霍查正在研究最后敲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未来组成人员的问题，同时也在研究以何种方式以及在何时实施打算采取的措施问题。

我认真地听取了恩维尔·霍查的谈话。我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建议，但是我也未能对他所打算采取的措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我也不得不对霍查在上边谈到的那些缺点表示同意。至于科奇·佐泽与纳科·斯皮鲁之间的摩擦，我在此之前已有所了解。我表示希望在政治局的某些成员之间不要有这样的摩擦，强调了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团结一致集体工作的必要性。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Д.С. 丘瓦欣

1946 年 9 月 21 日于地拉那

№09330

丘瓦欣关于对马列绍瓦免职的反应 与科奇·佐泽的谈话纪要

(1947年5月12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古谢夫，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秘密

摘自 Д.С. 丘瓦欣日记

今天10时我会晤了科奇·佐泽。在交谈时谈及了如下问题：

1. 关于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在政府中的职务问题。

科奇·佐泽向我通报了国内各界对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教育部长职务的反应。

这位部长说，普通百姓仍在继续做出反应。所有的人都认为，在政府中不应有游手好闲者的位置，政府将巧言惑众者、懒人和习惯于只拿国家的钱而自己对国家毫无贡献的人清除出国家机关，做得很对。

至于反动分子（商人，原吉斯林分子^①政府和索古政府的旧官吏、旧军官等），按这些人的看法，政府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在政府中的职务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1) 反动分子们散布反苏谣言说似乎苏联政府打算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占领阿尔巴尼亚，据这些谣言称，关于把苏联军队引入阿尔巴

^① 吉斯林是挪威法西斯党创始人，战时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后来，吉斯林就成为内奸的代名词。

尼亚的问题曾经在政府的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在这次会议上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发言表示坚决反对允许苏军进入阿尔巴尼亚，可是当时其余所有的政府成员都表示了“同意”。这些人认为，正是由于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的这一发言，他才被解除了政府中的职务。

2) 反动派还散布了另一种说法。据称，不久以前阿尔巴尼亚政府似乎收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据这些人散布的谣言说，这份备忘录甚至还在政府中“讨论过”。在这次讨论时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发言表示赞成接受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份虚构的备忘录中提出的那些条件，并因此而丢失了自己的职位。

至于说到党内人士，则应当指出，党内群众对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的工作基本上都表示赞同。但是在某些党内人士中（包括在地拉那），对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的教育部长职务引起了某种惊异。这些人士无论如何也不理解，像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这样一个曾在苏联呆过数年并曾亲眼目睹“应当怎样工作”的人，竟然不被允许参加建设民主的新阿尔巴尼亚的工作。当他们看到政府中在知识和素质方面有时还在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之下的其余那些领导人都能忠诚地、无可指摘地工作的时候，对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如此表现尤其感到吃惊。

在“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对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被解职的反应很有意思。例如，地拉那科学研究所的成员们在相互间的谈话中就坦率地表示，尽管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发表了一些高深莫测的讲话，做了一些“指导性的”发言，谈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并曾呼吁加强国家的恢复工作等等、等等，但是他自己实际上并没有干任何事情。这些人士认为，应当把这样的蛊惑宣传家从政府机关中清除出去。

还应当指出一个在人民议会主席团讨论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问题时出现的细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所有的主席团成员都

一致赞成政府的建议——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的职务。但是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奥梅尔·尼沙尼在表决时却来了这样一段插话：“当关于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职务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的时候，我们现在未必还能做什么事情。遗憾的是我们还不得不过来做这样的事情。……关于问题的实质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也许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本人要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

不难理解，这段插话的目的是旨在挑动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站出来发言，从而在人民议会主席团挑起争论。但是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以沉默应付了事，未敢说什么话。

应当指出，奥梅尔·尼沙尼听到关于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职务的消息时的确感到很不是滋味。正如上面已指出的那样，在人民议会主席团开会的时候，以及在同个别政府成员的交谈中，他都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会晤卫生部长米达尔·什图拉的时候，奥梅尔·尼沙尼就直截了当地表示，他对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的被解职感到惋惜。在同米达尔·什图拉的这次谈话中，奥梅尔·尼沙尼还曾试图探听是否有些什么促使政府做出解除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教育部长职务的纯党内的考虑。……

3. ① 关于某些议员的反政府活动。

科奇·佐泽告诉我说，政府已经决定在近日内对在最近数月里广泛开展活动，甚至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对反政府的议员集团进行有力的打击。他指出，这个集团为首的人有人民议会议员谢夫凯特·贝亚、康斯坦丁·博什尼亚库、科尔·库佳利、萨拉胡丁·托托、法伊克·谢胡、恩维尔·萨扎尼、谢赫·卡尔布纳拉、伊尔凡·伊马尤尼、伊斯拉姆·拉多维茨卡等人。此外，政府还打算以未完成政府交给的任务及作为驻巴里的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团长在意大利工作期间

① 原文如此，缺序号2。

挥霍大量钱财的罪名逮捕议员卡德里·霍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前中央委员）。科奇·佐泽说，根据国家安全机关掌握的初步材料，所有这些人都和去年9月9日发生在斯库台的暴动的参加者有联系。

科奇·佐泽说，不久以前还逮捕了议员谢赫·卡尔布纳拉的儿子，此人公开道出了这一帮议员同阵线分子的联系以及他们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数日前被捕的索古统治时期杜拉斯宪兵队长泰菲克·费里·阿累西也供出了这些议员的反政府活动情况，此人直到最近一直是谢夫凯特·贝亚的“左右手”。

据国家安全机关目前所掌握的情报，这个集团的所有成员已经约定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落到政府手中。对此，科奇·佐泽指出，政府打算尽快地消灭这个集团，不让该集团的成员有藏匿的可能。据他说，国家安全机关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这个集团的任何成员逃出地拉那。

据初步统计的材料，政府打算在近日内加以逮捕的人员数量在全国范围内将达100~120人。在这个数字中包括有：医生和教师7~9人，商人和工业家13~15人，律师和法官5~7人，前历届反动政府成员家庭出身者15~20人，僧侣约5人，索古军队的军官约12人，天主教徒5~7人以及其他一些人。

在谈话的最后，科奇·佐泽指出，作为开始，政府打算先逮捕5名该集团中最积极的成员——谢夫凯特·贝亚、谢赫·卡尔布纳拉、科尔·库佳利、萨拉胡丁·托托和法伊克·谢胡。这位部长说，在对这5个人进行审问并从他们那里获得相关的材料之后，将可以解决再逮捕参加这个集团的其余所有议员的问题。

我对这位部长所做这些情况通报表示了感谢。

谈话就此结束。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Д.С. 丘瓦欣

1947年5月12日于地拉那

№09347

莫洛托夫关于阿同苏联及相邻巴尔干 国家关系与霍查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7年7月15日）

秘密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在座的有；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科奇·佐泽和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丘瓦欣。

莫洛托夫问恩维尔·霍查，在莫斯科都看到了些什么。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他今天，即7月15日，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此外，还去看了地铁。

莫洛托夫问恩维尔·霍查希望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参观苏联的计划，他想在莫斯科看些什么和做些什么。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他在莫斯科想看的東西很多。他（霍查）同莫洛奇科夫同志进行了交谈，他们一起拟定了一个参观莫斯科的各种名胜古迹的计划。

莫洛托夫说，今天，7月15日，斯大林同志或许能够接见恩维尔·霍查，但他（莫洛托夫）还需要把这一接见的時間搞确切。接见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恩维尔·霍查。莫洛托夫还补充说，接见大概将在晚上7点或8点钟以后进行。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他非常高兴。他整个一生都盼望着有这

一天。此外，受到斯大林同志的接见也是他给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巨大荣誉。

莫洛托夫说，阿尔巴尼亚与苏联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应当相互熟悉和了解一下。斯大林同志很高兴接见恩维尔·霍查并同他及其他民主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结识。^①

莫洛托夫说，他大致地了解恩维尔·霍查在莫斯科的访问所做的计划安排。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恩维尔·霍查希望在这个计划安排中做些什么改变，悉从其便。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希望在此间，在莫斯科讨论哪些问题。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希望商谈几乎所有关系到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代表团还打算谈及经济和其他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关于国民教育、关于军队等问题。恩维尔·霍查说，他准备同维·米·莫洛托夫——如果维·米·莫洛托夫有时间的话——或者其他同志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当然，可以直接同他（莫洛托夫）讨论所有这些问题。至于那些专门性的问题，可以同在相关部门工作的有关同志一起进行商讨。这一切将取决于恩维尔·霍查提出的问题的性质。

莫洛托夫问，恩维尔·霍查希望提出哪些问题。莫洛托夫指出，他事先询问此事是为了报告斯大林同志。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从阿尔巴尼亚方面来说，主要问题当然是阿尔巴尼亚对它的南部邻国——希腊的政策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阿尔巴尼亚总的国际地位。其次，他（恩维尔·霍查）希望谈及

^① 恩维尔·霍查与斯大林的会谈是在1946年7月16日进行的。会谈时讨论了阿尔巴尼亚对内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斯大林提出关于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根据其社会成分（其大部分人员是农民）改名为劳动党的问题。

经济和财政问题，其中包括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问题。如果维·米·莫洛托夫愿意听取的话，恩维尔·霍查还打算介绍一下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状况，并指出阿尔巴尼亚在这一领域存在的不足和取得的成就。恩维尔·霍查还想概述一下阿尔巴尼亚的国内局势。此外，恩维尔·霍查还希望讨论有关阿尔巴尼亚军队的组织体制问题。恩维尔·霍查说，他还可以介绍一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的情况，党的领导班子及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准备工作。……

莫洛托夫说，他想提一个有关巴黎会议的问题。正如恩维尔·霍查所知道的那样，我们在收到了进一步的情报之后，已决定在参加巴黎会议的问题上采取否定的立场。莫洛托夫问恩维尔·霍查是否理解苏联、阿尔巴尼亚以及一些友好的巴尔干国家所采取的这一立场。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对于他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阿尔巴尼亚政府认真地研究了莫洛托夫在巴黎的所有讲话。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完全清楚明确的。

莫洛托夫问恩维尔·霍查是否掌握有关于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上将对阿尔巴尼亚或者就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关系问题采取的立场的什么材料。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他不了解任何新的情况。

莫洛托夫说，应当认真注视这一问题。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已经同哪些国家建立了关系。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阿尔巴尼亚同保加利亚建立了关系。此外，就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问题已经同罗马尼亚进行了7~8个月的谈判。阿尔巴尼亚从自己方面已经就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表态，但是罗马尼亚至今仍未做出关于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

莫洛托夫说，罗马尼亚虽然拖延了就此问题做出决定，但是它

最近将会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莫洛托夫问，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之间是否签有条约。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之间在1946年曾经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除此之外，还签有一系列关于开采铁矿的阿-南合股公司、关于修建铁路等问题的阿-南经济协定。

莫洛托夫问：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得如何。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这些关系正在顺利发展和巩固。阿尔巴尼亚人民把同南斯拉夫的友谊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和生命攸关的问题。至于同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关系，则由于南斯拉夫方面的过错，一些合同和协定的执行进行得相当缓慢。他（恩维尔·霍查）觉得南斯拉夫似乎对执行自己签订的经济合同并不很热心。形成的印象是：所有的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经济合同和协定都是在对问题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签订的。因此这些合同和协定的实施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例如，存在着一个关于阿-南合股公司的问题。这是一个对阿尔巴尼亚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阿尔巴尼亚矿井和矿山的发展。但是迄今为止阿尔巴尼亚的自然资源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这些公司还没有开始运作。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缺乏。但是事情还不仅仅在于人员方面。目前尚没有任何一项发展阿尔巴尼亚煤炭或者铁矿开采工业的具体计划。眼下从事自然资源开采工作的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有关部和苏联专家。

对于阿尔巴尼亚来说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关于铁路问题。阿尔巴尼亚政府没有一个明晰的概念：阿尔巴尼亚铁路建设的前景怎样，它们将通往何处，它们的终点在什么地方。曾经计划要修建两条铁路干线。一条干线应当是从都拉斯经由爱尔巴桑和斯特鲁加至斯科普里（南斯拉夫），而第二条干线则是从申吉纳至佩奇（南斯拉夫）。这些问题都同铁托讨论过。南斯拉夫人已经同意在最近的2~

3年内建成这些铁路。但是迄今尚未着手进行工作。

莫洛托夫问，修建这两条铁路干线的目的是什么——经济上的或是战略上的。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都拉斯—斯特鲁加铁路主要具有经济意义，因为在这条铁路经过的地区出产铁和铬。从战略观点来看，这条铁路并不很可靠，因为它是从山区通过的。从申吉纳至佩奇的另一条铁路首先是具有战略意义，虽然它也将被用于经济目的。在这些地区蕴藏有铬和铜。

莫洛托夫问，预计阿尔巴尼亚今年的收成是否良好。

恩维尔·霍查回答说，预料阿尔巴尼亚今年的收成很好，阿尔巴尼亚政府预计能收获200万公担小麦和玉米。

莫洛托夫问，用自己的粮食能否满足阿尔巴尼亚的需要。

恩维尔·霍查做了肯定的回答。恩维尔·霍查说，除了本国的收成之外，南斯拉夫人还同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30万公担的小麦和玉米。

莫洛托夫说，看来还需要就一些问题再进一步进行商谈。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接见问题，莫洛托夫答应将另外通知恩维尔·霍查。

谈话持续了1小时35分钟。

1947年7月15日15时于莫斯科

№09366

斯皮鲁关于其受到阿共政治局审查 与加加林诺夫的谈话记录

(1947年11月19日)

抄送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马立克，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秘密

今天纳科·斯皮鲁主动前来拜访了我。很难把这次会晤称为交谈，说得确切些，这乃是他一个人的独白。

互致问候之后，他一开始直截了当地说，他想谈谈昨天举行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他说，昨天（11月18日晚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举行了有9名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

他说：“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被邀请出席会议，而这样做我完全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利里·贝利绍娃、穆罕默德·谢胡和法迪尔·帕奇拉米——都是新派人物，他们没有卑躬屈膝地在南斯拉夫的压力下低头屈服，他们是南斯拉夫人所不喜欢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未能被邀请出席这次为了使之具有确定倾向而经过十分精心准备的会议的原因”。

这位部长告诉我说：“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人是恩维尔·霍查，他在报告中综述了萨·兹拉季奇所发表的多次意见的主要内容，并完全承认了南斯拉夫的所有指责都是正确的，而把对此应负的全部

责任推到我的身上，其中也提到了法·帕奇拉米和另外某个人”。^①

“我曾经说过，萨·兹拉季奇这些意见的内容并没有全部让我知道，这话我说得没有错。尽管恩·霍查和科·佐泽曾经几次同我谈到这个话题，但是他们对我隐瞒了这样的事实，即南斯拉夫人直言不讳地提出，在阿尔巴尼亚，反南斯拉夫势头的策动者就是我纳科·斯皮鲁。只是听了恩·霍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一点。这对我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用我们阿尔巴尼亚的语言来表达，这就意味着我是一个敌人。”——纳·斯皮鲁这样说。

他向我介绍说，在这次会议上科·佐泽和克里斯托·特梅尔科先发了言。用斯皮鲁的话说，他们当然“是支持报告人的，很显然，这是事先已经决定并准备好了的”。至于政治局的其他委员，纳科·斯皮鲁断定说：“他们谁也不敢说出什么反对已经阐明了自己观点的那些人的意见的话”。

接着他尖锐地批评了恩·霍查和科·佐泽“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

他说：“现在把一切都推到我身上，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是要知道所有由我做出决定的原则问题从来都是得到了恩·霍查和科·佐泽同意的。这些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从来做事都是遵照他们的指示，这并不排除我也有错误，但是这是属于工作中犯的错误。我曾不止一次地向恩·霍查说起过，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那些不正常情况，并且在5~6个月之前就已经提醒过他说，这些不正常情况需

① 南共联盟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的代表萨·兹拉季奇出席了1947年11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上宣读了由铁托签署的南共联盟的信，尖锐地批评了斯皮鲁“反南斯拉夫”的立场。恩维尔·霍查和科·佐泽是11月5日知悉该信的内容的，当时萨·兹拉季奇还向他们做了口头声明，说在贝尔格莱德人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在发展阿南两国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错误的，因为阿共中央过低地估计了两国经济计划一体化的必要性。兹拉季奇还指责说，在阿尔巴尼亚存在着一个隐蔽的反南斯拉夫的阵线，并说出了具体人名。

要加以解决，否则它们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接着纳·斯皮鲁谈到了自己的工作并说，在他工作一年来没有任何过错。

我感觉到，尤其令他难以接受的一点是没有在事前把兹拉季奇的谈话内容全部让他知道，特别是谈话中南斯拉夫指责他本人，为反对他个人而着重事先定下调子的那一部分。

他说，直到昨天之前他都认为问题是在于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但是到了昨天的会议上他才完全明白了事情是关系到他本人的。

在谈话结束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他认为当前恩维尔·霍查以及同他一起的所有其他政治局委员完全听从南斯拉夫的意见，所采取的现行路线是不正确的。^①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临时代办 A. 加加林诺夫

1947年11月19日于地拉那

① 在此次谈话的第二天，即11月20日，恩维尔·霍查在与加加林诺夫会晤时，谴责了斯皮鲁，并向他表达了政治局全体成员改善与南斯拉夫相互关系的决心。随后，加加林诺夫避免了与斯皮鲁的再次会面。于是，斯皮鲁给加加林诺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在政治局会议上即将发言的提纲，并答应要讲述事情的全部细节。但是，第二天，斯皮鲁就当着自己助手们的面自杀了。

№09513

丘瓦欣与霍查关于阿国内政治 形势的谈话记录

(1948年3月16日)

抄送莫洛托夫、佐林，送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绝密

摘自 Д.С. 丘瓦欣的日记

今天恩维尔·霍查同志会见我并与我进行了交谈。会见时科奇·佐泽同志在座。我请求总理向我谈谈他自己对阿尔巴尼亚国内政治形势的看法，并介绍我不在阿尔巴尼亚的这段时间里（1947年8月以来）国内发生的变化。

恩维尔·霍查在强调人民政权继续得到巩固以后说，国内的政治形势完全稳定。为了证实自己这一论断，他列举了前不久举行的人民政权地方机关的选举（1948年2月）以人民阵线的完全胜利而告终，它也是人民民主的胜利。在场的科奇·佐泽指出，选举表明民主阵线在基层威信很高，有些地区几乎100%的选民投票拥护阵线的候选人，恩维尔·霍查将民主阵线在前几次选举运动（1945年12月2日的成立议会选举，1948年2月15日的区、市会议选举）得票率加以对比之后指出，民主阵线候选人的得票率逐步增加，例如，1945年12月2日的选举，民主阵线候选人的得票率占参加选举的全体选民的93.18%，在区会议选举中得票率增加到

97.6%，最近一次选举中已经达到 99.1%。

这位总理在谈到选举进行过程的总形势和居民的情绪时强调指出，在全国范围内情绪高涨，没有出现任何事故。人民高唱歌曲来到选区，友好地投票拥护“我们的候选人”。科奇·佐泽说，“反动派和我们的某些政敌这次不敢抬头”。科奇·佐泽继续说，“如果说在过去在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选举经常伴随着武装土匪的袭击、暗杀和吓唬选民的话，那么在最近这次选举中已经没有这些现象了”。据他说，选举是在平静的氛围中进行的。权力机关和党组织在各地出色地完成了选举运动期间的任务。

据我的交谈者们反映，如果考虑到阿尔巴尼亚现在正经受着严重的困难，加之去年政府对待基本群众——农民的政策上犯了许多政治性错误（1947年5月从政治上看是错误的粮食征购法，地方土地机关没有兑现自己与农民签订的合同义务，错误的收购烟草和经济作物等等政策），那么人民政权在这次选举中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具有典型意义。

恩维尔·霍查在谈到国内总形势时指出，权力机关在消灭继续对当地居民进行恐怖活动的武装匪徒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据他说，现在在整个阿尔巴尼亚，只有不到 150~160 名匪徒，而在 1947 年年初时还有 500~600 名。现在国内已经没有由于政治原因与人民政权进行斗争的重大武装匪徒，现在在北部山区和中部的某些地区，隐藏的主要是刑事犯罪分子。他们由于杀人、盗窃而逃避人民保卫机关的惩罚。至于政治犯罪分子，只是屈指可数，并且在人民中间十分孤立（如迪布拉地区著名的登·埃列齐，登·卡列希等）。科奇·佐泽指出，根据资料，许多政治犯罪分子去年从阿尔巴尼亚逃到希腊，从那里进行反对国家的破坏活动。

似乎为了特别强调稳定的国内形势，科奇·佐泽指出，在阿尔巴尼亚各个时代都存在过的凶杀事件，现在已经绝迹。他列举了以

下数字：1939年，每月平均发生凶杀案件74起，到了1945年，这一数字降低到40~45起，1946年降到20起以下，1947年只有15~17起，今年1月则只有3~5起（也许这里列举的数字需要稍作更正）。他特别强调，在科尔奇省的莫克拉地区，索古时代没有一天不发生凶杀案件，而最近几个月只发生过几起。恩维尔·霍查和科奇·佐泽把出现这一形势的原因归结为基本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群众性的社会团体（青年团和阿尔巴尼亚妇女联合会的地方组织）工作的结果，这些团体已经深入人心，其活动在人民中间愈来愈有影响。

科奇·佐泽就此还指出收缴居民武器运动的丰硕成果。他说，去年居民共向警察机关上缴了数万件各种武器，现在居民每个月都要上缴1000~2000支火枪、步枪和其他武器。这位内务部长指出，居民上缴武器完全没有受到警察和人民保卫机关的压力。科奇·佐泽说，“这一切都说明，我们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已经大大提高。人民再也不用为自己的命运而担心，将保护自己那部分财产的责任完全寄托在警察机关和人民保卫机关身上”。

恩维尔·霍查在谈到经济形势问题时说，人民的公共福利现在已经大大提高。尽管从表面上看，城市的粮食供应还有些困难，但总的来看全国的供应还是有保障的。农民无疑有大量的粮食储备，不仅能够养活城市居民，还可以建立一些储备。这位总理就此指出，1947年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犯了大错误，引起农民对政府的某些不满。在去年的错误中间，恩维尔·霍查列举了1947年5月23日无疑打击了农民生产更多粮食的积极性的有害征购法，收购经济作物，尤其是收购烟草的错误政策。土地机关没有履行自己与农民签订的合同义务，他指出，政府应当向苏联公使表示感谢。还在去年5月，苏联公使就提请总理注意1947年5月23日颁布的法的危害性，结果导致它及时被取消。他接着指出，土地机关“欺骗”

了农民，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它们坚持要求某些地区的农民用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做法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并且签订了承担相应义务的合同，结果又不向农民供应所必须的粮食。还有另一个例子，看上去就像是公开欺侮农民。贸易部的收购部门已经与农民签订了协议，规定了收购他们的烟草的条件（价格、质量、保管条件、运送到指定地点的期限等等）。时间到了，可收购部门就是不收农民的烟草，致使烟草质量降低（不是由于农民的过失），收购部门相应地降低了烟草的价格，并且在某些情况下降低了几倍。“我们机关的这种政策”，恩维尔·霍查说，“没有产生任何好结果。这种政策只能激怒农民，使他们对政府的任何创举产生不信任”。“当然”，恩维尔·霍查继续说，“在所有这些事件中，也有不少是人民政权的敌人的故意破坏”。总理对我提出的有关问题回答说，到新的收获季节之前，城市居民需要6万多公担的粮食，政府打算从农民手中收购。据他说，贸易部目前正在制定措施，以便顺利收购6万多公担的粮食。他指出，实现这个任务的困难是机关没有任何可以信赖的统计资料。他还指出，如果阿尔巴尼亚有关机构能够确定某些地区的收成，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能正确地确定收成，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那就“不会造成中央机关的重大失误”。现在，当同志们都从各地赶来时，发现某些作物的播种面积被大大扩大了，因此也引发了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严重混乱。总理继续说，“不难理解，我们现在必须尽快修改这些计划”（尽管知道在许多城市，其中包括首都在内，粮食的供应经常中断，但我没有料到目前的形势会变得如此严重）。

对此恩维尔·霍查指出，刚刚闭幕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不仅要研究党的建设问题，还得研究国家的经济问题。据他说，在最近一次全会上，来自各地的同志从未像这次如此尖锐地批评“我们的失误”，并且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现在已经成立了

一个专门委员会，委托它研究在全会上提的所有建议，将其归纳后向中央提出有关的决议草案。恩维尔·霍查在谈到中央全会时，不能不提到他称为纳科·斯皮鲁的反党活动。纳科·斯皮鲁多年来一直推行非常隐晦的政策，其目的似乎是要把工人出身的同志排挤出党的领导人之列。恩维尔·霍查列举事例表明，纳科·斯皮鲁企图让恩维尔·霍查与科奇·佐泽争吵，并夸大南斯拉夫方面的错误。据恩维尔·霍查称，纳科·斯皮鲁企图唆使南斯拉夫人反对恩维尔·霍查（纳科·斯皮鲁1946年与南斯拉夫公使杰尔贾的谈话，并将恩维尔·霍查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培拉特全会问题的讲话交给了杰尔贾，恩维尔·霍查在这次讲话中将这次全会所犯的错误似乎推在南斯拉夫人身上；纳科·斯皮鲁企图在去年与基德里奇^①会谈时，唆使南斯拉夫人不信任恩维尔·霍查等等）。同时恩维尔·霍查继续说道，纳科·斯皮鲁在推行自己与党敌对的路线的同时，千方百计显示其亲苏联立场，尽管他在自己亲朋好友的圈子里多次谈到苏联“不好的东西”。据他说，纳科·斯皮鲁去年从苏联回国以后对苏联人，对苏联的集体农庄和工厂反映极坏，声称他在阿尔巴尼亚被占领期间见到的意大利企业，其秩序似乎比苏联的企业好得多。

恩维尔·霍查还列举了纳科·斯皮鲁反党行为的其他例子。尽管据恩维尔·霍查说，纳科·斯皮鲁把他（恩维尔·霍查）当成亲近的人，但他从前并没有发现这些活动。说到这里，恩维尔·霍查开始批评自己，声称对已经发生的一切，他应负主要责任，是他没有及时“认清”纳科·斯皮鲁。“只是到了现在”，恩维尔·霍查说，“当我们用同志式的方法批评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的错误时，我们党内才达到完全的团结一致”。他接着说，纳科·斯皮鲁一案使阿尔巴尼亚党的领导人受益匪浅（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当恩维尔·霍查在介绍

^①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部长会议经济和计划委员会主席。

这一切时，科奇·佐泽极力装出他在所有问题上与恩维尔·霍查一致的样子)。“有关所有这些问题”，恩维尔·霍查说，“我们已经详细通报给联共（布）中央代表彼得罗夫同志，并向他转交了全部必要的材料”。恩维尔·霍查和科奇·佐泽指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清除了像纳科·斯皮鲁这样的分子以后，变得更加坚强，领导班子更加团结。

谈话结束前，科奇·佐泽通报了党员数量增加的几个数字。据他说，目前共有 2.2 万名党员，1.45 万名预备党员，共青团有 3.1 万名团员。

谈话结束后，恩维尔·霍查和科奇·佐泽邀请我与他们共进午餐。我谢过他们，并未对此表示反对。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瓦·丘瓦欣

1948 年 3 月 16 日于地拉那

№09518

普赫洛夫和曼奇哈关于阿共 第八次中央全会的报告

(1948年5月15日)

绝密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八次中央全会于1948年2月26日至3月2日举行。全会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见我们的情报资料）指责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反南斯拉夫活动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一指责首先针对前经济部长、计划委员会主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纳科·斯皮鲁。八中全会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决议。

决议谴责了纳科·斯皮鲁反人民的敌对活动，对他的主要指控是反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从事反南斯拉夫的活动。决议指出，纳科·斯皮鲁不遗余力地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独立地、不依赖南斯拉夫的经济”而发展。他曾告诉人民：“没有南斯拉夫，我们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经济计划”。决议将纳科·斯皮鲁的这些对阿南关系的看法视为资产阶级、沙文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正如决议中所指示的那样，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拥护政治局采取的措施，将受纳科·斯皮鲁的敌对影响并与他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所有人员调离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中央全会撤销了阿尔巴尼亚军队参谋长穆罕默德·谢胡和人民青年组织领导人利里·贝利绍娃的职务，并将她开除出党。

中央全会决议制定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最近的任务。首先是注意“保持和继续巩固党的领导和党内的团结”，更加紧密地加强与南斯拉夫的联系和合作。全会指出，阿尔巴尼亚是民主阵营最薄弱的环节，帝国主义者企图在这里挑起国际复杂事态，决议接着提出了党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它们是：巩固党的领导机关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加强对工会活动的关心和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环境。

中央全会还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关于“补充和改变共产党中央和政治局组成”的建议（在我们的参考资料中已经报告过）。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全会的这一决议是依据从南斯拉夫得到的指示而通过的。决议草案是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驻阿尔巴尼亚全权代表萨·兹拉季奇的参与下起草的。

И. 普赫洛夫^①

И. 曼奇哈^②

1948年5月15日

① 普赫洛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干部。

② 曼奇哈，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干部。

№09505

莫洛托夫与霍查关于阿南关系
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8年6月24日)

机密

摘自莫洛托夫的日记

相致问候之后，霍查感谢莫洛托夫的接见，他说他知道最近莫洛托夫有多么忙。

莫洛托夫问霍查，是否认为召开八国代表会议是及时的。^①

霍查做了肯定的回答。

莫洛托夫又问霍查关于八国外长声明草案的意见。

霍查说他未能及时了解文件的内容，因为这份文件当时没有译成法语。

莫洛托夫问，现在有没有翻译。

霍查回答，他已经得到了译文，声明的草案很好。

莫洛托夫说，代表大会召开得很仓促，是因为需要很快采取行动，连准备工作的时间都没有，尽管如此也不应该出现严重的错误。

① 1948年6月23~2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代表在华沙举行了讨论德国问题的外交部长会议。

霍查说，他想和莫洛托夫谈谈阿尔巴尼亚的情况。

联共（布）中央的信^①使阿尔巴尼亚避免了重大的危险。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行为，使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曾陷入重大危险之中。

莫洛托夫指出，这是确实的。

霍查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完全信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铁托。他们曾坚信不疑，这个立场是符合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向联共（布）中央通报过自己的立场。霍查提醒说，他第一次和莫洛托夫在巴黎会面时就讲了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还在霍查到莫斯科时讨论过。

霍查说，联共（布）中央的信使阿尔巴尼亚有可能理解南斯拉夫共产党实际上的路线，为了便于推行这个路线，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首先极力分裂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破坏一些领导人的威信。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很年轻的，领导干部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国内实际上没有工人阶级。但是党也积累了不少的斗争经验，战争中为了阿尔巴尼亚的解放，党英勇斗争并无限忠实于苏联。党也犯过错误，但霍查说，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在战争时期，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间没有来往。实际上，波波维奇^②在阿尔巴尼亚时，是阿尔巴尼亚人把他从德国人那里解救出来的。波波维奇在促进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发展方面给

① 指联共（布）中央 1948 年 3 月 27 日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信，该信分发给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国成员。参见本档案集第 22 卷“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专题 No01626 文件。

② 米拉丁·波波维奇，南共中央候补委员，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委书记，1941 年 11 月任南共中央驻阿尔巴尼亚代表，1944 年 9 月回国。

予了帮助，但他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正式代表。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前夕，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派出了自己的正式代表。当时南斯拉夫人说，这个代表的任务首先是帮助阿尔巴尼亚人组建政府。事实上，他的目的是换掉过去党的领导人，挑选出对南斯拉夫合适的人。南斯拉夫人制造了一种印象，似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犯了一系列错误，包括他们责备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力图不依赖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行动。由于科索沃问题，南斯拉夫人还指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有沙文主义。

霍查接着说，他认为南斯拉夫人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阿尔巴尼亚解放前夕，组成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是按这种办法，这样正好符合了南斯拉夫人的打算。南斯拉夫人可以造成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层的分裂。南斯拉夫人试图达到让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只按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行动。阿尔巴尼亚人曾与南斯拉夫人紧密地合作。

阿南关系的转折点是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莫斯科之行。霍查说，当他从莫斯科回来，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就困难了。南斯拉夫人开始指责阿尔巴尼亚人改变了政策，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执行反南斯拉夫的政策。同时南斯拉夫人诉诸恫吓的手段。他们指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听说在阿尔巴尼亚的好多机关都撤掉了铁托的画像。在与南斯拉夫代办的谈话中，霍查当时就声明，这种指责没有任何根据。

南斯拉夫人甚至开始攻击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政策。还在霍查莫斯科之行以前，阿尔巴尼亚人向南斯拉夫人递交了自己的五年计划。南斯拉夫方面很久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收到答复，内容是对计划进行了最激烈的批评。南斯拉夫指责阿尔巴尼亚追求国家经济独立政策。同时还说，南斯拉夫同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同保加利亚的关系，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要好。

南斯拉夫人公开对纳科·斯皮鲁表示不满。同时暗示，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行为让人感觉像是敌人的帮手。

这样就形成了艰难的局面。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方面的批评明显是不友好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没有被看做是独立自主的党。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的情况也变得相当复杂。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事件——纳科·斯皮鲁的自杀。

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印象是，阿尔巴尼亚丧失了一个像纳科·斯皮鲁这样的好的工作者和苏联的朋友。”

霍查说，看来纳科·斯皮鲁是南斯拉夫人阴谋的牺牲品。但霍查认为，纳科·斯皮鲁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

莫洛托夫表示，这有可能。

霍查继续说，如果就南斯拉夫人的阴谋而言，纳科·斯皮鲁的虚荣心是可以原谅的。霍查说他自己此时犯了错误，接受了南斯拉夫人的影响，他相信了南斯拉夫人的批评。所有的情况，包括由科奇·佐泽引入的观点，导致的后果是霍查对纳科·斯皮鲁的敌视态度。纳科·斯皮鲁的自杀正好证实了这种态度。

莫洛托夫表示，纳科·斯皮鲁的自杀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这不是共产党员的行为。莫洛托夫指出，当时南斯拉夫人向他（霍查）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霍查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南斯拉夫人人为地激化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指责争取自给自足是荒谬的。

莫洛托夫说，如果阿尔巴尼亚想争取进步，它就应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包括经济关系。

霍查说，南斯拉夫人不希望这样，他们想对阿尔巴尼亚搞殖民政策。

莫洛托夫说，这个想法完全对。南斯拉夫人就是在对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上实行殖民政策。

霍查为证明自己的说法，列举了以下事实。为提高石油开采量，南斯拉夫有责任提供给阿尔巴尼亚必需的设备，但他们没有履行这个责任。当阿尔巴尼亚为此与南斯拉夫交涉时，南斯拉夫人却说，阿尔巴尼亚人没什么可担心的，因为如果石油开采少一些，受损失的只是南斯拉夫人。霍查说，南斯拉夫人只看到南斯拉夫的利益，他们不想了解，阿尔巴尼亚本身也有兴趣扩大石油开采，发展自己的经济。

莫洛托夫请霍查原谅，不能继续和他谈话了，因为要去参加编委会的会议。

告别时，莫洛托夫说，阿尔巴尼亚应站在正确的道路上，摆脱南斯拉夫人不好的影响。莫洛托夫说，在南斯拉夫人中也有好同志。

谈话进行了30分钟。

记录 维加索夫

1948年6月24日于华沙

No 09524

丘瓦欣与佐泽关于在阿共一大发言 进行自我批评的谈话纪要

(1948年11月5日)

抄送莫洛托夫、佐林，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绝密

摘自 Д.С. 丘瓦欣的日记

今日上午11时，我应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前任组织书记、阿尔巴尼亚政府前任内务部长科奇·佐泽中将的约请会见了她。

这位前中央组织书记说，他找我是想就如何更好地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征求我的意见。科奇·佐泽说，如果有机会，他打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承认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以及在这次之后举行党的骨干分子会议上对这些错误的批评。据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讲话草稿，对自己过去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担任内务部长期间所进行的全部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党对他过去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撤销了他在党内和政府内的所有领导职务，无疑是正确的。他完全同意这些决定，并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一点。据科奇·佐泽说，他同时还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揭露自己在1944年10月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培拉特中央全会期间以及在这次全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托派

领导人的联系。科奇·佐泽没有忘记说与托派分子伏克曼诺维奇·泰波^①自1943年起就建立了联系，他对泰波是言听计从的。据科奇·佐泽说，他曾告诉伏克曼诺维奇·泰波许多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部的情况，阿尔巴尼亚某些领导人的行动以及他认为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米拉丁·波波维奇的工作中的错误。“正是从这个时候，即我同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初次相识起”，科奇·佐泽说，“应当认为我就开始堕落了”。我的交谈者泪流满面，愤怒地开始谈起南斯拉夫驻阿尔巴尼亚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活动。他重复了早就为人所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驻阿尔巴尼亚代表韦利米尔·斯托伊尼奇在培拉特全会上的阴谋^②，还谈到南斯拉夫公使约瑟普·杰尔贾的阴谋。据科奇·佐泽说，公使多次唆使他反对恩维尔·霍查，与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工作人员争吵。在这方面，科奇·佐泽还谈到自己1948年3月10日在苏联代表团授予恩维尔·霍查苏沃洛夫一级勋章举行的招待会上与杰尔贾的谈话。科奇·佐泽说，招待会的正式部分结束之后，杰尔贾与我进行了这样的一场谈话。杰尔贾说，苏联驻地拉那的代表怎么能这么办事呢？为什么只授予恩维尔·霍查一人勋章，而在南斯拉夫，苏联的勋章却授给了党和政府的许多领导干部呢？据科奇·佐泽说，他反驳说，苏联政府向恩维尔·霍查授勋，目的是以此表彰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军队，以此承认阿尔巴尼亚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共同事业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等等。杰尔贾对此似乎回答说，“你们都是工人，不理解这次授勋的意义，你们应当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科奇·佐泽承认他过去在担任中央组织书记和政府内务部长时期全部的活动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特别是1947年底到1948年

① 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时任南斯拉夫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② 参见本卷本专题№09271文件。

初，这种活动间接反对了苏联，但又指出他将永远忠于苏联。无论有人多么起劲地给他戴上反苏分子的帽子，但他从来不会同意这一点。“我准备用自己的全部生命”，科奇·佐泽十分激动地说，“表明我不是反苏分子，我自己也从未反对过苏联”。

听完科奇·佐泽的话以后我回答说，由于科奇·佐泽所理解的原因，我在关于他如何准备自己在党的代表大会的“自我批评”发言稿问题上不能向他提出任何建议。但我指出，可以这样说，正如党的骨干分子会议所表明的那样，党要求您帮助党查清您和其他中央委员所犯的全部错误。我认为，党需要您不仅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从根本上分析并亲自对这些错误进行一定的批评。党现在需要您这位前领导人之一，帮助党制定迅速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最后我还说，必须注意：在分析您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在党如何评价这些错误的问题上，我认为除了您本人之外，其他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科奇·佐泽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并不是为了征求我的意见而来，而是“简单地，同志式地想了解我对他在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实质性的问题的看法”。在科奇·佐泽说了这个意见之后，我没有就他发言的实质性问题说什么。

随后科奇·佐泽说，按照有关交换情报的规定，他想将自己在大会上发言的副本寄给我。对此我表示同意。

鉴于路透社最近援引贝尔格莱德的消息，说对地拉那的事态和阿尔巴尼亚“讨伐”铁托支持者的情况谈得很多，我问佐泽是否了解英国在这方面的宣传，如果了解，他怎么看待这些宣传。科奇·佐泽回答说，他是从政治局委员贝德勒·斯巴秀那儿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在与贝德勒·斯巴秀谈话之后，他已经向《团结报》编辑部准备了一封公开信的草稿。据科奇·佐泽说，在这个已经准备好的稿子里他尖锐地批判了英国人的宣传，痛斥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分子的背叛活动，声明自己完全同意党和政府关于他的问

题的决议。

谈话到此结束。科奇·佐泽沮丧地离开了苏联使团大楼。谈话时 М.Ф. 格拉兹科夫同志在座。

1948年11月5日于地拉那

№095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阿共领导人 立场的评价给丘瓦欣的电报

（1948年11月20日）

抄送莫洛托夫和佐林。

绝密

关于丘瓦欣同志的电报

由于丘瓦欣同志发来关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电报，
现给他复电如下：

“地拉那（苏联）公使：

我们认为您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工作的评价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您将该党的领导人揭露科奇·佐泽反党集团的行为视为‘野蛮’、‘粗暴’等等也是完全不妥当的，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您所提议的拟向恩维尔·霍查所提的建议也是不能接受的。^①

上级机关”

1948年11月20日于莫斯科

① 在1948年11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开展了对科奇·佐泽及其支持者揭露和批判。丘瓦欣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中认为，批判带有“尖锐的、残酷的性质，直至要求将集团的成员交付审判，永远将其消灭”。丘瓦欣请求莫斯科批准他与恩·霍查会晤，以便提请他注意必须制止反对科奇·佐泽及其支持者的过火行为。随后，便收到了这封电报，并被召回莫斯科述职，直接领受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训示。

№09527

丘瓦欣与尼沙尼关于佐泽的错误及 阿南、阿苏关系的谈话纪要

(1948年12月7日)

抄送莫洛托夫、佐林，送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归档。

绝密

摘自Д.С.丘瓦欣的日记

今日(12月7日)10时，应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议会主席团主席奥梅尔·尼沙尼博士的请求，我在使馆大楼会见了她。

奥梅尔·尼沙尼首先说，他早就想会见苏联公使。今天，他想要在“友好的气氛中谈谈自己对阿尔巴尼亚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态的看法”。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首先从党的代表大会问题谈起。奥梅尔·尼沙尼在对党的代表大会的工作做了总的正面评价之后说，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满怀希望，政府将采取一些实际措施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他说，自从揭露了由科奇·佐泽领导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非法行动以来，人民大大地喘了一口气，感到某种放松，据他说，事态曾经发展到人们已经不相信自己，对每个人都进行监视，人们不愿意与自己的亲朋好友聚会，害怕“无孔不入的科奇·佐泽的警察”怀疑自己。奥梅尔·尼沙尼说，国家安全机关和科奇·佐泽不奉公守法，忘记了宪法，现在这一点已经不是秘密。他们不提出任何指控就把人关进监狱，连续几个月关起来既不审判，也不侦查，而

是搞逼供信。奥梅尔·尼沙尼指出，事情已经发展到采用真正的强盗手段。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失踪”，谁也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说到这里，奥梅尔·尼沙尼举了大学生哈季比的例子。据他说，此人被用真正的强盗手段所劫持，无疑是没有经过审判和侦查就被杀害了。奥梅尔·尼沙尼接着谈了内务部对私人通信的检查。他并不掩饰对他的私人通信也进行了检查，他相信还对恩维尔·霍查的私人通信也进行控制等等。奥梅尔·尼沙尼说，这一切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每一个诚实的爱国者都会对自己提出一个合法的问题：“难道人民民主就应当是这个样子？”尽管现政府是由于全体人民在反对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而执政的，但他的无视这些人民，不倾听他们的声音，简直是脱离了他们。奥梅尔·尼沙尼说，像科奇·佐泽这样的人，一旦国家和他们这些领导人遇到了新的威胁，将被迫再次向人民求助。他继续说道，应当尊重人民，应当时刻保持同他们的联系。阿尔巴尼亚人民尊敬那些奉公守法，行动有法律依据的领导人。奥梅尔·尼沙尼指出，我国人民最近几年所经受的一切，是国家历史上的黑夜。这种无法无天的现象，即使在“国民阵线”时期也不多见。

接着，奥梅尔·尼沙尼谈到了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他说，从戈戈·努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中，他同全国人民一样，了解到许多新的内容。据他说，戈戈·努什在代表大会上清楚地提出了南斯拉夫人大力在阿尔巴尼亚推行殖民制度的问题。他说，这一切讲得都不错。但现在人民要问：“这个戈戈·努什部长从前干什么去了？！”据奥梅尔·尼沙尼说，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忘记了自己的尊严，在普通阿尔巴尼亚人的心目中，几乎把铁托当成了需要顶礼膜拜的神。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开始忘记，我们也有自己的祖国，我们也应当热爱和尊敬它。只有通过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才能真正地热爱自己的朋友。

奥梅尔·尼沙尼说，我想，尤其要这样热爱和尊敬苏联。我们应当向那些实际上并不喜欢苏联，但表面奉承和尊敬苏联的蛊惑家宣战。“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爱苏联和苏联人民？”奥梅尔·尼沙尼激动地说，“因为他们视苏联人为英雄，在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殊死搏斗中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因为苏联人民兄弟般地帮助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不仅送来了面包，各种物资和专家，还在国际会议上保护了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的利益；还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民想沿着苏联各族人民的足迹前进”。奥梅尔·尼沙尼继续说，我们需要苏联和莫斯科的经常援助，不希望最近几年在阿尔巴尼亚出现的令人痛心的错误和无法无天的现象重演。他指出，现在大家都承认，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性文件，那么阿尔巴尼亚的形势将会一如既往。奥梅尔·尼沙尼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之前，我们经常需要苏联的援助和建议。

奥梅尔·尼沙尼在谈到阿尔巴尼亚政府组成最近发生的变化时说，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望的好人，在与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人进了领导班子。这是我们的领导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开始在实际中实现党的代表大会所表达的愿望的标准。

我认为没有必要就奥梅尔·尼沙尼所提到的问题进行争论。在谈话过程中只提了几个建议，奥梅尔·尼沙尼也立即表示同意。

谈话结束时奥梅尔·尼沙尼要求我向他解释几个俄文单词的意思，这是他在学习俄文过程中遇到的（奥梅尔·尼沙尼几个月前开始学习俄文，现在已经能够自由地读比较复杂的俄文课文和解释一般的问题）。

谈话到此结束。

苏联驻阿尔巴尼亚公使 Д. 丘瓦欣

1948年12月7日于地拉那

【专题说明】

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及其后果

(1945年11月至1949年9月)

本档案选集第22卷中已有一组关于苏南冲突的文献，这里收集的有关战后苏南关系的18件文献，是上一组专题的继续与补充。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有关1948年2月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谈和接触的文件。鉴于1947年9~10月为在欧洲共产党内部形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共产党情报局业已成立，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仍然各行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经苏联同意便采取行动，斯大林极为不满和愤怒。莫斯科命令保、南领导人立即前来会谈。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与前来的保、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对他们进行了毫不客气的严厉批评。在苏联的要求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分别与苏联签订了协议，保证今后凡遇到涉及双边利益的重要国际问题，必须同苏联进行协商。这次会谈及其结果是引起南斯拉夫最终与苏联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我们尚未找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苏方记录。所幸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档案的解密，使人们得以看到当年南共领导人吉拉斯和保共领导人科拉罗夫的记录。为了显示这次会谈的过程，我们选刊了这两份文件。尽管两个文件所记录的详略各有不同，但可以看出，基本内容没有太大差别。会谈后，季米特洛夫表示了对

斯大林的臣服，而铁托却对这次会谈以及此后卡德尔与莫洛托夫的会晤结果极为不满。为了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在这里也选译一些有关南共领导人内部往来电报的南斯拉夫档案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铁托对莫斯科的批评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这就导致斯大林决定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其中包括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批判南共，以迫使铁托就范。南斯拉夫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反而邀请欧洲各国共产党参加南共本身的代表大会。对此，莫斯科通知东欧各党不得出席南共的会议，并决定在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对南共进行缺席审判。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冲突由此公开化，并开始走上不同的道路

为了便于读者对档案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高增训、岳书幡、徐锦栋、吕允连、张廷文、钟平和、陈新华、杨克胜、张木生、方琼、何孟良、刘力、强德正)

No 09241

丘瓦欣关于斯洛文尼亚局势和新政府 组成原则与卡德尔的谈话纪要（摘录）

（1945年11月29日）

抄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归档。

秘密

在铁托元帅的招待会上我遇见了卡德尔^①，他在做了手术之后刚刚从卢布尔雅那返回贝尔格莱德。我知道卡德尔曾专心致志地从事斯洛文尼亚大选的筹备工作，所以我请他介绍一下斯洛文尼亚此次大选的结果。

卡德尔说，斯洛文尼亚此次之所以有较大比例的选民没参加投票，其主要原因在于斯洛文尼亚的领导人忽略了反动势力反对人民阵线的斗争，在卢布尔雅那和各地方的斯洛文尼亚领导人过分地相信自己肯定会胜利，盲目乐观，在竞选运动期间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由于这种盲目乐观、一味自信，在斯洛文尼亚的主要地区之一（马里博尔）有一些十分可疑的人混进领导层，而且其中有些人后来被发现竟然是外国直接派遣来的间谍。选举委员会机构人员不纯，而在马里博尔州各选举委员会竟然全部掌握在反动势力和同外国间谍机关有联系的人手中。对于这些人同外国间谍机关有直接联系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怀疑。例如，在举行选举那一天，即

^① 爱德华·卡德尔，时任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

11月11日，反动势力在选民中曾大力散布流言说选举将不举行，肯定会延期，在这一天将发生英国人发动的武装干涉，因为据说英国人将不准许进行这次选举。在进行这种宣传的同时，在南斯拉夫—奥地利边境（英国人占领区）出现了蓄意的部队调动，发生了挑衅的射击等等。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存在一个南斯拉夫反动势力（在某些盟国的帮助下）事先制定的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如果不能使选举无法进行，起码也要对选民加以恐吓，努力降低投票率，从而争取增加投“空白票”者的数量。据卡德尔称，反动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计划，如果说阻止选举的进行未能成功的话，那么在马里博尔选举区投“空白票”者的比例不仅在斯洛文尼亚，而且在全南斯拉夫也是最高的。卡德尔指出，这一比例竟高达40%，这无疑是影响到了整个斯洛文尼亚投票的总的结果。卡德尔说，目前正在纠正错误，而许多间谍已经被揭露出来并被关了起来。卡德尔说，在11月11日之后，在斯洛文尼亚已经揪出并关押了200多同外国间谍机关有联系的人。

卡德尔认为，尽管在11月11日的选举中遭到了这种相对的失败，但就整体而言斯洛文尼亚人民阵线毫无疑问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政治胜利。卡德尔说：不但如此，而且这种情况还表明，在斯洛文尼亚，人民阵线实际上是由一个政党——共产党组成的，因为在形式上参加人民阵线的其他政党，首先，其成员人数甚少，其次，都不拥有多少令人重视的政治实力，而且没有群众基础。现在，除了共产党人以外还有一些作为单独个人的社会党人加入了人民阵线，这些人在加入人民阵线的当时就宣布说，他们是以个人身分加入人民阵线的，不代表任何政党（指目前侨居意大利的托帕洛维奇的社会党残渣余孽）。加入阵线的还有一些基督教民主党人，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共产党人。卡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斯洛文尼亚的大选中出面的不是人民阵线而是共产党，结果大概也会是一模一样。

卡德尔说，之所以是这样一种情况，其原因是在于选民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共产党在居民中的巨大威望。……

3. 我请卡德尔介绍一下政府关于立宪会议工作的计划。在12月1日议会主席团选举之后，政府形式上将提出辞职。铁托将立即着手组织新的政府。未来的政府在组成人员方面将比以前少一些，因为预定要取消一系列部。其中，将取消负责各联邦事务的部（6个部）、教育部，采矿工业部按照新的方案应当同重工业部合并，而林业部则应当同农业部合并（森林工业将转归工业部），同时予以取消的还有社会保障部，它的职能将转由各联邦共和国相应的部门负责。

我问，参加人民阵线的个别政党在政府中将有哪些代表。卡德尔回答说，他们将争取做到让所有参加人民阵线的政党都有代表参加政府。其中，他们打算邀请农民党的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共和党的费拉多·西米奇（斯塔诺耶·西米奇的兄弟）参加政府。卡德尔指出，外交部长一职的问题虽然尚未最后决定，但铁托目前打算让斯塔诺耶·西米奇出任。

我询问了议会讨论和通过新宪法文本的程序问题，卡德尔说，现在的宪法草案还只是个草稿，还需要进行认真的推敲。在这次的议会会议上，预定要选举出一个将负责对宪法草案最后定稿工作的宪法委员会。在此之后，宪法全文将提交全民讨论。至于最后通过宪法文本，看来不会早于1月份。

我对卡德尔向我提供的情况表示了谢意。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参赞 Д. 丘瓦欣

1945年11月29日于贝尔格莱德

№09333

莫洛托夫关于向铁托介绍联共（布）中央
给法共中央信件给拉夫连季耶夫的指示

（1947年6月7日）

秘密

南斯拉夫

拉夫连季耶夫同志

今由莫舍托夫同志给您带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副本。

请借机向铁托同志本人介绍信件内容。铁托可以亲自摘记此信，但原件需还给您本人，而您则必须立即将其销毁。如果铁托提出某些意见，请您将关于此事的报告通过收到此信的同样途径呈送莫斯科。请确认此信收到。本指示执行后请电告。

维·莫洛托夫

1947年6月7日于莫斯科

附 件

致法国共产党中央

多列士同志

亲爱的同志！

法国最近发生的政治事件令联共（布）中央担忧，由于这些事件法国共产党人已经被政府所排斥。^① 苏联工人多次请求我们对于法国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法国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和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转变使苏联的工人阶级感到担心，这些巨变的后果使他们痛心。由于缺乏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很难给予他们以明确的答复。法国报刊上出现的报道，既矛盾，也不全面，因此不能给予任何明确的说明。

许多人认为，法国共产党是与联共（布）中央商议过自己的行动的。你们自己清楚，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联共（布）中央完全没有料到你们所采取的步骤。从所有这一切中你们自然会清楚，我们多么需要你们的情报资料，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法国业已形成的新的局势。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请您向我们通报信息。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联共（布）中央书记 日丹诺夫
1947年6月2日

^① 指1947年5月法国共产党人因反对马歇尔计划被排挤出政府的事件。

№05546

**拉夫连季耶夫关于铁托在南人民阵线
第二次大会上讲话向莫斯科的报告（节录）**

（不早于1947年9月27日）

……是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是作为国际政治因素的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这是十分明白的事实……但是，铁托对苏联在这一斗争中所给予南斯拉夫的帮助、苏联对整个解放斗争的作用却只字未提。……显然，之所以会有这些吞吞吐吐的说法，主要是铁托只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南斯拉夫的解放过程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变革过程，因而具有民族局限性。……

A.И. 拉夫连季耶夫

№ 11662

斯大林关于阿尔巴尼亚局势给 铁托的信（节录）

（1947年12月23日）

……根据您的建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同波波维奇同志^①就阿尔巴尼亚问题谈了两次话。由于在这两次谈话中发现了新问题，所以我们希望您最好能派一位负责同志来莫斯科，可能的话，就派吉拉斯^②或其他最了解阿尔巴尼亚局势的同志来。我准备满足您的所有愿望，但是我需要正确地了解这些愿望。

致同志式的敬礼！

约·斯大林

1947年12月23日

① 波波维奇，时任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

② 米洛凡·吉拉斯，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

№11663

苏联领导人关于南向阿尔巴尼亚派遣
军队问题给铁托的电报（节录）

（1948年2月1日）

铁托同志：

从您同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您认为只要与苏联有一个互助条约，就可以不仅不同苏联协商便向阿尔巴尼亚派遣自己的军队，而且甚至于事后也不向苏联通报这一情况，您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现向您通报一事：苏联政府是从苏联代表同阿尔巴尼亚工作人员的私人交谈中完全偶然地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决定派遣贵国军队去阿尔巴尼亚的消息，苏联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常的。但是，如果您认为这种做法是正常的，那么我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声明：苏联不能同意让苏联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当然应该明白，作为南斯拉夫盟国的苏联，不会对南斯拉夫政府事前未同苏联协商，甚至也没有向苏联政府通报而采取的这种行动的后果承担责任。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向我们通报说，您已经停止了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南斯拉夫军队，此事我们已获悉。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两国政府在对双方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为了避免误会，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消除这些分歧……

1948年2月1日^①

^①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发报人。

№11664

拉夫连季耶夫关于铁托对苏联来电反应
给苏联领导人的报告（节录）

（1948年2月1日）

……今天已将您的电报转交给了铁托。铁托把电报读了两遍后极为激动地说，真没料到苏联政府把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要。他承认他犯了错误，应该事先同苏联政府磋商，而且今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将进行磋商。他清楚反动派会把这种不正确的对外政策步骤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南斯拉夫的一个师将不进入阿尔巴尼亚……

拉夫连季耶夫

1948年2月1日

№11665

**莫洛托夫关于要求南共领导人访苏
给铁托的紧急电报**

(1948年2月2日)

我们认为，我们同您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鉴于紧张的国际形势，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在莫斯科举行非正式会议来交换意见的办法消除这些分歧。我们请求南斯拉夫政府派两至三名负责代表前来莫斯科交换意见。

同时还邀请保加利亚政府的代表前来。

抵达期限不晚于2月8~10日。请告知您的意见。

莫洛托夫

1948年2月2日

№08496

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 会谈的笔记（摘录）

（1948年2月10日）

莫洛托夫：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分歧：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条约；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记者的谈话；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

（1）错误在于同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生效之前签订了保—南条约，而且是无期限的。

保、南两国政府以自己的匆忙行动加强了英、美国内反动分子的地位，给他们提供了为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而加紧入侵希腊的借口。苏联政府应该提出警告的是，苏联不可能对没有同苏联协商就签订如此重大的条约承担责任。

你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而行动却相反，没有预先告知我们。这样的态度是错误的和不能允许的。

（2）我们觉得，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迷恋于记者招待会和发表谈话，这样就为记者关于某些不该谈论的问题向他挑衅提供了借口。谈话中阐述了走得太远并没有打算同任何人协商的计划，还提出联邦或邦联的问题、关税同盟问题，而且把波兰和希腊也包括进去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没有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谈论了上述各种问题。这在实质上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也是错误的。这就使得那些筹划建立西方集团的人的事情变得容易了。所以，根据党的政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应该受到警告处分。

您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建立联邦或邦联的讲话看来是有害的，给新民主国家造成了损害，而使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轻松。最有害的和不能容忍的是关于关税同盟的讲话，因为这可以理解为它包括了很快就将同这些国家签订互助条约的苏联。^① 很难理解的是，什么东西促使您在记者招待会上作如此不加考虑的声明。

我们和波兰的同志谈话时，他们说：“我们想，这是莫斯科的意见。”大家都这样认为，既然季米特洛夫和铁托提到了一系列国家，这肯定是根据苏联的意见谈的。实际上，波兰的同志说，他们反对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观点，并认为他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因为大家都认为——无论朋友，还是敌人——这是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这绝对是不正确的，以后也是不能允许的。

季米特洛夫的解释无济于事，甚至会使问题更加混乱。^② 从他那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前干涉同塞尔维亚的关税统一的是德国，而现在是苏联。

季米特洛夫：我们不是这么想的。

斯大林：您作为政治活动家，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想法，而应该想到别人会从您的讲话中得到什么。（科拉罗夫^③：我们想，您甚至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税同盟。）我们对南斯拉夫

① 1948年2月4日、2月18日、3月18日，苏联分别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

② 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对此，季米特洛夫首先以保通社1月29日声明的形式，然后又在2月2日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公开表示接受批评。他还把保通社的声明寄给了苏斯洛夫，让他转告斯大林，相信他与苏联立场将保持完全一致。

③ 科拉罗夫，瓦西尔·彼得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自1945年历任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主席、临时总统、部长会议主席等职。

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不仅不会反对，而且恰恰相反。

莫洛托夫：贝奈斯^① 的报纸迫不及待地写道：“季米特洛夫提出了共产主义计划，现在就让捷克共产党人来回答”。另一方面，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这种立场是与九国共产党宣言相矛盾的。

斯大林：您对记者的谈话使注意力离开了内部问题，谈的不是九国共产党会议上所谈的内容。

莫洛托夫：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以后都是不可允许的。

(3) 我们意外地得知，你们想在1月底将一个南斯拉夫师开往阿尔巴尼亚，以共同保卫边界。阿尔巴尼亚人说，他们确信，这件事是征得我们的同意后才干的。

据此应该得出结论，我们对阿尔巴尼亚局势的评价是不同的。不应该对这类分歧保持沉默。我们应该就此问题公开商谈，以便让人看出你们是如何评价局势的。我们认为，将来对此类问题也不应该忽视。有分歧就需要搞清楚，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就应该说出来并加以讨论。如果对这类问题没有进行协商，就不应该采取行动。这是为了事业和我们相互间的协议。

将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应该使自己和避免这类声明的危险。

季米特洛夫：我承认自己对布莱德谈判^② 所犯的错误，对记者的谈话也同样是错误的。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防御能力，我们必须同其他新的和民主的友好国家合作。

斯大林：您是想标新立异。波兰人和捷克人在嘲笑您的联邦。请您问问他们，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联邦？

① 爱·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② 1947年7月底季米特洛夫访问南斯拉夫，8月1日南保在布莱德签订了包括边界、贸易、战争赔款等一系列问题的条约。会谈后季米特洛夫声称，建立南部斯拉夫人联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季米特洛夫：这是有害的，实质上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旨在反对想利用声明来反对我们和苏联的那些人。这是一种情绪。这样的宣言将来不会再有了。

斯大林：我们相互之间不理解，而你们竭力在隐瞒这一点。

莫洛托夫：这是严重的分歧，不是小事情。

斯大林：您是一位老政治家，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也可能您有另外的看法，但您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需要如此频繁地与记者谈话。您总是想标新立异，想惊动全世界。您之所以这样做，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总书记，能向共产党的报纸发表谈话。您助长了美国的反动派，您的目的是使社会舆论相信，如果成立西方集团，美国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因为在巴尔干存在的不只是那一个集团，还有一个关税联盟。当前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前的斗争。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那里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因为，美国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强国。美国政府的首脑不是一些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真正的金融寡头，他们仇恨我们到了可怕的程度，一直在寻找对我们进行破坏的借口。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进步势力提供论据的话，那些大财团就会在大选中失败。如果我们为反动派提供精神食粮，那我们就帮助了大财团。美国政府处在大选前夕，正在担心选举结果。而如果这些大财团重新进入政府，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和我们的行动过错造成的。他们将会说：“你们建立的不仅是一个集团，而且是将许多国家联合在一起——反对谁？”您为什么需要这么一个集团？最后，如果是你们自己想联合在一起，那何必就此问题掀起这样一场喧嚷？您或者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是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那样被蒙蔽了。您这样干究竟为了什么？您为什么要减轻您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敌人的负担呢？

再来谈谈阿尔巴尼亚问题。南斯拉夫同志多么容易就解决了这

个问题！战争期间，三个同盟大国宣布阿尔巴尼亚独立，并说它们将支持独立^①。在反动派和民主力量斗争的所有环节中，阿尔巴尼亚这个环节是我们最薄弱的地方。阿尔巴尼亚还没有被接纳加入联合国，英国人和美国人不承认它^②。那里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再没有像这样薄弱的地方了。只有阿尔巴尼亚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律保护。如果铁托向那里派去一个师，或仅仅一个团的话，这不可能瞒住美国和英国，它们就会开始喊叫说，阿尔巴尼亚被占领了。难道阿尔巴尼亚公开请求南斯拉夫予以帮助？那时，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坏蛋就会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的角色。除了无知的人以外，还有谁能够坐视形成一个明显靠不住的阵线呢？现在需要的是加强组织阿尔巴尼亚的军队，为其派去教官，提供武器装备。在此之后，如果阿尔巴尼遭到进攻，它应该向南斯拉夫请求援助。否则，南斯拉夫就像是占领另一个独立国家的国家。那时完全可能出现武装干涉，也会出现美国的舰艇和基地。这对美国来说将是最方便和最有利的借口。当投入战斗的时候，应该建立对于自己有利的战线，而在这里简直就是亮出自己的后背让美国人打击。

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吧。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训练他们吧，武装他们吧，他们自己会保护自己的。最好是让他们自己保卫自己的独立。这样，美国人自己很难发动进攻，否则他们的事情就容易办了。你们这样解决问题过于简单了，而实际上问题是复杂的。

① 1942年12月17~18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达成协议，宣布不承认意大利对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并支持阿尔巴尼亚恢复独立。

② 尽管美国和英国在1945年11月10日与苏联同时发表声明，承认了在阿尔巴尼亚建立的新政权，但是他们不同意接纳阿进入联合国，也没有与阿建立外交关系。

如果希腊游击队将被消灭的话，你们能否发动战争？

卡德尔（当时的南共政治局委员）：不能。

斯大林：我是以对游击队现有兵力和他们的敌人进行分析为出发点的。近来我开始怀疑游击队是否能取得胜利。如果你不相信游击队会取得胜利的话，就需要收缩游击运动。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地中海并不十分感兴趣。他们想在希腊建立基地，而不吝啬资金，目的是在那里保住一个听话的政府。这是一个国际大问题。

如果收缩游击运动，他们就没有理由进攻你们。如今不是那么容易发动战争的。如果你们坚信游击队有可能取得胜利，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我对此多少有点怀疑。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我们很少得到那里的信息。

斯大林：您有权向我们要，我们向你们通报。让我们签订一个我们之间就所有重要问题必须进行协商的议定书。

季米特洛夫：我们将遵守它。

斯大林：同保加利亚的条约无须拖延。

本月15日匈牙利人来这里。在这之后，我们要请芬兰人，此后再请你们。

莫洛托夫：在某个条约^①中谈到关于消灭所有的侵略策源地的问题。这只是些漂亮的词句。这些词句只能为我们的敌人提供额外的武器。你们为什么要说得比其他条约多？你们将要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吗？

斯大林：这是“左”派的热情。

莫洛托夫：任何倡议都可能得不到支持，联合国反对侵略，他们可能使联合国走到反对我们的地步。难道国联没有借口我们同芬

^① 指1947年11月27日签署的南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7款中的内容。

兰的争执^① 宣布我们为侵略者吗？

南斯拉夫的同志们不允许阿尔巴尼亚购买我们的 5000 吨燕麦，而是要它去阿根廷购买燕麦。^②

斯大林：看来，南斯拉夫人害怕我们向他们夺取阿尔巴尼亚。你们应该吞并阿尔巴尼亚，但要聪明一点。

（科拉罗夫提请注意，同罗马尼亚的条约^③ 已经同莫斯科协商过了。）

你们关于统一经济计划的决定限制了你们自己的主权和罗马尼亚的主权。

只有三个联邦是可能的和自然的：1)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2)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3)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联邦是可能的和现实的。它们之间的邦联则是……^④

特拉乔伊·科斯托夫^⑤：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可以采取加速实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联邦的方针？

斯大林：建立联邦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建立。这很自然，我们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只反对共青团式的联合方法。联邦应该是经过筹备的，以便它能够被两国内部社会舆论和外

① 1939 年 10 月和 11 月，苏联为了保证其西北边界和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与芬兰缔结交换领土的条约，遭到拒绝后，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战争。

② 1947 年 12 月 13 日，拉夫连季耶夫根据莫斯科的委托，通知铁托，阿尔巴尼亚要求苏联政府提供 5000 吨燕麦，并询问南斯拉夫的意见。两天以后铁托答复，不需要从苏联运货，因为阿尔巴尼亚将收到南斯拉夫运去的燕麦。但南斯拉夫的燕麦一直没有到货，当阿尔巴尼亚人询问此事时，南斯拉夫人劝告他们到阿根廷去购买。后来卡德尔解释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主管部门之间的误会造成的。

③ 指 1948 年 1 月 16 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内容表明两国准备实现关税统一。苏联对此表示反对。

④ 此处档案原文复印件字迹不清。

⑤ 科斯托夫，特拉乔伊（1897～1949），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

部世界所接受。

卡德尔：我们认为，就是同保加利亚的联邦，也无须匆忙行事，基本上按国际原则进行，因为匆忙可能使我们处于困境。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你错了。你们不应该拖延三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联合。但必须由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并授权政府开始就联合问题进行谈判。最好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就可以向阿尔巴尼亚派出军队，这样做不会成为外国进攻的借口。

在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之前，建立联邦为时过早。但现在保加利亚已经是一个正式的主权国家了。现在，依我看，你们不应该拖延这个问题，最好尽快解决。如果你们通过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进行联合的话，那一切将很顺利。联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在种族关系上很接近，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习惯上更接近，每一个人都会理解这种联合。阿尔巴尼亚人在联邦条件下也会得到好处，因为将建立一个几乎多一倍人口的统一的阿尔巴尼亚。

需要做的是，将所有的力量团结在这个自然的联邦周围，以发展联邦的经济和民族文化，加强其军队。否则，波兰将对你们抱以希望，而你们对波兰也会寄予希望，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你们没有任何必要偏离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

莫洛托夫：如果需要消除季米特洛夫所说的那种侵略的策源地，就这样去做吧，有什么必要大声呼喊，故意声张呢。现在每一句话都被他们揪住不放了。

特拉乔伊·科斯托夫：我们认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

斯大林：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

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的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

卡德尔：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即游击队在数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

斯大林：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或许，在这里，我们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们认为，你们一定要有把握再行动。

科拉罗夫：那么美国人能允许游击队胜利吗？

斯大林：不要问他们。如果有能够取得胜利的力量，如果有能够利用人民力量的人，就应该继续斗争。但也不应该这么想，以为在希腊没有成功的希望，其他一切就都完了。

与希腊相距较远的国家应首先承认马科斯政府^①，而周边国家应该最后承认。

莫洛托夫：季米特洛夫同志反对卢尔切夫的讲话也是错误的，

^① 1947年12月25日，以希腊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为首的希腊临时民主政府宣布成立。

如今被敌人广泛利用了。^①有什么必要这样干。

季米特洛夫：这主要是迫于国内的需要，目的是不让他们再抬起头来。

斯大林：让尤戈夫^②去同反对派交谈吧，他最善于做这项工作。

卡德尔：我们认为，在实质上，我们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只是存在着个别错误。

斯大林：这不是错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③

① 科斯塔，卢尔切夫（1882～1965），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人党总书记。该党反对共产主义制度。1948年1月10日，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在回答社会民主工人党代表对政府预算草案的批评时，季米特洛夫指责他们是阴谋者，是祖国的敌人。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认为这是要镇压反对派，挑起反对西方的行动。

② 尤戈夫，安东（1904～1991），保加利亚内务部长，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③ 该文件是科拉罗夫用俄文记录的，保存在保加利亚中央档案馆。根据记录，会议时间为1948年2月10日21时10分至11日0时10分。

No 08497

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 南共中央的报告

(1948年2月10日)

卡德尔和巴卡里奇于2月8日星期天抵达莫斯科，直至2月10日星期二之前，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说什么。星期二上午，巴拉诺夫^①打电话要卡德尔和其余的人不要去任何地方，因为晚上9点钟，要请我们去克里姆林宫。列萨科夫告诉我们，星期一来了保加利亚人，同时强调说，保加利亚来的是“主要人物”——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特拉乔伊·科斯托夫。

果然，我们于晚上9点钟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我们准时抵达，但保加利亚人迟到了一会儿，我们在斯大林的接见厅坐了10~15分钟，待他们都到齐后，我们进到了里面。

会见在2月10日，星期二，莫斯科时间21时15分开始，持续了约3个小时。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已有苏联代表在那里。出席会晤的有：斯大林（主持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和佐林^②（在斯大林右侧依次而坐），以及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卡德尔、吉拉斯、巴卡里奇（在斯大林左侧依次而坐）。

莫洛托夫首先发言。他直接强调说，他们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

^① Л. С. 巴拉诺夫（1909~1954），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

^② 佐林，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1902~?），1947~1955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亚之间的问题已经到了严重分歧的地步。这些分歧无论从党的观点出发，还是从国家的观点出发，都是不能允许的。他列举了三个严重分歧的例子：第一，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签订的同盟条约，与苏联分别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不一致；第二，季米特洛夫关于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包括希腊成立联邦的声明，与苏联分别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签订的条约不一致；第三，南斯拉夫一个师进入阿尔巴尼亚南部（科尔察），同苏联分别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之间的条约不一致。关于第一点，他强调说，苏联政府已经通报过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的政府，他们同意了这一点，即同保加利亚签订和平条约之后，在其规定期满以前，不得同保加利亚签订条约。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国政府却签订了条约，苏联政府是从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关于第二点，莫洛托夫强调说，季米特洛夫同志太迷恋于记者招待会。同时，如果季米特洛夫或者铁托向报刊发表声明的话，整个世界都会想，这是苏联的观点。这时斯大林打断莫洛托夫的话说，记得那些日子里在莫斯科的波兰人表示反对。倒是苏联代表首先问他们的，问他们对季米特洛夫的声明有何想法。波兰人说，他们同意，当斯大林告诉他们说苏联反对时，他们就说他们也反对，但他们以为这是莫斯科的立场和指示。斯大林补充说，季米特洛夫的逐步联合（大概他指的是保加利亚通讯社的声明）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斯大林援引声明中的话说，在这个声明中说，奥匈帝国阻止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签订关税同盟。斯大林并补充说，这意味着从前德国人阻止，而现在我们（即苏联）阻止关税同盟。斯大林还补充说，季米特洛夫将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外问题，即转移到联邦等问题上。然后莫洛托夫转向谈第三个分歧点，他一开始就强调说，他们意外地得知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告诉俄国人说，他们以为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是得到苏联同意的，其实并非如此。

这时莫洛托夫开始援引紧急报告。斯大林对他说，要他读。莫洛托夫问斯大林读哪个紧急报告，斯大林倾斜着身子向他指点。莫洛托夫读着拉夫连季耶夫关于会见铁托的紧急报告。从所读的紧急报告中可以知道，这份紧急报告是对关于是否真的存在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决定这一问题的回答。紧急报告中说，这样的决定是征得霍查同意的，是确实存在的，报告的主题是通报可能的对阿尔巴尼亚的进攻。紧急报告中接着指出，铁托说，他不同意莫斯科关于在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的情况下，美英除掀起报刊宣传运动外还会进行干涉的说法。根据紧急报告，铁托还说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种地步的话，南斯拉夫和苏联一起来收拾局面。但是，在苏联就此问题采取外交行动之后，他不会再派出部队了。莫洛托夫最后指出，铁托并没有通报莫斯科说他不同意。他强调指出，无论从党的观点看，还是从国家的观点看，分歧是不能允许的，分歧要提出来加以讨论，不能隐瞒分歧，应该通报和协商。对记者招待会要谨慎。

莫洛托夫之后季米特洛夫发言。他就像其余的保加利亚人和卡德尔（代表南斯拉夫人说话的只有他）一样，没有能够有条理地和连贯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因为斯大林不断地打断他的话。他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在布莱德发表的不是条约，而仅仅是就未来的条约达成一致的通报。苏联代表证实他们从报纸上了解到了这一情况。季米特洛夫强调说，保加利亚经受着如此的经济困难，以至没有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的确就像他在记者招会上所讲的那样。斯大林打断他的发言并对他说，他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一个新词，这是错误的，错误是因为这样的联邦是不可能实现的。季米特洛夫说，事实证明奥匈帝国干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税同盟，他并没有暗指苏联。他最后强调指出，保加利亚和苏联的对外政策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分歧。斯大林打断他的话并肯

定地说，有着很大的分歧，列宁主义者的做法应该是正视分歧和错误，并予以消除。季米特洛夫说，他们犯有错误，还要学习对外政策。接着斯大林向他瞥了一眼又说，他是个老政治家，从事政治四十多年，他那里谈的不是关于错误的问题，而是另一种概念（他在会晤期间就此向季米特洛夫重复了有两三次）。鉴于季米特洛夫反复强调保加利亚由于经济原因应该同其他国家接近，斯大林说他同意，如果涉及的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税同盟的话，但如果涉及到罗马尼亚问题，他将反对这一点。总之，如果话题涉及到保加利亚与苏联所不同意的国家——大多数情况下是拿罗马尼亚作例子——建立联系的话，斯大林都表示反对。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条约中有关于关税同盟的条款，我想，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联合公报中谈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协调计划的问题也是一个原因。苏联代表会晤时多次发言都提到了所谈到的上述问题，它指的是即将签订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条约问题。总之，苏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系的批评涉及到可能出现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关系，明显的，还有南斯拉夫同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关系。

接着，科拉罗夫发言。他说，由保加利亚通报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中没有暗示苏联的地方，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关税同盟，罗马尼亚人是赞成的。此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条约首先寄给了苏联政府，苏联政府提出的意见只是用反对德国或其同盟国的条款代替反对任何侵略者的条款，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税同盟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意见。莫洛托夫为此向斯大林做了简短的解释。莫洛托夫肯定了科拉罗夫的上述发言。斯大林再一次强调说，他反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税同盟，尽管保加利亚人根据紧急报告有权认为苏联是不反对的。他强调说，他不知道在此之前寄给苏联政府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条约中有关税同盟

的条款。季米特洛夫说，正因为如此，这一点成为他在声明中所说的话过火的原因。斯大林对季说，季想震惊全世界，并补充说，这好像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在认真而详细地解释需要什么和怎样去做。他说，正是这一点为美国反动势力提供了精神食粮。然后他谈了关于美国大选的意义，关于为了不向美国反动势力提供任何使其能够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论据而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不应该为反动派提供任何借口。现在的美国政府还能够克制自己，但大财团和凶恶的资本家可能执掌政权，美国的反动势力听到这样的声明就会说，在东欧不仅要建立集团，而且将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对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一些人说，他们就像共青团员一样不知分寸，事后又像女人一样满街喧嚷。他将这一点同阿尔巴尼亚问题联系在一起。三个世界大国——苏联、英国和美国以特别条约的形式保证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阿尔巴尼亚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因为其他国家或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或是被承认的国家，而阿尔巴尼亚都不是。如果南斯拉夫军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美国和英国的反动势力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充当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保护者。不需要派出军队，需要的是在加强阿尔巴尼亚军队的问题上加紧做工作，需要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训练。然后，如果阿尔巴尼亚人遭到进攻，让阿尔巴尼亚议会呼吁南斯拉夫给予援助。他列举了中国的例子。他说，在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对苏联提出指责。中国人善于斗争，他们在前进。他补充说，阿尔巴尼亚人不比中国人差，需要对他们进行训练。然后他说，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没有向他通报，通常是在既成事实，不可挽回之前才报告的，苏联领导人都是从外部了解情况的。

接着科斯托夫开始发言，他抱怨说，有困难的总是小国和不发达国家。他想提出一些经济问题。斯大林打断他的发言并说，对于这些，另有一些部门主管。现在讨论的是分歧问题。

卡德尔发言。关于第一点他说，公布的不是条约，仅仅是关于就条约问题达成一致的通报，并补充说，我们过于匆忙了。他开始进行解释，如同季米特洛夫在上面已经证实的一样，日丹诺夫插话，证实他们是从报刊上知道这件事的。关于阿尔巴尼亚的事，他说，情况很严重，我们没有向他们通报。斯大林插话说，我们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卡德尔接着谈到希腊的不断挑衅，阿尔巴尼亚军队的软弱，还说到我们如何在经济上与阿尔巴尼亚联系，如何扶持其军队的问题。斯大林两三次打断他的发言。至于希腊入侵阿尔巴尼亚，斯大林说这是可能的。但他立刻提出一个问题，这种状况是否真实。阿尔巴尼亚的军队是没有任何指望的，他补充说，需要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训练，为他们建立军队。莫洛托夫说，他们没得到什么进攻阿尔巴尼亚的情报，并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情报。卡德尔解释说，最近，一家希腊公司对待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变得特别尖锐，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否相信希腊游击队会取得胜利。卡德尔回答说相信。斯大林说，他和他的同事一样，最近对此深表怀疑。他说，如果有胜利希望的话，就应该帮助希腊，如果没有这种希望，则应考虑结束游击运动。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保护希腊是不惜代价的，对他们来说惟一的难题就是我们帮助游击队。莫洛托夫补充说，他们经常指责我们，说我们帮助了游击队。斯大林说，如果没有取得胜利的条件，也不必害怕承认这一点。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了，如果目前没有条件，那么晚些时候将会有条件。接着科拉罗夫开始发言并叙述说，美、英、法政府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警告他们不得承认马科斯政府。科拉罗夫说，美国大使举止适当，有礼貌，英国大使厚颜无耻，蛮横无礼。斯大林插话说，这就是说，美国人最坏，他们经常变换角色。斯大林还说，不要把自己国家的命运同希腊游击队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观点，一旦保皇派—法西

斯分子取得胜利，巴尔干地区的局势就会变得艰难而严重。斯大林说，这一点还没有得到证实。

接着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讲述了各种问题，这些问题与会晤时提出的问题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期间，莫洛托夫援引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条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将根据联合国的精神行动，支持所有旨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所有侵略策源地的倡议。莫洛托夫用引自条约中的这段话批驳季米特洛夫企图把反对“侵略的策源地”的斗争同联合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斯大林补充说，这意味着先发制人的战争，其本身就是共青团式的抨击，是大吹大擂、大肆叫嚣的词句，只能为敌人提供材料。斯大林接着说——还是讲共青团的表现，当在列宁格勒革命刚一胜利时，他们那里有一位水兵通过广播骂了全世界，并对全世界进行威胁。莫洛托夫接着谈到了阿尔巴尼亚向苏联购买燕麦的问题，说铁托告诉拉夫连季耶夫，南斯拉夫将提供燕麦。但这之后南斯拉夫人却让阿尔巴尼亚人向阿根廷购买燕麦。斯大林半开玩笑地说，南斯拉夫人担心在阿尔巴尼亚的俄国人，因此才匆忙地向那里派军队。他还说，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人想的是，苏联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合，但又不想讲出来。莫洛托夫谈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关于协调计划公报中的一条原则时说，这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的联合。斯大林坚决认为，这是不能实现的。季米特洛夫很快证实说，这是毫无意义的事，这不是合作，而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造成争执。因此，相互关系中应该仅限于贸易条约。

斯大林接着阐述了苏联关于在东欧建立三个联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罗马尼亚—匈牙利联邦、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联邦的观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可以在明天就联合起来，这样的关系中不存在任何干扰，因为保加利亚今天是个主权国家。卡德尔说，我们不急于同保加利亚和

阿尔巴尼亚联合，因为还有一些国际和国内的问题。斯大林对此说，不应该推迟，这件事已经成熟了。首先需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合起来，然后阿尔巴尼亚加入其联合。这需要通过各自国家的国民议会，以人民的意志达成协议。斯大林想首先从政治联合开始，这样别的国家就将很难进攻阿尔巴尼亚。斯大林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联合多次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已经成熟。事情已经到了商议国名的地步。

卡德尔接着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即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一切都是公开的，但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转到了斯大林以前说过的话，即需要对阿尔巴尼亚的军队进行训练，阿尔巴尼亚在遭到进攻时再请求援助。

至于燕麦问题，卡德尔说，不排除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插手的可能性，目的在于破坏南斯拉夫—苏联关系（莫洛托夫对此沉默）。卡德尔接着说，看不出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在对外政策上有什么重大的分歧。斯大林打断卡德尔的话说，这不准确，分歧是存在的，隐瞒分歧就意味着机会主义。不要害怕承认分歧。斯大林强调说，就是在他们——列宁的学生们之间也多次出现分歧，就某个问题进行争吵，讨论，然后端正立场，继续前进。他还认为，需要大胆地提出希腊游击队的问题。接着他又提到中国的事情，但现在他说到了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按照他的话说，他们把中国同志叫来，并告诉他们，在中国没有发动起义的条件，需要寻找某种“临时措施”。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中国同志在所有问题上都赞同苏联同志的意见，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积蓄力量。俄国人曾两次向他们提供武器援助。显然，正如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是正确的。但他不相信希腊游击队也是这种情况。关于中国他说道，除根据同中国政府的条约作为中立区的旅顺港外，他们在中国没有自己的人。他谈到了中国人在没有集中足够的力量之前避免进攻城市

的战术。

卡德尔再次发言并说，我们没有向他们通报这些情况是个错误。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错误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不向他们通报任何情况。

接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建议签订相互协调对外政策的议定书，卡德尔对此表示同意。这时斯大林补充说，让我们就我们所感兴趣的所有问题询问他们，而他们将向我们通报一切。

接着季米特洛夫转换话题谈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当季米特洛夫说有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时，斯大林随口打断他的话说，要他与统一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政府谈上述问题。在继续会谈的过程中，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人如何接受联合的问题。卡德尔和吉拉斯向他解释说，如果阿尔巴尼亚人接受了联合，这样很好，因为这是他们的民族利益范围内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有80万阿尔巴尼亚人生活在南斯拉夫。斯大林联系阿尔巴尼亚的情况说，我们有一人^①已经自杀了，我们想甩掉霍查，但不应该匆忙粗暴地“强制”干这件事，而是要逐渐地来，不要一下子来。斯大林又一次说，首先需要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联合起来，然后让阿尔巴尼亚加入，需要由阿尔巴尼亚自己声明加入的愿望。接着，科斯托夫提出，关于同苏联的有关专利权、许可证、著作权的技术援助协议对保加利亚人不利，但他没有说该协议是否已经签订。莫洛托夫对此说，问题还需再研究一下，斯大林希望科斯托夫提交一

^① 指阿共亲苏派领导人、经济部长纳科·斯皮鲁。1947年11月，南共认为不能再容忍阿党内的反南派行为，铁托发出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要求阿共中央政治局对斯皮鲁的问题弄清事实，做出解释。鉴于铁托和南共的威望和影响，霍查只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铁托的信件和斯皮鲁事件。斯皮鲁感到失望而开枪自杀。关于斯皮鲁的死，霍查含糊其词地向莫斯科解释说，斯皮鲁有反苏情绪，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对此，苏联驻阿领事丘瓦欣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长篇报告，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证据。据说，斯大林为此大发雷霆。

个“简短的报告”。然后转入研究苏联新闻局为回答美国人的诽谤而发表的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文件。卡德尔对《真理报》发表的文件表示了肯定意见。季米特洛夫说，西方大国企图联合德国反对苏联。斯大林反驳季米特洛夫说，他总是把一切都暴露出来，西方大国并没有公开这样说，他们的说法是没有俄罗斯的欧洲，但如果没有，这就意味着反对。莫洛托夫在会谈中表达自己的意见说，保加利亚人对其军队人数保密较差，它的军队人数超过了和平条约的规定，他们在这一点上可能会受到指责。季米特洛夫对此说，相反，现在的人数还低于和平条约的规定，莫洛托夫对此表示满意，后来再没有提及这件事。季米特洛夫提出了签订苏联和保加利亚之间互助条约的问题，并强调说这对保加利亚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但又补充说，前希特勒德国的欧洲同盟国应该首先与其邻国签订条约：同罗马尼亚的——该条约已准备就绪，同匈牙利的，同芬兰的。

斯大林接着强调说，我们（即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应该加强经济、文化、军队之间的联系，而联邦则是个抽象的东西。

斯大林突然问到关于“我们的朋友皮雅杰”的情况，卡德尔回答说，他在从事我们的立法工作。

卡德尔就需要答复意大利政府请求南斯拉夫政府支持它取得对前殖民地控制权的问题征求了他们的意见。斯大林说，需要支持这一要求，并问莫洛托夫，他们可曾答复。莫洛托夫说，他们还没有答复，他考虑需要再等一等。斯大林对他说，没有什么可等的，应该立即予以答复。……

会谈到此基本结束。

我还要提醒一句，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的批评虽说在形式上是粗暴的，但说话的口气友好。

这个报告根据会见时所作的记录和回忆写成。

№ 08500

卡德尔等人关于 2 月 10 日会谈情况 给南共中央的电报

(1948 年 2 月 11 日)

昨天晚上 21 时，我们应邀到了克里姆林宫。出席会见的除我们三人外，有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苏斯洛夫和莫洛托夫的一位副手；保加利亚方面有季米特洛夫、科拉罗夫、科斯托夫。会见持续了 3 个小时。莫洛托夫提出了他们同保加利亚以及同南斯拉夫之间分歧的三个问题。

1. 签订保加利亚 - 南斯拉夫无限期条约没有预先同他们协商。
2. 季米特洛夫对记者的谈话。
3. 向科尔察派一个师。

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就对外政策的所有主要问题经常协商的必要性。他们建议就这个方针签订一项负有协商义务的议定书。我们同意了这一点。关于会谈提出的所有问题和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我们将口头报告。我们注意到，季米特洛夫因保加利亚分别与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之间需要建立关税同盟和协调计划而受到批评。俄国人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这涉及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没能提出任何一个我们的经济问题。为此，卡德尔想拜会莫洛托夫。我们将尽快回国。

卡德尔、巴卡里奇、吉拉斯

1948 年 2 月 12 日^①

^① 原文如此，根据电报内容判断，电报起草的时间应为 2 月 11 日。

№08498

苏南关于就重要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议定书

(1948年2月11日)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按照它们之间于1945年4月11日签订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商定，它们有义务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

本议定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将在上述条约的整个期限内有效。

本议定书一式两份，每份文本均以俄文和塞尔维亚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1948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全权代表 莫洛托夫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全权代表 卡德尔

№08499

莫洛托夫关于军事援助和贷款等 问题与卡德尔的会谈纪要

(1948年2月12日)

分送：斯大林、贝利亚、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维辛斯基、佐林

绝密

2月11日24时

摘自莫洛托夫日记

会谈中卡德尔同志谈及的问题有三个。

1. 卡德尔同志通报说，铁托同志想在3月或4月非正式地前来莫斯科。他解释说，铁托打算讨论的问题，大概也就是他，卡德尔来莫斯科讨论的那些问题（有关阿尔巴尼亚问题等），以便消除同苏联政府相互关系中的各种误会。卡德尔同志补充说，铁托认为，鉴于阿尔巴尼亚面临的危险，届时也可能离不开南斯拉夫。

我回答说，我向斯大林报告这件事并将给予答复。

2. 卡德尔同志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尽快解决军事援助问题，以及为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提供设备的问题。现在莫斯科的南斯拉

夫代表团已就这些问题工作了数个星期。^①南斯拉夫政府希望尽快解决上述问题。

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上述问题，答应查明情况，尽力而为。

3. 卡德尔同志表示，今年南斯拉夫的出口能力不够抵补南斯拉夫为完成其五年计划而必须的某些货物（电力设备等）的进口。鉴于这种情况，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从苏联得到价值金币 6000 万美元的借款，借款从五年计划结束时开始偿还，还清借款的最终期限根据协议决定。

我告诉卡德尔说，我无法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答应将他的上述请求通报苏联政府，然后把结果向他通报。^②

.....

会谈开始之前卡德尔和我签署了关于协商的议定书，现将其副本^③附上。

1948年2月12日

① 吉拉斯率领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 1948 年于 1 月初到达莫斯科，在 1 月 15~16 日与斯大林和布尔加宁的会谈中，苏联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但一直未办理有关事宜。

② 两天以后，莫洛托夫再次召见卡德尔，答复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苏联政府同意铁托于 3 月或 4 月访问苏联，以对南斯拉夫的行为做出解释；同意研究给南军事援助的问题；但对于南请求提供贷款的问题，则以苏联目前财政困难加以拒绝。详见本档案选编第 22 卷“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专题 No07484 文件。

③ 即本专题 No08498 文件。

№08502

卡德尔关于同莫洛托夫会谈情况 给铁托的电报

(1948年2月13日)

铁托元帅：

昨天我在莫洛托夫那里。我签署了下述内容的议定书：“苏联和南斯拉夫将就涉及两国的所有重要国际问题相互协商承担义务”。签署此议定书的还有保加利亚。之后，我谈了加快军事供应谈判和尽快签订条约的谈判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同斯大林商量并将答复通知我们。最后我提到你想在晚些时候非正式访问莫斯科。他问什么时候，我回答说过一两个月后。我们考虑到，我们继续留在这里并无益处，所以我们将于星期六返回。

卡德尔

1948年2月13日

№08503

铁托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 给吉拉斯和卡德尔的电报

(1948年2月13日)

吉拉斯和卡德尔：

从你们的紧急报告中看出，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结果。现告知你们下述情况，以供在可能的谈判中使用：我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库普列沙宁将军昨天从阿尔巴尼亚回来，他说阿尔巴尼亚军队各方面的状况都很糟糕。这支军队毫无一点战斗准备。没有粮食。阿尔巴尼亚北方与南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通信联络。供给因只有一条道路和桥梁损坏而处于困境。各级司令部都很差劲。没有动员计划，可以说连最低程度的战役计划也没有。总之，一切重担都落在我们肩上，如果我们想从战斗准备的观点使这支军队多少有点用处的话。我们认为，苏联的军事教官应该处于贝尔格莱德军事教官的领导之下，并应该将他们看做是我国军队的教官。总的来说，他们对于阿尔巴尼亚军队的这种处境应负有责任。我们认为，你们应该在如果阿尔巴尼亚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这个问题上得到具体的答复。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种进攻一旦得逞，我们的南马其顿就将处于艰难的战略态势。如果他们那里不同意让我们在阿尔巴尼亚放开手脚的话，那么，无论是解决这支军队的供应问题，还是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我们都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由于当前这种状况，在为我们的边境防御采取有效措施方面，我们的双手被束缚住了。

No 09502

季赫尔关于情报局刊物上表现的反南倾向 给主编尤金的信

(1948年6月7日)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托我向你们转达以下事情：

一、在最近几期《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经常出现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间接攻击，主要依据的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两封信^①。很清楚，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上述信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政策的评价，其一些本质的要点，都建立在一些以不可靠的事实为基础的情报上。根据一些共产党在波兰情报局协商会议开始提出的自愿协调一致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认为自己有权不同意这个评价，有权要求进一步纠正和讲清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情报局机关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是不对的。

二、《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在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对新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和建设采取完全不理睬的态度。比如，编

^① 这里是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8年3月27日和5月4日写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2卷“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专题No01625和No01631文件。

辑部秘书处甚至拒绝发表南斯拉夫人民议会4月末定期例会的简报，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许多今后在南斯拉夫经济中依靠排挤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分，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措施。后来，由共产党中央宣传教育局党员学习处的主任德·武奇尼契同志所写的关于南斯拉夫政治思想工作安排的情况通报，也被主编拒绝发表，其理由是，该文章没有按照上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信所指示的思想，对南斯拉夫党的工作进行批评。

三、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第五次大会的报道被《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以如此形式安排在如此版面，可以认为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南斯拉夫人民的一种侮辱行为。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大会的报道分配了一块很小的地方，甚至比米哈伊尔国王被剥夺罗马尼亚国籍的报道的地方还小。不仅缩减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送交的正式报道，而且完全不考虑大会的召开在广大南斯拉夫劳动群众中的巨大反响。因此，我们坚持提出：

在下一期报上登载有关人民群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召开大会的巨大反响的简讯；

在下一期报上登载根据1948年6月5日《战斗报》社论精神所写的有关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文章。

南斯拉夫共产党请求把这封信的内容通报给那些来自其他的、加入了情报局的党的编辑们，因为他们只了解根据斯大林和莫洛托

夫同志的信所形成的观点。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受南斯拉夫共产党委托

副主编 鲍里斯·季赫尔^①

1948年6月7日于贝尔格莱德^②

-
- ① 季赫尔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派驻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副主编。
- ② 1948年6月12日，编辑部全体成员讨论了这封信。讨论后通过的决定写到：“……季赫尔同志的信在形式和实质上都是不可容忍的。很清楚，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政策遭到了来自所有参加情报局的共产党方面的一致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非但不感到难为情，反而提出断然的不合理要求，让情报局机关报不报道参加情报局的各个共产党的观点，而报道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抱怨在刊物的版面上间接地批评它的领导政策，其实对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早就应该进行间接批评，而是应该进行直接的批判。《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全体成员不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中提出的抗议，不认为有必要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反马克思主义情绪的要求下改变刊物的路线。编辑部人员认为有必要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及编辑部现在的决定提交给情报局各党的中央委员会”。除南斯拉夫的两位编辑外，所有与会者都对决定投了赞成票。

No 09506

情报局秘书处关于共产党代表团参加 南共五大的决定摘录

(1948年7月5日)

机密

.....

一、情报局成员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邀请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态度^①

加入情报局的各党就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情报局秘书处一致通过了如下结论：

鉴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有的反党行为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

① 1948年7月1日，南斯拉夫共产党向欧洲各共产党发出邀请后，有些东欧党表示愿意参加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例如，匈牙利共产党在表示了这样的意见而没有得到苏联的答复后，7月5日拉科西第二次以个人便函形式致电“索罗金”（苏斯洛夫），请求回答这个问题。拉科西表述了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对于出席南共代表大会的立场：“我们认为派代表去是适宜的，并可以以此来影响南斯拉夫的形势。但是我们认为，只有在其他的兄弟党，特别是斯拉夫国家的兄弟共产党都出席的情况下，我们去才是合适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备派法尔卡什、格罗和马罗山同志去。希望知道你们的意见并请答复。”苏斯洛夫在情报局秘书处会议上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提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意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不合适的”。苏联的建议被一致通过。会议还做出在南斯拉夫大会开幕之前再给南斯拉夫人直接答复的一致意见，也就是不理睬南斯拉夫人关于在7月15日以前给予答复的请求。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已经使自己与参加情报局的各党对立起来，并走上了脱离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背叛劳动人民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鉴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兄弟党大家庭之外，情报局秘书处提议不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关于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请求。

各党中央委员会可以根据各自的理由单独拒绝派遣代表团。

兹将秘书处的上述结论通知参加情报局的各个共产党中央，并向阿尔巴尼亚、希腊、芬兰共产党通报情报局秘书处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各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事所持的态度。

№03657

经互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同南斯拉夫 关系的决议

(1949年4月28日)

鉴于南斯拉夫政府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实行敌对政策，因此在它没有停止这种敌对政策之前，经互会认为有必要采取下列措施：

1. 建议经互会成员国在最短时间内重新审定他们同南斯拉夫之间所签订的经济问题的协定，以便：

1) 停止给南斯拉夫提供任何贷款，同时也要停止根据以前与南斯拉夫所签订的信贷协定应向南斯拉夫提供的一切货物；

2) 在与南斯拉夫的贸易方面仅限于购买它的重要战略原料，例如：铅及精选铅矿、锌及精选锌矿、铜、汞等；限量购买它的铁矿石、木材、大麻纤维、黄铁矿石；

3) 大力削减向南斯拉夫出售、供应经互会成员国国内短缺的商品，以及基础工业设备和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停止向南斯拉夫提供武器；

4) 经互会成员国停止向南斯拉夫提供任何技术援助。

2. 经互会成员国在转运过境物资时使用南斯拉夫的服务是适宜的。

3. 在经互会下一次会议上，听取各成员国执行该决议情况的报告。

№03658

苏联政府关于指责南反苏 致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

(1949年9月28日)

今年9月24日在布达佩斯结束了对国家罪犯和间谍拉伊克及其同谋的诉讼程序^①，他们同时还是南斯拉夫政府的代理人。现已查明，南斯拉夫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苏联“友好”的虚伪声明掩饰下进行反苏的敌对活动。

布达佩斯的诉讼同样表明，南斯拉夫政府领导人不仅是根据自己的意图，而且也是根据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所直接下达的任务，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敌对的破坏活动。

在该诉讼程序中所揭露出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当今的南斯拉夫政府已完全成了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附庸，已经变成了他们侵略政策的工具，这一切必然导致并且事实上已经导致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1945年4月11日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所签署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已被当今南斯拉夫政府的粗暴践踏和彻底撕毁。

^① 拉伊克是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因对苏联不满及党内斗争的结果，1948年8月被撤消内务部长职务，改任外交部长。1949年5月被捕，9月受到公开审判并被处决。

根据以上所述，苏联政府声明，从现在起苏联将不再承担上述条约规定的一切义务。

受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 安·葛罗米柯

【专题说明】

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 筹备和建立

(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统天下的权威机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分支机构，都必须服从它的领导和指挥。从20年代直至苏德战争爆发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讲，共产国际无异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发展，都要视苏联对外关系的需要而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和初期，共产国际完全是从苏联的利益出发对各国共产党下达指示和命令，这往往使他们在国内处于被动和尴尬的地位（详见本档案集第15卷的档案文献）。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安抚西方列国，以保证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稳固和发展，苏联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

战争结束后，共产党在一些欧洲国家相继掌握了政权，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问题。于是，又有人开始谈论建立共产党国际机构的事情。就目前看到的文献，至少在1946年5月这一问题已经提上了某些共产党的议事日程（有材料说战争尚未结束时铁托就谈到这个话题）。不过，当时多数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所强调的都是按照本国国情走各自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苏联在大国合

作的总体外交路线指引下，也主张各国保持人民民主制度，不要学习苏联搞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以免加深西方大国的猜忌和对抗。194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战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益显露并趋向尖锐化，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出现，以及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被排挤出政府，苏联感到西方的压力和进攻态势越来越强。而此时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则是一盘散沙，有些执掌或参与政权的共产党甚至各行其事，这使莫斯科颇为恼火，因此开始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各党行动的协商机构——如果没有遇到强烈反对，这种机构最好具有协调和指挥职能。1947年9月的九国工人党、共产党协商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联共（布）中央为此做了充分准备。会议把法共和意共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他们迷恋于议会斗争而其行动方针也没有事先向莫斯科请示；会议把抵制马歇尔计划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有些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竟违背莫斯科的旨意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援助；会议把加强阶级斗争、加快国有化和集体化作为统一国内发展方针，以此来规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会议把两大阵营对立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危险作为观察现实世界的标准，以此来协调各共产党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次会议决定建立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并确定情报局的宗旨、任务和职能。

尽管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议期间表示了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忠诚和服从，但在一些实际和具体问题上仍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就使得这一阵营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以至斯大林不得不拿南共和铁托开刀，并通过大清洗的残酷方式进行内部整肃。当然，这已经是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的主题了。

这里选编的47件档案文献，反映了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筹备和建立的大体过程。其中拉科西在匈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来自匈牙利政治历史研究所收藏的档案，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为了便于读者对这些档案文献的理解，编者做了必要的注释和技术性说明。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
王英杰、刘新宇、吴红、侯静娜、方琼）

No 11661

拉科西^① 关于新国际在 匈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摘录）

（1946年5月17日）

……最后，我想提出另一个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的问题，如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指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同志们知道，第三国际必须解散，因为事情的进程证明它妨碍而不是促进了共产党的发展。……当我们筹建第三国际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所遇到的麻烦就在于我们想要一个拥有执行权的实行集中制的和强有力的国际，这类似于马克思在1864年所设想的那种国际，而不是像一战前的第二国际那样的协商性机构。而这就是第三国际的灾难。因为第三国际代替了应各自探索革命条件的每个国家，并且力图承担集中指挥整个运动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第三国际就从一个中心出发来指导整个运动。结果就是各党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一成不变地因循这个中心所确定的方向，并且等待该中心下达指示。这种情况使得同志们不得不宣布停止第三国际的活动。国际解散以后，各党纷纷诉说国际的存在阻碍了它们党的前进，例如最近我们听到我们的南斯拉夫同志说，这种中心机构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它不了解当地的条件，有时提出的要求与他们所需要的完全相反。所以这样的国际不能再建立。相反，国际应当是这样一种机构，即它不是妨碍各党的前进，而是为各党根据当地的环境去实现无产阶级解放

① 拉科西·马加什，时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

的任务提供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我接着要说的是，不能把新的国际等同于以前的国际。新的国际不是一个组织性的机构；它的任务将是进行调停、在遇到挫折时提供帮助和把一个国家共产党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传递给别的国家的共产党，使它们能够学习别党的经验和吸取别党失败的教训。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仅是我们，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开始感到，如果不就经验和错误进行交流的话，它们就无法制定有关国际问题的适意的方针。我们现在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国际，这种国际将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样，下面一种曾经在第三国际中广泛传播的观点也要改变，即我们必须等待革命的条件至少出现在一批国家中，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发动革命。我记得，当1923年德国出现革命的形势时，在德国的邻国我们都在准备采取这种革命行动，以便能够在两个以上的国家都同时出现革命的形势。我记得，在形势发展不同于德国的捷克共和国、法国和其他国家，我们准备了各种的援助计划和类似的起义等等。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将遵循另一条路线。这里我马上要说的是，并不是很多人都理解对国际解散所作的解释，因为在这段时期里他们没有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所以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就在一些共产党中间流传开来了。例如，当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起试图把匈牙利共产党关于斯洛伐克境内匈牙利人问题^①的路线与捷共的路线进行协调时，一些同志就在宣扬国际必须解散的理论，因为各国共产党所追求的国际目标（即民族目标）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不应该被提到国际的议事日程上。为此，他们冷静地向我们建议：在捷共批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抨

^① 指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人迁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捷匈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参见本档案选编第23卷“苏联与战后捷克斯洛伐克”专题和第26卷“战后苏联与匈牙利”专题的文件。

击捷共。我们反对这种理论。我们确信这是错误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此完全不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各国共产党的民族追求对于国际来说是不合适的，而无论有如何完全不同的理由。既然现在各国共产党都已经变得强大了，变得引人注目了，对于共产国际或者其他共产党国际机构的要求就会加强。目前令人困扰的是一些共产党正在准备参加选举。同志们知道，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正在为选举做准备，而我们的同志则忙着别的事情。他们还要处理和约问题。但是，一旦选举完毕，和约签订，那时这件事就要提上日程，我们就要建立某种国际组织。这话的意思就是，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中，一个国家不管什么时候获得了争取无产阶级解放或者社会主义的条件，那就应当实现它，而不管各自的国家是否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也是一种新的前景，它意味着，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由于共产党的努力具备了这些条件，那就必须实现它。这对所有的共产党是一种新的鼓舞，因为现在在他们的国家里，能否创造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基本上取决于他们的努力。

No 09295

赖赫里关于恢复共产国际问题 给斯大林的信

(1946年9月20日)

最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自德国投降以来已经过去两载有余，而和平条约迄今仍未签署。政治形势的不明朗促使一些捷克共产党人在小范围内开始认真思考恢复作为国际权力机构的共产国际的可能性。在此我冒昧地将关于此事的备忘录^①呈送您过目，并请您在百忙中予以关注。

鉴于关于把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设在柏林的想法可能至少会在西方的公共舆论中引起各种歪曲的议论，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提出讨论。

我一方面冒昧地致信给您——苏联共产党（布）书记，同时按照党的纪律我还把此项备忘录及此信的副本分别递交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哥特瓦尔德同志、国务秘书克列门季斯同志以及苏联驻布拉格大使佐林同志。

请接受我对您的崇高敬意和无比忠诚。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兹德涅克·赖赫里^②

1946年9月20日于布拉格

^① 参见本专题No09315文件附录。

^② 兹·赖赫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普通党员。

№0931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赖赫里来信的 结论性意见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7年2月7日）

秘密

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1946年10月1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捷克共产党员兹德涅克·赖赫里就恢复共产国际问题写给约·维·斯大林的信。^①写信人随信附有一份“关于共产国际的备忘录”。

此信及所附的备忘录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特别处交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研究并提出结论意见。对我们关于兹德涅克·赖赫里其人的查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告知说，赖赫里系捷共布拉格地区组织的一名普通党员，该党员表现一贯积极和忠诚。

备忘录的作者一方面正确地认识到当初解散共产国际是必然的和适时的，同时也断言（在1946年9月），“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全世界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恢复共产国际……乃是适宜的，甚至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不能满足于过去的联合形式（第一、二、三国际）。他强调了把未来的共产国际“建立成国际政治机构”，或许也可以，如作者所说，

^① 参见本卷本专题№09295文件。

使其被认定为拥有自己领地（类似梵蒂冈）的权力机构的必要性。

备忘录中空口无凭地断言，“暂时放弃这一路线（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那些理由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他还以这样的结论来补充这一论点，即“1938～1945年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在新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条件的发展”。

基于备忘录中的这些论点，作者还分析了有关“恢复共产国际”的形式问题，但是他忘记了此类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形势，不能不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

备忘录的作者还简单化地看待他认为未来的共产国际应当扮演的角色。作者选定柏林作为共产国际可能的所在地，认为共产国际在那里的存在与活动似乎能够“使德国人民有机会在共产国际中发挥出其通过非帝国主义的途径努力造福全人类的无可争辩的才能”。

必须指出，“恢复共产国际”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反映了国外某些共产党人寻求对有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前景问题的答案的愿望，因为这些问题使他们感到焦虑和不安。

另一方面，国外共产党人提出类似问题，也同近期以来在各式各样的政党（首先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以及在它们的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陈旧过时”等等的争论有一定联系，并部分地是由这些争论而引起的。正如一些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某些共产党看来也被卷入了这些争论（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参见附件）。

从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近期以来一些资产阶级的和其他的政党已经又重新展开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批评。

在最近一个时期，有一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缺乏修养的新人加入到了西方共产党队伍中来。但是历史发展的现今时期促使一些共产党的某些成员在理论方面去独立地领会当今现实的许多

方面。鉴于这种情况，批判地对上边提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并阐明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从帮助国外的共产党角度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

现将兹德涅克·赖赫里同志的来信、“关于共产国际的备忘录”以及有关上述争论的材料一并呈上。

B. 莫舍托夫

И. 梅德韦杰夫

1947年2月7日于莫斯科

附 件

在这份材料中介绍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一年来（从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这一段时间）由某些政党及报刊展开的争论的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方面。

例如，在1946年3月，捷克国家社会党（贝奈斯的党）主席津克利博士（现在还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在奥洛穆茨市举行的该党农民党员的州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就顺便讲了如下一段话：

“捷克人当前正不得不在两种社会主义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马克思是德国人，因而从他的学说中留给世人的许多东西都贴近德国人的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不能仅仅是物质的和具有物质属性，如果大家都拥有完全一样的东西，那么社会就不会变得更美好”。

接着他又说：

“捷克人民并没有紧紧追随和不倦地仿效旁人的癖好和要求。我们并不渴求盲目模仿外国”（刊载于1946年3月5日的捷克国家

社会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之声》报)。

同一个津克利在1946年3月中旬于布拉格举行的一次该党选举前的动员大会上曾断言，似乎存在着若干个互有区别的“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据津克利认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反映的不仅仅是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且还有人民的精神本质、人民的传统、人民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轨迹。当然，津克利是把“捷克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置于特殊的位置，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乃是“捷克人独特的精神品格的反映”。……

津克利在谈及“捷克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愿意向其他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学习之后紧接着又说：

“我们将非常理智和审慎地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习，当然这种学习是带有确定的信念，即确信存在着的不是只有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还有若干个这样的抽象构想，而且当通过科学的方法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了自己生命力或者根本就没有生命力的时候，这种构想将会变得更多”。（《自由之声》报，1946年3月17日）。

我们注意到，在刊登了该党领导人的这些讲话之后，《自由之声》报在其1946年4月3日和4日的两期上又刊载了颇有点名气的反动分子和诽谤者扬·斯拉维克的文章，这些文章负有的使命是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证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过于公式化的和粗糙肤浅的。

对这样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即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及其报刊发表的这些讲话，在反对左翼政党的竞选斗争（因1946年5月举行的议会选举）进程中都抱有确定的目的，已无需予以置评，但应当指出，由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挑起的这场争论的目的在于，力图证明革命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

国家社会党的报纸《日贾尔报》1945年12月23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有时候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合理的事情，但如果革命成为一种职业，则它就是极其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再引用一句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援引过的总统贝奈斯关于革命与进化、突跃式发展与渐进式发展之间的区别的话：‘充分成熟的国家的改革都是逐渐地、规范地、平静地、不使用暴力和不破坏法制地进行的’”。

在这里需要较为详细地说一说贝奈斯关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权利报》1945年12月23日报道，贝奈斯博士在同法国新闻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达内斯的谈话中说：

“我认为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行旨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应避免强制性的从一种制度向另一种制度的过渡。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我看来，实行社会主义措施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依照民主的方式，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定理论。我认为在人类的发展中我们已经达到有可能这样做的阶段。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我们目前正在努力实现这些想法和这种观念”。

贝奈斯的这种观点与《自由之声》报1946年1月18日援引的贝奈斯博士在刊载于《文化与政治》杂志的理论文章中所提及的主张有密切联系。

正如《自由之声》所指出的那样。贝奈斯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意味着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转折。就像封建制度的法国变成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宪制国家在1848年之前在欧洲引起了一系列内部变革一样，后来，例如在1918年之后，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后果，给欧洲带来的就是普遍的内战和内部变革。我们已经迈入了为建立战后社会新的社

会和经济结构而坚决斗争的时代，迈入了由资产阶级民主向人民民主转变的时代。

这一类比在资产阶级的某些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那里引起了恐惧，他们担心经过一定阶段的斗争之后，就像封建社会的末日曾经到来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末日也将到来。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想补充说的是：令封建社会如此痛恨的资产阶级制度却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以所取得的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进步而曾经令世人瞩目。与此完全一样，在不久的将来，新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将取得进步，而在每一个国家当今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转变与发展都将走各自不同的道路。这种进程在一个地方将进行得快一些，而在另一个地方将进行得慢一些，而且人民中的不同阶层还需要适应新的条件。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的自然过程。首先，苏联及其政府就是这样看待这种发展的，因而该政府把目标定为同当今世界强大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实现长期的合作共存”。

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同样也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天主教）人民党报刊的兴趣。一些天主教报纸一方面口头上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出色地经受住了在苏联的实践检验（像在天主教人民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民主》报1946年3月29日发表的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在发展》的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那样），而同时它们又站出来反对“企望模仿”。例如，还是那家报纸早在1945年11月24日就曾经这样写道：

“需要在人民的土壤中寻找一种具有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特点的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源泉。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将符合我们特点和我們需要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们发现，天主教徒们提出的关于“自己的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论点”与捷克国家社会党人的类似“论点”是一致的。所有这些主张同贝奈斯关于“在每一个国家当今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向人民民主制度的转变与发展都将走各自不同的道路”，也就是，用贝奈斯另外的一种说法，“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民主的方式，而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与不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固定理论”的公式的真正本质未必有什么不同。

国家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的右翼分子们正在利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通往社会主义的“自己的道路”的“论点”来抨击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及其政府当前的对外政策方针。

反动势力也在利用这一“论点”进行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颠覆活动。反动分子深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深得人心，因此无法公开站出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日益亲密。但是反动势力试图用关于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不依附于其他国家的自己的社会主义”的那些蛊惑人心的表态在人民中播撒对苏联不信任的种籽。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及其报刊看来不仅仅在理论问题方面，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对内政策的实质方面均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共产党当时就应当考虑到，来自政府联盟中其他政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将会发展为对政府的当前对外政策方针和对内政策的批评。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1946年1月25日曾发表了旨在反对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专门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强调，当前有一些政党着重宣称马克思—列宁关于国家、关于民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已经过时和已为实践所否定，并认为通过暴力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总的来说已被排除。文章作者反对这种断言，表示：

“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对于列宁还是对于马克思都从来未曾是目的本身，但列宁和马克思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由于统治阶级的反抗而被迫采取的极端手段接受下来的”。

该文作者接着指出：

“今天就十分有把握地断言我们将通过渐进的变革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没有阶级的社会，断言今后将再也不需要革命的烈火，不需要流血，不需要暴力还为时过早。其实任何人都没有像我们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这样极其强烈的希望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正是社会的这些阶层在战争中做出了99%的牺牲。……”

因此，即使我们将通过相对和平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这首先也要取决于我们将如何能够成功地使进步的、民主的发展进程的隐蔽和公开的敌人就范。”

在上述文章中做出了如下结论：

“……只有反动派才需要去尝试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原理，因而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一方面可以像我们这样维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又可以实行另外某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论点的意见。它们之中只有一种是正确的，只有一种得到了生活和实践自身的验证——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论点。任何其他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论点都会造成对未来的错误展望，把我们的政策引入迷途，不是引导人们前进，引导人们走向人类社会的更高形式，走向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将人们拖向后转。”

但是，从共产党方面也曾做出了一些与理论和社会当代发展问题有关的表态。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克列门特·哥特瓦尔德同志在于1946年9月25日举行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中，在谈到共产党今后的前进方向时表明了如下观点：

“正如经验已经表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不是只有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在一定的国际和国内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也还有通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法西斯主义被粉碎之后，在进行了使人们付出如此之多的牺牲，在许多国家里撕开了统治阶级的伪

面具，并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斗争之后，已经出现了新的历史性道路和可能性。这种情况也与我们有关。……”

接着他还说：

“……我们已经走过了我们捷克斯洛伐克通往社会主义的特色道路的一部分。我们已经学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们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抱定明确的目标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我们发现，哥特瓦尔德同志所表明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通往社会主义的特色道路”的观点，必然使人联想到捷克斯洛伐克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和报刊提出的“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社会主义”等论点。

此外还应强调，共产党领导人的这种观点有可能被反动势力利用来进行反对共产党本身的斗争。

No 09351

巴拉诺夫关于华沙会议议事日程和苏联代表团 与会问题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7年8月15日)

绝密

参加共产党代表华沙会议^①的联共(布)代表应遵循以下指示：
在会上听取所有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应当估计到这些党的报告人
人会提出共产党在现阶段的某些策略问题，并建议形成统一的观点。
因此，与会人员显然会要求听取关于国际形势的专门报告。在这种
情况下，联共(布)的代表可以就这一题目做一个专题报告，讲解当
前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回答各共产党代表在其报告中提出
的某些问题。

在共产党代表互相交换了信息和做了国际形势报告之后，可以就
一些非常迫切的问题组织交换意见。

会议拟提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1. 民主组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企图在经济上奴役欧洲国家斗争中的任务（《马歇尔计划》）。
2. 关于德国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
3. 关于各国共产党对苏联和联共(布)的态度。
4. 关于共产党行动的协调和相互提供情报的形式。

^①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于1947年9月22~26日期间，在波兰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市（西里西亚）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当然，会议上交换意见可能并不限于上述内容，显然还会提出另外一些问题，并且就它们交换意见。但是，会议的中心应当是上述问题，因为它们是现代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决定性问题。

联共（布）代表在对上述讨论结果进行总结时，可以支持成立协调委员会的想法。如果交换意见表明有这个必要，而且这个建议是由其他党的代表提出的。

联共（布）代表对关于成立出版情报刊物的机构也应持此立场。

至于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成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而斗争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目前应当反对通过。成立这一组织有可能：1）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际形势复杂化，2）对现有的国际民主组织（工会、青年、妇女联合会）的作用产生怀疑，因为它们的使命就是为和平、民主而斗争。

如会议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通过致世界民主组织书，则可予以接受。但呼吁书必须号召世界人民与战争贩子，与反对派干涉各国人民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企图进行斗争。

会议应当秘密进行，结束后可以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和呼吁书。

联共（布）的代表应当拥有关于会议日程所有主要问题的详细材料，此材料必须认真准备并报经联共（布）中央批准。^①

П. 巴拉诺夫

^① 日丹诺夫对巴拉诺夫的这一书面报告做了重大修改，并于1947年8月底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于即将举行的协商会议的计划方案的建议。日丹诺夫认为，联共（布）应该在会议日程中提议两个问题：1）关于国际形势；2）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第一个问题的报告应该责成联共（布）代表来做，而第二个问题的报告委托给波兰方面。斯大林同意了日丹诺夫的计划。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是日丹诺夫起草的，报告提出了关于世界已经分成两大阵营的理论。

№11618

第一次共产党情报局会议
开幕式会议记录
(1947年9月22日)

绝密

会议于18时15分开始。

由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同志^①致开幕词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怀着深刻激动而喜悦的心情在自由的波兰，在曾为凶恶的德国帝国主义堡垒的土地上欢迎你们大家。

我们高兴，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变化之后，当年英勇地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变化而今天代表着本国空前强大力量的各党代表们见面了。

对我们运动中那些为了本民族自由、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英勇地、忘我地献出了生命的各位战士应给予应有的评价，让我们为他们默哀一分钟。(与会者起立，为牺牲的战士默哀)。

在我们给各党的邀请信^②中，我们已经陈述了我们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动机。你们的到来表明，我们各党都要求对目前形势交

①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943～1948年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1945～1949年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因被指控“右倾民族主义倾向”而被免除波兰工人党中央总书记职务，1951年被逮捕。

② 指由哥穆尔卡代表波兰工人党中央签署并寄给即将参加会议的各共产党领导人的1947年7月25日信件。

换看法，而且这种要求不断增长。我们的会议再次证实了恩格斯大约在 70 年前就讲过的话：

“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型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

我们所有的党都希望从联共（布）的经验和英勇斗争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革命思想和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中听取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是在伟大的变化时代聚会的，这一变化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来自因苏联实力、地位和意义的巨大增长而带来的新的阶级力量对比态势（在粉碎德国帝国主义和解放被奴役的欧洲人民的斗争中，苏联承担了整个重担），来自因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而给帝国主义体系所造成的新的缺口。

这些变化的普遍结果是世界资本主义战线的明显衰落，革命和反帝力量的明显增长。我们还深刻记得列宁所说的话：

“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本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平衡，什么谐和，什么均匀。在每个国家的发展中，都是有时是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这一方面、这一种或这一类特点特别突出，有时是另一方面、另一种或另一类特点特别突出。发展过程从来都是不平衡的。”

我们意识到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在发展上同西欧的主要区别。我们认为分析这些区别，即使从实践活动的观点看，对我们也是重要的和有教育意义的。

我们希望在开会期间弄清我们相互援助的办法，我们在这一阶段相互联系和实施思想影响的最佳形式。

请允许认为我们的会议已经开幕。

然后，哥穆尔卡同志宣布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单

1. 安·亚·日丹诺夫^①，来自联共（布）
2. 格·马·马林科夫^②，来自联共（布）
3.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来自波兰工人党
4. 希拉里·明兹^③，来自波兰工人党
5. 雅克·杜克洛^④，来自法国共产党
6. 艾蒂安·法戎^⑤，来自法国共产党
7. 路易吉·隆哥^⑥，来自意大利共产党
8. 埃德日尼奥·雷阿勒^⑦，来自意大利共产党
9. 爱德华·卡德尔^⑧，来自南斯拉夫共产党
10. 米洛凡·吉拉斯^⑨，来自南斯拉夫共产党
11. 鲁道夫·斯兰斯基^⑩，来自捷克共产党
12. 什特凡·巴什特万斯基^⑪，来自斯洛伐克共产党；

-
- ①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 ②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 ③ 希拉里·明兹，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工业和贸易部部长。
 - ④ 雅克·杜克洛，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
 - ⑤ 艾蒂安·法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1948～1950年期间，担任《人道报》主编。
 - ⑥ 路易吉·隆哥，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
 - ⑦ 埃德日尼奥·雷阿勒，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主任。
 - ⑧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自1948年起担任外交部长。
 - ⑨ 米洛凡·吉拉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不管部部长。
 - ⑩ 鲁道夫·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政府副主席。1951年因被指控犯有“反国家阴谋”罪，被免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于1952年被判刑并被处决。
 - ⑪ 应为巴什特万斯基·什特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13. 维尔科·契尔文科夫^①，来自保加利亚工人党（共）；
14. 弗拉迪米尔·波普托莫夫^②，来自保加利亚工人党（共）；
15. 乔治乌—德治^③，来自罗马尼亚共产党
16. 安娜·波克^④，来自罗马尼亚共产党
17. 米哈伊·法尔卡什^⑤，来自匈牙利共产党
18. 约瑟夫·雷瓦伊^⑥，来自匈牙利共产党。

哥穆尔卡同志提议选举会议第一场会议主席。

一致选举哥穆尔卡同志为会议主席。

哥穆尔卡同志建议批准各共产党提交的来宾名单：

1. 雅·贝尔曼^⑦，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2. 亚·萨瓦茨基^⑧，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3. 斯坦·拉德凯维奇^⑨，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
- ① 维尔科·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 ② 弗拉迪米尔·波普托莫夫，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担任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949～1950年期间担任外交部长。
 - ③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 ④ 安娜·波克，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书记，外交部长。
 - ⑤ 米哈伊·法尔卡什，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总书记，国防部长。
 - ⑥ 应为雷瓦伊·约瑟夫，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
 - ⑦ 雅库布·贝尔曼，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团副部长。
 - ⑧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自1949年起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 ⑨ 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波兰社会安全部长。

4. 贝·格明德尔^①，捷共中央领导干部
5. 古·巴列什^②，捷共中央领导干部
6. 亚·尼·库兹涅佐夫^③，日丹诺夫同志助理
7. 德·尼·苏哈诺夫^④，马林科夫同志助理
8. 安东·弗拉图萨^⑤，南共中央领导干部。

通过名单。

然后哥穆尔卡同志提议批准以下会议时间规定：

开会时间：从 11~15 时和 18~22 时。

情况报告为两小时，不含翻译时间。

通过提议的时间规定。

哥穆尔卡同志提议成立会议秘书处，成员有巴拉诺夫同志^⑥——来自联共（布），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⑦——来自波兰工人党。

秘书处的职责是：

- 1) 进行记录；
- 2) 受会议委托起草提案和建议。

① 格明德尔·贝德日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主任。1952 年因被指控犯有“反国家阴谋”罪被处决。

② 巴列什·古斯塔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担任《红色权利报》主编。

③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涅佐夫，联共（布）中央副书记，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④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苏哈诺夫，联共（布）中央副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助理。

⑤ 安东·弗拉图萨，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办公厅负责人。

⑥ 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巴拉诺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自 1949 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情报部部长，同时担任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厅主任。

⑦ 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为政治局委员。

记录使用俄文。会议工作结束时，记录应由所有代表团签字。
通过哥穆尔卡同志的提议。

哥穆尔卡同志通知，会议日程上有各共产党代表的情况报告。
哥穆尔卡同志还强调说，在总结情况报告和交换意见的基础上，产生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通过哥穆尔卡同志的提议。

№11621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波工人党 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2日)

绝密

哥穆尔卡同志的报告（记录稿）^①

由于最后一次战争，波兰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的推动力，它们的组织者，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是波兰工人党。

从波兰解放的第一天起，我党就占据了各个最重要的生活领域的制高点，是波兰复兴的实际领导者。现在我党有近80万党员。而我们开始建设新波兰的时候，才仅有两万人，主要是游击队员或游击队出身的人。

波兰的结构性变化是通过和平道路即通过不流血的革命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实行这些变化没有斗争和牺牲。我们走过了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首先是同地下的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武装破坏活动做斗争。在同匪徒们做斗争中，我们牺牲15000人，主要是我党党员。反动派的武装破坏已基本上被我们粉碎，尽管它的根源还没铲除干净。仅今年8月份，我们的战士、安全机关工作人员、

^① 这里刊登的是经报告人事后删改的文本，其与原报告文本的主要差别之处，在注释中将予以说明。其他会议记录也是如此。

警察和党的积极分子遭杀害的就达 48 人。^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波兰社会变化的和平道路，在法律范围内所完成的和正在完成的波兰革命丝毫不意味着为马克思主义所生疏的恬静安闲，而是包含着尖锐的和流血的阶级斗争。

我党在通向国家政权的道路上，没必要消灭旧的国家机构，因为它在德国占领者的铁蹄下已被踢碎，而占领机关也因占领者被消灭而随之被歼。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是建设新国家机构的任务。

哥穆尔卡指出，在波兰，把国家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比西欧国家有着优越的条件，但他认为，只有工人党广泛组织过民族解放斗争和拥有武装游击队的地方才有实现国家结构改革的条件。

哥穆尔卡同志说，在建设新国家的过程中，我党非常重视它的武装力量。尽管政府具有联合性质，但在安全部和国防部里（从上层到基层领导机关），在安全机关及其基层单位里，所有领导职务均由工人党党员担任。

在外交部、工业部和贸易部，更换了大批领导成员，这保证了我党指示的贯彻执行。在国家机构的其他环节，尤其在司法机构里，情况很糟。部分旧的反动的国家机构在我们这里留下来了，但它们正在逐步消失。这样，我党对国家机构拥有决定性影响，这大大减轻了使社会关系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任务。

哥穆尔卡继续指出，如果说波兰的道路可以被某个国家接受，那么应该记住，它的基本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国家机构从上到下的主要环节。

如果国家机构担负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军事和民政环节不是由忠诚的能够作不妥协斗争的分子组成，尤其是这些环节的中上层环节不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而掌握在同他们合作的自由民主党或社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句子：“和 89 名公民”。

会民主党分子手里，那么通常这就意味着，在像波兰、南斯拉夫或保加利亚这样和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很难甚至不可能摧毁反动派的反抗和顺利地同它们进行斗争。^①

在分析波兰的经济结构特点时，哥穆尔卡指出了以下几种经济成分：

小商品经济，包括大多数的农民经济、大多数的手工企业和小商人；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富裕的农民经济、私人工业企业、部分手工企业、批发商和部分零售商、房产主和各种投机商人等；

带很大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它们是国家工业、贸易、金融、交通等。

我们认为，我国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因此不能将其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同时也不能将其称之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国家手里仅有一部分额外产品是按照社会需求按计划分配的。大部分产品还控制在市场—资本主义分子的手中。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几乎一整页：“可能其他国家的反动派不会像波兰的反动派那样，在国内找到如此适宜的条件鼓动落后群众起来反对民主政府。也许其他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由民主党没有被反苏传统所困扰，而波兰的反动派则善于把这种传统作为反对波兰革命民主运动和苏联的武器，也许其他国家的人民和他们的自由民主党不会像波兰这样容易上共产主义和国内关系苏维埃化恐吓的当。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怀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只有在与反动派的斗争中，才能夺取和掌握政权，即使这个政权是通过议会选举的途径获得的。

如果在某个国家里，反动势力允许忠诚的民主主义政党获得多数票，并将通过这一途径建立人民群众的政府的话，那么可以事先预测，它会发动无情的斗争以推翻这个政府。到那时，忠实于劳动人民利益并处于这个政府领导之下的国家机关，将在抵抗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我们清楚，反动势力的主要火力总是集中在处于政府中的共产党人身上。波兰的实践已经证明，当共产党人手中拥有了与阶级敌人斗争的主要的国家机器时，他们是如何行动保卫自己和转入进攻的。”

把我们经济中的国家一块变为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把私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或分子改造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将为我国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迈进奠定基础。

只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资本主义成分努力挣脱国家的控制，企图占领我国经济的制高点。显然，实现这些企图将意味着从人民民主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并由此带来一切政治和经济后果。

我党的总路线是，在现阶段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现在我们不提出消灭资本主义成分的任务。

我国农业生产和工业消费品生产的低水平，使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发展农村富农经济和城市手工业及私人工业成为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人们所盼望的事情。在这种条件下，不能提出消灭零售商业的任务。于是我们努力调节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以便保证国家经济成分的不断增长。

在人民民主国家的条件下，当政权和经济控制权操在我们手中的情况下，限制资本主义成分的任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

我们打算通过经济和行政综合手段，使资本主义成分处在国家监督之下。

关于经济手段，近期我们提出以下几条：

1) 彻底消灭私人批发贸易，按照国家指示，由国家和在国家计划范围里工作的合作社包揽批发贸易。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很大成绩。近几个月，95%的粮食供应是通过国家贸易渠道实现的。

2) 巩固国家在合作社和零售贸易中的阵地，在大型工业中心更应是这样。

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建立了国家百货商店，扩大了合作社网，尤其扩大了大型工业中心内部的分配网。

3) 广泛发展农业合作社。

4) 广泛发展农产品预售合同制（定期制）。

5) 建立共用机械农业公司。

6) 利用国家名义建立高商品化的农业企业，以缓解城市供应，帮助调节农产品市场。

7) 扩大手工业企业合作社网，首先是小企业和农村手工业合作社网，包括供应它们原料和推销它们的产品。

8) 通过原材料、电力和燃料供应手段对私人工业实行经济控制。

在行政手段方面，我们提出了以下措施：

1) 同黑市、倒卖外汇作斗争，同滥用职权作斗争。

2) 根据原价和利润额监督私人批发和零售商品价格。

3) 租让私人商业，目的是减少商业中的不必要环节和取消商业中明显的投机倒把和不遵守国家监督的成分。

4) 对私人资本主义成分加强税收制度，不破坏它继续发展的能力，但要严格限制它的过量收入。

哥穆尔卡同志指出，采取所有这些措施已收到积极的成效。

哥穆尔卡同志接着陈述了波兰经济三年恢复计划，其目标是通过完全恢复和改造工业企业，耕种荒地和大大提高产量，把需求恢复到战前水平。

哥穆尔卡同志说，1947年上半年的情况表明，总的来说，计划完成得比较顺利，尽管旱灾造成的歉收带来了许多经济困难。

实现三年计划的基本条件是：

1) 通过系统地运用经济机制，充分调动我国经济中的一切潜力。

2) 通过合理和广泛支持群众劳动竞赛运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利用部分属于应征入伍的居民建立劳动大军。

4) 通过减少中产阶级和富农经济的收入，扩大没有通货膨胀威胁的卫生保健的财政基础。

5) 为扩大设备和原材料进口能力，大大扩大出口，其中包括农产品出口。

波兰的对外贸易出口今年将达到 2 亿美元。波兰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保持着贸易关系，同时与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贸易往来。通过出口煤炭，从许多欧洲国家获得了大笔货物贷款。近来，在普通贸易条约之后，波兰同苏联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又签订了不少内容广泛的条约，其中包括相互交流技术经验，共同恢复和改造经济项目，广泛地相互利用过境运输，等等。

在长期国际条约的范围里，扩大和加深这些条约，使它们协调一致，可充分利用人民民主国家的资源，加速这些国家的发展，从而使我们对美帝国主义可给予更坚决的有效的反击。

波兰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正在全速展开，尽管它在战争期间遭受了重大损失。

波兰现在的工业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但增长是不平衡的。重工业比战前增长 128.2%，电力生产比战前增长 152%，而轻工业只达到战前的 80%。轻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首先在于原料基地薄弱，而进口原料的能力有限。于是造成了工业消费品严重短缺。小企业和作坊发展不足也加重了这种短缺局面。

与 1945 年相比（作为 100），1947 年价格总指数为 148，粮食产品指数为 105.1，工业产品为 190.9。如果注意到 1945 年春天由于有大批无主的德国商品，工业品价格比较低，那么应该承认，价格浮动相对不大，而购买力价格相对稳定。同 1946 年相比，国家部门工作人员实际工资增加 41%，国家工业企业工作人员增加 34%。大中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如果考虑到保险法的变动和假期的变动，与战前实际工资相比，达到战前的 80%。但劳动生产率

由于许多原因仅达到战前生产率的2/3。

波兰正在进行深刻的结构改革。正在进行土改和西部省份居民定居工作。消灭地主和不允许个人大量占有土地，导致波兰农村的中农经济比重大幅度上升。10%的土地还留在国家手中。这批土地将用来加强国家成分。

我们对所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银行系统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在批发贸易中，国家和合作社成分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在批发贸易中，国家成分占50%，合作社成分占26%，私人成分占24%。在零售流通领域，国家成分占2%，合作社成分占11%，私人成分占87%。

在分析国家政治形势特点时，哥穆尔卡同志说，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权属于工人阶级。我们是通过同波兰社会党合作达到这一点的。

体现为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作的工人统一战线，构成了波兰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基础。我们政治和经济成绩的取得，靠的是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和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合作。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两党行动总是统一的。^① 我们理解，合作也包括波兰社会党同意我们的某种建议，尽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句子：“例如，这种情况还出现在组织自愿后备役人民警察时，出现在组织工人和人民群众时，这些组织行动是基于战争的原则，其宗旨是帮助摧毁法西斯地下恐怖活动，打击反动分子以及鼓励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巩固民主政权而进行斗争。波兰社会党同意建立这样的组织，但故意什么也不做，不帮助实现这个任务。在合作时还应该明白这样的情况，波兰社会党对于我们党所进行的运动不做任何抵抗，并不代表它赞同这样的运动。例如，在选举议会时，当时波兰社会党并不赞同我们的关于镇压阶级敌人的一些措施，但是，它基本上也并没有抵制这些措施。这样，合作就意味着不仅仅是两党在整个阵线上积极赞同共同的行动，而且这里还要指的是合作伙伴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的中立立场。”

管社会党对实现这一建议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我们理解，合作也包括这种情况，当波兰社会党不同意我党开展的某项运动时，但它不给予抵制。

在波兰工人运动中，社会民主传统还很强。这些传统同波兰被瓜分和失去独立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传统联系在一起^①。波兰社会党社会民主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主义，其程度超过整个第二国际的传统。在过去，波兰社会党对波兰共产主义者和以前的波兰共产党抱敌视和明显的不友好态度^②。它反对波兰共产党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波兰共产党在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③只是在战争中和德国占领时期，波兰工人党（其基本成员是以前的波兰共产党）^④以其同占领者的斗争才赢得了为独立而斗争的爱国主义政党的名声，从而才打掉了波兰社会党手中反对工人党的主要王牌。现在我们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地位大大地强大，其影响超过了社会党。在某些工业部门，主要是在矿井，我们有着明显的优势。

我们党懂得，不同波兰社会党合作，我党将很难达到领导人民群众的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统一。另一方面，不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传统作斗争，不深刻修正它的思想意识，便不能顺利地建设人民政府，把复兴的波兰引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被占领时期，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分裂为两派。一派号称“自

① 波兰国家（波兰立陶宛王国）被消灭是因为其领土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分割成三部分（1772年，1793年，1795年）。

② 波兰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2月，因被指控党的领导骨干队伍中大量地出现了“反动特务”，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于1938年8月16日被解散。

③ 这里缺少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他们不善于将自己的国际主义与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和波兰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结合起来”。

④ 波兰工人党成立于1942年。

由、平等和独立”，代表社会民主党旧的思想，仇视波兰工人党和苏联。另一派人数不多，力量很弱，又分两翼——右翼和左翼。早在被占领时期，我们就开始同这一派的左翼合作。它的领导人是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①，不过他现在又站到了波兰社会党右翼一方。

左派是现在统一战线中的波兰社会党的萌芽，它开除了最反动的领袖，把基本的社会党群众团结在一起。

可以把波兰社会党看做是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最左翼。波兰社会党不能不同我们合作，因为没有波兰工人党便不能管理国家。但是应该指出，波兰社会党之所以同我们合作，是由于它有意识地盼望这种合作。历史经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波兰社会党的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它的队伍中，出现了我党非常赞成的根除有害的反苏主义传统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过程。两党统一战线和合作的直接结果——政治和经济领域所取得的共同成绩也大大促进了这一点。

波兰社会党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它的内部分三派：左派、中派和右派。而且中派又分左右两部分。党的领导权操在中间派手中。波兰社会党左派力量很弱。对党没有多大影响。右派力量很大，有许多有经验的干部。

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三年合作的经验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经验使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由于这一经验，我们使波兰避免了各种政治和经济波动，巩固了人民波兰的新制度基础。但是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合作应按有机统一的路线发展，否则在一定条件下这一合作必然会中止并演变成尖锐的斗争。两党之间，由于人员和经历的不同，由于角逐，由于对党的爱国主义的理

^① 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爱德华，1945~1947年担任波兰民族统一阵线临时政府总理，1947~1949年担任社会管理机关部长职务。

解不同，由于思想差异毫无共同之处的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常常出现尖锐的冲突。至目前为止，两党中下层组织合作的实践表明，这类问题曾引起不少剧烈冲突而破坏合作。两党党员群众思想水平很低。战后三年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新接受的党员近50万人，他们很难掌握两党的思想区别，因为两党合作并未在自己的日常刊物上讨论过这些区别，而在主要的现行政策问题上两党又采取公开一致的立场。^①

波兰工人阶级是人民的领导者，但是思想不同的两个党都想得到工人阶级的这种领导权。波兰社会党要求我们把它看成权利平等的党。我们承认两党形式上平等，但不能放弃领导权。由于不能存在两个领导，实际上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权利平等是不可能的。波兰社会党意识到自己依附于波兰工人党，从而力求摆脱它，企图同敌视民主的各政治力量，即同米科瓦伊奇克^②的党建立联盟。通过成立各民主党竞选联盟，我们使它的打算化成了泡影。于是波兰社会党改变了策略，开始依靠反动分子扩充自己的党员数量。

与此同时，在波兰社会党中，“自由、平等和独立”分子积极活跃起来反对统一战线。中央领导开始公开鼓励他们的活动，破坏统一战线和两党的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提出两党有机统一的口号。为使波兰社会党不再向右滑，这一口号是必需的。我们指出了合作应该发展的方

① 这里缺少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追求，力求获得发展、独立、主权和政治上的平等，等等。很难拒绝同我们合作的社会党提出的这些权利，同时又不能赞成这种合作，因为在其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这种合作在社会关系的发展中存在着被扭曲的危险。”

②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波兰农民党的创始人，1944年前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自1945年起，任波兰民族统一战线临时政府委员，1947年起侨居国外。

向，把统一问题作为现实的迫切的具体的目标提出来。有机统一的口号意味着对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的坚决宣战。

同时我党还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投机运动，在运动中暴露出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不坚定性和不彻底性。安全机关揭露和逮捕了社会党内部所隐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派别小组。

波兰社会党中央领导人明白，它依靠损害自己统一战线的面目加强本党的策略将会破坏同波兰工人党的合作，将会破坏统一战线。这些领导人决定脱离这条不可行的道路。为答复我们有机统一的口号，波兰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强调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同波兰工人党的统一战线和合作。

最积极的右派活动家被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了下来。波兰社会党领导人接受了我们定期召开两党联席会议的建议。最近3个月，召开了近1500次这种会议，两党出席会议的成员超过了30多万人。几天之前，召开了两党中央积极分子大会。这些会议的目的是普及工人党和社会党两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外，我们同波兰社会党达成了共同组织思想学习班的协议，准备一起对两党党员进行政治教育。

只有通过同波兰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毒作斗争，才有可能在波兰建立统一工人党。现在很难预见这一斗争的各个阶段和形式。但是，波兰社会党中现在的大部分积极分子很可能在未来统一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这个党的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不愿依据这一思想的分子，必然要离去，放弃政治生活，无论如何得放弃合法的生活。在我们的政治体系中，没有波兰社会党右翼分子的位置，如果分裂，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党。

今天我们很难说，我们什么时候达到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有机统一。但达到这一统一是必须的。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

是我们继续沿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条件。^①

断言人民政权已无任何来自内部的威胁，我们这里已无可使波兰逆转的力量——这种乐观是不明智的。反动派在经济领域还有很深的根基。基督教会就是一支很强的反动力量。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处在它的影响之下。反动的党派和组织还可能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一些反动分子正在向参加民主联盟的政党里钻。我们对青年的工作很薄弱，基督教对青年有很深影响。波兰还继续存在的经济困难是反动派的又一盟友。

在分析反动力量的特点时，哥穆尔卡同志谈到了基督教会。它的力量源泉首先是它对小资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传统影响，以及它控制之下的广大的中央集权化的教区和教堂机构。由于一部分教徒参加了反对占领者的斗争，而且付出了重大牺牲，基督教在战后保留了自己的影响。

选举期间，由于党的灵活政策，我们得以使基督教会部分地保持了中立。选举之后，主教团反民主的活动加强了。

国际反动派利用宗教，企图在波兰建立反动党派。我们绝不能容许这一点。我们同教会反动影响的斗争计划是建立在我们长远的经济打算以及文化和思想革命的计划之上的。

波兰人民民主制度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没有排除资产阶级政党的

① 原报告中这一段是以下列方式表述的：“今天，我们也很难勾画出某个期限，即在这个期限中我们希望能够使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达到组织上的统一。各种情况都可能加快或者是阻碍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建设统一的工人党才是主要的政治任务。如果把工人运动分为两个派别，那么，关于达到社会主义的梦想，将会变成空想。只有在统一阵线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人民在进步的道路上走到确定的目标。如果没有一个党的——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人，它（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失去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在社会发展中应该出现的是一个进步的过程。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政党，对于我们来说，正逐渐成为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的条件。”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联合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

存在。这些政党将不仅反对人民政府，而且还将反对新的社会制度。经验表明，反对党是很危险的，绝不能给它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全部的民主权利。我们只是在资产阶级阶层中没能限制住反对党的影响。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压制很大，资产阶级思想是每个反对党的强有力的盟友。这种党的自由民主性质只能有利于加强它的影响。此外，被禁止的反动党和法西斯党的信徒们大多集中在反对党的队伍里。

反对党在反对人民民主的时候通常都越出法律界限。反对派的总的特点是同干涉我国内政的国际反动派，主要是同盎格鲁—撒克逊反动派有联系，结果反对党堕入了叛卖祖国的泥潭。

我们容忍波兰反对党的存在，但我们应该经常给它们点颜色看看。^①

波兰反动派把英国和美国作为发展方向是米科瓦伊奇克的党在竞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盎格鲁—撒克逊反动集团反对波兰西部边界的行动和苏联保卫这一边界，使波兰居民中战后初期所存在的深厚的亲英、亲美情绪迅速地消失。同时，对苏联的好感加强了，而且不断增长。波兰人民把波兰反动派的政策同英美反动派的政策看成是一回事完全是正确的。

无论是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企图，还是反对党的斗争，都没有改变人民民主政权的根本性质。在波兰发展的现阶段，在现在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我们打算继续把政权建立在各民主党联盟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在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将支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各民主党联盟为基础政府。

① 这里缺少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反对党的存在也给我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好处。在许多诉讼案中，无数背叛祖国和证明反对党领导人与法西斯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事实，使受到反对党欺骗的人们加快了脱离他们的步伐。”

目前的政府建立在五党——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民主党和劳动党联盟的基础之上。如果说后两个党对波兰社会关系发展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农民党——代表劳动农民的党则是重要的联盟成员。我们努力保护这个党，把它作为我们的盟友。^①

在指出波兰农民运动的历史根源时，哥穆尔卡同志讲述了农民党的由来。米科瓦伊奇克回到波兰后，成立了波兰农民党，其中集中了农民运动中的所有反动分子，还有部分中间分子。没有建立自己党的萨纳奇分子^②和恩德茨基分子^③也渗透到这里。米科瓦伊奇克和他的党在反对人民民主的斗争中使用了狡猾的手段。表面上米科瓦伊奇克同意进行社会改革、没收地主财产和把主要的经济目标国有化。实际上他想努力推翻人民政府，把波兰社会党从政权中挤出去。主要是在我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之后，加之竞选失败和农民党内部的危机——一部分杰出的活动家退党并组成左翼农民党，米科瓦伊奇克农民党的影响大大减弱了。至今为止，这个党仍是反民主力量的重要中心。

我们的敌人常拿集体农庄恫吓农村居民。^④ 我们党在长期时间里放弃了组织集体农庄，但也没有向农村居民指出农村经济改造的具体计划。这是我党在农村工作，在加强我党在农民之中的影响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这一缺点也反映在我党的社会成分方面。尽管

① 在原报告中这一段是以下列方式表述的：“农民党是劳动农民阶级的党，代表了波兰人民的大部分，是集团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将这个党作为我们的盟友保留下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也是我们关切和努力的目标。”

② 毕苏斯基 1926 年在波兰执掌政权后，打着“萨纳奇”（“整顿”）的口号，在国内建立了专横的制度。

③ 指的是国家民主主义者。

④ 原报告中这一段是以下列方式表述的：“阶级敌人选择以集体农庄进行恐吓，作为自己在农村的主要宣传手段。波兰农民害怕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在这种恐吓的基础上，利用政府目前已经中立化的政策以及波兰工人党的声明，阶级敌人已经具有越来越大的在农村进行政治渗透的可能性。”

农民占波兰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我党成分中，农民只占20%，而且主要是原来的雇农。

农民党失败之后，它所代表的过激农民运动明显地加强了。这一运动不仅波及贫农，而且波及中农。但是富农分子开始渗透到这个组织里来。

农民党的严重问题是真诚捍卫劳动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领导干部问题。没有工人党的帮助，农民党则没有政治出路。在党内，这种农民中的二号资本主义人物可能占上风。通过影响农民党中经常处于我党影响之下的核心骨干分子，我们力争避免这种趋势。在地方，我们还召开波兰工人党和农民党中层积极分子联合会议。这些会议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形成了人民的农民运动，把它引上了同工人运动合作的方向，塑造了农民党的思想面貌。

波兰人民民主的严重缺点是青年组织涣散。我国有几个青年组织，其中每个组织都接近于国内相应的政党或政治流派。现在我们正尽力消除青年战线中的这种涣散状态。^①

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体系中还有不少薄弱环节。首先是干部培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成立所有青年组织最高领导机关的计划，它应该以在思想上协助青年组织的教育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利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经验，我们打算在明年组织青年‘劳动营’，其成员为应征入伍者和退役军人，以及招收青年组织里的自愿人员。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劳动营还能成为一所思想教育学校，毫无疑问，它还能够带来极大的政治好处。

高等院校的青年主要是受反动势力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高等院校青年的社会成分，我们将以接收新青年的方式来逐渐改变这一点。我们还开设了专门的短训班，培训工人和农民青年，以便加快改变高等院校青年的社会成分。

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的政治体制中，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的地方。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上层建筑的政治领域，我们已经夺取了主要的领导地位。占有这些地位，我们能够以合乎我们利益的精神加快发展进程。目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干部问题，人员问题。这是我们党内最薄弱的地方。”

养。我们组织了中央党校，开设了3个月和半年的学习班，培训了近3000名同志。我们还有短期州党校，已有近11000名同志毕业。我国还有青年斗争协会学校，工会学校。对于干部培训我们给予了高度重视。

我们有意识地展开了建设群众性的党的工作。干部的党不能代替群众性的党，况且我们有经验的积极分子并不多。我们经常要派几万名党员去开展各种社会运动。近来我们准备放弃大规模征募党员的工作。由于经常更换党证，我们清除了异己分子和不够格的人。我们打算清除5%的党员。

在我党生活困难的日子里，我党有幸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和指示。利用这些指示，依靠波兰工人阶级无限的革命热情和全体人民的创造力，我们取得了波兰现在的成绩。

然后哥穆尔卡同志分析了对外政策问题。

我国外交政策的巩固基础是与苏联的联盟，是不断加强人民关于这一联盟必要性的意识，要向人民解释，从波兰国家利益的观点看，这一联盟是正确的。要摧毁和粉碎一切的反苏中心，根除自伟大十月革命以来就不断用来毒害波兰社会舆论的旧的反俄情绪和反苏偏见。现在在这一领域，我们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利用我国西部各州的问题和苏联帮助波兰确定奥得河和尼斯河边界这一事实作为这一斗争的主要手段。

马克思主义者永远遵循民族问题必须服从社会解放斗争的利益这一原则。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新战争贩子企图重新武装德国人，把他们作为反对苏联和斯拉夫国家的工具，梦想让这些国家的人民重新变成资本主义的奴隶。所以，奥得河和尼斯河上的波兰边界不仅是历史上有根据的波兰国家边界，而且是给人类带来自由和社会解放的欧洲新社会制度在西部的突出部边界。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共产党和所有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的进步的革

命民主力量，同波兰工人阶级和全体波兰人民一样，都在关注奥得河和尼斯河上的波兰西部边界。

我国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础是斯拉夫的团结。这一团结不仅是我国同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未来同保加利亚联盟的动因之一，而且是波兰同其他斯拉夫民族文化、经济接近的源泉。^①

我国对外政策的第三个基础是为巩固建立在波茨坦公告原则基础之上的和平，为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的一切策源地，首先是为德国的非纳粹化、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而斗争，反对德国在其保护者的援助下发动新的侵略的任何可能性，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欧洲各族人民主权的威胁，反对西方集团和所有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帝国主义反人民联盟的企图。

一方面我们强调我们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但同时坚决反对它们向波兰渗透和在波兰依靠波兰农民党和法西斯地下组织建立巩固的政治基地的企图。我们挫败了英美国家的这些企图，迫使它们召回了它们败坏了名声的大使并派来了新的大使。

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继续积极地实行渗透，这次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会和波兰社会党的某些集团身上。

从上述原则出发，我们对所谓的马歇尔计划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我们不拒绝利用美国贷款的可能性，但我们没有把美国援助看成是“救命稻草”。相反，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扩张形式，它威胁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但是，应该确定，到目前为止在波兰斯拉夫团结一致的运动，并没有像在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深刻，这说明随着与兄弟斯拉夫人民的亲近以及与他们建立的更加密切的关系，波兰的历史将以另外的一种形式发展。在这方面所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是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友好条约，以及同时签署的经济、运输和文化协定，这些协定也加强了我国国家的民主力量。这些条约的实现能够消除久已形成的数十年来被夸大的有利于德国人的对抗性矛盾，有助于顺利解决至今还未被解决的领土问题。”

着欧洲国家的主权，使欧洲国家充当美国半殖民地的角色。

我们彻底捍卫我们的这一立场，尽管波兰社会党有某些动摇。

我们把波兰变成了民主、反帝和爱好和平国家总链条中巩固的一环。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分子把我们封在了铁幕后面，企图以此把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分开。看到他们奴役波兰的计划和指望落空了，他们拒绝了对我们的经济援助。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因内部矛盾而斗争，但在反苏和反民主政策的基础上可达成协议，正努力组织新的战斗。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美帝国主义现在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面目和它的企图揭露得还很不够。

每个国家的阶级斗争，除苏联之外，正在明显地变成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非常必要交流各个国家共产党的经验，彼此协商各自的想法，以便采取较好的方法和最正确的策略，战胜本国的阶级敌人，挫败世界帝国主义的企图。

哥穆尔卡同志报告之后，宣布休息 20 分钟。

№11622

马林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联共（布）
工作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2日）

绝密

20时25分会议重新开始。

担任主席的哥穆尔卡同志让马林科夫同志作联共（布）工作情况报告。^①

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联共（布）工作的情况报告^②

一、战后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

在我们苏联被称之为伟大卫国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

① 马林科夫报告草案的名称为：现阶段的联共（布）“情况报告提纲”。日丹诺夫对草案的修改意见是：“关于危机的问题还要多谈一些。谈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繁荣’时，不要使用面包，而要用粮食一词。勾掉建成共产主义”。

② 马林科夫报告的第一个文本里，有一段前言：

“同志们！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托我，在本次共产党协商会议上做关于联共（布）工作情况的报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如此丰富多彩，为了多少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同时又不过分地占用你们大家的时间，我有必要把自己的报告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在该报告中，我只谈一下联共（布）中央在战后时期的工作，并向你们阐明：第一，苏联国民经济的领导问题，第二，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第三，关于对外政策问题。”

束和由战争向和平的过渡，使联共（布）面临着消除战争后果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复杂的任务。党面临着重大的转折——由解决战争任务转向解决经济和文化任务。

在这一国家发展的新时期，斯大林同志详尽地确定了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在 1946 年初在对选民讲话中指出，“我们应该在最短的时间里医治好敌人给我国带来的战争创伤，把国民经济的发展恢复到战前水平，进而在最近的时间超过这一水平，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进一步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

我们党认识到，顺利地完这些任务需要克服严重的困难，因为对于苏联来说，过去的战争是俄罗斯以往所经历的所有战争中最残酷和最严重的战争。

战争使苏联人民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由于德国入侵，在战斗中以及由于被占领和把苏联人驱逐到德国，苏联损失近 700 万人^①。

德国法西斯占领者使苏联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法西斯强盗毁坏和焚烧了成千上万个工业企业、国营农场、机械拖拉机站、集体农庄；破坏了我国西部的整个铁路网，使国家许多地区变成废墟，消灭了苏联人几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夺走了几百万苏联公民的生命。德国法西斯造成的损失，仅直接毁灭的财产就达 6790 亿卢布。^②

其他任何国家，甚至最强大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受这样的损失，都会倒退几十年而变成二类国家。但苏联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苏联的国家和社会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它证明了自己优

① 据 1992 年 12 月 30 日《真理报》报道，根据已经查明的材料，苏联在二战期间的人员损失为 2700 万人。

② 根据俄国现有的统计资料，苏联在战争中丧失了 30% 的国有资产，其整个物质损失大约是所有参战国家损失的 41%。

于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在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由于我们的祖国在斯大林领导下在战前做了长期的国防准备。认为这一历史性胜利没有战前全国的积极的国防准备也可取得，或认为这一准备可在短时间里，比如3~4年时间里完成——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对希特勒德国这样的敌人实施打击，反击它，然后彻底消灭它，除了我国军队的无比英勇之外，还需要有完全现代化的和足够数量的武器装备，需要有很好的和充足的给养。为此，必须有金属、燃料、发达的机械制造、粮食、棉花。而要具备这一切，必须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历史改造，从1928年起，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

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已具备了满足前线最低物质需求的能力。这些物质能力是我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经过3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建立起来的。这3个五年计划使苏联建立起了实施胜利战争的经济基础。

众所周知，没有党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国家便不能做好积极的防御工作，而这一政策不仅遇到了外部敌人，而且遇到了苏联内部敌人的恶毒和疯狂的反对。党的这一政策是在同各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李可夫反革命集团的激烈斗争中贯彻执行了的。这是一伙卑鄙的叛徒和投降主义者，为了外国侦察机关的几个钱企图从内部破坏苏联的实力，为我们的敌人创造在战争情况下于其有利的形势。

党既没有屈从于一些人的威胁，也没有屈从于一些人的叫嚣，而是义无反顾地前进。党没有顺从落后，不怕逆流而上，总是保持主导力量的地位。没有坚定性和坚韧精神，联共（布）便不能捍卫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也就不能使国家做好积极的防御，不能保障战争中战胜法西斯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党粉碎了所有

反党、反苏维埃的力量，从而及时地消灭了苏联出现“第五纵队”的一切可能性。战争表明了苏联人民前所未有的统一，表明了它以布尔什维克党为核心的团结。

但是，战争初期苏联的这种强大的经济前提还不能保障胜利的必然到来。还要求巧妙地利用这些能力，迅速地动员它们以供战争所需，按照战时需要改造它们。在严重的战争条件下，冒着敌人的打击，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党巧妙地在极短的时间里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了战争轨道上来，一切服从前线的需要，提出了“一切为前线”的口号。

敌人对于苏联政治制度内部不巩固的期望落空了。希特勒分子指望，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多民族的国家将解体，我国各民族之间将发生摩擦、产生分歧，他们的这一指望落空了。战争表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联盟是牢不可破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坚如磐石的。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为首的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的周围，奋起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成果。由于新社会制度的胜利和我党正确的民族政策而形成的我国各族人民的友谊是苏联力量的源泉。

斯大林同志说，“苏维埃国家制度，表明它是多民族国家的典范，苏维埃国家制度是这样一种国家组织体系，在那里，民族问题和民族合作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都好”。

尽管蒙受了重大的牺牲创伤，苏联走出了战争，并且更加巩固和强大。保障了我们战争胜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发达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村集体农庄制度的活力，现在党解决恢复和进一步发展苏联国民经济任务的时候，又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同时，在资本主义国家，当由战争转入和平时期时，伴随而来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尖锐，国内市场进一步萎缩，生产水平下降，企业关闭，失业增长，经济中不能利用复员的广大军

人，等等。而在苏联，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制度，避免了类似的战后动荡。在苏联，没有危机，没有失业，有的只是生产和人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

1946~1950年新的五年计划规定了国民经济战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该五年计划主要的经济政治任务是：使遭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各地迅速复兴，把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一水平。

根据五年计划，苏联的工业生产1948年就要达到战前水平。以后几年，工业产量要达到战前的1.5倍，而且要保障优先恢复和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舍此便不能迅速而顺利地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整个苏联国民经济。恢复重工业应该加强国家的技术—经济独立。

为了保障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需求和丰富我国主要日用品，五年计划还强调发展农业和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业。

我们要大大超过战前人民收入水平和人民消费水平，在短期内取消票证供应制度，代之以苏联文明的发达商业，特别关注扩大生产日用消费品，通过不断的降低物价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加强货币周转和苏联的货币。

五年计划的出发点是：保障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进一步的技术更新，将其作为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为此，我们提出了在近期内赶上和超过国外科学成就的任务。

五年计划规定了进一步提高苏联劳动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伟大任务，规定恢复和扩大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网，改善人民的卫生保健状况，扩大住宅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五年计划提出要保障苏联文化和艺术的繁荣。

五年计划致力于进一步提高苏联的国防，给苏联武装力量以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为保证我国应付一切情况，捍卫和平和防止对

苏联及其盟友发动新的侵略，我们应加强苏联的武装力量，巩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

完成新的五年计划，保障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还意味着恢复战前我们走过尔后又被战争中断了的苏联社会发展的道路。这是完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新五年计划在这方面意味着向前迈出更大的一步。

1946年和1947年过去的几个月的情况表明，新五年计划正在顺利地完成。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工业已走上生产民用产品的轨道。曾经被德国占领的地区迅速得到恢复。

完成五年计划是在巨大的劳动热情下进行的。为超过完成1947年计划，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献礼，现在在全国范围里，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正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莫斯科、列宁格勒、顿巴斯、乌拉尔、高尔基、库兹巴斯等这样一些大型工业地区完成计划的进程使我们指望能够提前完成1947年计划，这将意味着完成五年计划的整个速度要加快。

从1947年7月生产煤、铜、铝、镍、电力、拖拉机、车床和某些其他机械的情况看，苏联工业已接近战前水平。

通过一年半的实现五年计划的奋斗表明，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某些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这比开始预计的要快。所以，正在重新审订某些工业部门初期所规定的五年计划任务，进一步加大这些任务。

同时应该指出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意义。在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东部建起的工业基地，在战争时期由于有1300多个企业从国家西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这些基地大大地发展和加强了。所有这一切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在战争年代，东方为前线提供了成千上万的坦克、大炮、飞机、弹药等武器装备。战后，乌拉

尔、西伯利亚、高加索和中亚的工业迅速转向生产和平产品。在新的五年计划里，东部地区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还将进一步增长。

自然，战后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困难的和自发完成的。在完成五年计划的道路上我们得克服许多困难。

把国民经济从军事轨道转向和平发展轨道，这本身就有许多经济、组织和技术方面的困难。同时，还不能忘记，在把国民经济转入和平轨道的时候，我国还遇到了1946年的旱灾这样的严重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旱灾之一，它使我国主要产粮区歉收。如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顺利地克服了这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完成了供应居民粮食的任务，保障了五年计划第一年任务的完成，那么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感谢党在领导经济中政策的正确。

在这里应该指出，手里握有物资和粮食储备对巩固苏维埃国家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没有储备便不能有计划地驾驭国民经济。储备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强大武器，是应付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突发情况的可靠保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特别重视建立国家储备。

谈到我们发展的困难，首先应该指出，保障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业劳动力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战前就发生了。战争更加深了这些困难。

从保障企业劳动力的观点看，苏联没有失业为发展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创造了完全新的条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从失业大军里吸收他们需求的劳动力；失业大军在危机时期便膨胀起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又削减下来，但只要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永远不会消失，它是资本主义的常期伴侣。失业大军依靠两个渠道得到补充：一是农民破产，

饥饿把他们驱逐到工厂做工；一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作坊主、小商人的破产，他们最终被迫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社会主义消灭了这种因劳动群众贫困而劳动力储备得到补充的根源。我国再没有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城市也没有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没有劳动力自行流动。

不过，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没有工人阶级数量的不断增长是不可思议的。需要扩大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劳动力人数。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中工人和职工人数需要增加 600 万人。工业、交通和建筑业吸收新劳动力是完成 1946~1950 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的决定条件之一。在正常条件下这已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况且是在战后，战时苏联社会青壮年所遭受的重大伤亡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良影响的。

这就是党和苏维埃国家特别重视计划分配劳动力和寻找新的国民经济劳动力补充源泉的原因。不建立必要的劳动力储备，社会主义工业便不能发展。所以，建立国家劳动力储备，在工厂职业学校里培训年轻劳动力，并把他们分配到相应的工业部门是党特别关注的目标。五年计划规定为此培养 450 万人。

在我们面前还有另外一种困难。由于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不能指望从国外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设备，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得依靠自己的力量。这就需要额外努力组织生产在正常国际形势下可以从国外进口的新型设备。

所有这些困难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发展的速度——新的建设项目运营投产，总的建设计划的完成。

在农业方面我们还得克服严重的困难。战争暂时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削弱了它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由于转入战争需要，停止了拖拉机的生产。大大减少了农业机械及其备件、农业

生产资料的生产。战争年代播种面积减少了，农业技术状况恶化了，粮食产量降低了，牲畜头数减少了，畜产品产量降低了。战争造成的困难同1946年国家许多地区出现旱灾造成的困难连在一起。

在这些条件下，党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农业和巩固集体农庄制度的专门措施。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战后发展农业办法》的详细决议。现在党在农业方面关注的主要目标是从组织—经济上巩固集体农庄，以及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党坚决制止了损害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违犯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做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和支付。与此同时，党还采取措施以求扩大拖拉机、康拜因和其他农业机械的生产，扩大农业所需化肥的生产。

中央全会的决议里规定了战后发展农业的详细规划。决议详细指出了扩大谷物、技术作物（棉花、甜菜、亚麻等）生产的途径，指出要发展畜牧业，改善农业技术，完善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作，改善国营农场的工作。联共（布）中央全会的决议指出了社会主义工业为技术装备农业所应完成的任务。所有这一切措施，旨在迅速巩固和提高国家农业，巩固集体农庄制度。必须保障农业的提高，以便使我国居民有足够的食品，工业有足够的原料，使国家有必要的粮食和原料储备。

苏联的农民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报之以巨大的劳动热情，它对1947年整个农业工作计划的完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1947年增产丰收，全国展开了社会主义竞赛。政府通过了专门措施表彰农业和畜牧业中的先进工作者（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勋章）。

今年春播进行得很顺利。1947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去年增加近800万公顷。

今年谷物收获组织得很顺利，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粮食订购工作正在进行中。

农业年度的预先总结说明，在解决粮食问题和建立国家粮食和原料储备方面，今年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巩固集体农庄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为进一步改善工业中心居民的粮食供应建立了必要的条件。

农业的成就为今年在苏联取消票证供给制度创造了条件。票证制度在战时是必要的，当时需要减少后方的需求以保障前线部队的定期供给。当战争结束、部队复员后，票证制度的必要性降低了，这一制度应该取消了。苏联政府可以回到正常的商品流通和全面发展生产和需求上来了。许多州的旱灾，国家粮食储备的减少，要求把取消票证制度由1946年推迟到1947年。为了给取消票证制度作准备，苏联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取消多种价格。

我们完成五年计划的工作，是实现斯大林同志给全联盟人民提出的下述任务的第一步：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巨大高潮，把我国工业提高到战前两倍的水平。我们应在以后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达到：我国工业每年可生产5000万吨生铁，6000万吨钢，5亿吨煤，6000万吨石油。

二、党的建设问题

我党生活中的最典型特点和主要特征，它的成就的基础是它在我国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和人民对党政策的无限支持。党的正确政策保障了苏联人民思想政治的巩固和团结。

这一切使我党能够在卫国战争中组织力量歼灭敌人和战后动员起全体人民顺利地展开消除战争后果的工作。

在去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和今年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联盟的胜利深刻地鲜明地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思想政治上的一致。选举是在巨大的政治高潮

中进行的，它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人民对自己党的无限信任和支持。

战争要求苏联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损失。自然，在战争期间，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受到限制。所以在由战时转入平时后，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取消这些限制，保障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苏联人民想过如愿以偿的生活，无论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

这一切给党的领导水平和党组织的工作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这些新要求观点看，由于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轨道，要求认真改造党组织的工作。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在党组织的工作中揭露出了战时没有看到的严重缺点，揭露出了党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失误。

我党的成绩及党和苏维埃国家干部在战争中所经受的考验，没有给我们居功自傲和停止不前的权利。相反，战后摆在我国面前的经济、文化建设的新任务以及现在的整个国际形势确实要求联共（布）毫不动摇地提高全党思想工作水平。

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我党组织的工作。在战争年代，党的机关在组织后方和把经济转入战时轨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战争条件下，党的机关被迫承担了不少管理经济的业务工作。在当时条件下，这是正确的。但不能不看到，这在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一些消极现象，导致了党内工作的削弱，同时还导致了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基本原则之一被破坏了。

现在，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党提出了加强地方党的机关和加强党组织的工作，提高党内工作水平和提高布尔什维克领导国家和经

济活动的水平，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党内工作任务之一。

完成这些任务同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批评是我党发展的基本条件。

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党提出继续巩固苏维埃国家，完善国家机构，改进国家机构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在组织完成党和国家指令方面，国家机构做了大量工作。党在建立灵活而具体的国家机构和培养忠于党的事业和具有必要的知识和组织才能的国家干部方面所作的长期工作得到了回报。

现在，提到国家机关工作首位的是：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工作，加强苏维埃法律，反对私有制的流毒，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在我们活动的各个方面加强国家纪律而斗争。

在这些条件下，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关，提高它在完成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任务当中的组织作用，为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机关同群众的联系，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最近的时间里，全国地方劳动者苏维埃将要选举，这将大大改进各地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工作。

战后党和国家工作的新任务给党的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尖锐地提出必须提高党和苏维埃干部的思想和工作水平。培养和培训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帮助几百万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国家经济知识和苏维埃国家经济政治知识，以及国际形势和苏联对外政策知识武装他们——这是目前党所从事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为了切实提高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联共（布）中央认为需要在最近3~4年的时间里，通过党校及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学习班对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区的主要的党和苏维埃干部进行培训。为了这一目的，在改造学校和学习班训练

网方面已做大量工作。为培养加盟共和国、州和边疆区范围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成立了高级党校，学制3年。目前在这一党校学习的有1000名学员。此外，高级党校还开设9个月的学习班，培训州委和边疆区委年轻的书记，州劳动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州和边疆区报纸的编辑等。在这些学习班学习的已超过500人。

在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中心，开办了177所两年制的党校和9个月的训练班，有近3万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和报纸工作人员在其中学习。

联共（布）中央成立了社会科学学院，负责为中央党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联共（布）州委和边疆区党委培养理论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有高等技能的教员和科研机关、科学杂志理论工作者。科学学院设有以下专业：政治经济学，外国经济与政治，国家和法权理论，国际法，苏联历史，通史，国际关系，联共（布）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俄罗斯和西欧哲学史，逻辑学和心理学，文学和艺术理论。科学学院研究生学制3年。现在在这里学习的研究生近300人。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我党人数大大增加了。

尽管在卫国战争前线，我党伤亡很大，但战争期间党员人数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如果说战前党有党员和预备党员380万人，那么现在党员人数已达630万。也就是说，近一半党员是战争期间和战后加入联共（布）队伍的。

我党人数如此猛烈的增长是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绝大部分加入我党的人是在祖国危难关头入党的，也就是说，加入党的是人民中最坚定的分子。

党的队伍的迅速扩大和党的成分的变化尖锐地提出了必须对共产党员进行政治教育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共产党员，尤其是近年来

入党的人，没有受过必要的政治训练。出现了党的数量增长同党员和候补党员政治教育水平不相符合的情况。鉴于这种情况，党提出不再迅速增加党的数量，而要对党员和候补党员展开政治教育，把重点放在提高共产党员政治水平上，因为毕竟是质量重于数量。

在提高共产党员思想政治水平和劳动群众共产主义教育水准的事业中，现在广泛展开的对列宁和斯大林生平事迹的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6年恢复了因战争中断的列宁文集的出版工作，并开始出版斯大林文集。文集将印刷50万册。

此外，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各种著作也开始出版，印数到9000万册。斯大林简明传略出版发行100万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战后出版1000万册，从开始出版时算起，已超过3000万册。

我国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同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密不可分。在逐步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我国粉碎和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残余之后，国际资产阶级在苏联内部失去了它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所有支柱。但是，国际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苏联人意识中的资本主义余毒——私有制思想的余毒和资产阶级道德的余毒，某些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倾慕，以及各种民族主义的表现等等。

在诸多思想政治工作任务中，特别应该提出培养和发扬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教导说，“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在于，它不是把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偏见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把人民对于自己苏维埃祖国的无限忠诚，把我国所有民族劳动群众的兄弟般合作作为自己的基础。在苏维埃爱国主义中，人民的民族传统和苏联全体劳

动者的共同根本利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发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同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的表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党以尊重其他民族和承认它们独立发展的权利的精神教育苏联人民。

最近，党同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面前各种卑躬屈膝和奴颜十足的表现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种表现在我国知识分子某些阶层中传播很广，它是可恶的原沙皇俄国的流毒之一。党对这种卑躬屈膝和奴颜十足的许多具体表现给予了坚决的打击，因为这些表现在现阶段对苏维埃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危险——国际反动派的间谍机构为了削弱苏维埃国家，正极力想利用这些染上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和奴颜十足病毒的人。

十月革命把俄罗斯人民从外国资本的经济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使我国成了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实现了文化革命和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国家之后，我国人民使国家摆脱了对资产阶级西方的依附——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精神上。苏联成了世界文明和进步的支柱。

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有崇洋媚外的位置呢？类似这种反爱国主义的行为、表现和情绪的根源在于可恶的原沙皇俄国的余毒。在沙皇俄国占有巩固阵地的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千方百计支持和宣扬关于俄罗斯人民文化和精神缺陷的观念。脱离人民和与人民格格不入的沙皇俄国的统治阶级不相信俄国人民的创造力，不允许俄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落后。从此产生了一种观念，认为俄罗斯人应当永远充当西方欧洲“老师”的“学生”。

这些旧的资本主义代表的流毒现在被美、英帝国主义的间谍机关所利用，它们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侦察机关和反苏宣传在苏联内部找支撑点。外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努力在带有不相信自身力量烙印和染上崇洋媚外病毒的某些不坚定的我国知识分子阶层中寻找薄弱

点和突破口。这些人很容易成为外国侦察机关的养料。

在现在的条件下，党的思想工作的矛头是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流毒，同各种思想歪曲作布尔什维克式的不调合的斗争。在这方面，联共（布）中央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话剧院剧目等等决议），以及在中央倡议下不久前举行的哲学辩论^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保证在科学和艺术活动家的队伍中，战斗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占主导地位，以此加强苏联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党性，把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所有手段——报刊、宣传、科学、文学、艺术提到新的更高的水平。

在强调文学和艺术巨大的社会教育作用以及它们在人民共产主义教育尤其是在正确培养青年——培养青年一代朝气蓬勃、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不怕挫折、准备克服任何艰难险阻——事业中的作用时，联共（布）中央指出：苏联作家和艺术、文化活动家除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可能有其他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一切没有思想性、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教都是与苏联文学格格不入的，都是对苏联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有害的，都不应该在我们的书籍和杂志中有立足之地。联共（布）中央指出：我国的文学和艺术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应遵守构成苏维埃国家生命基础的东西——中央的政策。

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告诫苏联文化界的代表们不要崇拜正处在颓废和瓦解状态之中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和艺术。

中央特别强调全面开展认真的和客观的批评意义。舍此便不能

^① 在联共（布）中央 1946 年 8 月 14 日“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8 月 26 日“关于话剧院的剧目及其改进措施”，以及其他一系列决议中，尖锐地批评了杂志的编辑部和国家剧院所犯的“思想上的错误”。

继续发展苏联的文学和苏联的艺术。为了对思想工作各个领域的缺点展开批评，联共（布）中央成立了《文化与生活报》（联共（布）中央宣传部机关报）。

不久前在联共（布）中央倡议下，对格·费·亚历山德罗夫^①的著作《西欧哲学史》进行了哲学辩论，结果揭露出了我们理论战线上，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缺点。为克服这些缺点，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领域科学理论工作的进一步提高，成立了《哲学问题》新杂志。

现在中央委员会正在起草新的联共（布）纲领。现行的联共（布）纲领明显陈旧了，应进行修改。^②

在制定新纲领的同时，对党章也在进行修改。战后国内和党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章许多条款过时了。

三、对外政策问题

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阵地加强了，帝国主义阵营的阵地削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苏联的巩固和一系列国家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建立。

① 格奥尔吉·费奥多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文化与生活》杂志的编辑。

② 在报告草案中，这些话之后还有以下内容：“联共（布）的新纲领应该对于苏联国家存在的30年做出总结性评价，应该对于目前的国际局势做出分析，以及明确联共（布）在最近的20~30年的任务。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提出建设共产主义，也就是在苏联创造这样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实现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这显然是根据日丹诺夫的意见删去的，有关内容出现在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纲中。

粉碎德国和日本意味着帝国主义阵营的衰落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战争之后美国变得强大多了，而美国的伙伴——英国和法国削弱了。

在美国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被粉碎和英法衰落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实行旨在建立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新扩张主义政策。

在这些战后新的条件下，昔日在反对法西斯德国和帝国主义日本的战争中相互合作的军事盟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国际政策方向。

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代表着一种政策方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针是颠覆帝国主义，保障各民族之间巩固的民主主义和平，保障全面加强爱好和平的各民族的友好合作。

同时，我们的对外政策建立在苏维埃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际意义不断增长上。

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领导着国际政策的另一种方向。为了巩固美国垄断资本在战争期间在欧洲和亚洲所占有的阵地，这一集团走上了公开扩张的道路，走上了奴役被削弱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奴役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家的道路，走上了拟定新的战争计划、在同“共产主义危险”做斗争的旗号下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道路。美国资本的这种政策方向最鲜明而具体地体现在杜鲁门计划和马歇尔计划之中。

当代国际政策的两种方向就是这样。

苏维埃国家和英明的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使我们在战前和战争中利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这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我们本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这一事实出发，奉行同所有那些表示愿意友好合作的国家在遵守互惠原则和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条件下保持真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

方针。苏联捍卫这一方针，它坚定地彻底地恪守自己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义务。

同时我们时刻准备反击一切敌视苏联的政策，不管它来自何方。苏联同民主主义国家一起坚定地揭露所有和平的敌人，人民友谊的敌人，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国际合作的敌人，同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采用歧视政策，贬低它们的意义或在解决最重要的国际问题时绕开他们，制造阴谋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立敌对联盟和集团等一切企图做斗争。

联共（布）清楚地意识到过去战争中苏联盟友目前这种改变政策方向的危险性。我们看到，美国和英国放弃了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所承担的义务，在德国和日本、反民主的土耳其和法西斯君主制的希腊等国反民主阶层中寻找自己新的盟友。我们看到，这种游戏孕育着很大危险性，它们放纵佛朗哥西班牙，称赞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帝国主义分子，支持中国的反动制度，而对像南斯拉夫和波兰这样对粉碎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国家，则实行迫害和歧视的恐怖主义政策，粗暴地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干涉其内政，公开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民主、反政府分子，越来越公开地可耻地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制定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的侵略计划和新的战争计划。与此同时，美国的统治集团还是新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的倡导者。

自然应该看到，梦想成为侵略者的人想发动战争和可能发动战争之间的区别。新侵略者模仿希特勒分子，对意志薄弱者和不坚定分子施加影响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讹诈和恶意宣言。

我们拿来同美英帝国主义分子计划相对抗的是苏联和民主国家，首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苏联沉着地、坚定地反击一切对它进行讹诈的企图，敏锐地注视着帝国主义阵营里它昔日盟友的一切可疑行动，严防自己上当。

对于苏维埃国家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忠诚盟友——新民主主义国家，苏联永远准备着而且现在正在给它们以支持和广泛的援助，坚定地捍卫它们的利益。

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附庸国家奉行坚决支持的政策，支持它们争取民族解放和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斗争。

这就是联共（布）对外政策的基础。

由于苏联消灭了国内对抗阶级，达到了苏维埃社会的思想政治统一，现在苏联阶级斗争的锋芒开始转向国际舞台。这里正在形成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在与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较量中，我们的党将检验自己的武器。联共（布）非常重视对外政策问题，关心选拔和培养能够保障贯彻执行党的对外政策的干部。

党很重视用国际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干部，教会他们如何理解国际形势，学会在国际舞台上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区分朋友和敌人，猜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险恶用心和恶习。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苏联同全世界尤其是同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真正的民主的先进的进步集团和组织的思想、政治和文化联系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战后苏联社会组织获得了积极参加国际工会和其他民主组织的广泛可能性，可以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人民民主组织发展友好的联系。

苏联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加国际民主组织，帮助我们兄弟的共产党争取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统一的斗争，对抗右翼社会党人和这种统一的其他敌人的分裂活动，促进进步组织的成长和巩固，同时也加强苏联的国际影响。

我国同各国民主组织的各种文化和政治联系，促进了在国外传播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有利于加强苏联的影响，促进各民主

组织的活动。

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之后，联共（布）本着对自己国际义务的理解，保持了同兄弟的共产党和其他同我们亲近的民主组织的联系。

联共（布）努力答应各兄弟的共产党的请求，不拒绝给予同志般的援助，如果出现这种必要的话。

对联共（布）的请求是各式各样的，其中包括请求帮助制定纲领文件，政治计划，共产党要执行的最重要的法律等。

此外，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等国）还时常同联共（布）领导人会晤，尽管不都是定期的。

1945年，联共（布）中央开始专门出版对外政策问题通报，定期介绍外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各共产党的工作经验、外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内容。联共（布）中央把这一通报下发给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领导干部，还寄给某些共产党的中央。

但是，联共（布）和兄弟党之间的现有联系不能认为是充分的或令人满意的。这些联系带有非正规的性质，不能使我们和其他共产党及时相互得到广泛的、及时的和准确的信息，不能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制定共同的观点。

况且今天，当美国垄断资本正在组织反对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远征，发展扩张主义计划，企图借“援助”之名奴役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之时，当共产党人应该确定自己对美帝国主义这一计划的态度之时，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现有联系不能保障协调各共产党之间的行动。

按照我们的意见，必须实施旨在消除目前这些问题中不正常状况的明确措施。

我们认为，必须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加强各国共

产党之间联系和建立经常接触的问题，以便相互理解和协调行动，如果各国共产党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话。^①

① 在报告草案中，结论部分是以下列形式出现的：“在即将结束报告时，我想谈一下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众所周知，自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各兄弟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遭到了破坏。经验表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这种互不往来的情况，无论是对于联共（布），还是对于其他共产党来说，都使他们失去了获取相互情况的可能性，以及在关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的可能性。

目前，正当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反对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斗争时，正当他们实施扩张计划，打着‘援助’的幌子企图奴役欧洲和其他的一系列国家时，正当共产党人应该确定自己对美国帝国主义这些计划的态度时，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这使得各国共产党失去了协调自己的行动以便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些计划的可能性。

在我们看来，必须采取一定的旨在消除在这些问题上当前所存在的异常的状况的措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本次协商会议上必须讨论关于国际形势的问题，必须讨论关于恢复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以及在他们之间建立经常性的接触，以便相互理解和交流经验，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以相互一致的精神为基础自愿协调自己的行动。”

No 11649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情报局会议 第一天情况给斯大林的通报

(1947年9月22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①

今天，9月22日晚情报局大会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被邀请的各国共产党的全体代表：来自波兰的哥穆尔卡和明兹、来自南斯拉夫的卡德尔和吉拉斯、来自罗马尼亚的德治和安娜·波克、来自匈牙利的法尔卡什和雷瓦伊、来自法国的杜克洛和法戎、来自意大利的隆哥和雷阿勒、来自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和波普托莫夫以及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和巴什特万斯基。哥穆尔卡做了简短的会议开幕词。大会委托哥穆尔卡主持最初的几次例会，然后每个共产党的代表将轮流主持会议。大会决定不做速记记录，而只是用俄文做简短的书面记录。在通过了会议的议程之后，开始听取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只有哥穆尔卡和马林科夫做了报告。其他代表没有准备在第一次会议上做报告。

哥穆尔卡的报告内容丰富。报告对波兰的政治局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报了共产党所做过的工作。

在报告的结尾处，在分析波兰工人党的对外政策时，哥穆尔卡提出了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问题。他指出，波兰工人党在工作最困难的所有关头，都有机会得到了联共

^①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布) 领导人的忠告，这些忠告给波兰工人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因此，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和相互帮助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现在，世界帝国主义打算进行反共产主义的行动时。

明天一早，保加利亚人和法国人——契尔文科夫和杜克洛将做报告。大会约定，在情况报告结束之后，将明确根据这些情况报告提出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列入大会下一步工作的计划中。

就总体印象而言可以得出结论，大会的全体代表对会议的召开极为满意。

谢尔盖耶夫^①

鲍里索夫^②

1947年9月22日

① 谢尔盖耶夫是安·亚·日丹诺夫的化名。

② 鲍里索夫是格·马·马林科夫的化名。

№11623

契尔文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保工人党 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3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3日11时开始。

担任主席的哥穆尔卡同志让契尔文科夫同志作关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活动的情况报告。

契尔文科夫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苏联红军对多瑙河的胜利进攻和它越过保加利亚边界成了1944年9月9日人民武装起义的信号，结果推翻了法西斯君主专制，建立了以祖国阵线为代表的人民政权。

1944年9月9日在保加利亚整个国内和国际发展上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国内社会力量对比和它们在国家中的作用，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政权由团结在君主政体周围并同德国帝国主义紧密联系的大资本集团手中转到人民手中，转到以祖国阵线为代表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人民知识分子的斗争联盟手中。这一联盟的领导者是共产党。

9月9日和以后几个星期，对法西斯和反动派实施了毁灭性打击，粉碎了它们的组织，但新政权并未来得及剥夺其经济基础，未

能彻底根除它们。

1944年反动派通过盎格鲁-撒克逊走狗、臭名昭著的格·米·季米特洛夫博士^①进行了第一次复辟尝试，他企图同共产党的农民联合会对抗，提出了农民独立政权的口号，排斥共产党参加祖国阵线和参与国家管理。

反动派反对祖国阵线又一次更为严重的尝试是在1945年夏，这同美、英粗暴干涉保加利亚内政有关。在国外的授意下，以尼古拉·佩特科夫^②为首的保加利亚农民联合会中的反动派从祖国阵线中脱离出来。这两个反动的派别形成了反对派，在对内对外政策路线上公开与祖国阵线对立。在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下，反动派千方百计利用国家的暂时困难，尤其是当时保加利亚不稳定的国际地位。

但是整个发展进程打破了它们的美梦。保加利亚签订了和平条约。英国被迫正式承认了我们。在苏联的帮助下，祖国阵线政府使国家度过了饥荒，为实现自己的纲领开始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

当反对派的企图被无情地打破，当赞成反对派领袖的选民为国家展开的建设所吸引并开始参加这一建设，即实际上是脱离反对派之后，反对派领袖们剩下的招数就只有秘密活动和怠工反对人民政权，策划阴谋制造国内骚动，并以此为外来干涉创造条件了。这样，反对派就成了阴谋反对人民政权的分子和西方帝国主义怙恶不悛的走狗的巢穴。为了国家和巴尔干的和平和民主，必须坚决彻底将其消灭。

我党和我们的盟友一开始就对反对派中一时受佩特科夫恶意宣传迷惑的基层群众及其上层领导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现在，在佩特科夫组织被解散之后

^① 格奥尔吉·季米特罗夫-格梅托，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总书记，自1945年起侨居国外。

^② 尼古拉·佩特科夫，自1945年5月起担任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总书记。在1947年，因被指控犯有策划反国家阴谋罪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我们要实行这种政策，给那些因这样或那样原因在选举中投过佩特科夫赞成票的人回到祖国阵线来的机会。

粉碎佩特科夫反对派，这不仅是对保加利亚法西斯和反动势力，而且是对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分子在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反动计划的打击。

在不久的将来大人民议会将通过的民主宪法反映出保加利亚在推翻了法西斯之后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从一开始摆在祖国阵线政权面前最严重的任务就是按照新民主的原则恢复和继续发展国家的国民经济。祖国阵线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合作社和私有经济成分结合同时以国家成分为主的原则，计划原则，国家和社会监督生产、交换和信贷的原则，国家迅速工业化的原则。

大人民议会批准了两年经济计划，实现这一计划是目前政府和人民关心的中心。

两年计划应为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奠定初步基础，加速农业改造，大大提高社会成分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作用。

在我国，工业生产占国民总产值的26%。与1939年相比，1946年工业生产为91%。计划1947年工业生产比1939年提高34%，1948年相应提高67%。

国内大小工业企业共6250个，其中492个在我国属主导企业。在主导企业中，国营的占16.6%，合作社经营的占2.6%，属私人资本家的占77.8%。交通运输、矿井、银行在国家手中。此外，烟草、酒类生产、保险业由国家垄断经营。国内贸易大部分掌握在国家和合作社手里。最重要的日用品由国家独自经营。对外贸易在国家监督下进行。我们准备对主要的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通过发展国营商店和市属企业“集体商场”，私人零售贸易将逐步消失。

在最近3年时间里，保加利亚合作社运动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的

强大因素。季米特洛夫同志说，合作社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应起这样的作用，就像祖国阵线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一样。1947年4月，所有合作社联合会合并成中央合作社协会。加入中央协会的有5000个合作社，100万成员。整个合作社运动处在我党的领导之下。

在1947年国内贸易额中，合作社达到990亿利瓦，占整个交易额的60%。在对外贸易中，合作社的比重达到14%。

某些工业部门，如制糖和木材加工，几乎全部处在合作社手中。在罐头工业中，按照经济计划，合作社1947年将达到整个生产的48%，在肉类加工中合作社将相应达到50%，在牛奶业中合作社将相应达到90%。为完成经济计划，合作社运动将迅猛发展，尤其是在手工业生产 and 农业领域。

两年计划还规定增加农业生产。计划规定增加数万公顷耕地，主要是排干多瑙河两岸沼泽地。与1939年相比，规定1947年农业生产增长13%，1948年相应增长34%。

按照土地改革，88358个农户分得了土地，总数达10万公顷。但是保加利亚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出路在于合作化，在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将为农业机械化和摆脱农村落后创造条件。现在有农业生产合作社565个（20万公顷土地），根据经济计划，1948年将达到800个，这意味着保加利亚将近1/5的农村将有这种合作社。

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里还开办了209个畜牧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有卡车187部，拖拉机409台，脱粒机181台，拖拉犁626架，以及其他农业机械。尽管农业生产合作社机械化程度还不高，还有经验不足和训练有素的干部不足等多种困难，但是它们已显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和与比单干农户相比的巨大优越性。

农业劳动合作社不是集体农庄。保加利亚的土地没有国有化，农业生产合作社部分成员保留着对他们入社土地的所有权。此外，合作社的收入一部分是以地租形式分配给土地所有者的。农业劳动

合作社的优势，无论是从经济观点看，还是从以集体精神教育农民的观点看，都是很大的。机械拖拉机站的建立也促进了劳动合作社的发展。现在有拖拉机站30个，1948年将增加到50个，拖拉机将达到1317台。完成两年经济计划以后，全国拖拉机数量将从1946年的4629台增加到1947年5155台和1948年6155台。其他农业机械也将相应地增加。

完成经济计划的困难也是很大的。这里不仅有客观原因，也有组织工作薄弱和以前遗留下来还远未肃清的官僚主义的因循守旧以及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的怠工和破坏等方面的原因。

但完成这一计划是有保障的，这就是人民群众准备响应这一计划，他们为此具有高涨的劳动热情。

为实现经济计划，我国首先指望自己的力量，以及兄弟的斯拉夫国家，首先是苏联的援助——至今我们仍在广泛利用苏联的援助。

我们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只有发展生产，改善生产质量，降低生产消耗才能有效地保障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障国家财政的全面好转，改善工厂和农村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

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可以说是正常的。^① 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除美国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希腊之外，保加利亚几乎与所有的国家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幸亏有伟大的苏联以及其他兄弟的斯拉夫国家给予我们的帮助，保加利亚才能够获得了和平条约，虽然这个条约包括了许多比较沉重的条件，尤其是在希腊的战争赔款方面，但是保加利亚却保住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不受侵略，保住了国家的主权。与条约的签署和祖国阵线政府的和平政策相反，保加利亚与希腊和土耳其交界，这种情形要求党和人民表现出极大的警惕性。对于巴尔干民主主义国家来说，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希腊和反动的土耳其是永久性危险的策源地。最近一段时期，在我们国家与希腊的交界地带出现了一系列的挑衅事件，以及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事务，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了挽救自己的代理人尼古拉·佩特科夫给祖国阵线政府施加压力，暴露了他们反对保加利亚以及巴尔干其他民主主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侵略计划。”

路线是与所有热爱自由的民族合作，无论如何保障国家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正如季米特洛夫同志多次指出的，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同我们的解放者伟大的苏联的永久友谊，同新南斯拉夫的兄弟般同盟，同其余所有斯拉夫国家和其他民主主义民族的密切合作。

布莱德会议和它通过的决定意味着新保加利亚和新南斯拉夫之间相互关系新阶段的开始，意味着两国在建立紧密联系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在布莱德会议上，通过了协商行动和共同保卫巴尔干和平的决定。

即将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这些条约将进一步加强保加利亚的国际地位。

保加利亚坚决拒绝参加实现所谓“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因为保加利亚丝毫不能牺牲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

在国家政权和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我党都占据最重要的位置和起主导作用。1945年秋第一次议会选举是在预先与同盟者达成协议和在共同选举名单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我们与农民党平均分配议会席位。但我们不能长期这样做。应当确定祖国阵线中每个党的政治比重和它在人民中的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在大人民议会选举中发表共同纲领，但选票需带有各自单独的颜色。我们的盟友被迫同意了。我们是和同盟者共同举行选举运动的，共同在会议和集会上发言。众所周知，选举中，我党赢得了很大的胜利，获得了54%的选票和280个席位，即整个议会60%的席位。我们的同盟者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同反对派做积极的斗争。根据宪法和议会实践，我党可以组成单一的共产党政府，但考虑到祖国阵线的巩固和人民的团结，我党为祖国阵线所有党派提供了参加政府的机会。

在祖国阵线和国家管理中，现在我党是主要的最积极的力量和领导力量。对于我党的领导作用，在我们的同盟者中现在没有一个

敢公开提出异议或加以否定。从季米特洛夫同志领导政府以来，无论在政府里，还是在议会和祖国阵线民族委员会里，对重大问题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分歧。

祖国阵线不是各党之间简单的联合。这首先是人民运动，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职员、人民知识分子为按照真正民主的原则复兴祖国而工作的战斗联盟。为巩固祖国阵线，把它建成人民所有健康力量的战斗联盟，我党做着所能做的一切。祖国阵线民族委员会是国家统一的民主力量的真正领导。我们经常同各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人一起召开祖国阵线民族委员会共同会议，讨论国家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地方上的祖国阵线委员会按对等原则组成。

祖国阵线由5个政党组成，它们是：我党，保加利亚农民联盟，“环节”人民联盟，社会民主党和激进党。参加祖国阵线的还有所有的群众组织：工会、经济、文化、妇女、青年等组织。

我们同保加利亚农民联盟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这个组织有着反对大资本家和法西斯的传统，在农村影响力不小。该联盟的领导权在佩特科夫分离出去之后转入祖国阵线成员手中，我们同他们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全力支持他们。

我们在农民联盟里的盟友现在掌握着联盟的领导权。我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信任和共同工作的亲密关系，我们正积极地采取措施以求在地方上也建立类似的关系。

“环节”人民联盟——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人数不多的一个小党。它在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有某些影响。党内分左中右三派。左派在党内没有多大影响。我们同基蒙·格奥尔吉耶夫^①领导的中间派一起工作得很满意。基蒙·格奥尔吉耶夫至今

^① 基蒙·格奥尔吉耶夫，“环节”人民联盟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和保加利亚外交部长。

还跟随着我们，大概他还将勉强同我们合作。不过，他并不想同党内右派断绝联系，而这些右派多次表现出反共产主义的面目。同“环节”右派，我们还将不断打交道。

“环节”右派同佩特科夫有联系。其大部分首领是作为保加利亚的大使，在国外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我国工人阶级中影响不大。这个党的领导层里有反共分子。他们伺机等待，暂时还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

激进党，完全是一个小党，没有什么影响。

在中央和党的州委里，我们基本上学会了很好地同同盟者一道工作，使他们同我们一起，而实际是在我们的领导下工作。不能说地方上我们的所有工作者都学会了这样工作。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地方上的同志应正确贯彻与同盟者合作的政策。学会在地方上同我们的同盟者一道工作，这将保障我党同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

根据 1947 年 6 月 30 日的资料，我党现有党员 51 万人。1944 年 9 月 9 日之后，我们有意识地对工人、农民、职员、知识分子敞开了党的大门。

1944 年 9 月 9 日之后，党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吸收了几万名新党员。因此我党面临着—项重要的任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新党员。

实际上，大批吸收党员的工作现已停止。在机关里吸收党员我们是非常谨慎的。通常我们拒绝接收从同盟者党中退出的人入党。现在我们正集中精力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加强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党组织的纪律性，提高它们在祖国阵线和管理中的领导作用。我们坚决清除那些怀着个人目的想借党营私或掩盖自己劣迹的、偶尔混进党里来的人和异己分子。虽然我们没有正式宣布清党，可我们正在清除这些人。今年我们已清除出 3 万这样的人。我们还将积极地进行这种工作，把一时混进来的人、追求名利的

人、腐败分子清除出党。

党的社会成分如下：

工人党员人数（名）	132153
其中：工业工人	40907
手工业者	20825
国营农场工人	18169
交通运输工人	12594
勤杂工	39658
农民党员人数（名）	223386
其中：贫农	146304
中农	71690
富裕农民	5392
职员中党员人数（名）	82405
其中：私人企业中	5750
合作社中	11970
国家和市政机关中	64685
手工业者中	31001
商人中	6140
大学生中	5849
退休者中	6075
家庭妇女中	23043
总计	510052

其中妇女党员共 67105 名。

可以说，全国居民集中的地方都有我党的组织。^①

在我党全体干部的教育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学会管理，而且

^① 在原报告中，几乎有 4 页的篇幅用于讲述党的干部问题。

是学会同我们的盟友一起管理。1946年初，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索非亚州委会议上讲话时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对我们盟友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现在我们不能推卸责任。我们现在要为一切负责。在我们的权力范围里，我们要做需要做的一切。然而在我们干部的工作中，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还没有完全的必要的统一。在同一个机关里，正是共产党员自己争吵和互相争斗。我们的地方干部经常有直接歪曲中央和地方政府指示的情况。经常出现歧视我们的盟友，傲慢粗暴地对待居民，赤裸裸地命令主义，不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不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甚至对抗政府的措施等现象。由于地方上歪曲党的政策，我们招来了更多的本来可以避免的反对派。

并非我们的所有干部，尤其在农村，实际掌握了党的总政策。我党农村干部（书记和党委会成员）的政策水平很低。作为祖国阵线和管理国家的领导力量，我党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尽快消灭这一弱点。这就是我党中央把党的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首位的原因。我们对自己的宣传鼓动工作很不满意。党的教育工作做得也不够。我党有4000~5000个学习小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党史和党的现行政策，学习人数达50000人。我们组织了很多一个月或两个星期的学习班（夜校）。普罗夫迪夫、普列文和索非亚定期开办三个月的学习班。索非亚有一所一年制学校，有60人。当然，这带来了积极的结果，但离党的需求还相差甚远。这是我党很大的弱点。党中央正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加强党的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①

我党开展了广泛的出版工作。我党的出版社是国内最大的出版

^① 原报告中在接下来的两页中，分析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在农村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中的缺点。

社。我们大量出版马列文献。列宁和斯大林最重要的著作已翻译成保加利亚文出版。已出版几卷列宁选集。近几天要出版斯大林传。准备出版斯大林文集。

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发行量24万份。党还出版理论杂志《新时代》，发行量2.5万册，还有《哲学思想》杂志，10000册。此外，中央委员会还出版《党的工作者》杂志，探讨党的建设问题和宣传鼓动问题，发行量10000册；《宣传手册》杂志10000册。

在省里，我们没有党的报纸。那里只出祖国阵线委员会的报纸。我党州委拥有印刷机关，印刷传单和其他材料。

所有社会、专业、文化、运动等群众组织的刊物都掌握在共产主义者手中。

党的思想工作还很薄弱。对新的建设经验还未展开理论研究。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力量还很少。我们努力把他們组织在《新时代》杂志周围，但成绩不大。没有彻底揭露和粉碎法西斯思想残余。大学里还在学习旧的资产阶级教科书。大学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在大学专业教研室里党的阵地还不十分牢固。科学院的改造刚刚开始。

但我党在全国知识分子当中，在领导整个文化战线上取得了关键性的成绩。大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了祖国阵线。保加利亚艺术、科学、技术界著名代表人物都是我党党员。律师、工程师、医生这几类人加入祖国阵线进展较慢。但我们已顺利地粉碎了反动派的巢穴。新闻部与所有的文化学院都有联系。除部长和另外一两人，这个部所有负责职务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党非常关心文化战线。党中央通过专门成立的下属委员会领导文化战线各部门的日常工作。

实际上我党领导着全国的工会运动，全国成立有总工会，有会员57.6万人（产业工人共有74.7万人）。也就是说，总工会团结

了全国产业工人的 77%。

总工会中央委员会有 71 名委员，其中 59 名是共产党员，4 名是农民党党员，6 名社会民主党党员，2 名原反对派。在加入总工会的各独立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9154 人^①中，787 人是共产党员，45 人是农民党党员，31 人是社会民主党党员，8 名是“环节”党成员，20 名“革命青年联盟”成员，52 名无党派人士。总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我党政治局委员。总工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我党中央委员。保加利亚工人阶级完全处于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

其他群众组织实际上也都处在我党的领导之下，我党对它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农户组织——农民总工会，有会员 12 万人（近一半是妇女）。对这一农户组织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任务：第一，利用所有其他社会组织（合作社、金融机构，祖国阵线委员会，市苏维埃）的援助，促使提高农民的福利。第二，积极主动提高农村的文化。第三，农民总工会应为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同全国总工会的联系而积极工作。我们把总工会看成未来取代农民总工会这一农村政治组织的手段。

同党有紧密联系的还有革命青年联盟组织（50 万人），它在劳动战线上开展着广泛的活动。革命青年联盟是我国建设战线各个领域劳动队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青年联盟正为保加利亚全国民主青年的统一而奋斗。全国已成立许多民主青年委员会。现在全国已有 4000 个这样的委员会。它们协调各青年联盟的共同工作。除青年联盟（“农民青年联盟”10 万人，“社会青年联盟”1.5 万人，“环节”组织 1 万人）外，民主青年委员会还广泛团结非党青年群众。革命青年联盟正逐步把自己的教育工作重心转向民主青年委员会。在各地

^① 原文如此，疑有误。

方，委员会的领导几乎都是我们的人。成立全国统一青年组织的呼声很高。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革命青年联盟和农民青年联盟代表大会将为明年春天民主青年委员会代表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我们认为，在明年民主青年委员会代表会议上，可以着手建立青年组织联合会，为未来青年组织的完全统一铺平道路。

中学里的青年学生已完全联合成统一的组织（18万人）。我们还领导着小学的少年组织，共有成员60万人。

新民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妇女的巨大政治积极性。在我党的倡议下成立的广泛妇女同盟拥有成员40.7万人。我们成功地顶住了分裂这一同盟的企图。其他党的妇女组织没有多大意义。

我们在农村的影响很大。选举中反对派得票主要是在城市。今年为了保障粮食定购的成绩，政府采取了特别措施，这使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出现了某些紧张。农民特别不满的是政府关于对粮食进行统一脱粒的决定，以及每个公民定量分配600克面包的规定。这表明了我们农村工作的弱点，说明了我党组织的薄弱，说明我们宣传解释工作不够，说明我们不善于同中农——主要的粮食提供者和农村最有威望的农民保持紧密的联系。季米特洛夫同志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期限内采取政治和经济措施消除同部分农民的分歧。不少中农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斗争。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可以也需要吸引中农，把中农作为我们最亲密的盟友。

所有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权都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国家安全机关和边防军里，我们不同任何人分享权力。

在军队里我们占有领导地位。军队里最重要的指挥职务都在我们手中。我们将逐步从共产党员中培养部队指挥员以取代旧军官。但丝毫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在我们的军队里，还未彻底肃清不合格的人和敌对分子。在部队政治和战斗训练中还存在许多缺点。

党非常重视保苏协会，协会现有会员 100 万人，在普及苏联知识和加强保苏友谊方面，协会开展了很多活动。

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1. 尽一切努力保卫国家独立和国家主权，全面加强我国同伟大苏联、同兄弟的南斯拉夫、同所有斯拉夫国家和其他民主主义国家的友谊；不丧失对尚未被消灭的反动派的阴谋的警惕。

2. 努力工作，保障完成和超额完成两年经济计划。

3. 厉行节约，为实现计划，首先应该依靠我们自己，依靠自身的力量。

4. 搞好春播，保证明年的粮食供应。

5. 对新宪法草案给予某些重要修改（建立主席团以取代共和国总统），通过新宪法最后草案，根据宪法实行全国立法。

根据宪法，改造整个国家机构。

6. 进一步加强我党在祖国阵线和国家管理中的领导作用。准备召开祖国阵线大会，会上准备解决祖国阵线各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在所有祖国阵线组织代表参加的大会上选举）。这是祖国阵线作为真正的人民运动向前发展的重要一步。

我们把祖国阵线看成是在我们保加利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最好形式。

№11624

杜克洛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法共 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3日)

绝密

休息过后，13时10分，会议主席哥穆尔卡同志建议杜克洛同志发言，作关于法国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杜克洛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杜克洛同志对有机会同参加过共产国际的各党代表见面表示高兴。同联共（布）代表见面，法共代表尤为高兴，他们借机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表示感激。杜克洛同志说，法国国内的基本特点是：共产党被挤出政府；工人生活水平恶化；法国恢复怠工，以抵制把法国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对印度尼西亚发动殖民主义战争；法国加入西方集团；人民群众对政府政策不满和工人阶级展开行动。

在这些条件下，正在准备今年10月19～21日举行的市政选举。鉴于举行选举，美国对法国内政的干涉日益加强。

法国共产党是战争年代法国反抗希特勒德国的主要力量，是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倡导者。

党旨在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绩。^①

1947年第一季度，法国工业达到了战前生产水平的95%。假如保证鲁尔区的煤炭正常运到，这一水平提高得还将大。

这一数字说明了法国工人阶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走在前面的是国家工业部门（矿山达到战前生产水平108%，交通运输业达到战前水平的120%）。

最近几个月，生产速度开始放慢。这说明，把共产党排挤出政府影响到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

如果说1947年初在工业战线呈现出好的前景，那么农业则是另一种景象了。现在面包定量是200克，而且这一定额也是依靠进口粮食。法国已请求国际组织提供180万吨粮食，但只答应供给82万吨。

从9月1日开始实行的面包定额下降引起了全国的罢工浪潮和抗议游行示威。

面包供应困难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对政府信任。战前法国粮食十分充裕，现在则完全依靠进口。除旱灾和霜灾之外，影响减产的因素还有政府不合理的价格政策。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如小麦播种面积从1939年520万公顷下降到1947年330万公顷。

党把争取面包的口号作为党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主要口号之一。其中，党准备为把播种面积扩大到500万公顷而奋斗，为此争取为每公顷小麦播种建立奖励制度，主张为农户发放种子，供给他们肥料，还制定了许多刺激农民扩大小麦播种面积的措施。这一争取面包的斗争同争取法国国家独立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政府的反国家政策是美国对法国粮食出口所造成压力的结果。

^① 报告原稿在此列举了法国矿石开采、铸铁、钢材、机车、车辆、重型和轿车生产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美国压制法国减少小麦生产是从1944年系统实施的。现在法国完全依赖从美国进口小麦。

法国感到牛肉、油脂短缺。而大量牲畜又通过走私运往境外。

为进口粮食，需要大量自由外汇。除急需的物品外（粮食、煤、动物油），政府已禁止其他所有进口。进口煤炭是由鲁尔区供应不足造成的。出现了稳定或降低鲁尔区煤炭供应和加大美国煤炭供应的趋势，尽管美国煤炭不适合平炉使用。例如，1947年3月，从鲁尔运进15.5万吨煤炭，而从美国运进57.1万吨；4月相应数字为16.4万吨和78.5万吨；8月相应数字为17.4万吨和121.5万吨。同时，美国的煤价每吨2400法郎，而从鲁尔区运进的煤每吨为2140法郎。

现在法国进口已无美元可用。英国禁止英镑和美元自由兑换的决定引起了法国新的外汇损失。不久前，财政部长请求国际银行从5亿美元的储备中拨给法国二级配额2.5亿。

法国对外贸易支付平衡有很大赤字：1947年上半年进口1250亿法郎，而出口仅为640亿法郎。主要从西方国家——其中主要是从美国进口。例如，1947年上半年，法国从美国进口商品价值为470亿法郎，从比荷卢（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进口额为430亿法郎，而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国家进口额仅为29亿法郎。而且在法国同美国的贸易中，法国进口为470亿法郎，出口仅为38亿法郎。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法国的外贸，几乎全是面向美国和西欧国家的。

法国银行的黄金储备正在枯竭。1939年黄金储备达到2159吨，而现在这些储备只剩下394吨。所以说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纸币的发行在增加：1947年4月流通的法郎纸币的发行额为7700亿，到1947年9月4日流通领域中的法郎纸币的发行已达到8540亿。如果说所谓的普通预算基本上没有赤字，那么现在的特别预算

赤字已达 1260 亿法郎。

价格指数 1947 年 4 月达到 837，同年 8 月达到 1068。毫无疑问，共产党退出政府影响到价格上涨。

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渐降低。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价格的上涨。现在的实际工资仅为战前的一半。与此同时，资本家的收入却很高。例如，大工业企业家 1947 年收入为 1100 亿法郎（1945 年为 170 亿）。

不少企业家开始意识到现时形势的危险性。所以，1947 年 8 月 1 日主动同总工会签订了提高 11% 工资和共同把价格维持在现有水平的协议。拉马第政府^① 对这一协议采取了否定态度，实际上只是限制了给低薪工人阶层增薪，政府的这一行动实际上促使了价格上涨。

战争年代，法国的资产阶级有两张王牌：一个是贝当^②，一个是戴高乐^③。戴高乐从未停止过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他奉行观望政策，认为盟军在法国领土上的行动将消灭共产党的抵抗运动和他们在解放战争中所取得的阵地。

共产党能否比其所作所为更进一步呢？

应该注意到，1944 年 8 月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如果党不执行当时的政策而执行其他政策，一定会败坏自己的名誉，使自己孤立于群众之外，失去自己已取得的阵地。很明显，当时惟一正确的政策，头等大事就是同希特勒做斗争。假如采取措施反对戴高乐，这种政策将引起盟军实施反对共产党的行动。

① 保罗·拉马第，1947 年担任法国部长会议主席，1948~1949 年担任国防部长。

② 亨利·菲利普·贝当，自 1940 年起担任法国总理，曾与希特勒德国合作。1945 年被判处终身监禁。

③ 夏尔·戴高乐，自 1940 年起在境外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1945 年成为法国政府和武装力量的首脑。自 1946 年 1 月退休。“法兰西人民联盟”党的领袖。

戴高乐的计划很简单，这就是孤立和排挤共产党。为此他决定依靠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戴高乐的这一政策得到了社会党人的支持，他们1945年4月在市政选举中实际上同人民共和党结成了联盟。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在竞选中失败了，结果社会党中出现了强大的改变党的方针的思潮。但就在这时，战争期间躲藏在德国的布吕姆^①回到了法国。

1945年8月，在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布吕姆作了详细的反共纲领的发言。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所谓“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建议修改党章，这些修改为同人民共和党结盟创造了条件。

布吕姆把人民共和党当作了社会党人的盟友，使人民共和党以“左派”党的面目出现在群众面前。其实，人民共和党是反动力量，它以自己的欺骗宣传和吹嘘自己在解放斗争时期的“行动”掩饰了它的反动本质。

1945年10月选举时，人民共和党借助同社会党的联盟跃居首位。社会党放弃了成立社会党和共产党政府，成了人民共和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仲裁人。社会党的立场促进了人民共和党右派的巩固。

社会党人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在1946年6月2日的选举中，他们的得票率下降了，而人民共和党的得票率增加了。共产党的得票略低于人民共和党。但当时人民共和党不想成立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害怕人民不满。当时它同美国人的联系还不密切。

在1946年11月10日的选举中，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失去了很多选票，而共产党得票最多。在决定总理职位候选人时，对于多

^① 莱昂·布吕姆，法国社会党名誉主席，自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出任政府总理。

列士^①来说社会党人的 20 票是不够的。人民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这种情况。最后总理由布吕姆担任，他受反动派的委托，试图拒绝共产党人参加管理。布吕姆执政仅两个月，但在这段时间里，他成功地把法国拉入了西方集团，为英法结盟做好了准备，开始了印度尼西亚战争。接替布吕姆并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的拉马第内阁，起初决定追随布吕姆所蛊惑宣传的降低物价的政策。实际上拉马第的政策使群众失去了对实现降低物价政策的信心。

总工会要求建立超额工作奖，这可能会导致增加工资。拉马第立即提出了信任问题。这时群众已有很大不满情绪。共产党应该确定自己的立场。早在 1947 年 3 月，拉马第就因讨论印度支那战争问题提出过信任问题。当时共产党没有破坏政府的团结，不愿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制造政府的危机，因为对这种危机工人阶级可能不理解，在中层阶级中也不会有好的反响。

当拉马第第二次提出信任问题的时候，共产党就不能再采取这种立场了，不能在劳动群众的眼里毁坏自己的名誉，因为问题涉及的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共产党人投票反对信任表决，而后来被排挤出政府。假如共产党这时实行另外的政策，那么就会同工人阶级断绝关系。共产党员被挤出政府意味着党的孤立，但最可怕的孤立是脱离工人阶级的孤立，党避免了这种孤立。假如共产党人留在政府里，容忍在劳动群众中败坏自己的声誉，那么以后将会很容易将共产党永远驱逐出政府。

现在法国工人阶级（其多数相信共产党）以及中间阶层和农民都坚信，共产党离开政府之后，国家形势将变坏，离开共产党什么事情也办不好。群众中正在开展让共产党回到政府中去的运动。共

^① 莫里斯·多列士，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46 年 11 月至 1947 年 5 月，担任政府副总理。

共产党作为参加组阁的党，其威望在群众中很高。

共产党正在做宣传解释工作，向劳动群众证明，为了使国家形势好转，政府的供应、财政、工资和物价等经济政策，殖民主义政策和外交政策必须改变。

拉马第政府正进行印度支那战争。急于消灭胡志明（已有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和使原皇帝保大复位。不久前在马达加斯加出现了流血事件。法国议会通过的阿尔及利亚法律地位引起了广大阿尔及利亚居民的不满。

这样，政府的殖民主义政策，作为不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一种政策，应予以根本改变。

皮杜尔迈出了向西方靠拢的有力步伐。他签署了鲁尔区煤炭分配协议，积极支持旨在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马歇尔计划，召开16国会议是成立西方集团的第一步。

马歇尔反对大国一致的原则及其在其他问题上的角逐，是发动新战争的实际步骤。这意味着，应该组织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揭露“马歇尔计划”内幕的运动。这是本次会议上应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在法国，有“马歇尔计划”的敌人，但这一计划的保护者们迫使人们相信，没有美国，法国就不能独立存在，法国离开美国不行。

各民主党，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在于向本国人民群众证明，欧洲各国即使没有美国的援助，也完全有能力恢复自己的经济。其中法国共产党的阵地可以得到很大的加强，如果它在未来国家选举中能够向人民证明这一切的话。问题在于怎么做这件事——这是本次会议应该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法国共产党正在研究这些问题。

法国共产党在本国劳动群众各个阶层中的影响近来大大提高了。由于害怕共产党在市政选举中获胜，右翼党派极力想通过旨在

反对共产党人的选举法，借助这一法律剥夺我们在以往市政选举中所获得的阵地。^①

现在我党有党员 93 万人，即比 1946 年少而多于 1947 年 4 月。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到 1947 年底，党员人数要超过 100 万人。

全国总工会会有会员 600 多万人，其中 500 万人处在共产党的影响之下。各主要部门工会也在法共影响之下。法共成员中还有许多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等。近来教员中党员人数在增长，以前他们都远离共产党。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绩的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的。他们积极地在法苏友好协会里工作。

农民在战争期间对共产党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提高了我们在农村的影响。在农民眼里，法共是法兰西共和国里最大的党。

共产党领导着“法国妇女协会”，该协会有成员 50 万人。党在青年中的影响在增大。“青年协会”有成员 30 万人，处在法国共产党的影响之下。

法共出版的儿童杂志印数达 12 万份，同美国出版的儿童杂志进行着有力的竞争。^②

除共产党外，在其他党里都有戴高乐建立的“法国人民同盟”的追随者。该同盟在选举时的行动可能动摇其他党的立场，使反共联盟的建立变得复杂化。

戴高乐寄希望于把国内秩序搞乱。他的人同纵火、恐怖、暗杀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一句话：“替换共产党员市长，夺取我们占第一位的选票。”

② 原报告中接下来还有以下内容：“在国内，在城市和农村，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现存的政府。

在举行最后一次信任投票时，拉马第获得了微弱的多数票，但是，他紧紧地抓住政权不放，并把自己扮成戴高乐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中间人。

法国共产党揭露拉马第是戴高乐政策的继续者。”

活动有关系。他想以此煽起人民消灭国内“混乱”状况的愿望，使人民盼望一党执政，盼望他领导的组织成为“维持秩序的党”。^①

共产党广泛地向群众解释说，戴高乐是反动派，拉马第在为戴高乐扫清道路，而共产党是国内最大的维持秩序的党。我们说，应在反动和民主之间进行选择。

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党人的立场。社会党里昂代表大会^②表明，该党内部对拉马第政策有不满情绪。

摩勒^③决议草案包含有对拉马第的批评。草案里指出，政府没有完成党的纲领和决定。草案还要求改变政府对殖民主义问题的政策。在这一草案里有不少积极的方面和提法。

摩勒草案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很多赞成票。关于未来选举中共产党和社会党的结盟问题还悬而未决。

右翼社会党人（布吕姆、拉马第等）是反动派的走狗，而社会党左翼害怕同共产党一致行动。左翼社会党人中有一种不安情绪，并且还将增大。对于共产党而言，同社会党统一行动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这种统一行动将根本改变国内形势。应该加速促使社会党向左倾。

在本次会议上应该讨论这个问题：能否利用东欧国家社会党人对法国社会党人施加压力和影响。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让人们相信制定摩勒草案的那些人，而是要反对孤立共产党。应该对我国的共产党人施加影响，改变他们的行动。

杜克洛同志说，法共面临的任务很艰巨。但党有办法完成这些任务。

① 原报告中接下来还有以下内容：“拉马第坚决主张，应该在共产党人与戴高乐之间进行选举。”

② 法国社会党里昂代表大会于1947年8月14~27日召开。

③ 居伊·摩勒（1905~1975），法国社会党总书记，无任所部长。

杜克洛同志通报了党的刊物情况：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发行40万份，星期日50万份。共产党的其他日报发行总量达到100万份。党出版了几份杂志，其中有理论杂志《共产主义手册》，发行量6万册。

1947年9月召开了党中央全会，确定了走出目前危机的三项条件：

1) 通过刺激生产者积极性，充分利用国家资源。贯彻总工会和企业家之间签订的关于价格和工资的协议。理顺农产品价格。发展技术和加强勘探工作，保护法郎，实施征税民主改革，降低社会开支，减少大批军事贷款，在1946年3月6日协议的基础上立即同越南签订和约，发展同法国同盟国家的交往。

2) 保证德国战争赔款的支付，做到为法国供应煤炭、车床、电力和机械设炭。对鲁尔区建立国际监督。对外政策应以所有盟国之间的协定为基础，而不是放弃我们作为被占领国的权利。拒绝西方集团，其追随者把德国推到了法国前面，在全世界支持反动势力和法西斯势力，尤其是德国和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和法西斯势力。

3) 争取战争创伤较轻的友好国家和盟国的经济和财政援助，努力签订贷款协议以使我们容易得到以后不影响我国对外政策的贷款，保障按照尊重民族独立权的精神，正常发展我国同一切盟国和朋友的贸易关系。

为对我党干部进行培养和教育，发展党的教育网。现在有两所中央学校和培养各种工作专家的学习班（报刊、对外政策、工会等方面的专门人材）。^①

^① 原报告中接下来还有以下内容：“党中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关于在思想战线上进行斗争的问题。采取措施，以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的机关更灵活地进行工作，改进报刊的内容和形式，等等。”

共产党认为，法国在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共产党准备站在它所面临的任务的高度之上。

在讲话结尾，杜克洛同志表示，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意扩大与其他国家兄弟的共产党的联系，同意与它们建立经常的联系。

会议于15时30分结束。

No 11650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契尔文科夫的 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3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在9月23日上午的会议上，听取了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和杜克洛的情况报告。契尔文科夫的报告从质量和政治水平来说属于中等。但是，契尔文科夫十分令人感兴趣地概述了保加利亚的政治局势，这种评述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报告还对党的任务做了详细的论述。契尔文科夫还指出了党的最大的缺点是共产党人在农村中行政工作方面的过火行为，尤其是在进行粮食收购时，以及党务工作人员极低的思想政治水平。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保加利亚人实际上已经停止接收党员，并对党进行了清洗：仅在今年就在总数50万党员中开除了30000名党员。谈到国家机关时，契尔文科夫通报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在保加利亚驻国外的大使中，有许多对政府心怀不满的右翼分子，以及军队中的许多指挥岗位，时至今日仍然被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占据着。

作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契尔文科夫列举如下：主要任务——保证保加利亚的独立和主权；同苏联以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友谊；提高对战争贩子的警惕性，与保加利亚的美、英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斗争；制定五年计划；制定严格的经济措施；准备对大

型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措施（目前在492个最大型企业中，有16%已经实行了国有化）；加强生产合作社；完成宪法的制定工作，并对其中的条款进行修改，取消总统，改为主席团；在宪法得到最终批准之后，对政府进行改组，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政府；祖国阵线委员会的组成从均等原则的基础，转为选举制，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巩固党在祖国阵线中的地位，据保加利亚人看来，这将巩固党在祖国阵线中的地位。

（待续）

No 11651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杜克洛的 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3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接上)

关于杜克洛的报告。杜克洛的报告给我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杜克洛没有从法国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的处境中吸取任何教训。与此恰恰相反，杜克洛认为党在采取统一行动之前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杜克洛报告的基本内容可归纳如下：法国的政治局势正朝着有利于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法国越来越倾向于西方集团，并逐渐变成英、美帝国主义的仆从国。这种局势在法国的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情绪。

当共产党人还在政府里任职时，法国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在持续地增长，并达到了战前水平的95%。为提高工业总产值，共产党人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

排挤共产党人这一情况对生产的增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就连工厂主也在散布对局势的不满情绪。因此工业产值下跌了。

谈到到农业，杜克洛认为是灾难性的。这种灾难性的农业导致了供应方面的尖锐危机。由于干旱，使得今年的谷物，尤其是小麦，收成不好，而不正确的物价政策更加重了这种欠收的后果。近

年来，次要农作物的价格一直高出小麦价格许多，这导致小麦的播种面积由战前的500万公顷下降到1947年的300万公顷。其结果是法国今年供应不足，即便是他们能够从美国进口80万吨谷物，那么也还要欠缺100万吨。

形成的局面是：在谷物方面他们完全依附于美国。

除了最必需的东西，例如与俄罗斯相比质量差并且价格昂贵的美国煤炭之外，已经停止了对其他货物的进口。

法国在美国面前卑躬屈膝，它请求美国为其提供民用食品和工业原料。没有了美元，法国开始吞食最后的黄金储备，在拉马第政府执政时期这种吞食更加厉害了。

法国的对外贸易逐渐被美国人控制起来。法国的收支极不平衡。法国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等于零。国家预算出现赤字。庞大的军事支出成了国家的负担。印度支那战争每天要耗费1亿法郎。

随着共产党人离开政府，物价逐渐上涨。工人阶级的处境严重恶化。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跌至战前的一半。拉马第执行着“罪恶集团”厚颜无耻的政策，并直截了当地宣称，任何一次提高工资，都将会引起物价相应的提高。

资本家的收入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根据不完整的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在1945年是170亿法郎，而在1946年是1100亿法郎。

社会党人拒绝对富人实行紧急征税的措施，同时还继续提高物价和税率。法国共产党人极为关注这种状况，并准备提供任何一种帮助，以使国家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奴役。（这显然是在间接地暗示希望获得苏联方面的帮助）。

此后，杜克洛对近年来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的策略进行了评述，并最终将这段历史追述到共产党人被开除出政府。同时，杜克洛还为党的政策进行辩护，并不承认党的领导人有任何错误。党的

一切策略都被他解释为，或者是由于必须保持与工人阶级的联系，或者是由于不疏远中产阶级。软弱无力和无原则地屈从于一个个的议会组合，缺乏坚定的路线和前进的目标，这些描述都给大会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当杜克洛做结论性发言时，更加显现出了党的不利处境。将党的全部希望与即将进行的市政选举联系在一起。杜克洛声明说，如果全体兄弟党目前能够开展一场共同地反对新的战争贩子的运动并帮助法国的话，那么，法国共产党就有希望在市政选举中获胜。

其次，杜克洛对社会党人的左倾观点抱有极大的希望，他极其详细地讲述了在社会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居伊·摩勒成功地将极左的章程列入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但是，杜克洛忧伤地说，大概，社会党人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脱离这些原则。杜克洛所看到的出路是，使法国社会党人的大多数确信与共产党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是，对此法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杜克洛求助于全体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与法国的社会党人不同，以便通过他们对法国的社会党人施加影响。

最后，杜克洛在结束报告时说，在群众中出现了为争取共产党人返回政府的运动，但是，目前党对群众说，只有在政府改变政策的条件下，党才能够返回政府。

№11625

斯兰斯基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捷共 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3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3日18时30分开始。

担任会议主席的哥穆尔卡同志让斯兰斯基同志作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斯兰斯基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捷克斯洛伐克在解放之后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变革。哥特瓦尔德同志^①称这些变革为民族和民主主义革命。

民族和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领导下进行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非常乐于彻底地进行这一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保障了自己的许多关键阵地，而它的某些措施超出了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由于这些变革，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人民民主制度。

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其特点是有许多特殊的条件。这一发展

^①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自1948年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的有利条件是：捷克斯洛伐克是较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被占领期间它的工业潜力又有较大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比重很大。在解放之后，共产党立即变成了群众性政党，今天拥有党员 117 万人。共产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拥有巩固的多数，这反映在所有工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95% 的工厂委员会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在农村，共产党也是最强大的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利条件：

由于慕尼黑投降，即放弃公开抵抗，捷克斯洛伐克落入了德国法西斯的魔掌。（而且斯洛伐克变成了所谓的独立的斯洛伐克国家，于是斯洛伐克法西斯主义者在战争过程中制造了一定的独立幻想。）在捷克土地上，德国人借助哈赫叛徒集团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成功地利用了行政机构。^① 对德国占领者的公开反抗没能达到其他斯拉夫国家那样尖锐的程度。在这里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观望分子之间没有显出多大的反差。更有甚者，贝奈斯^② 早在 1943 年就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他同伦敦侨居政府一起途经莫斯科回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莫斯科，在他的参与下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这个政府的多数成员是侨居伦敦的代表，即贝奈斯的追随者。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是美军来到了西部捷克。美军的存在激励了所有反动分子，妨碍了实施的反对叛徒的措施。（美军于 1945 年 12 月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同时苏军也撤离了捷克斯洛伐克）。

一些特殊的条件还存在于国家机构中。国家的官员在战争后期

① 1939 年 3 月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将其分裂，在捷克领土上建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埃米尔·哈赫出任总统。

② 爱德华·贝奈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于 1948 年 6 月辞职。

实行两面派策略，他们为德国人工作，同时又举行一些怠工来为自己遮掩。解放之后贝奈斯分子从集中营回来，很难阻止他们重新占据以前的位子。结果国家机构改革很慢，不得不同反动派作尖锐的斗争。

1945年5月新制度建立在所谓的科希策纲领^①之上，这一纲领是共产党主动提出的，民族阵线的所有党派都在上面签了字。

在科希策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实行了重要的变革，即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它们是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它们在民族解放斗争过程中就已出现，当时是作为非法的人民机关。在哥特瓦尔德同志的建议下，伦敦政府发布了关于民族委员会的命令，把它们作为地方、区和边疆区范围里的国家管理机关。解放之后，各委员会在成立新国家机构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给工厂任命自己的全权代表，组织供应，它们活动地盘上的安全机构和国家机构都隶属于它们。

民族委员会取代了以前的体系，即各区和地方的行政长官（反革命分子）。人民代表——民族委员会成员有执行权，他们下达指示，对所有部门的国家官吏实行监督，如安全部门、农业部门、供应部门、物价部门、地方工业、贸易和手工业部门，等等。

共产党在民族委员会里的阵地十分强大，地方民族委员会三主席全是共产党员。在163个区民族委员会中，128个委员会（80%）的主席是共产党员。6350个地方委员会（总数11512个）的主席也是共产党员。在民族委员会里工作的共产党员约有14万人。在那里他们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同时代表广大的人民群众。

^① 指的是1945年4月5日在科希策市宣布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第一个政府的纲领。该纲领和政府的组成是1945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同流亡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

按照法律，每半年民族委员会必须向选民报告一次工作。民族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开举行。

民族委员会制度赋予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结构以新的特点。虽然它没有彻底消除掉旧民主的影响，但毕竟大大限制了这种影响，把基层国家机关置于人民代表的经常监督之下。

第二个成绩是大型工业企业和银行系统国有化。

在群众，首先是联合工会的支持下，我党没分阶段，而是一举实现了国有化。所有银行，所有所谓的商贸和保险公司，所有关键的工业部门，其余工业部门所有工人超过 400 人的工厂，而有些工业部门工人超过 250 人的工厂，全都实现了国有化。从工人和职员人数看，国有化部门的比重相当于整个工业的 61%。1947 年春天，我们把那些国有化命令没有涉及到的从德国人和叛徒手里没收的企业合并到了国家企业里。这样一来，国有化成分从工人和职员人数上看，已占到整个工业的 66%。从工业产量上看，国有成分已占整个工业的 75%。实际上，矿山、冶金和电力部门已全部国有化。化学、冶金和机械制造部门，国有化程度已接近 75%。

国有化为新民主主义制度、为新型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在这里，主要的生产资料已从大资产阶级手中没收并转交国家所有。^①

共产党是两年计划的倡导者和制定者，该计划仅涵盖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部门。计划规定到 1948 年年底工业生产达到战前水平的 110%；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达到 130% 甚至到 140%。完成计划应使居民生活水平比战前提高 10%。除总的经济和政治目标外，两年计划还将改变国有成分和非国有成分的对比，使之朝着有利于国有成分发展。这清楚地表现在投资分配上：总投资的 90% 规定

^① 原报告接下来有一整页，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国有化的内容。

投向国有成分，私有成分仅占10%。

两年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前8个月完成了计划的101%，工业生产达到1937年水平的95%。现在两年计划的薄弱环节是建筑部门，这一部门国有化成分比例不大。我们希望明年克服今年的落后环节。采矿业和建筑行业一直感到劳力不足，主要问题是劳力资源的组织问题。

实施两年计划已对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工业生产的增长和生产成本的下降使我们今年春天降低消费价格有了可能。降低价格巩固了工农联盟，因为农产品收购价格没降低，而农民所需工业制品（农业机械、石油、煤油）价格降低了。居民经济状况的特点是：尽管还实行票证供应制，但每人的物品需求量，如糖、土豆、肉、鞋子等，超过了战前水平。需求之所以增长，是因为我们提高了工人的实际工资，于1939年相比，工人工资增长了34%。

我们成功的价格政策的基础是1945年所贯彻的货币改革，当时的价格和工资与1939年相比，一天平均增长300%。我们不仅做到了物价指数和工资的平衡，而且平均工资与1939年相比增长了397%。

所有这些经济成绩是反对反动派的有效政治因素。它表明，新制度比资本家更善于领导经济。所有这一切使劳动群众进一步坚定了对自己力量的信心。

因此，反动派在群众中的基础被削弱了。人民把这些经济成绩归功于共产党，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了。

在批发和零售贸易中，私人资本成分至今势力还很大。国营成分向批发贸易渗透采取了以下方式：国营企业建立自己的进出口局。它们还组织基地，排除批发商，直接同零售贸易建立联系。比如在煤炭分配中，已经建立了这种体系。

零售贸易 15% 的交易额是通过合作社渠道完成的。几乎所有消费合作社都处在共产党员的手中。粮食、牛奶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 90% 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进行的，党在这些合作社里阵地较弱。我们制定了成立四个垄断性国家公司的草案，它们应该把整个农产品的购销统辖起来。由于这一措施，农业合作社和部分零售贸易应落入国家控制之下。此外，某些国营企业有自己的零售网（如“巴佳”企业，它通过自己的商店销售自己的产品）。

国家价格调控是一个重要因素。国家确定所有商品的批发和零售价格。由于这一措施，使流失到私人部门的部分额外产品处在了国家监督之下。

我们的弱点是：工业部至今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中，这给统一领导经济造成了困难。我们通过直接隶属于总理的经济委员会贯彻我们的指示。现在正在制定具体的措施，想通过银行信贷系统对国有成分和私人资本成分实施监督。信贷系统隶属于财政部长。我们打算以此实现著名的“卢布监控”系统。

我们的第三个成绩是强制迁出德国人，实现土地改革和贯彻新的土地政策。

从捷克斯洛伐克迁出 300 多万德国人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①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知道，这件事应感谢苏联和斯大林同志的亲自支持，他在波茨坦会议上达成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迁出德国人的决议。

全部无偿没收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变节分子手中的土地。

从 1945 年 5 月开始，共分配土地 170 万公顷。将近有 17 万农

^① 盟国监督委员会于 1945 年 11 月 20 日批准了关于将德国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其他国家迁移到德国一些单独地区的命令。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迁移行动于 1946 年 1 月 25 日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共迁移了 200 多万德国人。

户，主要是雇农和贫农，得到了这些土地。我们制定了关于重新审议1920年第一次土改的法律。在这一法律的基础上，还将分配50万公顷地主和教会的土地。

我党很关注农村。虽然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不过除250万工人和职员外，我国还有近100万农民。

党在农村实施区别价格的政策，孤立最富裕的农民和地主。我们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实行区别对待价格。有20公顷土地的中小农民得到最高的收购价格，有20~50公顷土地的农民得到较低的价格，而50公顷以上的农户得到最低的价格。这些价格差总额达到几亿克郎，它们归农业部支配，用来建造文化宫、公共洗衣店、幼儿园、电影站等。今年春天，我们将农业机械价格下调了30%，农用石油和煤油下调了40%，工作鞋和工作服价格下调了20%。

我们为农民提供价格便宜的机械，为不使这些机械落入富农之手，为了使这些机械为中小农户服务，我们组织了国家和合作社农机站。现在有30个这样的国家站，258个合作社农机站。到两年计划完成时，还应组建94个国家和合作农机站。此外，还要组织2202个地方机械购买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将通过贷款以便宜的价格得到农业机械。

现在党制定了专门的农业措施计划。这一计划称之为“朱里什计划”^①，农业部还制定了一些法律草案交农民讨论。其中有：

新土地改革法草案，其中规定将50公顷以上的所有土地拿出来分配；

农产品购销改革法令草案。草案规定，所有农产品只通过4个国家垄断公司与农业合作社联合收购和销售；

^① 尤利乌斯·朱里什，捷克斯洛伐克土地部长。

农业合作社民主化法令草案。这一草案应使小的分散农户便于加入农业合作社，消除富农在他们中间的影响；

农民贷款法令草案；

统一的农业税法令草案，该法令将减轻中小农民的税收；

农业机械化法令草案，这一法令草案将保障机械站和合作社购买机械的贷款。

现在由于旱灾，我们被迫提高粮食价格，此外，我们还为没有商品粮或商品粮不足的小农户拨款 50 万克郎。

我们的土地政策帮助我们扩大党在农民中的影响，顺利地同农村反动派进行斗争。^①

斯兰斯基同志继续分析了斯洛伐克的形势特点。

他指出，在民主党的直接保护下和基督教的参与下，非法的格林卡组织^②正在酝酿反对新制度的阴谋。反动分子正向国家机构和经济机构里渗透。由于还有无数班杰拉分子^③，斯洛伐克成了外国间谍机构和国际侦察机关进行阴谋活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所有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知道，反动派在农村的地位仍然很牢固，反动派在富农中间招募了一批自己的追随者，这些人在农民中间进行挑唆活动，号召农民进行罢工和怠工，并进行猛烈的反共产主义宣传鼓动。

与农村反动派进行的斗争，将是一个同我们的阶级敌人进行残酷较量的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们党在农村的部分组织以宗派主义态度对待中农甚至是小农，这是实行我们正确的土地政策的障碍。我们努力克服这些错误，并认识到，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继续巩固捷克斯洛伐克新制度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六月全会研究了斯洛伐克问题。哥特瓦尔德同志说，斯洛伐克——这是我们新政权的最薄弱的地方。实际上，斯洛伐克的形势正在出现危机。”

② 指战前安德烈·格林卡领导的斯洛伐克人民党，该党 1944 年根据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决议被解散。

③ 即 1943~1947 年斯捷潘·班杰拉在西乌克兰组建的乌克兰起义部队的成员。

中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舞台。

斯洛伐克的国家制度有以下特点：斯洛伐克人被认为是独立的民族。还规定，共同的国家生活应按两个民族平等的原则实现，而且斯洛伐克最高民族机关——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被赋予在斯洛伐克领土上的执法权和部分立法权。

1946年6月选举之后，民主党人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斯洛伐克机关的职权受到了限制，规定斯洛伐克代表服从政府和各部分管。实际上这一协议没有执行。布拉格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没有扩展到斯洛伐克领土上。

处决蒂索^①沉重地打击了斯洛伐克的反动分子。围绕蒂索的判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在捷克的合作者和总统本人摇摆到最后时刻。直到有了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威胁的时刻，我们在政府里关于这个问题才取得多数。

处决蒂索之后，党搜集了斯洛伐克形势和民主党反国家阴谋活动分子的材料。但我们在捷克的合作伙伴们不同意对阴谋分子采取断然措施。被迫公开谴责格林卡分子反捷克和反国家活动的捷克反动派，按照国外反动派的指示，同斯洛伐克的反动派结成了秘密集团，以保护斯洛伐克反动派免遭镇压。

由于发现了斯洛伐克的新阴谋，党展开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不仅揭露斯洛伐克的反动派，同时还揭露捷克反动分子的骑墙态度。党制定了实施严厉措施反对斯洛伐克反动派的提案，该提案即将在政府里讨论。党决定对所有企图怠慢这些措施的人进行点名。党要求清洗民主党，开除一批代表，让一些全权代表和斯洛伐克部长们退休，进一步限制他们的职权范围，采取行政措施反对反动派的主

^① 约瑟夫·蒂索，1939～1945年期间担任在希特勒德国的庇护下建立的斯洛伐克国家的总统。1947年被判处死刑。

要策源地。^①

反对斯洛伐克反动派的斗争是复杂的，其原因在于我们的部分斯洛伐克同志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他们不明白，民族问题应该服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某些斯洛伐克同志长期反对限制斯洛伐克民族机关的职权范围。只是后来才明白，须在捷克进步力量支持下进行的反对斯洛伐克反动派的斗争，是符合斯洛伐克人民的利益的。

斯兰斯基接下来谈到了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在人民中的政治领导权的斗争。^②

解放之后，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民族阵线，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阵线由4个党组成：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社会党和天主教党。

我们禁止了许多反动党，从国家管理部门清除了大资产阶级的叛徒集团。反动势力一开始想成立自己的党。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种打算并开始向一些参加政府的党里钻。首先他们向民族社会党里钻，民族社会党成了原土地党最反动分子的避难所。这个党的主席津克尔博士^③是最反动的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家和外国反动派的走狗。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这些措施的实现首先取决于社会民主党人与我们的合作。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成功地获得这样的合作。（但是，甚至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斯洛伐克问题仍然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在斯洛伐克，这个在经济方面是国家最落后的地区，资产阶级的地位还非常牢固，而教会在那里，尤其是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②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明白，为顺利地进行与反动派的斗争，为彻底地巩固新的制度，为保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仅仅掌握国家经济方面的领导地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政治舞台上进行重大的斗争，也就是争夺政治领导权，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

③ 彼得·津克尔，捷克国家社会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主席，自1948年起侨居国外。

与反动派的期望相反，在1946年5月的选举中，我党获得了全体捷克选民40%的选票。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在议会300个席位中占有154个席位。^①

社会民主党内部有3个派别：左派、中派和右派。中派代表是劳什曼^②，选举之后他常同马耶尔^③——右派代表和贝文的走狗合作。左派代表费林格^④在党的机关里没权，他对右派和中间派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这种不坚定和反共产主义的立场，我党出现了不少困难。在右派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倾向于同其他党结盟和反对共产党。结果我党提出的许多法令草案，先后在政府和议会里受阻，很多问题没能得到解决。

反动势力企图利用总统达到自己的目的。贝奈斯一开始装得很忠诚，但后来发表了几次带倾向性的反共产主义的讲话，“反对专制，反对暴力”。尽管他有病，还在背后支持反动派。

最近几个星期民族阵线内部已呈现出公开危机的形势。在讨论给农民农产品收购价增加补贴时，部长们建议对百万富翁的财产征收特别税。民族阵线其他党投票反对我们，而社会民主党弃权。共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但是，在选举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却表明自己是一个摇摆不定的、不可靠的同盟者。右翼分子利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获得选票不多这一事实，并认为这个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结果。右翼分子转向进攻，并要求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人脱离关系。实际上，这种观点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中已经占了优势。社会民主党人开始与议会委员会和民族委员会中的其他党派结成联盟反对我们。在决定政府内的某些重要问题时，社会民主党人也投票反对我们。”

② 博古米尔·劳什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工业部长。自1949年起侨居国外。

③ 瓦茨拉夫·马耶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供应部长。自1948年起侨居国外。

④ 兹德尼克·费林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政府副主席。

产党的领导人决定转入公开的反攻，决定在全社会面前揭露反动派。

在政府投票表决之后，我们公布了 11 名反对向百万富翁征税的部长的名字，而且指出了在这件事上不支持我们的社会民主党部长们的行为。这一揭露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工厂、工会组织、地方民族委员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许多组织都表示了抗议。^①

在群众的压力下，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建议我们两党谈判，结果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提出了关于对百万富翁征税的方案，开始对因受民族社会党挑拨要求增加工资的国家职员共同采取了行动。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发表的联合公报在群众中引起了新的反响。它直接推动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危机。右翼领袖马耶尔部长提出了辞呈以示抗议，但后来又收回了声明。社会民主党中央企图撕毁同我们达成的协议，撤消费林格党主席的职务。但这一主张的倡议者占少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赞成同共产党达成的协议，而由费林格继续任党的主席。社会民主党内部右派和左派的斗争在继续。以工会总书记爱尔本为首的几乎所有社会民主党的工会领导人都团结在我们支持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周围。

我们党的方针是：在与社会民主党左派和中间派加强合作，同时孤立和揭露反动派的走狗——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基础上，做到同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在政府的所有党派中，人们对人民愤怒所造成的后果表示担忧。

国家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所处的受批评状况试图做出了反应，一方面虚构自己的两名大臣和马萨里克部长被杀未遂事件，另一方面挑拨和煽动国家职员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

我们党对社会民主党人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社会民主党结盟。

所发生的事件对民族社会党的内部形势也产生了影响。这个党的领导人坚持反动方针。在民族阵线内，它口头上与共产党合作，实际上它秘密地同基督教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结成联盟。但是，这种政策开始引起民族社会党内部的不满。我们现在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这个党内建立能同共产党共同奋斗的左翼。

我们认为，可在天主教党内部组织反对派。在这个党内部，力图同斯洛伐克民主党建立基督教联盟的法西斯集团同比较民主的分子（工会活动家和某些神职人员）之间正在进行斗争。

这样，就可以造成这种形势，即我党将来在同反动派冲突时可以依靠其他党内坚强的左派，把反动分子从民族阵线中清除出去，并以此加强民族阵线。^①

我们的弱点是，在国家机构中还存在大批旧反动官僚制度的代表。

内务部掌握在我们手里。国家安全机关、武装部队总司令和这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应该指出，今天，在民族阵线上层中出现的混乱局面，与下层的状况是不相适应的。各个政治党派的劳动人民群众为完成两年计划正在和睦地工作着。在工厂，在农村和城市，人们学会了共同行动。团结一致的思想确保动员全部的力量。

此外，民族阵线不仅仅代表着各个政治党派——它还依靠着强大的群众组织。我们希望所有大型的非党派组织加入民族阵线。我们已经拥有了由220万工人和职员组成的统一工会组织，这个组织是在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还拥有统一的青年联盟，这个联盟把共产主义青年与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合起来。我们还领导着一个合作社工作人员联盟，其中共计有300万名会员。还有一个统一的农民阵线，其领导层是在均等的基础上组成的。

我们希望这些组织，主要是工会组织，在民族阵线中起着更加积极的作用，并考虑到：在国内政治局势尖锐化的情况下，能够出现那样的时机，到时我们就能够把握住政府中的工会代表、青年联盟和合作社工作人员联盟代表，把反动派的代表从政府里清理出去。”

些队伍的地方首长都是共产党员。50%的战士也是共产党员。此外，国家安全机关还有特别团，它们全由共产党员组成。国内侦察机关的领导职务也在我党手中。但我们在安全机关的中层环节和安全机构官员中阵地单薄，那里还有不少贝奈斯分子和反动分子。

在慕尼黑协定和被占领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被粉碎，解放之后又重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苏联组建的数量不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从西方来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以及留在国内的军官干部。我们还没有把这几部分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势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部队中没彻底清洗反动分子。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虽然是苏联的朋友，在多数问题上也跟我们走，但行动还不坚决，有时向右派集团的压力让步。

将近 1/3 的将军是共产党员。他们大部分是军事专家。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中下层军官。

在农业部和新闻部（电台、电影），我们的阵地比较好。我们改善了我们在财政部和国内贸易部里的阵地。在外交部，我们的阵地还比较薄弱。

斯兰斯基在谈到党内形势的特点时指出，在被占领时期，党失去了 25000 名成员，即 1/3 以上的党员，他们都是最优秀的干部，其中包括 5 个中央委员会的 42 名成员。

党在走出地下之后迅速地成长起来了。在合法存在的一年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加到 100 万人以上。

党的社会成分是：工人占 42.6%，农民（其中包括农业工作人员）占 7.6%（不包括同时在工厂工作的农民），职员（包括国家机关职员）占 16.2%，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占 4.2%，军人占 1.1%，自由职业者和大学生占 1.4%，家庭妇女占 19.1%，退休职工占 3.8%。应特别指出，我党中的妇女人数增长了 32.2%。

党内老党员和新入党的党员之间还有明显的差别。

我们认识到了占全党 97% 的新党员思想水平如此低下的危险性。新党员基本上只知道政府计划和党的现行政策问题。所以我们赋予党的干部学习和全体党员学习以特别意义。在基层组织，我们组织报告会，阐述我们的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我们有十所全日制州委党校。有一所中央党校，学制半年，已有 110 名党的工作人员从这里毕业。毕业之后，这些同志现在在州委领导岗位上和中央书记处机关里工作。此外，我们在中央党校还开设了专门学习班，培养记者、青年和妇女运动工作人员，区委秘书和农村党的领导人。仅在今年，我们在这些学校和高级学习班里就培训了 910 名同志。^①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我们对党员进行了登记，登记已于今年春天结束。通过登记，对每个党员进行了审查。在登记过程中，清除了违犯党纪分子和消极分子。

登记运动巩固了党，为今年初进行的征集新党员创造了前提。在今年 8 个月的时间里，党吸收新成员达 13000 名。吸收新成员的工作还在继续。

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的出版使党的学习得到了补充，这一出版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是空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了 25000 册，《斯大林传》第一版印刷了 8 万册，斯大林《论伟

① 这里原报告被删掉的内容是：“自解放之后，我们开始接收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入党，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不能使形形色色的人渗入到党的队伍中。每一个入党的人都应该有两名党员的介绍，并通过在党的会议上对候补成员进行讨论的方式接收入党。况且，在最初的几个月里，还从党的队伍里开除了几名投机钻营者和异己分子，因此，我们不得不对党员进行核查。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对截止到今年春季的党员进行重新登记。这次开展的重新登记工作实际上是党内的一次大型运动。对每项工作和每个党员的个人行为进行单独审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填写党员登记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对这个登记表进行讨论和核查。在这次重新登记过程中，将违犯党的纪律以及不良分子开除了党的队伍。”

大卫国战争》出版发行了 98000 册，哥特瓦尔德同志的文章和讲话集在 10 个月的时间里发行达 6 万册。在布拉格，我们组织了社会科学院，它的下属部门不仅从事科学研究，还每周定期组织公开授课。

为我们的积极分子出版了专门的杂志《工作人员》（发行量 28000 册），国际政治问题专门杂志《新观点》（发行量 17000 册），开始出版理论杂志《新思想》（发行量 7000 册）。

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报纸（发行 44000 份）。此外，我们还出版了 4 种州日报，总发行量 16.8 万份，22 种周刊，发行量 29.8 万份。我们在报刊上的影响还不局限于这些党的刊物。处在我们直接影响下的刊物还有工会机关《劳动报》（30 万份），捷克青年统一联盟机关《青年阵线报》（8 万份），农业协会报《农业新闻》（10 万份）。

在分析对外政策问题时，斯兰斯基同志强调指出，在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感到美帝国主义和同美帝国主义集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外反动派的压力。

斯兰斯基同志说，反动派攻击我们同苏联和其他斯拉夫人民的联盟。对外政策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必须通过同国内反动派的尖锐斗争。例如近来的同波兰的条约问题，对此，政府里反动派的代表几乎对抗了一年。再如对待马歇尔计划的态度问题，反动派企图把这一计划看成是挽救捷克斯洛伐克经济的计划。还有关于同法国联盟条约的讨论，我们完全否定这一条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观点都取得了胜利。

应该指出，斯拉夫政策受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的广泛支持，他们怀着深刻的感激和敬爱之情看待苏联，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但是对反动分子面向西方的宣传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这种宣传

对我们构成了威胁。贝奈斯和马萨利克实际是英、美帝国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走狗。

美、英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同反动派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干涉我国内政。美国大使施泰因加特甚至以美军驻扎在斯洛伐克边界相威胁。不久前，在我国情况紧急的日子里，美国人曾企图调动他们的军队集结在我国边界，以便为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派散布未来战争的谣言提供口实。

我国同斯拉夫人民的紧密联盟对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有着重要意义。同实行计划经济的斯拉夫各国的合作使捷克斯洛伐克避免了滑入正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同苏联、波兰、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合作保障了我国工厂的满负荷开工，而且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长期条约对我国人民群众状况的积极作用现在已表现出来，尤其是我们得到了苏联4万车厢的粮食，这在我国欠收的情况下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同斯拉夫国家结盟的政策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未来主权和独立的强大而有力的保证。

斯兰斯基同志在讲话结束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感谢波兰同志们的倡议，感谢提供了在此会晤和就我们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的机会。

我们特别欢迎联共（布）代表团关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研究进一步紧密和经常合作形式的建议。在当代复杂形势的条件下，我们大家都需要相互建议和协商。在解决复杂问题的时候，各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也是莫大的帮助。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表示希望会议为经常接触开辟道路。

谈到前景，斯兰斯基同志指出，党面临着“谁战胜谁”这一激烈而严重的斗争。不能低估反动派的力量。反动派不仅依靠它国内

的政治潜力，它首先同美国的反动派及其侵略计划联系在一起。

我党有足够的力量夺取胜利。

我们希望民族阵线内所有党的左翼的民主分子同我们站在一起，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同我们站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依靠工人阶级稳定的大多数，依靠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的工农联盟。应当指出，今天民族阵线上层出现的分裂状况不符合下层的形势。各个政党的劳动群众为完成两年计划在友好地工作着。

此外，民族阵线不仅由各个政党为代表，它依靠的是强大的群众组织。我们有统一的工会，工会有 220 万工人和职员，工会处在我们的领导之下。还有青年统一协会，共有成员 35 万人。这一协会把共产主义青年和社会民主主义青年联合在一起。我们领导着合作统一协会，共有成员 300 万人。还有农民统一协会，协会领导按照对等原则实施。

在国内政治形势尖锐的情况下，进攻时刻可能到来。那时，我们可以抛弃反动派的代表，可以让工会的代表、青年和合作社协会的代表进到政府里。

利用斯大林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示，我党坚信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

No 11626

乔治乌—德治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 罗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3日)

绝密

休息过后，会议主席德治同志发言，作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德治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由于苏联军队冲破了莫尔多瓦希特勒防线，罗马尼亚才摆脱了希特勒战争。因此，罗马尼亚摆脱战争并不是广泛的反希特勒斗争的结果。同民主力量一起参加八月行动的有国王和他周围的人以及一批将军。这赋予1944年8月23日事件以政府政变的性质。从第一天起，我党就不得不在艰难的条件下为争取罗马尼亚的民主主义制度而开始斗争。

党立即着手组织国家的民主力量。党的组织得到了改造。建立了统一的工会，现在有工会会员150万人，包括大多数工人和职员。我们也吸收社会民主党参加组织工会的工作，早在1944年5月我党就同社会民主党签订了统一战线协议。

在我党的倡议下，成立了民族民主阵线，参加这一阵线的各民主党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等。

我党承担了各民主力量统一行动组织者的角色。从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为使国内政治生活迅速民主化，党在全国，尤其是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一系列民主游行。我们组织群众上街，要求成立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我们要求实现土地改革，对劳动群众实现广泛的公民自由，实现国家非法西斯化，要求与苏联一起真正参加反希特勒战争。由于我们的运动，瑟讷泰斯库政府被迫让位于由各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不过在这个政府里起主导作用的仍是反动党派——马尼乌的国家农民党和布莱蒂亚努的国家自由党。为巩固已取得的成绩，我们广泛发动群众为实现民主改革而斗争。

我们着手推翻英美分子、国王和反动党派全力支持的马尼乌政府。在布加勒斯特集结了工人武装队。以王宫面前游行示威为高潮的广泛的街头行动持续了整整一昼夜。勒代斯库被迫退休，躲到了英国公使馆，后来在美国人帮助下逃到国外，在国外疯狂地进行反对民主罗马尼亚的运动。

在我们建立民主政府的斗争中，苏联政府给予了我们宝贵的政治援助。

从格罗查^①政府上台到1946年11月19日议会选举这一时期，我们不得不同严重的经济困难做斗争。国家经济处于混乱和衰退状况中。我们遭受了两年旱灾。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我们完成了许多改革，实施了许多措施，为罗马尼亚的改革事业迈出了重要步伐。

由于土改，72.6万农民分得了140万公顷的土地。

工人工作队在土地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把它们派到农村

^① 彼得·格罗查，罗马尼亚农民阵线领袖，自1945年3月起任罗马尼亚联合政府主席，1947~1952年任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1952年起任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帮助春播，修理农具。

我政府公开谴责罗马尼亚 1913 年占领南多布罗加的帝国主义行为，这样就消除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关系中所有有争议的问题。政府开始清除国家机构中的法西斯分子。内务部机构经过了彻底改组。旧干部由大批工人共产党员所代替。

部队中清除了许多反动将军和军官。成立了部队政治教育机构并使其合法化，该机构完全掌握在我党手中。

实施了选举改革，取消了两院制，为妇女和军人提供了选举权。

政府开始恢复经济。

这些改革和措施是在民主力量和由外国反动集团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实施的。

国内反动势力反对民主制度和民主改革的主要中心是国家农民党。

我们成功地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企图在政府联盟中制造分裂和使我们党孤立其盟友之外的阴谋。

统一阵线和政府联盟仍坚强有力。作为反动派的直接走狗，彼得雷斯库和他的集团已被揭露和孤立^①。

尽管经济形势严峻，但由于我们充分把劳动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支持我们的政策，所以我们能够保持政治稳定，避免了政府危机。

1946 年 4 月，为了共同进行选举，我们成立了民主政党联盟。^②

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了苏联国家给我们的援助。除了直接的政治援助，保护我们免遭英、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内政的

① 蒂捷尔（康斯坦丁）·彼得雷斯库，1946 年 3 月前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因反对社会民主党全国特别代表会议做出的接受共产党提出的统一竞选人名单的决议，被开除出党，后组建独立社会党。

② 罗马尼亚民主政党联盟于 1946 年 5 月 17 日成立，参加的有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国家自由党、农民阵线及其他政党，其政府中的代表人物是格罗查。

干涉。苏联政府还减轻了罗马尼亚签订停战协定的条件，给予我们经济援助，帮助我们走出因旱灾引起的严重的形势。

这就是以往的形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党三年来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就是通过选举胜利和争取稳定的议会多数，达到了巩固民主制度的目的。

各民主党在 1946 年 11 月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罗马尼亚民主发展过程。

在这些选举中我们同其他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特特勒斯库^①的党，国家人民党和亚历山德雷斯库^②的国家农民党结成了联盟。我们制定了民主党联盟纲领，其他所有党都接受了这一纲领。纲领规定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把国家银行转归国家所有，实行税收体系民主化，改革司法制度，缩短服役期限，等等。

在选举运动中，我们不得不进行激烈的斗争反对得到了英、美驻罗马尼亚代表公开支持的各反动党派的联盟。

选举胜利意味着民主制度和政府的阵地巩固。尽管有人企图从外面和内部颠覆各民主党的联盟，但这一联盟还是保留了下来。选举运动还表明，我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新议会里，和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农民阵线等）和靠近我们的其他党的代表一起，我们占据了巩固的多数，在 369 个席位中占据了 228 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和特特勒斯库的党没包括在这一多数里）。

我们的阵地在政府里也巩固了。以前特特勒斯库的党控制的工业部和贸易部现在也由我们控制了。社会民主党人的过分要求被否定了。同靠近我们的其他部长一起，我们在政府里占据了多数。

① 格奥尔基·特特勒斯库，国家自由党主席，于 1945 年初脱离了以布莱蒂亚努为首的原罗马尼亚国家自由党。

② 安东·亚历山德雷斯库，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主席，1945 年初脱离了以尤·马尼乌为首的原国家农民党。

这样，通过选举，我们真正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我们获得了在议会和政府里通过我们想通过的决议的可能。

选举之后，我们向全党和人民提出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在较短的时间里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法律。罗马尼亚银行机构——布莱蒂亚努反动资本集团手中的国家银行实行了国有化。通过了改造工业和贸易部的法令，大大扩大了这个部的活动范围。议会通过了按照工业主要部门组织工业管理局的法令。在各个工业管理局里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这样国家就有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施领导和监督的可能。

今年7月，我党公布了自己的改善国家经济和财政形势的提案。这些提案被政府通过了，提案包括6个月的工业活动计划，目标是使工业生产水平达到1938年的70%。提案把货币改革和货币稳定作为各民主力量政府的中心任务。

许多新民主主义法令涉及到农业。我们实行了必须交纳公粮的制度。今年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公粮征集计划，从而保证了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为此目的，从今年开始我们对农户实行实物税制。通过了土地所有权出售法令，该法令阻止把农民的土地集中到富农手里，确定了国家对土地收购的优先权。饥饿时期农民出卖的土地被宣布无效。取消了我国农村所存在的一种封建残余——做工抵债。

除了这些加强我国经济领域民主的法令和措施，我们还实行了加强我们在国家机关里的阵地的措施。宪兵和边防军归入了共产党员掌握的内务部系统。军队裁减了干部，清除了反动的军官。国家职员也进行了裁减，以此清除国家机关中的反动分子和变节分子。但应该指出，部队和国家机构中的清洗工作还远没有完成。

由于选举，加强了我党及其最亲密盟友之间的联系。对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来说，选举是一场争取盟友特别是争取主要盟友——劳动农民的战斗。在这场斗争中，农民阵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选

举之后共产党和农民阵线领导人联席会议上通过的共同决议中，强调了工人和劳动农民阵线的必要性，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共产党和农民阵线紧密合作的必要性。为加强农民工作，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成立了农民部，由政治局委员领导，党的每个县委里也成立了相应的农民机构。自上而下，共产党和农民阵线领导机关联席会议收到了较好的结果。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匈牙利人的民主组织——匈牙利人民联盟（在议会里有 29 名代表）也出现了类似的加强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机关成分民主化的过程。

在我党领导之下的工人青年联盟、农民阵线青年和大学生民主组织在民族青年联盟中居主导地位，该民族青年联盟把全国的青年组织都联合到了一起。

反动派在知识分子当中根系还很深。在大学里还存在不少反动工会。同时进步力量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加强。大批著名的知识分子代表——学者、作家、艺术家、演员，或加入我党或靠近我党。

加强我们阵地的措施是在同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实现的。国王表现出了破坏同政府的关系的企图。他拒绝签署一系列命令，在等待英、美分子的影响和支持，梦想王室今后，作为反政府的策源地起更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对国王施加了压力，对他周围的亲信进行了打击。在公开集会和报刊上故意不加理睬他。

国家农民党的活动是罗马尼亚民主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一障碍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不久前政府解散了国家农民党。该党代表的委任状被宣布作废，部分代表被逮捕。最近即将举行审判^①。不

^① 对尤·马尼乌以及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审判是 1947 年 10~11 月进行的，罪名是从事“反国家活动”、“背叛民族利益”、与美国和英国的特务机关有联系。尤·马尼乌被判处终身监禁。

久即将公布的侦察材料，不仅是对国内反动派，而且是对英、美反动集团的沉重打击。

解散国家农民党是对最反动的和最富进攻性的部分大资产阶级和被剥夺的地主在政治上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是国家农民党。

在民主党联盟内部，我们不得不同特特勒斯库和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进行不间断的斗争。

社会民主党近来同国外的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同工党和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社会民主党的积极活动，统一阵线实际上已破坏。但在统一阵线范围里恢复联系之后，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仍有右派分子不断进行的反苏和反共活动。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进行了打击。在许多工业中心，我们动员群众反对工人当中的右倾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社会民主党中央被迫开除许多右翼领导人出党，其中有二人还被开除出政府。

在不久前举行的工会选举中，共产党夺取了胜利。在从新选出的工厂工会委员会中，85%的人是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仅占10%。

应该说，尽管在我们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中存在不少困难，但在所有关键问题上，我们还是做到了带领它一同前进。

不久前实行的货币改革进一步加强了我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改革——稳定的第一阶段——对投机钻营的资产阶级给予了有力的打击。货币改革导致了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通货膨胀时期相比提高了两倍）。应该指出，这一改革是在没有英美贷款的情况下进行的，反动党派和特特勒斯库认为，似乎我们没有能力做这件事。

我党是货币改革的倡导者，这一改革提高了我党的威信，它使

想加入我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云集于我党的队伍中。

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行动，我们在社会民主党左派中的解释工作，我们对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斗争，最终我党是民主制度一切主要成绩的倡导者这一事实，促使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中产生了一种有利于同共产党合并的广泛思潮。在货币改革成功之后，在社会民主党群众中，尤其是在工人中间，到处出现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同共产党合并的愿望把成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问题提上了日程。

在发展我们同社会民主党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必须从以下两条道路中择其之一。第一条道路是接纳社会民主党中的工人党员加入共产党，这样社会民主党便成了没有工人群众的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有被内外反动派利用的可能。第二条道路是成立统一的党，对此预先须做广泛的思想解释工作。这条路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政治统一——建立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我们的意见是必须选择第二条道路。为此我们制定了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纲领草案，该草案将公开讨论。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将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这将使我们容易消灭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将为罗马尼亚通过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前提。

由于货币改革的成功和我党威信和影响的生长，我党面前出现了新的政治和经济任务。

下面我列举一些我们正在着手完成的任务。

稳定形势，提高工业生产，通过降低工业品价格逐步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巩固和扩大工业中的国有成分。通过工业管理局对私人企业实行监督和领导。通过税收措施、贷款政策、国家经济监督和适用总工法令等手段，反对超额利润。

实行银行集中化。通过国有化的国家银行对贷款和私人资本实行监督。

向农民，首先是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供应农具。发展国营农场。给予国家购买土地的优先权。扩大消费合作社，逐步发展生产合作社。

国家领导外贸。建立国营商店以发展内贸。广泛发展工人消费合作社。

行政改革。部队改革和部队转交共产党领导。

司法改革。在各级法庭建立人民陪审员。

税收改革。

教育事业民主化。

减少部的数量，以此加强我们的阵地。

通过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和限制国王特权并逐步彻底消灭君主制的新宪法。

我想谈的最后一个任务是，坚定地贯彻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要加强同我们民主主义邻国的友好的相互关系。

我们的外交政策带有新的特点。这已不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附庸关系了。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我国人民把同苏联缔结友好和互助条约看做是我国独立和主权的保障，看做是对和平事业的宝贵贡献。

至于我们同其他邻国的相互关系，则我们的政府代表团最近访问了索非亚、贝尔格莱德和布拉格，在这些地方，讨论了签订相互援助条约的问题。同我们的所有邻邦——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有着进一步巩固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前景。

在党的工作任务方面，我们面前摆着重要的任务。共产党现有党员 71 万人（工人 44%，农民 39%）。这么众多的年轻干部都需

要进行政治教育。我们有各个层次的党校教育网：6个月的高级党校，4个月的中央干部学校，3个月的报刊工作人员学校，外交人员学校，匈牙利语中央学校，中央妇女学校，中央青年学校，以及21所县干部学校。

我们有近32000名宣传员，他们不脱产，在短期学校里接受训练。

我党直接控制着绝大部分的首都和各省报纸。中央机关报《火星报》是全国发行最广泛的报纸。

我党展开了广泛的出版活动。我们出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著作。今年8月第一次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罗马尼亚文翻译本。出版了大量的苏联文献。

我们党非常重视反对外来思想影响，特别是反对英、美在文学艺术、电影、广播和报刊上的影响的斗争。

在我们党的活动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党干部思想和政治水平低。

现在我党的中心任务是从组织上巩固我党日益增长的影响，同时继续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原军团分子和混进党的队伍的人。这将帮助我们顺利地克服党工作中的缺点。

我们认为，在现阶段，罗马尼亚进入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过程。党的巩固及其影响将为这一过程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

我们党非常满意地接受我们波兰同志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倡议。我们欢迎联共（布）代表团关于探索各国共产党经济接触形式的建议。我们认为，在我们的工作中，在解决我党所面临的任务中，这种接触将给我们以宝贵的帮助。

会议于22时闭幕。

№11652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斯兰斯基和
乔治乌—德治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在9月23日晚间召开的会议上，听取了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报告。

斯兰斯基确定了实行工业国有化所取得的成绩，目前，全部工业的75%已经被国有化了。1947年的最初8个月里，两年经济计划的任务已经完成了101%。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1939年相比，实际工资增长了34%。

工人阶级的情绪很好。农民阶级也支持新的民主制度。农民的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贫雇农获得了170万公顷的可耕地。正在制定关于将土地收归国有的立法草案，即将个人手中超过50公顷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这样一来，还将会有50万公顷的土地可分配给需要土地的人。

共产党人实行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动摇了反动派的地位，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力量仍然还很强大。尤其是在斯洛伐克局势尤为严重。在基督教教会的庇护下，斯洛伐克民主党成为反政府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该党还在斯洛伐克领导了分立主义运动。布拉格政府的指示遭到了暗中的对抗。国家的经济机关里混入了许多法西斯分子以及破坏分子。斯洛伐克是国际侦察机关反对捷克斯

洛伐克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危险巢穴。

贝奈斯的党和右翼分子支持与斯洛伐克的反动势力秘密结盟。

在斯洛伐克出现的困难局面，由于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错误而更加严重了。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许多党员不懂得，民族问题应该服从于共同的政治任务，他们阻碍与地方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

涉及到民族阵线问题，如果说在参加统一阵线的各政党以及共产党的同盟者的上层中，反共产党的倾向十分严重的话，那么在党的基层组织里却合作得十分友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联合的思想在下层十分强烈。民族阵线所依靠的不仅仅是各政党，而且还有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青年联盟以及其他的群众性组织。

贝奈斯表现得不好，在多次讲话中攻击共产党人。即使身患疾病，贝奈斯仍然依据抵抗进步的民主措施的精神，经常干涉国家事务的解决。

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共产党提出了继续清洗国家机关，这些国家机关中有许多旧的反动官僚分子和贝奈斯分子。在外交部里共产党人的地位是极其薄弱的。必须清洗军队中的反动分子。共产党人在中等军官阶层中的力量最为薄弱。斯沃博达将军受反动分子的影响。

谈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斯兰斯基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是新的民主制度这个堡垒上最西边的堡垒，并感受到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的特别压力。捷克斯洛伐克反动分子对共产党人的对外政策的攻击加强了。贝奈斯、马萨利克、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天主教党的右翼分子——是英、美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柱。英国和美国的大使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事务。施泰因加特大使威胁哥特瓦尔德，说美国军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地区部署军队。美国的军队确实进行了一些调动，以便给散布那些引起惊慌的谣言以借口。

但是，直到目前，在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人仍然占据着上风（与法国的友好条约、与波兰的条约、对“马歇尔计划”的态度，等等）。共产党人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斯拉夫国家对苏联的态度方面他们的政策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对苏联的好感更加增强了。

共产党目前拥有党员 1172000 人。在对全体党员实行普遍重新登记的工作结束之后，中央开始接收新的党员，并计划在 1948 年 5 月 1 日前夕使党员的人数达到 150 万人。党非常重视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工作。

斯兰斯基赞成关于必须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联系的建议。

对斯兰斯基报告的总印象还是很好的。

德治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是用来阐述众所周知的那些事实，即 1944 年 8 月 23 日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争取本国民主制度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他还不只一次地强调了苏联给予罗马尼亚民主力量的巨大援助。

德治是这样评价目前议会和政府中的力量对比情况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依靠自己的同盟者，在议会和政府中可以做出任何决定。

由于进行了货币改革以及今年的大好收成，德治对于国家经济状况改善的前景非常乐观，并表示坚信：一定能够完成共产党人提出的稳定经济的 6 个月计划，并拟定在今年年底使工业生产水平达到战前的 70%。

同时德治确定说与反动派的斗争在不断地尖锐化。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影响下，国王再一次表现出企图破坏与政府的契约，重新拒绝签署政府的一系列法律草案。王宫逐渐变成反政府活动的基地。

对国家农民党的打击，以及即将进行的对该党领导人的审判，

也是对国内反动分子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反动派的打击。

在民主联盟的内部，与特特勒斯库的斗争正在日益加强，显然，只要特特勒斯库党内正在增大的反对派留在联盟内，这种斗争在近期就会导致与特特勒斯库合作的中断。

社会民主党人继续加强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联系。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分子正在进行着反共产主义的、反苏联的活动。由于共产党开展了揭露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的计谋，也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工会组织领导机构选举中遭到了彻底失败（共产党获得了 85% 的席位，而社会民主党只获得了 10% 的席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被迫将一批极端的右翼分子开除出党和政府。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提出了关于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问题。

共产党认为，目前应该将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罗马尼亚共产党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途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的基础上，将两个党合并成一个政党。这将导致社会民主党的消失，从而不给反动派以机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社会民主党这个招牌，比如说，如果共产党从基层开始吸收社会民主党人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或者是在已经没有党员群众的情况下仍然保留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构，如果这样就有可能被反动派利用。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纲领草案已经制定，并将对其进行广泛的讨论。

在今后的政策中共产党将从以下几点出发：

在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中，坚定地执行同苏联友好的方针。罗马尼亚不能依附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广泛地宣传对苏联的热爱和友情；

完成稳定国内经济状况的 6 个月计划，提高工业生产的水平，通过降低物价的途径来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根据 6

个月计划所取得的成绩来制定经济计划；

巩固和扩大工业中的国家成分，加强国家对私营成分的监督；

对税收制度进行改革以有益于劳动人民群众；

通过税收和信贷制度来缩减资本家的巨额利润，实行总工法；

集中银行；

确保农民的农业机械贷款；

全力开展农村的消费合作社，使其逐步转化成生产合作社；

继续清洗党务机关中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分子，其中包括在
进行审判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对军队进行改革，使军队的领导权转入共产党手中；

制定新的宪法，这一宪法将极大地限制国王的政权，并为完全
消灭国王的政权提供可能性。

尽管斗争局势极为困难和复杂，共产党认为，罗马尼亚已经加
入了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这一进程，并拥有继续更快地发展这一进
程的前途。

目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共有党员 71 万人。

德治报告给人总的印象不太好。

今天上午南斯拉夫人卡德尔和吉拉斯、意大利人隆哥进行了发
言讲话。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4日

No 11627

卡德尔和吉拉斯在情报局会议上 关于南共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4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4日11时开始。

会议主席哥穆尔卡同志请卡德尔同志作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卡德尔和吉拉斯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卡德尔同志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名义欢迎与会者。他说，我们特别欢迎，身为各国共产党导师和榜样的领导党——联共（布）代表的出席。说联共（布）是领导党，不仅是因为它是伟大苏联人民的党，不仅是因为它以自己人民的经验和热血促使我们战胜了法西斯。联共（布）是领导党，是因为这个党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的党。苏联的力量和它现在的国际作用，联共（布）的整个过去，使这个党成了进步的热爱自由的人类的领袖。这样，很自然，其他国家的

共产党希望同这个党保持更紧密的联系。^①

南斯拉夫共产党欢迎这次会议的召开，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建立的联系能经常保持下去。我们完全赞成波兰工人党中央的倡议。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争开始前在广大群众中就占有了阵地。但它的领导作用是在战争期间最后形成的。

1941年4月战争^②之后，我们立即着手建立不大的完全保密的军事委员会，其使命是为发动武装起义做组织准备。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在整个南斯拉夫建立起这种委员会系统。

中央认为，随着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国际条件的变化，不仅是我们的国际义务——帮助被进攻的苏联，此外还有国内条件的变化。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把苏联参战看成是消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保证。群众同占领者斗争的愿望大大增强了。因此，南共中央于6月22日和23日号召南斯拉夫人民开始反对占领者的游击战争。7、8两月全国都开始了游击行动并迅速转变为全民起义。到9月，我们已有很大一片解放领土，到1941年9月中旬，以总书记铁托同志为首的我党中央政治局已全部从贝尔格莱德转移到解放的领土上。中央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成立了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同志任总司令，我们的力量不断增长，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认为，保证了起义胜利的是我们策略的四个基本因素。

毫无疑问，第一个因素是：从被占领的第一天起，我党就有通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从另外一方面，目前，我们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的见证人，这种危机导致了各种矛盾和阶级冲突的进一步激化，并为帝国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进行解放斗争和武装起义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牢固的联系，以便互相交换意见并协商加强世界民主力量的某些共同措施，是必须的。”

② 指1941年4月6日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对南斯拉夫的进攻。

过开展游击运动武装起义的明确方针。而且我们依靠了预先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成果，依靠了我们人民对占领者的仇恨，依靠了在人民面前揭露旧的政党。正因如此，在组织武装起义的事情上，我们没有等待其他政党，没等待它们同意进入战争。我们把武装起义的全部机构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同占领者进行了彻底的毫不动摇的武装斗争，保持了党在整个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实施一系列革命措施以使劳动群众把人民解放战争真正理解为自己的战争。

当时我们党内的确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怀疑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他们说，游击战争只能是辅助手段而不是武装起义的主要手段，武装起义的主要手段只能是全面罢工、街垒战和夺取城市政权。还有意见认为，把工人从城市吸引到森林中去是错误的，党的领导人离开城市进入山区并使其中一部分人成为军事领导人也是错误的。我们党的一部分同志的这些意见很快被批驳了。

我们党的方针是：把边区的游击运动发展为人民起义，并在正规军（它应在人民起义中成长起来）部队的帮助下使人民起义发展到城市。所以我们为解放领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我们做到了由游击队逐步建立起正规军。起初，游击队多少都同一定的地区联系在一起，由地区司令部实施领导。后来，当条件成熟后，我们开始由游击队建立特别游击旅，旅设司令部。这是我军最初的正规部队，它们按照最高司令部的统一战役计划进行调动和使用。由这些独立旅发展为师和军。我们没把游击战争理解为对资产阶级施压和使它做出某种妥协的工具，而是把游击战争看做是完全战胜占领者和整个资产阶级的工具。这就是我们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①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认为，南斯拉夫的例子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游击战争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也可以成为武装起义的主要方式。”

我们策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人民阵线的特别发展。在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囿于人民阵线的一般解放和民主纲领。我们要求，除同意人民阵线的一般的政治纲领外，还要执行两个条件：

第一，希望人民阵线的各主要组织成为所有爱国力量的统一组织，它们不是按对等原则，而是按民主方法，按照一些人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功劳选出自己的领导人。^① 这样，在1941年通过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协商成立人民阵线的地方，我们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在1942年，这些集团放弃了自己的组织独立性而完全并入了人民阵线。^②

第二，我们要求加入人民阵线的每个政治派别和每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积极地帮助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有一些政治家，他们准备接受人民阵线的政治纲领，但不接受武装起义。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主要的政治打击方向是针对人民解放战争前线和占领者之间所谓的中间分子。这些人实际上同占领者合作，公开宣扬假解放和假民主口号，指责他们所谓的人民阵线和共产党的毫无意义的“冒险主义”。我们无情地揭露这些反动的说客——占领者的帮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只有统一的人民在统一的领导之下，才能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因此，我们要求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阵线委员会的团结一致。我们将自己的工作集中在人民阵线这些统一的委员会上，这样，就建立了相当牢固的组织，这个组织使资产阶级政党地方集团的活动完全陷入瘫痪，其中包括阵线组成部分的那些集团。还是在1941年的时候，通过在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政治党派之间协议的途径成立了人民阵线，而1942年这些集团已经丧失了自己组织的独立性，并作为一个整体溶入了人民阵线。这样一来，人民阵线就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统一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它不是在联合和平等委员会的基础上，而是在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建立的组织。”

②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这种口头上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少数，与此同时他们还反复强调，在战争结束之前应该暂缓起义行动以及同盟国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胜利。我们不仅不同意这样的人加入人民阵线，而且还要在群众面前揭露他们，他们是占领者的后备队，是掩护占领者的基地。”

凶们。^① 我们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范围内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南斯拉夫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实际上是在我党同占领者和国内反动派经过激烈的斗争和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人之后，是在我们的党在全国占据了以劳动人民为首的领导阵地之后才开始的。

我们策略的第三个因素是争取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斗争。人民解放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是在1941年我们解放了一部分领土之后立即出现的。人民解放委员会，在我们这里经由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民解放委员会自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全部权力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在解放的领土上，我们摧毁了旧政权。旧的国家机构体系。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解放的领土上，政权应掌握在人民——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其他真正的爱国者的手里。人民解放委员会基本上是依照苏维埃政权的榜样建立的，但也考虑到了我国的条件。当涉及到叛徒和同占领者合作者的财产时，很多人民解放委员会立即实行了土改或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和工业企业。自然，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出现吓坏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但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委员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先是在各地方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然后我们成立了县和区人民委员会，然后是独立的民族人民解放委员会并附带相应的执行机构，最后是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起初，人民解放委员会和人民阵线委员会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它们同时是战斗组织和政权机关。后来这些职能分开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只是人民政权机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清楚，我们实际上打击的是以他们为代表的内部的反动派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我们打击的是我们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我们打击的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永远不会把人民解放战争看做是我们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而只是这一革命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在人民解放战争范围内，我们实际上进行了我们的民主革命，而在解放之后，我们继续将这种革命推向了社会主义更高级的形式，又一次无情地镇压了反动派的抵抗行动。”

关，与它并行存在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只作为群众性的人民政治组织，是人民解放委员会工作依靠的对象。

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威望及其发展成了一种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依仗了这种因素我们才能够在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采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宣布推翻流亡政府政权和禁止王朝返国，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把南斯拉夫变成联邦国家，和把政权转交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最高人民权力机关，从而使一部分动摇的群众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根本转变。我们认为，南斯拉夫人民政权的发展是人民解放战争同孤立和粉碎资产阶级势力和在共产党领导下争取人民革命的民主权力的斗争相结合的典范。

我们策略的第四个因素是对战时盟国的明确态度。我们整个宣传鼓动政策的方针是加强反希特勒联盟的统一。依靠这种统一，我们全面利用了有利于我们发展的国际机遇。但我们同时也系统地揭露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我们公开揭露了他们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政治阴谋，揭露了他们不愿给予武装援助和同米哈依洛维奇^①游击队和其他叛徒们合作的原因。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教育我们的群众不要相信英、美反动派，打掉了对英、美反动派的一切幻想。

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向群众指出苏联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苏联对我们的无私援助。

我们说，莫斯科—贝尔格莱德联盟，是我们独立的基本保证。我们任何时候也不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和我们同英、美盟国的关系相提并论。相反，我们经常对人民讲，苏联的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

^① 米哈伊洛维奇是二战期间南斯拉夫切特尼克运动——与人民解放力量对立的塞尔维亚军事政治运动领导人，因被指控犯有叛国附敌罪，根据南斯拉夫联邦法庭的判决，于1946年被处死。

斗争，苏联的努力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坚持这种看法，而实践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鲜明的对外政策立场，是动员群众抛弃一切幻想和孤立我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因素。^①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这就是战争后期旧资产阶级政党被粉碎和被揭露、整个国家指挥阵地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原因。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民阵线和作为领袖和人民解放斗争组织者的铁托同志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粉碎了整个旧的国家机构，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家机构。在新的国家机构里占据领导位置的是战争中经受考验的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大家知道的，我们同伦敦流亡政府签订了协议。从国内情况看，我们不需要这一协议，它对我们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我们的群众深深憎恨这个流亡政府。我们之所以签订协议是从对外政策方面考虑的，在这方面它是有利的。但世界和国内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英、美代理人离开了政府，到1945年，我们可以建立精干的和统一的人民阵线政府了。

清除了国家上层机关中残留的反动分子和巩固了人民政权系统之后，我们可以转入我国战后发展的下一个阶段了——准备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按照苏维埃国家机构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机构，自然也考虑到了我国的特殊条件。

党的领导作用在国家机构中从上至下得到了保证。联邦政府24个部长职位16个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其余8位部长，多数也同我们党有紧密联系。部长助理，毫无例外，全是共产党员。在联邦人民议会里，将近4/5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在每个人民共和国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正是红军于1944年协助了我们的解放运动这个事实，更加巩固了我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里，在县人民委员会执委会里，也存在类似的比例，不过在个别县人民委员会会议会里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比例差别不大，但共产党员到处是稳定的多数。有些地方，敌对分子，尤其是富农钻进了人民委员会县议会。这仅是个别的地方人民委员会，多半是在农村；在这些方，我们正在开展斗争，力求使人民委员会摆脱敌人的影响，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①

帮助我们粉碎敌人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正确的解决民族问题。

众所周知，南斯拉夫一直是民族冲突激烈的地方。占领者把这种冲突变成了公开的相互残杀，有时一次就死伤几万人。在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共产党是惟一反对各种沙文主义表现和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兄弟般相处和团结的党。

1943年11月29日，通过南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共产党发表了宣言，根据宣言，南斯拉夫宣布为各民族权利平等的联邦。解放之后，我们立即毫不动摇地贯彻了这一决定。除德国人外，我们承认所有少数民族享有一切民族权利：语言，出版，学校，文化结社，相应参加权力机关等。我党的这一民族政策是对各种沙文主义口号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口号的致命打击。

解放后粉碎反动派的第三个因素是我们迅速医治好了国家的战争创伤。我们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自愿参加国家恢复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我们对投机倒把，对资产阶级分子利用我们经济困难捞取利益的一切企图给予了无情的打击。我们制止住了物价上涨，我们稳定了国家财政形势，保障了产量的提高。这些成绩使得反动派无力反抗。人民群众把反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为加强这些人民委员会，为消灭敌人，尤其是富农分子的影响而进行斗争，是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继续巩固人民委员会以及从人民委员会中成长起来的人民政权的整个体系，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条件下继续巩固苏联民主制度的原则，我们的人民政权正是建立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

动派反对人民政权的行动看做是企图妨碍国家的迅速恢复和企图破坏国家的经济生活。

很清楚，这种政策，加上我们手里掌握有国家机构和军队，导致反动派重整旗鼓和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发动进攻等一切企图的彻底破产。反动派不但没能进攻，它的一切合法组织也全部遭到覆灭。除共产党和人民阵线外，我国现在不存在任何其他党派。

的确，在形式上，我们在人民阵线里除共产党外，还有几个其他的党。但实际上这只是几个空名，是为了对外政策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我党对人民群众中持摇摆态度的一部人做工作的一种形式。

这样，在我国出现了这样的形势：人民阵线成了以共产党为首的劳动者惟一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①

我们认为，人民阵线在我国的意义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近来我们正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人民阵线，进一步扩大它的活动范围。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将这一点看做是我们党的最伟大的胜利。

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守纪律的、团结一致的政党，是一所培养人民阵线干部的真正学校，在这样的条件下，具有这样性质的人民阵线，是领导人民群众的一个非常便利的工具。

在人民阵线的所有领导机关里，在中央、共和国和县级领导中，确保我们党的领导作用，不仅仅是在形式上，而且在共产党员与非党员人员的比例数上。人民阵线所有委员会的书记，都是由共产党地方委员会书记或者是委员担任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在我们这里人民阵线的意义不仅没有被削弱，而是增强了。最近我们通过措施，以使人民阵线更加巩固，使其活动更广泛地开展。目前，人民阵线的人数，根据我们的统计有 600 万人，并在每一条街道上，每一个村庄里，每一个居民点都有自己的组织。同时它还是群众自下层监督的形式。人民阵线的会员有自己的证件，他们交纳会费，还必须参加自己组织的工作。特别是现在，当我们正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时候，人民阵线在动员群众的工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人民阵线成为劳动群众的组织。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准备修改人民阵线的纲领和章程。目前，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中只有一个纲领，也就是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相同的纲领。人民阵线是我们党实现自己纲领的一个组织上的武器。”

这样，现在同反动派残余势力的斗争，其表现形式不是党际之间的阶级斗争。斗争重心转到了我国经济和国家建设领域。敌人的活动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阻止实现五年计划和政府实施的所有社会措施，敌人多半以奸商、怠工者、破坏者的面目出现，或以宣传者的面目出现，针对国家建设，宣扬各种有害的理论，反对我们党同反动的世界观进行思想斗争。

另一方面，敌人同英、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和破坏分子联系在一起。

所以对我国的反动派，我们不是把他们作为民族政治力量，作为政治反对派来打击，而是把他们作为英、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代理人，作为外国间谍和破坏机关的支柱和魔爪来打击，所以我们无情地打击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判处他们死刑，公开揭露他们同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联系。^① 帝国主义分子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除了共产党之外，我们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某种其他的国家政治党派，没有也不可能有某种不是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代理机关的国家反对派的存在。在我们看来，如果我们允许其他的，也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在今天我们这样的条件下，除了是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机关之外，他们不可能是别的——威胁共产党在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或者是对其施加压力的话，那就根本谈不上保证国家的独立和人民政权，更何况是继续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了。

我们认为，在我们国家里的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它是极有代表性的，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国家。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每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各种政治力量内部的相互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对比的组成部分。在我们看来，美国为争取世界统治权而进行斗争，正好说明了它所依靠的是与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的自己的经济优势，直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优势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目前，正是由于这一点而出现了一种趋向，即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将一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变成自己的经济武器，变成奴役这些国家的武器，使这些国家变成半独立的甚至是半殖民地的国家。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我们看来，今天最危险的错误就在于，低估国际政治发展的意义，低估将这种发展同自己国家内部政治的发展不断地联系起来的重要意义。”

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卖力和公开。帝国主义分子企图在我国也这样做，希望在我国残余的反动分子中找到自己的支柱。这样，我们反对这些残余分子的斗争采取了保障国家独立的斗争形式。

在南斯拉夫，现在人民政权的敌人的活动，完全没有政党和政治的特征。反动派变成了一小撮叛徒、破坏捣乱分子和外国侦察机关的特务。很清楚，他们因此更加孤立于群众之外。他们和他们的英、美主子三年来一直企图在我国搞武装叛乱活动。他们经常把英、美营地培养出来的武装匪徒派到我境内来。但我们的农民和安全机关捉住了这些匪徒并消灭了他们。这充分证明了人民政权的力量，说明了我国反动派残余分子的软弱。

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和外国间谍近来特别企图用天主教以及东正教、穆斯林等各种宗教反对人民政权。

当然这些宗教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在战争期间，整个天主教，从上至下，几乎全都同占领者有联系，并积极地反对人民解放运动。当时我们大大削弱了它的阵地。现在由于总的国际形势，天主教主教打算进行反攻，企图反对人民政权。

因此，我们对教会中最反动的部分加大了压力，另一方面，我们对倾向于同政府合作和对梵蒂冈政策不满的宗教界人士给予了让步，甚至给予物质援助。结果我们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今年由于不同的宗教节，参加庆祝这些节日的教徒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甚至群众性打鬥。原来是，大部分信教群众准备积极地保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保卫自己的人民政权，在普通神甫中，同国家合作的倾向增强了。上层宗教分子中也出现了分化。某些主教开始同政府合作。由于天主教组织有很强的纪律性，隶属于梵蒂冈，因此我们对他们之间的这种分化不抱多大幻想。

我们在东正教里的阵地大大加强了。其中的分化大大加深了。

对一般神职人员我们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在某些共和国，如黑山和马其顿，几乎所有神职人员都同人民政府有关系。

应该指出，东正教的上层绝大部分都是敌视我们的人，切特尼克分子或处在他们影响之下的人，各种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分子。加夫里尔宗主教本人似乎持摇摆的立场，实际上他支持的正是这部分反动的神职人员。对于东正教神职人员，我们在人民阵线范围里成立了单独的神甫组织，通过这一组织（我们从政治上和物质上经常帮助这一组织），我们不断削弱反动上层的立场。

至于穆斯林教——当然它的意义不大，近来我们借助区别对待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该教的最近一次会议上，选出了新的穆斯林教首领莱斯·乌尔·乌列姆，他同人民阵线有紧密的联系。大部分穆斯林教领导人多少都同人民阵线有联系。但是基层神职人员大部分都对我们怀有敌意。在上层改变之后，粉碎基层神职人员的反抗就容易多了。

关于我们同梵蒂冈的关系。如果说起初这种关系对我们争取国际承认带来了益处，帮助我们吸引了农村信教农民的最落后部分，那么现在这种关系对我们则是弊大于利了。梵蒂冈在南斯拉夫的政策，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一样，意在支持我国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用共产主义恐怖的神话吓唬基督教群众。梵蒂冈努力说服世界舆论，说在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基督教徒无法生存。我们要求梵蒂冈，希望它同我们商量新主教的任命。我们这一要求在信奉宗教的群众当中传播是很广的。所以，如果同梵蒂冈断绝关系，对此我们信奉宗教的群众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这方面我们不想超前，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梵蒂冈的政策，必须与总的国际形势发展相适应。

在农村，反动派寄予很大希望的另一个因素，这便是富农。富农的反抗正在加强。它企图把部分中农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在收

购农产品和贯彻各种经济计划措施时看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们认为，现在对富农实施总的进攻是错误的。我们努力把富农作为奸商来打击，因为它哄抬物价、囤积粮食、抢夺劳动者的谷物、攻击人民政权、欺骗农民群众，是城市资产阶级残余的支柱。这种同富农斗争的方法帮助我们依靠中小农民，这样加深农村的区别对待政策^①

卡德尔同志接着谈到国内的经济问题。

卡德尔同志指出，国家解放之后，我们首先进行了土改。夺取了土地在3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土改的效果首先是政治上的。在南斯拉夫，大地主其实很少。分配的大量土地都是原德国殖民主义者的。所以，土改之后，我国农业结构没有变化。

去年年底，我们对整个工业实行了国有化，只是小企业除外，因为在现在的条件下这些小企业在中国手里将亏本。同时，我们对整个批发贸易实行了国有化，私人手里只剩下零售商业。所有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有陆运、海运和河运业、印刷业都实行了国有化。除农业外，在我国经济中，整个资本主义成分比重已微乎其微了。对外贸易，从解放后第一天起实际上已由国家垄断。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毫无疑问，在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同农村里富农的斗争过程，将会引起我们党的注意。

对于目前南斯拉夫的政治局势也是如此剖析的。以人民阵线为首的我们党的牢固的群众基础，帮助我们粉碎了敌人的一切阴谋，巩固了我们党在国家管理和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很长时间以来，英国和美国的代理人，由于缺乏其他手段并受到了群众的孤立，正在拼命地开展针对个人的恐怖活动，组织怠工以及破坏经济的活动。我们认为，他们今后所要加强的是这些斗争方式。我们应该努力提高我们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警惕性。但是，目前敌人还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目前出现的敌人的行动，主要是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在人民阵线和工会组织的帮助下，一经敌人开始活动我们就能够立即揭露这些反动步骤。”

今年我们着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其任务是：

- 1) 消灭经济和技术落后；
- 2) 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实力；
- 3) 加强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以及从此而来的新的生产关系；
- 4) 提高劳动人民总的生活福利水平。

五年计划要使国家得到改造，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它还将为消灭我国的（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余毒创造物质前提。

要实行五年计划显然需要彻底改造我国经济的领导机构。我们改组了所有的经济部。我们把优秀干部调到这些部门。必须制定工业、建设以及整个经济每日登记制度，必须彻底改造财政系统，实行劳动的定额和物资、劳力、燃料、煤炭需求标准。我们应该改造交通运输业。自然，我们必须同可能的困难和我们干部的错误做斗争。但尽管这样，还是可以说，我们克服了主要的困难，积累了经验，这些经验可帮助我们下一步更好地工作。

进一步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工业化要求我们大大提高农业产量。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我们不能提高农业。这样，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尖锐问题，这就是把小的农户联合起来和建立大农业。

近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列宁合作社计划的精神，根据我们的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已有农民合作社，按总的销售，其产品已占我国农业的3/4。我们将给合作社以必要的帮助，使在其范围里发展其他形式的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我们努力在农村建立统一形式的合作社，它将有信贷部和储蓄所，有作坊，根据能力，还可办小工厂加工农产品或生产农村的日用品。修理农具和机械，还可有机械拖拉机站，在必要的时候还可建地方

小发电站。通过继续发展这种合作社，我们认为，可以逐步解决把小农经济联合成大农业的问题，即实现农业集体化。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重要手段，这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即近似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组织。它们是农民如何为农业的榜样。现在南斯拉夫有近 350 个这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它们的数量还将不断增长。我们全力支持它们。为此我们发展机械—拖拉机站，重视发展农业中的国家成分。

在贸易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所有大的贸易都实行了国有化。

私人手里只有零售商店。除这些商店外，还广泛发展国家和合作社零售商店网。我们逐渐扩大这一网络。因为有困难，眼下工人供应由工厂内部特别商店实施。短缺商品，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些商店对工人进行供应。

至目前为止，我们对市场实行严格的行政监督。所有价格都规定上限。我们改造了金融系统。取消了许多银行，把人民银行及其分行变成了统管国家金融事务的主要组织渠道。我们彻底改造了旧税收系统，这一系统适合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更多地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求。这方面我们采用了苏联的经验。最重要的税收形式是营业税，它占我们工业积累的大部分。

所取得的结果表明，我们正在顺利地完成五年计划。尽管某些部门我们还比较落后，这主要是进口不足，但总的来看，我们还能完成计划。五年计划的这些初步成绩，自然加强了我党和人民阵线的影响。劳动群众给民主政权以很大的支持，可以毫不夸大地讲，全体人民劳动热情都非常高涨。

关于我党的组织问题，由吉拉斯同志评述。

吉拉斯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吉拉斯同志一开始指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秘密斗争、战争期间武装起义和战后建设和恢复被毁坏了的国家等条件下成长和发展的。^①

- ① 原报告文本开始部分的内容与会议记录稿不同：“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艰难的地下斗争中、在武装起义中、在为建设和复兴被破坏的国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国外经常有人认为，只是军事状况以及对于被占领国的某些特别有利的政治条件，帮助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

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正如对每一个革命那样，对于南斯拉夫革命同样也必须有一定的历史条件的结合。我不打算单独说明，这些历史条件是什么，我只想强调指出如下：正如大家所都知道的那样，对于劳动人民所取得的胜利来说，如果没有革命的、组织得很好的、并在斗争中善于领导人民的政党的话，这些最有利的条件，就其本身而言，是远远不够的。在南斯拉夫正是这样的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是经过极好准备的政党，正是它开始的与敌人、与法西斯占领者及其走狗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1941年，当时南斯拉夫已处于希特勒分子的占领之中，而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组织和队伍的纯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全党团结一致，坚如磐石。从当时公布的党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充分认识到党的力量和组织性，它完全清楚，党能够完成摆在其面前的最艰巨的任务，它能够充分履行对自己人民的、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尤其是对苏联的职责。

实际上，由于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和思想上的锻炼，在祖国被占领之后，特别是在苏联遭到进攻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立即开始了同敌人的武装斗争，开展了人民的武装起义，作为在战争条件下的惟一有效的斗争方式。

如果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在思想上训练有素、在政治上团结一致的政党，它怎么能够在没有任何外界物质援助的情况下，开始武装起义并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斗争？当然，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够开始并这样做了，这个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具有强大的力量并具有充分的组织性。南斯拉夫共产党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政党。

在20年深入的地下斗争之后，南斯拉夫共产党参加了战争。在战争最初和战争期间，党内没有任何动摇。党内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反党集团（在此我们不是指的某个人或者是某些地方的情况，它们不可能对党的生活和发展，及其决议在群众中的贯彻执行产生影响）。”

我党是经过20年严密的地下活动之后进入战争的。党内没有任何动摇的和反党的派别集团。

中央委员会迅速把全党工作纳入了战争轨道，指出同占领者的武装斗争是“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任务”。

党组织迅速适应战争条件，立即开始建立游击队。^①

无论是在战前非法存在时期，还是在武装起义和战争期间，以及到现在，接纳新党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预备期是必须有的。每一个定期交纳党费、承认党的纲领和积极地在党的一个组织里工作的人都可成为党的成员。党建立在工厂、农村、机关和街道支部的组织基础之上。党的领导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南斯拉夫共产党由各个共和国里建立的有自己领导的各民族的共产党组成。^②

战争开始时，南共有党员15000人。他们都受过严酷的不合法斗争的考验，有很好的组织纪律性。这些党员在起义中80%的人都牺牲了。战争期间加入党的党员伤亡也很大。但尽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南斯拉夫全国各地涌现出反对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武装起义。众所周知，在南斯拉夫还没有全面解放之前，这些武装起义规模越来越大。

由于党的正确的政治目标，由于确定了同占领者开展武装斗争的坚定方针，党的队伍尽管损失很大，但仍然很快补充了大量新战士和新干部。党在各个方面日益得到了发展和巩固。越来越多地发展了广泛的群众并吸收他们参加武装斗争，党开始在基层建立人民政权机关，普及和巩固人民阵线组织，并使人民阵线组织的分支机构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最闭塞的角落。”

②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只是由于党的队伍的忠诚可靠，由于自己内部的团结一致和组织性，南斯拉夫共产党才能够建立这样的群众组织，如人民青年、人民阵线等等，并依靠这些组织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是这样的牢固组织，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如此牢固的基础之上，那么，在最初艰难的环境下它也就被摧毁了，也不可能建立如此众多的群众性组织，并组织群众和带领他们进行斗争。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员人数增长缓慢的问题，这是由于它所依靠的是一系列政治上先进的群众性组织，以及它在解放战争和武装起义中所起的作用。”

管如此，党的人数还是不断增长。1945年1月，党员人数达到10万人，这时党领导着50万军队，100万人的人民阵线和青年组织。

全国解放之后，党的队伍迅速增长。现有党员40万人。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核心是经过起义和4年战争严峻考验的干部。

党的社会和民族成分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各个劳动阶层（工人、农民、人民知识分子）以及南斯拉夫各民族在党内都有代表。党内妇女和预备党员人数也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党员来说，思想政治工作是必须的。党有6所中等党校和一所两年制高级党校，此外还有大量初级学习班和训练班。

南共依靠群众政治组织和其他组织。

这里应该首先指出人民阵线，在战争期间它发展成了拥有百万人的群众性组织。参加人民阵线的群众组织有妇女阵线、青年联合会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的工会联合会。此外，参加人民阵线的还有一些个别政治小组，原政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和一些杰出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家。

地方上（农村、工厂和街道）的人民阵线组织是一致的，即它们中间没有任何党派特点。地方上的人民阵线所有成员一起聚会，讨论政治和经济问题。除南共外，地方上没有其他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在人民阵线的帮助下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分配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宣传（宣传工作经常由人民阵线做）。

国外常认为，南共不合法，合法的只有阵线。这是不对的。南共合法，但它的工作形式是这样的：不削弱作为惟一的群众性政治

组织的人民阵线，党依靠阵线实现自己的纲领。^①

因此，党的任务是：巩固人民阵线，利用它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

现在，人民阵线拥有成员 420 万人。这个数字里没有包括南斯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在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铁托同志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了党在人民阵线中的领导作用，以及在人民阵线纲领和党的纲领之间没有任何差别这样一个事实，并强调说实际上这是同样的一个纲领。

因此，在党的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前景并提出了如下任务：加强人民阵线并利用它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这样一来，党将应该越来越积极地进行工作，使得人民阵线组织在思想上更加团结一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更加巩固，一句话，使它们变成一个包括千百万个集体的统一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目前存在的差别也将逐渐地消失。自然，党应该很灵活地并非常有策略地领导这个过程，不能仓促行事也不能阻碍群众的发展，也就是进行它们已经面临的内部联合。

人民阵线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战后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随着南斯拉夫人民为争取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不断地向前发展，人民阵线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它越来越趋于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得到巩固和团结一致。根据这一点，南斯拉夫共产党目前应该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和巩固人民阵线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人民阵线如此根深蒂固以及它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下这个事实是最好的说明：根据对它的会员证进行统计，目前它已经拥有 420 万名会员。这个数字里还不包括南斯拉夫人民青年的人数，目前这个青年组织也有大约 125 万人，并且它也是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从属于人民阵线的。这样一来，如果所进行的登记不是阵线的全部人员，那么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组成人员不少于 600 万人。

拥有这样一支庞大的力量，党在建设国家的斗争过程中，将可以克服出现在它面前的一切困难。

目前，在实现五年计划的斗争过程中，人民阵线还起着群众的动员者的作用。此外，它还是进行广泛的政治教育，以及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的非常适宜的方式。

可以说，人民阵线是有纪律性的组织，它能够准确地、毫不动摇地完成领导机构给它提出的任务。

每一个在人民阵线现存组织中工作的人，能够支付会员费并承认人民阵线组织的纲领的人，没有因与敌人的合作而玷污自己的声誉，也没有因自己的生活方式给人民阵线的威望带来损失的人，都可以成为人民阵线的会员。参加人民阵线组织不存在任何思想上、信仰上以及其他方面的障碍。”

拉夫人民青年，南斯拉夫人民青年有成员 125 万人，它作为一个独立组织并入人民阵线。这样，人民阵线的成员数量不少于 600 万人。

每一个在阵线的一个组织里工作，交纳成员费和承认阵线纲领的人都可成为阵线成员。同敌人合作的人不能加入人民阵线。

党依靠的另一个群众组织是南斯拉夫人民青年。人民青年的组织原则同人民阵线的原则相同。人民青年以灵活的方式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性的政治工作。人民青年的核心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该联盟有成员 32 万人。

党还依靠工会，工会有会员 98.42 万人，占工人、职员总数的 80%。^① 在南斯拉夫工会中，没有敌视工人阶级利益和反对我党工会工作路线的派别。如今的南斯拉夫工会是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完全统一和战斗激情的体现。

党依靠群众性的妇女组织——妇女阵线，它在战争期间起了很大作用，现在为恢复被毁坏了的国家而继续奋斗。

最后，党还依靠重新成立的解放战争战士协会。

应该指出，南斯拉夫军队所有军官和高级指挥员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国家安全机关自下而上也全由我党成员领导。

还应该说一下我们组织工作的缺点。

我们的专家和思想上训练有素的干部不足。我党刚刚开始从党的工作人员、共青团员和忠于党和人民阵线的人员中培养干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在提高生产积极性方面，在整顿工作秩序方面，在为实现五年计划而斗争方面，以及在活跃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方面，工会组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部。^①

我党成员，尽管他们的忠诚和战斗素质是令人满意的，但他们比较年轻，思想政治水平较低。这造成了在地方上贯彻国家某些措施时有时会出现偏差或姑息人民敌人的现象。

在文化建设方面党的任务也很重。党在中小学和大学里还没能够正确解释各种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的高素质的干部。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尽管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对于南斯拉夫出现的新的形势持肯定的态度，但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仍然不能完全适应于这种新的形势。尤其是在经济任务方面，党应该克服这个困难并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缺点。

党的成员，尽管就其忠诚和战斗素质方面比较令人满意，但是，他们相对都比较年青，并在思想和政治上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有如下事实：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正确地实施国家的一些措施或者是对敌人持放纵态度的倾向。在这方面党应该领导与困难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应该改正任何一种错误。

在文化生活领域，党能够善于推动一些部门沿正确的道路前进，甚至找到并组成一支健康的，尽管在思想上缺乏经验的干部力量。但是，在科学和哲学领域党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党非常缺乏能够在大、中学校讲述各种哲学和科学问题的干部。这样一来，由于缺乏干部造成的后果是，占据这些部门的基本都是异己分子，甚至是敌对分子。

是的，党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这种状况。但是，遗憾的是，不可能很快地见效，因为党的领导干部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党不得不将最优秀的和最富有理论修养的干部派到国家和党务工作岗位。”

№11628

隆哥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意共 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4日)

绝密

休息过后，哥穆尔卡同志让隆哥同志发言，作关于意大利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隆哥同志的报告（记录稿）^①

1943年7月25日推翻墨索里尼之后，共产党有党员5000～6000人。此外，国内还有许多共产党员小组，它们之间和同领导中心之间没有联系。党的基本干部是经过国内地下斗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或从莫斯科和巴黎党校毕业的积极分子。这些干部是游击

① 原记录文本的开始部分在公布时被删掉了，其内容是：“法西斯制度持续了20年。在法西斯统治的最初5年里，除了共产党之外的所有党派，都享有从事政治活动的自由，但是，后来法西斯分子就禁止了各党派的活动。

共产党是惟一的一个在秘密条件下，坚持不懈地同法西斯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政党。社会党也只是在法西斯统治的后期才开始自己的活动。1934年共产党与社会党签署了关于一致行动的协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分子的行动党，加入了左翼党。这三个政党共同向人民发出号召。”

运动的组织者。^①

1943年，我党在国家大型工业中心组织了一系列罢工。由于劳动群众的不满和越来越积极地反对墨索里尼以及前线失利，大资产阶级开始反对法西斯主义以防止人民起义和挽救危难的政权。^②

1943年9月3日，巴多利奥元帅以国王的名义与同盟国签订了和约。巴多利奥政府由罗马迁到国家南方。德国人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这样，意大利分为两个区域：人民运动发展薄弱的南方和被德国人占领的北方。北意大利居民政治积极性很高，同德国占领者进行了斗争。这一斗争持续了二十多个月。

处在南方的巴多利奥元帅政府，依靠王室和有君主制情绪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政府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同政府并行存在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无权干涉政府的行动。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前，党的领导中心主要是在国外。社会党人在意大利没有大规模的组织。在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在社会党人从前享有传统的影响力的地区，我们控制了他们的干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以取代他们的影响。这种情况在除米兰和都灵之外的所有地区几乎都出现了。

行动党带着经过锻炼的一批干部走出了地下状态。他们由于积极参加了抵抗运动而在群众中享有了很高的威望。

应该指出在其他政党中还有基督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众所周知，在墨索里尼统治的初期，自由党人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并向其提供干部，甚至在法西斯政府里担任部长职位。早些时候，自由党人不再支持法西斯主义并持有中立的立场。战争末期这些自由党分子开始反对墨索里尼政权。”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盟军在西里西亚岛登陆之后，意大利发生了宫廷政变。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被赶下了台。政变的目的是以其他的更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人士取代墨索里尼，并防止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但是，反动派的这些计划被在墨索里尼垮台之后开始的波澜壮阔的人民群众运动粉碎了。

立宪君主不得不对危机采取了另外一种解决方法，法西斯政党被解散，警察局被归入了军队。建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加入其中的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党、行动党，以及基督教民主人士。”

这时陶里亚蒂来到了意大利。当时的政治事件步入了死胡同。民族解放委员会要求宣布成立共和国，不想加入任何其他政府。在这种形势下，陶里亚蒂建议把君主制问题拖到战争结束，然后通过全民表决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宪法问题，他建议交由将来的立宪会议解决。这些原则成了各政党之间达成协议的基础。由各政党参加，成立了新政府，它动员人民群众同德国占领者作斗争。

在意大利北部地区，主要任务是同德国人做斗争。共产党是反抗运动的首领。共产党在积极地同德国法西斯军队做斗争的基础上联合了其他政党。它着手组织游击队，发动群众同德国人和法西斯爪牙墨索里尼作斗争。^①

我们成立了6个反法西斯党联盟。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我们组织了加里波第纵队^②。这是标准的军事集团。后来又有其他党的军事集团加入。成立了统一的指挥部。我党的口号博得了群众的信任。在共产党的号召下，1943年11~12月，在北意大利组织了大规模罢工，而在1944年5月，在整个德国人占领区开始了总罢

① 在更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它组织法西斯队伍中的士兵开小差，准备组建游击队。在与德国法西斯军队进行积极斗争的基础上，共产党成功地联合了各个政治党派。但是，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人士反对这种积极的斗争形式，并呼吁只是支持德国军队中拒绝参加战斗的军官。

共产党开始着手组建游击队伍并发动人民起来进行反对德国分子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喽罗们的斗争。党号召人民千方百计地阻碍德国分子企图利用我们的工业和农业来达到自己的军事目的。

我们竭尽全力以争取达到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一致，并建立了包括6个反法西斯政党的联盟。建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这些委员会并列行动的是领导武装斗争的军事委员会。资产阶级政党拥有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物质援助，并吸引了军事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占据了领导地位。”

② 朱塞佩·加里波第是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在被德军占领的意大利，游击队以加里波第的名字命名。

工。罢工持续一周。参加人数达到 100 万人。^① 1945 年春天游击运动加强了。游击队人数超过 47 万人。其中一半是共产党组织的加里波第纵队。在意大利整个解放当中，游击队起了很大的作用。^② 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战斗组织，我们迫使盟国承认了它。民族解放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北方做了大量工作：组织人民法庭，处死叛徒，其中包括墨索里尼和他的部长们。委员会为逃跑了主人的企业任命政委。在企业里成立工人委员会。委员会曾准备以新的国家机构代替旧机构。^③

为捍卫统一，共产党不得不对其他党做出了让步。当盟军来到北方时，形势发生了变化。盟军司令部清除了行政机关中游击队任命的人员。罗马政府任命自己的人担任行政职务，将民族解放委员会排挤出管理机关。在政府内部搞力量平衡。共产党和与其合作的社会党在政府里没有占据优势，没有压倒右翼党派。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法共所面临的问题……

日丹诺夫：在哪方面？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由于进行游击运动，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 15 个处于游击队政权管理之下的解放区。这些解放区的面积大小不一，但是在其范围内居住着 10 万多人。

1944~1945 年冬天，在意大利战线上的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将军下达命令，解除游击队员的武装。但是，游击队员并没有放下武器。”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国家的南部起到了负责协调各个政治党派活动的调解机关的作用。这些政治党派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所有政治党派在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是，在意大利的北部，这些委员会却变成了与德国占领者进行斗争的机关。共产党提出了关于将各地所有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变成斗争的机关。共产党要求各地都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我们获得了盟国的承认，承认民族解放委员会是斗争的机关。当盟国来到意大利的北部地区时，民族解放委员会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③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但是，并非所有的游击队伍都遵循这一策略。由基督教民主党人领导的游击队就搭救了许多法西斯骨干分子。”

隆哥：意大利共产党应该在许多问题上让步，因为战争还在继续，国家分为两部分。我们反对盟国当局的政策会引起盟国方面的反应，我们将被消灭。我们20年来的活动是在地下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同群众的联系很薄弱。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路线：同各民主党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加强这一联盟，在此基础上达到扩大和巩固民主成果的目的。在同所有民主力量的联盟中，共产党为共和国而斗争。我们进行了总的民主选举，召开了立宪会议，宣告成立共和国。

在保护劳动者利益方面，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通过立法手续规定企业主无权解雇工人，甚至是在劳力“多余”的情况下。确定了工资浮动制（工资随物价上涨而增长）。通过了佃农对分制法令。54%的收成保证归佃农所有。还通过了把荒地分给农民的法令。

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实现大的民主改造：工业、农场和银行没能实现国有化。我们没能实行关于北方企业工人成立的管理委员会的法令。^①

在1945~1946年市政选举中，我们同社会党人获得了多数，得票率为35.8%。^②在1946年6月2日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共产党获19%选票，社会党获23%，基督教民主党获37%。在第二轮市政选举中，尤其在南方，共产党得票率增加了。近来共产党的队伍大大扩大了。至1945年年底，党有成员180万人。到1946年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217.5万人。到1947年7月，党员人数达到227.9万人。在意大利北部，我们的阵地比在南方巩固得多。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我们要求在全国的所有企业里建立这样的委员会，但是，我们没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些委员会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

现在，我打算谈一谈关于群众工作的情况。”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提出了统一的名单。在一些小城市里，绝大多数市长的职位由社会党人担任，而在重要的大城市里，则由共产党人担任。”

全国有7个省区，5%以上的居民是共产党员。例如，在艾米利亚区，大约12%的居民是共产党员。在托斯卡纳区，党员人数占9%，在翁布里亚区，党员人数占7%。

党内有妇女党员42.2万人，青年党员39万人。

共产党的刊物发行面很广。中央机关报《团结报》在4个城市出版（罗马、热那亚、米兰、都灵）每日发行量33.5万份。我们的所有日刊加在一起，日发行量达到50万份。

意大利总工会会有会员608万人。在最近工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多数。

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群众组织。其中有青年阵线，成员27.3万人，其影响面在50万青年之上。在共产党影响之下的还有游击队联盟，有成员21.4万人。妇女协会有成员49万人。该组织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其影响面在100万妇女之上。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共产党是群众性的党，同所有阶层的群众都有联系。近来，我党的影响在不断增长。我们的行动口号是团结所有的左派力量。

我们的敌人努力孤立共产党，企图破坏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行动统一。反共分子引起了社会党内部的分裂，右翼分子脱离了社会党，单独成立了意大利劳动者社会党。萨拉盖特分子声明说，他们为自治的欧洲“社会主义”而斗争。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共的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党并没有因为这一分裂在群众中失去什么。但在议会党派中一半社会党代表赞成萨拉盖特^①。萨拉盖特分子在群众中没有多大成绩。

应该指出，右翼社会党人仍企图使社会党和共产党分手。在所

^① 朱塞佩·萨拉盖特，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在1947年成立了意大利劳动人民社会党（自1949年改名为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有社会党人统一的口号下，萨拉盖特分子努力把社会党人推上反共的道路。

我们提出了统一行动的口号以与右翼社会党人的这一阴谋抗衡。我们声明说，排除工人阶级60%的人所追随的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不能达到所有社会党人统一的目的。^①

在社会党里，右翼分子可能还占优势。这要看总的政治形势。

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开除出政府改变了意大利的整个政治形势。陶里亚蒂同志声明说，这种使政府危机的决定意味着意大利民主内部的分裂，是由民主向后倒退的一步。

反动派想挑战工人阶级，把共产党推上冒险主义的道路。

共产党一再声明，对于它来说，参加政府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争取国家更新的手段。反动派把我们脱离政府看成是分裂进攻的信号。^②企业家放开了手，开始取消以前工资浮动的规定，取消企业解雇工人的禁令。反动派企图把恢复国家的重负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为了不发生分裂，我们建议成立两党联盟。在这个联盟范围内，涉及到两个政党之间协调行动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社会党反对建立这样的联盟。

社会党的内部形势也很不稳定。右翼分子可能还占据优势。这要看总体的政治形势。应该指出，德·加斯佩里的旨在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清除出政府的策略，缓和了社会党的分裂。

政府辞职的发生是在美国和梵蒂冈的压力之下。还是在自己的1947年1月的第一次美国之行之后，德·加斯佩里决定摆脱政府的危机，并力争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但是，当时由于社会党人拒绝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加入政府，德·加斯佩里的这个打算因此遭到了失败。

1947年5月，德·加斯佩里做了第二次尝试。在美国和反动势力直接的和公开的压力之下，德·加斯佩里再一次试图摆脱政府的危机。他利用了以下方案作为前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不可能得到美国方面的援助。最初德·加斯佩里建议只是将共产党人清除出政府，但是社会党人拒绝在没有共产党人的情况下参加政府，因此，德·加斯佩里被迫组建了只有基督教民主党人参加的政府。”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它试图消灭民族解放委员会。”

反动派在对外政策领域也得了手，企图彻底把意大利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

德·加斯佩里^①反动政府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国民议会选举推迟到1948年春天。现在正在酝酿把选举拖得更晚。对共产党展开了一系列进攻：搜查共产党驻地，企图禁止集会和游行等。继续逮捕游击队员，说他们在占领期间进行了“非法行动”。与此同时，从监狱里释放法西斯分子。法西斯报刊开始自由出版。

应该指出，德·加佩斯里政府的这些反动措施对我党的战斗能力没有造成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断增长。党在人数上也不断增加，行动更加积极。左翼党派正在相互接近，地方上成立了保卫共和国委员会。

德·加斯佩里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了群众的抗议行动。最近几个星期意大利发生了全国大罢工。^②不久前北意大利农业工人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雇农超过100万人。60万冶金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全国展开了农民夺取荒地的运动。9月20日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是共产党联合社会党、行动党和“劳动民主党”共同组织的。^③

德·加斯佩里政府同美国建立了紧密联系。该政府鼓励旨在反

① 德·加斯佩里·阿利奇德，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意大利总理。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这段话的叙述有些不同：“德·加斯佩里政府的经济政策引起了价格的持续上涨，并导致里拉的贬值。企业主加强了对工人要求的抵制。所有这一切在国内引起了群众性的抗议活动。在最近几周里，在整个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

③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基督教民主党企图分裂工会组织，阻止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在1947年6月，在佛罗伦萨市召开的工会组织代表大会期间，基督教民主党千方百计地反对进行民主选举工会领导人，竭力保留从前的人数均等的原则。但是，我们成功地取缔了这个原则并在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票。基督教民主党反对通过支持工会组织宣布罢工的决议案。在群众的压力下，基督教民主党在这个问题上被迫做出了让步。尽管遭遇了这些失败，基督教民主党仍然没有停止对工会组织施加影响的斗争。”

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敌对运动。站在反苏反共运动前头的是基督教民主党和教会。在以前的反苏宣传里，它们曾利用的里雅斯特问题^① 和和平条约问题。但在陶里亚蒂同志访问南斯拉夫，在那里他同南斯拉夫政府建立了直接接触，从而保证满意地解决了的里雅斯特问题之后，这一反苏运动遭到了有力的回击。由于马歇尔计划，现在正开展反宣传。我们的敌人想把我们放在反对给予意大利援助的对立面的位置上。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主张保护我国的独立。我们努力做到既同美国又同苏联友好。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但美国也需要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谈判。除美国外，我们还需要东欧国家的援助。我们反对任何威胁我国独立的计划。共产党明白，马歇尔计划是想在欧洲建立两个集团，这个计划将导致我国隶属于其他大国。将导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内政进行政治干涉，这方面希腊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否定马歇尔计划，因为上述每一点都威胁到我国的自由和独立。我们不应该说“援助”。我们有充足的手段同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②

① 的里雅斯特是亚得利亚海沿岸城市，原属奥匈帝国，1918年为意大利占领，其绝大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后来，邻近地区的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迁居到此。1945年5月初南斯拉夫军队突破德军在意大利的防线，与西方盟国军队在索查河会师，共同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市。5月22日占领军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6月9日南斯拉夫被迫与英、美达成撤军协议，但未放弃对的里雅斯特的主权要求。此后，苏联在国际会议上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建议的里雅斯特市在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的范围内作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存在，而将的里雅斯特港口确定为自由港。但西方国家反对。根据1947年2月签署的对意和约，的里雅斯特及周围不大的地区被划分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美国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国家，而我们是贫穷的国家，但是，我们不应该作为美国人的穷亲戚出现。我们的敌人希望在我们的环境里出现恐吓和暴乱。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是在我们国家里建立民主制度。我们只有通过广泛的民主力量的联盟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在政治计划，我们努力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这方面有几个方案：

1. 扩大政府，让萨拉盖特分子和共和国分子加入政府。但这只能加强德·加斯佩里。所以我们否定这一方面。

2. 成立社会党领导下的政府，但没有共产党的参加。这里注定要实现法国所做的事。这样解决问题未必可能。我们反对这种决定，因为它将破坏共产党和社会党行动的统一，导致同社会党的分裂。

3. 我们建议如下解决问题：必须成立由左派党参加的政府。

日丹诺夫：包括基督教民主党？是他们把你们从政府里赶了出去。他们是敌人。他们实现了国家政变。

隆哥：我指的是左派基督教民主党人。

日丹诺夫：您想比议会主义者还议会主义者。他们首先破坏了议会原则，从政府里把你们——最强大的党赶出去。我们不理解这些阴谋。请允许提个问题。如果反动派进攻，那么党中央就退步。反动派把共产党赶出了政府，达到了目的。这不是后退一步，这是国家政变。党想怎么办？党由防御转入进攻？如果党有进攻计划，那么党想在什么地方进行防御，从什么地方开始进攻？或是您想借避免“冒险”的旗号禁止党转入进攻？党想退让多长时间？所有这些问题不能不使全世界工人阶级焦虑不安。

隆哥：我们组织了广泛的群众运动。我们甚至在冶金工人总罢工时想过让工人夺取工厂。我们曾计划利用这个对政府施加压力。我们号召农民夺取土地……

日丹诺夫：您说“没有冒险”。而总罢工和发表声明，照您看来，这不是冒险？党有没有进攻计划，或它想继续防御，等待反动派禁止共产党，把它赶入地下？你们已被赶出政府。而你们没有反抗。反动派将得寸进尺。你们是否进行反攻？

隆哥：我们有转入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规定：使德·加斯佩里失去群众支持，禁止萨拉盖特分子支持德·加斯佩里。如果德·加斯佩里得到萨拉盖特分子和共和主义分子的支持，那么这将影响到社会党。我们的任务在于，联合一切左派力量，并在这一联合的基础上使政府下台。^①

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成绩。起初，萨拉盖特分子和共和主义分子倾向于支持德·加斯佩里。现在他们远离了他。我们的计划是：在提出经济要求的基础上，发动工人运动，使政府或满足工人的要求，或宣布下野。

向议会提交了两个对德·加斯佩里不信任决议案。一个是南尼^②以社会党党团的名义提出的，一个是陶里亚蒂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的。两个决议案将很快在议会中讨论。如果我们能做到使政府辞职，那时将提出成立新政府的问题。如果德·加斯佩里不辞职，我们将号召群众。

我党中央研究了共产党被赶出政府的问题，认为，党在转入反对派立场之时表现得很软弱。我们的反对派立场多半是口头上的，只表现在组织聚会和游行上。只是近来党才转入行动。

日丹诺夫：开始怕你们了？

隆哥：是的，怕我们。

日丹诺夫：两百万人的党足以使10个德·加斯佩里害怕。如果怕你们，那为什么逮捕游击队员，搜查党部和禁止集会游行？

隆哥：在我们组织的群众的压力下，政府被迫将释放的一些法西斯分子重新逮捕，取消封闭我们工厂墙报的命令，不再敢侵犯聚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它不拥有稳定的大多数”。

^② 彼特罗·南尼，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自1947年起担任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意大利外交部长。

会的自由。反动派不敢转入公开的进攻。

我们很重视原游击队员。9月7日到处举行了游击队员检阅。仅在艾米利亚区摩德纳这个小镇就有原2万游击队员排着军事队伍通过广场。

我党中央批评党的不坚定立场，批评地方工作软弱。提醒全党，仅仅通过议会斗争不能推翻政府。

我们懂得，法西斯的危险依然存在。国内法西斯组织的活动出现活跃。政府鼓励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尤其是半法西斯组织“沃莫-夸伦库埃”活动猖獗。应迫使政府采取反法西斯组织的措施。

我想谈谈我党的成分。全党团结在自己的中央和陶里亚蒂同志周围。党的缺点是它的影响同它的数量不相称。在农村，雇农跟我们走，但我们在贫农和中农中间影响不大。而在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中的阵地也较薄弱。我们同统一工会和合作社联盟这样的组织联系紧密，但至今我们没注意扩大自己在体育、文化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影响。

我们感到党的干部数量严重不足。

我党考虑到了未来残酷的斗争，正在从组织上准备反击反动派的进攻。

我同意杜克洛同志所说的话，我想表示我们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感到满意。我们有了交换经验的机构，这些经验对我们的斗争有用。兄弟党的经验将促使我们顺利地进行斗争，加强我们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联系。

我们感谢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为我们和我国解放所做的一切。我们倾听同志们所说的一切建议。这可能是对我们反对把意大利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工具的斗争的重要帮助。我们保证，我们将为继续进步和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积极斗争。

会议于17时结束。

№11629

雷瓦伊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匈共 活动情况的报告

(1947年9月24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4日19时开始。

会议主席哥穆尔卡同志让雷瓦伊同志作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活动的情况报告。

雷瓦伊同志的报告（记录稿）

由于最近一次选举^①，我们成了领导党，同时由于25年来我们处于地下，实际上我党是一个不大的集团。

1945年我们获得了80万张选票，即17%，现在我们获得了111.3万张选票，即全体选票的22.3%。

如果说1945年在各州城市里我们是少数，那么现在在这些地方，我们已走在了社会民主党的前面。

在6个大城市里，共产党1945年获得14.5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获得20.7万张选票，而今年，1947年，共产党得票20.3万张，社会民主党得票18.6万张。

^① 指1947年8月31日开始的匈牙利非常议会选举。

但过高估计我们在工人阶级当中加强了影响是不正确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明，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还不是压倒性的，即我们还没有征得工人阶级具有决定意义的多数。

现在在一些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城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力量相当，而有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甚至超过我们的力量（如首都郊区）。

在匈牙利，新的和积极的因素是农民的左倾。145万农民，即整个农民的2/3投票赞成4个联合的党。其中共产党得票50万张，社会民主党20万张，农民党35万张，左派党一共得农民票105万张。

国家农民党在选举过程中加强了阵地，得到42万张选票，比1945年多得9万张，当时它获选票是33万张。

这个党是贫农党，它实际上是在我们党领导下工作的。这个党的总书记是共产党员。此外，两位部长中（均为这个党的成员），其中一位也是共产党员。在这个党的新议会党团（共有36人组成）里，15人是共产党员，8人是同情共产党的。

由于选举法的奖励制度，竞选联盟总得票率为60.8%，但获得的席位为65%，而3个得票率为46%的左派党，获得的席位为50%。

匈牙利现在没有像样的统一的反对党。1945年我们把统一的反对党分为四部分。我们现在还没有彻底达到目的，即在议会中建立巩固的左派多数，从而保障匈牙利民主朝着人民民主的方向发展。

竞选联盟内部的形势很复杂，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和小农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至于社会民主党，那么它的竞选政策是由右派控制的，它的中

派和左派没能阻止这一政策。^①

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能深入农民群众，它甚至失去了在国家主要农业区即怀有民主情绪的地区的影响。

我们提出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我们这一倡议在选举中夺取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很多选票。无论如何，我们得压过社会民主党，否则它将要求内务部长的职位，而且觊觎占据警察、军队和工会的关键领导职位。这些职位落到社会民主党人手里将大大意味着加强美、英帝国主义对匈牙利国家机构和工人运动机构的影响。

小农党失去了 200 万张选票。美、英帝国主义寄希望于这个党，认为这个党有 57% 的选票，有民主传统，它不仅依靠大部分富农，而且依靠中农，在霍尔蒂^② 当政时是反对派。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他们希望成为小农党的继承人，并因此而奉行征服一切反动群众的方针。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学会了反动派的反共产党和部分是反苏的口号和论点。例如：在全国散布谣言说，如果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就会立即建立集体农庄。他们鼓动说，只有社会民主党人能够阻止任何一种专政制度和匈牙利与苏联的联合。

这样一来，他们的宣传鼓动并没有帮助自己，反而帮助了右翼党派。

在一次群众性集会结束之后，一个农民对另一个人说：如果这些社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以及共产党人确实希望建立集体农庄的话，那么我既不会投共产党人的票，也不会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要知道他们是同盟者，我将只投普费伊费尔的票，也就是投票赞成半法西斯右翼分子的党。

社会民主分子希望无论如何也要成为比我们更强有力的政党，然后，在此基础上，要求得到外交部长的席位。

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反动政策的答复是采用在政治上包围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首先是由于我们所施加的压力，他们没有将右翼分子的首领卡尔·佩耶尔作为候选人，而这样做的后果是他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并根据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名单成为候选人。这自然引起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愤怒。我们采用的计谋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开展斗争，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在这方面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重大的失败。”

② 霍尔蒂·米克洛什，1920~1944年期间担任匈牙利的摄政王（国家的首脑）。自1944年起侨居国外。

经过两年剧烈的政治斗争，^① 我们击败了这个党，在很大程度上把它的民主核心和农民群众从反动派分子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消灭了费伦茨·纳吉^② 之后，我们把左派分子推到该党的领导位置。拉约什^③ 就属于这一左派集团。在这个党因阴谋败露身败名裂之后，左派分子走上了这个党的领导岗位，而反动群众，主要是城市的，离开了这个党。选举时期民主分子和反动分子之间的内部斗争持续到今天。

由于这个党的分化，内外反动派看到它已不能被用来作为反对匈牙利民主的工具。所以他们又组织了新的反动党派。

这里主要谈两个党。

1) 所谓的民主人民党。它由巴兰科维奇领导。实际上这是一个基督教会党，尽管某些主教，例如明曾蒂^④ 主教，认为该党过左。这个党得到 80 万张选票，它依靠的是最黑暗的落后的农民阶层，首先是妇女。暂时还不能把这个党看成是匈牙利反动派最积极好斗的力量。有时甚至还可利用该党的一部分同极右的半法西斯集团作斗争。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你们大家都知道，正是这个政党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了这个反动的阴谋。当我们揭露了原政府总理和小农党的领袖——纳吉·费伦茨时，这个政党受到了重大的打击。我们是利用他在瑞士休假时做这件事的。当时我们的行动是极其神速的，以便不给美国人以机会干涉并拯救纳吉·费伦茨。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纳吉·费伦茨得到了美国人的劝告，即不要提出辞职，并在其辞职已成事实而在布达佩斯已经建立了新的政府之后，返回匈牙利组织抵抗运动。

目前这个党的情况如何呢？”

② 纳吉·费伦茨，匈牙利独立小农党的领导人之一，匈牙利总理，自 1947 年起侨居国外。

③ 丁尼斯·拉约什，匈牙利国家独立小农党领导人之一，自 1947 年 3 月起担任国防部长，自 1947 年 6 月起担任匈牙利总理。

④ 约瑟夫·明曾蒂，红衣主教，匈牙利东正教教会的首脑，1948 年因被指控犯有“从事反国家的阴谋罪”而被逮捕。

2) 匈牙利民主的主要敌人是普费伊费尔的半法西斯党,即所谓的匈牙利独立党。它获得选票60多万张,主要在城市。这个党是美帝国主义的公开走狗,美帝国主义主要利用它干涉匈牙利内政。

应该说,我们对这两个反动党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以直到竞选前最后阶段才直接对这两个党开火。

选举^①之后,出现了我党受到孤立威胁的形势,这一形势拖延了新政府的建立,甚至使人怀疑,如我们不做出重要让步,新政府是否还能建立。^②

① 指1945年11月进行的国民议会选举。

② 在原报告中这段话的表述是:“请允许我,在通报关于匈牙利目前局势之前,首先简要概述一下以上所说的内容:

1. 民主力量,首先是我们的党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这意味着,匈牙利的民主基础变得更加牢固了。

2. 在国内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各种力量的划分。这首先意味着,匈牙利的民主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正在尖锐化。我们非常了解我们的力量,并认识到我们的地位已经得到巩固,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敌人的力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过低估价敌人的力量。

3. 与各种力量总体对比并行发生的是民主阵营内部各种力量的细微差别,在民主阵营内部形成了右倾集团,它们打算在某种程度上与反共力量合作;而另一方面——民主政党内部的左派分子,则逐渐地向我们靠拢,以便共同进行不仅是反对反动势力的,而且是反对自己党内的右倾分子集团的斗争。

考虑到所有的这一切,以及国际形势的尖锐化,应该说,匈牙利的民主制度正面临着严峻的重大的政治搏斗。

在进行组建新政府的谈判期间,我们就感觉到了各种矛盾的尖锐化,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

小农党党内的右派集团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以便将右翼分子派到新政府里,这些右翼分子实际上都是半法西斯党所信任的人。此外,这些集团还提出了一些条件,如果采纳这些条件将意味着确定新政府的反动纲领。

类似的倾向还出现在社会民主党人中。右派分子将选举失败的责任推到左派分子的身上,他们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并动员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来反对左派领导人。在这种压力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通过决定,只有当共产党人将警察局和军队中的一系列关键职位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时,社会民主党人才能参加政府。

我们动员群众，而且公布了我们的政府纲领。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有 30 多万人聚会游行。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赞成我们的口号，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我们的游行集合。

当时我们的主要口号是：

- 1) 立即成立新的强有力的民主政府！
- 2) 停止政治阴谋，着手工作！
- 3) 打倒民主的敌人！

在我们的政府纲领中，我们提出了三年计划要求，我们提出了许多措施消灭国家预算赤字，反对物价飞涨，反对贪污和保障供应。

围绕这些口号和我们的政府纲领，我们组织了人民运动。在我党中央全会上，中央坚决宣布：1) 共产党不打算向右翼党派扩大政府联盟；2) 共产党不打算接收同盟党右翼分子加入联盟。

这样，我们防止了成立反共统一阵线，达成了成立新政府的协议。新政府 15 名成员中，有 5 名共产党员，4 名社会党员，4 名小农党员，2 名农民党员。实际上在政府成员中，我们有 7 名共产党

(接第 422 页注释②) 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得到：内务部主管部长的职位（到目前为止仍为共产党人所掌握着），负责整个国家警察机构的管理工作；政治警察局，也就是国家安全警察局的局长职位；边防军队的副司令员职位；军队侦察处的主任职位；一个师长的职务（共有两名）；布达佩斯市警备司令的职位。

当我们收到他们的要求时，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些要求是由英国或美国的特工人员研究制定的。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党面临被孤立的危险，并拖延了新政府的建立，不仅如此，还可能使新政府无法建立，或在我方做出重大让步后建立政府。

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做如何反应呢？”

员和2名同情我们的人。这样，新政府不会通过不利于我们的决定。

随着新政府的成立，我们赢得了一次战斗，但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在匈牙利到底是人民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这一问题还未最后解决。

与此相联系的第二个主要问题也没有最后得到解决，即匈牙利是加入周围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还是成为某种形式的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柱。

如果不考虑到美帝国主义旨在把匈牙利变成反苏和反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基地的政策，便不能理解匈牙利的内部斗争。

匈牙利民主是人民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各种因素的混合物。国内消灭了封建关系，分了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实行了根本的土地改革，重工业实行了国有化。正在准备把大银行收归国有，这些银行控制着近60%的匈牙利工业。

但至今相当一部分工业和几乎整个商业机构都处在资本家手中，国家行政机构主要由旧官吏组成，存在反动的和半法西斯的党，它们在议会里有党团。

从红军解放我国之时起，匈牙利的两种民主因素之间就未间断过斗争。匈牙利民主的历史表明，人民民主因素在增长，超过了资产阶级的因素。

匈牙利的经济恢复取得了重要成绩。我们的工业达到了战前水平的80%。1946年8月货币稳定使匈国民经济迅速提高，使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有了提高。1946年8月1日工人工资不足战前工资的50%。经过一年时间，实际工资增长了，现在达到战前水平的60~70%。

国家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形势造成了额外的困难。

我国连续三年遭受了旱灾。今年我国比预计的少收500万公担

粮食。因此，我们被迫减少粮食定额。今年人民收入减少 1.5 亿美元，即整个国民收入减少 10%。国家预算赤字达到 20%，支出为 50 亿福林，收入仅为 40 亿福林，赤字达到 10 亿福林或 1 亿美元。战争赔款占国家总开支的 50%。去年 8 月，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所进行的货币稳定现在受到威胁。货币发行额超过了相应的货物价值。所以物价在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在下滑。

我党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克服经济、财政和供应领域出现的困难。其中主要措施是：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实施国有化；尤其是加强国民企业的劳动纪律；同物价高涨作斗争；暂时禁止提高工资；对资本家的收入和财产大幅度提高税收；在国家机关严格实行节约制度。为此我们甚至决定在实施三年计划头几个月里减少预定投资的 25%，以待经济形势好转后再加速实施计划。

我党在经济和财政政策方面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稳定，反对通货膨胀倾向，同时严格控制资本家。

经验表明，在目前存在 4 个民主党联盟的情况下，继续前进和保障匈牙利人民民主的胜利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四党联盟实际上变成了议会在政府中的合作。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小农党分子只是临时被迫同共产党合作，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反对共产党。

从这里应该看到，我党应该奉行民主力量新联盟方针，依靠这一新的联盟可以解决匈牙利民主发展的基本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帮助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工人成员组织起来，以对抗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这终将导致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取代其右翼和加强同共产党人的统一阵线，或造成社会民主党队伍的分裂。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成立匈牙利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前景。我们还应该帮助小农党的民主分子组织该党依靠农民群众的左翼，以便把资产阶级分子、反动分子和半法西斯分子从党内排挤出去。这意味着，小农党的左派或夺取全党领导以此巩固同共产党的联盟，或使该党分裂，左翼

同共产党形成联盟。我们还给自己提出任务：全面巩固我们同国家农民党的联盟，扩大我党的群众基础，加强我党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

我们认为改变力量对比的第一步是粉碎普费伊费尔的半法西斯党，要采取政治和警察措施反对它，以便彻底把它赶入地下。

我党应该努力工作，发展和加强联盟党之间的左翼集团，在一定的时刻可以同它们建立新人民民主政府。为达到这些目的，可能通常的合法办法是不够的。

当然，匈牙利未来民主将取决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我党的工作。

在红军解放我国之后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党赢得了很大的声望。^①

我党现有党员 75 万多人。仅在 1947 年 8 月竞选过程中加入我党的就有 10 万人。我党的社会成分是：工人党员 42 万，农民党员 28 万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小商人党员 50 万人。

党内妇女占 25~30%。在工厂、农村和城市，我们有基层党组织 47000 个。在 75 万共产党员中，仅有 1 万人是非法时期的老党员，有 5 万人曾是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或工会成员。^②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甚至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共产党是整个国家生活的动力。社会舆论调查研究部门在选举之前提出一个问题：谁是最受欢迎的国务活动家？答案是，拉科西同志获得了多数赞成票。拉科西的威信和声望超过了匈牙利民主党的其他所有领导人的威信，并越过了共产党的界线。居民所有阶层的人士向他提出愿望、要求，并向他请教。”

②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祖国解放之后，我们的党处于与其他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的环境之中，关于这些情况来自兄弟党的同志在这里已经做了说明。党员数量的增加意味着，许多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和思想上没有受过培训的人参加了党的队伍。在干部问题上我们党所具有的弱点，正是其他兄弟党也具有。尽管这样，我首先想说的并不是这些弱点，而是想谈谈这些新的没有受过培训的党员同志的成绩和能力。只是我们的老党员同志，在最近的两年半时间里，没能完成那些我们已经决定下来的任务。”

由于党的队伍的迅速增长，党内进来了许多没有实践经验和缺乏思想教育的人。

在这些年轻干部的帮助下，1945年初我们以突击的方式仅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在农民中间分配了地主的土地，从而建立了工农联盟。在这些年轻干部的帮助下，我党得以提出恢复交通的口号和实现这一口号。在这些年轻干部的帮助下，我党得以在解放之后立即领导了大规模的人民恢复国家的运动。在这些年轻干部的帮助下，我们得以在两年时间里发动起人民群众反对反动派并胜利地进行了这一工作。

这些年轻干部的缺点表现在，他们不理解我党的民主和民族政策。^①

克服我们干部的弱点只能通过教育。我党教育是采用以下形式进行的：我们每个委员会都有为期三个星期的学习班，有三所3个月一期的党校，有一所6个月一期的中央党校。

此外，我们为军官、大学生、市政工作人员举办了几百次实习课和专门训练班。选举前我们举办了一周训练班，培训了数千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在广大群众意识中，我们的党仍然是1919年的那个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党。许多所谓的‘老党员同志’认为，红军解放匈牙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继续1919年被停止的那件事。这些人不懂得与其他民主党合作的政策，他们在农村和一些地区扮演着小专制者的角色，这给我们的党带来了许多危害。

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左倾宗派主义，特别是在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方面，尽管我们已经免去了其中许多人的领导职位。

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持敌意的态度上。例如，我们进行了长久的斗争，才使我们的矿工确信，必须修正对矿场上的工程师们的态度。

左倾激进主义还表现在我们的新党员同志否认普通的群众性工作，而只是想组织群众斗争和示威游行。只是在我们党于1946年9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我们才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根本的改变。我们的党组织开始进行日常工作，实施公共政策，每逢星期日去探访农村。由于这种转变，我们在最后一次选举运动中取得了成绩。”

名宣传员。总共 10 万共产党员通过各种党校和训练班训练。

我党理论刊物（发行 15000 份）在党的干部的教育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的日报在全国广泛发行。我党中央机关报是匈牙利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日发行 11 万份，星期日 16 万份。此外，我们有了 3 种人民报纸，发行 18 万份。我们还出版 15 种日报和 45 种周报。我党报纸发行总量超过了其他党的党报发行总和。

我们的出版机构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和斯大林传，苏联政治和文艺书籍。

我们对电影也有决定性的影响：400 家电影院中 230 家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对电台广播也有重要影响。

党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正在扩大。全国 20% 的医生、22% 的工程师是共产党员。著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艺术家是我党党员。

我们有许多群众组织，它们在党和群众之间起着传送带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会。工会组织有 150 万成员。在工会中央委员会里我们占多数——8 名共产党员，7 名社会民主党员。我们的妇女组织（匈牙利妇女民主联盟）和青年组织（匈牙利青年民主联盟）没有多大作用。青年组织仅有 10 万人，妇女组织有 30 万人，这说明，两个组织同群众联系不密切。

农村中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是新土地所有者联盟，它是我们为土改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成立的。在这个组织的领导机构中有各个党派的农民，但在中央领导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在我党的影响之下的还有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织。

国家政治警察和特殊警察部队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大部分战士和军官是工人和农民。原冶金工人成了上校警察，甚至将军。在警察部队，70% 的士兵和军官是我们的人。

部队现在有两个师和边防军组成。所有这些部队的首长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控制的不仅是高级职位，还有大部分中下级职位。军事学院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任命原游击队员和西班牙战斗参加者的职务，军官成分得到了调整。

我党应进一步改善同群众的接触，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清除追求名誉地位和异己分子，把得到群众信任和享有威信共产党员安排在领导岗位上。

匈牙利民主制度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①

统治斯拉夫人民和外西里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愿望使匈牙利统治阶级变成了德国法西斯的附庸。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一直是匈牙利政策的工具，用以转移匈牙利劳动群众对国内剥削阶级和对统治阶级民族叛卖行为的注意力，把匈牙利劳动群众的仇恨转移到邻国民族身上。

反对德国危险和争取匈牙利独立的斗争同争取匈牙利民主和争取同斯拉夫民族结盟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匈牙利争取独立运动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匈牙利社会的反动阶层——大资本家，原来的地主，富农，僧侣，以及霍尔蒂的官僚机构，是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和英、美在我国政策的体现者。削弱和消灭国内的反动势力，这意味着消灭英、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基础，并保证匈牙利对外政策的民主主义方向。

匈牙利以前的统治阶级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附庸，他们一直在垂死挣扎，直到最后一刻。由于他们的政策，匈牙利彻底地变成了希特勒的附庸国，他们将国家引入了灾难的深渊。这种对希特勒德国的忠诚是并非偶然的。匈牙利的大资本家和地主将匈牙利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德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将德国法西斯分子作为反对匈牙利工人和农民的保护者。他们认为法西斯德国是那种力量的代表，这种力量可以保障匈牙利大资产阶级在所谓的大匈牙利王国的统治地位。”

的传统充满了同斯拉夫邻国人民接近的意图。^①

在匈牙利，大匈牙利沙文主义还依然存在。^②

匈牙利人民愿意加入斯拉夫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联盟。斯拉夫人民也愿意帮助匈牙利加入这一联盟以防止匈牙利变成英、美帝国主义打入多瑙河地区的一个楔子。但有一种因素使匈牙利同邻国人民的这一联盟变得复杂起来，成了反动的匈牙利沙文主义的推动力，这一因素便是斯洛伐克匈牙利人的地位问题。

-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我们，匈牙利的共产党员们，还在战争期间就声明过，反对德国占领者的斗争是与为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为自己的自由而战并拒绝大匈牙利沙文主义的斯拉夫民族结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提出这种观点还是在国家解放之后，在准备巴黎和平会议期间。当时在国内沙文主义又死灰复燃了。甚至在民主主义阶层也接受了所谓的匈牙利‘民族边界线’的观点，这意味着应该将居住着匈牙利人的所有领土归还给匈牙利国家。

我们反对这些沙文主义的企图，但不拒绝在巴黎和会上为一些质朴的民族要求进行辩护。否则我们就会使自己孤立于人民群众，并脱离了人民的民族感情。但是，当和平条约已经缔结时，我们坚决地说：应该消灭修正主义，匈牙利民主制度不可能忍受任何旨在反对自己的民主邻国的企图。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民族问题应该从属于民主的进步问题。南斯拉夫民主制度的统一和强盛，罗马尼亚民主制度的团结和巩固，比匈牙利的边界更重要。”

- ②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今天，英、美帝国主义取代了以往的德国，而对大匈牙利沙文主义实行纵容。它们试图点燃对斯拉夫人过去的仇恨。

但是，匈牙利沙文主义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力正在一天一天的减弱。工人阶级感谢苏联解放了自己。65万匈牙利农民永远也不会忘记，由于红军的到来他们才获得了地主的土地。当给农民分配土地时，在农村可以看到这样的标语：‘我们感谢斯大林的土地’。

匈牙利人民对新南斯拉夫抱有好感是因为，匈牙利人非常清楚，南斯拉夫联邦给予了匈牙利人民以自由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可能性。根据这个原因，在匈牙利反罗马尼亚的情绪是很难发展的，因为在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权利。

德国帝国主义是匈牙利民族独立的永久敌人，而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则继续着德国的手段，这就使我们更容易开展为保卫匈牙利独立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一政策还使我们更容易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灌输一个信念，与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与苏联和南斯拉夫结成联盟的思想，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

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作为人民的党，不能放弃代表我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满意这种状况，在斯洛伐克，几十万匈牙利人失去了一切公民权利，他们没有学校，没有报纸，甚至没有反对自己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权利。我们希望，最终我们能就这个问题同我们捷克和斯洛伐克同志达成协议。^①

匈牙利民主主义为完成自己的内外任务需要民主的邻国的援助。这种援助可以是经济的，如同苏联的贸易条约或同南斯拉夫的经济条约，也可以是思想政治的，如在保卫匈牙利选举、反对西方攻击方面，各人民民主国家报刊对我们的声援。在我们的人民民主邻国报刊上公开批评我国民主党的右翼集团也是这种援助。

在匈牙利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对匈牙利从经济上或外交上实施某种压力，也是对匈牙利民主主义和我们党的一种援助。^②

①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匈牙利的民主制度还在对外政策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力量。

1. 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在和平条约方面出现的沙文主义的斗争。

2. 我们成功地做到了，使政府一致拒绝参加就马歇尔计划问题举行的巴黎代表会议。

3. 我们缔结了匈南经济互助条约，这一条约对抗了盎格鲁-撒克逊的阴谋，并受到人民的广泛欢迎。

4. 在我们的国家纲领之中，规定了与我们的民主邻国缔结友好互助条约。我们希望立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将比在新政府里由共产党人担任外交部长更容易些。根据我们的战略计划，打算按照下列顺序进行这件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苏联，保加利亚，以及在消灭了所有阻碍之后——捷克斯洛伐克。

5. 我们在匈牙利人民中散播对盎格鲁-撒克逊，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仇恨，并将这种仇恨与为争取匈牙利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揭露反动阶级是人民的叛徒，是为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工作的。这个任务也是我们在未来将要完成的。”

② 这里删掉了原报告中的以下内容：“但是，我们不仅仅是希望援助。我们，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永远都清楚，我们能够给予我们邻国同志以最重要的帮助，这种帮助应该是：消灭自己本国的反动分子，并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人民不应该为这个国家担心，正相反，他们可以依靠这个国家，就像依靠自己的同盟者那样。为了实现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忠告，需要协商，需要与我们的兄弟党

为了完成我们面前的任务，我们需要建议咨询，需要同我们的兄弟党交流经验。所以我们欢迎这次会议，我们同意联共（布）代表团关于建立经常接触的建议。

（接第431页注释②） 交换意见。因此，我们非常欢迎这次代表会议，并同意联共（布）代表团的关于建立经常接触的建议。解散共产国际并不意味着削弱国际共产主义。

我们不但欢迎召开这次代表会议以及将来召开的类似的会议，而且在我们看来，国际形势日益复杂化，因此各共产党之间协调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当我们的代表团在动身的时候，它获得了中央政治局的全权委托，提出与国际形势尖锐化相关的问题。我们还认为，说美帝国主义分子点燃第三次世界大战多半是恐吓。我们还认为，今天不可能燃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因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里的人民和军队是不希望战争的。

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排除在某个地区可能出现部分冲突，武装冲突，甚至是‘小规模战争’。难道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不意味着将把希腊变成这种冲突和‘小规模战争’的策源地？

这并非理论问题。各国共产党应该对它有所准备。例如：如果在邻国出现这样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党在对外政策方面就应该采取另外一种路线。我们的党应该在对外政策方面建立这样的条件，即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能够给予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帮助。

存在着许多国际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集体协商解决。在此意义上我代表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欢迎召开这次代表大会。”

№11630

马林科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 会议日程安排的发言

(1947年9月24日)

绝密

休息之后哥穆尔卡同志说：

同志们，我们的日程已经结束。我们听取了所有的情况报告。现在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确定下一步的日程。第二，选举会议主席，因为我们以前曾商量好，为了讨论议事日程首先必须选出主席。我请你们发表看法。请马林科夫同志发言（联共（布）代表团）。

马林科夫同志：

同志们，我们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取了出席本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的情况通报。这些通报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其中反映了各布尔什维克党在各国具体情况下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斗争经验。所以说，我们的会议已给我们带来很大好处。

但是，如果我们只局限于情况通报，不就我们共产党关心的某些主要问题交换意见，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会议就辜负了我们对这次会晤的希望。

我们生活在美帝国主义宣布了实施反共反民主远征的形势之下。

我们是分散斗争还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一起？

充分地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弄清，就国际形势问题和当代条件下各共产党的策略问题交换意见的必要性成熟到了什么程度。

出于我向你们陈述的这些理由，联共（布）代表团建议——看来，这是代表们的共同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 1) 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 2) 关于各共产党行动的协调问题。

我们建议分别听取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报告，并进行必要的意见交换。

如果我们的建议被接受，那么我们代表团准备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至于第二个报告，我们觉得应由波兰代表团代表来作。波兰同志们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倡导者，自然，他们可以继续充当倡导者，就共产党活动的协调问题作报告并提出建议。

这样，同志们，我建议就我们所听取的情况通报不进行辩论，而是交换意见，以便确定我们会议的下一步工作计划，确定我们应将哪些问题列入下一步工作计划，我们应就哪些问题听取报告，交换意见和做出决定。

会议主席争求与会者对马林科夫同志建议的意见。大家表示同意。日程通过了。

马林科夫：由于我们的建议被通过，联共（布）代表团根据日程的第一个问题推举日丹诺夫同志为报告人。

会议主席提出建议：选举下一步会议主席。

日丹诺夫同志提议哥穆尔卡继续担任主席。

明兹同志建议由联共（布）代表团担任主席。

哥穆尔卡同志支持明兹同志的建议并指出，波兰代表团的倡议已经通过了，因为波兰同志们信中所说的计划已经完成。现在会议的事情是决定下一步工作和会议主席问题。

会议表示同意明兹同志的建议。

委托联共（布）代表团为下一步会议的主席。

会议于 21 时 30 分结束。

№11653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卡德尔、隆哥和
雷瓦伊等人的报告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9月24日，会议听取了卡德尔和吉拉斯（南斯拉夫）、隆哥（意大利）和雷瓦伊（匈牙利）的情况报告。

卡德尔做了内容十分详细的报告，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斗争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共产党在这个斗争中的作用进行了短要的历史性的概述，并详细地评定了南斯拉夫当前的局势和党的政策。但是，一些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情况，卡德尔没有谈及。卡德尔赞同大会的召开，并支持联共（布）关于必须讨论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以便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措施的建议。吉拉斯在党和人民阵线组织工作的问题方面对卡德尔的报告进行了补充。南斯拉夫共产党约有党员45万人，人民阵线按会员证以及交纳的会员费计算约有420万名成员，而实际上大约有600万名成员。南斯拉夫共产党通过人民阵线开展工作，人民阵线是一个统一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人民阵线的纲领同共产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人民阵线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巩固，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主要任务。党和人民阵线的全部力量被动员参加完成五年计划的斗争。正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所声明的那样，他们将在一切方面利用苏联的经验。南斯拉夫已经走上工业化的、并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农业的道路，即为建设社会主义、

最终在国内尤其是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牢固的基础。卡德尔极其详尽地描绘了五年计划的任务。

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报告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接着是隆哥（意大利）发言。隆哥报告的大部分内容讲述的是，意大利法西斯制度衰落的历史，以及意大利北部出现的在共产党人庇护下的游击斗争和抵抗运动的历史。这些叙述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枯燥地罗列了在1943年7月25日至1946年底这一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涉及到今年春天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这件事情时，隆哥只是依据报刊上发表的陶里亚蒂对这件事的解释，十分含混不清地简述了这一问题。从隆哥的报告可以看出，目前已经拥有220多万名党员的意大利共产党，由于其领导人的错误和惊慌失措，不知道今后将怎样做，也无法预料事件的发展。

德·加斯佩里政府在意大利的民主力量之间进行挑拨活动，企图将共产党推上冒险和暴力行动的道路上，以此为反动派扫清道路。反动派非常理解这是作为向民主力量以及工人阶级发动进攻的信号。反动派希望在对外政策领域大显身手，以便使意大利成为美帝国主义的顺从的工具。德·加斯佩里准备在1948年春天对议会进行新的选举，也可能这种选举会向后拖延。开始了限制民主自由的一系列措施：搜查共产党人的住所，企图禁止各企业中工人的集会，禁止出版墙报，借口指控其犯有刑事杀人罪开始逮捕游击队员等等。同时给法西斯的报刊以自由。

从隆哥的报告中还看不出来，共产党是否考虑过对反动派进行回击的问题。

当谢尔盖耶夫向隆哥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即共产党是否计划向反动派和德·加斯佩里政府进行反攻，或者在暂时还没有对它实行全面禁止时，只是打算继续进行防御和退让，隆哥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复，同时以指出开始的罢工和工人们的示威游行作为掩饰，

并说党准备广泛开展这种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当谢尔盖耶夫反驳说，德·加斯佩里的基督教民主党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政变，反对国内最大的一个政党，恢复了议会的一切权利，它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共产党会不进行任何战斗就做了让步，——隆哥开始引用国内的客观形势对这一切进行辩白。

按隆哥的话说，共产党希望开展孤立德·加斯佩里政府的群众性运动，联合一切左派力量并为除掉德·加斯佩里政府而斗争。这个政府中的绝大部分成员是不牢固和不稳定的。南尼和陶里亚蒂，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向议会提出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本周应该对这些提案进行讨论。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确认，在向反对立场转变的过程中党表现得极为软弱，从而使反对派在群众集会上有了更多的说话机会。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注意到今后斗争的更加残酷以及可能会出现警察的镇压行动，“研究组织进行抵抗的可能性，并准备号召广大群众参加斗争”。隆哥是这样说的。

隆哥的报告给与会的大部分代表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

在晚间的会议上，听取了雷瓦伊（匈牙利共产党）情况的报告。雷瓦伊的报告内容十分丰富，报告对匈牙利的政治形势，以及红军解放匈牙利之后它的现实状况作了分析。

目前在国内外各种势力进一步划分界线，反动派与民主制度的斗争也日趋尖锐化。民主力量在增强和巩固，但是，在民主阵营里也出现了分化：社会民主党和国家小农党里的右翼分子形成了组织，而这些党的左翼分子同共产党人亲近。

目前尚未得到解决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匈牙利建立的将是人民民主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匈牙利是加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行列，还是将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柱。目前，在匈牙利是

两种民主制度并存，最终确立那种民主制度，这将取决于共产党的策略、毅力和智慧。

目前的4党联合政权不能确保人民民主制度在国内取得胜利。这个联合政权是临时的不稳定的，最近就可能被新的势力集团所取代，为此共产党应该帮助社会民主党和国家小农党内的左翼分子团结起来，将这些党内的右翼分子驱逐出去，或者是分裂这些政党。这样就有可能与这些重新复兴的政党或者是脱离了这些党的左翼分子结成牢固的联盟。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

应该粉碎最反动的普费伊费尔半法西斯主义政党，将其赶入地下，以恐吓其他党派中的右翼分子。最终应该建立新的集团，这个集团将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的组织。

在对政策领域应该保持与苏联以及其他斯拉夫国家牢固联盟的方针，决不允许匈牙利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地区的跳板。除存在着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无权地位有关的困难之外，与斯拉夫国家结盟的前景是非常美好的。这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这个问题将会妨碍有关匈牙利族人与斯拉夫族人亲密友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

雷瓦伊表示赞同联共（布）代表团的建议，必须讨论国际形势的问题，以及巩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他们的行动的问题。

总的来说，雷瓦伊的报告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听取完情况报告之后，鲍里索夫提出建议：

不再就听取的报告进行实质性的讨论，而就会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交换意见。大家对此表示同意，并根据我们的建议确定了下一步工作的日程：

1. 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谢尔盖耶夫代表联共（布）做报告；

2. 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由波兰工人党代表团代表进行报告。

委托联共（布）代表团主持下一场会议。

9月25日上午，谢尔盖耶夫做报告。

No 11654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将情报局驻地 设在华沙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4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今天大会结束了对各国共产党情况报告的听取工作。关于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报告情况，我们将做补充汇报。在报告工作结束之后，根据我们代表团的建议，大会决定将以下两个问题列入会议日程中：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以及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行动的报告。正如所约定的那样，第一个报告将由我们的代表来做，第二个报告由波兰人来做。

由于波兰人要做报告，哥穆尔卡和明兹请求会晤并阐述了以下观点：波兰人不希望在华沙建立任何一种合法的情报局。如果一定需要这样的机构，是否最好将其建立在贝尔格莱德或者是布拉格。如果莫斯科不适合作为这个合法的协调机构的驻地的话，那么，依据同样的理由，华沙也不适合成为这样的地点。当我们阐述了在华沙成立这样的情报机构将会带来益处的理由时，哥穆尔卡和明兹说，他们不想用波兰的利益进行冒险，因为在波兰建立情报局将会被看做是共产国际的复活，而这会给波兰的对外关系领域造成不良的影响，波兰将会失去在国外购买货物的权利。为什么波兰共产党应该背上这样的包袱呢？如果说到我们，波兰人，那我们非常满意现存的与联共（布）的接触。我们说，对于事情的如此变化我们没

有预料到，最好是在做完国际形势报告之后，当情况以及必须协调的问题变得非常明朗的时候，我们再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这样约定好了。但是，过半个小时之后，哥穆尔卡又再一次补充了自己的理由，并说，波兰人原则上反对情报局，并认为，在这一阶段应该限制杂志的出版，正如他们建议由自己来通知召开大会的消息那样，同时他们还认为，可以赋予这个杂志编辑部以必要的协调权利。除此而外，在他们看来，即使波兰人不同法国人讲，他们也未必能够承担责任，现在就表示赞成建立情报局。同时建立情报局可能会阻碍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政党。

从所有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波兰人很胆小，他们不想将自己与任何重大的事情联系起来，除了杂志这件事之外。

鉴于波兰人的这种立场，我们认为，在波兰人做报告之前，明确其他各国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对国际形势报告进行讨论过程中做这件事，向参加讨论的各位代表提出相关的问题。

应该指出，在各党的报告中，各位代表都表示赞成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更密切的接触。

我们的意见——必须建立情报局，并且其驻地就设在华沙。

拟定执行这个方针。

请求给予指示。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4日

№ 11631

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关于 国际形势的报告

(1947年9月25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5日13时开始。

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同志们！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日程是国际形势报告。
现在由日丹诺夫同志作报告。

日丹诺夫报告：

关于国际形势^①

一、战后世界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导致了整个国际形势的根本转变。军事上粉碎法西斯国家集团，战争的反法西斯的解放性质，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侵略者当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根本改变了两个体系——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社会主

① 这里刊登的日丹诺夫报告即1947年10月22日及以后发表在《真理报》和其他共产党报刊上的文本。该报告在发表时删去了第四节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批评的内容和结论中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见本文件的附录。

义。

这些变化的实质在什么地方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结果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最强大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成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遭受失败这一事实。全世界，尤其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对德国和日本，首先是对希特勒德国，寄予了特别的希望，首先把它们作为了一种能对苏联实施打击、即使不能消灭苏联至少能削弱苏联和颠覆苏联的影响的力量，其次把它们作为了一种能消灭德国本国和所有成为希特勒侵略目标的国家革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从而能加强资本主义共同地位的力量。这其中包含着战前英、法、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彻底贯彻“绥靖政策”和鼓励法西斯侵略的政策——即所谓的慕尼黑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英、法、美帝国主义分子对希特勒分子寄予的希望落空了。希特勒分子比较薄弱，而苏联和热爱自由的人民要比慕尼黑分子们估计的强大得多。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穷兵黩武的国际法西斯反动主力被歼灭，而且在很长时间里难以恢复元气。

因此，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损失。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结果是冲破了统一的帝国主义阵线，俄罗斯脱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如果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资本主义不再是一统天下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粉碎法西斯，资本主义世界阵地的衰落和反法西斯运动的加强，导致了中欧和东南欧一系列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在这些国家出现了新的人民民主制度。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榜样，苏联军队的解放作用，同热爱和平人民的大规模的高涨的反对法西斯占领者及其走狗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到了一起。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作为民族利益的叛徒，亲法西斯分子，同希特勒合作分子，附敌分子——大资本家、地主、高级官吏、君主主义的军官们被揭露。在多

瑙河流域的国家里，随着国家从德国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臭名昭著的同德国法西斯合作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被夺去政权，在同法西斯占领者作斗争过程中人民中涌现出的新的力量掌握了政权。在这里掌握政权的是工人、农民的代表，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由于工人阶级处处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坚定性和不调和精神，工人阶级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影响大大地提高了。

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不能完成的这样一些民主改革。通过土改把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并以此消灭了地主阶级。把大型工业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同德国人合作的叛徒们的财产，从而根本改变了这些国家垄断资本的地位，使群众避免了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这样奠定了国家全民所有制的基础，建立了新型国家——人民共和国，在那里，政权属于人民，大的工业企业、交通和银行归国家所有，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居民劳动者阶级集团为主导力量。结果，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仅避免了遭受帝国主义分子的压迫，而且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由于战争，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了。苏联是打败德国、日本的领导力量和灵魂。全世界民主进步力量都团结在苏联周围。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最严峻的战争考验，在同最强大的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成了胜利者。苏联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大了。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面貌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六个所谓的帝国主义强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中，三个（德国、日本、意大利）因军事失败而衰落。法国也遭到削弱而失去了自己作为大国的地位。这样，只剩下两个世界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和英国。但其中之一的英国，其地位也遭受损

失。在战争期间，英帝国主义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表现得都很软弱。在欧洲，面对德国的侵略，英国显得软弱无力。在亚洲，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没有力量保持自己对殖民地的统治权力。英国一时失去了同殖民地的联系——这些殖民地供应宗主国的粮食和原料，吸收宗主国的大部分工业产品——在军事和经济上依附美国，依靠美国的粮食和工业品供应。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对美国的财政经济依附开始增长。战后尽管英国收回了自己的殖民地，但在殖民地遇到了美国的影响不断增强的问题，在战争期间，美国趁机在完全属于英国势力范围的地区（阿拉伯东方、东南亚）加强了自己的影响。美国在英国帝国主义的自治领地和南美洲巩固了自己的影响，以前英国在那里的作用大大超过美国。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制度的危机日趋尖锐，这表现在殖民地和从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和不断高涨上面。因此，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后方构成了威胁。殖民地人民不愿再像以前那样生活。自治领地的统治阶级再不能像以前那样管理殖民地了。以军事力量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现在遇到了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大的武装反抗，这导致了持久的殖民地战争（荷兰—印度尼西亚，法国—越南）。

战争是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同时又将继续加剧这一不平衡。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战争中没有被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美国资本家发了战争横财。同时美国人民也没有遭受战争创伤，没有遭受占领者的压迫和空袭；因美国实际上是在战争命运已经决定的最后阶段才参战，故而美国的人员伤亡也比较小。对于美国而言，战争首先是其工业生产广泛展开的一种推动力，导致了出口的大大增长（主要向欧洲出口）。

战争的结束给美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垄断资本努力保持

自己以前的高额利润。为此，他们强求不减少战时的供货规模。但为此美国必须控制战时吸收美国产品的那些市场，而且还要掌握新的市场，因为由于战争，大部分国家的购买力大大降低了。这些国家对美国的财政经济依附程度也大大加强了。美国对外国的贷款达到 190 亿美元，其中不包括美国对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投入。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从世界市场的退出为美国提供了新的更大的机会。

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帝国主义最有影响力的反动集团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积极干预欧洲或亚洲事务，那么在战后新的条件下，华尔街的主人们则转入了新的政策。他们提出了利用美国全部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固守战争期间在海外所夺取的阵地，以及最大限度地扩大这些阵地和在世界市场上取代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计划。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急剧衰落给美国造成了一种机遇，使之利用战后经济困难，其中包括战后英国的经济困难，较为容易地控制其他国家。美国宣布了新的公开占领和扩张主义方针。

美国新的公开扩张的方针，其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统治。为了巩固美国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一垄断地位是由美国两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的消失以及美国资本主义伙伴英国和法国的衰落而形成的），美国政策的新方针打算扩大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措施计划，在作为美国扩张对象的所有国家建立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统治，使这些国家沦为美国的仆从国，在这些国家建立这样的内部制度，即它可以排除来自工人和民主运动的一切干扰，使美国资本可以放手地对这些国家实施剥削。美国政策的这一新方针，现在不仅适用于昨日的军事敌人或中立国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美国的军事盟友。

而且特别注意利用英国——美国的盟友同时也是美国以前的资

本主义敌手和竞争对手——的经济困难。美国扩张主义方针的出发点是：不让英国摆脱战时形成的在经济上英国对美国的依附，而且还要加大对英国的这种压力，以便夺取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把英国挤出自己的势力范围，使之跌向仆从国的地位。

这样，美国新政策的方针是确立自己的垄断地位，想把自己的资本主义伙伴置入依附于美国的境地。

但是，在美国通向统治世界的道路上，站立着苏联及其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法西斯主义政策的堡垒，站立着摆脱了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立着包括美国本国工人阶级在内的各国工人阶级——他们都不希望为了自己剥削者的统治而进行新的战争。所以美国新扩张主义和反动政策的方针以反对苏联、反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反对各国工人运动、反对美国工人运动、反对各国的反帝解放力量为目的。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成就、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就、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感到吃惊的美国反动派，极力想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救世主”而反对共产主义。

这样，美国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非常像不久前也曾觊觎世界统治地位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可耻失败了的冒险计划。

就像当年希特勒分子为了保障能够压迫和奴向所有人民首先是本国人民，在准备掠夺战争之时以反共为自己作掩饰一样，现在的美国统治集团也以防御、抵制共产主义为其扩张主义政策，甚至为其进攻自己削弱了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英国的根本利益作掩护。借口“防御”其杜撰出来的所谓苏联威胁，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在世界各地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为美军构筑登陆场。美国外交运用恫吓、收买和讹诈等手段，轻易征得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的同意，合法地在欧洲和亚洲——德国西部地区、奥地利、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伊朗、阿富汗、中国和日本等

地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

把自己视为对抗苏联、对抗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及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要力量，视为全世界反动的反民主势力的支柱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天便立即着手恢复敌视苏联和世界民主的阵线，鼓励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从希特勒奴役下解放出来和开始按照自己的选择建设生活的各欧洲国家的附敌分子和以前的资本主义走卒。

紧随丘吉尔之后，极其凶恶和失去平衡的帝国主义政策，开始提出尽快实施先发制人的反苏战争，公开呼吁利用美国暂时的核垄断优势反对苏联人。新战争贩子们企图恫吓和讹诈的不仅是苏联，此外还有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他们把苏联描绘成可能的侵略者，把自己说成是中国和印度的“朋友”和使之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救星”，其使命是“援助”弱者。他们想以此控制印度和中国，使它们服从帝国主义，从而继续对它们进行政治和经济奴役。

二、战后政治力量的新格局及以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为一方和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为另一方的两个阵营的建立

战后国际形势和一些国家的根本变化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状况。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格局。战后过去的时间越长，国际政治中所出现的两种基本的政治方向就越明显，即世界舞台上现有的政治力量分成了两个基本的阵营：一方是帝国主义的和反民主的阵营，一方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领导力量是美国。同美国结盟的是英国和法国，而且英国艾德礼、贝文的工党和法国拉马第的社会党政府的存在，并没有妨碍英、法作为美国的仆从国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步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后尘。支持帝国主义阵营的还有这样一些殖民主义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反动

的反民主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希腊；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美国的国家，如中东、南美国家，中国。

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到处支持反动的和反民主的亲法西斯的制度和运动。

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帝国主义阵营准备依靠各国的反动势力和反民主势力，支持昨天的军事敌人反对自己的军事盟友。

反帝和反法西斯的力量构成了另一个阵营。这个阵营的基础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这一阵营还包括这样一些同帝国主义决裂和坚定地走上民主发展道路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匈牙利、芬兰。同反帝阵营有紧密联系的有印度尼西亚、越南，同情这一阵营的有印度、埃及、叙利亚。反帝阵营依靠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依靠各个国家的兄弟的共产党，依靠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依靠每一个国家的进步民主力量的支持。这一阵营的目的是反对新的战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向全体爱好和平的人民提出了巩固对法西斯的胜利和保障巩固的民主世界的重要任务。在解决战后这一主要任务中，苏联及其对外政策应起主要作用。这是由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决定的，它同一切侵略的扩张意图格格不入，它所关心的是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外部世界。作为新的更高一级社会制度的载体，苏联在其对外政策中反映的是整个先进人类的愿望——向往持久和平和厌恶作为资本主义产物的新的战争。苏联是所有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忠诚卫士，任何形式的民族和种族压迫、殖民主义剥削的敌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所出现的力量对比变化，进一步提高了苏联国家对外政策的意义，扩大了其对外政策的规模。

围绕保证正义的民主世界的任务，反帝和反法西斯阵营的一切力量聚合到了一起。在这一基础上，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领域的友好合作得到了发展和加强。这些国家，首先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反法西斯解放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以及加入反法西斯阵线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芬兰，在战后成了反对美、英把它们的发展拉向后退和重新把它们置入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一切企图和争取和平、民主及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坚强战士。

民主阵营的成绩和国际威望的增长不符合帝国主义分子的心愿。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过程中，英、美国家的反动势力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企图破坏盟国的协调行动，拖延战争，削弱苏联，挽救法西斯侵略者免遭全部被歼。以丘吉尔为首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分子拖延第二战线的开辟就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倾向，其实质是“慕尼黑政策”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的继续。但碍于战争还在进行，英、美反动集团未敢公开反对苏联和民主主义国家，不过其心里十分明白，全世界人民群众的心毫无疑问都倾向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但在战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里，形势开始变化。还在1945年7月三国柏林会议谈判期间，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就表现出不愿考虑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合法利益的愿望。

苏联和民主主义国家最近两年的对外政策是为彻底实现战后世界民主原则而斗争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国家是实现这些原则的坚定的忠诚的捍卫者，它们丝毫没有偏离过这些原则。所以，战后民主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为民主主义世界，为消灭法西斯残余和禁止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复活，为确立民族平等原则和尊重它们的主权，为全面裁军和禁止大规模杀伤武器而斗争。在解决所有这些任务时，苏联外交和各民主主义国家的外交遇到了英、美外交的反抗，战后英、美坚定不移地贯彻拒绝战时盟国所宣

布的战后世界建设的普遍原则路线，以旨在破坏普遍和平、保卫法西斯分子和颠覆各国民主制度的新政策取代这一和平和巩固民主的政策。

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旨在解决裁减军备和禁止特别杀伤武器——原子弹问题的共同外交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苏联倡议，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全面裁减军备和关于首要任务是禁止为了军事目的生产和利用原子能的提案。苏联政府的这一提案遭到了美国和英国方面的激烈反对。帝国主义集团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对抗这一决议，这表现在无休止地提出各种毫无结果的拖延和阻止理由，以妨碍通过一些有效的实际措施。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代表团在联合国组织里的行动带有经常为国际合作的民主原则和为揭露帝国主义阴谋分子反对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阴谋而奋斗的性质。

例如，在讨论希腊北部边界形势问题时，充分地暴露出这一点。苏联和波兰坚决反对利用安理会歧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指责它们对希腊的侵略行动。

苏联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这一事实。从这里产生了苏联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在遵守相互原则和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的条件下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众所周知，苏联过去和现在一直恪守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苏联表明了自己合作的意志和愿望。

而英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执行的完全是对抗的政策，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拒绝它们以前所承担的义务和放手推行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宗旨不是为了各民族的相互合作，而是让它们相互仇视，侵犯民主主义国家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孤立苏联。

对所有那些表示愿意合作的国家，苏联对外政策奉行保持真诚

的友邻关系的方针。对那些是苏联真正朋友的和盟友的国家，苏联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对它们像对待真正的朋友和盟友一样。苏联的对外政策打算进一步扩大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友好援助。

为捍卫和平事业，苏联对外政策否定对被战胜的国家的人民进行报复的原则。

众所周知，苏联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热爱和平的非军国主义的民主德国。在谈到苏联的对德政策时，斯大林同志指出，“简单说来，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可归结为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德国的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是建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最重要条件之一”。但苏维埃国家对德国的这一政策遇到了美、英帝国主义集团的疯狂反对。

1947年3~4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表明，美、英、法不仅准备中断德国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甚至准备消灭作为统一国家的德国，准备肢解它并单独解决和平问题。

这一政策是在目前新的形势下贯彻实行的，即在美国终止了罗斯福旧的方针和转入新的政策——准备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情况下开始执行的。

三、奴役欧洲的美国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帝国主义转入侵略的公开扩张主义的方针，这在美国的对外对内政策上得到了反映。积极支持全世界的反动的反民主势力，破坏旨在使德国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的波茨坦决议，庇护日本反动派，扩军备战，储备原子弹——所有这一切伴随着对美国国内劳动群众基本民主权利的进攻。

尽管美国受到的战争创伤较轻，但绝大部分美国人还是不愿重复战争，不愿承受随之而来的牺牲和限制。这促使垄断资本及其在美国统治集团里的走卒们寻找特别手段，以便摧毁国内这一侵略扩

张主义方针的反对派，从而放手进一步实施这一危险政策。

倚仗资本垄断组织的美国统治集团所宣布的对共产主义的远征，必然导致侵犯美国劳动群众的根本权利和利益，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生活法西斯化，导致最野蛮的仇视人类的“理论”的观念的传播。为了准备新的第三次世界战争，美国扩张主义集团密切关注的是扼杀国内对外冒险的一切可能反抗，以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毒化政治上落后的和没有文化的普通美国群众，借助各种反苏、反共宣传手段，如利用电影、广播、教堂和报刊欺骗愚弄美国居民。

美国反动派提倡和贯彻的对外扩张政策规定在所有方面同时展开积极活动：

- 1) 军事战略措施
- 2) 经济扩张和
- 3) 思想斗争。

实现未来侵略的军事战略计划同最大限度地利用二战结束前极大增长起来的美国军事生产部门联系在一起。美帝国主义贯彻彻底的国家军国主义化政策。美国的陆海军军费开支每年超过 110 亿美元。美国武装力量费用拨款 1947～1948 年占预算的 35%，即比 1937～1938 年增加了 10 倍。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军数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中占第 17 位，那么现在它已名列榜首。除储备原子弹外，美国战略家还直言不讳地讲，美国正在研制细菌武器。

美国军事战略计划规定和平时期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建立众多基地和登陆场，用以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美国空军和海军在阿拉斯加、日本、意大利、南斯拉夫、中国、埃及、伊朗、土耳其、希腊、奥地利和西德建有基地或重新建立基地。美国的军事使团在阿富汗，甚至在尼泊尔活动。正在积极地准备利用北极地区实施军事侵略。

尽管战争早已结束，英、美之间的军事联盟，甚至英、美军队联合司令部依然存在。假借装备统一化协定，美国扩大了它对其他国家，首先是对英国和加拿大，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的监督。假借西半球共同防御，把拉美国家拉入了美国军事扩张主义计划的轨道。美国政府把帮助土耳其军队的现代化宣布为自己的正式任务。反动的国民党军队由美国教官训练，装备美国的技术装备。军事集团成了美国积极的政治力量，大批任命在国家整个政策中贯彻侵略的军国主义方针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美国的经济扩张是实现战略计划的重要补充。作为高利贷者，美帝国主义努力利用欧洲国家的战后困难，尤其是利用遭受战争创伤较重的盟国原料、燃料和粮食不足，把自己援助的奴役条件强加给它们。看到未来的经济危机，美国急忙寻找投资和商品销售的垄断范围。美国的经济“援助”广泛追求美国资本奴役欧洲的目的。某一国家的经济形势越严重，美国垄断资本家给它的援助条件就越苛刻。

经济监督带来的是政治上服从美帝国主义。这样，美国商品销售垄断范围的扩大是同美国获得反对欧洲新民主主义力量的新基地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垄断资本在“拯救”某个国家于饥饿和崩溃之危时，所追求的是剥夺它的整个独立性。美国的经济“援助”几乎自然会带来受援国国家政治方针的改变，在这个国家上台的是那些准备按照华盛顿指示贯彻美国所盼望的内外政策的政党和人物（法国、意大利）。

最后，美国追求世界统治和反共方针还包括思想斗争。美国战略计划思想方面的主要任务是恫吓社会舆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实施侵略，这样，把盎格鲁—撒克逊集团说成是防御的一方，推卸它准备新的战争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威望在国外大增。苏联以其忘我的英勇的反帝斗争赢得

了各国劳动群众的爱戴和尊敬。在全世界面前，清楚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苏维埃社会不可摧毁的精神和政治统一的力量。美、英反动集团担心社会主义制度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所产生的这种无形影响逐渐扩大。战争贩子心里十分明白，为派自己的士兵去同苏联作战，需做长期的思想准备。

在反对苏联的思想斗争中，美帝国主义者不懂政治问题，显得愚昧无知，他们首先突出这种思想，即想把苏联描述成似乎是反民主的独裁的力量，而把美国 and 英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说成民主。这种保护资产阶级假民主和指责共产主义独裁的思想斗争纲领，把工人阶级的所有敌人（上至资本家大亨，下到随时准备接受其帝国主义分子所传授的对苏联的任何诋毁的右翼社会党领袖）团结起来。这一欺骗宣传的轴心是这种论点：似乎真正民主的标志是多党制和拥有组成了反对派的少数。根据这一点，不遗余力地反对共产主义的英国工党分子企图在苏联找到对抗的阶级和相应的各党之间的斗争。作为政治上的无知，他们根本不能理解，在苏联已无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对抗和阶级，因而也没有多党制。他们盼望苏联有合他们心意的资产阶级政党，其中包括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假社会党。但令其遗憾的是，历史已将这些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打扫干净。

工党和其他为资产阶级民主辩护的人们，不惜口舌，对苏维埃制度竭尽诬蔑之能事，与此同时，他们又把少数法西斯分子对希腊和土耳其人民的血腥专制视为正常，对资本主义国家诸多不可容忍的践踏最起码的民主原则的现象熟视无睹，对美国民族和种族压迫、受贿、肆无忌惮地侵犯民主权利的事件充耳不闻。

伴随奴役欧洲计划而发起的思想“运动”，其目的之一是对民族主权原则进行攻击，号召放弃各民族主权，并提出“全世界政府”的思想以与之抗衡。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美化肆无忌惮侵犯

各民族主权的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扩张，把美国打扮成全人类法律的守卫神，而把那些反对美国渗透的人们说成是过时的“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的追随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那些幻想家和和平主义者所鼓吹的“全世界政府”的思想，不仅被用来作为对那些捍卫自己独立免遭美帝国主义侵犯的各民族施加压力和瓦解它们思想的手段，而且被用来作为一种专门对抗坚定而彻底捍卫所有民族（不分大小）真正平等原则和保护主权原则的苏联的手段。在现在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追随它们的国家，成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自治的危险敌人，而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成了捍卫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可靠支柱。

非常典型的是，密切合作参与实现美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思想计划的是布里特^①式的美国军事政治侦察机关和格林^②之流的黄色工会领袖，以头号资本主义辩护人布吕姆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舒马赫和贝文式的工党领袖。

在现在条件下，美国扩张主义意图的具体表现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其实，这两个文件反映的是同一种政策，尽管它们在反映美国奴役欧洲这同一意图的提法上不一样。

“杜鲁门主义”对待欧洲的基本特点是：

1. 在地中海东部建立美国基地，目的是确立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

2. 大张旗鼓地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反动制度，把它们作为美帝国主义反对巴尔干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堡垒（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提供贷款）。

① 威廉·布里特，1933～1936年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1936～1940年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

② 威廉·格林，1924～1952年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

3. 不断对新民主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其表现是无端指责它们独裁和有意扩张，攻击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不断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支持它们国内一切反政府和反民主的分子，故意中断同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目的是给这些国家制造经济困难，阻止其经济发展，中断它们的工业化。

打算对一切积极反人民的反动制度提供美国援助的“杜鲁门主义”带有公开的侵略性质。它的公布甚至在习惯了一切情况的美国资本家圈子里也引起了某些不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进步人士坚决抗议挑衅性的公开带有帝国主义性质的杜鲁门的行动。

杜鲁门主义受到非议，这决定了“马歇尔计划”——较为隐蔽地实施同一扩张主义政策的企图——的必然出现。

“马歇尔计划”隐晦的模棱两可的提法的实质在于：拼凑因债务同美国联系起来的国家集团，把美国贷款作为对欧洲国家放弃经济独立然后是政治独立的筹码。而且，“马歇尔计划”的基础是恢复美国垄断资本控制的西德工业区。

正如后来的会议和美国活动家的讲话表明的，“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首先不是给贫困的国家——战胜国，即美国在反对德国斗争中的盟友，而是给德国资本家，以便把欧洲和德国所需之煤炭和钢铁的主要产地操纵在自己手里，使需要煤炭和钢铁的国家依赖于德国经济实力的恢复。

尽管“马歇尔计划”规定要彻底使英国和法国一样，沦为第二位的国家，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和法国拉马第社会党政府仍把“马歇尔计划”当作救命稻草抓住不放。众所周知，英国已基本花光了美国1946年给它提供的3.75亿美元贷款。很清楚，这笔贷款的奴役条件捆住了英国的手脚。在财政上已陷入依附美国这一绝境的英国工党政府把获得新的贷款视为惟一出路。所以它欢迎“马歇尔计划”，把“马歇尔计划”看成走出经济死胡同的出路，看成获得新

贷款的机遇。此外，英国政治家还打算利用西欧国家集团（美国债务国）的建立，企图在其中充当美国的总管，靠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自己发财。英国资产阶级还幻想乘“马歇尔计划”之机替美国垄断资本家效劳和接受他们的监督，以便收回自己在许多国家丢失的阵地，尤其是恢复自己在巴尔干多瑙河地区的阵地。

为了赋予美国提案更多的表面上的“客观性”，还决定把法国也拉入准备实施“马歇尔计划”倡导者的行列，而法国为了美国已丧失了自己一半主权，因为美国1947年5月给法国贷款的条件上规定把共产党赶出法国政府。

遵照华盛顿的指示，英、法政府邀请苏联参加马歇尔提案的讨论。这个手段是为这一提案敌视苏联的性质作掩护。其用意在于，既然事先早已清楚，在马歇尔所提条件之下，苏联拒绝讨论美国的援助提案，那么这就可以把“不愿促使欧洲经济恢复”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从而调动需要实际援助的欧洲国家反对苏联。如果苏联参加讨论，那就很容易诱使东欧和东南欧国家落入“在美国援助下恢复欧洲经济”的陷阱。同时，如同杜鲁门计划想恫吓这些国家一样，“马歇尔计划”也指望先试探它们在经济方面的坚定性，试着诱骗这些国家，然后用美元“援助”捆住它们。

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计划”的使命是实现全美计划的一个最重要任务——在各新民主主义国家恢复帝国主义政权，迫使它们放弃同苏联的密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

同意在巴黎同英、法政府一起讨论马歇尔提案的苏联代表，在巴黎会议上揭露了制定整个欧洲经济计划的不可行性，揭露了在法、英庇护下借新欧洲组织制造干涉欧洲国家内政和破坏它们主权的威胁企图。他们指出，“马歇尔计划”违反国际合作的基本准则，隐藏着欧洲分裂和使欧洲许多国家服从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威胁，该计划打算在诸盟国面前首先给德国的垄断康采恩提供援助——在

“马歇尔计划”里，恢复这些康采恩明显地被赋予特别的作用。

苏联的这一明确立场剥掉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英、法走狗计划的伪装。

全欧洲会议可耻地破产了。9个欧洲国家拒绝出席。而且，即使在同意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和制定这一计划具体实施措施的国家中，这一计划也没有受到特别热情的欢迎，此外，很快证实，苏联关于这一“计划”离真正的实际援助还相差很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原来，美国政府根本就不急于实现马歇尔的承诺。美国国会活动家们承认，国会讨论给一些欧洲国家的贷款拨款问题不会早于1948年。

这样，非常清楚，通过了“马歇尔计划”巴黎“实施方案”的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自身都成了美国讹诈的牺牲品。

必须指出，美国的西方集团方案，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这些依附于美国的国家里也不能不遇到严重的反抗。恢复德国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抗欧洲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力量，这种前景既不能吸引英国，也不能吸引法国。这里英—美—法集团内部存在着一个重要矛盾。美国垄断组织，同全世界的反动派一样，看来不指望佛朗哥或希腊法西斯分子成为美国反对苏联和欧洲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某种可靠支柱。所以，他们对恢复资本主义德国寄予特别的希望，把这看成是对欧洲民主力量顺利地开展斗争的最可靠的保证。他们既不信任英国的工党，也不信任法国的社会党，认为它们是不值得完全信任的“半共产主义者”，尽管它们表现得完全符合其心愿。

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问题，尤其是作为敌视苏联的集团的潜在的军事工业基地的鲁尔区问题，成了最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和美、英、法之间争吵的问题。

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兴趣不能不引起英、法两国的严重不安。美国毫不含糊地暗示，它想从英国手里夺取鲁尔区。美帝国主义分子

还要求合并三个占领区，公开成立在美国监督之下的西德政治独立地区。美国主张在保留美国庇护之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基础上增加鲁尔区钢的生产水平。在华盛顿看来，马歇尔所承诺的给恢复欧洲的贷款主要是用来援助德国的资本家。

这样，美国不是按照丘吉尔所设想的作为英国政治导体的欧洲合众国的计划模式拼凑“西方集团”，而是把它作为美国的保护国，在这个集团里，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主权，其作用同美国第49个州的作用相差不远。美帝国主义越来越肆无忌惮地鄙视英国和法国。确定西德工业生产水平问题的双方和三方会议（英国—美国，美国和法国），严重违犯波茨坦决议，同时也表明美国完全轻视其谈判伙伴的真正利益。英国，尤其是法国，被迫听取美国的指示并接受它的指示。美国外交在伦敦和巴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同它在希腊的表现相似，在希腊，美国的代表认为完全不需什么手续，可以随意撤换和任命希腊部长，俨然以战胜者自居。这样，新的欧洲道威斯^①计划，其实质是反对欧洲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

“马歇尔计划”目的在于反对欧洲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化，自然也是反对它们独立和自力更生的基础。如果说当年欧洲的道威斯计划遭到了失败，当时对抗道威斯计划的力量比现在弱得多，那么现在，在战后的欧洲完全有充足的力量，更不用说苏联了，如果它们表现出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完全可以打破这一奴役计划。问题在于欧洲人民的意志和反抗决心。至于苏联，它将竭尽全力阻止这一计划的实现。

反帝阵营国家对“马歇尔计划”的评价得到整个事件进程的充

^① 查理·盖茨·道威斯，美国银行家，1924年成立了国际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旨在复兴德国军事工业潜力的所谓的道威斯计划。

分肯定。在对待“马歇尔计划”方面，民主主义国家阵营表现出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捍卫欧洲所有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如同不受美元外交狡猾手段的欺骗一样，也决不屈服于讹诈和恫吓。

苏联政府从不反对利用外国贷款，其中也包括美国贷款，它把外国贷款作为加速经济恢复的一种手段。但苏联的出发点永远是：贷款条件不带奴役性质，不能导致债务国受债权国的经济和政治奴役。从这一政治原则出发，苏联一直主张这种立场：外国贷款不能成为恢复国家经济的主要手段。恢复经济的主要和决定性条件应是利用内部力量和本国的资源以建立自身的工业。只有根据这一原则才可以保障国家的独立免受经常表现出把贷款作为政治和经济奴役手段倾向的外国资本的侵害。“马歇尔计划”正是这样，它反对欧洲国家工业化，从而也指望颠覆它们的独立。

苏联坚定地捍卫这一原则：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该建立在双方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原则基础上。苏联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苏联同外国的相互经济关系建立在双方平等和保障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同苏联的条约，对于参加者来说，是互为有利的条约，丝毫不包含侵犯条约双方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的因素。从美国签订的和准备签订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条约的观点看，苏联同其他国家所签协定的这一根本区别现在可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苏联的对外贸易政策中没有不平等协定。而且，苏联同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表明，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人们完全记得不久前苏联同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所签订的条约。苏联以此充分表明，欧洲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走出经济困难处境的出路。美国也可以有这样的条约，如果工党政府在外来压力下不破坏同苏联已拟定好的协定。

揭露美国经济奴役欧洲的计划——这是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

不可磨灭的功劳。

同时，必须指出，美国自身也面临经济危机的威胁。马歇尔的表面大度是有其重要原因的。如果欧洲国家得不到美国的贷款，这些国家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就将下降，这将加速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所以，如果欧洲国家表现出应有的毅力和准备抵制美国贷款的奴役条件，那美国可能被迫让步。

四、在团结民主的反法西斯的热爱和平人士、反对新战争和侵略计划的斗争事业中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适应新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发展的要求，解散共产国际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国际的解散结束了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的诬蔑攻击：似乎莫斯科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似乎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了本民族利益，而是按照外来指示行动的。

共产国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当时各国共产党还很弱小，各国工人阶级运动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各国共产党也没有公认的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国际的功劳在于：它建立和巩固了各国劳动者之间的联系，深入研究了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确立了共产主义思想宣传的共同原则，帮助培养了工人运动领袖。从而为年轻的共产党变成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年轻的共产党变成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由一个中心领导这些党已成为不可能和不适宜。因此，共产国际由促使各共产党发展的因素变成了制约这一发展的因素。共产党发展的新阶段要求各党之间的新的联系形式。这些情况决定了必须解散共产国际和组织新的各党之间的联系形式。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的4年时间里，共产党大大巩固了，它们几乎在欧洲和亚洲所有国家里影响大大加强了。共产党的影响，不仅在东欧，几乎在全欧洲的国家里，在法西斯统治的国家里，以及

在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地方——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等国，都有所增长。共产党的影响尤其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得到了加强，在那里，共产党成了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政党。

但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状况中也有自己的缺点。某些同志这样理解问题，把共产国际的解散理解为取消各兄弟的共产党之间的一切联系和接触。但经验表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不相往来是不正确的、有害的、不正常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民族范围里发展的，但同时对各党来说也有共同的任务和利益。这种状况是非常奇怪的：拼命证明似乎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传达的是莫斯科的指示的社会党人恢复了自己的国际组织，而共产党人却拒绝各党之间的会晤和就相互关心的问题磋商，害怕敌人攻击说“出于莫斯科之手”云云。各种行业的代表——学者、合作社工作人员、青年、大学生，都认为可以保持国际接触，就本专业方面的问题交流经验和进行磋商，召开各种国际会议。而各国，甚至有联盟关系的国家的共产党却羞于建立各兄弟党之间的友好关系。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将给各兄弟党的工作发展带来有害的影响。一些党相互磋商和协调行动的这种需求性成熟了，尤其是现在，如再继续不相往来，将削弱相互理解，甚至导致严重错误。

由于大部分社会党的领导（特别是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充当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领导反对美国奴役欧洲计划和勇敢揭露内部美帝国主义所有走狗的历史责任自然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身上。同时，共产党员应该支持所有那些不愿自己祖国受欺侮和愿为反对外国资本奴役祖国和保护民族主权而斗争的真正的爱国者。在吸引所有反法西斯的热爱自由的人们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役欧洲的新扩张主义计划的斗争事业中，共产党应成为领导力量。

必须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分子想发动新的战争和能否发动战争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世界人民不喜欢战争。保卫和平的力量是

如此的强大，如果这些力量在捍卫和平的事业中表现得非常坚强，那么侵略者的计划一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不应忘记，帝国主义代理人关于军事危险的喧闹意在恫吓意志薄弱者和不坚定分子，企图通过讹诈达到向侵略者让步的目的。

现在工人阶级的主要危险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和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就像以前慕尼黑政策放开了希特勒侵略的手脚一样，如今对美国和帝国主义阵营新方针的让步也会使这一方针的组织者变得更加无耻和更富侵略性。所以共产党应该在国家的、经济的和思想的各项战线领导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侵略计划，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在共同反帝和民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自己的力量，应该把一切民主和人民爱国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

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其他国家各兄弟共产党肩负着特别的任务。它们应该把保卫民族独立和自己国家主权的大旗擎在自己手中。如果各国共产党牢牢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如果它们不害怕恫吓和讹诈，英勇地捍卫持久和平和人民民主，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自由和独立，如果它们善于在自己反对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企图奴役自己国家的斗争中领导一切准备捍卫本国尊严和民族独立的力量，那么任何奴役欧洲的计划都不能实现。

马林科夫同志：同志们，没有人报名辩论，如果我建议在晚间会议上开始议程上规定的辩论，大概可以反映同志们的意见吧。有没有反对意见？没有。请允许我提出晚上会议发言的时间安排意见。

确定晚上辩论发言为 45 分钟。下次会议于 9 月 25 日 18 时开始。

会议于 14 时 30 分结束。

附 录

日丹诺夫报告发表时删节的部分

四、共产党在团结一切民主的、反法西斯的和爱好和平的力量以反对新战争和侵略计划中的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的解散，是适应新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发展的需要，它的解散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国际的解散，永远结束了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敌人的诽谤谰言，即所谓莫斯科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以及各国共产党的活动仿佛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是按照外国的命令进行的等等。

在共产国际解散以来的四年中，几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中，共产党的力量 and 影响都大大地增长了。共产党的影响不但在欧洲增长了，而且实际上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在曾经被法西斯主义所统治的欧洲各国，甚至在那些曾经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过的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芬兰等国也都增长了。在新民主主义各国家里，共产党的影响尤其强大，在那里，共产党是影响最大的政党。

但是在各国共产党目前的情况中，还存在着很多缺点。有些同志曾经这样理解这件事，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即意味着各兄弟共产党之间的一切联系和一切接触都取消了。然而，经验却表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缺乏联系的状况是不正确的，是有害的，并且实质上也是不自然的事情。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各个国家的国内发展的，但是，与此同时，各国共产党又有着共同的任务和利益。目前的情形是相当奇怪的：当那些社会党人（他们曾经拼命地证明说，

共产国际是向各国共产党人传达莫斯科指令的机关)已经恢复了他们自己的国际的时候,而共产党人却竟然反对彼此间的会面,尤其反对在彼此有关的问题上进行相互协商,以避免敌人关于“奉莫斯科之命”的谣言。各种活动的代表——科学家、合作社经营者、工会会员、青年、大学生——都认为保持国际间的联系、交流经验、在工作问题上进行相互协商、召集国际会议是可能的,而各国(甚至彼此有密切联系的国家)共产党人却不去恢复自己相互间的国际联系。毫无疑问,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对各国兄弟党事业的发展,一定会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现在,当各国党继续隔离的状态会降低相互间的了解、有时还可能造成严重错误的时候,某些共产党之间自愿协同行动和协商的要求就完全成熟了。

缺乏联系所导致的孤立,毫无疑问地正在削弱着我们的力量。尤其是,在谈到一些错误时,应该涉及到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待美帝国主义反对工人阶级的新行动方面的错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在应有的程度上、在本国人民群众面前揭露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即美国奴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计划。法国共产党将共产党人离开拉马第政府看做是内部制度的一种自然现象,而当时共产党人被驱逐出拉马第政府的真正原因是应美国人的要求。目前已经完全清楚,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是法国获得美国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即2.5亿美元使法国放弃了自己的国家主权。

对于法国统治当局出卖国家主权这样的可耻行为,法国共产党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其他党派的行为,法国共产党没有抨击他们这种对捍卫国家荣誉和独立事业的背叛,而只是抱怨出现的破坏民主制度的行为,这种行为的表现是触犯了法国议会中人数最多的党的权利,同时,在这种情况下破坏议会传统的行为只是被看做一个理由,而不是原因。这种对将共产党驱逐出

政府的重要原因沉默不语的态度，无疑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严重错误，这种态度，或者是基于没有弄清楚形势，并对这种形势很难做出判断；或者是法国共产党人被有关“国家利益”的说法吓坏了，即共产党人害怕受到指责，说他们妨碍美国给法国提供贷款，仿佛这样将给法国的利益带来损害。这样一来，法国共产党人就被“缺乏爱国主义精神”这样的指责吓倒了，如果法国共产党能够揭露美国提供贷款的内幕，也就是贷款的条件是：要求通过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的途径改变政府的组成，并以此来削弱法国的主权，那么，法国共产党就将成为法国惟一的爱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共产党向反动派的猛烈进攻做了让步，尽管它也知道，这种进攻是按照敌视法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力量的旨意进行的。法国共产党员有责任行动起来，在人民面前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扮演的角色，是他们厚颜无耻地迫使法国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应该向人民解释：这不单单是又一轮的“政府危机”，也不是简单的违背了议会的传统，尽管这一点对评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危机有一定的意义，而是外国干涉了法国的内政，是毁灭了法国的政治独立性，是法国社会党人出卖了国家的主权。非常遗憾的是，法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至今也没有向法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社会舆论说明发生在法国的这些事件的内幕，以及法国社会党人在这方面所扮演的可耻角色。

法国共产党指责社会党人“逐渐地堕入右倾”。但是，难道所说的是堕落成什么样的右派的问题？难道布吕姆曾经当过左派？众所周知，布吕姆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一直是资产阶级的忠实走狗，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的传播者。因此，他没有向任何方向堕落过，显然，法国的同志们还没有完全看透社会党的首领们的计谋。

法国痛苦的经验是意大利“政府危机”的预兆。按照在法国实

行的这一标准，关于美国贷款问题以及与提供贷款有关的一切，是人为地制造的政府危机的主要动机，作为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美国帝国主义集团提出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的要求。

意大利的右翼报刊毫不拘束地袒露了这一秘密。“如果我们希望活着，我们就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意大利的右翼报刊《乌安森索》^① 这样写道。由此该报刊还做出如下结论：“危机应该这样解决，使我们能够拥有必要的贷款。争吵是多余的。应该理解在法国发生的事情，在那里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断绝了关系，而没有进行任何争吵，共产党人就被从部长的职位上赶了下来”。

德·加斯佩里关于将劳动人民的代表驱逐出政府的决定的通报，激发了群众并引起了广泛的抗议。但是，很遗憾，群众的这种主动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领导。

结论是：在意大利如同在法国一样，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反动派的力量，成为帝国主义威胁和讹诈的牺牲品，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民主的力量以及人民群众捍卫民族的根本权利和本国利益的坚强意志。

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无论是法国共产党，还是意大利共产党，在自己的困难的工作条件下，都表明了自己将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在共产主义旗帜周围的能力。

由于社会党领导机关中的大部分人（特别是英国工党分子和法国社会党人）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代理人，所以领导抵抗美国奴役欧洲的计划，勇敢地揭发各国国内一切美帝国主义的帮凶的特别历史任务就落在了共产党人的身上。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必须支持一切为防止其祖国受到侵害，为反对外国资本奴役其祖国，并为维护其国家主权而斗争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们。在团结一切反

^① 此处系 Буансенсо 的音译。

法西斯和爱好自由的人民进行反对新的奴役欧洲的美国扩张计划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必须成为领导力量。

由于苏联站在了抵抗帝国主义新的扩张计划的最前列，兄弟共产党应该以巩固自己在本国的政治地位为出发点，同时应该关心加强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重要支柱的苏联的实力。各国共产党应该忠诚地、公开地执行支持作为争取巩固持久和平、争取民主斗争的主导力量的苏联的这一政策。应该竭尽全力地强调指出，兄弟共产党为巩固苏联所付出的努力，是符合其国家的根本利益的。不应该认为兄弟国家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经常强调自己党不依附于莫斯科是正确的。问题并不在于依附还是不依附，因为莫斯科不能也不愿意将任何人置于依附的境地。故意强调“不依附”莫斯科、“脱离”莫斯科，实质上意味着巴结、虚与委蛇地应付和附和着那些将莫斯科视作敌人的人。各国共产党不应该害怕大声宣布，他们支持莫斯科的爱好和平和民主的政策，不应该害怕宣布，苏联的政策是符合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结 论

在战后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尖锐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特点是：活动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的重新部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和重新组合。当战争在进行时，同盟国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团结起来并形成一个大阵营。然而，就在战时，同盟国阵营内部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任务方面，已经存在着意见分歧。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和巩固欧洲的民主秩序，根除法西斯主义和防止德国重新侵略的可能性，并建立欧洲人民间的持久的、全面的合作。而美国和与它一致的英国，却确定了他们另外的战争目的——扫除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者，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地

位。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事务的任务方面的分歧，更加深化了。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其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巩固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其目的是加强帝国主义和扼杀民主。因为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运动计划实现的障碍，于是宣布了一个反对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同时英、美两个国家中的最狂热的帝国主义政客，也用新战争的威胁来支持这一运动。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其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的残余势力。

两个完全相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削弱和社会主义民主力量更为加强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及其主导力量美国，就开展了特别积极的侵略活动。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中欧洲的一个章节。美国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欧洲的计划，正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各国的计划所补充。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帝国主义阵营所使用的策略武器，是十分多样的。它有直接的暴力威胁、讹诈与勒索、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措施、贿赂、利用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等，以便巩固这个阵营的地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伪装起来的，企图这样来欺骗和引诱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武器库中，占

有特殊地位的是利用右翼社会党人的叛变政策，如像法国的布吕姆、英国的艾德礼和贝文、德国的舒马赫、奥地利的伦纳和塞尔夫等人，这些人力图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辞藻，来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强盗本质，而实际上，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诚的同谋犯，他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英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找到了贝文作为它的最坚决、最狂热的执行者，这并非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制定一个一致赞同的行动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英法同盟者，反对右翼社会党，首先是反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社会党。

为了粉碎马歇尔—杜鲁门的计划，欧洲所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力量一致努力，是非常必要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右翼社会党是这一事业的叛徒。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的政党结成的联盟，成为这些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计划的基础；除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中的社会党人，首先是法国的社会党人和英国的工党分子——拉马第、布吕姆、艾德礼和贝文——都在奴颜婢膝地帮助美国资本达到它的目的，促进美国资本的勒索，并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推上仰赖于美国的附庸国的道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法、意、英及其他国家的兄弟共产党的肩上担负着特别的任务。他们必须将保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如果各国共产党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如果他们不为威胁与恐吓所屈服，如果他们勇敢地保卫巩固的和平与人民的民主，保卫各国的国家主权、自由与独立，如果他们善于在反对那些企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他们国家的斗争中，领导一切准备保卫尊严和民族独立事业的力量，那么，任何奴役欧洲的计划就都不可能实现。

这是我们兄弟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必须指出，在帝国主义者发动新战争的愿望与组织这一战争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全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战争。拥护和平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只要这些力量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能坚定不移，只要他们表现出沉着坚定，那么侵略者的计划就一定会遭到完全彻底的失败。大家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代理人对战争危险的叫嚣，是要恐吓那些神经脆弱和不坚定的人，并用恐吓的手段迫使他们向侵略者做出让步。

目前，工人阶级所面临的主要危险，就是对自己力量的过低估计和对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一如过去慕尼黑政策任希特勒自由侵略一样，现在对美国及帝国主义营垒新方针的让步可以使这一方针的鼓动者更加放肆和更富于侵略性。因此，各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对帝国主义全面（军事、政治、经济、思想）侵略与扩张计划的抵抗，各国共产党必须团结起来，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自己的力量，并将一切民主爱国的人民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11632

吉拉斯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5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5日18时开始。

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同志们，我们开始辩论。在今晚会议上想作辩论发言的有吉拉斯、杜克洛和波克同志。现在请吉拉斯同志发言。

吉拉斯同志发言（记录稿）

吉拉斯同志声明，南斯拉夫代表团欢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同意他对国际形势的评价和对共产党活动的批评。^①

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征是美帝国主义力图统治世界，在这方面英帝国主义正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帮美帝国主义的忙。痛苦的劳动者和受压迫的人民头上又罩上了危险的阴影，其程度至少不比当年德国帝国主义的危险小。

看来，某些党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事实。他们认为，只要在合法的和合乎议会主义的范围里展开自己的工作，就能够使自己国家摆脱美帝国主义的魔爪。通常，这里指的是那些在战争期间没能

^① 吉拉斯在这里援引了日丹诺夫报告中对于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进行批评的内容。

利用已有的有利条件展开反对占领者的武装斗争的党的领导。吉拉斯同志这里指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以，吉拉斯同志分析了杜克洛的发言和法国共产党的一些问题。

经过再三选择，我先来谈谈法国共产党。在美国人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政治家和他们在法国社会党内的走狗一反资产阶级议会的传统，把共产党赶出了政府。美帝国主义分子还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干了同样的勾当。

这些事实世人皆知。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公开报道了这些事。但是，似乎只有法国同志们不清楚这件事。

法国同志们怎么解释自己被赶出政府呢？他们解释自己离开政府有两个原因：一是拉马第的反工人政策，由于这一政策，共产党人如果再留在政府里便会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二是政府的军事政策。结论是，共产党被逐出政府是由于它喜欢这样，它不能再呆在政府里是由于政府对待工人阶级和在印度支那战争上的政策。但这不是事实。法国同志们被逐出政府是由于美帝国主义者的要求。

在共产党员被逐出政府之后，法国展开了罢工运动。但这一运动不带有为共产党员回到政府而斗争的性质。法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人道报》声明说，罢工的罪过在于政府，因为它没有迎合工人的要求。这样，共产党自己赋予这些罢工以经济性质。拉马第政府部分地满足了工人的要求，于是罢工开始平息了。这样，党反对反动政府的斗争没有越出报纸—议会的范围，而且也没采取尖锐的形式。所以，应该提醒一下，后来多列士同志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称法国共产党为“政府党”。

法共被赶出政府之后，法共领导人的这一路线不是偶然的。这一路线有它自己的历史。这一历史的基本因素是：

1. 战争期间法国共产党建立了很多集团，但这样做不是建立在武装反对占领者和维希分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种民族团结

的基础上，建立在政治方面反对德国人的基础上，建立在“条件成熟”，即全民族甚至共产党的资产阶级盟友也准备起义时才发动起义的基础上。

所以，吹捧法国的米哈依洛维奇——戴高乐将军的皮杜尔^①被推上了抵抗委员会主席的宝座。战争期间法共的政策没有导致揭露下流的政治家和法国人民的叛徒。相反，由于法共没有掌握起义的领导权，使得资产阶级投降分子挑拨者和机会主义分子得以恫吓自己，似乎起义的时机还没到来，德国人还很强大和可以歼灭法国人，戴高乐正在训练能够解放法国的军队，英国人早晚要登陆，等等。由于这一切，被法国人民于1940年6月所唾弃的可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借助所谓的抵抗运动，在群众面前重新给自己戴上了爱国主义的假面具。^②

所以说，法国共产党不顾自己大多数党员的英勇斗争，在战争中遵循所谓的民族利益，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和对于法国人民的责任。

2. 法国解放之后，法共开始向反动派让步。当戴高乐解散爱国主义的警察，借口改组国内抵抗力量而驱散这些力量，最后直到他清洗游击队军官时，法共没有给予坚决的反抗。

法国的同志们希望借助选举积蓄力量，从而能夺回失去的阵地。这样，曾参加过武装斗争和公开同敌人发生过冲突的群众回到了等待和消极的道路上。

法国的同志们用什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呢？他们利用了两个论

^① 乔治·皮杜尔，法国外交部长。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共产党不需要更深刻的哲学来理解战争时期的形势，尤其是在被占领的国家，当情况或多或少比较有利的时候。最终应该思考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在这30年期间所教导我们的，苏联的斗争就是当时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斗争，无论这个共产党员身居何处。”

据。第一，他们断言，当时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会被理解为削弱反德民族阵线。第二，他们说，他们不得不注意不要让他们们的行动引起俄国人和英、美分子的争吵。^①

吉拉斯同志指出，法共这种行为的真正原因是幻想，幻想可通过其他什么途径，即完全通过议会道路得到戴高乐不顾任何议会和民主形式使人民失去的东西。

法国共产党人推说必须关注防止俄国人和英、美分子之间的争吵问题是完全可笑的，因为法国共产党对苏联最可靠的支持是清除英、美对法国人民的影响。

1941~1942年，苏联同英、美缔结了联盟。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欢迎这一联盟，但他们同时打击英国的走狗——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的部长和占领者的帮凶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在反德战争期间，希腊人对抗了英国人。经验表明，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斗争加强了作为世界革命力量的堡垒的苏联的阵地。法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高潮时向敌人让步，在法国人民面前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反面宣传员。

法国的同志们在围绕新宪法的斗争中遭受了新的失败。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共同提出交全民公决的宪法没有反映法国的社会关系。法国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提出的宪法草案有的条款越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纲领，而不是现实的宪法。所以，法国社会党人害怕被群众孤立，在议会里投票赞成这一宪法草案，而在全民公决时竭尽全力使其失败。共产党人借助议会手段力图获得一部好的宪法，但是，他们最终自己惩罚了自己，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实际上，这是战争时期的方针的延续，只不过是还要更糟一些。戴高乐借口整顿军队中的秩序而解除了真正的反德国法西斯战士的武装，而法国的共产党人放弃了保护自己的权利。显然，共同的反对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斗争，并不是他们拒绝这种保护的真正原因。”

成为议会手段的牺牲品。法国同志们想借助这一宪法在法国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这纯属幻想。每一个稍微有头脑的人都清楚，宪法通过全民公决时一定会失败，因为它不符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我们的法国同志想愚弄反动派，并依靠宪法转入进攻，而实际上被愚弄的正是他们自己，正是他们自己被他们盲目相信完美无瑕的选举机器愚弄了。在这一失败之后，皮杜尔、布吕姆及其同伙转入了进攻，并通过了宪法（共产党也同意，投了赞成票，尽管反对其中的许多原则，但同意了它），并认为消灭临时政权的时刻到来了。皮杜尔—布吕姆反动派以前为了不让共产党贯彻其不满意的宪法，曾反对消灭临时政权；而现在，当通过了自己的宪法之后，则赞成消灭临时政权了。不过共产党在选举中得票最多，成了议会中最强大的党。但事情并没按它希望的那样发展。帝国主义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法国殖民地居民不愿等到法共在议会中占到绝对多数后再使自己的权利合法化。

国内的经济困难逐步增长。法国的反动派开始拿国家主权做交易，一心想得到美国的贷款。共产党退出政府便是这方面的第一个牺牲，不过共产党却欣然同意了。

美国人、布吕姆、皮杜尔和贝文完全意识到，法共不会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只能是局限在议会斗争的范围里。法共以前的整个行动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法国共产党人的言行证明他们不容许“放纵”自己，不能脱离合法斗争的轨道，难道不是这样吗？

可是他们把党的整个工作甚至全党都置于这一基础之上。现在在法国共产党里没有任何秩序，没有任何纪律。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入党，只要想加入；谁都可以脱党，只要想离去。1946年它有成员100万人，而到1947年只剩下80万人。既然一次也没清洗，20万党员哪里去了？现在党的主要口号是扩大队伍！法共的统一只是个外表。这不是建立在斗争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统一思想和

统一意志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建立在迁就基础上，建立在思想和政治自由主义基础上，建立在任何人都不必服从上级决定基础之上的统一。这样的党没有让也不可能让反动派害怕。反动派勇敢地向党进攻，因为它清楚，并非所有共产党员都支持领导人，甚至在领导人试图采取什么措施的情况下。反动派非常清楚，大部分共产党员生活在幻想之中，幻想一切都好，都会平安地结束。“法国民主”不会逆转。

法国同志们应该知道，力图实现统治世界的美国人对共产党不断壮大不会袖手旁观。他们应该知道，美国人及其走狗将竭尽全力把作为民族主要抵抗力量的共产党拉下马。我不想干涉法国党的内部事务，但我们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不对的。法国同志们应该知道，法国没有和平发展，因为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议会只是斗争形式之一。法国同志们应该知道，资产阶级正聚集力量，准备转入进攻。法国同志们应该培养党，从组织上动员党和巩固党。法国同志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敌人尽管很弱，但它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转入了攻击。

3. 法国同志们所实行的同社会党团结的政策是不正确的，没有带来任何真正好处。解放之后布吕姆立即着手建立和解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立的各工作委员会里一直进行空洞的辩论，只要布吕姆还需要这么做。现在委员会和各工作委员会都不复存在了。法国同志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既失去了上层谈判的时间，又忽视了基层的工作。这使工人产生幻想，似乎布吕姆还不算怎么坏，毕竟同他可以达成协议。杜克洛同志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兴奋地说社会党在选举中丢了票，如果社会党人想挽救其党，那他们应该同共产党人一同走。杜克洛同志是否认为，布吕姆在法国资本形势严重的情况下特别关注的是社会党的命运，而不是挽救法国资产阶级？不，绝不是这样！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能同布吕姆统一！在西班牙

牙战争之后，共产党和法国的悲惨历史已多次证明这一点。统一的政策应该是有原则的，它应该从基层贯彻起，不管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愿意与否。

4. 对戴高乐的政策也是不明确的。请允许我指出，今年7月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多列士在批评戴高乐时毕竟还是指出了他的军事功绩。为什么？首先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法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戴高乐没有任何功劳。他是作为丘吉尔的走狗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在战争期间，他同英国国家情报处的间谍建立了阻止法国抵抗运动和游击队活动的小组。戴高乐、德拉扎·米哈依洛维奇和安德斯^①之间有什么区别？一点儿区别也没有！假如法国同志们不理解以前的形势，那么现在他们为什么还不向人民讲清楚戴高乐在战争期间的真实作用呢？为什么还把他作为人民英雄？所有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地害怕受群众孤立的结果。受哪些群众孤立呢？无论如何，不会受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孤立，因为工人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戴高乐分子。我觉得，法国同志们低估了戴高乐的危险性，尤其是如果看到，对于美帝国主义分子来说，拉马第和布吕姆还显得太“左”。

5. 法国同志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也应受到谴责。请允许我作以下的引证。在1946年6月23日给党的干部的报告中说：

“对于殖民地，党追求民主行动，以此作为解决叙利亚和黎巴嫩危机的手段。保留法国殖民主义国家地位以对抗英国，符合进步的利益。”

在1945年，昂里·洛捷尔在《共产主义手册》月刊中写道：解决殖民地问题的条件是在殖民地扩大法国的民主。

^① 瓦迪斯瓦夫·安德斯，波兰将军，1941~1942年担任在苏联境内组建的波兰军的司令员。1942年该部队被调到伊朗，以后参加了西方盟国的军事行动。

法戎同志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说，“殖民地分离出去会给世界反动派里最强大和最坏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海外扩张提供完全自由的天地。同时也会为这些分子占领法国本土提供便利，因为法国联盟解体后法国会衰落。这样，殖民地分离出去会导致世界反动派的强大和损害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支持那些力求在法国联盟里实现海外人民正义要求和争取自由的民族运动”。

应该考虑到，法戎同志说这些话是在法国共产党被逐出政府之后，是在布吕姆和皮杜尔在印度支那和马达加斯加发动战争之后，是在法国成为美国仆从国之后。共产党的这种政策束缚了殖民地人民的手脚，因为这种政策不谈法国殖民地应如何摆脱法国帝国主义分子，而只谈法国本身要避免外来的压迫。法国华尔街的士兵正在扼杀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而在这种时刻，法国的同志们却宣扬要恢复大法兰西帝国！

6. 法国党没有提出明确的前进方向。今年6月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也没有明确这一方向，大会没有分析自己的缺点和提出自己的任务，而只是具有宣言的性质。法国同志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党怎样和用什么回敬敌人的攻击。党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不明确。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多列士同志是这样表述党的对外政策纲领的：

“同所有人民，首先是同我们伟大的盟友——美、英、苏协商解决德国问题，它能保障安全和战争赔款；法苏联盟，它是防止德国侵略可能死灰复燃的可靠保障；英美联盟，希望我们的伦敦朋友正确地理解我国的利益，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恢复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联盟；恢复同我们所有朋友和盟友的贸易往来；中断同佛朗哥政府的联系和承认西班牙共和国；热烈拥护争取自己自由和独立的希腊和西班牙人民；消灭所有地方的法西斯残余；支持各国的民主力量；逐步裁军和禁止核武器——这就是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路

线，同时它也是同法国以及和平与民主的利益相一致的。”

在战争期间也可以这样讲。但是现在美帝国主义使法国处在仆从国的境地，现在美帝国主义站在反苏及其周围民主力量运动的前列。把美国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等量齐观只能迷惑法国人，使他们看不到美帝国主义对他们国家的威胁，看不到自己真正的和惟一的朋友——苏联和东欧各民主主义国家。

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吉拉斯同志强调指出，法国共产党应该切实着手修订自己现在的不符合国际关系的政治路线。法国的同志们应切实分析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从自己工作和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动员全党来解决新的任务。纠正错误还为时不晚，需要的只是决心。

吉拉斯同志指出，我坚信，法国共产党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法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劳动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证明，尤其在战争期间，他们克服了一切弱点，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善于斗争和敢于牺牲。

几万名法国共产党员在斗争中牺牲了，这是法国共产党英雄主义的生动证明。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几十万共产党员是党有足够力量完成目前任务的证明。

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让杜克洛同志发言。

日丹诺夫：我请杜克洛同志在发言时回答所有代表团都关心的问题。现在我插话提出这个问题。

既然法国形势如此悲观，而法国共产党在法国统治阶级圈子里不起任何作用，那为什么法国共产党人还继续称自己是政府党呢？

难道这不是事实，法国共产党被逐出了政府圈子，结果它失去了为社会党的反法政策承担责任的能力？

在这之后，法国共产党怎么能称自己是政府党呢？

难道法国共产党要为社会党和皮杜尔之流所干的丑事承担责任？

杜克洛：请求允许他在下场会议上发言。因为由于吉拉斯的发言，辩论的问题扩大了，他请求给他时间做准备。

№11633

波克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5日)

绝密

波克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共产党人在许多国家扩大了影响，其原因是，人民群众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说真话的人，甚至是在痛苦的事实面前。法国共产党便是例子。在慕尼黑时期，共产党人是惟一揭露慕尼黑的人。当各国社会民主党疯狂攻击苏联的时候，甚至充满恐怖的国家共产党也勇敢地向自己的人民解释，苏联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各共产党影响增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反对占领者和卖国贼，它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最后，各共产党之所以巩固，是由于它们是联共（布）——领导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和拯救了人类免遭希特勒奴役的国家的党——的兄弟党。

所有这些因素不仅对像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样的党，而且对像法共和意共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党也是有利的。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团结到了共产党周围，因为他们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斗争能使人民避免新战争的灾难。人民学会了憎恨侵略者。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现在已经暴露无遗。

法共有能力重新唤起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它有能力的表示，拉马第——这是个亲美的卖国贼。难道为了表示这一点还需要等待什

么新的选择吗？

杜克洛同志想让我们高兴，说摩勒在其发言中重复了法共的某些主张。^① 应该向普通人民的社会党党员表示，摩勒同布吕姆一样，这样行动是在反对人民的利益。只有大多数人民群众，其中包括许多社会民主党党员真正看清摩勒的真面目之后，那时摩勒才有可能被迫改口。

杜克洛通报说，戴高乐正训练武装人员，准备挑衅共产党。我觉得，美帝国主义分子和戴高乐对事态进程的分析比我们某些同志深刻得多。美帝国主义分子看到，在东方，正朝着社会主义发展，法国也可能走上这条道路。这意味着，事情比争几个部长位子严重得多，美帝国主义分子和戴高乐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甚至看到，在意大利，事情不仅局限于把共产党驱逐出政府，那里正企图扼杀共产党。在这种条件下不能借口怕孤立于群众之外而畏缩不前。法国同志们称自己是政府党。共产党不能在所有条件下都当政府党！

我们认为法国和意大利的事情是一个严重的信号。反动派昨天在法国和意大利干的事，今天他们还想在匈牙利，明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后天在罗马尼亚干。这一警报迫使我们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反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谈到马歇尔计划，杜克洛同志向我们说，他有些谨慎，最终他还是支持了这个计划。但是，要知道这简直就是最危险的蛊惑煽动。摩勒片面地重复共产党人某些论点的那一部分内容，以及他在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很重要。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掩饰。不应该欢喜，而是应该表明，马歇尔计划和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这是两种相互排斥的东西。如果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话，那么人民的收入将会下降，而摩勒却说收入会增加。应该向人民表明，向普通的社会民主人士表明，摩勒同布吕姆一样，都是以这样方式来反对人民的利益。这样人民的大多数，包括许多社会民主人士才能真正认清摩勒的面目，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摩勒不得不采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话。摩勒以非常令人愉快的方式描述了马歇尔计划，如果我们因此而对他大加赞扬的话，那么我们在人民面前就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动派的阴谋。在法国和意大利，全体人民还未由于共产党被赶出政府而站起来。而且，出于某种自尊心，我们的同志说是他们自己退出的。

法共在宣传中的出发点是：美国的贷款对法国来说是必需的。这一点我们从隆哥同志那里也听到，尽管他坚定地说必须保卫民族主权。共产党承认美元是必需的，这正确吗？须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将说，共产党员的勇敢有什么用，连他们都承认，美国的援助我们是必需的。既然美国的贷款缺了不行，那只好在主权上让步……

无论是法共还是意共，都未提出可以不要美国的贷款，可以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国家的问题。这些党为什么忘记了苏联在敌人封锁和背后无任何人支持的情况下恢复自己经济的英雄榜样。须知今天在各人民背后还有苏联！为什么不学习希腊的榜样？希腊得到了美国的“援助”，而希腊共产党反对这种“援助”，动员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

还有不要美国援助的其他国家。它们不要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而是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恢复自己的经济。

这就是法国的同志们应该向自己的人民所说的。他们应该表示，尽管此路漫漫而悠远，但它是法国人民的可行之路。

杜克洛同志讲了法共的一个口号——不仅同英国和美国友好，而且同所有“盟友”友好。不能把苏联和其他“盟友”等量齐观。必须指出，在过去，除苏联之外的这些“盟友”不是法国真诚的盟友。必须向人民提起关于敦克尔刻和鲁尔之役。法国需要真正的朋友，而且它有这样的朋友。战争期间当英帝国主义分子建议把法国并入英帝国版图的时候，斯大林同志表示赞成有一个强大的和自由的法国。苏联的英勇斗争在法国解放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法国人民知道这一点。让法国人民意识到吧，他们不是孤立的，苏联是他们强大的盟友，他们可以博得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国家的真诚友

谊。这些国家拥有一亿人口，几乎是法国的3倍。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些盟友。

我们大家都期望，杜克洛同志在报告里会对法共的错误做认真的分析，并指出克服现有弱点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杜克洛的报告里没有这些内容。不过，这种状况在法共里也不是一天了。

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共产党不接受这样宝贵的援助——学习联共（布）的丰富经验、智慧和知识。即使有什么人让我们放弃这一援助，我们也要力争利用这一援助。真不明白，为什么法国共产党不争取采纳联共（布）的建议。至于我们，在地下斗争之后在着手改造我们的国家时，我们缺乏经验，联共（布）的建议对于我们以及其他共产党，都有宝贵的意义。怎么能有一个共产党既不利用联共（布）的经验和援助，又不和其他共产党交流经验呢？

在结束发言时，我们代表团想对一个问题表示一下意见。斯兰斯基指责斯洛伐克人，说他们没有使自己的民族要求服从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共同利益。

斯洛伐克人民长期受压迫，而受压迫的人民通常是在解放之后好长时间仍很敏感和疑心重重。现在有一个问题，当斯洛伐克人民看到与他们肩并肩生活了好多个世纪的匈牙利人被剥夺了权利，把他们看做一个派别，甚至不接收他们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怎能相信民族压迫的政策已彻底结束了？

据说，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给捷克人带来了诸多痛苦。但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给南斯拉夫人带来的痛苦也不少。我们还记得诺维萨德。然而在南斯拉夫，匈牙利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所以我们认为，捷克的同志们应该改变自己对于匈牙利问题的态度。

我们衷心感谢日丹诺夫同志做了非常好的报告。我们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和各共产党的情况报告里吸取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对

我们的活动大有好处。首先我们从会议中学到这一经验，在与我们政府合作者的关系中，不能表现丝毫的犹疑。我们应该满怀信心坚定地走我们的路，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困难时刻与我们的同路人一起争取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邻友取得了比我们更大的成就，他们的榜样将激励我们前进。

马林科夫：由于其他同志准备明天发言，会议现在闭幕。下场会议明天 11 时开始。

会议于 19 时 45 分闭幕。

No 11655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会议讨论情况和 情报局驻地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5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1. 今天，9月25日，在我们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之后，会议开始对报告进行讨论。今天发言的有吉拉斯和安娜·波克，他们都声明完全赞同报告的内容。吉拉斯和安娜·波克发言的主要内容是批评法国共产党的错误的，波克在报告中还对意大利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吉拉斯十分完整地概述了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他所提出的批评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其批评理由也非常充分。明天，杜克洛将就今天展开的批评进行发言，届时他将回答我们提出的您已经知道的那个问题。

明天将继续讨论。除杜克洛之外，即将发言的还有隆哥（意大利）以及其他代表团的成员。

2. 就组织建立情报局的问题与南斯拉夫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进行了交谈。两个代表团都认为必须建立这样的同时具有协调职能的机构。作为情报局的驻地捷克人同意设在布拉格，而南斯拉夫人则同意设在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人还声明说，他们的关于将情报局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的意见可以被看做是最终的意见，他们不需要同铁托进行商量了。捷克人说，他们需要返回布拉格与哥特瓦尔德商量此事，并于明天傍晚返回告知最后的结果。当

斯兰斯基从布拉格返回后，我们将考虑全面的情况，立即报告我们关于情报局驻地问题的最终建议。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5日

№ 11656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
接到斯大林指示的通报

(1947年9月25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我们已经收到有斯大林就杜克洛报告所做的指示的电报。执行情况后告。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5日

№11634

杜克洛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6日11时开始。

在辩论会上发言的有杜克洛、斯兰斯基、卡德尔和法尔卡什。

杜克洛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我以法国代表团的名义赞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

在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对现在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报告对美国的作用，对它追求统治世界的企图，对它旨在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扩张侵略政策给予了特别的分析。

我们同意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对反抗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的评价。我们认为，这些力量可以同美帝国主义作胜利的斗争。可以在保卫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这一斗争。

必须揭露我们敌人的谎言，似乎苏联想发动新的战争。我们在法国正揭露这一挑衅性谎言并将继续揭露它。

至于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和马歇尔计划，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充分揭露它。指责我们向反动派的压迫让步，似乎我们这样做是由于缺乏政治勇气。

我们同意，我们对一些问题有错误的见解，没有充分揭露美帝

国主义，因为我们把共产党员离开政府仅仅看成是内政。看来，必须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忽略了事情的这一方面？毋庸置疑，当法国共产党进入政府的时候，反动派力图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反动派利用了形势，依靠美国人的援助。这一点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没有及时看破敌人的意图。我们没有做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我们揭露了反动派，但我们做得不充分：我们应该揭露拉马第政府的反动计划。

很清楚，为什么法共成了批评的中心，因为我们可能给国际工人运动造成的重大损失，这使我们承担了重大的责任。

我们应该从批评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但对某些问题我们想谈一些意见。指责我们选择了一条最容易的道路是不正确的。我们有缺点和错误，但不能指责我们害怕困难。我说这话是完全负责的。

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法国共产党指责布吕姆向右滑。我们同意，布吕姆任何时候也不曾是左派，他一直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但是，我应该说，法国共产党任何时候也没饶恕过布吕姆。我们一直攻击他。在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上，多列士同志揭露了布吕姆背叛行径，揭露了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我们批评布吕姆对价格和工资问题的态度，批评他的整个政府政策。

多列士同志指出：“布吕姆美化美国垄断资本扩张政策的企图只能使法国工人和人民在反抗威胁我们民族独立的国际金融资本的攫取中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解除武装。”

我们使用“政府向右滑”这一提法不是在给社会党人定性，而是在给拉马第政府的活动定性。我们利用这一提法向人民证明，政府的政策越来越反动。我们认为，说共产党离开政府意味着拉马第反动性质的加强，这是对的。但毫无疑问，应该指出和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对政府的影响。

在1947年9月13日的会议上，我党中央委员会是这样评述共产党被逐出政府这一行动的：

“政府的行动遭到了破产：在国内政策方面——减少口粮，供应混乱，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法郎贬值；在对外政策方面——放弃战争赔款，改变了同我们所有盟友的友好关系，使法国隶属于美国资本的力量，美国力图在我国恢复之前先恢复德国，使我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种忘记民族利益和不断失去我们民族主权的政策同它的制订者们所标榜的带来好处云云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政策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不稳定。

拉马第政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完全没有能力保证国家恢复。由于它的过错，人民在国家经济恢复、社会保障、加强民主和挽救民族独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威胁。它使建立法国联盟的问题受到威胁。

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和贯彻这一政策，5月份才把共产党员部长们逐出了政府。”

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对美帝国主义的攻击最近加强了。我们通过宣传加强了人民群众的反美情绪。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存在缺点。但说我们什么也没做是不正确的。

我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面临的市政竞选运动中，国际形势问题是主要问题。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我国的独立问题。我们进攻布吕姆、拉马第和社会党。我们认为，必须把社会党的基层党员和它的领袖们区别开来。我们认为，争取行动统一和坚决批评社会党这中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这里指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吉拉斯和波克同志批评我们同社会党统一的政策。吉拉斯同志说，我们白白浪费时间同社会党最高领导人谈判，而这些谈判没能取得任何结果。应该指出，吉拉斯同志不了解情况。从1945年起，我们同社会党最高层领导人没进行过任何谈判。1946年，社会党

退出了在此之前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的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1944年。在布吕姆从德国回国之后，社会党竭尽全力使委员会的作用归结为空谈，最终取消了它。

我在斯特拉斯堡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吉拉斯同志在发言中曾提到我这次发言），我面向的不是布吕姆，而是工人当中的一般的社会党党员。

波克同志曲解了我的意思。我在读摩勒决议时从未高兴过。我想指出，群众对社会党领导人政策的不满迫使摩勒之流发表左倾言论并进行鼓动性宣传，尔后又以实际行动否定这些言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毕竟不能把这一思想强加于我们，说我们非常相信摩勒之流。我们认为，应该吸收社会党人参加我们的行动，我们说社会党人中有我们可以吸收的人。我们考虑到了社会党所发生的变化。社会党里的工人越来越少。在1947年9月13日中央的决定中是这样确定我们同社会党的相互关系的：

“但是，不顾工人中社会党多数党员的意见，其领导委员会、议会党团和社会党的部长们依然奉行言行不一的方针，阻止进行必要的变动”。

从这里可以看出，摩勒的责任是和拉马第一一样的，后者没有摩勒与其狼狈为奸是不能执行他的反动政策的。

但我们应尽最大努力把广大社会党群众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我现在回答日丹诺夫同志的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是政府党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为我们否定的政府政策承担责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人民表明我党可以管理国家并证明了这一点。

日丹诺夫同志：假如您直接说你们是这一政府的反对派，您是否被理解得更深一点呢？我尽了最大的可能认真地读完了多列士和杜克洛同志从1947年5月4日以来所有讲话，但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一句说明贵党处在反对党的位置上。

杜克洛同志：我们必须改变现今政府的口号意味着，我们是现政府的反对派。确实，我们在一开始动摇过，不清楚这个问题。但后来我们不再动摇了。

日丹诺夫同志：当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由动摇政策转向坚定政策时，不妨告诉人民，至今发生的事是怎么结束的，应说明出现动摇的情况，但现在已经克服。必须把这一切告诉人民。

杜克洛同志：我们说，没有共产党参加不可能有民主的政府。我中央委员会在9月15日的决议中指出，党在这些问题上出现过动摇和错误。中央委托政治局起草一个专门决议，在我们离开法国时决议还未拟定好。

我们应该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并赋予运动以政治色彩。当指责我们只赋予运动以经济性质的时候，应特别强调指出这一点。中央指示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斗争什么也达不到。现在我们正在展开非议会性质的斗争。我们不只是进行议会斗争。

但是，应该弄清楚和更好地研究人民群众运动形式问题。我们一定做到这一点，我们坚信，我们能够保卫法国独立，使其不依附于美帝国主义。

我想分析一下给了我们严厉批评的吉拉斯同志的发言。我们知道，吉拉斯同志是爱护我们的，并且是本着“爱护得越深，批评得越狠”这一谚语行事的。吉拉斯同志谈了我们战争期间的错误。假如不是现在而在当时听到这些批评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由于美帝国主义的进攻曾出现过错误。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使我们想到，我们不仅要揭露这些错误，而且要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

日丹诺夫：杜克洛同志还准备替意大利同志们回答（笑声）。

杜克洛：我想，我们自己的错误够多了，还是让意大利同志们自己回答吧。

群众运动不能局限于市政竞选。但我们认为应该利用这些选举发动群众。必须更深刻地揭露美国在改变我国政治形势中的作用，组织广泛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这一运动不应只局限于工人阶级范围之内。它应包括最广泛的人民群众。

日丹诺夫：这是正确的。

杜克洛：我们代表团可以保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挫败反动派孤立共产党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所提出的原则，共产党完全有能力组织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我们认为，在与社会党的关系方面，应把社会党的领导人和他们影响之下的群众区分开来。在这方面，法国共产党有充足的经验。我们应该支持所有那些不同意出卖我国主权的人。

我应该分析一下所谓独立于莫斯科的问题。在支持苏联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在斯特拉斯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多列士同志说：

“有人利用我们无产者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倾慕，利用我们有觉悟的法国人对法苏友谊和联盟的忠心作借口诬蔑我们。但哪一个法国人，不论男人还是女人，能够忘记，法国应该感谢苏联、苏联士兵和斯大林元帅？法国和苏联的利益在哪一点上都不是矛盾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哪一个工人能够忘记，一切国家劳动阶级的利益都是一致的？哪一个法国工人可以否认苏维埃革命的伟大意义？斯大林、列宁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俄国共产主义者经常讲，从巴黎公社经验的角度，他们明白了许多东西。巴黎公社社员的后代学习最丰富的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有什么可非议的？”

经常借口似乎我们依附莫斯科而向我们发难。但是我们应该公开声明，如果我们的人民想成为自由的人民，那么他们就应该支持苏联的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如果我们反对战争贩子，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同这些战争贩子的主要对手——领导争取和平斗争的苏

联团结一致。

我们完全同意日丹诺夫同志所说：苏联的对外政策符合所有民主的热爱自由的人民的利益。我们不会忘记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一点告诉群众，不仅是从形式上，而且要从实质上。

我想分析一下波克同志提及的问题。她指责我们，说我们不想同各兄弟的共产党保持接触。这一指责没有具体的根据。我应该说，我们不仅完成了我们保卫法国利益的职责，而且完成了国际主义者的职责。我们认为，各兄弟党之间已经建立了接触。

我们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不能产生这种印象，似乎说我们党是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说它是共产党。我想劝同志们相信，法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共产主义政党。不能说，党内没有任何纪律和规章，谁都可以随意加入和退出。假如是这样，那党就不能进行斗争了。可以说我们党在纪律和规章方面有缺点，但全盘否定是不正确的。我们保证，我们将克服这些缺点。我们一定从对我党的活动的批评中得出必要的结论。我们将纠正一切应纠正的东西。我们一定从日丹诺夫的国际形势报告中得出必要的结论。

马林科夫：作为会议主席，我应该反映代表们的意见。我们希望，杜克洛同志在自己发言结束的时候，简单明确地说说，您得出了哪些结论，按照杜克洛同志的意见，法国共产党的领导犯了哪些错误？

杜克洛：我们意识到，最近我们反对政府的斗争进行得很不得力。党的这种行为的原因，看来应从没有充分深刻理解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法国事件的发展上去找。

很清楚，这些弱点的根源不仅在于党在近几个月的实践活动。按照我的意见，我们没有理解我们参加政府的性质和这个问题发展的条件。正如我讲的，反动派想改变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自己，想使我们参加政府变为不可能。党没有明确这样的前进方向：使工

人阶级的力量占据优势。这样，党存在着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过分看重合法性和议会主义。这是我们错误的根源所在。

我们认为，为改变形势，必须向党和人民讲真话。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党和人民。

我认为，党应该分析自己的活动并做出相应的结论。我们，法戎同志和我，决定一回到法国，立即把所有这些问题提交政治局和中央，然后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如果我们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那我们就能调动起适合开展胜利斗争的情绪。我认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就在于动员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应使这一思想深入工人阶级的心中。我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你们可以相信它，它将完成自己的使命。

杜克洛同志发言之后，马林科夫同志请斯兰斯基发言。

No 11635

斯兰斯基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斯兰斯基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不仅明确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而且指出了为共同努力打破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侵略计划而摆在各共产党面前的、需要在各民族范围里奋斗解决的关键任务。

我们同意日丹诺夫同志在这里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政策的严厉批评。从法国共产党被逐出拉马第政府之时起，我们就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法国同志的政策有严重错误。即使在我们这里，我们也感觉到了法国事件的后果，因为它鼓励了我国的反动派。

但我们想首先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政策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吸取教训。

不考虑国际力量，我们就不能理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日益紧张的原因。在我国，反动派的经济政治基础已被摧毁，反动派遭到了一系列打击，它在群众中的基础已大大削弱。对我国反动派的进攻性只能这样理解，它越来越成为美帝国主义的直接工具，它按照外来指示行动，同英、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协调行动。

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幻想恢复他们在许多国家失去的阵地，尤其是他们在巴尔干—多瑙河地区失去的阵地。

他们关注的中心之一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是因为：

第一，捷克斯洛伐克对他们来说是一块肥肉，失去它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甘心的。在旧捷克斯洛伐克，整个资本的 20% 以上是外国的投资，主要是英国以及法国和美国的投资。外国资本在像斯科达、维特科维采这样的大工厂，在所有的炼油厂，1/3 的化学工业企业里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总额达 150 亿~200 亿克郎的外国资本全部被收归国有。

第二，英、美帝国主义者明白在法西斯德国陷落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起着什么作用，它起着中欧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投资商品和工业制品供应者的作用。

奴役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停止有竞争力的工厂，提高自己和西德生产在欧洲这一地区的作用，损害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潜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自己的仆从国——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产生诱惑力。

第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仍未死心，仍打算借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动力量拼凑反动阵线和反共集团，目的是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毫无疑问，国内所有政治阴谋，所有把反动力量联合起来的企图的幕后操纵者都是美、英间谍，他们插手班杰拉分子的土匪行动和斯洛伐克地下法西斯组织的活动。

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之后，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面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我们的任务和我们的责任是：加强和进一步展开我们已开始的对反动派的反攻，把反动派从他们的阵地赶走，揭露他们旨在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各种势力的代理人，最后，粉

碎反动派，同时紧紧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

我们应该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我们党内还有自由主义情绪，宽恕反动派及其进攻。我们应该提高群众首先是党员的警惕性，在我们的报刊上和各种宣传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动员以反对反动派，警惕间谍和反动派破坏者可能的阴谋措施和挑衅，同时加强我们在安全机关和军队中的阵地。

我们自己应该弄清而且向群众解释，英、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计划意味着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结束。英、美的扩张政策，同希特勒一样，是同我国国内的反动派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从根本上敌视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存在的。^①

含有援助西部占领区德国垄断组织和资本家内容的马歇尔计划，意味着第一步先恢复德国帝国主义，重新使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威胁。在西德，在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庇护下，苏台德的日耳曼人正在组织起来。他们经过美国占领军指挥部的同意，宣传要返回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他们的组织者不仅是亚克什之流的舒马赫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有所谓的苏台德州原格林卡的代表。

斯洛伐克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中欧各国人民民主最薄弱的地方，这不是偶然的。这有它的国际背景，是同美国人的扩张计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这一点在战争前就已经明确了。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帮助希特勒肢解并消灭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无情地奴役着它的居民。在1942年8月前的战争期间，英国承认慕尼黑协定，长时间地拒绝贝奈斯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支持关于在中欧和东欧建立以波兰反动的流亡政府为领导的大联邦国家的计划。美国走得还要远一些。美国支持多瑙河—巴尔干区域全体人民都憎恨的哈布斯堡王朝分子，并梦想得到梵蒂冈的赞同，以恢复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些计划遭到失败首先是因为红军的解放部队到达了欧洲这一地区，并在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恢复了这些国家的国家主权。

但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中欧和东南欧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敌视态度仍然存在。仍然实行着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扩张计划。”

划联系在一起。美国人打算利用格林卡法西斯分子、单独媾和的反捷克分子的力量，作为自己反捷克斯洛伐克的后备力量。他们派自己的用美元和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班杰拉匪徒去援助他们。^①

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从进一步巩固和不断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的观点看，而且从挫败美帝国主义计划的观点看，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斯洛伐克的反动派。第一步我们已经完成，但还必须继续行动。

在同反动派的斗争中，我们已掌握了主动权，我们不会失去这一主动权。而且，粉碎斯洛伐克反动派已对我国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对比产生影响，这有助于我们解决许多捷克和摩拉维亚问题。

我们不准备侵害斯洛伐克人的民族权利。我们党和哥特瓦尔德同志是在共同国家里解决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相互关系问题这一新方案的倡议者，这已写入科希策纲领中。我们为斯洛伐克人被认为是独立的平等的民族，为斯洛伐克人在自己土地上实施管理权而奋斗。但目前形势复杂，斯洛伐克人民没有捷克进步力量的有力帮助，单靠自身力量不能战胜厚颜无耻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动派。捷克的进步力量帮助斯洛伐克人民从叛卖分子手里挣脱出来，叛卖分子为了华尔街的利益把斯洛伐克人民推上了冒险的道路，捷克进步力量帮助斯洛伐克人民巩固自己的自由和平等地位，以便使其摆脱长久以来的落后。

由于斯洛伐克问题，应该谈一谈匈牙利同志们的发言。斯洛伐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卖国求荣的斯洛伐克政府原部长、已被判处了死刑的法西斯匪徒丘尔昌斯基在美国人那里找到了避难所，而另一个部长、法西斯分子西多尔在梵蒂冈那里找到了避难所。目前他们俩人都在为美国人效力，是整个阴谋活动的中心，并与所谓的民主党领导人以及地下法西斯组织和匪帮保持着联系。在美国人监管的地区内，他们有无线电台并使用斯洛伐克语进行广播。整个行动的目的是煽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仇恨，破坏他们在共同国家里的生活，使斯洛伐克成为各种‘冒险主义’的基地。”

克的匈牙利人问题同特兰西瓦尼亚或南斯拉夫的匈牙利人问题大不一样。和平条约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是由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民族国家，这不是偶然的。在巴黎会议上，维辛斯基同志以苏联的名义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匈牙利人迁移，并提起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类似迁移已做出很好的榜样，这也不是偶然的。

巴黎会议决定，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半年时间里达成匈牙利人迁往匈牙利的协议。此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间还签订了关于相互交换同等数量的匈牙利人（从斯洛伐克）和斯洛伐克人（从匈牙利）的协议。

但遗憾的是，匈牙利实际上没执行这一协议。应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解放之后宣布要求所有匈牙利人迁移，并剥夺了他们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这有其深刻的根源。与匈牙利人相比，斯洛伐克人是相对的小民族。他们在匈牙利人统治之下长达近千年。马扎尔^①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形式。斯洛伐克民族被迫走到灭绝的边缘，逐步变成山地民族和游牧民族。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存在帮了1938年霍尔蒂的忙，使其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帮助下夺取了大片斯洛伐克土地，而且这几个省的大部分匈牙利人都支持占领者。在斯洛伐克，对匈牙利人和占领者的仇恨，至今还很大。经过痛苦的经验之后，斯洛伐克人民从本国匈牙利人身上看到了经常的修正主义的危险和对自己民族存在的威胁。

如果我们想正确而公正地解决民族问题，那不仅应该考虑本民族，而且应该考虑弱小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感情。

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如能采取双边和相互理解的立场，我想，捷克斯洛伐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匈牙利和匈牙利共产党在未来一定能找到共同语言。

^① 匈牙利人自称为马扎尔人。

民族社会党和天主教党反动集团在贝奈斯总统的支持下，企图改变我国的对外政策方向。^①

这从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报刊围绕马歇尔计划所开展的运动中看得很清楚。民族社会党领导人企图这样描述马歇尔计划，似乎它对捷克斯洛伐克是有利的，仅仅由于它不符合苏联和其他我们盟友的心意，捷克斯洛伐克才不能接受它。还有一位部长（德尔蒂纳）^②声明说，如拒绝马歇尔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将蒙受重大牺牲。所有反动分子都断言，捷克斯洛伐克没有西方经济援助，没有美国贷款便不能走出战后的经济困难。同时他们还援引一个事实，说捷克斯洛伐克需要各种原料，因此我们的经济对西方有一定的依赖性。

但我们通过同斯拉夫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合同，我们在使我国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根据这些合同，最近几年我们同斯拉夫国家的贸易额将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35%，如果加上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贸易额，这一数字将达到 50%。

我们的两年计划使我国朝着经济独立于帝国主义范围的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我们现在正着手制定计划。我党中央决定，五年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独立，摆脱对英、美集团的依靠，发展我国同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联系所需要的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这一点同时还表现在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以使捷克斯洛伐克在法国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同法国签订同盟条约。尽管已经有了慕尼黑的痛苦的经验，法国政府仍然向我们提出了它可以不必承担任何责任的条约文本。被提交的条约文本不同于我们与苏联、波兰和南斯拉夫签署的其他条约。这样的条约只能破坏我们的安全体系。

尽管如此，反动派仍然接受了这个条约，贝奈斯已经宣布自己即将前往巴黎参加 7 月 14 日的签约仪式。我们的党，首先是哥特瓦尔德同志阻止政府实现这些计划，并驳回了提交来的条约文本。

但是，不应该不重视这些新的冒险主义，以及这些挑唆性的企图。”

② 普罗科普·德尔蒂纳，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

那些工业部门。

自然，这种经济政策会引起帝国主义阵营的疯狂不满。毫无疑问，可能面临经济压迫，而且伴随着我国反动派的狂吠。所以，我们应该揭露反动分子的假面目，揭露英、美通过电影、报刊、文学在我国进行宣传所起的反叛作用。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青年免受这些宣传的腐蚀。我们应该奋起反对文化领域的“缺陷”。我国有一些人，他们对斯拉夫文化持高傲态度，企图使我们的文化生活脱离斯拉夫文化，这样，使我们接受盎格鲁—撒克逊理论家们的种族主义的反斯拉夫的追求世界统治的“思想”。我们应该揭露这些假理论的实质。

哥特瓦尔德同志在今年8月24日在布尔诺讲话时说：

“只有苏联的政策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这一政策坚决反对对捷克斯洛伐克存在本身构成威胁的恢复帝国主义德国的企图。只有同苏联和其他斯拉夫人民的联盟才是捷克斯洛伐克平安未来和独立的保证。所以，所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诬蔑我们斯拉夫盟友和企图削弱我们盟友的人都是叛卖者”。

遵照这种精神，我们正搞群众运动，揭露反动派，揭露反动派的叛卖和反民族的作用，动员人民群众保卫民族独立，为巩固同苏联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友谊以及同爱好自由的国家的友谊而奋斗。^①

我们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在共同反帝和民主纲领的基础上，达成各兄弟共产党经常接触和协调共同行动的协议。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如果我们内部的反动分子依靠国外的反动势力的话，如果它使自己的行动与美国侵略者的计划保持一致的话，如果它在某个时候不知廉耻地公开宣布自己拥护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反动的反捷克的行动的话，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也应该不客气地声明，我们能够依靠一切进步力量，依靠和平和民主阵营里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能够与这些力量一起共同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奴役。”

№11636

卡德尔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卡德尔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明确阐述了当代国际形势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都能如报告所述承认这些事实，我毫不怀疑，我们在这方面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们在天天碰到这些事实，那么，据我所看，我们不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在发表我对法共和意共问题的看法时，我承认，我对具体事实了解不够，不能详尽地评述两个代表团报告的细节。（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对这两个报告存有分歧。）不过，稍微看一眼这些问题，就足以明白，会上所说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我赞成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批评也是针对某些未出席这次会议的党的。

我觉得，这里所说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运动都处在法共和意共政策的影响之下。

战争后期和战争结束之后，许多国家乃至世界范围里帝国主义上层集团衰落了，它们通过同共产党临时合作这种显著的方式寻找

出路以摆脱这种处境。这是战后联合政府时期，在这一时期，共产党员和其他人民反法西斯阵线按照各党联合和对等原则参加了政府。共产党之所以加入这一联合，是因为它还很薄弱，还不能执行夺取政权和建立以工人阶级和其他群众为首的政权的坚决方针。我们认为，共产党在这样的条件下进入政府和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是正确的。

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种状况不可能长久；我们大家一贯认为这一教导是对的。共产党人，即革命工人阶级、反帝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代表不可能长期同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或他们的走狗——社会民主党等所有其他右翼党派一起同坐在一个政府里。这种联合政府仅仅意味着双方力量非常薄弱，不能独揽政权，意味着政府里的阵地将变成斗争的舞台，争夺国家管理部门和真正体现国家权力的所有执行机关和武装机构的具体行政、军事、警察、经济和其他具有实权的领导职务。在这一斗争中，获胜的通常是奉行坚决夺取整个权力方针的人，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并有通向这一目标途径的人，对巩固的议会联盟和选举数字较少幻想的人，如果他们不是仅仅依靠占领国家权力的某些关键职位；在这一斗争中，获胜的通常是不把争取群众多数问题单单理解为选举数字或主要是宣传鼓动问题，而是将其理解为把更多的群众吸引到同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作尖锐斗争阵地上来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所教导我们的至少是这一点。这一历史还告诉我们，不走这条路的共产党将陷入机会主义，从而促使资产阶级克服其弱点和重新壮大起来，最终把工人阶级政党赶出政府。

能否说，战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理解了自己的作用呢？

不，我认为还不能这样说。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战争期间和战后出现了某种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是修正列宁主义的倾向。

众所周知，美国共产党里出现了所谓白劳德^①主义现象。但白劳德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是个别的和偶然的現象。由于反法西斯战争被削弱了的帝国主义体系重新给自己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它借助这一外衣和社会民主党的言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各种幻想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印象，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以及一系列的类似错误和偏差。不知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开始认为，战后开始了帝国主义某种和平议会发展的时期，而不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的时期。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据我们看，在这条道路上，即在滑向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或盲目崇拜帝国主义的巩固和力量的立场的道路上犯了许多错误。毋庸置疑，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政策中，这些错误表现得最充分；在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里，这些错误也有表现。

由于在我们这里坐着意大利共产党中央的同志，为了说明问题，我举意共中央政策的某些例子。

例如，在共产党员里出现了这种倾向，他们不是把由于战争引起的帝国主义的衰落理解为这样一种信号，即共产党应明确奉行在某些国家消灭帝国主义的方针，人民民主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夺取政权的方针，而是将其理解为共产党合法走向政权从而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今年7月1日陶里亚蒂同志表

^① 厄尔·拉塞尔·白劳德，1921年参加美国共产党，1930～1934年任美国共产党执行书记，1934～1944年任总书记。1944年解散美国共产党，另行组织了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

达了同一种见解：“我们预感到，存在着主要依靠合法途径对我国实行民主主义改造的可能性”。^①

自然，我不是否定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曾设想过这种可能性。某些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就把本国的发展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道路。

但是，当东欧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波兰、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谈论通过和平道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候，这是一回事，那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借助在战争期间所夺取的巩固的领导位置已有保证，而他们夺取领导位置的条件我们大家都清楚，无论如何，这同议会手段没有任何关系。哥穆尔卡同志在这里谈到波兰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时，特别强调了这一事实。而如果在资产阶级还牢固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国家里，共产党也谈论这一点，那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那里，这种谈论只能造成和加强对议会作用的幻想。

某些共产党策略的另一个错误，我们认为，这就是特别盲目崇拜各党联合，把它看成是争取群众的惟一可行形式。当然，我绝不是强调，共产党人不应利用这种形式。但是，如果有的党的领导人把这种联合当作是争得议会多数和通过这一多数走向政权的惟一道路，如果它不采取其他措施，那么，它就有陷入议会主义和社会民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也可能，并非夸大地说，个别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受到这些倾向的影响，重复着某些共产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犯过的错误，这些错误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即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政府，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是“谁战胜谁”的一种斗争形式，是‘两种政权并存’的独特形式，是为夺取国家执行机关中具体的实权职位而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而认为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一种道路和方法，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只能借助于议会方式才能得到保证。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点已经不再经常谈起了，但在实际中仍然是这样做的。”

主义立场从而真正帮助反动派巩固政权的危险。陶里亚蒂同志在1946年7月27日成立会议上就是这样讲的：

“党——这是有机的民主制度。群众性的大党——这是巩固的占有决定性阵地的民主制度，这些阵地任何时候也不会丢失……这些大党不仅是国家生活和民主的需要；它们的存在——这是我们国家的幸福。这些大党联合的队伍，实际是我国统一不被破坏的保证”。

我非常尊重陶里亚蒂同志，但我不能同意在群众中散布这种幻想。

我们大家都清楚，每一个党的联合都是带有两面刃的刀子，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如果共产党人不能伴随和通过这种联合建立其他的夺权手段，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将处于某种孤立的地位。当战后资产阶级还很弱的时候，它加入联合，加入同共产党的人民阵线或类似阵线。这意味着，在议会基础上同共产党联盟，当时有利于资产阶级走出困境。由于某些国家的共产党不能或不善于利用资产阶级的这一严重形势夺取至少是某些决定性的领导职位，所以同共产党人的这一联合对共产党人不利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尽管共产党人也坐在政府里。

我认为，如果我说，意共对联合的这种观点是其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不顾这样的不好的经验，其政策仍处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之下。

众所周知，萨拉盖特离开了南尼的社会民主党，此举打破了该党的统一。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坚决反对他，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但萨拉盖特没有加入德·加斯佩里的政府，所以意大利共产党后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自己对萨拉盖特党的立场。意共认为，只有在萨拉盖特不与德·加斯佩里联合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接受萨拉

盖特，或至少是他的被分裂的党的一部分加入联合以成立“左派党”集团。

我们觉得，意共低估了萨拉盖特加入政府的另一方面，即低估了这一事实：萨拉盖特是美国和反动派的“左翼”后备队。他的目的是削弱南尼，争夺左派党的工人群众部分，把他们引向反动阵营，从而迫使南尼终止同共产党的行动一致。我们觉得，反动派现在需要萨拉盖特“反对派”，正是为了让他明天以更有力的姿态加入政府和在更大程度上孤立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我们认为，必须争取同群众的团结。因为他们跟萨拉盖特走，但必须揭露萨拉盖特的党，不能同它缔结联盟。我们还觉得，我们意大利的同志们对南尼右转的可能性也估计不足。很清楚，意大利同志们目前同南尼密切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意共越能独立地动员群众，越能首先借助各种组织形式加强两党基层群众的团结，它就越能巩固同社会党左翼的联盟。这一自下而上的团结将从下面束缚社会党领导人的手脚，将进一步巩固这一联盟，使之对群众、对意大利其他左派党和集团的领导人产生吸引力。

在强调自下而上团结的必要性的时候，我们没说不要同其他党也建立联合和联盟。但我们认为，如果共产党主要依靠同上层领导的联合，那它将被迫不断退却；如果共产党找不到继续巩固这一自下而上团结的适宜形式——这些适宜形式不应到不大的对等委员会里去找，而应到包括联盟中所有党的群众，甚至联盟外各党的群众在内的群众性组织中去，而首先应该依靠这些基层的群众性组织，如果不是这样，所有这些联合将逐步垮台，共产党将受到孤立。共产党应加强自己的领导作用，束缚其他党上层领导人的手脚。否则，共产党将依附于其他党，落在它们的后面，经常处于完全被孤立的危险之中。

但事情还不仅是策略问题，还有斗争的方向问题。还有这样一

个口号，说每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都是新人民民主政府。我们意大利的领导同志断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德·加斯佩里政府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开始。^① 不过意大利的同志们忘记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和意大利反动派来说，这个被他们称之为人民民主政府是帝国主义者意大利阵地加强的开始。问题就在于谁最有力量。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在自己的多次讲话里给意大利群众散布了不少关于人民民主的幻想，吹捧德·加斯佩里是一个高尚的人，说他的党是劳动人民的党，没有揭露它是美国或梵蒂冈的走狗，然而这样一来，最主要的是在党的干部当中勾画出了一在意大利可以和平发展社会主义的图景，而此时反动派正罗织阴谋准备孤立共产党和把它赶出政府，结果这种事终于发生了。^②

但人民民主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而开始。根据我们的看法，人民民主的开始是在那些地方，即与其他劳动群众结成联盟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工人阶级至少掌管了国家政权所有主要领导职位，而这些职位能够保障共产党的领导和逐渐消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权其他领导职位的影响的地方。可以说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掌握了这些领导职位吗？当然，两党没有掌握这些职位。所以说，我认为，我们意大利的同志们以其在意大利的人民民主理论引导群众，并以此解除了人民群众的武装，而他们本来应该动员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开端。陶里亚蒂同志 1946 年 5 月 7 日说过：当时南斯拉夫政府首脑铁托肯定地说，对于意大利来说，摆脱责任的最佳途径就是简单地改组政府。请允许我说，这是错误的，因为在意大利不仅仅是政府改变了，这里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民主主义运动，大规模的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将在 6 月 2 日进入关键性阶段（在选举中）。”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意大利共产党没有正确地评价其他一些国家的状况，比如法国的状况。例如：陶里亚蒂同志于 1946 年 5 月 27 日曾羡慕地说过，‘法国找到了这样一个人，他领导了抵抗运动，并实施着明智的对外政策，不为任何人效劳’。陶里亚蒂同志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群众并借助群众的压力夺取这些资产阶级再不能从这里将他们赶走的阵地。

另一个广泛使用和解释的口号，这就是所谓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作用”。自然，与共产党相比，任何一个党也没有更多的权利称作民族的党。但是，某些共产党员从“民族政策”走向了“民族主义”或某一地方主义，把自己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不懂得国内和国际政治发展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大概会产生各共产主义文献中早就重复了很久的臭名昭著的口号：“不是伦敦，不是华盛顿，不是莫斯科，而是 X——未知的首都”。不过，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没有莫斯科就没有人类的进步和自由，就没有提出这些口号的共产党领导人所在国人民的真正民族独立。

在意大利共产党内，保卫“民族统一”的口号得到了特别的使用。众所周知，在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战斗精神方面，北意大利要比南意大利进步得多。意大利的同志们为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拖延北意大利革命的发展，以避免南意大利过分落后，这样保持意大利的“民族统一”。

意大利共产党的类似机会主义错误在于意共领导人在战争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意大利共产党，从1943年起就有发展武装斗争反对德国人和通过这一斗争建立更大的革命武装力量的良好机会。但意大利的同志们不善于联合这样和那样的人，不善于利用良好的机会，不善于准备战后夺取国家政权领导职位时所能依靠的基础和武装力量。

在战争期间，我们有机会同意共保持联系。但意共领导同志们没有充分彻底利用我们的经验，尽管正是这些经验帮助他们大大巩固了他们在北意大利的阵地。战后，由于自己的合法策略和在各党联盟中给自己的盟友让步，意共同志们失去了这一阵地。最后，他们允许从他们手中夺走武器，夺走意共实际上手里已有的政权，准

确些说，他们自己决定放弃北意大利群众中的巩固阵地，以求有利于政治联盟中的不巩固的阵地。^①

我只想指出，北意大利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法国同志们的斗争条件还好。此外，意大利同志们在北意大利身后还有无产阶级，其革命意志和战斗精神可能在西欧所有被占领国家中数第一。从这一观点看，我们认为，意共的错误甚至比法国同志们的错误还严重。

还有，据我看来，现在被非常错误地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争取群众、争取群众多数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党的力量不在于它在竞选中得票多少，尽管也不能轻视这个问题，党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能对资产阶级施加多大的压力，它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和斗争精神动员到什么程度，为了夺取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指挥阵地它能使其瘫痪到什么程度，等等。我觉得，在现在的形势下，西方共产党争取群众的最佳方式是借助更为坚决的斗争，这里也指群众政治罢工等斗争方式，借助能够使群众感受到共产党的力量，感受到它挫败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阴谋的坚强决心的行动来激发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这样做，我们本身的经验也表明，群众，首先是中间阶层，不仅跟着纲领和口号走，而且跟着有力量的人走。不能实际展现自己力量的大党必然失败和失去群众。另一方面，经常有这种情况，比较小但勇敢灵活的党能够吸引广大人民群众跟着自己走并夺得国家政权的关键阵地。据我看，在东欧和中欧，有个别党取得这种胜利的实例。但不顾这些人共知的事实，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其他个别党内经常强调，共产党不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但是，今后我将不再谈论这个问题了，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与意大利的同志们经常进行辩论，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但是，他们不同意我们对于他们的这个政策的评价。”

允许自己挑衅暴力，挑衅“冒险”，谁也不能迫使他们离开合法斗争参加政府的道路。自然，这种政策帮助资产阶级更加坚定地继续反共路线。^①

我认为，假如意大利共产党为参加政府而斗争，并借此夺取国家的领导职位，无疑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他们不展开最广泛的和尖锐的群众行动，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据我看，则不能通向这一目标。对于法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情况。这种动摇政策使群众士气低落，鼓舞资产阶级的勇气。意大利报纸在报道意共的某次游行示威时，轻蔑地描写讲演充满了“对参加政府的忧虑”，这不是偶然的。假若党最坚决地发动群众——而党有条件这样做，那么资产阶级很快就会失去兴致，不敢如此轻蔑地对待意大利共产党了。

法国和意大利同志们解释说，他们避免尖锐的斗争形式是因为他们可能处于孤立的境地，失去中间阶层。我觉得，这一论据没有说服力。其一，不是党的积极性，而正是党现在没有成绩——党不坚定的结果，实际上使党失去了这些群众，其中还有工人；假若采取表现党的力量的最坚定的斗争形式，那么党对群众就更具吸引力了。其二，在政治上迎合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是我们所提到的错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在苏联代表团的第一个报告里，马林科夫同志特别强调了联共（布）的一个突出特点，这就是它善于斗争，敢于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例如，在这一年的8月中旬，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自己的干部发出了一封指令性的信函，在信中指出开展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的必要性，但是，总的来说，在一切重要的问题上仍然继续坚持旧的路线方针，千方百计地提请注意，应该采取温和的态度，警告不要陷入‘冒险主义’。陶里亚蒂同志在1947年7月1日说过，‘我们不应该丧失作为全国统一的和积极的反对派的特征……’。

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7年8月16日下发的这封指令性信函中说到：‘……我们应该竭力追求建立这样的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还有共和国的所有左派力量，并且采取与人民和民主基督教党派代表结成民族统一联盟或民主共和统一联盟的形式，尽管根据情况……’。”

反潮流，如果需要这样做。我觉得，不是所有共产党都发现了这一突出特点。相反，保护明显的错误已成为某些党的领导们的习惯，他们经常有意识地把自己降低到无原则的水平，降低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水平，并且振振有辞地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将孤立于群众。

我想单独分析一下希腊问题。

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们经常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希腊形势”。他们说：美国人和国内反动派想让我们做希腊所做的事，即他们想迫使我们铤而走险，拿起武器，他们想让我们这里出现“希腊形势”。这些同志们说，但是他们错打了算盘，因为我们不希望“希腊形势”。的确，他们的错误实质就在这里。其实，他们不理解“希腊形势”，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主要是在议会主义的基础上作斗争，而希腊共产党则是带领人民拿起武器作斗争。实际上，美国人和希腊反动派不希望“希腊形势”，这一形势给美国人和希腊反动派带来了巨大损失，威胁着他们的权力和整个帝国主义在希腊的阵地。

所以，“希腊形势”现在大大优于法国和意大利形势。同时，当希腊民主力量反抗美帝国主义扩张和对反动派的进攻转入反攻时，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力量则在退却，不仅允许，正如资产阶级所说，“不失体面”地把他们赶出政府，而且允许在没有他们有效反抗的情况下把他们的国家变成仆从国和发动反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战争的基地。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同意意大利同志们的意见，说美国人和法、意反动派希望在这些国家出现“希腊形势”。相反，我坚信，他们不仅不希望这个，而且坚信，意大利和法国的“希腊形势”，除所说的“希腊形势”的本意外，还是对帝国主义的最沉重的打击，它意味着目前帝国主义对进步势力进攻的破产。

自然，同志们，我要附带说明，我说这些不是想要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走这条路。当然，为打败反动派的进攻，他们可做什么

和应做什么，这是他们的事情，应由他们决定。我只是说，他们对“希腊形势”的不正确评价完全符合他们共同的国内政治路线。这正是今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民主主义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因为法国和意大利斗争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是今天反帝斗争阶段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说，这两个党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承担有最伟大的责任。

但问题不仅在于这种评价。问题在于，从这一事实产生了另一种事实，即这样看待“希腊形势”的党没有充分支持希腊的解放斗争。某些共产党低估了希腊民主军队的斗争，把这一斗争看成了“毫无希望”的事情，看成了即将遭镇压的斗争，而另一方面又扩

分子反动进攻的斗争，这一斗争可以取胜。

根据法共和意共代表团的情况报告和根据我们掌握的其他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党至今采取的是政府党立场（——正如法国同志们所说），或“建设性的反对派”立场（——正如意大利同志们所说）；这种立场实际上是给政府以帮助。作为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共产党参加提高生产，收购粮食，克服经济困难，以及其他类似行动。我很难理解，共产党怎么可以对资产阶级反动派政府，此外对美帝国主义现在借以对法国和意大利人民进行经济奴役并把他们的国家变为美国附庸的政府采取这种立场。在我看来，这种立场不能称作别的，只能称作使党失去明确的政治方针，失去前进方向。这里，整个党的政策归结为纯粹的议会主义。^①

我觉得，如果我们大家同意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那么法共和意共应该彻底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而不只是纠正个别错误。^②

①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党准备采取另外的斗争方法，如果党内不存在这样的幻想，即不仅通过议会道路，而且还可以通过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其他战斗方法去阻止美国人以及国内反动分子的进攻，我就无法理解党为什么要竭力减轻政府的经济困难状况，而这个政府还是党希望推翻的政府。我觉得，在这个政策中没有明确的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内的反动走狗的阴谋、争取未来的法国和意大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方针。”

② 在较完整的记录文本中还有以下内容：“目前，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全体反法西斯力量处于这样一个事实面前，即以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力量企图对人类的进步力量进行全面的反攻。毫无疑问，这种反攻的目的在于：打击和摧毁人类的进步力量，孤立苏联以及其他的东欧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已经被摧毁或者是实际上已经遭到破坏，以此来加强由于人民解放战争已被动摇和破坏的帝国主义的地位，为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扩张政策扫清道路。换句话说，目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最低限度也可以放开过去被束缚而现在仍然被束缚着的双手，这种束缚一方面来自于苏联和现存的东欧新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及其对外政策，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工人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主义民主运动。”

毋庸置疑，帝国主义分子在向反帝力量进攻方面之所以取得成绩，其原因在于反帝力量不能制止或粉碎这一进攻，从而巩固了帝国主义的地位，大大加重了工人阶级和人类所有进步力量斗争的困难。

对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来说，自然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中央认为，现在摆在所有共产党，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探索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反动进攻的途径和手段，对帝国主义的进攻展开坚决的反攻。

No 11637

法尔卡什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法尔卡什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匈牙利代表团热烈欢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该报告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填补了一个很大的空白。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只依靠本国的经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能孤立地同美帝国主义做斗争。

我们将在政治局讨论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并从中得出我们所需要的结论。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治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我应当说，吉拉斯同志发言中对法国共产党的批评，也迫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

我党许多成员也没受过考验，在危难关头也可能动摇。关于党成为群众性的党只能靠吸收成员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政治局里讨论，要克服我们组织中的缺点。过分扩大党的队伍因此使党混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危险是存在的。

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国家国内政治的发展不能单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去讨论。不能认为，美帝国主义已放弃争夺人民民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南斯拉夫政治上已经没有有组织

的反对派，但反对南斯拉夫的斗争仍在进行，采取的手段是破坏和怠工。美帝国主义反对匈牙利不仅是通过怠工，同时还利用政府内外的各种党派瓦解民族和民主的统一，以便在一定的時候孤立共产党，迫使它让步和投降。

在民主获得一定发展，但共产党及其真正盟友在议会、政府和国家机构中还未拥有决定性多数的国家里，共产党一直有被孤立的危险。在这些国家中，民主政府阵营里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不应该害怕这种分化。应该勇敢地采取把美国的代理人清除出民主联盟和同与共产党合作的党的右翼作斗争的方针。

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敢像在法国那样公开宣布美元的优势。在东欧人民民主国家里，布吕姆们没有宣布美元的优势，而宣布的是“东”西方之间所需建立的“桥”的优势。这种“桥”的理论意味着自由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应归结为地理问题。这种理论建立幻想，似乎自由和帝国主义之间存在某种第三种东西。这种“桥”的理论客观上是对处于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之下的民主主义国家团结的否定，是对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

这种“桥”的理论甚至在与我们合作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扩散得也很广，甚至在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中也有其踪迹。这种理论还未被从思想上击破。揭露这种理论是一项严肃的任务，因为这种理论导致假民族独立的概念。“东西方之间”的桥，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桥意味着什么？这种“桥”意味着独立于自由的人民，反映着自由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中立”。在这方面，日丹诺夫同志在批评那些强调自己“独立”于莫斯科的共产党时讲得非常对。

谈几句法国问题。杜克洛同志描述了一幅惊人的图景，一帮叛徒如何把一个伟大的法国置于了半殖民地的境地。我们在布达佩斯也听说，法国共产党被赶出政府是美国人的旨意。在我们中央机关

里，我们也是这样解释法共被赶出政府的原因的。法国同志们怎么不知道这一点呢？如果知道，又为什么不把这一点告诉人民呢？莫非是法国同志们不告诉人民真实情况，是为了不打破小资产者的梦想，为了适应期待美国援助的小资产者的幻想。

为什么法国共产党在政府危机之前不揭露美国的干涉，不动员人民群众反对它？假如它这样做了，假如它揭露了社会党人，那毫无疑问，敌人阵营里便会出现混乱和分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大概会找到同自己一起反对美国干涉的盟友。杜克洛同志本人承认，法国甚至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工厂主。揭露敌人的代理人，同美帝国主义的爪牙做斗争不会导致党的孤立。正是由于害怕孤立，对敌人让步，法国共产党才落到了今天孤立的境地。不清楚，如果共产党员们勇敢地说实话，并直接地转向人民，那么，拉马第政府是否敢把他们赶出政府。

假如尽管如此，事情还是落到了共产党员被驱逐出政府的地步，那么形势也会是另一种样子，因为群众看到了共产党是法国独立的保护者，而那些把共产党赶出政府的人是人民的叛徒。

杜克洛同志对法国沦为半殖民地国的分析是精彩的。但分析完了之后，杜克洛同志没有阐述法国的发展前景。市政选举是否是走出困境的出路？选举的前景如何？我持怀疑态度。

我希望法国共产党能看到自己的错误，并在多列士和杜克洛同志领导下克服它们。

谈几句意大利。隆哥同志讲到了同德·加斯佩里的联合，并为这种联合找根据说，没有基督教民主党，议会多数是不可能的。但愿隆哥同志不抱怨我，假如我说这是议会迷。议会多数被说得如此神圣，触动不得。难道不能以某种群众力量对抗议会多数？难道不能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成立少数派政府并解散议会？我担心意共迷惑于基督教民主党的数量之“大”。在匈牙利，反对我们的也是这

样一个“庞然大物”——小农党有57%的多数。但我们没有迷惑于这个多数。我们进攻并粉碎了这个“庞然大物”。

日丹诺夫同志说得好：不能高估敌人的力量和低估自己的力量。害怕孤立意味着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还想谈几句德国问题。美帝国主义侵略性的增长意味着争夺德国斗争的激化。今天我们看待德国人民再不能用战争年代的眼光。当时德国全体人民支持希特勒。今天不能说全体德国人民支持美国的侵略计划。在德国，有反抗这一计划的力量。应该支持这些力量。如果我们不能使德国民主化，如果德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火药库，那我们各国人民的自由将受到威胁。

防御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应依靠共产党的国际协调政策。与此同时，贯彻这一政策还应该把它作为民族政策，应向人民讲清楚。这里我介绍一下我们匈牙利共产党的经验。我国的反动派也企图利用法国的那些“论据”。反动派断言，似乎美国的财政援助符合国家的民族利益，而共产党不捍卫民族利益，因为它拒绝这一援助。我们回答说：自由的人民不因一千万或一亿美元而出卖自己的自由。当阴谋者被逮捕和费伦茨·纳吉被解职之后，美国拒绝了给我们贷款，我们给人民解释：请看，美国不给匈牙利人民贷款，都把贷款给了想夺农民土地的敌人。我们不需要这种宽恕人民敌人的贷款。人民理解我们：不仅是工人，还有农民。

以前我们各国共产党曾努力依靠各国总的特点和情况，而对本国特点估计不足。这导致各党工作的死板公式化。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必要的，有益的。但解散共产国际之后，又出现了相反的危险。只依赖本国的特点而对各国共同的特点和经验估计不足。但不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不能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这导致民族局限性。民族局限性和机会主义——这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宝贵援助，我们也争取过铁托和季米

特洛夫同志的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建议。但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个别的建议。问题在于各个党有组织的接触。一年前拉科西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曾建议各国共产党之间恢复联系。我们希望恢复这些联系。

至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争议问题，由雷瓦伊同志发言。

会议于 15 时闭幕。

№11638

隆哥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6日18时开始

马林科夫同志主持会议。

在辩论会上发言的是隆哥、波普托莫夫、哥穆尔卡、雷瓦伊和巴什特万斯基。

隆哥同志的发言（记录稿）^①

意大利代表团完全赞成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认为报告对战后国际形势的评述是正确的。我们特别同意日丹诺夫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在团结所有反法西斯和热爱自由的力量反对新的战争和侵略计划方面所承担的领导职能。所以我们完全同意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对我们党的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所发动的新的进攻时所犯错误的批评。

我们认为，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对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意大利的阴谋和帝国主义企图斗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有助于我们准确而坚定地确定这一斗争的任务，有助于我们

① 在俄国档案中保存的隆哥发言的两份记录稿差别较大，不易用注释的方法说明，故较完整的记录作为附录收在本文件之后。

克服弱点和纠正我党政治工作中的错误。

所以我们就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只局限于报告人所涉及的问题。

日丹诺夫同志指出，意大利在三个方面遭受到美帝国主义的进攻。意大利特别遭受到思想反共和反民主方面的进攻，这些进攻是借助几乎完全操纵在美国间谍和情报机构手中的电影、广播和报刊来实施的。它们散布谣言，诬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富于侵略，以最广泛和最无耻的方式对社会舆论进行欺骗。

敌人的思想进攻猖狂至极，我们在这方面的反应应尽量广泛、明确、坚定，毫无含糊和模棱两可之处。

我们应坦诚地承认，日丹诺夫同志在这方面的批评也是适于我们党的。

我们没有充分地 and 热情地阐明苏联人民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南斯拉夫人民在消灭法西斯和纳粹中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经常缩手缩脚地处于防御立场，很少广泛宣传苏联的政治和社会成就，几乎轻视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在此之前，我们应该更加坚定地 and 公开地奉行支持作为争取持久和平和民主斗争领导力量的苏联的方针。

我们完全接受日丹诺夫同志的意见，我们“不应该害怕大声说，我们支持莫斯科的民主和平政策”，我们不应该“害怕宣布，苏联的政策符合其他被解放人民的利益”，从而也符合比其他国家更担心新的战争的意大利的利益。

所以，在这方面，今后我们应该组织系统的宣传，使苏联的社会成就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成就家喻户晓。

我们应该宣传和保卫苏联的民主和和平政策，号召同所有受到美帝国主义攻击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

这一整个宣传不应局限于报纸上，而应成为争取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所有走上了自由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友好和团结的强大的人民运动的中心。

在美国的经济扩张方面，我们认为，我们党，总体说来，除个别我们所说的疏漏，其行动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所说的指示精神的。

我们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谴责，我们是按照党的六月份杂志上所阐述的理由对其进行谴责的，这些理由在我们的报刊文章和陶里亚蒂同志的议会发言中又得到了发挥。

在我党的宣传工作中经常出现关于欧洲被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的危险，关于制止这一分裂对意大利有利，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必须处在任何集团之外等思想。

同时，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认为，战后政治力量新的分化和两个阵营的建立已是既成事实，而作为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他指出，各共产党应“真正地、公开地实行支持作为争取持久和平和争取民主斗争领导力量的苏联的政策”。

的确，要求处在任何集团之外，这对实际处在帝国主义集团之内的意大利来说，实际上意味着退出这一帝国主义集团。

的确，这一要求没有妨碍我党公开反对所有旨在孤立苏联的政策。

但是，从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观点看，我们认为，在战后政治力量业已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今天，反对划分两个阵营的危险性和赞成处在两个阵营之外，这意味着减轻对把意大利纳入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对，削弱共产党对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和民主的阵营的应有的支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这样理解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的，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放弃我党在此之前在宣传工作中的那种提法。

在谴责和批驳“马歇尔计划”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谴责和批驳一切贷款或与美国经济合作的思想呢？我们觉得，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波克同志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做出了随意的结论。

我们在我们的情况报告中通报说，我们党拒绝“马歇尔计划”，但不拒绝美国贷款的思想，如果这些贷款，正如今年我们4月通过的决议中说的，“不给我国的独立带来损害”。

我们觉得，我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涉及这个问题时所阐明的以下原则不矛盾：

“苏联政府从不反对利用外国贷款，其中也包括美国贷款，把它们作为加速经济恢复的一种手段。但苏联的出发点始终是：贷款条件不带奴役性质，不能导致债务国受债权国的经济和政治奴役。”

这些原则同我们提出的接受贷款的条件是完全吻合的：“不能使它们，即贷款，给我国的独立带来危害”。

所以，我们觉得，波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意见是不公正的。

我们是否以此想说，我们认为在美国贷款和美国援助方面意共不该受到指责呢？不。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也应该受批评。这一批评来自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谈到苏联同所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观点时所阐明的原则。

我们党揭露了美国建议“援助”的帝国主义性质。我党声明说，可能的美国贷款不应该妨碍或限制我国同其他国家，尤其是同东方国家的贸易自由。但在回答我们的敌人的论据——“只有美国能给我们援助”——的时候，我们没有指出苏联已为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没有指出，假如我们对苏联奉行正确的政策，那我们也能发展同苏联有益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将对我国经济恢复提供巨大的援助。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占领意大利战略海军基地方面，我们应保持

充分警惕，积极揭露这方面的一切企图。不久前我们揭露了美国海军部企图在占领时期结束之后仍在意大利为其保障海军基地的打算。我们应该揭露美国人肆意占领亚得里亚海沿岸战略要点上的重要飞机场。

我们应保持警惕，在提交批准书90天期满后，美国部队不能以任何借口留在意大利。

我们坚信，我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行动，无论这些行动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应该局限在口头声明和抗议上，而应表现在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及其意大利走狗和帮凶阴谋的真正的人民爱国群众的动员工作上。

当按照美国和意大利金融寡头的指示把意共赶出意大利政府的时候，我党书记处把此事看成严重事件。

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德·加斯佩里决定把劳动群众的代表赶出政府的消息公布后，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广泛的抗议。日丹诺夫同志说，很遗憾，群众的主动精神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和领导。日丹诺夫同志做出了以下结论：

“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的共产党员们成了帝国主义威胁和讹诈的牺牲品。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民主的力量、人民群众保卫民族根本权利和本国利益的意志估计不足”。我们完全承认这一批评是正确的，我们无条件地接受这一批评。

在我党被驱逐出政府之后，我党中央和书记处重新审查了危机前后党的全部活动。

书记处在给全体党组织的指示中指出：“在转入反对党的情况下，全党表现出软弱……在对政府进行广泛的反对运动中，我们的组织和日报没有表现出才干……我们理解反对派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性质的行动和斗争，这些行动和斗争可使广大群众表现出自己对政府的反对立场。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是工会运动的性质。我们对

政府的反对派立场至今主要是口头性质，而不是斗争性质”。

在该信的另一处地方还说：

“处于反对派不意味着消极等待政府由于议会联合而下台。反对派意味着在国家面前应不断提出我们反对派的理由，这些理由的提出应有具体的形式，我们反对派的这些理由应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应根据这些理由开展一系列的宣传运动和行动，并造成影响，应引导全国并使之反对政府”。

必须指出，在做出了上述指示之后，意大利的形势正是按照党的书记处的意愿大大好转了。发表演讲和宣言、夺取土地、经济和政治罢工等整个浪潮激起了数百万工人、雇农反对政府。因此最近一些日子，我党和社会党在议会里有了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的主动权。

我们把这一事实看做我们积极、坚决行动起来，动员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德·加斯佩里政府反民主和反人民政策，反对美帝国主义奴役意大利政策的初步胜利。这一胜利证明（即使这是必须的），日丹诺夫同志对我党以往，尤其是在德·加斯佩里决定把劳动群众的代表赶出政府的时刻所犯错误的批评是正确的。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日丹诺夫在报告里对我党所采取的立场表示惊讶的问题上来。

我们担心，我们在我们的情况报告里没有清楚、准确地阐明意大利的形势，或者，也许可能，我们还没有理解日丹诺夫同志对我党活动所作这些指示和意义的分量，我们不想在这个对我党的直接活动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带着怀疑或误解离开会场。

我们在我们的报告里讲了我们在议会方面所追求的目标，而且引述了我党书记处给全体党组织的信。我们的目标是组建：

“重新由所有拥护共和国制的人民左派力量和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力量代表参加的政府，其形式可采取民族统一或民主和共和统

一，这依形势而定”。

上述政府的任务是采取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措施，当务之急是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新的选举。

为什么这一政府里还要有人民基督教力量的代表，即把我们赶出政府的那个党的代表参加呢？

因为在现在的意大利议会形势下，不可能成立只有左派力量成员的政府，它们在议会里没有多数。

左派政府没有基督教民主党参加，只有某些右翼派别参加，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政治上我们应该避免这一决定。

在现在形势下，有下面几种选择：

或继续处在反对派位置上，面对德·加斯佩里政府继续巩固和进一步坚决奉行把国家变成美帝附庸方针的危险；

或使我们的工作奉行国家将被占领时期的方针，转向通过议会外途径解决政府问题；

最后，或我们提出的解决政府问题的方案，我党选择了这一方案，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这一解决方案对我们来说是惟一可行的和合适的。

这一方案可使我们：

1) 正如已经做的那样，把左派党和左派力量联合成反政府联盟，以进行目前尚信心不足的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的斗争；

2) 在顺利的情况下，挫败美帝国主义把共产党彻底赶出政府的计划，从而给这一计划的执行者——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以沉重打击；

3) 尽快进行新的选举，防止在基督教民主党特殊政府监督下进行选举。

自然，这种解决方案的确是只针对目前议会状况的，在今天的立宪会议里左派力量不占多数。在其他议会形势或政治条件下，假

如允许或暗示我们有可能通过议会外途径解决政府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整个问题则将按照建立较单一和彻底民主政府的精神来考虑了。

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卡德尔同志发言的确切文字，我们只好局限于他对意大利共产党所作批评的大意。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南斯拉夫同志们批评的基本意思是：

意大利党参加联合政府，其行为是对的，但错在没有利用参加政府的机会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

它之所以没有扩大和巩固自己在政府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是因为它成了议会幻想主义和合法道路幻想的牺牲品，是因为它没能协调群众的行动和在政府和议会里的行动。

的确，卡德尔同志言辞尖刻，旁征博引，对我党的整个政治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

我们不能不指出，在全面阐述意大利武装起义之后形势和这一起义所开辟的政治可能性的时候，卡德尔同志没有提到，意大利是一个英、美军队占领的国家，法律上处于停战协定制度之下，这一制度给英、美政权和军队提供了最广泛的监督和干涉的权利。

我们并不是以此想说，在英、美占领的条件下，群众的所有干预都是不可能的和无益的，应该拒绝这方面的一切可能或尝试，都把它们看成是冒险的和必遭失败的东西。

在指出这一完全具体的情况时，我们只是想说，在提到我党的两百万党员、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游击队的初步威望和北方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时，必须把这些情况同当时尚不知其多少数量的全副武装的英、美和波兰师的存在相比较，以便有可能客观地令人信服地权衡战后时期意大利所存在的政治可能性，首先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解放之后我们立即考虑到，游击运动的发展、实力和编成不允

许我们冒险同英、美部队进行武装冲突，那样人民力量会被消灭，美国军队会找到长期占领意大利的借口。我们认为利用已取得的自由发展的所有人民民主组织是完全正确的。

的确我们被赶出了政府，我们失去了政治阵地，我们没能根本干预国家机构的更新。但力量对比并不是完全令人悲观的。我们拥有大批有组织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它们不仅没有蒙受损失，反而在继续增长。

在不久的将来，英、美在意大利军事占领的结束和停战协定制度失去效力，将给我们的行动提供更大的自由。罢工、群众政治性游行、夺取土地，现在意大利出现的行动都表明，为了开始公开的政治斗争行动，我们没有等待英、美军队的撤出。最近一年来，尤其是近几个月和近一周以来，我们积极地组织原游击队员，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赋予他们具体的、现实的任务。这一事实表明了我们在意大利政治斗争问题上的方向和意图。

在明确这些因素时，我们承认，在很多方面我们应该受到批评和谴责。例如，由于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的存在，我们过分限制了自己的行动。我们在政府的行动毫无疑问是软弱的，分散的。我们在政府和议会里的行动没同议会外行动和群众行动结合起来。

由于这些错误和软弱，毫无疑问，与意大利事态进程的需要相比，我们做出了过分的让步。但我们不认为，在争取意大利民主的斗争中我们彻底失败了。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斗争还在前面。我们还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应加快步伐靠近这一战斗。我党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已看到并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错误和最薄弱的环节。

我们坦诚地承认，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错误和弱点的性质和严重性。我们感谢同志们在这次会上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将向我党和我党书记处汇报这次

会议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党将认真研究你们的指示并接受这些指示。

无论我们在我党的伟大而迅速的发展过程中错误有多大，我们都可使你们相信：

我们的党尽管它的大部分党员党龄不长，但它是一个健康的党，是一个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和它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周围的党。我们的党愿意继续忠于我们大多数党首先是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斯大林的学说，继续忠于所有在这次战争中和战后善于沿着解放和动员人民群众的道路前进的党。

我们的党对所有其他共产党和所有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民怀有国际团结的感情。

弱点将被克服，错误将被纠正，我们坚信，我党将尽最大努力实现国际形势所提出的和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艺术地和准确地指出的任务。

附 录

记录较完整的隆哥发言稿

意大利代表团的同志们认真地学习了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我们完全赞同这个报告，并且认为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对战后业已形成的国际局势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认为，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对战后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的分析，对两个阵营——帝国主义和反民主主义阵营为一方，反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阵营为另一方——业已形成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

在报告中，日丹诺夫同志将杜鲁门—马歇尔的计划评价为奴役

欧洲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评价。

尤其是，我们还一致赞同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指明的，各国共产党在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和自由力量进行反对新的战争和侵略计划方面的领导作用。

不仅如此，我们还一致赞同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对于我们党的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发起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新的进攻面前所犯的错误给予的批评。

我们认为，在我们同美国资本主义在意大利的帝国主义阴谋和企图进行斗争方面，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将给予巨大的帮助。

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将有助于我们明确和坚信这一斗争的任务，克服一切弱点，改正我们党在政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因此，就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我们所进行的发言，只局限于报告人所触及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之所以希望谈及到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表达某些补充或者是反对意见，而只是为了给同志们提供一些关于我们党在政治工作方面的补充情况，而首先也是为了请同志们对某些问题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日丹诺夫同志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在以下三个方面实施自己奴役欧洲的进攻计划的：

- 1) 军事战略措施；
- 2) 经济扩张；
- 3) 意识形态的斗争。

意大利在这三个方面都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进攻。意大利尤其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反共产主义的和反民主主义的进攻，这些进攻是借助于几乎完全掌握在美国的代理人和情报代理机构手中的电影、无线电广播和出版物来进行的。借助于散布虚妄的谣言，即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将实行最大规模的和最下流无耻的进攻，来恐

吓社会舆论。

站在造谣运动前列的，不仅有被美国收买的那些黄色书刊，而且还有动用了自己全部组织和全部宣传网络的梵蒂冈。

除了共产党的报纸，以及与我们商定统一行动的社会党的部分报纸之外，在意大利没有一家报纸或者是出版社，不散布美国反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谣言。

为了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反应尽可能全面和清楚，没有任何模糊的地方，必须在思想领域开展大规模的反攻行动。

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批评，基本上是针对我们党的。

我们没能充分全面地展示苏联人民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人民，尤其是南斯拉夫人民在消灭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事业中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极少宣传苏联的政治和社会成果，即使做过也是十分怯懦并从防御立场出发的。我们几乎忽视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应该更加彻底地、比现在更公开地执行支持苏联的政策，把苏联作为争取持久和平和争取民主斗争的领导力量。

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中央委员会已经多次指出我们工作中的这些弱点，并指明必须进行恰当的改正。

在一年前做出的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中，就已经指出在选举运动时期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在这个决议中谈到：“在几乎所有的各党派都集中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我们在这些行动面前表现出了极大的软弱性，之所以有这种软弱性是因为我们站在了防御的立场上。除了个别的情况之外，还不明白，进攻行动应该由我们来倡议。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地坚定地强调，在战胜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事业中苏联所起到的

决定性作用，以及它所取得的巨大的社会成就，由于这些成就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这个国家里永远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是的，在做出这个决议之后，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了一些改善；但是，应该承认，这种改善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们完全接受日丹诺夫同志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大声宣布，我们支持莫斯科的和平和民主的政策”，我们“不应该害怕声明，苏联的政策是符合其他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利益的”，自然，也符合意大利人民的利益，意大利应该比任何一个国家更担心出现新的战争。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更经常地宣传苏联所取得的社会成果，宣传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和社会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们应该详细解释苏联的和平和民主的政策，并捍卫这个政策，我们应该呼吁那些面临着美国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

我们应该利用苏联革命三十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人民群众的游行活动，以表达对苏联的爱戴和感激之情。

所有这些宣传鼓动活动，不应该局限在报刊上，而应该成为巨大的人民运动的中心，这一运动的目的在于争取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所有的沿着自由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前进的国家建立友谊和团结。

在美国进攻的另一个方面，即在其实行经济扩张的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的党从整体上来说，除了我们已经谈过的那些错误之外，我们党在政治上的行动是正确的，从实质上来说，这些行动也符合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所谈到的那些内容。

同时，波克同志在昨天的发言中所依据的也是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内容，她认为应该提请注意的那些错误，大概指的是我们党在这方面也犯了的错误。

我们觉得，波克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她所做的一些结论，从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内容来看，也不能证明这些结论是正确的，甚至报告的某些内容还明显地否定了这些结论。

请原谅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们这样做也是忠实于我们对报告的理解，此外，如果我们对报告的某些内容还没有弄清楚，那么，也可以向我们做一些解释工作。

我们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谴责，谴责这个计划的理由我们在党的6月的刊物中已经做过阐述，后来，这些理由在我们报刊的文章以及陶里亚蒂同志在议会的讲话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党的6月的刊物中，我们指出，“马歇尔计划”意味着：

- “1) 将对苏联持敌对态度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反苏联盟；
 - 2) 将欧洲永远分割成两个部分，并用美国称之为‘铁幕’的屏障将它们分割开；
 - 3) 一个大国集团以监督为借口干涉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生活；
 - 4) 最终，作为最后的后果——在政治上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希腊就是这样的十分悲惨的例子。但遗憾的是，当美国反动分子要求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时，这样的例子同时在意大也被出现了”。
- 明确这些理由之后，党的刊物还指出：“那些坚持并非基于我们的民族利益之上的意大利对外政策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以上的任何一条理由的。

无论是建立反苏联盟，还是将欧洲分成两个集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对我们来说，如果建立这样的监督也是致命的，因为这样的监督将使我们的经济不可避免地屈从于帝国主义强国的利益，而这些强国的工业潜力无疑要高出我们的潜力很多倍，这使我们不得不完全依靠他们的经济扩张和物质状况而生活。

最后使我们陷入绝望境地的将是：对我们国家的内政进行政治

上的干涉，因为这种干涉将会把意大利置于一种任何一个意大利人都会反对的境地”。

在我们党6月的刊物里，对于“马歇尔计划”也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在引文里主要阐述的是“马歇尔计划”的基本特征，日丹诺夫同志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这些特征，根据这些特征，这个计划是应该受到我们对它提出的那样的谴责和批驳。

在我们所做的说明中有这样的表述，从日丹诺夫报告的角度来看，这个表述今天可能应该受到批驳。

在我们党的刊物里的这一表述中指出：

“无论是建立反苏联盟，还是将欧洲分成两个集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在我们党的宣传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思想，即关于欧洲分成两个敌对集团的危险，以及为预防这种分裂意大利应该进行的工作，还有在任何情况下意大利都必须处于任何一个集团之外的思想。

同时，日丹诺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认为，战后政治力量的重新划分以及两个阵营的形成即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阵营为一方，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的阵营为另一方，是已经形成的事实，并指明各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公开地和诚实地执行支持苏联作为在争取持久和平和民主的斗争中的领导力量的政策”。

意大利目前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一部分，要求处于任何一个集团之外，对于意大利来说，实际上就代表着退出这个帝国主义集团。

还有，这个要求并没有妨碍我们党公开反对任何一个旨在孤立苏联的政策。

实际上，不久以前陶里亚蒂同志就在自己的一次讲话中说：

“我们应该实行这样一种对外政策，它必须是反对、公开地反对任何一种其目的是在欧洲和全世界孤立苏联以及东欧其他民主和

文明的民族的政策。

如果我们附和具有这样性质的政策，那么我们将会非常不幸，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向那些成为我们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惟一主宰者的人进行无条件的投降”。

但是，在从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角度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考虑到，目前，当战后政治力量已经划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时，反对分裂成两个集团的危险和赞成处于任何一个集团之外，这意味着减轻打算使意大利加入帝国主义阵营的反对派的压力，削弱共产党应该给予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的公开的和无条件的支持。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的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放弃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材料中至今仍然使用的表述。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关于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扩张问题。

在谴责和驳斥“马歇尔计划”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谴责和驳斥任何一种无条件的贷款或者是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思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正如我们所感觉的那样，波克同志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得出了臆想的结论。

在我们的情况报告中，我们曾经通报说，我们党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但是，并不拒绝接受美国方面关于提供贷款的思想，并且必须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正如我们在今年4月做出的决议中所写的那样，这些贷款“将不会给我们的民族独立带来损失”。

在1947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陶里亚蒂同志就美国提供贷款问题曾作过如下声明：

“其主要条件是，外国不能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如果我们被迫允许我们的政府按照外国的考虑和要求来进行这件事情的话，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灾难。这样，我们的国家将会永远失去独

立。第二个要求是排除外国的经济干涉。我们应该与欧洲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进行经济、工业和贸易方面的合作，但是，必须是以这样的形式，即这种合作能够使我们的经济根据在我们的生活和民族实力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基本需求进行发展”。

波克同志批评意大利共产党这样提出了问题。她说，如果共产党人亲口说出自己需要贷款，没有贷款共产党人就不能应付等类似这样的话，那么，这将有利于同意在美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下的贷款。

波克同志还说，共产党人应该声明说，没有外国的贷款一样能够应付，这样一来，美国人就会被迫做出让步，因为他们需要我们。

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我们党承认，为加快我们国家的恢复工作，在一定条件下的贷款将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把一切都与贷款联系在一起。陶里亚蒂同志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指出：

“那些昧着良心发财的资本家们，将国家的财富聚积在自己的手中，还叫嚷着，为了国家的恢复未必还有其他的办法，因为在意大利既没有资本、没有资源，也没有可以缓解人民需要的资金；自然，应该按照人民的意见去做，这就是请求外国的帮助。那又怎么样，如果有外国的帮助就好。我们并不反对外国提供贷款，并为资金的流入创造条件。但是，我们非常清楚，意大利人民能够获得的最大帮助是在国内，如果这个国家是由那样一个政府所管理着，即这个政府能够承担各种各样的困难，并能够发现投机商们所隐藏的巨额财富的话。”

我们认为，我们党在关于外国贷款问题上的这种立场，与日丹诺夫同志在其报告中就这一问题所做的阐述并不矛盾。日丹诺夫同志是这样说的：

“苏联将永远坚持这样的立场：外国贷款不能成为恢复国家经

济的主要手段。恢复经济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条件应该是：利用各个国家的自身力量和建立本国的工业。”

“苏联政府从来也不反对利用外国的贷款，其中也包括美国的贷款，它把外国贷款作为加速经济恢复过程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但是，苏联的出发点永远是：贷款条件不能带有奴役的性质，不能导致债务国受债权国的政治和经济奴役。”

这些观点完全符合我们所提出的那些接受贷款的条件：“使它们，也就是贷款不能给我们的民族独立带来损失”。

因此，正如我们最初说的那样，我们觉得，波克同志就此问题所提出的批评意见是不公平的。

我们说这些话是否是想表示，我们认为不应该就美国贷款和美国帮助的问题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指责呢？当然不是。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对我们党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出自于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的如下内容：

“苏联同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表明，所有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只要回忆一下苏联在最近同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所签订的条约，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苏联以此明确指出，欧洲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走出经济困难处境的出路。英国也可以拥有这样的条约，如果工党政府在外部压力下不破坏同苏联已经签署的协定。”

我们党是这样揭露美国提供“帮助”的帝国主义性质的，它声明说，美国所有的贷款都不应该干涉或者是限制我们与其他国家贸易的自由，包括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在回答我们敌人关于“只有美国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论据时，我们没有表明，苏联已经为其他国家做到了这一点，还有我们也没有表明，在对苏联实行正确的政策时，是能够发展与苏联的有益的经济关系的，这对我们经济的复苏

将给予巨大的帮助。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占意大利的军事战略基地方面，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性，并积极揭露在这方面的任何一种企图。不久以前，我们揭露了美国海军部企图确保自己在意大利的海军基地一直到占领期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揭露美国人任意控制着位于亚得里亚海岸沿线战略要地的重要机场。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性，以便在提交批准书 90 天期满后，美国人没有任何借口在意大利保留美国军队。

我们坚信，我们党进行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行动，即便这些行动还没有表现出来，都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口头宣言和声明中，而应该表现在真正去动员广大的爱国人民群众的行动中，党是能够摧毁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和走狗的一切阴谋诡计的。

当根据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意大利的财阀政治集团的指令，意大利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的时候，我们党的领导机构将这个事实看做是异常严重的。在党的领导机构决议中说：这一排挤的事实“同时中断了国家民主制度的向前发展”。陶里亚蒂同志在立宪会议上发言时确定说，我们被排挤出政府也“暴露了意大利民主制度的深刻危机”，同时也是“共和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退步”。

的确，我们被排挤出政府这件事首先是出现在党的官方文件中，但也不排除，这是意大利反动阶层的要求。在党的日报和周报上，这样一种说法，即我们被开除出政府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和梵蒂冈提出了这种要求，而德·加斯佩里也情愿同意这个要求，立即被广泛地传播开并在数次群众集会上，在许多文章中被解释说明。

日丹诺夫同志在其报告中提到，德·加斯佩里的关于将劳动人民的代表开除出政府的决定公布之后，在群众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并成为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原因。日丹诺夫同志说，但是，非常

遗憾，群众的这种积极主动精神没有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应有的支持和领导。日丹诺夫同志做出了如下结论：

“共产党人过高地估计了反动派的力量，成为恐吓和帝国主义讹诈的牺牲品。他们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对于民主力量、人民群众捍卫民族的基本权利和本国利益的意志估计不足”。

这就是日丹诺夫同志对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方面的工作提出的批评。我们完全承认这种批评是公平合理的，并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批评。

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导人，重新审视了在危机发生前后这段时期里党的全部活动。

在党的领导机构致各级党组织的通报中指出：“在转向反对……时，全党总体上表现出软弱……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日报没有表明，在进行广泛的反对政府的运动中能够……我们对于‘反对’的理解是：进行一系列的演讲以及具有经济和政治性质的斗争，并能够允许广大的居民阶层表达自己反政府的立场，开展反对政府的行动。所采取过的行动大体上具有工会运动的性质：没有开展其他性质的行动。我们对于政府的反对立场，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口头性质多于斗争性质”。

在这封通报函中还说：

“处于反对派并不意味着等待政府由于议会联合而下台。反对派意味着：在国家面前应该经常提出我们反对立场的理由，应该以具体的形式提出这些理由，并争取使居民的大多数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些理由，并以这些理由为基础进行一系列宣传鼓动工作，最好是能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引起全国的注意并使整个国家处于反政府的状态”。

必须说明的是，在我们写了这些内容之后，意大利的局势有了很大的好转，正如党的领导机关所希望的那样。一系列演讲、游行

示威活动、夺取土地、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罢工，等等一些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政府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有机会在议会中掌握主动权并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的。

根据最近时期的无线电报道说，赞同这一倡议推翻政府的仿佛是所有的左翼政党，包括共和党和萨拉盖特分子在内，由于他们的不坚决和动摇，4个月前德·加斯佩里成功地将共产党人逐出了政府，自然，他们还没有表现出打算参加左派联盟。

我们将这一事实看做是在动员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德·加斯佩里政府反民主和反人民的政策，以及美帝国主义奴役意大利政策的斗争中，我们更坚决、更彻底的行动的初步胜利。这一成绩证明了，即使这是必须的，日丹诺夫同志对于我们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在过去，尤其是当德·加斯佩里决定将劳动人民的代表驱逐出政府的关键时刻，我们党行动的软弱性。

现在，请允许我回到报告中所触及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所持有的反对立场，日丹诺夫同志表示了惊讶。

因为我们担心，在情况报告中我们没有更清楚、更准确地阐述意大利的局势，或者也可能，我们还没有理解日丹诺夫同志在其报告中对于我们党的活动所做指示的意义和范畴，我们不希望，在这个对于我们党的直接行动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带着任何一种疑问和误解离开大会。

在报告中以及党致全体各级党组织的通报中，我们谈到了在议会计划中我们将达到的目标：

“组成这样的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应该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共和国的左派力量与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力量的代表一起，以民族统一联盟，或者是根据情况以民主联盟和共和联盟的形式参加”。

这个政府应该采取符合人民需要的坚定的措施，首先应该在最

短的期限内进行新的选举。

为什么要将基督教民主党的代表列入政府之中呢？要知道，这个党的代表曾经将我们驱逐出政府。

因为，在目前的议会制的意大利，不可能建立一个只有左派力量参加的、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府。

现存的基督教民主党左翼 6 个团体，在今天开始的议会斗争中，同意要求政府辞职，他们在立宪会议中占有 45% 的选票。

因此，只有左派力量组成的政府是少数派政府，自然，无论是从选票方面，还是从基督教民主党方面，或者是从右翼派别方面——自由党人、保皇分子和反动分子，这个政府都是行不通的。

在我们看来，左派政府中没有基督教民主党而有某些右翼派别参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从政治上拒绝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以有以下的选择办法：

或者是保持反对立场，冒险地面对德·加斯佩里联合政府，以及它的越来越坚决的具有反民主性质的方针和将国家变成美帝国主义附庸的政策；

或者是确定我们的工作目标：在国家被占领期间，通过非议会的道路来解决政府的问题；

或者是最终以我们事先拟定的方法解决政府问题。

我们党选择了最后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这种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是惟一可行的，是合适的。

这种方法可以使我们能够：

1) 正如所指出的那样，与左派政党和左派力量结成统一的反政府联盟，目前，这个反政府联盟能够进行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的斗争，但是，没有成功的十分把握。

2) 成功地粉碎美国打算彻底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的计划，

并以此使已经变成美国计划执行者的基督教民主党遭受重大的失败。

3) 在最快的期限内进行新的选举，并预先采取措施使选举不受基督教民主党的监督。

自然，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只是对于今天的议会状况而言，即目前在立宪会议中左派势力不占多数席位。如果在我们这里议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或者政治条件允许我们通过非议会的道路行动的话，那么，审视整个问题时，就可以依据建立同等的更彻底的民主政府的精神了。

在卡德尔同志的讲话中，在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批评时，并没有用明确的词句表达出来，我们也只好限于大体地说明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南斯拉夫同志提出批评的基本意思可归纳如下：

意大利共产党参加了联合政府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它不能利用自己已经参加政府的机会扩大和联合自己的力量，这是错误的。

意大利共产党没能扩大和巩固自己在政府以及国家机构中的力量，是因为它已经成为议会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幻想的牺牲品，是因为它不能协调好在群众之中同在政府和议会之中的行动。

实际上，卡德尔同志用最尖锐的方式，并以关于我们党的一些引文和资料为基础，对我们党工作中的整个政治和思想方针进行了彻底的谴责。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将卡德尔同志的全部意见一一谈出，因为没有时间和可以进行辩驳的必要材料。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的是：在对武装起义之后的意大利形势，以及这次起义创造的政治条件的整个阐述中，卡德尔同志既没有提到一个日期，也没有提到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日期

和事实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并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尽管只是在几周的时间里。

卡德尔同志没有指明，意大利是一个被英、美帝国主义军队占领的国家，在法律上处于停战状态下的国家，这给英、美当局和军队提供了最广泛的监督和干涉权力。

我们并不想以此来说明，在英、美占领的条件下，群众的任何一种行动都是不可能的、没有益处的，以及把任何一种可能性和在这方面的尝试，都看做是冒险和注定不成功的行动而应该加以拒绝。

指明这些完全具体的情况，我们只是想说，当回忆到党的 200 万党员、民族委员会和游击队的最初威望以及北方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时，必须将这些情况与同时具有的美、英和波兰的武装军队的数量相比，以便有可能客观地和准确地分析战后时期，首先是指可能利用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时候，意大利具有的政治条件。

我们认为在战后，游击运动的发展、实力和组成情况不允许我们冒险与英、美军队发生武装冲突。在这样的武装冲突中，人民的力量将有可能被消灭，而美国军队却可能找到借口长期占领意大利。

我们认为更加正确的是：利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发展全体人民的民主组织。

的确，将我们开除出政府使我们失去了政治阵地，我们不能顺利地实际参与恢复国家机构的工作。但是，均势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我们还拥有很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力量，它们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在继续发展着。

在这里承认在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中使用我们的力量还不算晚，这表明，尽管在两年期间我们只局限于开展演说活动，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而正相反，我们能

够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团结和组织起来。

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的军事占领近期即将结束，停战状态即将取消，这将给我们提供巨大的行动自由。关于目前在意大利出现的罢工、群众性政治游行示威、夺取土地，以及演说活动的报道表明，我们不能等到英、美军队撤离后，再开始更公开的政治斗争行动。在今年的整个一年里，首先是在最近几个月甚至是几周的时间里，我们将积极着手组织过去的游击队员，并打算将重要和迫切的政治和组织方面的任务赋予他们，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我们的目标和我们在意大利开展政治斗争问题上的计划。

明确这些看法之后，我们承认，根据卡德尔同志的讲话精神，在很多方面是可以批评和指责我们的。例如，由于意大利存在着英、美军队，我们使自己丧失了活动能力，尽管这更多的是由于局势使然。毫无疑问，我们在政府中的行动是分散的和软弱的。我们未能把在政府和议会中的行动与议会外的群众性的行动结合起来。

由于存在这些错误和弱点，毫无疑问，我们被迫做出了最大的让步，这比由于意大利局势的发展必须做出的让步要更大一些。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已经彻底地输掉了这场争取在意大利实现民主制度的战斗。今后还将面临这样的斗争，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拥有了十分明确的概念，即我们正在加快步伐走近这场斗争。中央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机构已经确定并指明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更严重的弱点。

我们十分坦率地承认，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和弱点的性质及严重性。我们感谢全体同志，感谢他们在本次会议上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帮助。我们将向我们党的领导机关汇报这次会议的结果。我们坚信，我们党将认真研究和领会你们的指示。

在我们党的重大的和飞速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我们犯过什么样

的错误，有一点我们能够使你们相信：

我们的党，尽管其大部分成员的党龄都不长，但它是一个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和陶里亚蒂同志周围的健康政党。我们党愿意忠于我们众多政党，首先是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忠于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时期能够在解放和发动本国人民的道路上前进的全体共产党。

对于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其他全体共产党和全体人民，我们党怀有国际团结的感情。

我们将战胜一切弱点，改正一切错误。我们坚信，我们党将尽一切力量，为实现由国际形势所确定的、日丹诺夫同志在其报告中出色地和准确地指明的那些任务而奋斗。

№11639

波普托莫夫在情报局 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波普托莫夫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保加利亚代表团完全同意日丹诺夫同志在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评价，同意报告中所做出的所有结论。

丝毫不能怀疑，在欧洲国家的上空笼罩着受美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威胁。

我们党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威胁，因为保加利亚处在巴尔干——战争贩子所青睐的地段之一和欧洲著名的“火药桶”之上。我们，巴尔干的民主主义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现在是与君主法西斯希腊和反动的土耳其为邻，这两个国家已首先“幸运”地处在“杜鲁门主义”的影响之下，完全奉行这一学说，这意味着它们已完全被奴化，已变成美帝国主义继续向巴尔干国家和苏联进攻的战略基地。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巴尔干国家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扩张的目标，同时也应成为进攻苏联和建立世界统治的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

为了这些目的，英、美帝国主义努力在巴尔干建立自己的统治，它们占领了希腊，并企图运用一切力量镇压争取自由和民族独

立的希腊人民的广泛的解放运动。此外，美帝国主义还利用无所不能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和下属委员会作为自己的经常性手段，以干涉巴尔干民主主义国家的内政，颠覆它们的国家制度，建立秘密的罢工和间谍组织，提出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干涉希腊内政这一无稽之谈正是为了实现这些黑暗的目的。现在，当美国人重新在联合国提出希腊问题，企图建立常设国际机构，准确说是美国机构，以观察和监督希腊北部边界“安全”之时，我们再次碰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固企图——利用一切可能的挑衅阻碍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发展和经济巩固，如果需要，则制造更为严重的巴尔干事件和冲突。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希腊形势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对巴尔干国家的危险可能进一步增长。在保加利亚南部边界和整个巴尔干半岛可以预料到会出现各种挑衅——直到严重事件。至今为止，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在巴尔干的阴谋均未得逞。美帝国主义对马歇尔计划的期望——诱骗新民主主义国家脱离苏联也化为了泡影。帝国主义分子对内部反动派的期望——制造巴尔干国家内部混乱同样也化为了泡影。帝国主义的走狗，德·米哈依洛维奇、尼古拉·佩特科夫之流，众所周知，下场都很惨。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国际调查委员会在巴尔干制造事端的阴谋也无结果。巴尔干各民主主义政府在所谓的萨洛尼卡调查分会上的教训——该分会越来越逢迎美帝国主义，它被禁止进入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挫败了美国人破坏巴尔干民主主义国家主权的计划。

当然，美帝国主义者这些失败丝毫不意味着他们甘心失败。不，他们现在只是变换了工作方法。他们开始从希腊派遣破坏分子，经常破坏边境，挑起边境事件。三天前报纸报道，一伙破坏匪徒和恐怖分子企图通过希腊边界潜入保加利亚领土，但我边防军及时发现并被消灭了。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希腊君主法西斯分子在希保边界的惯用伎俩就是恫吓，借此使我边界经常处于紧张状态。

对于这种讹诈，我们保加利亚人已习惯了。讹诈者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讹诈造成了边界的经常性紧张。

还应该指出，保加利亚人民民主的敌人正不懈地系统地实施诬蔑宣传。

众所周知，在美国正企图建立所谓的“绿色国际”，即“东方国家农民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公开号召人民民主国家的农民起来反对人民政府。这个宣言是费伦茨·纳吉、马切克^①、加夫里洛维奇^②、格梅托——米科瓦伊奇克的一个追随者和其他出卖者们签署的。

当然，这个美国“绿色国际”没有任何结果，但人民民主的敌人联合起来的事实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

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我们应大力加强宣传，揭露战争贩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建立美国世界统治的企图，使人民群众经常保持警惕、保卫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独立。

这一揭露宣传应具体，并针对具体事实：马歇尔计划，把希腊和土耳其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基地，诸如意大利和法国等许多国家受到经济奴役和政治依附的威胁，奴役西德和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等等。

我们认为特别危险的地区是君主法西斯希腊和土耳其反动派。在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挑动下，那里可能出现

① 弗拉德科·马切克，原克罗地亚农民党主席。自1945年起侨居国外。

② 米兰·加夫里洛维奇，原农民阵线总委员会主席，属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农民党。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

各种挑衅和意外事件。被英、美所奴役的希腊是破坏巴尔干和欧洲和平的最危险和最严重的策源地之一。

这一事实赋予我们，共产党以重要的义务，我们对英勇的希腊人民的解放斗争应给予全面的思想政治援助。

在我们的宣传中，我们应揭露美国奴役者在这个热爱自由的国家里的反动作用，揭露他们努力把希腊变成进一步侵略基地的企图。我们应该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帮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巴尔干民主国家保卫它们的独立和国家主权，揭露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希腊君主法西斯分子的不断挑衅。

在对待帝国主义分子和战争贩子上，各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必须做到完全意见一致和统一。在国际问题立场上，在捍卫民主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问题上，在外交上还必须相互支援。

已是让帝国主义分子和战争贩子明白的时候了：各民主国家不是分散的，它们是不可恫吓的，也不会被各个击破，它们是以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原则为基础的一个思想政治整体。

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合作和相互援助的政治条约。例如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条约中就规定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进行协商和合作。条约规定了“在对待希腊君主法西斯分子经常在边界挑衅的事情上，两国政府间密切接触和协商”的条款。

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季米特洛夫同志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成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人民之间真正友好和兄弟般情谊的宣言。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查的访问对进一步加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人民之间的友谊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斯拉夫人民和民主的非斯拉夫人民之间加强联系和友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我们以此挫败了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以“斯拉夫集团”、“泛斯拉夫主义”相威胁离间它们的企图。

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还应该得知，我们政策的中心应是动

员群众保卫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季米特洛夫同志不久前在告保加利亚人民书中写道：当务之急——这就是彻底确立我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并像保护睛珠一样保护它们，不允许帝国主义分子干涉我们的内政。

应当抨击帝国主义分子所拼命散布的理论：国家主权——这是一种偏见，似乎破坏主权是新时期历史的必然。

还应该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说明苏联是各族人民民族独立的强大捍卫者，反对美帝国主义霸占世界的企图。必须使我们每一个保加利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明白，苏联的政策完全符合保加利亚人民根本的民族利益。

从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我们还应该知道，如果我们不反对国内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它的第五纵队，我们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就不能成功。在我国，我们消灭了以佩特科夫反对派为代表的主要的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走狗。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消灭了保加利亚的第五纵队。我们不仅不能放松我们的警惕，反而应该加强警惕。

对于在祖国阵线内部表现出动摇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我们也应提高警惕，因为帝国主义分子一直企图争夺这部分人。

由于存在经常的危险策源地和来自君主法西斯希腊方面的各种突发事件，我们党应努力教育人民群众做好斗争准备，准备竭尽全力保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同志们，请允许我以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对联共（布）代表团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它在这次会议上对我们和所有的欧洲的兄弟的共产党所给予的帮助。我们将详细地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这次会议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将把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作为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基础，作为我们在人民群众中和党内阐

明国际形势问题工作的基础。

我们全党热烈欢迎在反侵略斗争中各国共产党紧密接触和协商一致。

我代表团完全同意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我们认为必须从这种批评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在我国要大力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11640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哥穆尔卡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同志们，波兰代表团完全同意日丹诺夫同志报告中对国际形势的评价。这一报告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挫败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仆从的计划如何组织更有效的行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辩论的基本核心，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内容。很清楚，各国最彻底的反帝的和平和民主力量——这就是共产党。毫无疑问，当世界范围里形成两个对抗集团——帝国主义集团和民主主义集团的时候，面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企图，某些国家共产党的策略问题不只是该党的内部问题，而应是所有党关心和讨论的目标。所以波兰代表团想对其他共产党的策略采取明确的立场。我们认为，我们对此有权就像所有其他党有权对我党的策略采取立场一样。我们大家都有权相互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尤其是评价某些党的策略，因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建设最巩固的反帝阵线和最大限度地加强欧洲和世界的民主力量。我们大家都与此事休戚相关。

波兰代表团想确定自己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策略的立场，同时我们意识到，由于没有深刻研究这两个国家内部形态的全部因

素，我们只能概括地评述它们的策略。

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是在比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的共产党条件恶劣得多的情况下行动的，它们已发展成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

我们不谈吉拉斯同志所触及的这两党在占领时期和盎格鲁—撒克逊部队进入法、意时刻的策略问题。在我们的情况报告里，我们顺便谈到，这一时期是加强工人阶级国家阵地的最佳时期。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犯了一系列错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的共产党也有错误。比如，现在我们看到，当时我们可以采取建立一个全国青年组织的策略，但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的错误没有造成过分严重的后果，因为我国有苏联军队这样一个强大的盟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除本国阶级敌人外，还加上一个强大的敌人——英、美军队。

但我们认为需要分析一下最近法国共产党的策略。法国共产党人犯了许多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对自己在政府中的阵地认识不足。他们可以不让把自己赶出政府，可以坚守保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党的阵地。应该清楚地和公开地把问题摆在工人阶级面前：美帝国主义者伙同法国反动派想把我们赶出政府。你们同意这样干吗？你们想同整个法国一起做美国资本的奴隶呢，还是准备反对这一点呢？我们认为，工人阶级将表示赞成斗争，不允许把自己的保护者和自己的代表赶出政府。法共没有这样做，这是一个很大的策略错误。

必须永远记取，防御立场是最不好的立场。

如果共产党不是通过革命道路而是通过议会选举争取参加政权，实际上这并没有改变形势。通过选票征得的阵地，应作为通过革命途径夺取的阵地来加以防御。

在指出必须号召工人阶级同反动派进行尖锐斗争的时候，我们不是想说，对于共产党人议会斗争是不屑一顾的，或可以不把其作

为斗争形式。谁也没建议盲动主义。但我们十分清楚，没有斗争便不能战胜阶级敌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这一斗争的最佳形式，为最能动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那些要求而进行这一斗争。

我们觉得，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经常听到所谓的和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这一和平道路影响之下的共产党的代表经常谈论这个。因此，应该强调，第一，人民民主国家和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同反动派做尖锐斗争甚至流血战争的道路；第二，只有党在政府和国家机关里有了巩固的阵地的时候才可言和平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面前的任务是夺取政府或参加政府。在目前条件下它们的策略归结为争夺议会选举胜利的斗争。但争取参加国家管理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选举斗争。而为使这一斗争有效，这一斗争应与群众的强大压力、与政治性质的罢工运动联系起来。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反动派企图封锁工人阶级走向政权的议会道路。隆哥同志告诉我们，意大利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担心意大利选举，因此正在拖延选举。根据我们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可以使反动派面临无法阻止的大规模劳动群众的压力，迫使反动派宣布选举。因为进行选举的要求是合法要求，实现这一要求的斗争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争夺政权的斗争今天要走议会选举的道路，那么这也是一条尖锐的阶级斗争之路。正如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党的实践表明的，只通过选举争取参加政权是不够的。应善于巩固和扩大已夺取的阵地。不同反动派做斗争，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最严重的缺点是它们在反动派进攻面前采取防御态度。这种立场有失去在人民群众中和工人阶级中影响的危险。这两党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没有同反

动派做斗争的明确方向。如果共产党不想失去工人阶级的信任，它应该向群众指明，它要带领群众奔向何方和走什么道路。

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向我们表明，对西方事态的发展不可有任何幻想，认为共产党人的让步和资产阶级的进攻在那里不可避免，认为美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将以某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增长是十分错误的。相反，如果正确评价个人的力量和敌人的力量，那完全有可能不仅制止住敌人的进攻，而且在公开的战斗中战胜敌人。显然，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想使西欧这些国家的事态进程发生根本变化，首先需要的是西方共产党的工作发生根本转折。所以我们大家都如此真切地讨论和批评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在最近时期里的活动。

法国同志们应该明白，我想他们已经明白，对于我们来说，他们的策略问题不是纯理论性质，而是涉及我们所有党和所有国家的生命的问题。我们可以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为例。假如法国共产党采取正确的策略。动员群众不让法国实施现在的对外政策，那么法国就不会屈从美国的压力了。我们大家知道，鲁尔区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对于我们大家有多大的危害。难道还不清楚吗，如果没有法国的同意，鲁尔区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堡垒将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如果法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政策，那法国的同意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如此看来，西方共产党的不正确策略是对我们大家的直接的和沉重的打击。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任务中，同帝国主义的斗争最重要。这一斗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的策略。

美帝国主义第一个瞄准的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它第一个想消灭的是共产党。但它的计划不只局限于共产党。美帝国主义想奴役和征服许多国家和民族乃至全世界。在这些条件下，共产党有最强大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潜在的同盟

军。这支同盟军——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非共产主义的民族力量，他们站在国家和民族主权的立场上，不想为美国的垄断资本服务。美帝国主义正在组织和准备战争。但美国人民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战争。共产党，作为争取和平的战斗的党，有可能把所有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吸引到同美帝国主义的作战中来。所以我们觉得，在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把同盟军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并制定一种能动员所有民族最广大劳动群众的斗争纲领。

我们很清楚布吕姆、贝文之流对待美帝国主义扩张的态度。因此我们应该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处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之下的群众，寄希望于一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我们可以吸引他们参加这一斗争。我们不该忘记，在一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由于只有工人阶级才可以领导这一斗争中的人民，所以我们主要关心的应是工人阶级的团结，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争取和平斗争中的团结。统一阵线的策略应是现阶段的主要策略，应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广大民族力量的基础。不能再回到只是自下而上统一阵线的老口号上去。统一阵线在社会党里层次越高，基层的统一阵线也就越稳。仅仅依靠共产党的自身力量，很难阻止美国资本的扩张政策和军事政策。这种从上层建立统一阵线的可能性，我们认为不仅人民民主国家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意大利社会党便是例子。如果法国共产党采取适宜策略，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基础上同部分法国社会党人建立统一阵线的前景是存在的。

我们认为，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党施加影响，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应把社会党的左派吸引到运动中来。对于社会党左派，应吸收他们参加行动并在国际舞台上充分使用他们。我们想强调，据我们的深刻认识，共产党同欧洲社会党左派的统一阵线对挫败美帝国

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意图有决定意义。

共产党成倍地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大大扩大了自己 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这是因为在占领时期它站在了同德国占领者斗争的前头。共产党今天拥有更强大武器，借助这些它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阵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同盟者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保卫本国人民主权的口号今天已成为共产党的一个主要口号。这一口号将为把自由民主主义分子甚至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集中起来和把他们推向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集团出卖民族主权的政策和斗争建立基础。今天，当保卫民族主权的口号阻碍美帝国主义扩张和成为工人阶级口号的时候，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被迫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使反动派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境地，使其不宜对共产党展开进攻。对于自己的出卖主权和卑躬屈膝的政策，美国垄断资本的反动走狗们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为共产党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民族战线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一事实，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帝国主义矛盾是建立这一战线的有利因素。

从宣传和组织的观点看，有相应准备的全欧各国反帝和反战运动可以采取全欧所有人民统一运动的形式。

波兰代表团在讨论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时得出了结论，由于国际形势严峻，在波兰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即

1) 我们应尽快消灭我国反对派的敌对策源地，尽快遏止罗马基督教的反政府的亲美的活动。

2) 对以各种体面借口向我国渗透的美、英间谍，应紧关大门。

3) 我们应提高警惕，做好组织准备，反对在我国扩大罢工行动。

4) 我们应进一步调整我们的对外政策，使我国尽可能不依赖于美国及其附庸。在这方面可起重要作用的是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

主国家的经济和友好条约。

5) 同美国在电影、书刊、杂志方面的思想影响，同我国广泛存在对资本主义西方的盲目崇拜做坚决的斗争。

波兰代表团认为，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重大的国际问题制约着事态的整个进程，同时它们也决定着各共产党的内部政策。

经验向我们表明，各共产党之间交流经验不足，相互影响和工作协调较差，其结果是有害的。毋庸置疑，假若我们党之间有充分的接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许多错误了，至少我们可以迅速地改正错误。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不能再容忍各共产党分散、工作没有联系这种状况了。波兰代表团认为，如果这次会议使全体同志们意识到国际形势的严重性，必须和可能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罪恶目的，如果这次会议使大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相信必须有明确和进攻的政策，同时建立起相互接触和协调的形式，那么我们的会议就完成了任务。

No 11641

雷瓦伊在情报局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雷瓦伊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1. 我想作一简短发言，因为我知道，与本次会议讨论的问题相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争议问题是第二位的。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匈牙利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总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合作问题的一部分。它还是我们能否忍受下述这种状况的问题的一部分：即在多瑙河流域某些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对抗，而英、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矛盾使这些国家相互对抗。

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准备使这些有争议问题服从于我们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

在几个月之间，在拉科西和法尔卡什同哥特瓦尔德会谈时，他们正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

2. 至于过去，无论如何我不想否认，斯兰斯基同志所说斯洛伐克人遭马扎尔统治阶级压迫达千年之久，这是对的。但不能忘记，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原匈牙利的南斯拉夫各省也有过这种压迫。

我还应该说，在最近一次战争期间，南斯拉夫各省的匈牙利人

比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人表现得还坏，但南斯拉夫同志们实行了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们不同的民族政策。

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同志们相比，捷克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解释他们反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政策的呢？

首先，他们解释说，匈牙利人和苏台德德意志人是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首要罪人。我应该说，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真正瓦解原因的非常片面的解释。难道可以只指责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而对捷克斯洛伐克反动的资产阶级和斯洛伐克法西斯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瓦解中的作用缄默不语吗？我担心这样片面指责匈牙利人会削弱对捷克，首先是对斯洛伐克反动派的斗争。许多斯洛伐克法西斯分子为了保存自己的阵地和政治影响，正是借这种反匈牙利人的情绪才隐蔽下来的。

3. 我不否认，在慕尼黑时期，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匈牙利人没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但也不能否认，也有少部分具有相当民主主义思想的匈牙利人曾准备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反对希特勒和霍尔蒂。众所周知，在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是在匈牙利族工人运动中有较大影响和有优秀干部。这些匈牙利共产党干部，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有20年，现在不被认为是拥有平等权利的共产党员，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不被接纳为共产党员。这里我应直言不讳地说，在斯洛伐克有一个匈牙利族共产主义者反法西斯委员会，该委员会得秘密从事工作，委员会成员常受到斯洛伐克反动派的迫害。难道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吗？

4. 但这里说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不想明白，现在是新匈牙利，应该找到同它友好和合作的道路。

巴黎和会决定把有争议的斯洛伐克匈牙利人问题提交两国讨论。但是，我们认为，从那时起，在匈牙利，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民主主义因素的变化。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这种

情况。

5. 斯兰斯基同志说，在匈牙利，斯洛伐克人没有民族权利（学校、报纸、组织）。我声明，我们愿达成这样的协议：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也得到居住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所拥有的权利。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有反法西斯的斯洛伐克组织，有斯洛伐克报纸，他们是匈牙利共和国的平等公民。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失去了发言权，而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有这种权利，他们大多数人都投票赞成共产党员代表，这些代表中也有斯洛伐克人。

6. 不能认为捷共和匈共之间现在的关系是正常的，尽管确实有一些改善。这些关系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捷共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没有邀请我党的代表出席，尽管我们两国是邻国。当我们问为什么时，捷克的同志们回答我们说，这是因为，被邀请出席捷共代表大会的全是斯拉夫国家和战胜国的共产党代表。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把共产党分成了战胜国和被战胜国的党。所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旧仇带到了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

尽管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没有邀请我党代表出席最近一次捷共代表大会，我党中央还是邀请他们的代表出席了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令人遗憾的是不仅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没有出席我们的代表大会，而且我们甚至没有收到祝贺信和任何对我们邀请的答复。

7. 我们觉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出自他们对斯拉夫团结问题的不正确理解。虽说我本人不属斯拉夫人，但我敢冒昧地说，斯拉夫的团结并不意味着民族的团结，它首先意味着的是走在社会进步前头的先进人民的团结。所以，不应该仅仅由于其他民主主义人民不是斯拉夫人，而把他们开除出斯拉夫人民的联盟。相反，应努力把其他人民纳入这一反对帝国主义势力

的民主主义的斯拉夫人民联盟。我觉得，对斯拉夫团结的任何其他解释都将导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8. 为了反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利益，应尽快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民主制度之间现有的争端。我在自己的情况报告里已谈了我们准备谈判的意见。我们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因三年来他们执行这种政策所遇到的困难。我们理解，出于内部政治的原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现在还没下决心彻底改变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但这一改变是必须的。

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准备在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原则的基础上，同我们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一起，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共同道路。

№11642

巴什特万斯基在情报局 会议辩论时的发言

(1947年9月26日)

绝密

巴什特万斯基同志的发言（记录稿）

星期二将在布拉格讨论同匈牙利和平条约的批准书问题。

和平条约第5条规定：

为解决按照1947年1月27日交换居民条约不属于被强行迁往匈牙利的匈牙利族出身的居民问题，匈牙利将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谈判。

如果从和平条约生效之日起六个月时间里，达不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有权请求外长会议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关于把20万匈牙利人强行迁出的要求，在和平会议上得到了维辛斯基以苏联代表团名义的支持，这一事实说明，我们的要求绝不是出自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利益。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声明，雷瓦伊同志的发言是违反和平条约的。首先令人吃惊的是他发言的格调。雷瓦伊同志这样描述事情，似乎这个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提出的。这是不正确的。这一要求已载入科希策纲领中，并根据哥特

瓦尔德同志的提议在莫斯科进行过深入研究。

至于和平条约，新民主主义的匈牙利也必须执行。

由于雷瓦伊同志谈到了斯洛伐克的匈牙利人秘密反法西斯组织的问题，应该向他指出，从我们掌握的文件材料看出，这些组织是反捷克斯洛伐克的。

雷瓦伊同志谈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忘记了其中也有斯洛伐克人。

我们对匈牙利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感到遗憾，因为这意味着修正和平条约的开始。更令人可悲的是：他们提出这一问题是在现在斯洛伐克形势恶化的时候，他们的倡议可能只有利于反动派。

假如我们同意从和平条约上让步，那么这将引起谁也不同意承担义务的结果。

在拉科西同志访问布拉格的时候，已同他约定，在适宜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将派自己的代表团去布达佩斯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直接谈判。

从雷瓦伊同志的发言中可以明白，匈牙利的同志们不想考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困难形势。

马林科夫同志：同志们，报名参加日丹诺夫同志论国际形势报告辩论的人均已发言。所以，现在我们停止辩论。有反对意见没有？建议通过。

现在有这样—个建议：下场会议于明天13时开始，而不是11时。届时我们听取报告人的总结发言和继续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反对意见？

会议于19时20分结束。

№ 11657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对日丹诺夫 报告的讨论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6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9月26日上午和下午的会议都用来进行讨论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全体代表团的代表都进行了发言。全体发言者一致拥护报告的全部内容，并声明，他们认为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所做出的结论，是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基础。各位代表根据自己本国的以及共同的发展经验，十分详细和丰富地论证了自己对报告的拥护。所有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都用大部分篇幅评论了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同时批评具有十分尖锐的性质，所有同志一致希望法国和意大利同志在最短的期限内改正自己的错误。这些党对于错误的分析是有非常高的原则性水平的。由于报告和大会上进行的辩论，对两国代表团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和思想压力。

杜克洛是从表示对报告的赞成开始的。他说，他完全同意报告对形势以及战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所做的分析。他非常清楚，法国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中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完全同意所确定的摆在法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

杜克洛说，对于我们提出了指责，说我们对杜鲁门—马歇尔计划揭发得不够。如果我们理解得没有错误，那么是指责我们缺乏勇气。

我们承认，对于我们离开（指被排挤出政府）的国际方面原因没有做充分的解释，尽管我们并没有沉默。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发现已经进行了很久的奴役法国的进程。我们应该做得更多些，以便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法国政治形势的主要方面上：即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以及他们在法国的代理人布吕姆、拉马第之流。从这个角度我们理解对我们的批评。

法国被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这将给苏联以及全体民主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有责任在这种危险面前做出一切结论。

但是，在讨论中对我们提出的某些意见，尤其是指责我们是有意地让步，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是有缺点的，但是，不应该指责我们没有做最大的抵抗。

我们同意，布吕姆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的这种说法。我们也一直在抨击布吕姆，多列士在所有的问题上对他进行过批评。有些右倾的表述，不是用于对布吕姆和社会党人，而是用于评价拉马第政府，该政府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反动。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美国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9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体会议上，对业已形成的局势进行了分析并认识到，我们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期间犯了错误并出现了动摇。最近我们加强了对政府的进攻。我们做得还很少，但是不应该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同意，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多些这样的说法。为保卫法国的独立和主权，我们应该做出最顽强的努力。面对即将来临的市政选举，我们正在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同时对布吕姆和拉马第之流展开了强烈的进攻。

在回答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时，杜克洛说，他们使用“政府党”这一表达方式并非是说，党要对拉马第政府所做的那些丑恶行径负责，而只是希望向人民说明，法国共产党是国内惟一能够管理国家的政党。

我们驳斥杜克洛说，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法国共产党没有在任何一份文件或者是领导人发言中做出过声明，说党与政府是对立的。杜克洛说，是的，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最初是动摇过，但是，后来他们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党确实是与政府对立的。

我们还指出，关于这一点应该在所有的通报中说明真相，而不应该对人民隐瞒自己的想法，并用“政府党”这样的表达方式将人民引入歧途。

杜克洛回答说，在来华沙之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拟定了改正错误的途径，政治局还委托形成决议，但是，在他们动身之前该决议还没有准备好。应该准确地制定出党的任务。我们一定做到这一点，并能够改变法国的政策，保卫法国的独立不受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接着，杜克洛谈到自己关于脱离莫斯科的报告的意见，他援引了多列士的讲话，并证明说，在这方面法国人没有过错。但是，他承认，应该更清楚地向人民说明真相，即在为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苏联的作用以及苏联政策的正确性。

在发言结束时，杜克洛声明说，法国共产党将从报告和对它的批评中吸取一切教训，并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能够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的。

此后我们请杜克洛更加明确地说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究竟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以及杜克洛从这些错误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杜克洛回答说，我们已经认识到，没有进行充分地斗争反对政府，究其根源是没有完全理解在法国形势的发展。很清楚，话题指的不仅仅是最后几个月的实际活动。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留在政府内的性质和意义。反动派的任务是改变政府中的力量对比以有利于自己。对于前途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不清楚如何建立一种平衡的

态势以有利于工人阶级。在我们的活动中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过于注重合法性，对议会充满了幻想。这些是我们错误的根源，随着共产党人被赶出政府之后，局势更加恶化了，这样更加重了这些错误。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应该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我认为，党的领导人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做深刻的分析，并让党和人民知道这种分析的结果并尽一切努力推翻拉马第政府。法戎和我已经共同商议过并决定，在返回法国之后，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提出所有这些问题，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如果我们在全党面前勇敢地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就能发展我们的事业，鼓起战斗精神，这是斗争必不可少的。法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应该做到，让这种思想为群众所掌握。我们党应该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我认为，我们党一定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对此你们应该信任我们。

隆哥的发言（意大利）

在自己的发言中，隆哥十分完整和充分地表示赞同报告的内容，并承认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关于隆哥发言的详细记录我们将利用9月27日上午的航班寄给您。在此我们只想简短地阐述一下隆哥发言的内容。

隆哥说，意大利代表团非常认真地学习了报告的内容，并完全拥护报告，认为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代表团完全同意报告对杜鲁门—马歇尔计划所做的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奴役欧洲的计划，并指明共产党在反对这一计划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代表团完全同意报告中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批评的内容。报告对于我们明确意大利共产党的任务、克服党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给予了

极大的帮助。因此我希望，隆哥说，我的发言仅仅局限在个别理由上，这并不是为了附加什么意见，而只是为了解释一些事情以及得到一些忠告。

意大利在三个方面遭到美国的进攻，正如报告中已经指明的那样。这种进攻尤其表现在思想领域里，在这方面的进攻是借助于电影、无线电广播和报刊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完全掌握在美国代理人手中。借助于散布关于虚拟的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准备侵略的谣言，以极其无耻的方式，广泛地对社会舆论进行恐吓。站在这场诋毁运动前列的不仅仅有向美国出售的黄色书刊，而且还有梵蒂冈。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一些报刊外，其余的报刊都在进行着诋毁苏联的运动。对此我们应该做出明确和强烈的反应。我们的党并不是经常能做得到这一点的。对于苏联取得的伟大成果我们宣传得不够，几乎忽视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成就。我们必须更加坚决更加彻底地执行支持苏联的政策。党中央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些缺点。此后出现了一些好转，但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完全接受报告人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大声声明说，我们支持莫斯科的和平民主政策，苏联的政策符合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的人民的利益，因而，这种政策也符合意大利的利益。我们应该更加广泛地宣传新民主主义国家所取得的政治和社会成就。

隆哥通报说，党准备利用即将来临的十月革命 30 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人民游行活动，以表达对苏联的热爱和感谢之情。

接着谈到美帝国主义在意大利的经济扩张政策，隆哥说，在这方面意大利共产党的行动是正确的，其行动正是依据报告所谈的精神进行的。我们党在报刊中，以及陶里亚蒂在议会的发言中，都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谴责。我们指出“马歇尔计划”意味着：1) 建立反对苏联的联盟；2) 将欧洲分割成两个部分，并用“铁幕”将这两个部分永远隔开；3) 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干涉欧洲国家的经

济生活，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4) 从政治上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希腊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

对于意大利来说，“马歇尔计划”的后果就是毁灭意大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中就是这样说明的。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与报告相符合的。波克同志在此就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对我们提出的批评是不正确的，这种批评与报告中的这部分内容是矛盾的。

我们有一个表述是应该受到批驳的，即意大利应该处于任何一个联盟之外。这样的表述是不正确的。意大利应该脱离帝国主义的联盟，并公开支持苏联的政策。赞同处于“联盟之外”这样的地位是不应该的。

接着，隆哥提出一个问题：驳斥“马歇尔计划”，是不是应该否决任何一种贷款？我不同意波克在此表明的观点。当这种贷款不会给我们的独立带来损失的时候，我们不能拒绝这种贷款。我们不能否决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思想，如果这种外国经济的参与不会给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带来损失的话。波克批评我们，她说，没有美国的贷款一样可以，这样美国人就不得不后退了。在此我应该明确一下，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的一切经济计划与任何一种贷款联系起来。我们国内有能力。应该动员国内的一切潜力，并发现被投机分子隐藏起来的财富。我们还对美国建议的“这种援助”的帝国主义性质进行了揭露。

隆哥说，意大利共产党对美国人在意大利保留海军基地和机场的企图进行了揭露。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性，以便在提交批准书90天期满后，美国人没有任何借口在意大利保留美国军队。

我们坚信，我们党进行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一切行动，即便这些行动还没有表现出来，都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口头宣言和声明中，

而应该表现在真正去动员广大的爱国人民群众的行动中，党是能够摧毁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和走狗的一切计谋的。

当根据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令，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的时候，我们将这个事实看作是异常严重的，并认为这个排挤的事实暴露了意大利民主制度的深刻危机。人民群众以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对此做出了回答，但是，非常遗憾，这些活动没有得到意大利共产党的应有的支持和领导。因此报告的结论说，我们被吓坏了，这种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完全承认这种批评是公平合理的，并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批评。

在共产党人被排挤出政府之后，我们重新审视了党的全部活动，并在给党的领导机构的通报函中揭示和指明了我们的错误。在这封信函中我们指出，不应该消极地等待议会联合后政府的辞职，而必须与其进行积极的、全面的斗争。

在这封信函之后，局势有了很大的好转，正如党的领导机关希望的那样。一系列演讲、游行示威活动、夺取土地、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罢工，等等一系列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是有机会在议会中掌握主动权并推翻德·加斯佩里政府的。所有的左派政党都会拥护这一点的。这是在与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德·加斯佩里政府，以及它的由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奴役意大利的政策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毫无疑问的成绩。这又一次证明了报告中的批评的正确性：如果我们从前的表现是另外一种样子，那么共产党人就不会被排挤出政府了。

在此隆哥打算回到自己情况的报告中，以便更加明确地答复当时报告人向他提出的问题，即：党是否有某种反攻的计划，或者党只是打算防御和后退。隆哥说，意大利代表团不希望带着任何一种

疑问和误解离开大会。

因为我担心，隆哥说，上一次我没有完全明确地阐述我们的立场，没有明白报告人指示的意义，我想谈谈我们党在近一时期的目标。其主要目标是——成立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应该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共和国的左派力量与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力量的代表一起以民主统一联盟的形式参加。这个政府应该采取符合人民需要的坚定的措施，首先应该在最短的期限内进行议会的选举。

为什么要将基督教民主党党员列入其中呢？因为在目前的六个党组成的议会中，基督教民主党占有45%的选票。仅仅由左派党的代表是不可能组成政府的：因为它得不到议会的支持。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是保持着对立的地位，等着反动派联合起来，或者是通过非议会的道路行动，但是，由于国家被占领这样做很困难。无论哪一条道路都不适合我们。我们选择了第三种使我们能够解决政府问题的办法：1) 与左派力量结成联盟；2) 粉碎美国打算彻底将共产党人驱逐出政府的计划；3) 在最快的期限内，在不受基督教民主党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新的选举。

如果在我们这里，议会是另外一种情形，或者政治条件允许我们通过非议会的道路行动的话，那么，审视整个问题时，就可以依据建立同等的更彻底的民主政府的精神了。

在发言即将结束时，隆哥声明说，党的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已经认识到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隆哥非常真诚地说，我们承认，报告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的全部错误并改正它们。我感谢报告人，感谢在此对意大利共产党提出批评的其他同志。我们将向本党的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汇报大会的决议，并对大会的指示进行认真的研究，使党的领导人掌握和执行这些指示。我们的党还很年轻，我们并不害怕所犯的错误，我们的党是一个健康的政党，其成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自己的领袖陶里亚蒂同志周围，并将永远忠诚

工人党、共产党情报局的筹备和建立

于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学说和斯大林同志。我们坚信，我们将战胜一切弱点，改正一切错误，我们党将尽一切力量，为实现国际形势报告中所确定的任务而奋斗。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6日

№ 11658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法共和意共 已承认错误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7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给您寄出关于对国际形势报告进行讨论的重要信息。从这份显然在稍晚些时候即可收到的信息中，您将看到，杜克洛和隆哥都承认了错误，并对提出的批评表示赞成，同时，杜克洛最初的承认是带有附加条件的，而隆哥则是无条件地承认。讨论工作已经结束。今天，9月27日，在大会对报告进行一致通过之后，我们计划成立由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制定报告决议的委员会。报告的结论部分将作为决议的基础，还要从报告中，以及讨论中摘取一些必要的内容以补充决议。现在我们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将对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批评的内容列入到决议中。正如您所记得的，在报告的结论中并没有提及这些错误。我们认为，不应该将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内容列入决议中。请给予指示。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7日

№ 11659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各党同意协调行动和 确定情报局驻地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7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您的关于赋予情报局协调行动的职能的指示已经收到。应该指出，全体代表团在自己的发言和谈话中，都一致赞同协调各党的行动。

今天，波兰人主动前来并通报说，他们已经解除了一切怀疑，并不再反对合法的情报局以及将情报局的驻地设在华沙。我们知悉了这个声明并通知说，我们将支持贝尔格莱德作为情报局驻地的建议。波兰人说，他们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已经就协调行动方面的问题预先与杜克洛和法戎进行了交谈，他们完全赞同我们的全部建议。今天，9月27日，将在会上对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问题进行讨论。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7日

№11643

日丹诺夫在情报局会议上 关于国际形势辩论的总结发言

(1947年9月27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7日14时开始。

会议主持人马林科夫同志：现在由日丹诺夫同志做总结发言。

日丹诺夫（记录稿）：

同志们，就国际形势报告交换意见是在很高的原则水平上进行的，表明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党完全团结一致，因为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同意报告的原则。

所以，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做总结发言了，我只想谈几点意见。

我认为，对于法国和意大利同志们关于会上对法共和意共活动的批评所作的声明，我们大家都深表满意。

我想表达在场所有同志们的共同意见，即我们殷切希望法国和意大利同志们在这里所作的声明能付诸实现。

我想我们大家都同意，由于问题涉及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事情就不是小的纠正和重点的变化，而是政策和策略的本质变化，是方向的重大变化。

这里我不想回到对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批评的话题，但为了彻底弄清问题，我想说，我们对杜克洛同志的解释，即他对法国共产党作为政府党所下定义并不是完全满意的。想成为政府党和真正

参加政府，这之间，有很大区别。不理解这一区别可能导致错误。如果法国共产党声明，它对现在的拉马第政府不负任何责任就好了。

杜克洛：请允许我打断您。对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并得出了深刻的认识，由于过多地考虑了使工人阶级对我们不理解的各种细节，我们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反对党的立场。^①

日丹诺夫：对杜克洛同志的声明我完全满意。完全清楚，关于不能唆使法共“去冒险”的声明也属于法共的这类错误，因为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策略和表明自己不想选择某种斗争形式未必合适。如果对敌人说，我没有武装，那敌人就会说——这很好，你更容易对付了。我将打击你，因为你虚弱。斗争的规律表明，受到重视的只是强大的敌人。我是这样理解的，杜克洛同志用自己的意见回答了这个问题。

从这里进行的辩论看出，所有同志们都明白，每个国家国内力量的对比都取决于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对比。因为我们正处在转折关头，所以存在着陷于死板公式的威胁。不能认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线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是同一走向。这样考虑是危险的公式化主义。我们已失去几个昔日的盟友，但我们不能惋惜失去叛徒。我们将找到新的盟友。我们明确的纲领将赋予我们新的盟友。

所以我想强调指出，诸如“右倾”、“左倾”、“民主党人”、“反

① 在俄国档案日丹诺夫的私人全宗文件中，保存着一份标题为“隆哥在日丹诺夫进行关于国际局势报告结论性讲话时的即兴插话”的文件。其中关于杜克洛的插话是这样记载的：“对于这个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很多，现在我完全可以确信，出于对待群众的态度方面各种细节的考虑，我们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应该立即对拉马第政府采取反对的立场，这样我们党的整个路线才会变成另外一种，变成正确的路线”。

“反动分子”这些概念，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可能是绝对的概念。真理是相对的，具体的。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现在。如果不指出这一战线经过什么点，哪些党是反动的，哪些党是民主主义的，就不能谈战线。对于转折关头，当力量重组时，这一点尤为正确。

拿左派问题为例。我们在辩论和报告中已表明，有左翼和“左倾”。众所周知，有愿同苏联合作的左翼，有愿为同苏联友好而斗争、为反对新帝国主义扩张而斗争的左翼，有愿保卫本国主权和独立的左翼。

我们有时认为，从表面上看，在我们最近的右翼永远是社会党人。但具体的形势可能把他们抛向反动的边缘。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你们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在论述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文章中说过，阿富汗埃米尔^①争取阿富汗独立的斗争比赞成帝国主义胜利的雷诺德尔^②之流的民主党人和“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革命。

具体的形势可能导致：社会党人不是出于恐慌，而是出于良心，在资产阶级最危急的时刻完成资产阶级的社会定货。法国的形势不就是这样吗？拉马第不就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一张王牌吗？可以找到这样的盟友，在政治力量分布图上，他们表面上还没有立即站到共产党的右边。如果一个社会党人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反对苏联，支持美帝国主义，准备出卖本国主权，此外，如果他不执行任何社会党的东西，这时他就是一个应对其直接开火（就像反对资产阶级一样）的敌人。

我们大家都想看到法国是一个繁荣的国家。但现在，在经过一

① 埃米尔，某些伊斯兰国家酋长的称号。

② 皮埃尔·雷诺德尔，法国社会党领袖。

切实验之后，在社会党对无产阶级完成所有出卖之后，现在清楚了，社会党作为一个爱国主义的民族党已经垮台，它已不能领导国家走上复兴之路。很清楚，统治阶级，其中包括社会党，正把法国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引向色当。

还不清楚吗？法国可以成为独立的强大的和主权的国家，但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或者它永远成不了这样的国家。我觉得前途只有一个。

对隆哥同志的发言谈两点意见。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那么隆哥同志是在说，意共中央 1947 年 8 月 16 日内部信件的意义就相当于这里，在报告中和辩论中，对意共活动的批评，该信已包含了这里所说的那些教训。如果我说的不对，我准备收回我的话。

隆哥：我之所以引用中央的信是想表明，我们已开始明白我们的错误。在同雷阿勒同志谈话之后和在辩论中我明白了，问题不在于我们工作的个别缺点，而是党的整个政策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我们要把这个意见向中央汇报，我相信我党领导将会同意我们的意见。

日丹诺夫：我想谈一下意大利政府问题解决的三种选择，隆哥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和中央信里都提到了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央不应急忙答应基督教民主党在政府里与共产党员共事。不值得对他们作这种预先许诺，我个人的意见是，在党的行动还未使国家新的力量对比形成之前不应急忙确定由哪些党参加政府。

当广泛的群众工作斗争中涌现出准备拥护共产党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的新的同盟者时，那时就会清楚，应该同哪些党或它们的哪些部分分享在政府的位子，分享将要杀死的熊的熊皮（笑声）。

我认为，对共产党进入政府还未表示出“基本热情”的基督教民主党应该得到一份批评。如果按照福音书说的行事，即为诅咒您的人祝福，爱憎恨您的人，当他打您右脸时也应把左脸给他，那么

应该给基督教民主党一份“基督教共产主义”，但它并不配这一礼物。也许我错了……

这就是我在自己的结束语里想说的几点意见。

在这里辩论中所表现出的意见一致意味着，尽管我们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联系已中断很久，在对形势理解上我们又形成统一的意见，又恢复了我们对任务和目的的理解。这证明了我们运动的强大力量。我们确定，我们各国不管以什么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但在任何地方，历史发展的动力都是无产阶级及其先进的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先进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即真正人类文明的代表者的先锋队的积极斗争。

这里表现出来的和把代表着1500万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各党代表团联系在一起的战斗精神和团结精神使我们充满信心，在未来的战斗中，无论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工人阶级都将以胜利者的面目出现。

马林科夫：鉴于辩论的结果，我可以明确地说，所有代表团的共同意见是这样的，我们的会议同意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我提请会议批准的正是这一建议。另一方面，联共（布）代表团建议现在由会议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今天可根据我们同意的报告和辩论草拟国际形势问题决议。如果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可按下述形式组成委员会：显然，报告人日丹诺夫同志应作为主席进入委员会，每个代表团推荐一名代表进入委员会。我们的建议就这样。请同志们对此发表意见。

反对意见没有。现在提出进入委员会的代表名单行吗，还是同志们商量以后等会议结束时再提出？

大家表示愿意立即任命委员会成员。被推出参加委员会的是：日丹诺夫、隆哥、法戎、明兹、马林科夫、哥穆尔卡、斯兰斯基、雷瓦伊、契尔文科夫、德治。

马林科夫：这样，我们结束了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首先我们转入下一个问题，联共（布）代表团请求由其他某个代表团的同志继续主持我们的会议，我们在第一场会议上已约定好了这个条件……（笑声）

在座的有人提：卡德尔同志！

马林科夫：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建议委托杜克洛同志主持会议。

一致赞成杜克洛同志担任会议主席。

№ 11644

哥穆尔卡在情报局会议上 关于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发言

(1947年9月27日)

绝密

会议主持人杜克洛同志：

按照议事日程，下一个由哥穆尔卡同志发言。

哥穆尔卡：会议期间，各代表团在自己的情况报告和就日丹诺夫同志报告所作的发言中都强调指出，各共产党之间必须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会议期间已完全表明，战后各兄弟的共产党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交换这些经验是可能的，并能够相互丰富各党的工作，改进各党工作。另一方面，也表明，各党工作不一致也带来了消极后果，而各党之间不定期的偶然的接触形式是远远不够的。解散共产国际带来了积极的结果。但共产国际解散后的4年实践表明，各共产党之间没有定期接触也给它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不正确的估计和政治错误。同时也清楚了，虽说各共产党是在本民族土壤上发展的，它们也有共同的利益和任务。很清楚，某个党的不正确估计和错误，不仅给该党带来危害和损失，同时也给其他党带来损失，所以所有党都关心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接触。缺乏接触已成为不可忍受的，尤其是现在，当美帝国主义的公开扩张政策使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首

先是针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其目的是消灭全世界的民主运动和奴役所有独立的国家。

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共产主义者应努力做到团结所有的民主力量、领导广泛的斗争运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占领计划和不给它奴役欧洲的可能性，这一历史责任落到了各国共产主义者的肩上。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的会议应该解决各共产党，首先是参加本次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组织形式问题。

我们建议解决出席本次会议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问题。除交换经验的职能外，这一情报局还应赋予在必要情况下按照自愿原则协调各共产党行动的职能。本次会议就是可以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范例。在此次会议上，我们听取了情况报告，对国际形势问题和各共产党的策略达成了共识。很清楚，我们会议的结果将成为各党工作的指导原则。

我们建议，情报局由出席本次会议的每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各中央委员会可更换自己的代表。我们不建议立即解决代表人选问题。这应由各共产党中央在听取了本党代表团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之后再做出决定。情报局，正如我们建议的，应3~4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在需要解决重要和有争议的问题时，可随时召开，就像这次会议一样，主要工作是在定期的情报局会议，即各共产党中央代表会议上进行。但显而易见，为组织各共产党之间交换情报材料和为保障情报局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需要有一个不大的辅助机构。

情报局要建立自己的机关刊物（半月刊，随着可能，出周刊）。这一刊物应成为相互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工具。在挑选杂志材料时，应确立这样的原则：涉及某一国和由该国党中央批准的材料，基本上不加改动照样刊登，而论述国际形势和个别国际形势问题的材料，由杂志编辑部按照情报局的指示解决。机关刊物用俄文和法

文出版，随着可能也用其他文字出版。为完成自己的任务，机关刊物应得到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积极而认真的配合。很清楚，如果我们只是指望编辑部，那么机关刊物便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各中央委员会都有义务给编辑部提供系统的材料。杂志头几期主要内容是本次会议的材料。我们建议，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尽快整理自己的发言和报告，以便刊登之。^①

情报局应有日常驻地，日常驻地设在何处，我请同志们发表看法。按照我们的意见，这一日常驻地不宜设在莫斯科，以便不给所谓的莫斯科的压力等类似的诬蔑提供口实。应确定召开情报局第一次会议的期限在11月底，最晚不迟于1947年12月15日。^②

我们建议把成立情报局辅助机构和情报局机关刊物编辑部的任务委托给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日常驻地所在国的共产党中央。情报局在其第一次会议上批准编辑部的最后组成。

我认为，情报局和出版机关的建立将大大帮助各兄弟的共产党实现它们所承担的责任。

杜克洛：我们听了哥穆尔卡同志的报告。还有辩论发言的吗？

吉拉斯：南斯拉夫代表团同意哥穆尔卡同志的所有建议。因此，南斯拉夫代表团以南共中央的名义认为，贝尔格莱德可作为日常驻地，那里可保障情报局的工作。

日丹诺夫：好主意！

① 会议之后，经过整理的各国党代表报告的文本和经过删节的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文本，发表在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第1期。

② 这次工作会议于1948年1月18日召开。会上研究审查了关于组建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及其拨款的问题。确定由苏联的哲学家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尤金担任刊物主编。

杜克洛：还有其他建议吗？

契尔文科夫：我们同意南斯拉夫同志们的意见。

一致通过吉拉斯同志的意见。

马林科夫：我觉得，可以同意哥穆尔卡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承认建立情报局是适宜的，赋予它交流各共产党工作经验和在必要时实施协调的职能。

如果同志们不反对，可以委托匈牙利、南斯拉夫、法国和联共（布）代表团的代表在下一场，可能是我们本次会议的最后一场会议之前，参考已通过的建议准备这一报告的必要决定草案。

杜克洛：各代表团同意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吗？

马林科夫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杜克洛：还有什么建议吗？

马林科夫：显然，我们目前的事是出版本次会议工作情况的公报。从我们方面讲，我们认为，公报不应立即发表，而是在各代表回到祖国之后再发表。

如果我们的建议被通过，那么在明天会议之前可拟定公报草案，这一工作可委托我刚才说过的代表团完成，草案在明天会议上批准。

杜克洛：对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有反对意见没有？

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隆哥：众所周知，本次会议文件在某种程度上要在情报局机关刊物上发表。

但现在能否得到这些文件呢，以便我们按照这些文件向中央汇报此次会议的工作？

日丹诺夫：我建议秘书处拿出自己的意见，在明天的下一场会议上提交给我们。

关于下一场会议的时间，我觉得，这应委托杜克洛同志决定，

以便他有权根据相应文件草案的准备情况决定下场会议的开始时间。无论如何，这里说的是明天的会议。（笑声）

会议于15时结束。

№11647

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 制定委员会的讨论记录

(1947年9月27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7日23时开始。

会议由日丹诺夫同志主持。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马林科夫同志、明兹同志、斯兰斯基同志、卡德尔同志、法戎同志、隆哥同志、契尔文科夫同志、德治同志、雷瓦伊同志。

日丹诺夫：让我们开始委员会的工作吧。首先，我们必须就委员会工作的方法和程序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工作方法已经由大会确定了。大会所确定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应该以报告内容和对报告的讨论为基础着手工作。我个人想提出以下的建议：将经过相应修改和补充的报告的结论部分，作为我们的草案的基础可能是合适的。很想听一听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法戎：我提议接受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况且，这些结论是对整个报告的总结，是可以将他们作为基础的。

日丹诺夫：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报告只是大体上包括了结论部分的论据。如果以某种形式并做一些相应的删减，我们就能够顺利地公布报告本身的内容，那么，这个难题就可以解决了。我认为，

如果大会认为可以公布报告本身的内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充分完成我们的任务，因为报告与结论是相互对应的，仅仅结论一部分内容是不够的。

法戎：整个报告还是报告摘录？

日丹诺夫：看来，我们不得不做摘录。

法戎：如果我提出这个问题，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报告的一部分内容比另一部分内容重要。在与杜克洛同志交换意见之后，我们俩人都认为，报告对我们党进行批评的那一部分内容，是不完全适合发表的。

涉及到报告对我们党的活动进行批评的那部分内容，是可以发表的，但不是作为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内容或者是会议决议的内容，而是作为我们党本身进行的自我批评。我认为有这个补充说明，报告是可以发表的。

日丹诺夫：显然，法戎同志没有理解我。我建议发表的正是报告的某些内容。涉及到报告中的批评内容，尤其是对法国共产党的批评，考虑到所叙述的内容，可以把这部分内容看做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我们已经决定作为决议基础的结论中，这些批评意见是不会出现的。

卡德尔：我也打算说出法戎同志所说的意见，但他抢在了我的前头。如果对法国同志的工作所作的批评意见进行公布，这可能会给法国共产党的活动增加困难……

日丹诺夫：自然，在没有附加文件的情况下，公布这些批评意见可能会造成一个片面的印象……

卡德尔：……所形成的结论是完全符合决议的。

日丹诺夫：因为从交流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因而也可能，应该转入讨论我们工作的程序问题。是否有反对意见？没有。我们是否应该宣读一下文本，然后对每页进行讨

论？同志们希望怎么做？

马林科夫：我觉得，可以有两种方法：或者是，如果我们一切都准备好的话，可以一边读报告的内容，一边进行修改；或者是，现在我们只是明确一下决议的基础，然后，我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自己的建议，明天，大约 12 点钟我们重新开会，到时再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的建议的话，那么我们也无法更有成效地工作。

日丹诺夫：同志们是如何考虑的？马林科夫同志提议，准备好修改的内容并在明天的会议上提出来。

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

日丹诺夫：我们必须指定下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显然，我们需要大约两个钟头。请秘书处通知我们，在准备好决议草案之后，如果决议文本可能不超过 5~6 页，那么打字和将其发给会议各位代表，需要多长时间？

巴拉诺夫：5~6 页，并不是很大的文件。可能只是翻译时会耽搁一些时间。总共需要大约两个小时。

日丹诺夫：那么，我们可以在 11 点钟开会。

建议被接受。

日丹诺夫：请同志们准备好对决议草案的修改内容。

会议于 23 点 15 分结束。

№11648

情报局会议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 制定委员会第二次讨论的记录

(1947年9月28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8日11时开始。

会议由日丹诺夫同志主持。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马林科夫同志、卡德尔同志、斯兰斯基同志、明兹同志、法戎同志、隆哥同志、契尔文科夫同志、德治同志、雷瓦伊同志。

日丹诺夫：请允许我宣布会议开始。我们是否对决议草案进行逐页的修改？首先作为“结论”，应该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会议就国际局势问题的决议”。这是标题。

请对第45页进行修改。

法戎：我发现法语文本里的第一句话没有决议的性质，建议用日丹诺夫同志报告里的第一句话代替这句话。

斯兰斯基：内容是相同的。

日丹诺夫：有细微的差别。在结论中谈的是，战后国际形势中发生的变化，而在报告中，对于因为战争的结果而发生的这些变化进行了分析。

也可能我们可以这样进行表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的发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样一来我们就顾全了两种含义。

法戎请求明确法文的表达方法。首先将文本译成法文，然后由委员会进行审批。

隆哥：也可能应该写一个小小的引言。这样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各国共产党（所列出的）代表在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之后，一致赞成如下结论”。

这样的引言可以赋予各国共产党的协议以一种自愿的色彩。

日丹诺夫：我想，这是可以接受的。

法戎：我提议：“……一致达成如下决议”。

日丹诺夫：这也很好。

批准这些句子。

隆哥：提议将“决议”这个词换成“宣言”。

法戎：赞成这种修改。

日丹诺夫：那么就用“宣言”代替“决议”。

对于这页还有其他意见吗？

法戎：应该对译文做相应的修改。

日丹诺夫：关于译文的问题可以在会下解决。

隆哥：我理解，关于译文的问题不是本次会议的内容。我建议委托法戎同志和一位俄罗斯同志对两种文本进行协商，因为对于法国同志和我们来说，法语文本更重要些。

日丹诺夫：我们委托秘书处在会议结束之前准备好两种文本，我们将在会上对其进行批准，使两种文本都成为正式的文件。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对45页的修改。请对46页进行修改。

契尔文科夫：提议在“……反对马歇尔计划”一词之后，指出

希腊，例如：“……厚颜无耻地干涉希腊内政”。

日丹诺夫：对这样的修改我有些疑义。如果我们将希腊列入其中，那么我们的决议就将拥有超出欧洲范畴的性质。如果我们将希腊列入其中，那么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将中国以及美帝国主义正在肆虐的那些国家列入其中。总之，我认为，我们的决议应该适合对国际形势所做的判断。

德治：罗马尼亚已经采取了帮助希腊人民的具体措施。我们已经成立了有著名大学教授参加的全国援助委员会。我认为指出帮助希腊共产党是其他各国共产党的义务，但不将这一点写入决议中是适宜的。

卡德尔：建议对第47页做修改，在括号中指出：希腊、中国等。

日丹诺夫：我们的决议不仅仅是策略性的文件，因此这个决议不应该只包含今天的情况。我们决议的出发点是，对希腊、中国的侵略仅仅是总侵略的一部分，这种侵略很快就可能播及到苏联、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等国。我们不应该给美国帝国主义以借口，让他们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侵略计划，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准备的更广泛的侵略。

法戎和卡德尔与日丹诺夫同志进行协商。

日丹诺夫：在希腊问题上我们已经拥有明确的立场，我们一直遵循这种立场。与过去所做过的相比，我们还没有想出什么新的办法。

法戎：建议向各国共产党作详细的解释，帝国主义阵营正在哪些方面进行活动。

日丹诺夫：我们应该写到：“这种侵略活动正在各个方面同时展开——在军事战略措施方面、在经济扩张方面和思想斗争方面”。

隆哥：建议在句子中列入右翼社会党人，增补句子：“……意

大利的萨拉盖特”。

建议被接受。

日丹诺夫：我应该通知委员会，匈牙利同志建议在布吕姆之后补充上拉马第。但是，要知道拉马第并不是社会党的首领，而是一个傀儡。我们已经提到过他，这样就足够了。我认为，法戎同志应该在我们中间起到仲裁人的作用。

法戎：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提到拉马第，因为在下一页还要提到他。

日丹诺夫：对第 48 页的内容做如下的修改。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句话应该删掉，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笑声）。

接着明兹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建议回避“除……国家外”这句话，因为“除去”这一词包括很大数量的国家，我同意他们的修改意见。

雷瓦伊：建议用“应该结成”替代“结成”一词。否则，可能会理解为：在这些国家里已经不存在右派社会党人了。

日丹诺夫：我不同意。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尽管或多或少有些艰难，但社会党人仍然处于与共产党结盟的状态。这样一来，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的社会党人和在西方国家里的社会党人，在行为上总是有差别的。阻止某种倾向性更加重要些。我们有办法阻止社会党人滑落到右倾一边。为了使匈牙利同志心安理得，我们也可以在前一个句子里加上“所有”一词。

卡德尔：无论哪一种表述都不合适。第一种表述不合适是因为，这种表述只适合于波兰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对于保加利亚来说这种表述完全不适合，在罗马尼亚社会党人也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建议说：“可以建立……基础”。

日丹诺夫：这样就取消了整个句子！我反对这一点。我们的决

议的重要因素是反映出各个国家的特点。如果接受了匈牙利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那么就是说，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英国与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情况也没有任何差别。但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有责任考虑各个国家的发展特点。

“应该”或者是“有可能”这样的表述意味着，在任何地方还没有出现联盟，而这是错误的！

也可以说“在那时，正如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

还有一种修改是可以接受的：用“在所有的国家里”取代“在这些国家里”。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最大限度的让步。（笑声）。

明兹：建议保留“在这些国家里”。

日丹诺夫：那么取消我的修改意见。在存在着离心力的社会党人那里，与他们保持联系对我们更有利些，不但如此，整个决议还声明，右翼社会党人是多么的危险。

斯兰斯基：支持明兹同志的建议。

雷瓦伊：我不否认，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社会党人和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党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恐怕明兹同志是以波兰的情况为出发点的，在波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事情进行的基本不坏，而在匈牙利，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正在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日丹诺夫：将出现动摇现象。这对我们有益。我坚决反对你们的修改意见。我们的全部策略的出发点应该是：考虑社会主义政党的阵营里的立场的差别，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对待它们，无论是在新的、旧的，还是在最新的民主主义国家里。

交换意见的最后结果是批准了该段落的最终表述。

法戎还谈到，在法国很难将左翼社会党人与右翼社会党人区别开。

日丹诺夫：对于居伊·摩勒我们在此没做任何说明。应该将他

归入哪一类，你们自己会清楚的。

法戎：当法国工人看到这个决议时，他们会想，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被他们自己看做是右翼分子的社会活动家。

我提议指出：“……首先是法国的社会党、英国的工党等等”。

明兹请求法戎不要坚持这种修改。当我们谈论右翼社会党人时，我们可以把南尼的党作为一个例外，而对于居伊·摩勒，应该由法国共产党人自己指明他是右翼分子。

隆哥就这个问题建议将“法国社会党人”改为“法国社会党”。这样就能够使人明白，所指的还有居伊·摩勒和其他一些人。

马林科夫反对这个建议。

日丹诺夫还提到由于持有左倾观点而被开除出社会党的法国社会青年。

法戎建议只提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这样，就可以解除普通社会党人的责任。

日丹诺夫：我们不能局限于指责一些领导人的行为。我觉得，给党推卸责任是不正确的。

委员会批准了最后的文本。

日丹诺夫建议将“兄弟”这个词全部取消，以便不使人理解为：宣言的基础是一个“兄弟”共产党的代表给其他一些“兄弟”党的代表的报告。

该建议被接受。

明兹建议找一个词来代替“共产党”这个词；否则波兰党就得换章程了。

日丹诺夫：这是毫无办法的！

日丹诺夫提出对文本的第49页做如下修改：用“一致赞同”这个词代替“共同的”，以便使决议不被理解为，是某个惩戒机构强加的。

该修改意见被采纳了。

隆哥：建议对文本的第50页做如下修改：用“政府的”这个词取代“国家的”一词。

根据日丹诺夫同志的建议，最终被批准的文本作了如下的修改：“在国家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等方面”。

日丹诺夫：关于文件的签名问题，建议在大会上达成一致意见。

法戎：至少有一份文件应该是签名的。

马林科夫：这句话是不是说，应该公布带有签名的这份文件。这将取决于其他文件。

卡德尔和契尔文科夫表示赞成发表带有签名的文件。

日丹诺夫建议这个问题应视公布其他文件的情况而定。

委员会决定，宣言文本应该签名。

斯兰斯基：什么人可以看这份文件？

日丹诺夫：您说的是报告还是决议？谈到报告，那么，这个问题应该由相关的各党中央委员会来决定。但无论如何，还是小范围内的人。例如：能够了解日丹诺夫报告内容的是政治局委员。至于说到决议，那么，在发表之前，相关各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将决议给它认为需要的那些人看。

卡德尔：最好是将公报、宣言和报告同时发表。

日丹诺夫：如果同志们希望这样，我可以采取措施，准备将报告与公报和宣言同时发表。尤其是我们还要在自己的通报上发表这个报告。

斯兰斯基：最好是在一周之内发表。否则材料将会“过时”。

日丹诺夫：也许我们现在可以约定，等报告一准备好，我们立即将它与同公报和宣言一起交付发表。

卡德尔支持这个建议。

日丹诺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使每个党尽可能快地得到这三份文件。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将报告整理好以便发表。

法戎：建议确定一个统一的日期，在所有国家发表这些文件。

日丹诺夫：同志们的意见可归结为：这三份文件应该同时发表。我们应该将这个意见向大会报告。

隆哥：建议将发表文件的日期定为星期日——10月5日。

日丹诺夫：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我们就在下个星期日发表。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马林科夫：也许我们可以约定如下：散会之后，大家分头去准备报告。然后，由三个代表团：大会的倡议者波兰代表团、情报局驻地设在其境内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和联共（布）代表团，将这些文件分发给各国共产党，使他们能够在10月5日星期日发表这些文件。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可以保证从莫斯科发送出这些文件的。

马林科夫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

卡德尔：我们请求联共（布），在出现困难而被耽搁的情况下，通知我们。

马林科夫：应该赋予三个代表团进行个别修改的权利。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

法戎：在下个星期日发表，可能指的只是两个文件，而并不包括报告。同时公布三份文件，对于报刊可能会很困难。最重要的是，公报和宣言能够在同一天发表。

日丹诺夫：我们将同时分发所有的文件，而关于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样的顺序进行发表的问题，可由同志们自己决定。

马林科夫：如果我们保证在星期五将文件送达目的地，那么是可以在星期日发表的。如果出现某些没有预料到的困难的话，那么

就不得不拖延一些时间发表了。

委员会决定，各国共产党都将得到报告的俄文文本和法文文本，发表的时间不能晚于两个星期。^①

会议于13点50分结束。

^① 事实上，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直到10月25日都没有刊登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苏斯洛夫在当天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非常气愤地通报了这件事，并建议“询问多列士和杜克洛关于没有发表日丹诺夫报告的原因”。

No 11645

各国党代表在情报局会议上 关于会议宣言、决议和公报草案的讨论

(1947年9月28日)

绝密

会议于1947年9月28日17时15分开始。

杜克洛同志主持会议：

我宣布会议开始。根据会议日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会议的宣言草案，由日丹诺夫同志讲话。

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会议决议草案，委员会决定以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总结作为基础。

我将直接转入委员会所作的并通过的修改内容。

第一，委员会给出了新的标题，用“宣言”这个词来替代“决议”。这样一来，文件就具有了如下标题：

“……会议宣言”。

接着委员会又补充了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将是宣言的第一段，并以如下形式表述：

日丹诺夫同志开始宣读宣言第一段落的内容。

委员会还对下一个段落的第一句话进行了修改，在最后定稿时我将宣读修改的内容：

(日丹诺夫同志开始读这句话)。

对结论的第一页做了修辞方面的修改：将以下句子划分为独立

的一个段落：（开始读这个段落的内容）。

在第二页的第三段里，补充了一句话：“这种侵略活动正在……展开”。

对结论部分第三页的最后一段做了修改：由“占有特殊地位……”一词开头的那句话，划分为单独的一个段落。在同一页的这个段落之后补充：“在‘……奥地利的塞尔夫^①’后面补充：‘……意大利的萨拉盖特’等等”。

在第四页的第一段，“共同的”一词用“一致赞同”一词代替。

在第四页的最后一个段落，同宣言的整个文本中的内容一样，删掉“兄弟般的”这个词。

在第六页在“……国家的”一词后面补充：“……政治的”一词。

以上这些就是委员会做出并通过的修改内容。

杜克洛：是否还有同志希望就委员会的报告谈谈自己的看法？

委员会的建议被一致通过。

日丹诺夫：委员会得出结论，应该签署这个文件。如果会议同意这个建议的话，那么，出席本次会议的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应该按照标题上所列出的顺序签署宣言，具体的是：

南斯拉夫共产党——爱·卡德尔同志和米·吉拉斯同志；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和弗·波普托莫夫同志，等等。

杜克洛：对于签署宣言的建议是否还有反对意见？

建议被一致通过。

杜克洛：根据会议日程，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协调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决议草案。由哥穆尔卡同志讲话。

^① 阿道夫·塞尔夫，奥地利社会主义党主席，联邦政府副首相。

哥穆尔卡同志开始宣读决议草案。

哥穆尔卡同志通报说，委员会讨论了关于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名称问题，但是，就这一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将下列名称提交会议审批：

《人民道路报》，

《人民战斗报》。

斯兰斯基对决议的第一句话提出了修改的建议。

隆哥：对于草案我有两个意见：第一，并不是参加会议的所有党都称为“共产党”，而决议中都谈的是共产党。第二，在决议草案中说，情报局是由参加会议的各国党的代表组成。应该去掉这个建议或者是在决议草案中指出，其他共产党也可以参加情报局。

日丹诺夫：在我看来，可以接受斯兰斯基同志的这个建议。涉及到情报局的组成问题，那么在决议中是说，情报局是由参加本次会议的各国党的代表组成。我不怀疑，会议的结果将会引起其他共产党的兴趣，他们就会提出询问，到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应该组成情报局，而不急于考虑其他共产党。我们是情报局的创立者，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形成情报局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说，应该吸收所有其他的共产党参加，尽管我个人认为，稍后会有许多共产党加入我们之中。

杜克洛：日丹诺夫同志建议接受斯兰斯基同志的修改意见。谁还希望谈谈？

吉拉斯：我同意这个修改意见。

斯兰斯基同志建议的表达方式，在最后校订时被确定下来：

“会议宣布，在目前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

明兹：建议在决议的标题中删掉“共产主义的”一词，而只保留“党”这个词。

日丹诺夫：抛弃共产党员，而留下党……（笑声）。

明兹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

马林科夫：建议把第四条中“下设”一词换成“下设”一词。^①

杜克洛：我建议把决议案提交表决。一致通过。

日丹诺夫：请求进行一个不大的修改。

在文件中，与同志们的姓并列的还有名字的第一个大写字母，在第二页上就没有这个字母了，而我和哥穆尔卡同志都失去了名字。请求将名字还给我们（笑声）。

杜克洛：是否还有什么意见？

一致确定文件的文本。

杜克洛：第三个问题——秘书处的通报——由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发言。

萨姆布罗夫斯基：会议记录是由秘书处起草的，包括所有会议的按日期的记录，会议听取的各个报告和发言稿的完整记录，根据报告所做出的相关的决议和公报。对于杜克洛同志和隆哥同志的报告和发言稿，以及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报告”的结论性的发言，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提请批准会议记录。

根据秘书处的意见，必须建立以下保存和使用会议文件资料的制度：

1. 在成立情报局工作机关之前，将会议记录保存在联共（布）中央，并委托联共（布）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建立情报局的辅助机关。

^① 马林科夫这里的建议只是一个修辞问题，即将俄文反身动词 *иметься* 换成及物动词 *иметь*。

2. 考虑到关于各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可能暴露出本国党的一些战略计划和意图，认为将这些报告文本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是不适宜的。

只有经过协商或者是经相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够交换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情报资料。

如果会议同意这些建议，那么，秘书处请求会议做出决定：全体代表将会议的文件交回到秘书处以便进行销毁。

自然，这个决议将不用于以下文件：各位代表以自己党的名义所作的、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和讲话文本，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文本，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文本，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文本，以及发给各位代表的公报文本。杜克洛：关于秘书处的报告谁还希望谈谈自己的看法？

日丹诺夫：我想建议在秘书处建议的第二条第二句话里，在“交换”一词的后面补充上“……和发表”^① 一词。我觉得，在与相关的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协商之后，除那些如我们一致同意的属于我们内部的敏感问题之外，报告能够予以发表。

至于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我们准备立即发表。

杜克洛：是否还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将经过日丹诺夫同志修改的秘书处的建议提交表决。一致通过。现在由马林科夫同志讲话。

马林科夫：我们大家也是这样理解的，所有这三份文件，即公报、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是应该在报刊上发表的。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委托三个代表团：波兰工人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联共（布）整理和发表这套文件。

关于刊登文件的日期，初步意见是：文件应该同时进行发表，

^① 在最后确定的文本中，这句话的表述是：“交换或发表”。

具体是：在下个星期天，如果没有出现某些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料到的困难的话。自然，同志们在会后随身携带的那些文件，在没有相关的党的专门通知是不应该公布的。

杜克洛：提出关于三国共产党在指示的期限之后公布材料的建议。建议提交表决。一致通过。

波克：我们忘记了讨论关于机关刊物名称的问题。

杜克洛：您有什么建议吗？

波克：没有，我只是提醒一下这个问题。

隆哥：关于机关刊物的名称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想说一下关于公布文件的问题。公布的文件是否应该签字，或者是没有签字？

日丹诺夫：委员会已经决定，如果在会议上将出现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委员会即将表达的意见是：发表的文件将不署名字。

关于机关刊物的名称问题，我想建议对这个问题不作最后决定，而约定稍晚些时候，委托情报局就这个问题进行协商。

我还有一个关于形式方面的意见。因为法语同俄语一样，都是会议正式使用的语言，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对于宣言的法文文本应该签字。

接受这个建议。与会者签署了宣言文本。

杜克洛：谁还想发言？没有。会议日程的问题已经结束。

好了，同志们，在会议结束之前，我想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感谢我们这次所交换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喜悦和自豪，因为我们的党是一支不可估量的力量，它能够经得住任何战斗，并确保在这些战斗中获得胜利。

在这些年里，我们身居各处，并在各个地区和各种条件下战斗着，此后，当我们再次聚首时，发现我们仍然拥有共同的意愿，进行共同的斗争。

这使我们十分坚信，我们的战斗团结将确保我们取得新的胜利。

我还想对波兰同志表示感谢，是他们担负起国际主义义务，将各兄弟共产党邀请到本次会议上。毫无疑问，本次会议将对今后事件的进程产生影响。

我还特别想感谢联共（布）中央的代表马林科夫同志，感谢他向我们通报了联共（布）中央的工作情况，并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尤其是它在思想战线斗争方面的活动的宝贵情况。对于在我们国内出现的美国人想奴役和使我们屈从的想法，我们应该做出强烈的反应。

最终，我要特别热烈地感谢日丹诺夫同志，感谢他的精彩的和光彩照人的报告，以及结论性的讲话，这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我还要代表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向日丹诺夫同志致谢，感谢他所给予的宝贵的指示，借助于这些指示我们将确定我们道路的正确方向。同时感谢他帮助我们及时调整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指南针的方向，这个指针已经开始出现了偏差并有可能导致巨大的危险。

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将更加坚强有力并充分相信，其他国家里的共产党对我们也是信任的。在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我们是无愧于其他国家的同志们给予我们的信任，并用这种对我们的信任来教育我们的人民。但是，令我们特别感到欢欣鼓舞的是那样一种力量，即来自于联共（布）中央——我们的榜样和领袖的力量。

我们在此所作的决议，将能够赋予我们更加坚定的目的性，使得我们对于自己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目前正值伟大的俄国革命 30 周年之际，这使我们有声地宣布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使我们有声地向我们的人民表明那条光明的道路，即伟大的巨人列宁和斯大斯所坚信不移的那条道路。

斗争在继续着，但是，有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联共（布）的存在，我们将更加充满信心地投入到未来的战斗中。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线中，我们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当之无愧的学生去参加战斗。在这个巨大的战线上，法兰西这块阵地，尤其令人感到不安。

但是，同志们，你们是可以满怀信心地离开此地的，这块阵地将会得到很好的守卫。它将获得法国共产党人的很好的守卫。法国共产党人将会在生活中再次学习我们的这些决议，并将它们变成进行斗争和获取胜利的工具。

出席我们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万岁；全体兄弟共产党万岁！

联共（布）以及我们爱戴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我们将获得胜利！

请允许我就此宣布会议闭幕。（掌声）。

会议于18时40分结束。

附 录

作为记录员和翻译员出席全部会议的 同志的名单

1. 奥斯塔普·德乌斯基^①，会议记录员。
2. 特皮赫特·耶日^②，翻译人员。

① 奥斯塔普·德乌斯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

② 特皮赫特·耶日，波兰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3. 斯特凡·维尔勃沃夫斯基^①，会议记录员。
4. 什莱因·米奇斯拉夫^②，翻译人员。
5. 捷列什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③，会议记录员。
6. 叶菲莫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④，翻译人员。
7. 舍夫利亚金·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⑤，会议记录员。
8. 列昂特·拉乌图^⑥，翻译人员。
9. 拉利奇·拉多万^⑦，翻译人员。

① 斯特凡·维尔勃沃夫斯基，波兰外交部机要秘书。

② 什莱因·米奇斯拉夫，波兰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副院长。

③ 捷列什金·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联共（布）中央副书记，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④ 叶菲莫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负责人。

⑤ 舍夫利亚金·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工作人员，《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辑部负责人。

⑥ 列昂特·拉乌图，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宣传鼓动部部长。

⑦ 拉利奇·拉多万，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活动家，贝尔格莱德大学的教授。

№11646

共产党情报局 9 月 28 日会议
通过宣言、决议等有关文件的记录
(1947 年 9 月 28 日)

绝密

1947 年 9 月 28 日全体会议会议记录

1. 听取了：

关于国际形势决议草案制定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委员会主席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决定：

批准宣言草案。(宣言文本附后)。

2. 听取了：

关于交流经验和协调各国共产党活动的决议案草案制定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委员会主席瓦·哥穆尔卡。

决定：

批准决议案草案。(决议案文本附后)。

3. 听取了：

关于制定公报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米·吉拉斯同志。

决定：

批准公报草案。(公报文本附后)。

4. 听取了：

秘书处的建议。报告人——萨姆布罗夫斯基同志。

决定：

批准秘书处的建议。（秘书处建议文本附后）。

（签字）

附 录

关于九国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议的公报

9月底，在波兰举行了一次情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以下共产党的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爱·卡德尔同志和米·吉拉斯同志；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和弗·波普托莫夫同志；罗马尼亚共产党——格·德治同志和安·波克同志；匈牙利共产党——米·法尔卡什同志和约·雷瓦伊同志；波兰工人党——瓦·哥穆尔卡同志和希·明兹同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安·日丹诺夫同志和格·马林科夫同志；法国共产党——雅·杜克洛同志和艾·法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鲁·斯兰斯基同志和什·巴什特万斯基同志；意大利共产党——路·隆哥同志和埃·雷阿勒同志。

与会者听取了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关于他们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爱·卡德尔同志和米·吉拉斯同志；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格·德治同志；代表匈牙利共产党——约·雷瓦伊同志；代表波兰工人党——瓦·哥穆尔卡同志；代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马林科夫同志；代表法国共产党——雅·杜克洛同志；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鲁·斯兰斯基同志和代表

意大利共产党——路·隆哥同志。

在对这些报告交换意见之后，与会者决定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和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问题。

安·日丹诺夫同志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与会者对报告交换了意见，并对目前国际形势和在目前国际形势下的任务，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关于各国共产党交换意见和协同行动的报告是由瓦·哥穆尔卡同志作的。关于这个问题，会议鉴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而引起的不利影响，并注意到相互交换意见的必要性，决定建立情报局。

情报局将由上述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经验交流，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

会议还决定，情报局将出版机关刊物。

指定贝尔格莱德市为情报局及其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所在地。

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
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
代表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就国际形势问题交换意见之后，一致通过了如下宣言。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战后的发展，国际形势已经发生

了根本的变化。

这些变化的特点是：活动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各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变和重新组合。

当战争在进行时，同盟国在反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团结起来并形成一个大阵营。然而，就在战时，同盟国阵营内部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和平问题的任务方面，已经存在着意见分歧。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认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重建和巩固欧洲的民主秩序，根除法西斯主义和防止德国重新侵略的可能性，并建立欧洲人民间的持久的、全面的合作。而美国和与它一致的英国，却确定了他们另外的战争目的——扫除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并建立自己的统治地位。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在确定战争目的和处理战后事务的任务方面的分歧，更加深化了。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政策，其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和巩固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其目的是加强帝国主义和扼杀民主。因为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运动计划实现的障碍，于是宣布了一个反对苏联及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十字军运动，英、美两个国家中的最狂热的帝国主义政客，同时也用新战争的威胁来支持这一运动。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的反民主的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其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的残余势力。

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削弱和社会主义民主力量更为加强的情况下发生的。

因此，帝国主义阵营及其主导力量美国，就开展了特别积极的侵略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正在各个方面同时展开——在军事战略措施方面、在经济扩张方面和思想斗争方面。杜鲁门—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美国在世界各地执行的全球扩张政策的总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这个总计划中欧洲的一个章节。美国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欧洲的计划，正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南美各国的计划所补充。昨日的侵略者——德国和日本的大资本家，正被美国用来扮演新的角色，作为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

帝国主义阵营所使用的策略武器，是十分多样的。它有直接的暴力威胁、讹诈与勒索、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措施、贿赂、利用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等等，以便巩固这个阵营的地位，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自由主义—和平主义的假面具伪装起来的，企图这样来欺骗和引诱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

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武器库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利用右翼社会党人的叛变政策，如像法国的布吕姆、英国的艾德礼和贝文、德国的舒马赫、奥地利的伦纳^①和塞尔夫、意大利的萨拉盖特等人，这些人力图用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辞藻，来掩盖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强盗的本质，而实际上，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诚的同谋犯，他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英国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找到了贝文作为它的最坚决、最狂热的执行者，这并非是偶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必须团结自己的队伍，制定一个一致赞同的行动纲领，制定出自己的策略，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及英法同盟者，反对右翼社会

^① 卡尔·伦纳，奥地利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奥地利首相。

党，首先是反对英国和法国的右翼社会党。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欧洲所有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力量一致努力，是非常必要的。右翼社会党是这一事业的叛徒。在新民主主义国家里，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民主的进步政党结成的联盟，成为这些国家抵抗帝国主义计划的基础；除了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其他大部分国家中的社会党人，首先是法国的社会党人和英国的工党分子——拉马第、布吕姆、艾德礼和贝文——都在奴颜婢膝地帮助美国资本达到它的目的，促进美国资本的勒索，并把他们自己的国家推上仰赖于美国的附庸国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它们必须举起保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如果各国共产党坚守他们的阵地，不受恫吓和讹诈，如果他们勇敢地保卫民主和他们本国的国家主权、自由和独立，如果他们在反对经济上和政治上奴役他们国家的一切企图的斗争中，能够领导一切愿意为荣誉和民族独立而战斗的力量，那么，任何奴役欧洲与亚洲国家的计划，都不可能实现。

这是各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之一。

必须记住，在帝国主义力图发动新战争的愿望与组织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战争。维护和平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只要他们坚决地保卫和平，只要他们拿出力量和决心，侵略者的计划必将遭到彻底的失败。不应忘记，帝国主义代理人掀起的关于战争危险的叫嚣，目的是恐吓神经脆弱的人和不坚定分子，并用讹诈的手段来达到对侵略者的让步。

今天，工人阶级的主要危险，是过于低估它自己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正如以前的慕尼黑政策放纵了希特勒侵略者一样，现在对美国和帝国主义阵营新政策方针的让步，必然会使这种政策方针的制定者更加嚣张，更富侵略性。因此，各国

共产党必须在各个方面，在国家、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领导对帝国主义扩张侵略计划的抵抗；它们必须巩固自己的队伍，在共同的反帝国主义和民主的纲领的基础上，统一他们的努力，并把一切民主的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

（签字）

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 交换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

会议宣布，在目前的情况下，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经验表明，共产党之间的这种缺乏联系是错误的和十分有害的。现在，由于战后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化，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自动地协调行动的必要性，已甚为迫切；共产党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的缺乏联系，对于工人阶级将是有害的。

有鉴于此，与会者一致达成协议如下：

1. 建立情报局，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匈牙利共产党、波兰工人党、苏联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组成。

2. 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交换经验，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行动。

3. 情报局由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组成，各党的代表由各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和调换。

4. 情报局将下设一个机关刊物，最初为半月刊，然后再改为周刊。机关刊物将以法文和俄文出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将以其他语种出版。

5. 确定贝尔格莱德市为共产党情报局驻地。

秘书处的建议

由秘书处编制的会议记录，包括了全部会议的逐日的记录，会议听取的所有报告和讲话，以及根据报告所做出的有关决议和公报。对于杜克洛同志和隆哥同志的报告和发言，以及日丹诺夫同志就《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所作的结论性的发言，都进行了详细的书面记录。

提请批准会议记录。^①

根据秘书处的意见，必须建立以下保存和使用会议文件资料的制度：

1. 在成立情报局工作机关之前，将会议记录保存在联共（布）中央，并委托联共（布）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建

^① 原文如此。这句话是萨姆布罗夫斯基在9月28日会议上提出秘书处建议时讲的（见№11645文件），因该建议被通过，决议中错误地保留了这句话。似应改为“批准了会议记录”。

立情报局的辅助机关。

2. 考虑到关于各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可能暴露出本国党的一些战略计划和意图，认为将这些报告文本分发给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是不适宜的。

只有经过协商或者是经相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够交换或发表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情报资料。

如果会议同意这些建议，那么，秘书处请求会议做出决定：全体代表将会议的文件交回到秘书处以便进行销毁。

自然，这个决议将不用于以下文件：各位代表以自己党的名义所作的、关于该党的活动情况的报告和讲话文本，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文本，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文本，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文本，以及发给各位代表的公报文本。

No 11660

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宣言、决议和公报 已获通过的情况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7年9月28日)

莫斯科

致菲利波夫

今天，9月28日，在委员会的工作完成之后，大会已通过决议闭会。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宣言，宣言的基础是我们报告的结论部分，其中有一些不大的修改和补充。接着，大会批准了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对于各国共产党必须交流经验以及协调行动的理由进行了简短的阐述，并规定成立具有协调职能的共产党情报局。情报局由各国共产党的代表组成，每个共产党出2名代表，分别代表参加会议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情报局将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局的驻地设在贝尔格莱德市。

通过上述决议之后，大会还批准了公报的文本。大会认为理想的是，在星期天，即10月5日，在九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同时发表会议的文件，用于发表的文本的最终整理工作委托给联共（布）、波兰和南斯拉夫代表共同完成。

会议是在极其热烈和与会代表对工作结果非常满意的气氛中结束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联共（布）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保证一定改正错误，修正本党的方针路线。

明天，9月29日的上午，我们将飞抵莫斯科。届时将当面提交会议的一切文件。

谢尔盖耶夫

鲍里索夫

1947年9月28日

№0936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党情报局 波兰会议结果的决议

（1947年10月27日）

机密

中央委员会在听取了日丹诺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九国共产党在波兰举行的情报会议结果的报告之后，支持本次会议的结果并赞同会议所做的各项决议。

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局势的声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基本政治力量新的对比关系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分析。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转而奉行来源于美国攫取世界霸权的企图的公开扩张主义政策，奉行造成新战争和侵略的威胁的政策，奉行旨在破坏民主制度的政策的情况下，一系列欧洲国家的最大的共产党举行的本次会议反映了渴望持久和平和自由民主发展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表明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反对反动势力和法西斯主义残余，为团结各国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国家的世界霸权、反对新战争威胁而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相信，声明所提出的任务和目标符合全体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定将得到苏联人民的全力支持。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也赞同九国共产党会议通过的关于为了交流经验和在必要时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各自的活动而建立由

这些共产党参加的情报局的决议。这样一种联系形式在共产党发展的新的条件下是必要的，而且毫无疑问，将会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

为了阐释本次会议所做出的各项决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各州、边疆区和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召开党的骨干分子会议，并做关于这次会议结果的报告。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各州委会、边疆区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也在工人、知识分子和集体农庄庄员中就本次会议的结果进行必要的阐释工作。

№06566

斯大林与法共中央书记多列士的会谈记录

(1947年11月18日)

绝密

在场的有莫洛托夫^①、苏斯洛夫^②和叶罗费耶夫^③（翻译）同志。

多列士^④说，他首先代表法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法共中央向斯大林同志致以敬意和感谢。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问，多列士不会是因为法国共产党人在华沙挨了骂而谢他吧。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只会对给它指出缺点表示感谢。多列士说，他想就几个对于法国共产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谈谈，并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和建议。

多列士说，九国共产党会议所做的局势分析在法国完全得到了证实。例如，在国内，美国人的干涉增多了，经济困难加深了，阶级斗争激化了。法国共产党遵照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指示进行了保卫国家独立的斗争，并且是同反动势力的联盟孤军作战。在最后一次

① 莫洛托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② 米·安·苏斯洛夫（1902～1982），1946～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部长，从194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书记。

③ В.И. 叶罗费耶夫是莫洛托夫秘书处的工作人员。

④ 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30～1964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市政选举^①中法国共产党保持了原来的票数甚至略有增加。目前戴高乐^②把法国最极端反动分子网罗到自己身边。这损害了社会党人特别是人民共和党^③，它们在选举中丢了很多票。

斯大林同志指出，人民共和党就是皮杜尔^④的党。

多列士对此表示肯定，并说人民共和党在市政选举中失去了3/4的选票。

斯大林同志说，人民共和党就像一个中转站。人们先加入它，再投向戴高乐。

多列士称，社会党人、人民共和党和戴高乐派尽管在一些内政问题上存有一定的分歧，但在为美国人效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沆瀣一气。法国的社会党领导人把对美国人的奴颜媚骨和对共产党的仇恨及对苏联的敌视结合在一起。法共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确定的路线，坚决地加强了对社会党领导人和拉马第^⑤政府的批评。法国共产党向群众指出，社会党人作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正和最反动的集团结盟，并公然进行挑衅。最新的证据就是博列加尔事件^⑥。法国共产党人尽管表示宣传拥护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定，但他们之中仍有某些动摇。比如，有一些同志对社会

① 指1947年10月19~26日的法国市政选举。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得到的票数超过35%，在选举中获胜。共产党人保持了原来20%的票数。

② 夏尔·戴高乐（1890~1970），法国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自由法国”（后改称“战斗法国”）运动的领袖。1944年6月至1946年1月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1947年4月创建了法兰西人民联盟。

③ 人民共和党，法国温和的右翼政党。

④ 乔治·皮杜尔（1899~1983），法国政治家。1943~1944年为法国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主席，是人民共和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46年6~12月任临时政府首脑，1947年1月~1948年7月任外交部长。

⑤ 保罗·拉马第（1888~1961），法国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47年1~11月任政府首脑，同年5月把共产党员部长从政府中清除出去。

⑥ 指1947年11月14日法国宪兵袭击了在博列加尔的苏联遣返人员营地。

党人的叫嚷和拉斯基^①的声明反应不正常。拉斯基在最近一次演说中断言列宁曾支持克伦斯基^②反对科尔尼洛夫^③。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说法不对，列宁从来没有支持过克伦斯基。^④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揭露了拉斯基的这些言论并指出，列宁发动工人阶级去和科尔尼洛夫作斗争时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对克伦斯基。

斯大林同志说，这种说法是对的。

多列士称，他想知道斯大林同志对以下一个重要问题的看法。法国出现了以介于共产党人和戴高乐派之间的以第三势力自居的集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他们。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各派势力看来将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组合和分化。共产党人无疑会壮大，但戴高乐派也会壮大起来。然而想在和平与战争、共产党人与戴高乐之间骑墙的人都将声誉扫地。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和平或者战争的问题。必须在和平拥护者与战争拥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能犹豫不决。斯大林同志问，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谁。

多列士回答说，社会党的领导人是莱昂·布吕姆^⑤。

斯大林同志问，社会党有无左翼。

① 加罗尔德·约瑟夫·拉斯基（1893～1950），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1936～1949年是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亚·费·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政治活动家、律师，第四届国家杜马中劳动派领袖。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中先后任司法部长、海陆军部长和总理。

③ 拉·格·科尔尼洛夫（1870～1918），1917年7～8月任沙皇俄国军队的总司令，同年8月底发动叛乱。

④ 实际情况是，科尔尼洛夫发动反临时政府的叛乱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全力反对叛乱，支持临时政府。

⑤ 莱昂·布吕姆（1872～1950），法国社会党领袖和理论家。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法国政府首脑。

多列士回答说，社会党有左翼，是居伊·摩勒^①领导的。社会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以前，摩勒一直做出比拉马第和布吕姆左的样子。但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就能看出摩勒对美国奉承巴结，对苏联却十分敌视。因此，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摩勒和布吕姆气味相投。多列士说，摩勒和布吕姆之间并没有像南尼^②和萨拉盖特^③那样大的区别。法国共产党对社会党右派和假左派都加强了火力。法国的社会党内当然也有一些反对派集团，但它们力量都很小。“左派”社会党人出版了一份《自由射手报》，这家报纸在内政问题上，如工资、罢工和工人要求等问题上竭力要表现得比共产党还左。另一方面，这家报纸却为马歇尔计划大唱颂歌。《自由射手报》还因“大西洋宪章”谈到保护各国主权的必要性而对它进行谴责。按社会党人的看法，这个要求既过时又反动。

斯大林同志说，他觉得，法国社会党人如同英国工党分子一样，都在自己党内亲自培植左翼。名声最大的左翼领导人都是右派的代理人。诸如法国的布吕姆等和英国的贝文^④等这类领导人，都清楚在其党内将自下而上形成一个真正的反对派。为了不让这些反对派分子投向共产党人，为他们建立了左派领导。“左派”们为了满足自下而上的反对派的要求，大肆蛊惑人心。右派则把持党的领导权并引导党按其路线发展。他们就是用这样奸诈险恶的方式蒙骗人民，目的在于把反对派留在党内，不让他们投向共产党人。反

① 居伊·摩勒（1905～1975），1946～1969年任法国社会党总书记。

② 彼特罗·南尼（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战时曾任该党总书记，战后领导意大利社会党左翼。1946～1947年出任政府外交部长。

③ 朱塞佩·萨拉盖特（1898～1988），意大利社会党领袖之一。1946～1947年任立宪会议主席。1947年策划分裂意大利社会党，为新的极右翼的意大利劳动人民社会党的领袖。1947～1963年任该党总书记。

④ 埃内斯·贝文（1881～1951），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1945～1951年任外交大臣。

对派里当然也有一些襟怀坦白的好人，但反对派不是由他们领导的。领导反对派的是齐利亚克斯^①之流。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齐利亚克斯本人就承认过他是英国国家情报局的老雇员。

斯大林同志说，反对派中有正派人，要谋求同他们接近。法国和英国的共产党人应该向左派社会党人的上层发起进攻并争取社会党基层党员。斯大林同志指出，在苏联，托洛茨基也从左面攻击过党，而他本人却要求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提供租让。

多列士说，法共中央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定精神明确了自已的策略。法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了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和领导抵抗运动的经验，它争取社会党的普通党员。因此法共中央决定在各个工厂成立保卫法国独立同盟。根据共产党的建议，这项工作由总工会负责。共产党在最近一次总工会代表会议上建立了反对马歇尔计划和美帝国主义的多数派。这一多数派是在弗拉商^②领导下并得到赛扬^③的支持而形成的。若奥^④是少数派。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能相信赛扬。

多列士回答说，当然不能过分信任赛扬，但这一回赛扬第一次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表现得立场鲜明。法国的反动分子同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起都对总工会的这次会议寄予过很大希望，以为会议上将如他们所料发生分裂。然而他们的指望落空了，这是法国共产党

① 科尼·齐利亚克斯（1894～1967），英国工党左翼领导人之一。1945～1950年在英国情报部门任要职。

② 贝努瓦·弗拉商（1893～1975），1926～1936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书记。1936～1939年任法国总工会书记。1945～1967年任总工会总书记。

③ 路易·赛扬（1910～1974），1944年任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主席。1944～1948年为法国总工会书记，1945～1969年是世界工联总书记。

④ 莱昂·若奥（1879～1954），1945～1947年任法国总工会书记，1947年12月策划分裂总工会并建立改良主义工会组织“工人力量总工会”。

的一大胜利。

斯大林同志说，若奥摘掉了假面具。

多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虽然只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但也想在农村建立保卫国家独立同盟。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不错。

多列士介绍说，今年12月法国各农村地区要举行20个代表会议，会议将把农民感兴趣的问题同反对马歇尔计划，争取法国独立斗争的利益结合起来。

斯大林同志说，在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中不要做得过火。否则社会党人会说共产党反对从美国人那里取得贷款。应该回答他们说：不，我们不反对。共产党人接受贷款，但条件是不危及国家主权。共产党人反对有损法国独立的奴役性条款。共产党人应该这样提出问题。这一点务必向农民解释清楚。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着手在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部门成立同盟。比如，正在筹备的保护法国电影业同盟。加入这个同盟的有电影制片厂的工人、演员、音乐家、技术人员以及老板，他们反对布吕姆与美国人签订的摧残法国电影业的协议。^①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

多列士称，共产党计划在汽车和航空工业中也建立起类似的同盟。参加这些同盟的甚至有不满美国人竞争的企业主。

斯大林同志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团结一切为争取民族工业独立而斗争的人。

^① 1946年5月布吕姆签署了法美两国有关财政问题的协议。美国政府根据此项协议勾销了法国战争期间所欠大部分债务，并向法国提供了3亿美元的新贷款。同时还议定由进出口银行提供6.5亿美元贷款用于支付法国向美国购买物品的货款。作为回报，法国政府不得实行保护本国产品的关税保护政策，并应该允许法国租用美国的影片。

多列士称，法国战前曾是汽车生产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现在国内汽车工业的恢复举步维艰，因为美国汽车简直充斥法国，而实力削弱了的法国工业根本无法和美国人竞争。多列士说，法国确实可算是航空工业的摇篮。共产党员梯荣^①任武器装备部部长时曾致力于重建法国的航空工业，扩大发动机和飞机的生产。然而现在这一工业在法国正趋于消失。不久前戴高乐称打算卖掉飞机制造厂。

斯大林同志指出，社会党人正在出卖祖国。

多列士说，他想就九国共产党会议谈一个与其说是有关将来不如说是有关过去的问题。法国共产党接受对其缺点的公正批评，其中包括对其没有迅速而坚决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计划所作的批评。当然，法共在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注意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危险性。法国共产党开展了自我批评并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然而，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上，某些兄弟党的代表对法共的批评有时有失公允。例如，南斯拉夫同志指责法国共产党很晚才加入抵抗运动和没有在法国解放的决定性时刻保住人民政权。多列士说，依他看，这一批评是不公正的。为了能正确地向法国广大党员通报情况和不至于使他们迷失方向，多列士想了解一下斯大林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是第一个开展斗争的党，它早在1939年就为保卫祖国反对德国入侵而战。在法国沦陷时期，共产党领导过抗击德国人的武装斗争，甚至连戴高乐这样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都否认，共产党在沦陷期间是组织武装抗击德国人的惟一力量。法国共产党在1944年8月法国解放时没能掌握政权，是一系列国际

^① 夏尔·梯荣（1897~1994），1944~1952年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4年4~6月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航空事务专员。1944年至1947年历任航空部部长、武器装备部部长、改建部部长。

原因造成的。法国共产党当时致力于促使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强化战争和加速战胜德国。法国共产党担当了美英军队的后卫。

斯大林同志说，要是苏联红军打到法国的话，就将是另一个局面了。

多列士说，当时声望还很高的戴高乐曾经试图怂恿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然而法国共产党并没有上他的当。法共不想削弱自己和孤立自己。党向人民揭露了戴高乐这个狂热的反动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真实嘴脸。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当然犯过错误，但依他看党在那一时期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共产党人在当时不可能执掌政权。即使掌握了，随后也会失去，因为美、英军队驻扎在法国。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有时也因其他一些问题遭到批评。例如，来法国参加各种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某些苏联同志曾经责问法国青年为什么不自称共产主义青年。这些同志差点儿没有指责法国青年犯了机会主义。在这以后很多青年人跑到法国共产党中央来说，苏联同志批评了法国的共产主义青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很惊讶，苏联同志竟会提出这样的意见。

多列士称，不能责备法国共产党没有把其青年后备力量称作共青团。法共因此扩大了青年运动的基础。现在受法共影响的有20万青年人。法共由于采取这样的策略团结了600万工会会员。为数5万~6万组织起来的妇女跟着法共走也得益于这一策略。

斯大林同志说，不应用党性来吓唬党外人士。不过法国共产党在创建统一战线时无论和谁结盟都应保留鼓动自由。这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党人手下留情，可是社会党人对他们却不手下留情。

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是否同意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会晤以及他如何看待意大利共产党的现状。

多列士回答说，他曾两次会晤陶里亚蒂^①并同他讨论了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这还是莫洛托夫同志在巴黎时的事。引起意大利共产党人当时责骂法国共产党人的，正是引起南斯拉夫同志夸奖法国共产党的缘由，具体说就是对的里雅斯特^②问题的立场。多列士说，依他看，意大利共产党成长得很快，队伍也有显著扩大。惟一令他担心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人在追求增加党员数量时，有时会在原则问题上放弃自己的观点。

斯大林同志打趣地指出，这是墨索里尼教会他们的。如果墨索里尼在法国的话，他也会教会法国共产党人的。

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是否还认识其他意大利同志以及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多列士回答说，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中出现了很多新人，他们不久以前才脱离地下状态，因此他还不认得他们。多列士说，他很熟悉几个老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他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位同志——隆哥^③。多列士和季·维多里奥^④也见过面。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设法尽可能多地会见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做是正确的，并说要更经常地互访。斯大林同志问，西班牙共产党的状况如何，有无作用和是否有好人。

多列士说，多洛蕾丝·伊巴露丽^⑤现在巴黎，他认为她是一个

①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1926年起一直任意共总书记。1944~1946年曾在意大利政府中任部长。

② 战后，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上有争议。参见№11628文件的注释。

③ 路易吉·隆哥（1900~1980），1943~1945年意大利游击运动领导人之一。1946年1月起任意共副书记。

④ 朱塞佩·季·维多里奥（1892~1957），1944~1947年为意大利总工会总书记之一，1947年起任总书记。

⑤ 多洛蕾丝·伊巴露丽（1895~1989），西班牙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39年起流亡国外。1942~1960年任西共总书记。

很强的党的工作者。

斯大林同志，她是否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还是还有人比她的地位高。

多列士说，共产党领导人中有卡里略^①，前西班牙共和政府部长。利斯特^②的位置稍稍靠边。米赫^③在马德里工作。多列士说，在西班牙同志中他还能提一下乌里贝^④，他是一个很杰出的共产党员。法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帮助了西班牙共产党。

斯大林同志说，西班牙共产党本来提出过派遣代表参加九国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要求不恰当。希腊人也想派代表。我们认为，参加情报局的党应得到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有些党已经公开活动。

多列士说，杜克洛^⑤曾就九国共产党会议结果向西班牙同志以及英国共产党人，如来法国的波利特^⑥作了专题报告。把会议结果也向比利时同志作过通报。西班牙共产党人出席了法国共产党中央的会议。此外，两党书记处曾就很多问题进行过直接会谈。

斯大林同志问，在这些西班牙人中有没有敌人的代理人。对他

① 圣地亚哥·卡里略（1915~?），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39年流亡苏联，在青年国际工作。1942年当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② 恩里克·利斯特（1907~?），1946年起为西共中央政治局（后改称执行委员会）委员。

③ 安东尼奥·加西亚·米赫（1905~1976），1946~1949年任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④ 维森特·乌里贝（1902~1961），1932年起为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1939年是人民阵线政府成员之一。1939年起流亡拉丁美洲。

⑤ 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31年起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1964年任法共中央书记。1946~1958年是法共议会党团主席。

⑥ 加利·波利特（1890~1960）——1929~1939年10月、1941年7月~1956年为英共总书记。

们应该认真审查。斯大林同志又问比利时共产党的情况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比利时共产党尽管力量还很薄弱，但比战前已有所壮大。共产党的老领导人已名声扫地，现在由新同志取代。多列士说。他认识比利时共产党的几个老同志，其中包括已有30年党龄的拉奥^①。多列士指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是，比利时共产党的影响在法语区较强，而在佛拉芒人地区较弱。

斯大林同志说，佛拉芒人按种族来说更接近德意志人。

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如何评价英国共产党的现状和他是否认为英共在壮大。

多列士回答说，英国共产党不但没有壮大，相反越来越弱。英国共产党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道路。英国的共产党人不相信工党的普通党员，在他们面前充老布尔什维克。英国共产党脱离了英国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打算帮助英国共产党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带有宗派主义性质。

多列士说，英国共产党人最近一段时间有过开展工作的良好机会。他们中有像矿工工会领导人奥纳那样的好人。奥纳也许政治上不很开展，但却是一个杰出的同志，他坚定顽强、忠心耿耿。他在矿工中享有很高威望。

斯大林同志问，奥纳是否参加了共产党。

多列士答，他是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英国共产党的议会代表很弱。

多列士说，加拉赫^②的确能力很弱。列宁当年特别是在《共

① 茹利因·拉奥（1884～1950），1940～1941年为比利时共产党秘密领导机关成员。1941～1945年被囚禁在法西斯集中营。1945～1950年为比共主席。

② 威廉·加拉赫（1881～1965），1921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43～1956年任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

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批评过他。到现在加拉赫也没有多大长进。

斯大林同志指出，加拉赫甚至倒退了。

多列士说，他来莫斯科路过布拉格时会晤了哥特瓦尔德^①。如有可能他想从莫斯科返回时取道华沙，在那里可以同波兰同志座谈，可能的话再经过柏林。

斯大林同志说，多列士当然可以这样办。

多列士说，他很想同德国同志谈谈。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对给予他们的任何微小的关注都非常敏感，苏斯洛夫同志出席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使他们很满意。皮克^②和格罗提渥^③给多列士发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谢法国代表团参加了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斯大林同志说，德国共产党处处挨打，谁也不给他们好脸色看。任何一个安抚都能让他们高兴。这些可怜的人处境艰难，但这一切并不都是别人的过错。

多列士说，法国出版一种《新民主》^④杂志。因为情报局将要出版自己的报纸，所以他想问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应该继续出版《新民主》，还是应把这份杂志停办。

斯大林同志问，这份杂志名义上属于谁。

多列士回答说，杂志属于法国共产党，尽管负责人中有各个党派的代表。

①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1896～1953），1929～194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1945年起为捷共主席。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总理。1948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② 威廉·皮克（1876～1960），1946～1954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③ 奥托·格罗提渥（1894～1964），1946～1954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主席之一，1949年起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

④ 《新民主》，法国共产党1947年在巴黎创办的世界政治问题月刊。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杂志如果有助于民主力量的团结，可以加以保留。斯大林同志又问，出版这份杂志的费用大不大。

多列士说，出版杂志的费用不大。

斯大林同志指出，法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请联共（布）提供援助，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他们看来害怕援助。斯大林同志说，联共（布）具备在必要时提供援助的物质条件。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的物质条件不错，资金雄厚。还在战前法共就有 2000 万法郎。现在这个金额大大增加了。

斯大林同志说，多洛蕾丝·伊巴露丽在莫斯科时，他也问过她，西班牙共产党人是否需要一些物质支援。而她也回答说，他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不需要任何援助。

多列士回答说，共产党人经营着一系列公司，其中就有法国航运公司

斯大林同志问，这能否获利。

多列士回答说，有数百万法郎的进项。

斯大林同志说，多列士应该明白，只要有需要，联共（布）愿意提供帮助。法国共产党如果接受这一援助，无须承担任何义务。

多列士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同志干得非常出色，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斯拉夫是由红军解放的。如果邱吉尔晚一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红军就打到法国了。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曾设想一直打到巴黎。

多列士说，当时美、英军队在法国登陆，与其说是要摧毁德国，不如说是为在西欧抢占地盘。

斯大林同志说，美、英军队当然不容许自己呆在非洲岸边坐视红军解放巴黎这样的丢脸事发生。

多列士说，他请斯大林同志相信，法国人民会热烈欢迎苏联红

军的到来。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将是另一种局面了。

多列士说，这样就没有戴高乐了。

斯大林同志设想说，戴高乐会逃跑。

多列士说，他不愿浪费斯大林同志的时间。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多列士一点儿也不是在浪费时间，他们很难得见面。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人要是知道他有幸和斯大林同志会谈时将非常高兴。多列士指出，他虽然是个法国人，却有一颗苏联公民的心。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大家都是共产党人，这就说明了一切。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共产党人如何处理武器问题。他们打算保留武器还是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了。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中央全权委托两位同志——政治局的一位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专门负责这个问题。其中一位是勒柯尔^①，沦陷期间他是巴黎共产党组织的书记；另一位是梯荣，他是法国游击运动的组织者。他们在老游击队员中开展工作，建立了军事性质的组织。法国共产党把好几个武器弹药库隐蔽了起来。

斯大林同志说，要保存武器和组织，以免在敌人面前赤手空拳。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进犯，应予以回击。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斯大林同志还说，苏联有武器，需要时可以提供。

斯大林同志问，有无可能通过无线电等方式和法国共产党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① 奥古斯特·勒柯尔（1911~?），1939~1944年为法共秘密领导机构成员，抵抗运动组织者之一。1942~1954年为法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负责组织工作。

苏斯洛夫同志说，用无线电同法国共产党有一些联系。法国有一个在莫斯科受过培训的无线电报务员。

多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人有几个无线电台。

斯大林同志问，电台工作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

多列士回答说，电台的活动是秘密的。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人保住了无线电设备。现在正在开设索非亚方向的专门电台，以便和季米特洛夫^①同志联系。电台还没有投入使用，但已经安装好了。

斯大林同志问，有没有万一出事后的备用电台。仅有一个电台是不够的。斯大林同志说应该把电台设在农村而不是城市。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人的电台都设在市郊。战争结束前法国共产党有3个电台和莫斯科联系。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电台是否既能接收又能拍发。

多列士作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问，发报机的功率有多大。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的无线电台能够和莫斯科保持不间断的联系。

斯大林同志转换话题说，法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农民中开展工作。不要忽视农民。他们是一支必须争取过来的强大力量。过去马克思主义者忽视农民。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要重犯这一错误。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在中部地区及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的农民中影响很大。

斯大林同志说，这很好。

^① 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1882～1949），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4～1945年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部长。1945年11月回国。1946年11月起为保加利亚部长会议主席。

多列士说，最近一次选举时，农村中投给共产党的选票甚至比一些城市中投的还多。

斯大林同志问，杜克洛是否是多列士的得力助手。斯大林同志说，杜克洛在议会作的关于工人阶级不会听信挑拨去发动武装起义的声明是不合适的。应当记住，敌人是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弱者发善心的。

多列士回答说，杜克洛是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工作做得很多，只是有时在议会的发言缺乏预先的充分准备。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常常上敌人的当而说了不是他打算说的话。尽管如此，杜克洛不失为一个优秀和机智的共产党员。

莫洛托夫同志问，法国共产党中央在执行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方面是否有动摇。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共产党中央有过这样的动摇。例如安德列·马尔蒂^①的立场就不正确。多列士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尽管安德列·马尔蒂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精神的勇敢斗士，但他过分重视形式逻辑。他对任何一种急剧转折和复杂局面都不能迅速掌握。这一回他竟然在中央委员会另作了一个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副报告，声称据他看来头号敌人是戴高乐。多列士说，他向马尔蒂解释说，头号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法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戴高乐、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人。关于马尔蒂的错误立场问题政治局讨论过。他本人对此不很满意。但第二天他在巴黎共产党组织的一次会上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发言就很好、很正确了。多列士说，马尔蒂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同志。不过他确实有些性子急，和他打交道要有极大的耐性。

^① 安德列·马尔蒂（1886～1956），1936～1938年是西班牙国际纵队总司令。1931～1952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多列士说，马塞尔·加香^① 尽管年近 80 岁，仍是共产党的一位卓越活动家。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劲头十足的共产党员，但不知为什么他相信，如果他是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的成员的的话，他就几乎可以左右整个对外政策了。马塞尔·加香是苏联的老朋友之一。对他来说俄国人的话就是法律。

斯大林同志问，加香有没有犯过去的老毛病。

多列士说，现在没有发现他重犯这样的毛病。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共产党有一位蒙慕梭^② 同志，他用罢工使法国的资产阶级吓破了胆。比方说，他宣布举行总罢工。谁也没有罢工，但他却宣布了。

多列士说，蒙慕梭是弗拉商的亲密战友，也是一个忠实的党员。

多列士指出，青年同志中也涌现出一批优秀干部。法戎^③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早在 1940 年他就在国民议会本着李卜克内西^④ 的精神作了一次出色的发言。现在他分管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问题。前共青团书记雷蒙·居约^⑤ 也是一位好同志。现在他担任巴黎

① 马塞尔·加香（1869～1958），1920 年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39～1940 年拒绝无条件支持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抗英、法联盟的军事力量 and 与纳粹德国缔结和约的路线。法国沦陷期间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战后多次当选为立宪议会议员和国民议会议员。

② 加斯东·蒙慕梭（1883～1960），1922～1936 年任法国统一总工会书记，1936～1940 年为联合总工会书记。1932～1945 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法国沦陷期间（1940～1944）为抵抗运动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45 年起任总工会书记。

③ 艾蒂安·法戎（1906～1992），1932～1945 年为法共中央候补委员，1936～1940 年为议员。1945 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1945～1947 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 年起为政治局委员。

④ 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8）之一。积极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⑤ 雷蒙·居约（1903～1986），1928 年起为法共中央委员，1932 年起为法国共青团总书记，1935～1939 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总书记。1942～1944 年参加过抵抗运动的组织工作。1945～1972 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地区共产党组织书记。这位年轻的党员很有天赋，也很有经验。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从妇女中提拔了领导力量。

多列士回答说，法共中央有7~8名女同志。诚然，她们既不异常活跃，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也不显得突出，但妇女工作做得非常好。她们和莫斯科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瓦扬-古久里^①。这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能干的同志。

多列士说，法共中央在战争期间只出了少数叛徒和逃兵。战前选进中央委员会的50名委员中仅有4人当了叛徒。其中3个被共产党人自己处死了，第四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多列士指出，法国共产党的薄弱环节是中层领导力量不够。很多这一层的人被德国人枪杀了。战争中德国人杀害的共产党员有35万之多。很可惜，一大批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积极参加过人民阵线筹建工作的同志牺牲了。这些人怀着对社会民主党人的刻骨仇恨。而年轻一代的共产党员则是在战时另一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需要对他们做大量工作。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教育党员。

莫洛托夫同志说，弗拉商是个好同志。

多列士说，弗拉商是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他1926年就入党了。他曾任政治局委员，后因接手总工会领导工作而不得不离开政治局。但他非正式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

多列士说，他非常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在适当时候接见弗拉商。弗拉商最近一次来莫斯科回国后，对没受到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接见有些失望。

^① 玛丽-克洛德·瓦扬-古久里（1912~?），1938年起为法国女青年运动领导人。1942年被纳粹分子逮捕，后被送往集中营。1945~1985年为法共中央委员，1945~1954年为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书记。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是弗拉商不想会见任何人。

多列士说，弗拉商只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库兹涅佐夫^①谈过话，但联共（布）中央委员一个也没见到。

斯大林同志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多列士回答说，是弗拉商自己不敢提出请斯大林或党的其他领导人接见的要求。

苏斯洛夫同志说，两年前莫洛托夫同志曾同弗拉商谈过话。

斯大林同志说，弗拉商该说出想与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会见的意愿，他又开玩笑地补充道，“我们连一切资产者都可以见，当然要接见弗拉商。”斯大林同志问，贝当^②是否还活着。

多列士回答说，贝当靠戴高乐的庇护还活着。他已经 91 岁了。

斯大林同志又问，魏刚^③现在何处。

多列士回答说，魏刚在法国。

斯大林同志问，魏刚在政治生活中是否还起作用。

多列士回答说，他已不起任何作用了。多列士说，魏刚和贝当当年都是戴高乐的顶头上司。多列士说，他有一次在法国驻苏使馆听说，戴高乐在莫斯科时说过，他不会给波兰人任何好处，他太了解这些波兰人了，早在魏刚手下服役时他就看透了他们。

斯大林同志指出，可是戴高乐的主要助手却是波兰人帕列夫斯基^④。这个人是英国人的间谍。邱吉尔当年在戴高乐身边安插了间

① 瓦·瓦·库兹涅佐夫（1901～1990），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② 亨利·菲利普·贝当（1856～1951），法国元帅。1940年6月任政府总理。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为维希政府首脑。1945年8月被判处死刑，后由戴高乐将军下令改为终身监禁，并被剥夺一切权利。

③ 马克西姆·魏刚（1867～1965），从1940年5月19日起任国防参谋长和法国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1940年7～10月任维希政府国防部长。

④ 加斯东·帕列夫斯基（1901～1984），1940年起积极参加“自由法国”运动，1942～1946年是戴高乐将军内阁总管。

谍。

多列士说，现在法国驻伦敦大使马西格利也是英国人的间谍。多列士谈起，戴高乐有一次在阿尔及利亚发表讲话时，为了讹诈英国人和美国人，故意说了几句苏联的好话。马西格利马上就致电所有法国的外交代表机构，指示对总统的这些话不必太在意。他的电报还说，法国一如既往地把政策建立在和英、美结盟的基础上。

多列士说，有一次听帕列夫斯基讲，约·维·斯大林跟他谈过逮捕多列士的话题。

斯大林同志说，确实有过这回事。那是在和帕列夫斯基谈话时，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问，是不是多列士一在法国露面，帕列夫斯基就要逮捕他。帕列夫斯基回答说：“哪里会呢，哪里会呢。”

多列士说，弗拉商请他有机会时向斯大林同志讲一件事。这是弗拉商在美国时亲眼目睹的事实。美国的反动派疯狂地发动了一场反对“红色分子”的运动。有人问一个美国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说，他不是。于是告诉他，您是共产党员，因为您的儿子叫约瑟夫。既然您给您的儿子取了斯大林的名字，那您就一定是共产党员。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元是会让人的头脑空虚的。钱袋越满，脑袋越空。斯大林同志问多列士打算什么时候回国。

多列士说，他后天，11月20日走。就差办理签证了。多列士说，他对莫斯科之行非常满意。他出席了十月革命30周年的庆典。多列士说，总之苏联对他的接待，用法国人的话说，像是对帝王般的礼遇。

多列士说，他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早在22年前他来过这个厂，当时这个厂叫莫斯科汽车公司。现在他看到工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的工业正在发展，他又问，法国的工业是

否也在发展。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工业曲线经过短期上升后又下滑了。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失业现象。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没有失业现象。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多少工人。

多列士回答说，算上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法国共有 1000～1100 万工人。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的冶金业恢复了没有。

多列士回答说，冶金业恢复得非常缓慢。生铁不够，也没有焦炭。由于缺乏钢材，汽车工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高炉也没有全部点火。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能炼焦的煤。

多列士说，法国炼焦煤很少。皮杜尔错误地以为，只要把萨尔^①并入法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问题是萨尔的煤非常少，而且都就地加工或被运往德国其他地方。此外，萨尔的煤也不是炼焦煤，连萨尔当地还要从鲁尔进口焦炭。多列士说，洛林的几个区是冶金业的集中地。但这几个区不可能和萨尔合并，因为这些区和萨尔竞争，萨尔不可能给予补充。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北部煤炭情况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煤的产量比战前增加了 20%。这完全归功于矿工的干劲。法国共产党号召他们提高煤产量。然而，由于现在很多共产党员被排除在煤炭业领导部门之外，矿工们对此普遍不

① 萨尔原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州。1919 年根据“凡尔赛和约”，国际联盟委托法国对萨尔实行政治代管 15 年。1935 年根据全民公决结果，萨尔归属德国，法国在萨尔的煤矿也由德国赎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尔属法占区。根据 1956 年全民公决的结果和法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条约，1957 年 1 月 1 日起萨尔纳入联邦德国版图。

满，所以煤产量又下降了。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著名的200家家族代表是否都保留了下来。

多列士说，他们都留在法国。法国煤炭工业的国有化并没有取消给国家预算带来巨大损失的地租制度。在法国有4家银行被收归国有。但两家大银行仍留在私人手里，其中巴黎区的一家的副行长是戴高乐的兄弟。法国的电力公司和煤气公司需要大笔资金。资本家却不向这些国有化了的企业投资。

斯大林同志说，他们不乐意这样做。

多列士说，社会党人为美国人投资法国工业提供了机会。汽车工业中建立了法美合营公司。福特在泊松建立了企业。通用电气公司吞并了雪铁龙企业。美国的康采恩垄断了法国的电气设备。美国对法国经济生活的入侵在法国的殖民地上进展尤其迅速，比如在摩洛哥、法属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等地。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也向法国工业投资。

多列士回答说，投资的主要是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斯大林同志问，比塞大^①现在由谁掌握。

多列士回答说，比塞大仍归法国人所有。

斯大林同志回忆说，邱吉尔曾想染指比塞大。他当时表示英国人流了血，所以想得到比塞大。

多列士说，美国人在摩洛哥站稳了脚跟，而英国人则在突尼斯站稳了脚跟。在阿尔及利亚双方的利益相互交织，相互冲突。

多列士指出，共产党员的作用在很多法属海外领地有所增强。例如，加勒比海安的列斯群岛、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国民议会中2/3席位属于共产党人。共产党在黑非洲的影响也很大。法国国民

^① 比塞大是突尼斯北部港口。1881至1963年为法国海军基地。

议会有 12 名黑人共产党员议员。留尼汪岛的共产党员占议员的 2/3。吉布提有一个党员议员。多列士说，共产党人委任普梯^① 将军作为驻法兰西联邦^② 的代表。这位将军曾任驻莫斯科武官，回国后对苏联颇有好感并开始寻求同法国共产党人接触。后来他成为法苏协会的积极分子，和法国共产党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本人因此被解职退役。现在共产党人请他担任驻法兰西联邦的代表。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军队。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有士兵，但没有军队。法国现共有 50 万士兵。分布在德国、北非、印度支那半岛和其他一些地方。法国竟然派不出一个师去印度支那，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法国军队十分薄弱。法国军队用的武器都是从英国来的。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本国难道不制造武器吗？

多列士说，法国共产党人主张扩大法国的武器生产。但社会党人横加阻拦。多列士有一次去军工厂对工人们讲话时指出，为争取和平和民主及尽快打败德国人需要生产更多的武器。社会党人却利用这一讲话疯狂地掀起反对多列士和共产党人的运动。社会党人说，战争一结束，一切武器就都没用了。他们以此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诡计容易得逞，而向法国出口武器对英、美来说有利可图。社会党人还主张取消法国的航空工业。

斯大林同志问，没有军队，独立从何谈起。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有无总参谋部。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有的是司令部和将军，比士兵要多得多。

① 埃奈斯特·普梯（1888~?），1940 年加入“自由法国”运动。1942 年 3 月起为“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驻苏代表之一，1943 年 9 月至 1946 年是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后改称临时政府）驻苏军事使团团长。

② 法兰西联邦是根据第四共和国宪法成立的宗主国和法属殖民地的联合组织。法兰西联邦大会只是一个协商机构。

斯大林同志问，法国是否还保留了一些军舰呢？

多列士回答说，法国有一艘大型战列舰，此外还有一艘“黎塞留”号巡洋舰时刻待命。

斯大林同志说，该利用这些材料来打击社会党人。要揭露社会党人主张解除国家的武装。

多列士说，社会党人倒是从英国人那里弄来了一艘“哥伦布”号航空母舰。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一艘没有飞机的航空母舰。

多列士回答说，意大利人将保留军队，意大利舰队要比法国舰队强大得多，因为美国人把一部分舰只移交给了意大利人。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留给意大利人的舰只将予销毁。

多列士说，他不久前拜访卡特鲁^①将军，同他探讨了军队问题。多列士问卡特鲁，法国在目前状况下能做些什么。25年前德国人不给法国人煤，彭加勒就拿下了鲁尔。^②而如今英国人和美国人不但不给法国人煤，而且不让他们控制鲁尔，这时法国却束手无策。多列士对卡特鲁说，法国现在的处境竟然使其做不了彭加勒25年前做过的事。卡特鲁回答多列士说，法国没有军队，这一点他一直在对戴高乐说。

斯大林同志说，世事的变化真是耐人寻味。20年前把共产党人称作卖国贼，而现在保卫祖国的只有共产党人。共产党人，也只有他们提出了国家独立的口号。他们现在是最彻底的国家独立的保卫者。共产党人可以公开宣称只有他们在保卫民族的荣誉和实力。

多列士说，他想针对斯大林同志的这番话提请注意以下情况：

① 乔治·卡特鲁（1878～1969），法属印度支那总督。1940年加入“自由法国”运动。1945～1948年任法国驻苏大使。

② 1923年1月以雷·彭加勒为首的法国政府因德国拒付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赔款发动并组织了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煤田的行动。

20~25年前社会党人就反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他们当时打着社会爱国主义的旗号。现在他们一如既往地反对共产党及工人阶级，但却已明目张胆地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了。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蜕化了，大大蜕化了。斯大林同志说，拉马第是个大骗子，他指出，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多列士回答说，拉马第原来是外省的一个小律师和小政客。一度当过社会党员，社会党分裂后追随德阿^①。法国解放后他才重又参加社会党。

斯大林同志问，多里奥^②的下场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多里奥被炸死在德国。他死的时候还穿着德国军官制服。

斯大林同志指出：“无耻之极”。斯大林同志说，德国人进攻莫斯科时，多里奥从所谓的法国志愿者中组建过一支军队。

多列士说，多里奥是个胆小鬼，自己从来设法躲在后面。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多里奥是德国人的奸细。

多列士说，多里奥早在1925年，即27岁时就当了叛徒。有一次在和警察发生冲突时他踢死了一个警察。他因此被捕入狱，但只在狱中呆了8天，就被放了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他被收买了。

多列士讲，从此以后多里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充当法共中央

① 马塞尔·德阿（1894~1955），20~3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的积极分子。1933年被该党开除，成为法国的社会党的组织者之一，主张对法西斯侵略国实行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张法国法西斯化并和纳粹德国合作。1944年3~8月在维希政府中任部长。1945~1955年匿居意大利。

② 雅克·多里奥（1898~1945），1924~1934年为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1934年被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成立法国人民党，和纳粹分子勾结。战时参加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法国志愿军团。1944年逃往德国，1945年2月被炸死。

的反对派。1926年他反对党中央，斯大林同志在特别委员会中分析了多里奥的问题。1927年他反对共产党。1929年多里奥反对苏联和对苏友好政策。1934年，当法西斯威胁全世界时，多里奥却保护希特勒德国。他以为，法西斯无所不能。多里奥声称，德国法西斯既然能在德国取胜，也就一定会在其他国家取胜。

莫洛托夫同志说，多里奥是德国人的间谍。

斯大林同志指出，多里奥被警察招募了。后来法国警察当局把其间谍移交给了德国人，德国人接收了他。

斯大林同志，赫里欧^①近况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赫里欧现在是国民议会主席和激进党领袖。这个人有自己的主张。沦陷期间在激进党代表大会上的一次发言中他说，法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没有执行正确的对苏政策以及忽视了军备问题。达拉第^②发言反对赫里欧，他说俄国是法国的敌人，而德国才是法国人的朋友。

斯大林同志问，现在激进党有多大影响。

多列士说，激进党现在无足轻重。

多列士说，过去投票支持激进党的农民撇开人民共和党，直接投向共产党。这些农民具有反教权主义情绪，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承认法国共产党人在争取法国独立斗争中的功绩。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的朋友达拉第”在1940年到处兜售经芬兰出兵苏联的计划。

① 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法国共和党（激进党）领袖之一。在20～30年代多次出任政府部长和总理，主张和苏联合作。1924年赫里欧政府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32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947～1954年任国民议会（国会众议院）主席。

② 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共和党（激进党）领袖之一。30年代多次出任政府部长和总理。起初接受人民阵线纲领，后来促使阵线分裂。主张对法西斯侵略者实行绥靖政策，1938年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参与者之一。

多列士说，当时马西格利也在策划轰炸巴库。多列士说，莫洛托夫同志好像见过马西格利。

莫洛托夫同志开玩笑说，他有许多朋友，其中贝尔纳斯^①可以算作一个好朋友，他在他的新著中多次提到过莫洛托夫。

斯大林同志说，法国将掀起一个爱国主义高潮。法国的统治集团扼杀了国家，使它失去了军队、舰队和军事工业。

莫洛托夫同志说，所有珍视本国独立和电影及其他民族事业部门自主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来。

多列士说，经常有人指责共产党人说，共产党人尽管是爱国者，但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想法。戴高乐有一次就对多列士说过这样的话。

斯大林同志说，戴高乐自认为是将军，却不组建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茹安^②将军有什么消息。

多列士说，茹安现已退役。多列士说，从军事上来说，茹安将军才华横溢。他惟一的一个“污点”是被希特勒释放后由德国人派到北非作战。茹安是法国优秀军事将领之一，他学会了红军的作战经验。例如，有一次在意大利蒙德—卡西诺区战役中，茹安就运用了红军的经验。茹安告诉多列士说，他不损一兵一将就攻占了要塞，得力于他在该地区集中了大量炮兵，差不多每隔一米就安了一门大炮。在法苏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茹安开诚布公地说，他希望法国能有一支像苏联那样的军队。

① 詹姆斯·贝尔纳斯（1879～1972），1942～1945年美国战争动员署署长，1945年5月至1947年1月任美国国务卿。

② 阿尔丰斯·茹安（1888～1967），1939～1940年在法德战线上指挥一个师，1940年6月被俘。1941年6月应维希政府之请获释。1941年11月起是维希政府驻北非军队总司令。1942年11月美英联军登陆时投向盟军一方。1943～1944年指挥法国远征军在意大利作战。1947～1951年出任摩洛哥总督。

斯大林同志问，茹安和戴高乐的关系如何。

多列士回答说，戴高乐解除了茹安的职务，因为担心他会同自己竞争。戴高乐本人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斯大林同志开玩笑地补充说，戴高乐也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多列士肯定了这一点并说因为戴高乐从来就没有打过仗。

临别时斯大林同志预祝多列士及法国共产党取得更大成就。

谈话进行了2小时30分钟。

1947年11月18日17时